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近代英国史

 **BOOK**
内网资料 非同凡响

序 言

在古代、中世纪时期，英国这个大西洋中的蕞尔小岛，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被置于地球边缘的天涯海角。当时欧洲大陆的人，隔着英吉利海峡，隐隐约约见到不列颠岛岸边雾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称之为阿尔比昂。在古代诗歌中，这个名称就是指英国。至于岛上的具体情况，知道的人很少。直到中世纪，一些欧洲大陆的人还以鄙夷的眼光来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边的康士坦察召开的一次天主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的代表认为，英国不过是像丹麦、葡萄牙一样的小国家，它的代表不能与其他大国代表平起平坐，不应享有表决权。

但到了近代，英国一跃而为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在国际斗争中，它的代表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各国统治者无不对之刮目相看。靠了日益富强的国力和强大的海军，英国先后在16、17、18世纪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英国的船舰，驰骋于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以后它又将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步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凡阳光一天24小时照耀之处，都可以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旗帜在飘扬，英国近代历史也就成为这时期世界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像世界上别的国家、民族一样，英国历史也有它的特点，其重要特点之一是，长期而持久的议会传统。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的议会就一直存在，未曾长时期停止过。到17世纪时，议会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发动了推翻君主专制的斗争，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没有国王、上议院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掌握最高权力的共和国。这次革命是在欧洲封建制度发生危机的环境下产生的。它是欧洲封建制危机的最深刻、最尖锐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革命中，社会中下层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意气风发，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性。革命时期人民的精神焕发、热情蓬勃的气概，引起了当时人的极大振奋。诗人弥尔顿对此欢呼道，他好像看到一个强大的民族，“像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枷锁，奋然站立了起来！”

虽然后来克伦威尔建立的军事专政的护国公制，将革命的民主进程加以扼杀，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开辟了道路，但在王政复辟时期，王党分子竭力将历史车轮扭转回革命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经过二三十年的复杂斗争后，斯图亚特王朝再度被推翻，詹姆斯二世只得流窜国外，才逃脱了像他父亲那样被斩首的命运。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逐渐建立并巩固了起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体制。在这段时期，欧洲大陆和东方各国，普遍存在着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会各阶层劳动群众都在专制君主的枷锁下忍受煎熬。法国的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把国家与他个人等同起来。那些匍匐于他的足下的臣僚，阿谀地称他为“太阳王”。在“太阳王”的凡尔赛宫廷豪华奢靡的阴影下，有多少人在专制暴政的重轭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那个著名的巴士底狱“铁面人”的故事，只是由

阿尔比昂（Albion），来源于拉丁文 album，意为白色。

于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加以揭露，才为世人所共知。实际上远比这一事件更为凄惨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王国”，在“身穿裙子头戴皇冠的答尔丢失（骗子手）”叶卡特琳娜二世及“戴着王冠的警察”尼古拉一世的野蛮统治下，俄国的千千万万农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叶卡特琳娜二世曾先后把约达 80 万个农民赏赐给她的宠臣作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对这些农奴加以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在当时俄国的两家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新闻》上，经常登载着把农奴和跑马、猎犬一起出卖的广告。女地主萨尔蒂科娃把许多农奴活活折磨至死。在这些暴君的严密控制下，人们在公开场合只能听到对“太阳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颂德，但实际上，受压榨和迫害的千万劳动群众，却对残害人民的统治者怀着刻骨的愤恨。18 世纪时，法国的梅里叶曾尖锐地指出：“暴君是当代最大的强盗和刽子手。”俄国的拉吉舍夫在 1790 年出版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一书中揭露，在专制农奴制的俄国，农民遭遇的是“带枷的罪犯的命运、被囚于地牢的囚徒的命运、驱下牛马的命运”。他认为沙皇是“一切凶手中最凶残的凶手、一切罪犯中最严重的罪犯”；一死还不足以偿其辜，他应该“死一百次”。

和上述这些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具有相对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文化界人士得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人估计，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中，大约有 40% 都是由英国学者作出的。在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中，包括从牛顿到达尔文等一系列英国伟大的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也是群星璀璨，先后出现了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休谟、吉本、麦考莱、韦伯夫妇、汤因比等人；在文学艺术上，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萧伯纳等，更是妇孺皆知。

英国的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和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不仅为本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积极性奠定了条件，而且也为欧洲大陆专制君主制国家的进步人士提供了避难所。在近代早期，当法国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时，数万名胡格诺教徒逃到了英国。后来，在流亡到英国的大批人物中，包括马克思、赫尔岑等革命家、思想家。《资本论》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就都是在英国出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钟声》杂志，发表革命民主主义文章，鼓吹在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农奴制。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就是在伦敦的圣马丁堂成立的。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先进人士向往的榜样。18 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法国其他一些政治家，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示了对英国民主政治的向往。19 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政治制度是维新派人士效法的榜样。

英国历史上的另一特点是，从中世纪以来，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比较薄弱，同时它的社会阶级关系流动性比较大，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太严格。这些特点，对英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早期，英国没有常备军和固定的警察，甚至国王本人都没有固定的卫队，遇到紧急状况时，国王临时能够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不过几十人。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武装力量主要由民兵组成。直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世界上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最薄弱的国家之一。马克思曾根据这一点，

认为英国在客观上有可能通过实行普选权，用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这些特点使英国的政治生活具有相对的灵活性。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小的变动即可调整，不致蓄积起来，爆发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在英国历史上，除了17世纪革命时期的内战之外，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暴力斗争事件。

上述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阶级关系特征，造成了在英国各种政治党派政策中和政治思潮中浓重的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长期稳定的政治局势，社会阶级关系流动性、灵活性较大，对科学技术发明的鼓励，以及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等，加上其他自然条件，使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当英国工业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在大陆上，法国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法国大革命的翻天覆地的暴力场面所吸引，未曾注意在英国发生的不太喧嚣的经济技术变革进程。但一个多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却日益显现了出来。它不但在生产技术上和经济上引起重大变革，而且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生产技术上，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量和生产率成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棉纱产量增加了四五十倍，生产率也迅速增长；19世纪初，英国一个普通纺纱工纺出的棉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二三百个手工纺纱工同时间纺出的棉纱产量。

工业革命也大大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千万年的时期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在无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只能以依赖和屈从的态度去取得与自然界的协调。世界上大多数人，虽然终年辛劳，含辛茹苦，仍无法从自然界取得维持温饱的衣食。直到中世纪时，在欧洲，无论乡村或城市，约有一半的人经常处于难以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水平。遇到荒年，往往饿殍遍野。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英国的坎布利亚等地还曾有许多人饿死，甚至在首都伦敦也有饿死人的事发生。就全世界来说，工业革命前，即1750年，全世界人口约7.5亿人，以当时生产力的水平来看，全世界顶多只能养活的人为10亿。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激增，100年后，即1850年为12亿人，1950年为25亿人。虽然人口激增，但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足以保证全世界人口平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 actual 收入仍然增加了4倍。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因为它的结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时，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在增长。”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实际上超过了一般的政治革命事件。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在交通运输方面所造成的重大技术发展，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前，各地区和各国之间的交通非常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各地区、各国人民之间，永世隔绝，互不来往，这是造成人们之间互相隔阂、猜忌以至争战的客观因素。工业革命后，交通运输工具飞速发展，人际来往、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国与各地区都由统一的经济链条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之间利害一致性日益增强。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四海一家的前景越来越近。

然而，我们说近代英国的政治比较民主自由，只是与欧洲大陆及东方的专制君主制相比较而言。实际上，英国在近代历史时期，主权在民的民主进

程始终未能贯彻到底。即使在 17 世纪革命高潮时期，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当权派即已用残酷手段，将要求把民主进程深入发展下去的中下层人民，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平等派和掘地派加以镇压。平等派的领导人李尔本等被逮捕、监禁，要求民主的士兵阿诺尔德、洛克叶和汤普逊被枪杀。书报检查制度虽然在 1695 年被废除，并且以后也未再恢复，但揭露和批判现实政治腐败的作家仍遭到迫害。著名的威尔克斯案件就是一个例证。托马斯·潘恩也因为发表了批评英国政府的著作而遭受迫害，他不得不逃往国外。18 世纪末，英国国内激进民主主义兴起时，英国政府颁布法令，暂停“人身保护法”生效，又制订“叛逆行为法”和“叛乱集合法”，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违者将遭严惩，直至判处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满和叛乱种子”的罪名将激进民主人士托马斯·缪尔流放到澳大利亚。在 19 世纪英国进行的三次议会改革中，选举权虽然不断扩大，但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始终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一直到 1918 年第四次议会改革时，妇女才取得了选举权，而且年龄被限制在 30 岁以上。英国工人运动兴起后，英国统治阶级多次用武力对工人加以镇压。1819 年发生了“彼得卢屠杀”惨案。宪章运动时，政府调集军警，屡加破坏，最后竟命令“铁公爵”威林顿率大批武装力量来对付工人群众。

当英国作为国外先进人士避难所的同时，英国统治阶级在对外关系上却执行着镇压革命和殖民侵略的政策。法国革命开始后，英国统治者成了当时反对法国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从 18 世纪末到 1815 年的滑铁卢战役，英国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 20 余年的反法战争。在英国推行殖民侵略过程中，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广大地区抢占土地、屠杀人民、掠夺财货。英国国内的工商业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血汗。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坚船利炮，用血与火的手段，通过鸦片战争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的。所以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英国也扮演了反动的角色。

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在它的早期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财富飞速增长，但劳动群众却反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无论作为一个人或一个阶级，都不能像人一样的生活、感觉和思想”。拿卡莱尔的话来说，工业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工厂，不过是像“昏暗、肮脏的牢房”。1851 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世界博览会时，英国的产品琳琅满目，参观者都对之赞不绝口。英国的工商业者作为“世界工厂”的主人而志满意得。帕麦斯顿在讲演中说：“我们的民族显示出一个榜样，即在我们的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都以欢乐愉快的心情，接受了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然而事实却是，工业革命时期，在新的工厂制度下进行劳动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都处于非常悲惨的状况下。在迅速兴建起来的大城市中，社会秩序混乱，环境污秽肮脏，工人们麇集在嘈杂、喧嚣的厂房中，无日无夜地辛苦劳动。大工业城市成了没有诗歌、花朵和友爱的荒漠。英国学者哈孟德说，这些“新式的纺纱厂和新式炼铁厂，就好像是金字塔一样，把它们长长的阴影投射在这个以它们为自豪的社会之上。”工业革命后，“迈达斯的祸害”在社会上到处弥漫，就好像古希腊寓言中的国王迈达斯一样，人们贪婪地企图把一切都变成黄金，结果却丢掉了许多远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工业化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说明“人类社会的被奴役，而不能说明人类社会有力量”。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

现在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吸取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我国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比较晚。近代以前，中国和英国相隔万水千山，交通阻隔，互不相知。苏伊士运河开辟前，中国到英国，海路须绕道好望角，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才能到达。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帆船，即英国的“短衫”（Cutty Sark）号，从上海航行到英国，也需时四个多月。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长期锁国闭关的大门。在丧权辱国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先进人士，深感必须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于是着手研究英国等西方列强。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不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不仅是由于在武器装备上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后了。曾经到过英国的王韬就指出，英国的“富强之本”，并不在于它的“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所向无敌”，而是在于它的“君民共治”的立宪君主制及“巴力门”，即议会制。到19世纪末维新运动时期，研究英国政治、历史的人逐渐增多。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介绍西方的书籍大量出现。1919年到1949年，出版了以英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大约有五六十种。不过大多是翻译的，中国学者自己所写的各类英国史著作只有五六本。

1949年全国解放后，英国史的研究也像其他学术部门一样，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论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它表现在：左的教条主义比较严重；对历史上的暴力事件一味歌颂，对和平渐进的历史现象则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而且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不是以史实为基础，而是只凭摘引经典作家或政治领导人的片言只语为标准。在对外学术交流中，1960年前主要是“学习苏联”，以后和苏联的联系也断绝。中国学术界处于完全和外界隔绝的状态中，即使偶而得到一些片断的、间接的资料，也都蒙上阴暗消极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中国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英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也在天昏地暗之中，完全停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左的恐怖路线得到纠正，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英国史的研究也开始了新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几年里，在英国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强烈的逆反情绪：即凡是过去被崇尚、歌颂的暴力行为，凡是过去被贬斥批判的改良事件，都有人从相反的角度重新加以评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逆反情绪渐趋平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态度和自由探讨的风气开始形成。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我们得以接触到英美等国出版的有关英国史的著作和资料，结果发现，近几十年来，在英美整理出版了不少有关英国史的新资料，特别是许多新论著大量涌现。在这些论著中，提出了许多和以前不同的观点。可以说，差不多所有英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都有新论点提出，有些甚至把以前的观点完全推翻了。我国学者在掌握了这些新资料和论著后，经过细心的学习、研究，得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些独立见解的取得，一方面是学者们个人潜心钻研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实践上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站在这个社会实践的基点上从事历史研究，就看到了前人所未曾看到或看得不深、不全面的问题。这正如19世纪初法国的基佐在他写的《1640年英国革命》一书序言中所说，他虽然不是英国人，不比英国历史家掌握资料更多，但他以对法

国革命的亲身体验去观察以前的英国革命，就得出了比缺乏这些经验的历史家们更深刻的体会。当代英国历史家希尔也说，英国历史家在研究英国革命史时的第一个困难是，他们“很少有革命经验，从17世纪以来，英国的传统一直是渐进的，革命这件事只是我们从书本上才知道的”。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有分析地吸收英美学者近年来的一些新成果，同时也把我们在学习、研究中所取得的独立见解反映出来。

不过，虽然我们力争以严谨的研究为基础去从事这本书的撰写，但也只能把它看成是我们学习、研究的一个阶段。以后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期把英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对书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尚希读者批评指出，以便在以后改正。

参加本书撰写的，都是南京大学英国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他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分别担任有关章节的撰写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王觉非（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1、2节，第六章），张廷茂（第四章第3、4、5、6节），吴必康（第五章），钱乘旦（第七章），沈汉（第八章），陈仲丹（第九章第1、2、3节），陈祖洲（第九章第4节），陈晓律（第十章第1、2、3节，第十一章第1、2、3节），潘兴明（第十章第4节，第十一章第4节）。

陈仲丹编制了译名对照表。

王觉非 1994年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17 世纪初的英国 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革命前的英国社会经济

一、17 世纪初的英国经济

农业

在 17 世纪革命之前，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占最大的比重。全国人口中，大多数都居住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来源也依赖于农业。各地区的居民基本上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其日常生活用品大多也是本地生产的。一般的农村居民穿用兽皮、麻布或粗帆布制的简陋衣服，穿着打了平头钉的鞋子，用木制的盘子进餐，主要的食品是黑面包。

与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不同，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农业很早就与市场发生了联系。早在 13、14 世纪时，英国的农村已成为佛兰德尔和佛罗伦萨发达的呢绒业的原料，即羊毛的供给者。后来，英国本国的呢绒业也日趋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不断增长，羊毛的价格也随之上升。到了 15 世纪末，英国越来越多的贵族将原来的耕地改为牧场，饲养羊群，收剪羊毛投入市场以赢利，农村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

当时英国人养羊业之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6 世纪末（1598 年），一个到英国旅游的外国人对此写道：“英国的居民宁愿养羊而不愿耕种，将近 1/3 的土地被停止耕种而用于养羊。在英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养出来的羊的羊毛，其柔软和洁白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国家。”到了 17 世纪初，英国全国人口中，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农村，但农业生产已与市场有了紧密的联系。农民已不再仅仅为了本地居民的消费而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把农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出卖。许多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从下面的例子中也可看出一斑：在 17 世纪初，为了便于把各地区的粮食运送到伦敦等中心城市去买卖，制造出了许多复杂的运送粮食的工具，这些工具供远至达拉姆及其它郡的农民使用。据 1608 年格罗斯特郡的人口职业调查，当时该郡的人口只有 1/2 还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其余的人都从事其它职业，如丝织业、制革业和饮食加工业等。即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农闲时也从事手工业或其它行业，而手工业者也以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

自从 15 世纪末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随着欧、美之间的交往日益发展，

Cf.C.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8, P.20.1653 年 8 月 1 日，李尔本在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追随者都是一些“中等阶层人士”，他们穿着打着平头钉的鞋子和皮围裙等。Cf.W.Schenk, *The Concern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48, P.64.

W.B.Rye (ed), *England as Seen by Foreigners in the Day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I*, 1865, P.109.

F.J.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in Carus - Wilson (ed), *Essay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Vol.I, PP.135—151.

R.H.Tawney, *An Occupational Censu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ical Research*, 1st Ser. V, 1935, PP.25—64.

美洲的大量白银不断输入欧洲，加上当时英国当地的人口迅速增长，市场需求量增加，因而引起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发生了“价格革命”。据统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1540—1640），英国的物价上涨了6倍，在16世纪中叶（1540年）以后上涨速度更快，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靠固定的货币收入为生的人，经济状况趋于恶化，特别是那些收取传统的固定货币地租的贵族。由于货币贬值，收入相对减少。而那些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人，其收入却不断增长。16世纪末，将土地出租给租地农业家而收取资本主义地租的农业家，每亩租税为1先令，到了17世纪初，每亩的租税上涨至5—6先令。而那些按照古老的方式从事经营的地主，他们从公簿持有农那里收取的传统地租却照旧不变。于是许多贵族就改变经营方式，以适应新的形势。其主要方式之一是圈地，就是把土地圈占起来，以从事新的经营方式，或者将土地出租给租地农业家，以收取资本主义地租。

圈地

所谓“圈地”，就是把农村中从很早时候起就已普遍存在的“敞田”用栅栏圈围起来，成为整片地段，在这片地段上养羊或从事其他耕作，如种植新的农作物。“敞田”是一种古老的土地制度，它将土地分割为许多条条块块，按土地肥力、水源状况等不同条件，平均分配给许多不同的农民。当耕种时，各人耕种属于自己的地段。但这些地段不仅互相交叉，而且每个农民的地段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区，耕种起来非常不便。当这些地段上的农作物收获以后，各地段的疆界将“敞开”，以供所有农户放牧牛羊或收割柴草，因而，“敞田”制虽有它的有利的一面（秋收以后，贫苦农户可在“敞田”上收割柴草以谋生计），但它对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圈地的现象很早就在英国发生了，不过，到15世纪末羊毛价格迅速上涨时，圈地运动才大规模开展起来。最初，圈地主要是为了养羊，后来随着市场上对粮食和原料作物需要的增长，圈地渐渐地被用以发展农业。从地区上看，圈地首先是从与市场联系较紧密的东南地区开始的，而在圈地运动中最积极的是那些在“价格革命”中受影响最大的中小贵族，即乡绅。被圈占的土地，先是公地和荒地，后来连农民的份地也被圈占。大批农民被从圈占的土地上赶走，他们丧失生产资料，到处流浪或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圈地虽然并非地主单方面以暴力进行的掠夺，有时也是农民与地主订立协议的结果，在17世纪这样的协议曾在大法官庭登记，但圈地所引起的农民悲惨的境遇和造成的社会上的灾难性的后果，却是无可否认的。关于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祸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p.21—22. 物价指数是以英国南部的几种日用必需品的价格而制订的，因为只有英国南部的物价数字保存了下来。见上引书。

关于“敞田”制对农业生产起了阻碍作用的观点，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他们指出，在“敞田”上也可应用新的农业技术和种植新的农作物。到17世纪初，在“敞田”制度下所进行的改进工作仍然在进行。Cf.D.N.McClosky, *The Persistence of English Common Fields*, in W.V.Pasker and E.L.Jones (eds),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1976.

害，早就有人不断提出抱怨，并且引起英国政府的严重关注。早在 1488 年亨利七世时，在一项法令中即已指出，怀特岛上的人口减少，是由于将耕地变为牧场的结果。随后又颁布了一项“防止破坏村庄法”，进一步指出圈地是引起一些严重社会灾害的根源。为了保持农业的稳定，防止将可耕地变为牧场并将农舍破坏，英国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圈地的法令，并在 1517 年成立了以沃尔西为首的“圈地委员会”。然而这个委员会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它的成立，不过是表明以前的许多反圈地的法令大部分都被漠然置之罢了。从 16 世纪初到 16 世纪中叶，英国接连颁布了一些类似的反圈地的法令。当时的人如牧师拉蒂默等对圈地运动所造成的人烟荒芜、农民流离失所等悲惨状况，都发出了凄厉的呼声。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关于“羊吃人”的悲叹更是人所共知：

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以后，

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的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

圈地运动不仅使农村残破，而且有些城市也受到影响，工商凋蔽，田庐为墟。16 世纪中叶，布里斯托尔的一份陈情书上说，该城有 900 所房屋荒废而无人居住。

农民对圈地运动不断反抗。1549 年，有好几个郡都发生了因圈地而引起的农民起义。约有 3500 个起义参加者被打死，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凯特被处绞刑。1607 年，米德兰又爆发了起义。1640 年革命前夕，在英国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农民反圈地的事件，被圈占的土地上的栅栏也被拆毁。

圈地运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首先，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英国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农业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它促使英国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和市场等条件。其次，圈地运动导致了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在圈地运动中，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式贵族，有的是原来的封建贵族，亲自参加资本主义经营，有的是将土地租给租地农业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这些新式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与阻碍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势力作斗争。

改进农业的新措施

由于粮食市场的迅速扩大，再加上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应付这种需求，当时的人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如：采用新的农作物和

E.Kerridge, The Returns of the Inquisition of Depopula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IXX, 1955, PP.212—218.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21 页，第 22 页。

G.R.Elton, Reform and Renewal, 1974, P.107.

新的耕作方法和耕作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改良肥料等。此时，欧洲的低地国家荷兰等地的农业比较先进，它成了英国效法的榜样。英国的农学家写文章介绍低地国家的农业成就，并将荷兰等国的先进农业方法应用到英国农业中。

在耕作方法上，在 16—17 世纪，英国的农业多采用轮耕制，即在一段时期（约 7—12 年）将土地作为牧场，另外再用一段时期（约 2—5 年）用作农田耕种农作物，用这种方法来保持土地肥力，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同时，许多农民还耕种新的农业作物，特别是新的饲料作物，如油菜和芜菁。这些农作物的种植，大大缓解了饲料不足的问题，对养羊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本来，养羊业在英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羊毛不但可作为呢绒业的原料，而且羊粪也是当时英国农业中的重要肥料来源。耕地常常由于得不到充足的肥料而无法提高产量，要提高产量，就必须饲养更多的羊（19 世纪中叶化肥发明之前，英国农业中所用的肥料主要是畜肥）。当时英国人养羊，首先是为了收取羊毛，其次是为了用羊粪作肥料，然后才是将羊肉用来食用。但是由于饲料问题未解决，到了冬季草枯叶黄，羊无饲料，不得不大批宰杀。如此，由于饲料不足，就引起了一连串消极的连锁反应。

到了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新的饲料作物从低地国家传入英国，首先是油菜，然后是芜菁。油菜的菜籽可以榨油，供食用或点灯，它的副产品可用作饲料，在冬天可用来喂羊。芜菁也是从低地国家传入的，在 17 世纪初已在萨福克郡种植了。以后别的饲料作物也相继传入。到 17 世纪中叶，在诺福克和萨福克等采用新的饲料作物的地区，羊的数量大大增加，不但羊毛增产，而且大大缓和了肥料的困难，也增加了土地的肥力。这一地带种植的大麦产量增加，作为提供给伦敦的粮食和酿酒的原料。

不过，在当时由于气候和土质的不同，英国有的地区采用了新的饲料作物，有的地区则不适于新的饲料作物的栽培。一般来说，在东盎格里亚和英格兰西部的砂质地带种植新的饲料作物的较多，而在米德兰各地，那里板结的土质则不适于种植新的饲料作物。

16—17 世纪，英国的农业和土地耕作方式已呈现出多样性，各地已逐渐有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有的学者把当时的英国划分为 40 个不同的农业经济区，也有的学者将之划分为 10 个，每个区中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农业地区。但为了简明，我们可以把革命前的英国划分为两大各具特色的经济地区。这两个地区大致的划分界限是：从西南部沿海的卫默思到东北部的梯斯默思，在这条线以北和以西的地区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高地；在这条线的东方和南方，以低地和可耕地为主，并以混合农作物为特征。

为应付粮食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通常的办法是扩大耕地面积。英国的耕地面积，从中世纪以来时增时减，这是由于人口的增减变动而造成的。13 世纪和 14 世纪初，英国的耕地面积曾大大扩大，但后来由于黑死病肆虐，人

以前都认为芜菁是在 18 世纪时由唐森德子爵（1674—1738）传入诺福克的，唐森德因而获得了“芜菁唐森德”的称号，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早在 17 世纪以前，从低地国家传入的芜菁已在萨福克等地种植了。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Chap. 2.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7, Vol.IV.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1978, P.32.

口锐减，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16 世纪末、17 世纪初，许多人移居到坎伯兰、西莫尔兰以及英国西南部其他地区，特别是萨克斯和肯特的旷野。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的格罗斯特郡、威尔特郡、北安普顿郡等地还发生了农民从原居的村庄向公有地和荒地迁徙开荒的运动。

总的来看，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业品种、新的饲料作物以及增施肥料等措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据粗略地估计，15 世纪末，每亩土地的产量为 $8\frac{1}{2}$ 蒲土耳其（1 蒲土耳其 = 36.368 升），到 17 世纪中叶增加到每亩 11 蒲土耳其。

工业发展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工业迅速增长。不但老的工业部门如采矿业、炼铁业、羊毛加工业、造船业等不断发展，而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包括棉纺织业、玻璃制造业、肥皂业及丝织业等。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采煤业，根据达勒姆、诺桑伯兰等 10 余个地区的资料，1551 年—1560 年，煤的年产量为 21 万吨，到 1681 年—1690 年，年产量已增长至 298.2 万吨。增长最快的时期是 1600 年—1660 年，从地区上看增长最快的是东北部。这一带煤矿的发展，甚至使诗人约翰·克里夫兰诗兴大发，他在诗中写道：

英国是个完完全全的世界，无所不有，它甚至拥有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你应该校正一下你的地图：纽卡斯尔应是秘鲁！

他把以纽卡斯尔地区所盛产的黑煤比之于南美的白银！

当时英国的煤产量比欧洲其他国家煤产量的总和还要多 3 倍。采煤工业的发展，为一些老的工业部门如炼铁业及新的工业部门如造纸、制糖等工业采用新技术并大规模地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像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这些工业部门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当时开采一个煤层，至少需要上千镑资金，这是一个普通工人许多年才能挣到的钱。同时大规模的工业还需要众多的劳动力，纽卡斯尔的煤矿约有工人 500—1000 人。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独立的手工工匠已无从问津，这只能由握有大量资金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雇佣大批工人去从事经营。

铁的产量也有所增长。不过，由于它的起点低，绝对产量并不高。年产量 16 世纪 50 年代为 5000 吨，到 17 世纪 50 年代增至 2.3 万—2.4 万吨。而且铁的质量也不如某些外国的好，有时还需要从瑞典进口大量质量较好的生铁，其价格比英国的还低。以前有人认为，由于木材砍伐过多，燃料缺乏，

C.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8, P.62.

M.K.Bennett, *British Wheat Yield Per Acre for Seven Centuries*, in W.E.Mindinton, *Essays in Agrarian History*, 1968, PP.53—72.

由于当时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含有一定推测的因素，不过，“它也许提供了一个发展趋势的合理的准确的图景。” J.U.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1932, Vol.I, P.19.

C.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1966, P.80.

J.Thirsk and J.P.Cooper (ed),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1972.

Barry Caward, *The Stuart Age*, 1980, P.17.

所以铁的产量降低了。但这个说法，已为新的研究所否定。虽然在英国的个别地区，木材短缺，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并未出现燃料短缺现象。这个时期，生产铁的中心从萨赛克斯、肯特转移到了米德兰西部和约克郡南部等地，这并非由于前者缺少木材，而是因为它的铁矿石质量不好。同时，这时的冶铁方法也有了改进，16世纪时用的是土法吹炼，现在则为水力鼓风炉所代替，效率提高了5—10倍。

不过，不能过分夸大16—17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工业发展水平。因为在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的工业从整体来说，仍然处于手工工场阶段。英国经济学家奈夫把这个时期英国工业的发展形容为发生了一次工业革命，其意义仅次于18世纪末的那次更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这一说法，未免过甚其词。事实上，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并以分散的手工工场为主要形式，羊毛加工业更是如此。这些分散的手工工场，大多由商人提供给农村的农户以羊毛等原料，由农民和农家妇女在家内进行加工。另有集中的手工工场，它们大都存在于采矿、冶金、玻璃和造纸等工业部门中。即使在这些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大规模的企业也属少数，除了少数大规模企业之外，一般也只是雇佣少数工人进行生产。工人中，还有一些是利用农闲到工场去作临时工的农民。

直到17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和土地。英国的工业部门绝大多数和土地这种当时人所说的英国的“自然财富”有联系，如：铁矿、铅矿、锡矿、谷物、皮革、蜂蜡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制造出来的产品主要也是用于居民的直接生活消费。同时，制造这些产品的劳动力大都是农民。工场产品的原料基本上都经由农民之手。而工场中的工人，不论固定的或临时性的也大都来自农民。农民关心他们的原料的销售，也关心他们到工场后的工资待遇，即使是冶铁业、采矿业等部门的生产，也与农民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当时的铁制品许多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铁钉、铁锤、刀子、斧头等。

直到17世纪革命前，纺织工业仍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15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英国纺织品出口价值大约增长了15—16倍，如把物价增长也计算在内，则增长5—6倍。到17世纪，呢绒仍占英国出口价值总额的3/4。不过，纺织业的生产技术并无多大改进，只发明了一种织袜机。由于价格昂贵，很少有人买得起。

商业贸易

革命开始前的100多年，英国的商品经济在迅速增长。1492年哥伦布发

Hammersley, *The Charcoal Iron Industry and its Fuel, 1540—1750*,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 2nd Ser. Vol. XXVI, 1973, PP. 593—613.

J.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1932, Vol. I, PP. 19—21.

Cf. D. C. Coleman,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75, P. 70.

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1933, P. 71.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1978, P. 75. 当时缺乏关于生产产品产量的统计资料，出口贸易是唯一可以间接显示国民生产数量的指标。

现“新大陆”以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英国正处于从欧洲到美洲的通道上，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受益匪浅。不过，这时的海上贸易的霸权地位，先后操纵在西班牙、荷兰之手，英国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16世纪末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开始向海上迅速扩张，英国的商人跟随海员和海盗之后，走向了海外世界。当德雷克率领的海盗在西印度群岛一带横行之时，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活跃在离英国越来越远的地区。

16世纪前后英国出口的商品已不再是以原料如羊毛等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特别是呢绒成了出口商品的大宗。而伦敦又是呢绒出口的最重要的中心。15世纪中叶，伦敦出口的呢绒占全国呢绒出口价值的1/2强，到了16世纪中叶，伦敦已把90%的呢绒出口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时伦敦出口的呢绒约10.5万匹，大部分出口到德意志和荷兰，其余则出口到波罗的海、近东各国以及法、俄、意等国。

这时，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大约在1490年—1520年，安特卫普进入鼎盛时期，英国的大部分呢绒都是运往安特卫普的。同时，由于伦敦的繁荣也造成了伦敦附近地区的财源发达、人文荟萃，成为英国最富庶的地区。其余地区，特别是西北部的一些港口如波斯顿、布里斯托尔、桑普顿等，则逐渐衰落。布里斯托尔的呢绒年出口量一度曾达到3355匹，而在16世纪50年代时，年出口量只有2312匹，跌落了31%。

从伦敦到安特卫普的呢绒贸易原来由汉萨同盟的商人控制。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商人冒险公司将汉萨同盟排挤了出去。1597年，汉萨同盟设在伦敦的商栈被关闭，商人冒险公司控制了从伦敦到北欧各国的呢绒贸易，当时它占整个英国呢绒出口贸易额的1/2。

到了16世纪70和80年代，安特卫普由于战争、粮食匮乏、饥荒和移民等原因而急剧衰落。由于安特卫普属于同英国敌对的西班牙，为了摆脱在对外贸易上依赖安特卫普的地位，为了克服“一条商路、一种贸易、一个商业公司”的状况，英国商人冒险公司于1564年离开了安特卫普，到波罗的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东方去寻找新的贸易基地。16世纪末，在英国出口的总数为10.5万匹呢绒中，7.5万匹出口到德意志和荷兰，1.2万匹出口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6500匹出口到近东，6500匹出口到法国，其余的出口到俄国、意大利等国。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英国成立了许多股份贸易公司。最初这是一些商人自愿共同出资组成的公司，他们装备长途航行的船只以进行海外贸易，后发展成为领有政府的正式特许状，获得特权和专卖权的公司。这时成立的重要公司有：莫斯科公司（1553年）、商人冒险公司（1564年）、西班牙公司（1577年）、东陆公司（1579年，从事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利凡特公司（1581年，从事近东贸易）、东印度公司（1600年）、弗吉尼亚公司（1606年）、法国公司（1611年）、百慕大公司（1612年）、马萨诸塞公司（1628年）等。这些公司的贸易范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沿岸各国、美洲殖民地、东方的印度及“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

C.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1966, PP.69—70.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1978, P.51.

C.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5*, PP.69—70.

二、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等级

人口

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口，历来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出的数字也只是一些近似的估计。他们大多是根据载有炉灶税调查或住户调查的纳税花名册，或者是根据教区登记簿中的出生、受洗、丧葬、婚嫁等的登记，然后根据每户大致有多少人口去推算而得出近似的人口数字。17世纪末格里戈利·金的统计就是这样得出来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英国从1470年—1520年到1640年—1650年的100多年中，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显，此后的100年中，人口数字基本稳定，到了18世纪末才又有了较快的增长。据估计，从15世纪末到1550年，增长曾暂时中断，后又继续增长，到1580年大约为350万。到1600年时，英格兰人口数已达到410万人，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人口约190万人，到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达到顶峰，将近530万人。在这段时期，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从600万人增加到770万人。以后人口即稳定不变，甚至还稍有下降，在英格兰下降到410万人，整个不列颠下降到730万人。

为什么在1650年以前的100多年中英国人口持续上升，但以后又下降？对这个问题，迄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家庭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因为在英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通常情况下，如不发生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人口的增长趋势是很自然的。但事实上，英国人口的增长率一直比较低。这是由于英国人有晚婚的习惯。在1600年—1649年，结婚年龄男子为26.7至29.2岁，女子为24.8至27.3岁。大约有10%的妇女到成年时还未结婚。所以女性的生育期大约只有12—15年。晚婚的原因是，青年人需要积存足够的钱财以建立独立的家庭；也有些人在年青时，为了学业，要等到高等学校毕业才结婚。后来结婚的平均年龄又稍有推迟，这可能是由于一般青年人实际收入下降，积存足够维持独立家庭生活的钱财需要更长的时间。

有些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当时英国人的家庭中有简单的避孕、节育现象。如一般已有3个子女的家庭，父母就采取避孕措施，母亲在哺育第3个或以后生的子女时，有意地延长哺乳期几个月，以达到避孕的目的。还有的学者发现，在贵族中存在着较普遍的独身现象。根据对17世纪南威尔士贵族的研究，在主要的贵族家庭中，有1/3的家长是独身。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减，对经济、社会、政治都会发生影

Gregory King,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for England*, in J.P. Cooper and Joan Thirsk (eds), *17th Century Economical Documents*, Oxford, 1972.

R.M. Smith, *Population and its Geography in England, 1500—1750*, in R.A. Dodgson and R.A. Butlin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1978, pp. 205—207.

Cf. J. Morrill, *The Stuarts, 1603—1688*, in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1984, p. 288. 由于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各书所载人口数字不完全一致。

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1986, p. 68.

J. Morrill, *The Stuarts 1603—1688*, in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1984, p. 288.

响。当人口增长过快时，如果粮食收成不好，就不能供应过多的人口以粮食而发生饥荒。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包括伦敦在内的一些地区，可能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至于 16 世纪 20 年代在坎布里亚曾发生不少人饿死之事，则是确实有资料记载的。

在这段时期，英国人口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城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英国最大的城市是首都伦敦。16 世纪 20 年代，伦敦有人口 5—6 万人，1600 年增至 20 万人。到 17 世纪中叶，它有人口 40 万人，不仅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大的城市，超过了法国最大的城市巴黎（35 万人）。不过，除了伦敦之外，英国虽然还有 20 个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但人口数都远较伦敦为少。如人口数仅次于伦敦的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等城市的人口，都只有 2.5 万人。伦敦的人口比英格兰其余 50 个城市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伦敦以及其他城市人口的增长，并非由于自然的人口出生增长的结果，相反，当时大多数城市中人口死亡率很高。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是移民。据统计，从 1560 年到 1625 年，迁居到伦敦的人每年约 5600 人。在地区上看，各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增长较快，有的则较慢；在年代上也不平衡，有的年代增长得快，有的年代慢。

城市作为工商业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乡绅和富裕农民。他们或者在这里出售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或者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有的则开商店、经营工商业。这些城市不仅与附近地区的城市或乡村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与较远地区甚至海外发生商业联系。一个名叫威廉·斯陶特的人，到兰开斯特开了一家商店，他从四面八方置办货物，甚至贩来西印度的糖和美洲的烟草。

城市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人们有的为了政治的或法律的原因，有的为文化娱乐而到城市中来。伦敦除了约 40 万人的常住人口之外，每年还有几十万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善性”的迁徙，另一种是“生存性”的迁徙，即前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或寻找好的职业而迁徙他处；后者是被生活所迫，在家乡无以为生，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生计。

17 世纪时，英国人迁往海外者约 30 万人，第一次超过海外迁入英国的人口。迁往海外者大多是远渡大西洋迁到西印度群岛，其次是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迁往海外的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他们为了寻找职业或改善生活环境而远走他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到 17 世纪 50 年代，有些罪犯或流浪汉也被流放到海外。迁往欧洲大陆者只有一小部分。

从海外迁到英国来的人较少。16 世纪时，英国曾是欧洲大陆一些人逃避

J. Morrill, *op. cit.*

E. A. Wrigley, *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560—1750*, in 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 1978, pp. 220—221.

C. W. Chalklin and M. A. Hanvinden (eds), *Rural Change and Urban Growth, 1500—1800*, 1974, p. 55.

Cf. J. D. Marshall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Stout of Lancaster*, 1967.

彼得·克拉克在研究肯特郡的人口迁徙时，提出了“改善性”的和“生存性”的迁徙的区别。P. Clark, *The Migrant of Kentish Towns, 1580—1640*, in P. Clark and P. Slack,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1972, p. 7.

宗教迫害的避难场所，但到 17 世纪，欧洲大陆和美洲反倒成了英国国内逃避宗教迫害的人的避难地。不过，到克伦威尔取消对犹太人在英国居住的法律限制后，有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到 17 世纪 80 年代，当路易十四迫害胡格诺教徒时，有些胡格诺教徒也逃到英国。

社会等级

中世纪时，欧洲人一般将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种职能不同的等级：僧侣，其任务是祈祷；贵族，其任务是佩剑作战；第三等级，其任务是纳税和劳动。随着历史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这种以职能来把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的概念已不再适用。

到了中世纪末期，一种新的理论产生并在社会上逐渐流行。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犹如自然界生物的机体一样，各个等级有不同的分工，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并发挥不同的作用。这种分工是合理的、自然的、由上帝认可的。它们是自然界、宇宙间“万物的链条”中的一部分。1547 年在英国颁布了一份《服从之道》，它定期在教区的教堂中加以宣讲，其中说道：“全能的上帝在天上、地下、水域中创造了万物，并规定了万物完美的秩序。他规定了在天上的天使长和天使们的不同等级和形态，在地上他指派了国王、公爵以及他们之下的其他统治者，他们排列有序……上帝为各行各业、各种公职的人都指定了各自的责任和等级。有些人地位高，有些人地位低，有的是国王、公爵，有的是下属、臣民。他们或是僧侣或是俗人，或是主人或是仆人，或是父亲或是子女，或是丈夫或是妻子，或是富人或是穷人……”

这种社会划分为等级的观念，在 16 世纪时在英国盛行，直到 17 世纪，仍为许多人所信奉。1602 年莎士比亚在《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中，借一个角色之口，说到这种担任不同职能的社会等级的不可变易性和神圣性。

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遵行着各自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

根据当时的人的社会等级观念，社会上所有的人，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都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信奉不疑。然而究竟社会区分为哪些具体的等级，却并不明确，而且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1577 年，威廉·哈里逊写道：“在英国，我们通常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绅士，绅士又可分为贵族、骑士、乡绅；第二等人是公民和市民；第三等人是自耕农；第四等人包括工人、贫穷的农夫、手艺人 and 仆人，也就是那些“被统治的而不是统治别人的人。”然而，这四等人的界限却并不是很清楚

基思·赖特逊：英国近代早期的社会阶级，载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95 页。

特罗伊罗斯和克瑞西达，见《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 卷，第 140—141 页。

的。如关于“绅士”(gentleman),威廉·哈里逊说,绅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统或至少因其美德而变得高贵知名的人”。也就是说,绅士的地位可以因其出身或美德而获得。不过,哈里逊又说,绅士是那些因为有财产而“毋需自食其力,因而能够并愿意支付作为绅士身份花销和行为举止费用的人”。

这样就令人感到“绅士”这个等级有些含混不清。另一个比较含混的等级是所谓“自耕农”(yeoman)。哈里逊说,“自耕农”是指那些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他们有的是那些从绅士手中租用土地的大农。但哈里逊又说“自耕农”是“某种享有优越地位,并且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优越地位是由于他们“生活富有,享有好的住宅,靠勤劳而致富”。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使“自耕农”这个概念令人无法具体掌握。

另一个同时代人托马斯·威尔逊在1600年左右把英国人分为:贵族、公民、自耕农、手工工人、农业工人。威尔逊着重分析了贵族,他把“议会贵族”与一般贵族分开。一般贵族即“较低级的贵族”,如骑士、乡绅、绅士等。另外,他把职业工作者如律师、官员、高等和中等教士放到了乡绅阶层中。

根据威尔逊的记载,在1600年左右,英国共有61个世俗贵族,其中包括1个侯爵、19个伯爵、2个子爵、39个男爵。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3607镑;500个骑士,平均年收入为1000—2000镑;1.6万个绅士,平均年收入为500—1000镑。

从托马斯·威尔逊的叙述中令人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即17世纪初英国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财富相差悬殊。不过,除此之外,他的等级划分的标准也是相当混乱的。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曾说:“许多骑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样富有,而且并不比许多伯爵差多少。”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不同的划分法。

这种社会等级界限混淆不清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如一般认为,“乡绅”(gentry)的明显标志应该是“有权持有盾形的纹章”。但是当时人平时所称呼的一些“绅士”(gentleman),其中很多人都无持有纹章的权利。1625年—1642年,在柴郡的大法官庭所登记的398个“绅士”中,只有5人获得持有盾形纹章的权利。1600年在兰开郡的自由持有农的登记簿中的770个自由持有农,除去7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冠以“绅士”的称号。

社会中下层等级的称呼也没有严格的标准,特别是“自耕农”(yeoman)和“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没有确切的含义。有些人,他们的邻居称

F.J.Furnivall, *Harrison's Description of England*, 1877, P.105.

F.J.Furnivall, *op.cit.*

F.J.Fisher (ed), *The State of England Arto Dom 1600*, by Thomas Wilson, 1936, P.17.

F.J. Fisher, *op.cit.*P.23.

17世纪后半期(1676年),肯特郡的一个副牧师在回答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封信中详细地谈到在他管理下的一些人。他把这些人的家庭分为5等:绅士家庭;自耕农家庭;商人家庭;工人家庭;穷人家庭。Cf.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1979, P.66.

J.S.Morrill, *Cheshire 1630—1660: Coun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4, P.14.

J. P. Cooper,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 and Men in England, 1436—1700*,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 2nd.Ser.Vol.XX, 1967, P.426.

呼他们是“自耕农”，但是他们却自称“绅士”（gentleman）。

前数十年中，英美历史学界关于“乡绅问题”的著名论战也涉及到了等级概念混淆不清的问题。陶尼曾指出，“被称为‘贵族’和‘乡绅’的这些社会集团，他们的界限互相溶合于彼此之中，这些名词所包含的主观意向和客观事实一样的多。”

总之，社会等级的概念混淆不清，没有严格的界限，是英国社会等级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欧洲大陆诸国如法国等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社会等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当时的人如哈里逊、威尔逊等人都讲到了这一点。16世纪末的国务秘书托马斯·史密斯曾说道：“至于说到绅士，在英国做起来既实惠又方便。”只要能支付一定的生活费用，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并逐渐赢得邻居和社会的承认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上富裕一点，生活方式上适当加以注意，就可以取得“绅士”的称号。这样，“绅士”这个等级的流动性就相当大。在社会等级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尽可能向上层等级攀登，如果在他们向上爬的过程中遇到障碍，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排除这些障碍。这也正是革命的一个动因。

Barry Coward, *The Stuart Age*, 1980, P.39.

R.H.Tawney,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Postscript*, in E.M.Carus - 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I, 1954, P.214.

基思·赖特逊：英国近代早期的社会阶级，载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节 政治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

一、专制君主制的衰落

君主专制由盛而衰

英国的专制君主政体经历了从发展、鼎盛到衰落的过程。15世纪玫瑰战争中，封建大贵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在内战中互相残杀，两败俱伤。而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羽翼未丰，尚不敢在国内政治问题上轻举妄动。相反，资产阶级为了能顺利发展自己的经济，希望能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并能抑制封建大贵族的割据和内讧。1536年发生的罗伯特·阿斯凯领导的天主教的反叛，1569年北方封建贵族的暴动，都是依靠了强有力的都铎政府的中央权力才将之平定的，商人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拥护。在这方面，为数众多的中小贵族的愿望和资产阶级是一致的。他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够遏制封建大贵族，使他们不能太专横跋扈，或进行互相厮杀等破坏行为。此外，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人士还指望依靠强大的中央政权击败强敌西班牙、法国，抗拒罗马天主教对英国事务的干涉，并向海外进行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至于英国的议会，虽然长期以来并未完全停止召开，但是直到16世纪90年代之前，议会实际上经常与政府保持一致。而且直到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下议院夺取“主动权”之前，上议院一直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议会很少与国王政府发生冲突。在有些问题上，议会不过起政府的下属机构的作用，形同政府的传声筒，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处仰政府之鼻息，不敢稍有异议。在上述情况之下，英国的专制君主制就得以巩固起来。

不过，即使在16世纪英国专制君主制相对巩固的时期，它与欧洲大陆如法国等国的专制制度仍有所不同。如英国没有常备军和有组织的警察力量。革命前，遇到紧急情况时，国王临时能够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只有几十人；其次，英国的议会一直未停止活动；另外，英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不够强大，而地方政权却很有势力。这些情况也对以后英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影响。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贵族在经济上日益壮大，他们对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以及特权公司依仗王权垄断重要的商业贸易等行为，不再甘心忍受。这时国内外的宿敌也已被打倒：在国内，16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高级僧侣受了沉重的打击；在国外，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大削弱了西班牙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及一部分贵族已不再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保护。相反，他们同专制君主的矛盾日益上升到首要的地位。君主专制制度丧失了它的统治基础。17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家哈林顿当说到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时曾指出：正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死亡一样，君主专制政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崩溃的。英国的君主专制经过了16世纪的鼎盛时期，到17

Cf. James Daly, *The Idea of Absolute Monarch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XXI, 1978, pp. 227—250.

James Harrington, *Oceana*,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by Stuart E. Pfall, 1968,

世纪初已濒临崩溃了。

清教的兴起

法国学者莫乃在他的《法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一书中强调，启蒙学者的思想在激发人们进行反封建斗争，促进法国革命的爆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如果旧制度只受到思想威胁的话，那么这对它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要使思想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人民的贫困，政治的腐败等现实社会的矛盾，这才能使思想发挥作用。不过，也应该知道，只有思想才能激发人们起而行动。”实际上，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法国革命时，大多数人都比较重视革命前法国的思想发展及其在鼓舞、动员人民进行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学者们在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时，一般对革命前的思想发展及其在激励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够重视。英国历史家希尔有鉴于此，注意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前的思想文化状况，并专门写了一部书：《英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书中研究了培根·雷利和柯克等人的思想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

在英国，17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有人说，17世纪的“科学文明”的出现是“基督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历史现象”。而在17世纪，英国的培根等人是世界科学思想上发挥最大作用的人。

但是不可否认，17世纪英国革命前的思想发展，不如法国革命前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发展水平之高及作用之大。英国革命家的思想是通过宗教的形式，即清教而发挥出来的。

“清教”原本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名词。它原是一种蔑称，用来称呼宗教中一些激进的、对教会领导不满的人，后来被用于政治领域，成了具有政治含义的概念。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在议会的议员中，有些人被人称之为“清教徒”，他们的人数占议会总人数的3/4。按当时人培根的意见，所谓“清教徒”就是那些“暴乱的、闹派性的……和教会的领导相敌对的人”。另一个同时代的人亨利·帕克认为“清教徒”可分为四类，即“第一，在教会政策上的清教徒；第二，在宗教信仰上的清教徒；第三在国家事务上的清教徒；第四，在道德上的清教徒。”一般来说，所谓的“清教徒”的思想，在革命发生前很久就已产生了。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关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管理制度方面的。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将英国国教加以“净化”，将其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清除”掉。他们比一般的新教教徒更加激进，具有更强烈的

PP.24—31.Cf.R.H.Tawney ,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 1941 , P.161.

D.Mornet ,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 1933 , P.476.

Cf.C.Hill ,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1980 , P.2.

H.Butterfield ,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 1949 , P.174.

C.Hill , op. cit.P.111.

C.Hill ,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 1976 , PP.15—22.

S.R.Gardiner , History of England , 1624—1628 , Vol.I , 1893 , P.178.

J.Spedding (ed) ,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 1874 , Vol.XIV , P.449.

H.Packer , A Discourse Concerning Puritans , 1641 , P.13 ; C.Hill , op.cit.P.22.

新教意识。有人说，清教徒是“更为狂热类型的新教徒”。清教思想以其激进的内容，吸引了许多社会中下层对现实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的世俗人士对它表示支持，但通常所说的“长老派”和“独立派”与这个时期的清教并无关系。作为一种教派的英国“长老会”，实际上在16世纪90年代已因受到魏特吉夫特和班克洛夫特的迫害而停止存在了。后来英国的长老会是在17世纪40年代由于同苏格兰订立的同盟而从苏格兰引入英国的，前者和后者并无连续性。而“独立派”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派别，是内战爆发后才产生的。 —

P. Collinson,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1967, P.27.

Cf. C. Hill,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1976, P.30.

二、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君主统治

詹姆斯一世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位为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即位时，表面上看一切都相当顺利，然而这时客观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的一些有利因素在现实的客观环境下逐渐雪融冰消。

詹姆斯一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表兄达恩莱的儿子，从血统上说，他是亨利七世的后裔，对英国王位具有合法的继承权。虽然伊丽莎白女王一直未正式宣布过他为继承人，但16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些迹象表明，伊丽莎白女王有意叫詹姆斯继承王位。所以詹姆斯是在未遇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和平登上王位的。在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王位递嬗过程中，往往发生权力斗争并引起政治混乱。1553年发生的诺桑伯兰的叛乱就是一个例证。詹姆斯能够顺利地登上王位，实属幸事。虽然在1604年曾发生过一次企图拥戴阿莱贝拉·斯图亚特的阴谋，并曾因此而逮捕了科海穆勋爵和瓦尔特·雷里爵士，但有人怀疑这是罗伯特·塞西尔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捏造出来并故意加以渲染夸大的事件。另外一个有利于詹姆斯的因素是，詹姆斯即位为英国国王时年已37岁，已有了相当的政治经验。

以前有些学者把詹姆斯说成是生性愚蠢，缺乏常识，“不但不了解英国人，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法律和传统。”有些英国以前的教科书也把詹姆斯一世说成是“基督教王国中最聪明的傻瓜”。这些看法已为新的研究所否定。有的著作指出：“詹姆斯一世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在处理下院议员所造成的许多困难问题时，显示出了相当的聪明才智。”

詹姆斯一世在英国所遇到的挫折，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生性愚蠢。他在苏格兰当国王时，不论在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方面都遇到一些麻烦，但他却能够将这些困难顺利解决，可是到了英国却处处碰壁。可见问题并不在他本人的性格和能力，而是环境不同了。自1604年起，詹姆斯一世的内外政策不断受到批评指责，到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时，“分歧开始剧烈地扩大”。

詹姆斯一世的内外政策

在政治上，詹姆斯像他以前的许多君主一样，是一个“君权神授论”者，他认为君主对他的臣民享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1610年4月，他对集合在

如伊丽莎白女王在给詹姆斯的信中，教导他应如何进行统治。伊丽莎白政府的一些大臣，特别是罗伯特·塞西尔，在伊丽莎白晚年，力图与詹姆斯接近，也显示出詹姆斯将登王位的迹象。 Cf.G.E.Aylmer,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 1603—1689*, 1971, P.11.

Wallace Notestein, *The House of Commons, 1604—1610*, 1971, PP.504—505.

这个讽刺性的绰号最初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对詹姆斯一世的称呼，后来在英国传开。有一本关于詹姆斯一世的传记，书名就是标的这个绰号。W.McEl-wee, *The Wisest Fool in Christendom*, 1958.

Robert Zaller, *The Parliament of 1621*, 1971; Robert E.Ruigh, *The Parliament of 1624*, 1971.

T.Rabb, *The Role of the Commons, Past and Present*, No.92, P.78.

白厅的上、下院的议员说：“国王在上可以行使一种神圣的权力，”他可以“任意处死他的臣民：或加提升、或加贬斥；或生、或杀；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除了上帝之外，国王不对任何人负责……”詹姆斯在苏格兰时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的，并且许多困难在他的专断独裁的措施下都得到解决。这更增加了他的绝对专制君权的信念，然而在英国他却发现此路不通。有人说他是“苏格兰的统治者中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但作为英国国王，却至少可以说是相对地失败了”。

在财政问题上，詹姆斯一世的政府也遇到很大困难。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政府的固定收入实际上日渐减少，早在伊丽莎白时期，政府的岁入已出现了亏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却发财致富。政府企图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向这些富裕起来的人收税，以解决财政困难，但这直接触犯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很大不满。终于在财政、税收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反对国王的斗争。

在宗教上，17世纪初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英国国教。詹姆斯一世原属苏格兰的长老派，长老派在宗教上对英国国教采取批判的态度，这一点使英国的清教徒对他入主英国抱有一定程度的欢迎和希望。1603年清教徒就曾向詹姆斯一世递交了一份“千人请愿书”，其中提到请求改变现行的宗教祈祷仪式。1604年，在汉普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詹姆斯一世表示同意清教徒所提出的一些建议。然而这些允诺，后来都未加以实施，清教徒继续受到迫害。

一些天主教徒，对詹姆斯未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状况甚为不满。以罗伯特·卡特斯比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在吉倚·福克斯的帮助下，在1605年11月进行了一次“火药阴谋”事件。他们在议会的地下室放置火药，企图炸死詹姆斯一世及其家属，但阴谋败露，为首者被捕并被处决。1606年重新制订了旨在反对天主教的刑法。

在外交问题上，外交事务常常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因为当时欧洲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国家，形同水火，经常发生冲突。对英国的新教徒来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不仅是他们向海外扩展商业的劲敌，而且也是宗教信仰的敌人。所以在英国一直弥漫着一种反西班牙的民族情绪。但詹姆斯一世即位后，却抱着与西班牙和解的态度。他即位伊始就宣布禁止英国船只掠夺西班牙的商船，并于1604年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结束了延续19年的战争状态。在缔约时，詹姆斯未利用英国在战争中占优势的有利地位，在条约中未包括英国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与西班牙的殖民地经商权等内容。1604年3月他在议会的发言中阐述他的“和平”外交方针：“外部和平对一个基督教国家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他们邻近的国家保持和平，可以使城市繁荣，商贾富裕，商业兴盛，国土上的各阶层人士都可以在他们各自的事业中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不会遭受危险和干扰。”有人说他的外交政策是“他的统治时期最可耻的失败”；并说，这是因为他成了当时西班牙驻英大使贡

C.H.Mcilwasin (ed),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1918, PP.307—308; David Wootton (ed), *Divine Right and Democracy, An Anthology of Political Writings in Stuart England*, 1986, P.107.

Alan G.R.Smith (ed), *The Reign of James VI and I*, 1979, P.1.

J. P. 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66, PP.132—134.

J.R.Tanner (ed),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1625*, 1960, P.25.

朵玛尔的“应声虫”，“詹姆斯一世的脆弱的性格在这个火热的西班牙人面前胆怯畏缩了”。这种指责虽为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否定，然而究竟詹姆斯一世为何采取这种在英国不得人心的外交政策，却有些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詹姆斯一世是个泛和平主义者，他想在欧洲建立普遍的和平，与各国都保持友谊。出于这个考虑，他把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的选帝侯普法尔茨的腓特烈，与此同时，他从1614年起又一直努力想使自己的儿子查理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国王的公主结婚。当1618年“三十年战争”开始后，德意志的新教国家与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同盟交战，尽管交战中有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即信奉新教的腓特烈，而且他们和英国又是同一宗教信仰，詹姆斯一世却并未对之进行有力援助，而且继续与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继续进行与西班牙王后联姻的谈判。他以为，靠了他个人的影响，可以使西班牙恢复和平，但西班牙对此置若罔闻。他这样的表现，看来并非如有的著作所说，是因为他“缺乏现实感，未估计到英国的现实利益和当时英国大多数人的反西班牙情绪”。詹姆斯一世作为一个国王，而且是一个已有了多年统治经验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超脱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看来他的上述表现，目的可能是在于，保持和强大的君主专制的西班牙的关系，以加强他在国内所要推行的君主专制政策。同时，也可能是他想借助西班牙的天主教影响，来牵制在英国迅速兴起的、难以驾驭的清教势力。

查理一世统治的开始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查理继位，即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继位之时，英国的国内外局势，并无特别的反常现象，没有出现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历史上王位交替时常出现的动乱形势。然而，1625年查理一世的即位，却标志着17世纪20年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原因为何？有的学者认为“最明显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答案是：查理一世这个新国王的个性”。当然，在君主专制制度条件下，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他个人的性格、行为不可能不对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查理一世，生性刻板，寡言少语，平时生活严格按自制的时间表进行，一周之内只有一天和外人见面。另外，他对宠臣白金汉公爵委以重任，言听计从，使后者在1628年被暗杀之前权势日隆，炙手可热，也使宫廷大臣的意见和不满不能向查理一世面陈，而是流向了别的渠道，特别是影响了议会，议会中不满的声浪日趋高涨。查理一世的个性和行为当时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当时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起更大作用的却是现实因素。首先，从16世纪后半期以来，英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成长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原来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秩序瓦解了。那些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阶级，不仅努力奋斗以继续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而且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要求，以便能用政治手段排

D. H. Wilson, *King James VI and I*, 1956, P.364.

Alan G.R.Smith (ed), *The Reign of James VI and I*, 1979, PP.14—15.

B.Coward, *The Stuart Age*, 1985, P.136.

Pauline Gregg, *King Charles I*, 1981, PP.122—123.

Derek Hirst, *Court, Country and Politics*, in Sharpe (ed), *Faction and Parliament*, 1985, PP.111—112.

除那些妨碍他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封建政治屏障；而那些在新的经济变动中日趋衰微的阶级，则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以图保住自己正在或将要失去的地位。至于社会上为数众多的中下层人民，平时他们任人剥削、宰割，抗诉无门，现在在整个社会变动的形势下，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开展斗争。在此基础上，政治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组织形式，议会里出现了不定型的“反对派”。在思想领域，表现在“清教”形式的激进思想影响不断扩大。另外一个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影响的客观因素上文已提到，是英国国家制度中的某些特点及其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上述的英国的军事警察制度和财政制度中。英国是一个岛国，平时不需强大的陆军来保卫，所以英国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正规的警察人员，即使国王的仪仗队也没有（到复辟时期才建立起来）。这样，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就缺少有组织的强制力量作为支柱，在这方面，和欧洲大陆一些强有力的绝对君主专制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财政制度方面，英国国王主要的固定收入有两项：一项是王室土地的收入，一项是关税收入。都铎王朝时期以来，由于“价格革命”，货币贬值，王室土地的实际收入不断降低。王室为了弥补亏空，不断将一部分土地出售。除了这两项固定收入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收入，如出卖垄断专卖权、卖官鬻爵、出售王室森林等。但临时性的收入，只能解救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王室的财政困难，所以国王在财政问题上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进行借贷。到查理一世即位时，国王已是债台高筑。资产阶级和贵族已不愿再借钱给国王。最后，国王不得不求助于另一项收入的来源，即议会补助金。这是一种为了应付特殊需要，由议会通过决议所征收的特殊捐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1624年—1630年英国同西班牙、1626年—1629年同法国发生战争，国王无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支付战争费用，使这个矛盾更趋尖锐。由于国王未能通过议会征收补助金，只好行使国王的特权，强迫各地人民交纳强制性的捐税，结果又引起中央同地方的敌对情绪。

在宗教问题上，查理一世支持当时英国教会中的“阿米尼安派”，这也引起了英国许多人士的强烈不满。“阿米尼安派”原指荷兰莱顿大学神学教授阿米纽斯所创立的一种宗教教派，又称抗辩派，它反对正统的卡尔文主义。

但是在英国，“阿米尼安派”一词是泛指那些拥护劳德大主教所宣扬的一种具有天主教色彩的教义和仪式的人，它受到清教徒皮姆等人的激烈抨击。原来一些英国国教徒，也由于对阿米尼安派的天主教精神的反感，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转入清教阵营。

近年来，有一些“修正派”历史家，否认在17世纪初英国议会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说，把“反对派”这个名词应用到300年前的历史上去，是时代观念的混淆，是把现代的政治词汇“陛下反对派”应用到300多年前的历史中去了。虽然在17世纪的议会里确实曾有过反对国王、王后、国王的宠臣顾问等的言论，但这些言论都无严格的原则性意义，也未引起过宪法冲突。Kevin Sharpe, *op. Cit.*, P. IX. 但这一说法，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反驳。有的学者指出，有确凿的材料足以证明，在内战前夕，在议会里确有反对派存在。R. Zaller, *The Concept of Opposi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1980, PP. 211—234.

Cf. J. P. Cooper,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ed. by J. S. Bronley and E. H. Kossmann, 1960.

G. F. Moore, *History of Religion*, Part , 1920, P. 355.

权利请愿书

议会在赋税问题上与查理的矛盾日趋尖锐。查理为了进行对外战争，需要议会通过征收更多的赋税供他使用。但在第一届议会时（1625年6月至8月召开），议会只同意查理征收一年的吨税和磅税。吨税和磅税都属关税，从亨利六世以来每个国王都可终生征收，所以议会这项决议，对查理一世是个打击。查理既无法从议会的正常税收中得到足够的金钱，就实行“强迫借贷”（所谓“强迫借贷”即国王不经议会通过而任意征收的捐税。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时都实行过。）。凡拒绝交纳者，即加以迫害。结果发生了“五爵士案件”。1627年3月，5个爵士因拒绝交纳“强迫借贷”而被捕。5个爵士要求对他们按法律进行正常审理，或者交保释放。最高法庭拒绝保释，但关于国王是否有权不指出罪行而任意逮捕人的问题，也未加明确判定。1628年不得不将5个被捕者释放。

议会对查理一世的行为甚为愤慨，为了表示抗议，在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主要内容包括：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不出示具体罪证不能任意逮捕人；和平时期不能随意实行军事法；不得任意在居民家中驻军等。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随后又按自己的意见任意加以曲解。他声称，他只批准了一项古老的传统权利，而不是一项新权利，并且表示当出现问题时，只有法官才能对这个文件进行裁决，议会无权对之进行解释。随后，查理一世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拒绝交税时，查理即将议会解散。

五个爵士是：约翰·科尔伯爵、托马斯·丹尼尔爵士、瓦尔特·艾尔爵士、艾德蒙·汉普顿爵士、约翰·海维宁赫爵士。J.P.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966, PP.106—109.

David Wootton (ed), *Divine Right and Democracy, An Anthology of Political Writing in Stuart England*, 1986, PP.168—171.

Pauline Gregg, *King Charles I*, 1981, P.184.

第三节 革命形势的形成

一、无议会的个人统治

矛盾的尖锐化

1629年3月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以后直到1640年4月重新召开会议，其间11年，是查理一世实行无议会的个人统治的时期。本来英国以前也有几个国王实行过无议会的统治，例如，亨利八世即位初期，在红衣主教沃尔西统治下有7年未曾召开过议会；在詹姆斯一世时，在1610年—1614年间，以后又在1614年—1620年间，也未召开议会。不过在查理一世的无议会统治时期，国内矛盾已越来越尖锐，国内逐渐呈现出山雨欲来的情景，查理企图用停止召开议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不但未达目的，反而使原有的矛盾更加尖锐。

由于害怕不满情绪的不断蔓延，查理即加强对反对派人士的迫害。9名反对派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中。对书刊进行严格检查，任何对政府不满的言论都不准发表。但是这时，群众不满的浪潮已汹涌澎湃，像一股洪流一往无前地发展起来，查理一世以一种“愚蠢的骄横”来对待群众的不满，只能使形势更趋恶化。

1636年，英国各地出版了各种内容的小册子，其中有的谴责国王对天主教徒的宠信，有的批判宫廷的腐败行为，也有的反对劳德大主教及其他主教的专断独行。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它们在每个市镇传播，并被发送到最边远的乡村。”还有些人从荷兰偷运一些有关清教内容的小册子到英国来加以散发。查理一世的政府用进一步的高压手段来恐吓民众。1637年6月，清教评论家威廉·普林尼、清教神学家伯顿和清教徒医生巴斯特威克被捕，并被送到王室法庭受审。普林尼在1633年就已因写了抨击政府的小册子而被逮捕，并被带枷示众，割去耳朵。现在这三人又被带枷示众，当众加以鞭打，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当6月30日他们带着枷被押往威斯敏斯特时，沿途跟随了许多同情的群众，他们在路上撒满了鲜花和芳草。普林尼向在场的群众说：“我们所以这样不惜牺牲，是为了你们的普遍的幸福和自由！”1638年，清教宣传家约翰·李尔本又受到当众鞭打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因是他散布宣传清教的小册子。

本来，在当时的英国，人民惨遭迫害之事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然而，“像这样使上帝的圣徒淌洒鲜血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政府的这些迫害行为，非但未将人民吓倒，反而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情绪。有些对政府不满的清教徒，为了寻找信仰自由，逃往美洲殖民地。从1603年以来的30多年中，迁到海外去的清教徒有6万人。

F.Guizo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1640, 1851, P.63.

J.Rushworth, Historical Collections, 1980, Vol. , P.324.

Pauline Gregg, King Charles I, 1981, P.276.

F.Guizot, op.cit.P.64.

H.N.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8.

群众运动的兴起

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查理一世仍旧一意孤行。他不顾“权利请愿书”的规定，不经议会同意强行征收“船税”，这对社会上已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更是火上浇油。拒交“船税”很快发展成为群众运动。

船税在伊丽莎白时代即已开始向沿海港口和沿海城市居民征收，这是用来代替以前由这些地方的居民装备船只到王家海军服役的义务。改征船税以后税额固定，由治安法官征收，直接交给郡长，然后由郡长上交海军大臣，很少被挪用。所以当查理一世刚恢复船税时，人民的反应还比较平静。但到1635年，船税由原来只向沿海城市征收扩展到内地城市，并且以后3年连续征收而不间断，似乎变成了固定的捐税。根据“权利请愿书”，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捐税，而这项税收未经议会同意，所以有人不愿交纳。丹比勋爵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抗议书，要求立刻召集议会讨论这一问题。瓦维克伯爵在宫廷当着查理一世的面说，他“不愿伸出一个手指强迫他的佃农去违心地交纳船税，除非国王召集议会加以通过”。1637年，议员汉普顿和赛伊勋爵在议会提出一个审查案，拟审查船税是否合法。查理无奈，为了逃避议会的审议，就将这一问题提交法官去裁决。法官中除2人外，其余的人都投票同意国王有征收船税的权力。原来表示反对的法官，也以服从多数为名签署同意的决定。这样，查理一世就更加有恃无恐，用强迫手段逼迫人民一律交纳“船税”。而人民却认为这是违背“权利法案”的非法行为。在许多郡里都爆发了抗交船税的浪潮。萨摩塞特郡的人民，还认为国王的决定侵犯了该地人民享有的古老的、公认的权利。由抗交船税而激起的抗议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不过，从1634年到1638年冬，国王以强迫手段仍旧收到了90%的船税。这一情况，到了同苏格兰的战争危机到来时，完全改变了。1639年实际上收到的船税，只达到应交的20%。

苏格兰起义

当英国国内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抗议浪潮日趋高涨之际，由于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倒行逆施政策，苏格兰起义爆发。苏格兰起义使查理一世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不得不结束他的无议会的个人统治。

苏格兰虽然自1603年以后与英格兰共有一个国王，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教会组织。16世纪，苏格兰完成了宗教改革，长老派的信仰在苏格兰占据统治地位。詹姆斯一世时，在苏格兰推行长老会组织与主教制相结合的制度。而查理一世则打算如同在英国一样，也在苏格

C.V.Wedgwood, *The King's Peace*, 1972, P.146.

Ibid.P.57.

David Underdown,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1985, PP.124—125.

M.D.Gordon, *The Collection of Ship Money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rd.Ser.Vol.IV, 1910, P.143.

Ibid.PP.143—144.

兰实行阿米纽斯教会。早在 1629 年，劳德就催促查理一世把英国的祈祷书在苏格兰推行。1633 年查理一世访问苏格兰时正式决定这样做。这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极大不满。但查理一世仍我行我素，对苏格兰人的不满非但不加考虑，反而加强镇压。1634 年，发现巴尔玛利诺勋爵处有一份反对采用新祈祷书的请愿书，查理即下令以叛国罪将之逮捕。这一事件，使苏格兰人更加愤怒，加上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更趋复杂。到 1637 年 7 月正式采用新祈祷书时，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11 月间，苏格兰人选出了一个常设的代表团体，1638 年 2 月这个团体起草了一份“民族公约”。公约宣称他们不接受新的宗教法规和新的祈祷书，但整个文件的口气比较温和，其中并未提到反对主教制的问题。然而，查理一世仍旧坚持顽固立场，使和解的可能化为泡影。11 月，“公约派”在格拉斯哥开会，宣布取消主教制。双方已失去妥协的余地。苏格兰的“公约派”组织了一支军队，决心要为苏格兰的宗教和政治独立而战斗。1639 年，苏格兰“公约派”的军队攻入了英国国境。

为了应付苏格兰的反抗，查理一世要求召集武装的民团。但民团的费用无着，查理一世虽然在 1637 年至 1638 年之间增加了农民所负担的赋税，但仍然不足以应付这批军事费用。伦敦城区的商人也拒绝借钱给国王去从事战争。在柴郡等地甚至发生了以武力袭击收税人的事件。查理一世既在各地都得不到支持，只得在 1639 年 6 月 18 日在贝尔韦克同苏格兰人订立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查理同意苏格兰人有权召集议会，同时双方都把军队解散。

C.V.Wedgwood, *The King's Peace, 1637—1641*, 1972, P.108.

J.Morrill, *Cheshire 1603—1660, Country Government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4, P.29.

二、革命形势的形成

短期议会

停战协定虽然订立了，但问题并未解决。苏格兰的“公约派”并未根据协议解散军队。当年秋天，他们在格拉斯哥召开会议，表示否认查理一世对他们的统治权。

9月，查理一世将翁特沃恩（他在1640年被授予斯特拉福伯爵称号）从爱尔兰召回，任命他为主要顾问，征求他对当前局势的对策。当翁特沃恩听说对苏格兰的战争需要费用达30万镑时，认为如不召集议会，通过新的税收，则无法筹措这笔费用。查理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召集已停止了11年的议会，企图要求议会通过他所需要的经费，以使用以同苏格兰作战。然而议会召开以后，非但拒绝通过国王对经费的要求，而且提出了议会应该享有的权利问题。查理一世气恼之下于5月5日又将之解散。这届议会存在不到一个月，在历史上称为“短期议会”。

长期议会的召开革命形势成熟

苏格兰的起义在不断扩大，“公约派”的军队在纽伯恩击败了英王的军队，随后占领了纽卡斯尔（所谓“主教战争”）。在英国国内，伦敦及其他一些城市的手工工人和城市平民发生了骚乱。许多地区的人民要求重新召开议会，仅伦敦一地就有1万人在要求召开议会的请愿书上签名。1640年9月，查理一世在约克召开了一个由贵族参加的“大委员会”，但参加会议的贵族也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一世无力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于10月在里朋与苏格兰人订立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查理一世的政府被迫每天付给苏格兰人850镑费用，直到最后和约签订为止。另外，还规定，必须在苏格兰人撤出英国之前交付苏格兰人30万镑赔偿费。但即使这笔款项，查理也无处筹措。他不得已只好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以后断断续续存在到1660年，史称“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召开后，成了反对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的中心，所以一般将之作为英国革命的开始。

第二章 革命年代（1640年—1660年）

第一节 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内战

一、长期议会的召开革命的开始

长期议会的召开

早在长期议会召开前，英国各地城乡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已风起云涌，层出不穷。

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饥寒交迫的下层群众，本来就已怨愤满腹，当他们听到“短期议会”被解散的消息时，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于是纷纷起而抗争。特别是在伦敦郊区，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大批小生产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无依无靠的“无主之人”。他们大批涌入伦敦等大城市谋求生计。据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1569年，伦敦的“无主之人”达3万人之多，到17世纪初，他们的人数进一步增长。这些人与伦敦市内及郊区的帮工、学徒、水手、脚夫一起，形成庞大的队伍。他们不断举行大规模示威，甚至捣毁监狱，释放人犯，要求惩办王党的首要人物。有些群众还冲进坐落在市郊的大主教劳德的住处。农村中则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城乡劳动群众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查理一世为首的统治机构陷于瘫痪。1640年8月28日，一份有12个贵族签名的请愿书说，当时英国到处是一片混乱，军队里军纪废弛，士兵甚至公开进行抢劫，人民普遍感到不满和恐惧。查理一世的政府既无力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困难，又无力应付苏格兰人重启战端的威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于1640年11月3日下令召集新的议会，即“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议员的选举是在全国群情激动的状况下进行的。“这时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很少有人支持王党的候选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都落选了。”高韦康和大马尔罗等地所谓的“市井之徒”，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以与王党贵族的候选人相竞争，并且取得了胜利。而那些著名的反对封建王党的激进人物如皮姆、汉普顿等人，以及许多刚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成员都当选了。据统计，后者重新被选入议会的达294人。

据一些学者研究，1620年—1650年是英国历史上经济最坏的时期。Joan Thirsk,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 1967, PP. 620—621.

C.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1975, P.31.

S.R.Gardiner, (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27, PP, 134—135.

F.Guizo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1640*, 1851, P.85.

I.J.Ashford, *The History of the Borough of High Wycombe*, 1960, PP.133—134; M.R.Frur, *The Election of Great Marlow in 1640*, *Modern History*, No.XIV, PP.434—445.

R.N.Kershaw, *The Election for the Long Parliament 164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23, No.152.

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成份和政治态度

“长期议会”在1640年11月3日召开后，成了反对王党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中心。不过，在“长期议会”中，虽有不少议员要求国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但他们并无将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就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的议员全是贵族，而且在下院的500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这些贵族议员虽然有很多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或与资本主义经济有联系，因而对王党限制他们的经济发展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感到不满，但他们毕竟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将封建制度彻底消灭。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议员，大都是上层资产阶级，其中有些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他们的经济来源依赖于封建宫廷。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投靠封建王党。例如在出身于伦敦商人的议员中，有12人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他们在内战开始后都支持王党。其余的议员在反对封建制度方面也有一定局限性。一旦革命危及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会畏葸不前。1641年，一个议员在解释他对“自由”的理解时曾说：自由是“根据一定的法律，我们得以知道，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奴仆和我们的财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建造，我们耕作，我们播种，我们收获，是为了我们自己。”可见，他们所要求的“自由”的核心是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剥削奴仆的权利。在这里包含了两个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要素，即既要反对封建王党，又要防范劳动群众的“过激”行为。诚然，这时的议会中也有极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议员，如皮姆、汉普顿、马尔腾等人，然而他们人数少，在议会中没有足资依靠的力量。革命开始之后，王党的各项阴谋之所以被粉碎，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初步胜利，并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决定性的力量并非是议会中议员的活动，而是全国各地，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劳动群众不断的斗争。这在斯特拉福伯爵审判案中得到了反映。

斯特拉福审判案

斯特拉福伯爵是群众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皮姆等人就提出要求审判斯特拉福的议案，然而议会中的一些保守议员却竭力阻挠，甚至干脆不出席议会。1641年4月21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的议案时，500多个议员中，只有263个议员出席。群众对议会中的这种情况甚感愤慨，经常成群结队到议会示威。成千上万市民签名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严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之下，下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了“褫夺公权法”，判处斯特拉福极刑。但当这一法案送交上院后，却遭到上院的拒绝。查理甚至扬言要对反对

Cf.D.Brunton and D.H.Pennington, *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 1954, PP.19—20.

C.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58, P.15.

Sir Thomas Aston, *A Remonstrance Against Presbytery*, 1641. Cf.C.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962, P.188, P.44.

I.Pearl, *Lond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61, P.216.

C.V.Wedgwood, *Straford*, 1957, PP. 319—320.

派人士动用武力。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群情激愤。曾经目睹这一情景的人记述说：“霹雳一声，全城的人都发动了，店铺全部关闭，群众人山人海地跑到西敏宫[议会所在地]，”一连两天包围并冲击议会，不断高呼：“制裁，制裁”的口号。当上院的议员乘车前来开会时，群众冲上前去质问他们将如何投票，并将反对该议案的议员的住宅捣毁。议会开会后，云集议会外的群众在墙上张贴标语，责骂那些反对这个议案的议员是“斯特拉福分子，祖国的叛徒”。5月8日上院投票表决时，群众的声势对议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影响，结果上院以37票对11票通过了这个议案。

但根据当时的制度，议会通过的法案，需经国王批准才能生效。查理一世拒绝批准这个议案，他一再向斯特拉福表示，他的“生命、荣誉和财产都不会被牺牲”。群众对国王竭力包庇自己宠臣的行为非常气愤。5月9日，大批群众涌到国王的住处白厅。宫廷里上上下下，惊慌失措，乱了手脚。王后和侍女们吓得赶快躲进自己的房间，“又是颤抖，又是祈祷，时刻防备着群众会立刻攻入宫门。”查理一世在群众运动的汹涌浪潮面前胆战心惊，不得不赶快签署了法案。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处于危险中的话，我将乐于冒险拯救斯特拉福伯爵的生命，但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儿女以及我的整个王国都被牵涉到这件事上去时，我被迫让步了。”5月12日，当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上处死时，聚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据当时目击者威尼斯驻英国大使周凡尼·朱斯提尼安的估计，聚观的群众达20万人左右。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群众最多的最壮观的场面。

长期议会取得的初步胜利

从1640年11月到1641年春夏之间，长期议会除了处决反动首脑人物之一的斯特拉福外，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与斯特拉福同样“臭名昭彰”，被许多群众所痛恨的劳德大主教，也被控以叛国罪，并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中（1645年被处死）。查理一世还被迫签署了议会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如国王到期不召开议会，议会可自行开会。同时还通过另一议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同时，撤销了封建特权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1629年—1640年）所征收的“船税”被宣布为非法。此后，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吨税和磅税。激进派的领导人李尔本和普林尼等被无罪开释。

议会在1640年11月到1641年春夏间的一系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群众的强大运动威力支持下取得的。正如当时反动首脑人物之一劳德

D.Laing (ed), R.Baillie: Letters and Journals, 1841, P.352.

J.L.Sanford, Studies 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Great Rebellion, 1858, P, 346.

C.V.Wedgwood, Straford, 1957, PP.328—329.

C.V.Wedgwood, Straford, P.329.

G.Davis, The Early Stuarts, 1603—1660, 1937, P.10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 1640—1642, 1923, P.151.

大主教所说：“每当下院有什么议案将要提出，并且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这正是封建宫廷最害怕的事。

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

日益高涨的城乡群众运动使王党感到十分恐惧，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不得不作出让步。中下层人民运动的浪潮，不仅直接冲向了封建堡垒，而且也日益危及到贵族资产阶级议员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与封建利益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到了1641年秋天的时候，议会里许多议员已对群众的自发斗争感到惊恐，他们想转过头来与王党妥协，而不再敢提出更多的反封建的要求了。这在讨论“根枝法”和“大抗议书”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废除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英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因为它是英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1640年冬和1641年初，伦敦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断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把主教、主持牧师、教士大会等“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但是，当这个议案提交议会讨论时，却受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其原因拿议员瓦勒的发言可作一说明。瓦勒在发言中，引用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作为例子，说明他所以反对废除主教制，是因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御人民的外围堡垒。如果人民“用举手及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就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取得平等，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要求土地法以及在世俗事物上的平等。”这就是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危及他们的私有财产，因而宁愿把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作为防范人民之用。结果，“根枝法”由于上院拒绝批准而未获通过，直到1646年，主教制才被废除。

关于“大抗议书”的讨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时，议会反对封建王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204条，都是用一种谦和的、规劝的语气写成的。有些地方，还夹杂了一些忠君爱上、感恩戴德之词。如第154条说：“我们以非常感激之情承认，陛下曾通过了比以前许多年代里所通过的更多的有利于臣民的法令。”第184条在讲到主教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加限制时，立刻声明：“我们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想使教会的纪律和统治的金缰绳变得松弛。”纵观全文，只有极少数地方略微提到农民和手工工人的情况；第31条和第32条提到公社土地被圈占后无地农民的情况；第54条和第55条提到破产的呢绒工人移民国外的情况；第98条提到人民生活困苦，监狱里有人满之患……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轻描淡写，而且没有提出具体改进的措施。

即使这样温和的文件，在1641年10月20日提交议会讨论时，仍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当时议会里气氛紧张。一开始“议会里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而这种分

C.HillandDell, *The Good Old Cause*, 1949, P.217.

B, Whiteloke, *Memoire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1853, Vol. I, P.114, P.115.

S. R. Gardiner (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26, P.225, P.229.

S.R.Gardiner (ed), *op.cit.* PP.202—232.

歧却无法弥合,出席者的比例也显著减少了”。这个文件先后经过 8 次讨论,到 11 月 22 日投票表决时,议会厅中更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历史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争论接着争论,议会连续开到掌灯时分,直到午夜,才以 11 票(159 票对 148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¹当议会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印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一些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一些人则从腰带上的剑鞘中拔出了刀剑,手握剑柄把剑砍到地上。”几乎演出了全武行。这么多的议员对这样一个温和的文件如此激烈反对,使议员皮姆等人也感到十分惊讶。皮姆发现,1641 年夏天以前还支持他的议员,这时已大多站到王党方面去了。

从对议会议员政治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长期议会”里的议员,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了。1641 年 5 月投票反对处决斯特拉福的有 59 人;1641 年 11 月投票反对通过“大抗议书”的有 148 人;到 1641 年冬第一次内战爆发前夕,公开拥护国王的议员已增加到 255 人。这些拥护国王的人,到内战爆发后,大部分投奔王党,站在国王的旗帜下反对革命。

这一现象表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议会阵营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过程。促使这一分化的关键是城乡劳动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议会中那些从反对派的立场走向拥护国王的议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迅猛增长起来的群众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感到畏惧,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越来越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到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

革命开始时期的农民运动

在这段时期,农民起义已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各郡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根据当时英国上院公报等不完全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 15 起。起义的农民千百成群,夺取被贵族地主强占的公用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遍地燃起农民起义烽火的情况下,1641 年夏,议会里一些议员提出了如何镇压起义的问题。6 月 19 日,上院颁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并命令各地政府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办“所有的暴乱和非法的集会”。议会还向各地派遣特命全权官员,对农民实行武装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从 1640 年到 1643 年,上议院(当时英国上议院起最高法院的作用)一共受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 人,其中有 5 人是妇女。

不过,在这个时期,议会还无力扑灭人民起义。因为王党仍在猖狂反扑,而议会自身立足未稳,安全难保,他们中那些中等价层出身的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而他们要求继续同王党作坚决斗争。如在讨论

J.Foster, *The Debates on the Grand Remonstrance*, 1860, P.163.

J.R.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Vol. , 1893, P. 1129.

J.Foster, *Op cit*, PP.163—164.

内战前夕,议会中支持国王的,上院有 80 人,下院有 175 人。C.Firih, *OliverCromwell*, 1958, P.68.

阿尔汉盖莱斯基:《17 世纪 40—50 年代英国的农民运动》,俄文版,1960 年版,第 133 页,附图 4。

阿尔汉盖莱斯基:英国 17 世纪的土地立法与农民运动,《史学译丛》,1957 年,第 2 期,第 54 页。

“大抗议书”时，克伦威尔及其他一些代表竭力要求通过这个文件。据说克伦威尔曾表示：“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的话，那么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将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掉，离开英国，并且以后永远不愿再看到英国，他知道还有许多诚实的人也将作这样的决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依靠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之外，别无他途。

逮捕五议员事件

查理一世眼见议会中有些议员保王情绪增长，有些议员动摇不定，决定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段，用武力把议员中比较激进的反对派领导人皮姆、汉普顿等 5 人逮捕。王党分子本来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出马，轻易就可把 5 个议员抓到手。王后曾轻蔑地向国王说：“去把这些坏蛋揪着耳朵拖出来。”但皮姆等人得到消息后，躲到了伦敦城区，把命运寄托在中下层人民身上，城区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和平民武装起来，保护了皮姆等人的安全。一周以后，伦敦市及市郊南沃克的脚夫和水手组成的队伍，簇拥着皮姆等 5 人，堂哉皇哉地回到议会下院。他们沿途高呼“保卫议会、保卫王国”等口号。市内群众夹道欢迎。伦敦附近白金汉郡和肯特郡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开往伦敦，横穿市中心，直趋下院，沿途高呼“誓与议会同生死”。在这一事件中，劳动群众事实上成了伦敦城真正的主人。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在伦敦已无计可施，被迫于 1642 年 1 月 10 日离开了首都，到英国北部，聚集那里的保王分子企图对议会进行反扑。当年 8 月 22 日傍晚，王党分子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山顶上升起了王党的军旗，正式宣布讨伐伦敦议会里的“叛乱分子”，于是开始了内战。

二、第一次内战

两个阵营

1642 年秋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但是这两个阵营划分的基础并不是地理的不同，而是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态度的不同。王党在他们所盘踞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社会支柱，主要是旧的封建贵族。而议会在他们所控制的东南地区各郡中则以资产阶级、中等贵族、农村中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为依靠。同时各地区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如在王党占优势的西部地区，“出身于古老家族和拥有地产的贵族”拥护国王，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支持议会。在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各郡，议会的社会支柱在农村是自由租地农和较低的乡绅，在城市里则是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那些封建大贵族则同情王党。可见，在内战开始后，不论是在议会还是王党所控制的地区，革命力量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城乡中下层人民和劳动群众。

战争开始后，从双方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来看，议会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据有首都，可征收固定的赋税以充军饷。而王党军队的供给则只能靠王室个人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从地方上勒索来的捐献。他们的供应很快就枯竭了，不得不把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派出去征收钱粮，以致军纪废弛，怨声载道。在数量上，战争刚刚开始时，议会军大大超过了王党。当时的英国没有常备军，为国王服役的只有为数很少的领取佣金的贵族武装，以及由乡绅组成的卫队和分散在 26 个卫戍区的枪手。所以在内战开始后，国王和议会都必须着手去筹建自己的军队。国王只能靠地方上的高级贵族和威尔士及爱尔兰的地方官员派武装人员组织军队，而议会则由于英格兰各地的地方官员大都拥护议会，同时民兵的军官也大都站在议会一边，在招募士兵和筹集军械军需方面都比国王方便得多。1642 年 8 月，国王统率下的军队只有 800 骑兵和 300 步兵，到 9 月份也只有 2000 骑兵和 6000 步兵。而议会军却在短期内集合了大量军队。在总司令埃赛克斯伯爵指挥下的骑兵有 5000 人，步兵有 2.5 万人。而且海军舰船也站在议会方面，控制着许多重要港口。在行政管理方面，议会据有首都伦敦，可以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比较稳固的行政管

E.Hyde Clarendon, op.cit, Vol. , P.296.另据陶尼说，1645 年时，在布里斯托尔，拥护国王的是“社会的两极，即最富有、最有势力的人和中等阶级所鄙视的最低贱的、最下等的人。” R.H.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1929, P.202.

J.Deame Jone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60, P.70.

如戈塞斯特侯爵曾捐给国王 7 万镑；纽卡斯尔侯爵捐给国王 7000 镑。J.D.Jones, op.cit.P.71；G.Davis, The Early Stuarts, P.129.

C.H.Firth, Cromwell's Army, 1902, PP.26—29.

M.C.Fissel,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in the Early Stuart, Art of War,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rmy Historical Research, 1987, Vol. IXV, PP. 133—147.

Ronald Hutton, The Royalist War Effort, 1982, PP.3—48, History, 1988, P.403.

E.Hyde Clarendon, op.cit.Vol.VI, P. 62, P.66, P.71.

理中心。

议会军的失利

但内战开始后的第一段时期（1642年—1644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23日，双方军队在埃吉山会战，胜负不分。随后，王党军队向伦敦方向进击，企图一举捣毁议会阵营的中心。但王党军在11月进抵特恩·格林后，被议会军阻止，旋又转赴牛津，占据牛津作为大本营，直接威胁伦敦。同时，在英国北部，王党军队在纽卡斯尔侯爵统率下，占据了北部的5个郡。在西南部，霍普顿爵士指挥下的王党军队占领了威尔士。到1643年秋，王党军从北部和西南部同时向伦敦进击，经过几次战役，全国有3/5地区被王党军占领。

为了争取援军以抗击王党军队，皮姆等人派遣使节与苏格兰人谈判，希望订立同盟条约。议会的使者到达苏格兰后，经过10天谈判，于8月9日订立了“庄严同盟与圣约”。这个条约虽然在议会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在严酷的军事形势下，议会不得不在9月7日批准了这个条约，建立了同苏格兰人的同盟。根据这个同盟条约，苏格兰军队于1644年1月越过边界同王党军队作战。1644年7月2日，苏格兰的军队、费尔法克斯指挥下的议会军和曼彻斯特、克伦威尔指挥的东部联盟的军队，在马斯顿草原与王党军队展开会战，结果王党军队被击败。然而由于议会军未能乘胜追击，使王党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与此同时，在英国西南地区由埃塞克斯指挥的议会军却被王党军击溃。

议会军在这段时期的失败，其原因显然不是客观因素的不利和军事力量的薄弱，而是议会军领导阶层的妥协和动摇。

内战爆发之初，从议会阵营领导阶层对待战争的态度来说，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主和派，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与国王妥协，他们相信国王许诺给议会的诺言。另一派是主战派，他们不信任国王，认为只有用武力打败国王，才能迫使国王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反封建的态度比较坚决。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他们虽然不相信国王而准备作战，但态度不够坚决，时刻准备着一旦国王承认了议会的权利就同国王言和。第三派人士在议会中大约有30—40人，他们的领袖是皮姆和汉普顿。这派人利用左、右两派的矛盾而保持权力平衡，把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而议会军的总司令和其他高级指挥人员则由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老朽的人物担任。在这些人的操纵之下，议会军进行着拖拖拉拉、半心半意的战争，以至节节失利，不断败退。

严酷战争现实，使议会中一些人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吸收具有反封建斗争决心和勇气的中下层人民参加到军队中来，作为中等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的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从农村自耕农中具有

J.H.Hexter, *The Reign of King Pym*, 1941, P. 70.

克伦威尔最初也是埃塞克斯伯爵领导下的一个军官，后来他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一个团，受曼彻斯特指挥。

“正派的、勇敢的性格，敬畏上帝和热爱公民自由”的人中招募自己的军队，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当时的人说到他的军队的士兵时说：“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自由租地农及其子弟，他们自觉地投身到斗争中去，并自觉地接受克伦威尔的领导。他们内以自觉的精神武装起来，外以精良的武器武装起来，这样，就能够坚定得像一个人一样站在那里，并忘我地进行冲锋。”¹即使在这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当中，也不乏下层社会出身的人。1643年克伦威尔当讲到他所挑选的军官时曾写道：“我宁愿要一个穿着普通粗布上衣的军官，只要他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作战，并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而不愿要一个你们所称呼的‘贵族’这样徒有其名的人。”

这支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得既勇敢又有纪律，即使王党分子也承认它比王党军队优越。如当时的王党历史家克拉兰敦就说，国王的军队虽然有时也能占上风，将敌人击溃，“但他们从来不能重新集合起来，也不能在同一天进行第二次进攻。”²克伦威尔的军队则不同：“如果他们占了上风，或是受到攻击并被击溃时，他们就立刻重新集合起来，并很有秩序地站着，直至他们接到新的命令。”克伦威尔的军队由于战绩辉煌，在1644年马斯顿荒原胜利之后，被人称之为“铁军”。

克伦威尔指挥下的军队与埃塞克斯指挥下的军队的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方，埃塞克斯领导下的议会军遭到一连串可耻的灾难性的失败，但在北方，[克伦威尔的军队]在马斯顿荒原之战的胜利，使其他所有的失败都得到了补偿。”问题是十分清楚的：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改组军队，吸收农民和城市下层劳动群众参加到军队当中来。然而，尽管事情是如此明显，但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却不愿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下层人民武装起来之后，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在1644年11月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高级军事领导人之一曼彻斯特在纽伯里的战役中作战不力，贻误戎机，并指出他的错误“既不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意外，也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他害怕采取任何行动……和他竭力想在使国王不受到法律制裁的条件下，以妥协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对此，曼彻斯特却厚颜赧颠地回答说，他之所以不愿去同国王作战，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后代仍然是国王，而我们将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国王那怕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要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后代的前途将被断送。”他这几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形象地表露出这些元老派领导人对待内战的态度。

G.Davies, *The Parliamentary Army under the Earl of Essex, 1642—1645*,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XLIX, 1934, PP.32—55.

W.C, 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 1937, P.216, P.256.

E.Hyde, *op.cit.*Vol.IV,PP.45—46.

“铁军”（Ironsides）一词原为马斯顿草原战役后人们称呼克伦威尔等领导人的意为“坚强勇敢的人”，后来才用来统称克伦威尔的军队。

T. B.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 I, 1861, P. 118.

W.C.Abbott, *op.cit.*Vol.I, P.302.

Ibid, PP.310—311.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克伦威尔引述曼彻斯特的话，有人认为可能和克伦威尔在会议上的发言有出入，因为它和克伦威尔本人平时的文字风格不同。不过关于曼彻斯特的同样内容的讲话，在克拉兰敦的著作中也有记载。E.HydeClarendon, *op.cit.*, Vol. , P.452.

下层人民独立运动的发展

但是，就在议会里长老派上层领导在内战中拖延不决的时候，城乡劳动群众独立的反封建斗争却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城市中，各种要求信仰自由的独立教派运动和大量涌现出来的各种反封建的自由出版物和小册子；在农村中，遍布各地的农民运动，特别是西南部的“棒民”运动，参加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自1643年11月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了“庄严同盟与圣约”以后，长老派成了官方的宗教，议会规定全国人民必须一律信奉，因而人民反对议会中上层领导人的斗争就和反对长老派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议会控制的许多城市内，下层劳动群众的独立教派运动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仅在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个不同教派的圣会。在这些圣会上，“由适合于他们的向导，即皮匠、裁缝、毡匠和诸如此类的穷汉们来布道。”

人民反封建斗争独立性增长的另一种表现，是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涌现。据统计，仅1645年，全国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

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焕发的景象，引起当时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像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

在农村，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各地蔓延开来。内战开始后不久，贵族地主们就惊呼：“那些粗汉们都在说，贵族们当我们的主人已经很久了，现在该我们去当一当他们的主人了。”当内战迁延不决，议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不但不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战斗，反而多方设法镇压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时，有些地区的群众运动就走上了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议会的“中间”道路。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所谓“棒民”运动。

“棒民”的人数大约有10万人。基本群众是农民，但领导成份比较复杂。在领导人中，除农民之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棒民”自称他们走的是“中间”道路，既不反对国王也不反对议会，而是联防互保，以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财产”，使其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多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棒民”还曾经派代表分

J. R.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Vol. . PP.1178—1179.

F. S. 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1952, P. 191, P.203.

R. Garnett, *Life of John Milton*, 1890, P.80.

F.P. Verney, *Verney Family Menmoir*, 1892, Vol. , P.69.

关于棒民人数各书记载不一，据研究17世纪英国农民史的专家阿尔汉盖莱斯基对1645年各次起义“棒民”人数的统计，共约10万人次。C.N.阿尔汉盖莱斯基：《17世纪40—50年代英国的农民运动》，俄文版，第164页，附表15。

在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多塞特郡的“棒民”运动的领导人中，各级教士9人，贵族9人，各级军事人员14人，工商业人士21人，知识分子和官吏5人，农民（公簿持有农）1人，身份不能确定者41人（身份不能确定的人中，无疑多为农民），共100人。C.H.阿尔汉盖莱斯基：上引书，第170页，附表16。

A.R. Bayley, *The Civil War in Dorset 1642—1660*, 1910, PP.472—479.

别到国王和议会那里去寻求和平。但总的说来，“棒民”对王党更为敌视。他们所以举起“中间”道路的旗帜，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议会动摇不定的政策的不满。

“棒民”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这从他们的名称即可看出。所谓“棒民”，也就是揭竿而起手执棍棒进行战斗的农民。克伦威尔在讲到“棒民”时曾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贫穷、愚蠢的家伙。”作为一种社会阶级斗争形式，“棒民”运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它打击并遏制了它所活动的地区，即西南部各郡的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它也是迫使议会不得不改变动摇犹疑的态度，赶快采取措施坚决同王党进行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议会军的改组新模范军的建立

城乡劳动群众反封建斗争独立性主动性的增长，以及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着手改组军队。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时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议会不得不在1645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自抑法”，撤换了埃赛克斯、曼彻斯特、瓦勒等昏庸的元老派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新模范军”中的自耕农，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和自觉的纪律性，在战场上一往无前，连战皆捷，使战局急转直下。1645年6月，“新模范军”在纳西比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攻克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不久，查理一世本人也作了议会的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Vol. , 1900, P. 264. C.N.阿尔汉盖莱斯基, 上引书, 第158页。

D.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Vol.V , P.386.

W.C.Abbott, *op.cit.*Vol.I, P.

W.C.Abbott, *op.Cit.*Vol.I, p.314.

第二节 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一、两次内战之间政治斗争的意义

从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揭开革命序幕，到1649年初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到当年5月正式宣布成立英吉利共和国，革命的发展一浪接一浪，其间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不少场合还出现过危急的形势。这些斗争的成败，对革命的发展都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加速了革命的进程，有的使革命遭到挫折，一度倒退。然而，从当时英国整个社会经济进步的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来看，革命阵营必然胜利，封建王党必然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胜利，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垮台。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向，已是确定无疑的事，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曲折和逆流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总的趋向。

然而，从1646年底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8年春第二次内战开始，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形势，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这时，封建王党已在内战中被打败，国王本人也已作了议会阵营的阶下囚。原来以议会阵营为一方，以封建王党为另一方的矛盾和斗争已基本解决。议会阵营内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上升到了主要地位，成为这段时期整个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斗争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打倒封建王党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以及如何建设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被打败之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一胜利的成果巩固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基本被摧毁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个阶级应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享受哪些权利？

围绕着上述问题，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几个政治派别，即代表大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在第一次内战结束之后，都强烈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为实现各自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封建王党也蠢蠢欲动，企图利用议会阵营内部的矛盾趁机反扑，企图东山再起，使斗争的局面更趋复杂。

上述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在这段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其进程和结果不但将直接决定着将要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各阶级在新制度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而且也将对此后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产生很大影响。

正像任何历史转变关头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的这一转折时期，对英国革命以后的发展和结局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有关英国革命史的著作，大多未对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将之作为两次内战之间的间歇，未指出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对英国革命和以后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些著作虽然对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比较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然而其观点大多具有机械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特别是把平等派的失败归因于其“小资产阶级的属性”。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二、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的基本形势

议会军在第一次内战中的胜利，是靠了新模范军中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在战场上的流血战斗，靠了城乡劳动群众广泛开展的反封建斗争和对议会军的积极支持所取得的。但是内战结束以后，胜利的果实却为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所攫取。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非但未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

经济状况

当1646年内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战争期间，英国各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王党军队和苏格兰军队所占领的地区，破坏更为严重。内战时，全国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断绝，贸易停顿，王党占领的西北部地区的农业和议会军占领的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不能互通有无。1646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这些都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当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时，在议会内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不但不立刻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反而加紧搜刮，趁机牟利，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贫苦人民所经常食用的粗粮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价格，也成倍上升。

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原来生活已很困苦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境地。40年代，英国的贫民人数达到50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靠工资为生的城乡劳动者，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依靠微薄的工资更加难以度日。虽然在有些部门中，工资略有提高，但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而实际工资大大降低了。据统计，1646年—1650年，工资增加数额约在15—30%之间，但同一时期，面包的市价却上涨了1至2倍。这就直接影响了工资劳动者的生活。

塔塔里诺娃著的《英国史纲》等书中就是这样的观点。（见《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954年，俄文版，第1卷，第418—419页，第2卷，第180—181页。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三联书店，1962年，第116—118页。）实际上，当时平等派和其他各政治派别的成败，其原因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各政治派别的政策和策略等因素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英国小麦每夸脱的年平均价格，17世纪20年代时为30先令，1646年涨至58先令，1647年为65先令，1648年—1649年为68先令。J.E.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V, 1887, P.270.

当时每夸特燕麦的年平均价格1643年为7先令8便士，到1647年猛涨到21先令4 1/4便士。W. Beveridge,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o Century, Vol.I, 1939, P.208, 附表。

据罗杰斯估计，在17世纪中叶，英国400万人口中有近一半人口“靠自己每周的工资过活”。J. E.Rogers, Eight 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Work and Wages, 1895, P.96.有的学者认为英国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国，所以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英国工业，特别是羊毛工业渗入农村的特点，靠工资为生的人肯定是很多的。

J.E.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1887, Vol.V, PP.826—827, 附表。另据贝维利吉对伦敦7个地区的医院和学校购买烤面包的付款帐单的分析，1644年—1645年伦敦烤面包的价格已比平时高，以后又不断上涨。1644年—1645年售价为1先令5便士的面包，到1648年时售价为2先令1便

内战开始以来，一般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所担负的赋税，也日益苛重。战争时期，国库开支庞大，而议会中掌权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代表——长老派，就把支付这些庞大开支的来源，以赋税的形式转嫁到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头上。

当时议会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军费，仅只支付军队官兵的薪饷一项就已十分巨大。1645年初新模范军刚建立时，每月支付给军队官兵(当时人数共21,400人)的款项为5.6万镑。虽然新模范军的军饷一度欠发，但从1646年3月到1647年3月，军队从国库支取的军饷仍达1,185,551镑。议会为了筹集这笔庞大的费用，除了以高达10%的利息向伦敦城区及其他地区的富商巨贾借贷，并将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加以出卖以作为弥补外，又向居民加重征收货物税。货物税本来是1643年7月根据议员皮姆的建议，仿效荷兰的例子对一些消费物品课征的间接税，但以后课征的项目和数额日益增多，不仅奢侈品，而且许多日用必需品，诸如食盐、淀粉、肉类、肥皂、纸张等都要纳税。据估计，在这个时期，平均每年所征收的赋税总额达到400万镑。1643年—1646年，一般的乡绅要把1/4的收入用于交纳赋税，于是贫苦劳动群众就陷入沉重的赋税负担之下。加以当时的税收工作都委托给各郡的大资产阶级包税人承办，这些包税人从中渔利，盘剥人民，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作为英国革命主要问题的土地问题，也是在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方式下解决的。革命时期，议会曾颁布了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法令。1643年3月，议会颁布法令，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所谓“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以后又准许王党分子交纳赎金将被扣押的土地赎回。接着又颁布法令，将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加以出卖。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方式，从所有这些方式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例如，关于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大多是作为议会向大资产阶级借贷的抵押品，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须继续向议会所组织的“扣押委员会”交纳地租。当王党分子用赎金赎回土地时，赎金完全落入了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手。议会成立“罚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项事务，会址就设在伦敦商业区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中心。

被出卖的王党分子的土地，也大多落入了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手。虽然议会关于出卖主教土地的法令，曾提到这些土地的直接所有者，即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在完成主教领地登记后30天内有权优先购买这些土地，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按规定土地都是成大块地出卖，一次付款，一般农民缺少大批资金，无法购买。而伦敦城区及其他地区的富商巨贾，则可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金和手中掌握的政权，轻易地将这些土地攫为己有。伦敦市著名的议员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就曾利用职权以8000镑的价款把伦敦附近高门、霍恩斯、芬克里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广大地产购为己有。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如此臭名昭著，引起人民的公愤，以致

士。W.Beveridge,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o Century*, Vol. I, P.208, 附表。

W.C.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I, 1937.P.327.

C.Firth, *Cromwell's Army*, 1902, PP.183—184.

H.J.Habakkuk, *English Landownership, 1680—1740*,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 No.10, 1940, PP.8—9.

V.Pearl, *Lond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61, P.330.

在 1649 年时成为伦敦街头棚子戏中的讽刺对象。

总的来说，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土地所有权大规模转手的现象。以前属于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1646 年 2 月 24 日，议会又颁布法令，废除“领地法庭”，解除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因而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对地产就有了享有充分自由的支配权。然而农民所负担的封建义务却未予以触动。非但如此，在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的贪婪剥削之下，农民所承担的地租额，反而比以前更多了。例如，原来在一些高级牧师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所负担的地租额为 2 万镑，但到了 1649 年时，在这批新的主人剥削下，他们所负担的地租额已增加到 20 万镑。

同时，议会还暂时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多次通过决议，对由于圈地而引起的农民的骚动加以残酷镇压，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政治形势

在政治上，长老派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力图将国家政权垄断在自己手里，对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的言论和活动加以扼杀。

早在 1640 年 11 月长期议会召开之后，议会即开始逐步发挥政权的作用。内战开始以后，在议会阵营所控制的地区，议会成了最高政权机关。到第一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胜利而结束时，议会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临时政府。

在长期议会，议员的成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革命开始阶段，不仅上议院的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议院的 507 名议员中，除了 70 名左右是资产阶级之外，其余也全是贵族。即使这 70 个左右的资产阶级出身的议员，其中有不少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保王党人的一边。

H.Morley, *Memoirs of St. Bartholomeu Fair*, 1859, P.221.

S.R.Gardiner (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1927, P.290.

W.A.Shaw,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1640—1660*, 1900, Vol.I, P.59.

英国的圈地运动到 15 世纪末已大规模展开，但在英国革命之前，英国政府一方面害怕圈地运动引起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害怕圈地运动使作为英国社会支柱的自耕农被消灭，所以从 1489 年亨利七世颁布第一个禁止圈地的法令起，以后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法令。英国革命时，刚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贵族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对圈地运动抱着姑息纵容的态度，暂停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对反抗圈地的农民运动加以镇压。

有些著作认为长期议会在刚召开之际，资产阶级的代表就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关于长期议会议员的成份，已有专门著作进行研究。

D.Brunton and D.H.Penington, *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 1954; M.Keeler, *The Long Parliament*, 1954. 这些著作对议会中 500 多个议员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和具体的研究，认为在长期议会议员中，不论是王党拥护者或议会拥护者，他们中的贵族、律师和商人的人数，大致都是相等的，但是关于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阶级出身同他们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却研究得不够。

如在下院的议员中，有 22 名伦敦商人，其中有 12 人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他们都是保王党人，后被驱逐出议会。在其他城市选出的资产阶级议员中，也有一些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其中有些人也是保王

第一次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原来的保王派议员公开投入王党阵营，离开了议会，于是站在反对王党立场上的议员，包括清教徒中的长老派和独立派，在议会里占了绝对的优势。到 1645 年新模范军建立后，根据“自抑法案”，一部分在军队里担任军职的长老派议员放弃了军职，把力量集中在议会里。此后议会就成了长老派手中所控制的工具。

长老派控制了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后，利用议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竭力把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如他们仍然坚持每年不动产收入达到 40 先令的人才能享有选举权，从而使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仍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

长老派在政权机构中的统治地位，更以其在宗教信仰上的独占地位而得到巩固。自从 1643 年 9 月议会同苏格兰人缔结了“庄严同盟与圣约”以后，长老会就成了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以后长老派又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通过有上下两院议员参加的“西敏寺神学家会议”制订决议，进一步加紧长老派对国内宗教信仰的控制。第一次内战结束后，1646 年 7 月，议会拟订了作为同国王谈判的纲领性文件“纽卡斯尔提案”，在全部 19 条条文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国王在英国实行长老会的宗教。由于国王及一些王党分子企图利用议会阵营内部的矛盾来完全恢复王权，所以加以拒绝。

虽然长老派企图在他们的条件下同王党相勾结的计划未能立即实现，但他们仍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强行推行长老会宗教，对一切违反长老会宗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的人百般加以迫害。

长老派这种强迫全国人民信奉长老会宗教的政策，引起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中下层人民群众争取政治、经济解放的斗争，是同争取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正像诗人弥尔顿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由之中，首先给我以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发表言论，讨论问题的自由。”这种要求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反映在议会统治区内大量出现的各种独立的宗教教派的活动，以及广泛出版和传播的各类出版物、小册子上。当时议会的秘书托马斯·梅益在回忆录中写道：“普通的人、织工、卖蜡烛的人、盐贩等，公开地传布关于各种不同宗教的论题，并对教会礼拜本身加以粗暴的干涉。”主教胡尔也说，仅在伦敦一地就产生了 80 个不同教派的圣会，在这些圣会上，“由适合于他们

党人。C.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1962, P.120. 1642 年内战爆发前夕，长期议会上院议员中有 30 人支持国王，80 人支持议会，20 人中立；下院议员中有 300 人支持议会，175 人支持国王。C.Firth,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in England*, 1958, P.68.

G.Davies, *The Early Stuarts, 1603—1660*, 1937, P.142, PP.189—192.

S.R.Gardiner, *op.cit.* PP.290—306.

当时查理一世曾傲慢地说：“没有我的权力，就不可能恢复和平。”王党分子海德也向国王说，如果接受了议会的纽卡斯尔提案中的条件的話，那么，君主制就将“断根绝种，不可复生”，因而加以拒绝。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642—1649*, 1893, Vol. , P.129.

Milton, *Areopagitica*, in Richard Garnett, *Life of John Milton*, 1890, P.81.

的向导，即皮匠、裁缝、毡匠和诸如此类的人来布道”。

与此同时，许多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色彩的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内战开始以后，随着人民斗争积极性的增长，各种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出版物急速增多。据统计，1645年，英国各种出版物共有722种之多。1640年—1660年，平均每天有3种出版物出版。尤以1642年—1649年出版的最多。英国人民在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这种蓬勃焕发的精神，当时独立派诗人弥尔顿曾予以热烈赞颂。

由于中下层人民群众争取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受到当权的长老派的扼制和迫害，广大中下层人民同长老派之间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论领域内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综上所述，在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封建王党已被打倒，但胜利的果实却为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所攫取。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下阶层和劳动群众在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上，都继续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革命开始以来，社会中下层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潮流，在冲决了封建王党所构筑的堤坝之后，现在却又受到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阻拦，于是革命潮流的波涛，就直接冲向成为革命阻挡者的长老派。革命潮流发生了波折，激荡起湍急的回漩，形成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场面。

J.R.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93, Vol. , PP.1178—1179.

F.J.Siebert, Freedom of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1952, P.191, P.203.

Richard Garnett, Life of John Milton, 1890, P.80. 参见本章第一节。

三、两次内战之间的几个主要政治派别

从第一次内战结束到第二次内战开始（1646年—1648年）这段时期，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三个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之间展开的。这三个政治派别是：代表大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城乡中下层群众利益的平等派。

长老派

长老派在革命的开始阶段，是站在反对封建王党的立场上的。当1641年秋冬之间议会里讨论“大抗议书”时，由于意见分歧而在议员中产生了拥护国王的“骑士党”和反对国王的“圆颅党”。那些后来的长老派议员，当时属于“圆颅党”。长老派和独立派这两个名词虽然在1641年春讨论“根枝法”时已出现，但并未形成固定的独立的政治派别。

从政治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长老派不过是那些比较保守的议员，所谓独立派则是指那些主张宗教宽容的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长老派作为议会里保守的右翼，坚持维护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政治集团，与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渐渐分裂。还在内战正进行的时候，长老派就已经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力图阻挠革命过程的深入发展。第一次内战结束后，革命的胜利果实几乎全部被长老派所独吞。长老派力图把已形成的局势固定下来，使革命就到此为止。他们在内战刚一结束时就迫不及待地屡次与国王谈判，企图在保证国王利益的条件下恢复王位，实行立宪君主制。1647年，苏格兰人把查理一世交给议会后，长老派的领导人更频繁地同这个作为俘虏的国王相勾结，谈判互相妥协的条件。

独立派

独立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开始时期，他们同长老派站在一起反对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渐渐形成了单独的政治派别。到了1643年，作为政治集团的独立派已完全形成。

英国历史学家费林认为，1641年11月，议会围绕着是否刊印“大抗议书”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导致议员分裂为“骑士党”和“圆颅党”，“这可能是英国政党真正的肇端。” K.Feilling, A 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 1640—1714, 1950, P.72.

K.Feilling, A 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 1640—1714, 1950, P.72.

1641年11月，下院议员爱德华·德尔林（宗教委员会主席）写道，他在下院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议员以长老派或独立派的身份或立场来坚持自己的观点。 C.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1962, P.165.

到1643年时，独立派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独立派形成之后，在诸如对待内战的态度、改组军队等一系列问题上与长老派发生了分歧，展开了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了改组军队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胜利的果实为长老派所独吞，独立派所代表的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未得到满足。在政治上，长老派控制了作为最高政权机关的议会，独立派被排斥在外；在经济上，垄断专卖权仍未取消，独立派自由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动受到抑制；在宗教信仰上，长老会被规定为全国必须尊奉的宗教，独立派的宗教活动与思想言论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独立派对第一次内战后所形成的局势非常不满。他们利用在他们控制下的军队，同长老派所控制的议会展开了斗争。

然而，当独立派与长老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上的下层人民与军队里的士兵群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怀着惶恐戒惧的心情，害怕群众独立自主的运动发展起来以后，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妨碍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有时又企图勾结国王和长老派，共同镇压下层劳动群众，在许多场合摇摆不定。

平等派

平等派代表城市和农村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城乡劳动群众是英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以来，议会阵营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都是依靠广大中下层劳动群众的力量所取得的。然而如上所述，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他们的经济、政治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在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也继续受到当权的长老派的箝制。所以城乡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对长老派的政策极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除了反映在城乡劳动群众的不断骚动和向议会递交的请愿书之外，还反映在平等派影响的迅速扩大和增长之上。

平等派的思想在其领导人李尔本、奥弗顿和伍尔文等人在第一次内战期间所发表的著作中就已形成并已广泛传播，但此时还未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自己的组织。自新模范军建立之后，由于新模范军的基本群众都是由自耕农和城市手工业者所组成的，所以反映城乡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的思想，在士兵中得到热烈的响应。平等派也加强了他们同军队的联系，在士兵中积极展开宣传鼓动工作。1646年7月，李尔本的三个同志（当时李尔本在狱中）共同起草了一份名为“千万公民的抗议书”。它从人民应享有最高主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取消国王和上院、信仰自由、人民在法律上一

的“自抑法”，根据该法令的规定，一些原来担任军队领导职务的长老派议员被解除了军职。此后，军队的领导权就逐渐落入了独立派手中，但同时，独立派丧失了了在议会中的势力。直到1648年底军队开入伦敦清洗议会之前，议会一直是在长老派控制之下，而军队则是独立派用以同长老派对抗的主要工具。Ibid, PP.30—31.

关于新模范军士兵的社会成份，至今仍未研究清楚。C.Firth, *The 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 1940, Vol.I.然而新模范军中的士兵大多数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是可以肯定的。因为1645年初新模范军刚建立的时候，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各郡的民兵。其中东部联盟的民兵占新模范军士兵的半数。当时英国是个农业国，这些民兵主要是农民自属无疑。另外，从平等派的各种文件、言论以及各地人民的请愿书，都间接地反映出新模范军士兵的社会成份主要是农民及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如1647年10月29日在普特尼会议上争论关于选举权问题时，鼓动员赛克斯比发言时说：“我们这些成千上万的士兵冒了生命的危险。在这个王国中，我们在财产方面很少享有我们应得之份，然而我们享有生存权。”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1951, P.69.

律平等要求。它不像通常的一些文件那样，以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名义，而是以千万人的名义提出的。它包含了一些根本性的要求，从而给革命以新的动力和方向。正是在这个时候，平等派从一个思想流派转变为一个以新模范军的士兵和伦敦中下层群众为基础的政治派别。

农民和城市群众本来具有组织散漫的阶级属性（现在许多论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在讲到平等派时仍旧抱这样的观点），但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环境中，新模范军这个组织稳定、纪律性强的军事团体，成了团结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有力工具。除了军队之外，平等派还在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开展工作，建立机构，以后又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伦敦附近的萨里郡、白金汉郡、牛津郡以及其他各郡。另外还和国内各地的卫戍部队以及海军取得联系。有些地方的平等派还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有专门的财务机关和印刷所，还向成员收取会费。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长老派的政策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平等派积极展开活动，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特别是军队里的士兵，他们在内战中已显示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现在平等派就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基础。

三个政治派别斗争的发展

上述三个代表英国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派别，在第一次内战刚结束时，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被打倒的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也利用议会阵营内部的矛盾，分别与长老派和独立派暗中勾结，要挟引诱，煽风点火，阴谋东山再起，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更趋复杂。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几个政治派别的基本矛盾又有所不同，以 1647 年 8 月为界。在此之前，即从 1646 年 6 月第一次内战结束到 1647 年 8 月军队进入伦敦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独立派和平等派团结在一起，共同与长老派作斗争，表现形式为军队同议会的冲突。结果是以军队的胜利和议会中长老派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是从 1647 年 8 月军队进入伦敦到 1647 年 11 月 15 日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镇压士兵起义。在这段时期，独立派同平等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独立派与平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表现形式是军队内部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的冲突。结果是以克伦

“平等派”（Leveller）这个名词，在 1607 年时就已出现，但那时是指那些反对圈地、破坏栅栏和围垣的人。到了革命开始以后，“平等派”的含义有了改变，它是指那些主张消灭各种等级地位不平等，“要求宗教自由和反对来自主教的或长老的纪律约束的人。”（W.C.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1937, Vol.I, P.322.）1647 年秋，“平等派”这一名称再度出现。这时，它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的名称了。王党历史学家克兰敦在这年秋写道：“这时在军队中又成长出了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所谓的‘平等派’。这个名称也许是他们自己起的，也许是经过他们同意的。平等派谈起国王、议会和高级军官时，语言不逊而且非常自信。他们公然表示对所有的贵族和国王抱有敌意，并宣称所有等级的人都应该平等，在全国不论在称号上或财产方面都应一律平等。”（Edward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1958, Vol. , P.261.）

克·希尔：《1640 年英国革命》，1958 年版，第 46 页。

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镇压了企图起义的士兵，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1647年11月15日灌木林原野事件之后到1648年春第二次内战的爆发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独立派在王党威胁面前不得不重新与平等派相联合，恢复军队内部的团结，保证了他们在第二次内战中的胜利。

四、长老派与独立派的斗争

围绕遣散军队问题的斗争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摆在议会阵营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在封建王党被打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如何实现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处置被俘的国王及其他封建王党分子。然而，在议会中掌权的长老派非但对这些问题不予考虑，反而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的主要工具——军队。因为长老派认为军队已成为集结中下层力量的大本营，是妨碍他们独吞胜利果实的严重威胁。

1647年3月，议会在反动长老派议员丹济尔、胡尔斯和斯泰普尔顿等人的操纵下，以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为借口，提议遣散军队，而且拒绝补发士兵的欠饷，只发给一种债券作为欠发薪饷的抵偿。对那些坚持要求补发欠饷和抚恤阵亡将士遗孀的士兵则要以“国家的敌人和骚扰公共安宁的人”的罪名严加惩处。议会还将独立派的军官召到议会加以质询，甚至威胁要逮捕克伦威尔，因为他未采取措施来平服士兵的要求。议会的决议传到军队后，引起士兵群众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军队里发生了骚动。这时议会欠发士兵的薪饷，步兵已达18个星期，骑兵已达43个星期，但议会只答应发6个星期的薪饷作为遣散费。所以要求补发欠饷已成为士兵的一致呼声。

然而军队里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非常暧昧。费尔法克斯对议会遣散军队的决定表示同意，克伦威尔则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害怕解散军队以后，他和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将失去可资凭借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害怕士兵的政治力量增长，可能会使他失去控制军队的权力。克伦威尔的这种态度，被当时的人讥讽为狡诈的两面派行为。人们说，他一方面在议会里赞成解散军队的决议，另一方面又在军队里挑起对这一决议的反抗。

士兵不满情绪的增长“鼓动委员会”的建立

当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犹豫不定，动摇于长老派的议会和军队里士兵群众之间的时候，士兵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和主动性却迅速增长了起来。他们对议会的措施和高级军官的态度非常愤懑。克伦威尔在讲到当时士兵强烈的情绪时也写道：“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无情。”

就在军队里的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为了遣散和补发欠饷的问题而群情鼎沸的时候，伦敦以及其他各地的平等派对议会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也迅速增长。1647年3月到5月，平等派曾5次到下院去请愿，提出他们的切身要求，但议会对此不予理会。5月20日，议会还命令绞刑吏将第4次请愿书加以烧毁，引起平等派人士对议会更大的忿恨。李尔本在他的文章中对议会的长老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们比自大宪章颁布以来任何君主更为残暴。李

S.R.Gardiner,HistoryoftheGreatCivilWar,1886,Vol. ,P.223.

E.H.Clarendon,TheHistoryoftheRebellionandCivilWarsinEngland,1958,P.223;W.C.Abbott (ed),WritingsandSpeechesofOliverCromwell,1937,Vol.I,P.435.

W.C.Abbott(ed),op.cit.P.439.

尔本指出，现在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像以前用武力去反对国王一样，现在也要用武力去把这些暴君连根铲除。李尔本以及其他平等派人士对议会已完全失望，他们认清了议会中长老派已成为人民的主要敌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是要到主要由城乡下层人民组成的军队士兵中去宣传鼓动，发动士兵同长老派作斗争。

平等派的思想传播到充满激愤和失望情绪的士兵中，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平等派的领导人约翰·李尔本这时虽然被囚于伦敦塔监狱，但仍不停地写作小册子派人送到军队的士兵中，在士兵中得到强烈的响应。当时在军队中担任副牧师的巴克斯特论述道：“士兵们摘引李尔本小册子中的话，就像摘引法律条文一样。”士兵不再仅仅关心补发欠饷等物质待遇问题，而且热烈讨论起国家大事来。据当时人的记载，在士兵中弥漫着一种热烈争论各种政治、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等问题的浓厚气氛。“有时争论政治上的民主，有时争论宗教上的民主……而争论得最多和争论得最激烈的是他们所谓的‘良知的自由’。”他们深切地感到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已不再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团体和组织的要求。李尔本等平等派人士为了帮助士兵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也进行了紧张的宣传组织工作。终于在1647年4月末5月初在许多连队的士兵中，产生了代表士兵群众的“鼓动员”，并进而组成了“鼓动员委员会”。

“鼓动员委员会”首先是在当时军队中比较激进的和组织性较强的8个骑兵团中建立起来的。此后，鼓动员又与伦敦的平等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陆海军连队、地方上的卫戍部队进行联系。一些具有平等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如雷因波洛、赛克斯比、艾伦等，也参加到士兵的行列中来了。

士兵的“鼓动员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联系士兵与军队以外的特别是伦敦的平等派的纽带。于是，以军队内士兵为核心代表中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治力量开始形成。这个政治力量直接与议会里的长老派相对抗，并且迅速摆脱了军队内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当时出版的一个文件在讲到军队内士兵的强大力量时说，士兵们驱逐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军官，又说：“军官们那时只有得到[士兵的]同意和允诺才能得到权力。他们的权力只限于那些士兵们所托付给他们的。”

不久，军队里有人听说长老派加紧了同国王的勾结，为了防止长老派阴谋的实现，1647年6月初，骑兵掌旗官乔伊斯率500骑兵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了军队驻在地的纽马凯附近。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1951, P.23, P.89.

A.S.P.Woodhouse (ed), *op.cit.* P.23.

4月23日，罗伯特·李尔本团队的16个普通士兵往见费尔法克斯，声称他们代表全团的士兵，反对把他们派往爱尔兰，并抗议用停发薪饷的办法对他们进行威胁。这次事件表明在军队的士兵中第一次出现了新的组织。而就在同一天，出现了“鼓动员”这个名词。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88, Vol. , P.237.

Don M.Wolfe (ed), *Leveller Manifestoe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44, P.246.

关于这次军队劫持国王的行动，许多著作都说是克伦威尔派人干的。英国学者阿勃特则认为“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肯定或者否定克伦威尔本人在这个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I, P.452.) 但根据已知史料来分析，可以肯定乔伊斯前往抓押国王之举，不可能是受克伦威尔派遣。因为6月2日乔伊斯离开纽马凯前往赫姆比城堡时，克伦威尔正在伦敦。当6月4

“全军会议”的成立

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军队同议会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然而在这样严重的斗争关头，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却在长老派的议会和军队的平等派士兵群众之间抱着骑墙观望的态度。士兵对克伦威尔这种暧昧的态度日益反感。最后，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如果他不立即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就将不顾他而单独前进了。当时摆在克伦威尔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依附于长老派，在长老派控制的议会指使下镇压士兵群众和平等派，或者站到士兵群众与平等派一边，并领导他们去与长老派作斗争。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权衡利害得失后决定走第二条路。于是，克伦威尔赶快表示他和大多数军官愿意站到士兵这方面来，同时解除了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军官们的职务。

当然，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所以站到士兵方面来，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士兵和平等派的主张，而是要以此保持他们对军队的领导权，把士兵中发生的运动引导到他们所指引的轨道上去。为此，克伦威尔建议成立了全军会议。

李尔本等平等派人士不懂得，全军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确认了克伦威尔的领导权，削弱了平等派和士兵鼓动员的独立性。并且还错误地认为，既然士兵代表和军官代表在全军会议中有平等的代表权，共同讨论国家大事，这个会议就成了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们的民主团体了。

可以说，1647年4月底“鼓动员委员会”的成立是平等派士兵在军队中建立独立组织，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控制的重要契机。而6月初的全军会议，克伦威尔又把鼓动员推到他所设立的牢笼中，使平等派士兵继续受到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的控制。这是平等派的一大失策。

全军会议召开后，平等派一心为贯彻他们的理想而努力，但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则一方面在口头上与平等派和士兵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紧紧抓着权力之柄，一刻也不放松。

6月5日，全军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军队的庄严协约”，宣称“军队提出的要求如得不到满足和保证，我们将不会甘愿解散和分离，也不允许别人把我们解散或分离。”__6月14日的全军会议上，又一致通过了致议会的“军队声明”。声明说：“我们并不是被雇佣来为一个国家的任何专制权力服务的雇佣军，而是被国家的许多宣言请来保卫我们自己

日乔伊斯在赫姆比城堡抓到国王的那一天，克伦威尔才离开伦敦。后来当费尔法克斯听说乔伊斯把国王抓到纽马凯军队驻地后，立刻派了3个连队来保护国王，并打算把国王护送回去。而克伦威尔是支持费尔法克斯这一意见的。克伦威尔曾写信给奉命护送国王回去的华莱说：“要用除了武力之外的一切办法使陛下回去。”只是因为国王本人不愿回到赫姆比城堡，这一命令才未执行。

T.Firth,op.cit.P.54.

这是克伦威尔于1647年6月4—5日在纽马凯附近肯特福德高地的军事会议上提议建立的。正式名称是“军事大会”(General Council of War)，但主要讨论国家政治问题，所以实际上是全军会议(General Council of Army)。由军队里所有的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代表全军讨论重大问题的机构。

和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的……因而我们为此目的以理智和良心拿起了武器。”声明还表示反对一切专横、暴行和压迫，并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重新进行选举，指责议会中胡尔斯等 11 名最反动的议员，要求把他们从议会中“清洗”出去。

“军队声明”是由独立派军官艾尔顿起草的，但它的内容却贯穿了平等派的思想。它阐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同时还从理论的高度发挥了士兵（即身穿军服的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人民）有权过问国家大事的思想。

从 4 月底士兵鼓动员委员会的设立到 6 月中旬“军队声明”的发表，表明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军队已不再是单纯执行议会命令进行战争的工具，也不再单纯要求补发欠饷，把目光只限于物质经济利益，而是成了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了。这时，军队已成了与长老派议会相对立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它取代了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和长老派控制的议会这两个旧的政治中心。

不过，军队的领导权仍处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控制之下。表面上，军队这时所发表的一些文件是平等派士兵所主张的原则的胜利，实际上，这不过是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一种策略，他们用暂时的理论上的让步来赚取平等派士兵组织上的服从。

军队进入伦敦

平等派士兵对议会里的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强烈要求军队开进伦敦，对议会中反动的长老派议员采取行动。伦敦以及其他地方的中下层人民也纷纷向军队递交请愿书，支持军队同议会斗争。然而，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对这些要求一再推诿。他们害怕士兵到了首都以后，势力进一步增长，使他们难以驾驭。7 月 16 日在里丁地方召开的军队会议上，围绕军队是否开进伦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正在这时，7 月 26 日和 27 日长老派在伦敦挑起了反对独立派的叛乱。消息传到军队，士兵群情激愤，克伦威尔无法再压制士兵的要求而于 8 月 6 日下令军队开进伦敦，弥平长老派所煽起的骚乱。议会里的胡尔斯、斯泰普尔顿等反动的长老派议员也纷纷逃散。

这样，在 1647 年 8 月 6 日军队开进伦敦后，议会同军队的斗争就以独立派领导的军队的胜利而结束。

五、独立派与平等派的斗争

独立派与国王妥协的原因

1647年8月军队占领伦敦以后，军队内部独立派高级军官（士兵们讽刺地称他们为“贵人”）同平等派士兵之间的矛盾很快上升为主要矛盾。

当时摆在军队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制服了议会里的长老派以后，把长老派未能完成的改造和建设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的任务担当起来。军队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按照本身的利益和愿望拟订了改造国家的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于是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首先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了。

独立派高级军官关于建立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案，反映在由克伦威尔参与，艾尔顿拟订的“军队建议纲目”中。“军队建议纲目”的内容相当广泛，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度：国王的地位仍保留，不过必须受到议会的限制；议会将由两院组成，上院（贵族院）仍保留，下院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出；另外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掌管全部事务。

1647年8月底，独立派军官就“军队建议纲目”同国王进行了谈判，但查理一世对其中限制王权的规定很不满意，因而加以拒绝。这时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又敦促军队会议降低要求，并对建议纲目的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他们两人还一再向国王保证，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那么以后就不会叫他作进一步的让步，但查理一世企图利用军队同议会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进行要挟。他曾公开向艾尔顿等高级军官说：你们没有我就不行，如果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就将陷于毁灭。”所以到10月11日谈判即告失败。

与此同时，议会中的长老派也在紧张地同国王接触。1647年9月，议会再次向国王递交“纽卡斯尔建议”，但国王借口说军队的建议纲目比这提供了更好的“有利于永久和平的基础”而加以拒绝。

这段时期，独立派同国王频繁接洽，互相勾心斗角，双方都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一次艾尔顿在同国王谈判时说：“陛下，你是想在议会和我们之间作仲裁人，而我们也是想在陛下和议会之间扮演这个角色。”这话充分暴露了当时独立派高级军官的立场。

平等派与独立派矛盾的增长

独立派高级军官力图与国王相勾结的种种行为，引起平等派和士兵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克伦威尔频繁地同国王接触并信函往返时，社会上就流传着

S.R.Gardiner (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1927, PP.316—326.

W.C.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1937*, Vol.I, P.492.

1647年7月13日议会中的长老派曾向当时驻在纽卡斯尔的国王提出和平建议，主要内容是要求将长老派宗教作为全国必须遵奉的宗教信仰，限制王权，使议会享有较大的权力。S.R.Gardiner, *op.cit.* PP.290—306.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93*, Vol. , P.133.

C.H.Firth,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in England, 1958*, P.169.

克伦威尔抱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说法。有时人们说克伦威尔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受了野心家艾尔顿的欺骗才被引入歧途。有时人们又说，这两人都是干坏事的同谋者，两人暂时的意见分歧不过是迷惑人们的手法而已。克伦威尔由于感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不信任，后来不得不告诉国王的使者贝克莱，叫他不要经常到他那里去，以后书信也要秘密寄送。并说，他由于受到人们很大的怀疑，害怕得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平等派对克伦威尔等人与国王相勾结的行为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号召士兵和鼓动员不要受高级军官的欺骗。为了自由的事业，要反对一切暴政，不论这种暴政来自哪里。在平等派的宣传影响下，士兵群众觉得不仅议会里的长老派不可信任，而且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也是不可信任的。因此，他们要求把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10月间，有5个骑兵连撤换了比较温和、斗争性不够坚决的鼓动员，并于10月15日拟订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造的纲领——“军队事业”，以与高级军官的“军队建议纲目”相对抗。

“军队事业”论述了平等派建立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它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要求赋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取消上院；停止圈地，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还给农民；废除专卖权，取消什一税等。

“军队事业”拟出后，遭到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高级军官的激烈攻击。10月20日，克伦威尔在议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对“军队事业”百般指责。他声明他和其他高级军官与这个文件的制订毫无关系。同时宣称，他的目的和愿望，“从内战开始时起就不是别的，而是为国王效劳，并建立君主的权力。”

围绕着“军队建议纲目”和“军队事业”展开的激烈争论是两种政治原则的冲突，主要分歧集中在君主制、上院、普选权等问题上。克伦威尔深恐平等派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为了尽早将平等派的影响加以消灭，提议召开全军大会，在全军大会上对上述两个文件进行讨论，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对平等派进行打击。

平等派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公约”

为了迎击克伦威尔等人即将发动的进攻，平等派在10月下旬又拟订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草案“人民公约”。它要求立即解散现存的议会；实行普

G.Holles,MemorialsoftheHollesFamily,1493—1650,1937,P.264.

C.H.Firth,Oliver Cromwell,P.171.

W.C.Abbott,op.cit.Vol.I,P.497.

英国历史学家费尔斯认为“军队事业”是由魏尔德曼拟订的，但从这个文件的文体前后不一来看，它可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它可能是在李尔本（李尔本当时虽然被囚于伦敦塔中，但仍与狱外平等派保持密切联系）的参与下，由几个人共同制订的。所以这个文件不仅反映了军队中士兵的要求，而且也表达了城乡劳动群众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要求。

DonM.Wolfe(ed),LevellerManifestoesofthePuritanRevolution,1944,PP.196—222.

W.C.Abbott(ed),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1937,Vol.I,P.512.

原件无日期，但估计是在10月20日至28日之间，即从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发言中还未提及这个文件，可见文件还未拟出）到普特尼会议召开之间拟订出来的。这正是“军队事业”拟订以后的数日。但其中有些内容与“军队事业”不同，其政治要求更激进、更明确，但社会经济要求却减少了。有的著作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争取独立派军官的合作与支持”（见Don Wolfe, Lev-eller Manifestoes,P.223.），但此说未必可

选制；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选区按人口比例重新分配。在第2条中特别指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干涉”。这里所谓的“个人”实即指国王，“团体”指上院。所以它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第5条规定，任何权力都不能干涉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也不能强迫人民服兵役，从事战争，也就是说包括议会下院在内的“任何权力”都不能违背人民的利益。这里体现了平等派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源泉的思想。另外，“人民公约”还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官职、财产、地位、出身如何，都应服从统一的法律。——

平等派的“人民公约”是革命以来城乡中下层劳动群众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要求和愿望的集中反映，是平等派人士几年来在现实斗争中的经验总结。“人民公约”中关于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最高源泉、关于普选权和关于废除王权和上院等民主思想，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对鼓舞群众进行斗争、推动革命深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普特尼会议

平等派的“人民公约”提出后，独立派和平等派围绕着未来国家政治制度问题的争论更趋激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647年10月28日在伦敦郊外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了全军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士兵鼓动员和平等派中下级军官以外，地方上的一些平等派人士也参加了。

在这次会议上，独立派和平等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的见解，暴露了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深刻的分歧。所以从思想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

会议首先围绕国家政权形式问题展开了争论，然后在10月29日又转入关于选举权的争论，到11月1日以后又回到了政权问题。

在28日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人民公约”。克伦威尔认为，“人民公约”虽然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不能因为它有道理，就把它作为宪法草案提出来。如果是这样，以后将会有更多的草案提出，那就可能导致流血斗争和内战，就像瑞士一样，一个州反对另一个州，一个郡反对另一个郡。他说，在考虑宪法草案时，不能首先考虑有无道理或是否应当，而是要看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是否准备接受它并与之一道前进，因为“这个文件包含了对王国政府非常巨大的变更，这种对政府的变更是自从英国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且不去考虑其他问题，仅就这一变更将会引起怎样的效果来说，就是明智的和虔诚的人们所必须要考虑的。”另外，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还指责“人民公约”破坏了军队在“军队庄严协约”中对议会所许下的诺言。艾尔顿说，信守盟约的精神是正义的基础，靠了它，人们才能互相信赖，并继续保存自己的权利和财产。如果现在不信守以前的盟约，那么“人民公约”被通过后，别人也可以照例不加遵守，这只能造成混乱。——

信。看来，上述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平等派认为政治要求更为重要。

Don M.Wolfe (ed), *Leveller Manifestoes*, P.227.

Don M.Wolfe (ed), *op.cit.* PP.227—228.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PP.7—8.

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发言，受到平等派代表魏尔德曼和雷因波洛等人的猛烈抨击。魏尔德曼在讲到军队同议会以前订立的协约时说，问题首先在于订立的协约是否诚实，是否合乎正义。如果以前订立的协约是不正义的、不诚实的，那么都可以废除。雷因波洛在发言中对克伦威尔力图维护现存的英国政治制度并用困难太大来进行威胁的言论表示愤慨。他说，要是害怕困难的话，那么我就不会起而反对国王进行战斗了。“让你被重重的困难所包围吧，即使在你面前的是死亡，而你的身后和左右都是大海，但如果你确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话，我想你必然会义无反顾地将这项事业推行下去的。”

28日会议上的发言表明，独立派害怕局势进一步变动，要求革命停止下来，所以拿各种借口进行威吓，企图禁止群众擅自提建议、拟方案。平等派则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要求把革命继续下去。

关于选举权问题的争论

次日即10月29日，会议围绕着关于选举权的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平等派坚持普选权的原则，认为这是英国全体居民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雷因波洛在发言时说到：“最贫穷的人和最高贵的人都是在英国过活的。因而……每一个人必须在他自己同意被置于一个政府管理之下的时候，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理……严格地说，在英国，最穷的人如果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他也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

独立派则竭力反对普选权的原则。他们认为，如果实行了普选权，就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李启上校在发言中说，英国没有财产的人与有财产的人的数目是5：1，“如果主人和仆人都成为平等的选举人，那么，很清楚，那些在这个王国没有财产的人，将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去选举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将会制造出一种法律，将会使资产和地产平等。”艾尔顿在发言中更是百般为现存的有财产资格的选举制辩护。他歪曲平等派所主张的普选制实质上是主张一个人只要在英国出生，就可以享有处理这里的土地和其他一切事务的权利。他主张选举权只应该给那些“在这个王国具有永久性固定利益的人”。而对这些人的“自由权利”已经提供了。这里他所指的就是现存的英国的选举制。另外，他还声称，给贫穷的人以选举权，可能会使有权势的人贿赂穷人、收买选票，像古罗马那样造成独裁制度。

对此，平等派进行了反驳。雷因波洛指出，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投票权，不是财产而是理智。否定一个人的投票权，就是否定他运用自己理智的权利。政府的目的是既保护人民也保护财产，但难道人民不是比财产更有价值吗？针对上述李启上校的言论，雷因波洛说，在现存的选举制度下，六分之一有选举权的富人利用特权去奴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共约六分之五的人，把他们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PP.7—8, PP.10—13, P.24, P.27.

见王觉非：《17世纪英国革命中平等派关于选举权的主张》，《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P.53.

Ibid. PP.53—54.

Ibid. P.54, P.63.

变成了“劈柴挑水”的苦力。鼓动员赛克斯比在发言中也坚持，没有财产的人应享有他的生而具有的天赋权利——选举权。不过，也有一些平等派如皮蒂等人，在独立派关于普选权将破坏私有财产的攻击之下，感到有些困惑。他们在寻找论据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声称他们根本不反对私有财产。相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普选权“是保护所有财产的唯一手段”。后来，皮蒂在发言中又说，他们所主张的普选权只给那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自由处理自己的劳动和财产的人。而所以要将学徒、仆役和领救济金的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是“因为他们依靠别人的意志”。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根据平等派的文件，他们的主张曾在会议中获得胜利，并在表决中被通过，但克伦威尔接着却建议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协调双方的意见，使平等派在会议中争得的优势化为乌有。

10月31日根据克伦威尔提议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但军官代表有12人而鼓动员代表却只有6人。尽管鼓动员坚持立场，未作退让，但是他们在组织上的阵地的步步丧失，却越来越明显了。

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的争论

11月1日，全军会议的辩论又集中到国王和上院的权力和地位上。平等派的雷因波洛、赛克斯比和魏尔德曼等人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国王和上院的统治。他们主张，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比国王和上院享有更大的权力。魏尔德曼说，在流了这么多的血之后，如果下院的权力仍无所改进，那么“在将来的编年史中，这将是可耻的事。”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则百般维护国王和上院的权力。艾尔顿说：“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克伦威尔则认为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由议会去讨论并报请国王认可。同时，克伦威尔在发言中还以加强军纪来对平等派进行威胁。

克伦威尔在普特尼会议上的表现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P.54, P.63.

Ibid.P.61, P.83.据加拿大教授默克费逊估计，如果按照皮蒂的主张，只给“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以选举权的话，有选举权的人数将比原有的多一倍，但如果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话，有选举权的人将比原有的多四倍。Cf.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1979, PP.112—117.

10月29日的会议，在会议记录克拉克文件中，没有关于对选举权表决的记载。但后来在11月11日赛克斯比等15人署名发表的“鼓动员致他们团队的一封信”中却说，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长时间争论后表决通过了平等派“人民公约”中第一条关于普选权的要求。决议指出，除了仆役和乞丐，全体人民包括士兵在内，即使每年收入不到40先令也都享有选举权，只有3票反对。（A Letter from Several Agitators to their Regiments, in *Puritanism and Liberty*, P.452.）这信写于事情发生后的十几天，而且是在伦敦街头进行散发，可见不会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的。那么为什么克拉克的记录中未记载这一重要事件呢？是否独立派高级军官授意将这有关的记录删除？尚难遽加定断。

A.S.P.Woodhouse (ed), *op.cit.* P.103, P.123.

A.S.P.Woodhouse (ed), *op.cit.* P.122.

在连续一个多星期的争论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实际上，争论本身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在克拉克文件中，缺乏从11月2日至11月8日的逐日详细记录，但从其它一些片段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11月5日的会议上，平等派占了优势。他们提议召开全军大会，把问题直接交给士兵群众讨论。这一提案获得通过。但次日，独立派高级军官又在会上提出要加强国王和上院的权力，拒绝了平等派的要求。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普特尼会议上，由于争论的两派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无法调和，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结果。事实上，斗争很快就从思想交锋走向更现实的一面。我们看到，克伦威尔在后来的发言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平等派的要求将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一再威胁要加强军纪。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克伦威尔与艾尔顿和往常一样，引用圣经教义，摆出一副虔诚、神圣的模样。10月28日，当讨论国王和上院的地位时，克伦威尔引用圣经上圣徒保罗的话，声称与基督比较起来，政府的形式不过是“废物和狗屎”。艾尔顿也在发言中声称，如果上帝指引他干的话，他会把国王、贵族、财产都加以消灭的。然而当讨论到实质问题时，所有这些圣经引文、基督教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压倒了一切。他们公然以古老的宪法原则的保卫者自居，紧紧抱着君主制、上院和私有财产不放，指责平等派的建议将威胁到私有财产，并导致无政府状态。宗教的热情、神圣的言词，一切都让位给世俗的现实利益。

另外，从普特尼会议前后克伦威尔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独立派的高级军官是有计划地准备最后打击平等派的。很可能独立派还采取了一些阴谋手段。对此，平等派虽然也有所认识，如在10月29日会议上，平等派代表罗伯特·艾维拉德在发言时就表示，他怀疑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人故意拖延时间，暗地里却在布置圈套来反对平等派、鼓动员。与此同时，士兵群众也感受到不祥的气氛，纷纷要求鼓动员采取实际行动去对抗独立派高级军官。10月29日，平等派又发表了“告全体士兵的呼吁书”（有人认为该呼吁书可能出自魏尔德曼之手），“呼吁书”要求士兵们提高警惕，因为克伦威尔很可能会以造成无政府状态的罪名，借口加强军纪，用强制的手段来镇压士兵群众和平等派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以后的事态发展说明平等派的怀疑都是有根据的。不过，平等派虽然觉察到了这一点，却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

当克伦威尔一切准备就绪，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时候，他就逐渐由和解的姿态转而强硬起来。在11月8日的全军会议上，克伦威尔攻击“人民公约”中关于普选权的规定，声称这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他提议全军会议暂时休会，军官代表和鼓动员都回到各自的团队去。一周以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等军队领导将军队分为3个部分，分别集中到3个地方进行检阅，企图借机来镇压士兵中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平等派意识到斗争的

A.S.P.Woodhouse (ed) op.cit.PP.452—454, 附录。

有些历史著作在论述普特尼会议时认为，会议后期平等派言论动摇，论点中心偏离了方向，因而在辩论中步步退让，使独立派占了上风。就历史资料来看，这一看法还不能作为定论。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P.97.

Ibid.P.83 , P.454.

A.S.P.Woodhouse (ed) ,P.83 , P.454.

严重时，也想趁军事检阅的机会发动士兵起义，强行通过“人民公约”。

于是，两派的斗争就由会场转到了疆场，由唇枪舌剑转为真刀真枪了。

魏尔事件

检阅前夕，独立派高级军官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鼓动员以前所提出的一些要求，一方面又以加强军事纪律相威胁。另外，这个文件还附了一个“协约”，要求士兵服从军官和军队会议的领导，并要求每个士兵都要在这个“协约”上签名表示同意。平等派的领导人虽然也呼吁各个团队士兵团结起来，共同与“贵人”（高级军官）作斗争，但并未作切实有效的工作。当时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有些特别激烈的平等派分子计划在军事检阅前夕，趁克伦威尔睡着的时候在床上把他杀死。他们还扬言把那些不同意他们审判国王计划的人的喉咙管割断。这种喧嚣浮躁的表现和刺激性的言词，正表示他们并未作切实的准备工作。

11月15日，首先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进行了军事检阅。检阅时，除了奉命前来的4个骑兵团队和3个步兵团队外，平等派领导的哈里逊团队和罗伯特·李尔本团队也径自前来（这两个团本来是奉命分别到别的地方参加检阅的）。罗伯特·李尔本团队的士兵将该团大部分军官都赶走了。他们还在帽子上别上了“人民公约”和标语口号：“给英国以自由！给士兵以权利！”一些著名的平等派军官如雷因波洛上校等也到场了。由于平等派事前未作必要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行动计划，所以其余几个团队的士兵没有响应平等派的号召。当雷因波洛拿着一份《人民公约》冲向费尔法克斯时，却被人推到一边去了。哈里逊团队的士兵也经不起费尔法克斯的一番劝说，即表示服帖。罗伯特·李尔本的团队虽然坚持斗争，但也未采取果断的积极行动。结果克伦威尔拔剑策马冲入该团，将为首者逮捕，并对其余的士兵大肆恐吓。紧接着就对肇事者进行军法审判，判处三人死刑，并用掷骰子的办法将其中一人即士兵阿诺尔德当场在队前由行刑班加以枪决。如此，就像一个历史家所说，由于克伦威尔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叛乱军队的秩序重新恢复了起来。”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决定性斗争中，独立派高级军官未费多大气力就取得了胜利。在军队中势力强大的平等派就这样轻易地被别人制服，放下了武器，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的同志在行刑班刽子手的枪声下倒在血泊之中。11月19日，克伦威尔已能够在议会中以表功的姿态报告灌木林原野事件的经过，并保证说，军队甚为平静和驯服。议会为此向克伦威尔表示感谢，并要求以后对军队中的任何叛乱行为都要坚决加以镇压。

这个文件大部分是由艾尔顿起草的，但内容与克伦威尔在军队会议上的发言基本相同，所以这个文件可能是由克伦威尔授意拟订的。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96, Vol. ,P.22.

W.C.Abbott (ed), WritingsandSpeechesofOliverCromwell, Vol.I.P.556.

S.R.Gardiner,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1896,Vol. ,P.

S.R.Gardiner,op.cit.P.561.议会中只有共和主义者赖得洛等人认为克伦威尔的行为不过是为了增强他自己的权力，因而拒绝对之表示感谢。

平等派失败的原因

平等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够？或是因为克伦威尔强加于他们的军事纪律？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两个因素都是存在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从人数上来说，不但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而且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也是站在平等派一边的。在军事检阅时，大约四分之三的士兵所以未公开表示对平等派的支持，是因为在当时环境下平等派既未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又未采取切实的发动工作把在场的士兵组织起来。各连队的士兵自然很难自发地对平等派的起义加以响应。至于克伦威尔利用职权将军事纪律作为打击平等派的工具，自然也对平等派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如上所述，自从鼓动委员会成立以后，军队里高级军官单纯以军事纪律来压制士兵的企图曾一度很难推行。看来，这些都不是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因素。至于一般书籍中把平等派的失败归因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属性，把它说成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更是一种不符史实的无根之谈。

平等派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斗争中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独立的组织和领导权。平等派奔走呼号，高唱原则，却把现实权力丢在一边，任凭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摆布。虽然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在争论原则问题时有时也表示出公允和商量的伪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死死抓牢，寸步不让。当克伦威尔一步一步地把平等派从领导组织中排挤出去后，就运用这个领导地位的权威把平等派打翻在血泊之中。

另外，我们回顾一下革命开始以来的经历可以看到：在革命刚开始时，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狂妄嚣张，议会阵营遭到多次危难。然而，由于议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领导中心，摆脱了查理一世宫廷的控制，经过斗争终于赢得了对王党的胜利。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当长老派和独立派展开斗争时，虽然长老派控制了起临时政府作用的议会，但独立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军队，把军队变成与议会相对抗的独立政治中心，摆脱长老派议会的控制，终于取得了对长老派的胜利。后来在独立派领导的军队取得对长老派议会的胜利，军队内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的士兵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本来也有可能在士兵群众之中形成独立的政治领导中心，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的。1647年4月底5月初，军队里出现了鼓动员的组织，这就为平等派在士兵中建立独立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如果平等派能够把这个组织巩固发展下去，以此为中心把士兵群众和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斗争组织领导起来，摆脱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控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也是可能的，但平等派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1647年6月5日，全军会议召开，鼓动员的组织被并入克伦威尔领导的以军官代表占多数的全军会议中。10月31日，克伦威尔提议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鼓动员的势力进一步削弱。11月8日，当克伦威尔悍然解散全军会议时，平等派束手无策。11月15日在灌木林原野举行军事检阅时，平等派又未做任何切实有力的准备，终于被蓄谋已久、布置就绪

“平等派宣言”的编者沃尔夫认为，平等派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数不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克伦威尔强加于他们的军事纪律，是互有联系但难以解答的问题。Don M. Wolfe (ed), *Leveller Manifestoes*, 1944, P.65.

参见王觉非：《17世纪英国革命转折时期的政治斗争》，《欧洲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2—183页。

的克伦威尔打倒。

六、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

国王的阴谋活动

然而，就在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将平等派士兵镇压下去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原来，国王查理一世从1647年10月起就秘密地同苏格兰的使者来往，阴谋勾结苏格兰的封建主来恢复他在英国的统治地位。11月11日夜，查理一世从原来监管他的汉普顿宫逃到了怀特岛的卡里斯小溪堡。在这里他继续同苏格兰的使者秘密接洽。

查理一世逃跑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震动。克伦威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暗自庆幸。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士兵鼓动员就无法接近国王，这就有利于保证国王的安全，也有助于他对鼓动员的约束，使鼓动员更服帖地听从长官的命令。

就平等派来说，这时正是他们在灌木林原野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国王逃跑的消息使他们非常激愤，同时对一再与国王相勾结的克伦威尔更为仇恨。虽然他们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却更坚定了斗争的决心。据当时人说，当时军队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士兵仍公开声言他们要继续斗争。“虽然他们知道，要是起义的话，肯定会失败的，但他们仍不会就此罢休。”1647年底和1648年初，平等派加强了活动。他们发表言论，出版小册子，对克伦威尔等人的背叛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由于平等派的宣传活动，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威信逐日下降，而平等派的影响迅速增长了起来。

独立派高级军官态度的转变

在上述形势下，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又陷入了他们在第一次内战刚结束时曾经遭遇的境地，左右受敌，进退维谷。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继续向右转，勾结国王；或者向左转，与平等派士兵重新联合，共同与王党作斗争。

第一条道路是克伦威尔等人自第一次内战结束以来一直想走而未走通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的右方还站着比他们更保守更反动的长老派和苏格兰封建主。国王宁愿接受苏格兰封建主或长老派的条件，而不愿答应独立派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克伦威尔等人逐渐认识清楚了。特别是这年11月21日，克伦威尔截获了国王查理一世给王后的一封密信（“马鞍书信”）。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查理一世宁愿得到苏格兰人的支持，而绝不接受克伦威尔提出的条件。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克伦威尔不得不打消继续同国王相勾结的念头。对此，他后来曾说：“当发现我们不大可能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时，我们立刻就决定要使他毁灭。”

E.Hyde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1958, Vol. , P.275.

W. C. 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1937, Vol. . P. 569.

1649年，当克伦威尔的密友奥列里问他，为什么他以前一直为国王辩护，同国王谈判，但后来却突然转变态度，决定停止同国王的谈判时，克伦威尔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苏格兰人和长老派比我更有力，

克伦威尔所以不敢继续同国王勾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这种行为在士兵群众和广大中下层人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使他不得不考虑这样下去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11月底，当国王的使者贝克莱到军队里去找克伦威尔谈判时，克伦威尔就托人转告他不愿和他见面。他说：“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危险的。”他并且表示，虽然他一向乐意为国王服务，但他不愿为了国王而自取灭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在11月下旬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百般为国王辩护，力图与国王相勾结，并对平等派废除王权、审判国王的要求予以猛烈抨击，现在却一变而为拒绝同国王谈判，同意审判国王，也就是说，突然与平等派采取同样的立场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从表面上看，似乎颇为费解，但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客观环境来分析就可看出，它不是由个别事件或克伦威尔的一时兴致所引起，而是由斗争的现实所决定的。

当然，对克伦威尔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痛苦的选择。12月24日，在温莎的祈祷会上，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高级军官“以非常激动和悲伤的心情祈祷着……从早晨9点钟直到晚上7点钟”。最后才决定：“国王应该作为有罪的人加以处决。”

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

独立派高级军官同国王断绝关系后，鉴于国王勾结苏格兰封建主伺机进行反扑，即将发动内战，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平等派重新联合。在1647年12月21日的军队会议上，克伦威尔将以前参加灌木林原野起义的平等派军官全部释放。1648年4月29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时，平等派的军官以及以前的一些鼓动员如艾伦等全部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使国家蒙受重大痛苦的罪魁祸首加以审判。

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平等派联合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非但没有接受平等派的纲领，反而更加处心积虑地准备推行他们原来那一套保守的政治计划，用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保持君主制度。

从1647年底到1648年初，英国国内的形势非常紧张，新的内战即将爆发已是十分明显的事。1647年12月26日，查理一世同苏格兰的使者订立了秘密的“协约”。规定苏格兰人派军队前来帮助查理一世恢复王位，解散现有的英国军队和议会，查理一世则答应在英国全国推行长老派宗教。虽然这

如果他们同国王谈妥了，那么我们就会被抛弃。” W. C. 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1937, Vol. , P.564.

W.C.Abbott (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 P.570.

有的著作说，“克伦威尔的立场如此急遽转变，究竟是什么原因仍然不十分清楚。” Don M.Wolfe (ed), *Leveller Manifestoes*, 1944, P.67.

E.Hyde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1958, Vol. , P.283.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96, Vol. , P.116.

S.R.Gardiner (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1927, PP.347—352.

个“协约”非常秘密，同铅裹了起来，埋在怀特岛的卡里斯小溪堡的花园里，但在1648年初，消息即渐渐传出，国内有些地区的王党分子也蠢蠢欲动，阴谋发动叛乱。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政治立场仍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他们已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查理一世身上，但他们仍没有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决心。1648年初在一次讨论未来政府机构问题的会议上，据在场的人记载，一些共和主义者（当时人称之为“共和人士”（Commonwealthman）要求立刻成立自由的共和国，并审判国王查理一世。克伦威尔和他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却尽量回避，抱着“超然事外”的态度。另外，有些历史资料足以证明，直到1648年春，克伦威尔等人曾打算推威尔士亲王或约克公爵出来代替查理一世为国王，以此来保持君主制度。只是因为威尔士亲王本人不同意，而约克公爵已逃到了法国，这个计划才未实现。

就平等派来说，当独立派重新与他们联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同时，他们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已认识了克伦威尔的真实面目，对他是存有戒心的。

然而，直到这时，平等派仍然没有认识到领导权和独立组织的重要性。当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被迫与他们重新联合的时候，他们没有趁此机会把士兵中的鼓动员委员会恢复起来，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和领导中心。他们的行动仍旧处于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的领导和指挥下。可以说，平等派这时仍旧是实践落后于理想，行动跟不上言词。这就为他们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C.H.Firth (ed), *Memoir of Edmund Ludlow*, 1934, Vol. , PP.185—186.

C.H.Firth,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in England*, 1953, P.186.

1648年初，李尔本在议会发言指责克伦威尔说不仅他不断与国王打交道令人怀疑，而且一年来他的态度几次变换，说明他缺乏政治上的坚定性。4月，他劝说士兵服从议会的决定驯服地解散。6月，他又回过头来率领军队反抗议会关于解散的决定，但到了11月，他再一次回过头来要求军队服从议会而解散。另外，李尔本还列举事实，指责克伦威尔缺乏政治原则性。如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共和制意味着自由，君主制意味着奴役，是不可调和的，但克伦威尔却把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只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所以人们有理由把他看成是一个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原则的两面派。

第三节 第二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一、第二次内战和王党的失败

第二次内战的爆发

1648年2月，南威尔士的王党进行暴动，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内战。这时许多地区的贵族公开拥护王党，伦敦也出现了敌视议会军的活动。海军原来是坚决支持议会的，这时也转向王党方面。原来与议会军一起反对国王的苏格兰人，这时也转而与议会军为敌。5月间，在肯特地区，王党分子占领了许多城市；在英格兰北部，王党分子和苏格兰的军队共同行动；有一部分舰队也投到了王党方面。有人形容当时的形势是：“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地主和商人、伦敦城区和农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苏格兰的军队、威尔士人、英格兰的舰队，一切的力量都反对克伦威尔的铁骑军。”

虽然王党在第二次内战开始阶段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在议会阵营，独立派和平等派已重新联合，军队恢复了团结。在1647年12月21日的军队会议上，克伦威尔宣布将以前因参加魏尔事件而被捕的平等派军官全部释放。1648年4月29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时，平等派的军官和以前的一些士兵鼓动员如艾伦等人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平等派提出的建议，即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使国家承受重大痛苦的罪魁祸首而加以审判。议会军的士兵奋勇作战，反击王党分子的反扑。各地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积极支持议会军，并主动参与同王党的斗争，因而战局很快有利于议会军。1648年7月上半月，议会军镇压了南威尔士的王党叛乱。8月，在普雷斯顿附近的决定性战斗中，王党军队被击溃。这个月的31日，王党在东南方的最后根据地科尔切斯特向议会军投降。第二次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

“普莱德清洗”

当议会军开赴前线作战的时候，议会内的长老派趁机秘密与国王谈判，企图使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纽波特条约”）下复位。长老派的活动引起人民普遍不满，社会中下层人民和军队里的士兵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审判国王，把国王作为内战的祸首加以惩处，同时要求清除议会里同国王勾结的反动议员。1648年4月9日，军队召开了一次军官会议，在平等派鼓动员参加下，通过了追究国王查理一世罪责并对之进行审判的决议。同年11月10日，当军队从前线胜利归来到离伦敦不远的圣阿尔班斯的时候，军官会议通过了一项“军队抗议书”，谴责议会里一些议员同国王进行谈判的行为；要求成立审判国王的法庭；将现存议会解散；废除君主制等。当议会表示拒绝接受这些建议时，军队就于1648年12月2日再度开进伦敦，并派人到怀特岛将国王押到赫斯特城堡，以断绝议会同国王的来往。这时，社会中下层人民和军队里的士兵革命热情高涨，平等派的影响大为增长。军队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实际上都是平等派的主张。军队领导权在形式上虽然处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手中，但实际上中下级的进步军官如哈里森、普莱德、

W.Churchil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1956, Vol. , PP.218—219.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96, Vol. , P.116.

艾沃尔等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掌握了主动权。当军队得知 12 月 5 日议会以 129 票对 83 票通过了继续在“纽波特条约”的基础上与国王谈判的消息时，就决定对议会采取行动。当时军队面前有三种途径可走：一是将现存议会解散，重新进行议员选举，但这样做有可能使一部分敌视军队的人在选举中重新被选入议会，反而对议会不利。所以赖德洛等激进人士认为这种办法不妥。第二种办法是将议会干脆解散也不再选举，由军队直接控制局势（后来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做的），但这种方式在当时不会为人民所接受。第三种方式是将议会中敌视军队、竭力主张同国王进行谈判的议员清除出去，剩下的议员继续开会，最后这一办法为军队中的激进分子所接受。12 月 6 日清晨，军队在未得到统帅部的命令的情况下，径自占领了各条通向议会的通路。普莱德上校拿了一份事先拟好的议员名单，站在议会大厦的入口处，不准名单上开列的议员进入议会。最初，普莱德只认出少数人，后由守卫人员帮助他指认那些名单上开列的议员。不久，格雷勋爵前来，站到普莱德上校身旁，帮普莱德指认并将那些进行反抗的议员带到附近一个名为“王后宫”的建筑中加以囚禁。次日清洗继续进行，约 100 多名议员被从议会“清洗”出去，他们大多是长老派议员。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到会的议员只剩下约 200 人，即“残余议会”，主要由独立派议员组成，此后，独立派就在议会里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事件，克伦威尔事后才得知，他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对此感到高兴并将努力加以支持”。

W.C.Abbott, op.cit.P.706.

关于被“清除”出议会的议员人数，当时人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后世的有关著作也人各异词。根据各书的记载加以考订，除了那些被囚禁起来的议员之外，被阻止在议会外不准进入议会者为 186 人。David Underdown, *Pride's Purge*, 1985, P.212.

W.C.Abbott, op.cit.Vol. , P.707.

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审判国王

当时形势的发展，不仅使保守的长老派遭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克伦威尔、艾尔顿等独立派领导人也感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酷现实，使他们不得不去同王党和长老派坚决斗争。1648年温莎军官会议开会时，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就表示不应该再同国王谈判，因为“他是一个大骗子、一个虚伪的人，所以他是不可信任的。”不过，直到此时，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导人虽然不再对查理一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却仍然不愿废除君主制度。“残余议会”中有些议员的态度也动摇不定，他们在讨论关于审判国王的问题时，拖延了许多天，12月28日才通过了把查理作为背叛国家、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英国人民自由的罪犯而加以审判的决议。独立派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们最后同意审判国王也是在当时形势下无可奈何的事。克伦威尔12月底在下院讨论审判国王的问题时说：“任何人，不论是谁，如果他打算废黜国王或剥夺国王子孙的王位继承权……他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叛徒和犯上作乱的人。然而，既然上帝已把这个加于我们，我们只有服从。”但根据当时的规定，法律在下院通过之后，须经上院同意才能生效。这时上院只剩下16个议员，他们一致否决了关于审判国王的议案。下院鉴于国内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军队里士兵的情绪空前高昂，平等派正在积极展开活动，不得不采取顺从民意的坚决措施。1649年1月4日，通过下院享有最高权力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家任何法律的最终源泉是人民，因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应该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下议院的决议可不经上议院和国王的批准而直接生效。1月6日，下院通过了成立最高法院以审判国王的议案，成立了由135人组成的特别高等法庭。参加者有议会议员、法学家、高级军官、伦敦议会的议员等，庭长为法学家布拉德肖。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审判从1月20日开始，首先宣布对查理一世的指控：国王本来应该根据法律为人民利益而进行工作，但是查理却企图攫取无限的权力，对人民施行暴政，他挑起了内战，对英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然而高等法庭中的一部分人却对审判国王和判处他死刑一事表示反对，原来的议会军总司令费尔法克斯，虽然也是高等法庭的成员，却拒绝出席。1月27日判处查理一世死刑时，出席的高等法庭成员只有67人，占全体成员的一半，最后在判决书

E.Hyde Clarendon,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1958, Vol. , P.281.

C.H.Firth (ed), *Memoir of Edmund Ludlow*, 1934, P.186.

W.C.Abbott (ed), *op*, cit.P.719.

S.R.Gardiner(ed),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1927, PP.384—387.

W.C.Abbott, *op.cit.*P.737.

在宣布高等法庭的成员时，第二个名字就是费尔法克斯，他本人不但拒绝出席，而且他的夫人在旁听席上大声喊叫表示抗议，引起法庭一阵混乱。E.HydeClarendon, *op.cit.*P.235.

上签名者只有 52 人。判决书上对查理一世指定的罪状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__判决在 1 月 30 日执行，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

2 月，下院又通过了废除上院和王权的决议，这时英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共和国。5 月 19 日，议会的决议正式宣布：“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都将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都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这样，英吉利共和国就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了下来。另外，根据议会在 2 月所通过的决议，国家行政权交给了由 41 人组成的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的成员大部分是独立派领导人物，其中 31 人是来自议会的议员。实际上，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处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的手中了。

共和国建立的意义

1649 年初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是 17 世纪英国革命发展的顶点。在这个阶段的革命发展过程中，英国社会的中下层人民群众和作为中下层人民代表的平等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赋予这个阶段的革命事件以革命民主的性质。

然而，革命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代表者的独立派掌握了政权之后，立刻转过头来镇压人民并扼杀革命的民主进程了。

第四节 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护国公制

一、共和国建立时的国内局势

独立派的政策

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派领导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在消除了右面的敌人后，就转过头来集中力量对付左面的敌人，即以平等派为代表的广大中下层人民。

独立派领导人所实施的政策，不但未减轻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这就引起了广大城乡中下层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从第二次内战以来已经蓬勃开展的人民运动和平等派的活动更加高涨起来。

针对当时独立派当权集团的倒行逆施政策，1649年2月底，李尔本发表了小册子《揭露英国的新枷锁》，其中对议会的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要求限制议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最高主权。同时，它还要求采取措施，消除人民的经济困难状况，取消什一税、间接税，取消专利和垄断公司，实行出版自由等。3月底，李尔本又发表了《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的第二部分，谴责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一些议员，说这些人表面上表示要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却是在想方设法抢夺政权。

平等派的斗争

由于李尔本在上述小册子中对议会和高级军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议会即将李尔本和与他共同执笔的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一起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中。当李尔本等4人被带到国务会议受审时，曾听到克伦威尔捶着桌子大喊：“你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人，只有去粉碎他们。如果你不把他们粉碎，他们就要粉碎你。”可见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国的新当权者已把平等派当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了。

李尔本等人仍坚持斗争。他们先于4月14日在监狱里发表宣言，为平等派的事业辩护，然后又于5月7日由他们4人共同起草发表了第三个文本的《人民公约》，要求在1649年8月以前解散现议会，以后议会每年改选一次。这个由400人组成的代表机构是英国及其领土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根据自然权利”、年龄在21岁以上的男子选出。除罪犯和仆人，领救济金的人以及以武装支持过国王或自愿对国王进行捐献的人之外，其他人都有选举权。不过，那些为国王效劳过的人，10年之后，仍可被选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公约”还要求停止征收间接税和什一税，改收所得税。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平等派长期以来不断为之奋斗的思想原则的继续，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来改造当时的英国。它符合当时城乡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愿望，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但也引起当权者的敌视和恐惧。克伦威尔等人即着手筹划去镇压平等

E.W.Haller and D.Davie, *The Leveller Tracts, 1647—1653*, 1944, P.166, PP.171—189.

J.Lilbourne: *The Picture of the Council of the State*, W.C.Abbott (ed), op.cit.Vol. , PP.41—42.

Don M.Wolfe (ed), *Leveller Manifestoe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44, PP.402—403.

派的活动。

平等派士兵起义

在平等派加强活动的情况下，军队里在平等派影响下的士兵又像 1647 年一样，站到了斗争的前列。1649 年 3 月 1 日，有 8 个士兵因向军官会议递交请愿书，抨击国务会议，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 5 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被判有罪。克伦威尔下令于 3 月 6 日在全团士兵面前将这 5 个士兵面朝马尾放到马背上，然后在他们的头上将刀折断，并把他们从军队中驱逐出去，但是伦敦市民却以盛大的集会来向这几个士兵表示敬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害怕士兵闹事，即借口派军队到爱尔兰去镇压那里的天主教徒的叛乱，指派一部分部队前往爱尔兰，另外一些部队则受命离开伦敦，调往别的地区。这个措施引起士兵的强烈不满。4 月间，在士兵中已发生了骚动。23 日费尔法克斯命令不满情绪强烈的一个骑兵团队撤出伦敦，但遭到士兵的拒绝。次日，当这个命令再度重申之后，士兵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即下令将为首的 15 名士兵逮捕，送到白厅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 6 人被判处死刑。后来，克伦威尔害怕军队发生更大的骚动，将其中 5 人赦免，而在 27 日把士兵罗伯特·洛克叶枪决。当 29 日为洛克叶举行葬礼的时候，伦敦市内有几千群众参加，他们佩带黑纱和作为平等派标志的海绿色飘带。灵柩前由士兵列队吹着军号，奏着葬礼进行曲，送葬的群众整齐地排列了有几英里长，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向独立派当权者的大示威。

与 4 月间伦敦士兵的骚动同时，在全国城乡和军队的士兵中都不断有不满政府的事件发生。虽然伦敦的士兵骚动遭到镇压，但发生骚动的根源却未消除。5 月 1 日平等派新文本的《人民公约》发表后，得到人民和士兵的广泛拥护。2 日，伦敦人民包围议会，要求释放被囚禁的李尔本、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同时，伦敦和埃塞克斯的人民也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抗议议会迫害人民的行为。

士兵中也酝酿着更大的反抗政府的行动。5 月间，在牛津郡、威尔特郡、白金汉郡都发生了士兵拒绝前往爱尔兰而发动的起义。起义部队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预定各个团队一齐开往牛津郡的班伯里会合。在这里领导起义的是平等派士兵威廉·汤普逊。但起义者缺乏组织，预定的会合计划未能实现。当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在伦敦率领大规模的部队前来讨伐时，起义队伍仓卒应战，在贝尔福德被击溃，400 人被俘，其中 3 人当场被枪决。17 日，起义的领导者汤普逊也在战斗中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在镇压了平等派士兵的起义以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到了附近的牛

1648 年 10 月底，平等派领导人雷因波洛被保王分子刺杀。在他的葬礼上，第一次出现了海绿色的飘带，这可能是因为雷因波洛原来是一个海员，曾在海军中服务，此后海绿色即被平等派用作自己的标志。

S.R.Gardner,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 1897, Vol. , P.52.

《军事通报》(Mercurius Pragmaticus)，1649 年 4 月 24 日—5 月 1 日。H.N.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510.

平时人们称他为“上尉”威廉·汤普逊，但实际上他在“新模范军”中只是一个下士士兵。(H.N.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513.) 有些书籍称他为“汤普逊上尉”，不确。

津大学，受到大学领导人的热情支持。牛津大学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学位委员会，授予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以博士学位，授予其他军官以硕士学位。25 日克伦威尔等回到伦敦时，更受到伦敦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议会专门通过决议，定于 6 月 7 日举行感恩祈祷和隆重的恣情欢乐的庆功宴。伦敦城区的大富豪还特地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家中，赠给他们以黄金制成的盆、罐以及盘子等贵重器皿。上层阶级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中重新走到一起来了。平等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已退出了舞台，17 世纪英国革命也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对平等派的评价

平等派的政治纲领，是当时英国的各个政治派别中最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纲领。这个纲领得到当时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还得到新模范军中的大多数士兵的衷心支持。这些士兵曾多次为了实现平等派的要求而进行斗争。虽然平等派最后在斗争中失败了，但是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却深信不疑。李尔本曾表示：“不论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坚信，后代的人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好处。”平等派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他们在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斗争时，没有建立起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组织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操纵。虽然平等派的这个弱点是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力量不够壮大、政治斗争经验不足有关，但是平等派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和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没有彻底抛弃对克伦威尔的幻想，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重要因素。

虽然平等派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民主思想，以后仍以各种形式在群众中绵延流传。1685 年一个以前的平等派鼓动员理查德·伦勃特，当他因参与一件反政府的事件被残酷迫害时，他在临刑前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挑选去骑在别人头上，因为没有任何人当生下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付马鞍；没有任何人可以骑在他身上，鞭打他，奴役他！”这句话表达了平等派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思想。后来，每当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来时，平等派的革命民主思想又会在群众中沸腾起来。18 世纪末，当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之时，平等派的思想再度成为鼓舞民主派人士奋而进行斗争的因素。“伦敦通讯会社”把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重印并加以散发。当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 20 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的纲领和言论曾多次被引用。

掘地派运动

Wood,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Oxford*. See W.C. Abbott, *op.cit.* 1939, Vol. , P.73.

W.C. Abbott, *op.cit.* Vol , , P. 79.

John Lilburne *England New Chains Discovered* in A.L.Morton(ed) *Freedom in Arms A Selection of Leveller Writings* , 1975 , P.11.

参见王觉非：《欧洲史论》，1994 年版，第 157—175 页，第 222—223 页。

H.N.Brailsford, *op.cit.* P.624.

A.L.Morton (ed) , *Freedom in Arms , A Selectionl of Leveller Writings* , 1975 , P.73.

1649年春，正当平等派的活动在英国不断发生的时候，在很多地区还出现了自称“真正平等派”即掘地派的运动。这年4月，在温斯坦莱和艾维拉德的领导下，一批为数约二三十人的掘地派成员集合于伦敦附近萨里郡的圣乔治山，占领那里的公用地和荒地，进行耕种、垦殖。几个月后，掘地派的人数迅速增加。在肯特郡、白金汉郡、北安普顿郡、哈福德郡等许多地方都得到响应。他们声称并不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并把实现他们计划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等当权人物身上，认为“富有者的理智终将战胜他们的贪欲”。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地主和行政当局的恐慌，地主们组织武装，破坏了他们的垦殖区，政府也派了军队将之驱散。到1650年春天，掘地派的垦殖区已遭到破坏，掘地派运动随即瓦解。

掘地派的思想反映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温斯坦莱在所写的小册子中认为，人类社会在原始时期，土地是公有的，后来由于少数人阴险奸诈，而另一些人不学无术，因而产生了土地私有制。随之而来的就是贫富悬殊，强者欺凌弱者，产生了战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王权，人民沦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在英国，这种现象是从诺曼征服开始的。征服者威廉征服英国后，把侵占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作为私有物，广大的英国人民变成了受奴役的无地的农奴。温斯坦莱主张，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土地属于公有，人民都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然而，温斯坦莱却找不到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力量。他有时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智，有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当权的领导人物身上，希望这些领导人能利用权力从上而下推行他的计划。当然，他的这种希望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掘地派运动和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城乡最贫穷人民的愿望，但它是不成熟的、空想的，而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掘地派关于取消私有财产的主张，在当时刚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英国，不但引起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即使社会中下层人民包括一些城乡贫苦人民对此也感到陌生和不现实。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温斯坦莱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托马斯·莫尔的影响，温斯坦莱的思想对英国后世的激进主义者如威廉·葛德文等的思想发生了影响。在思想发展史上，温斯坦莱的理论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国当权者，在镇压了平等派、驱散了掘地派以后，实际上破坏了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群众基础。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右翼元老派联合，以加强对下层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同时，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缓和紧张的国内矛盾，又发动了对爱尔兰、苏格兰的征讨和对海外的斗争。

温斯坦莱等人自称为“真正平等派”，别人称之为“掘地派”。

艾维拉德是掘地派运动初期阶段的领袖，但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却是温斯坦莱，而且在后期，温斯坦莱成为实际领导者。Cf.H.W.Bt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658.

掘地派在圣乔治山的开垦活动，仅是在许多地区都发生的垦殖活动的一个得到记载的例子。C.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1974, P.118, P.124.

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除了引述《圣经》之外很少引述其他著作。对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不过从他的著作的内容来看，他很可能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书，并受到它的思想的影响。

二、征讨爱尔兰、苏格兰

征讨爱尔兰军队的变质

克伦威尔借口镇压从 1641 年开始的爱尔兰的“叛乱”，1649 年 8 月亲率 1 万多军队在都柏林登陆。到都柏林后他宣称，他和他统率的军队正在从事“反对野蛮的、血腥的爱尔兰人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并从事宣传基督福音，建立真理与和平，在这个血流遍地的国度，恢复其往日的幸福和安宁……”克伦威尔希望能得到英国议会的支持。由于这里交通不便，道路状况很差，而且气候潮湿，瘟疫流行，英国军队在爱尔兰遇到很大困难，但克伦威尔以残酷手段击溃了爱尔兰人的抵抗，很快就攻占了德罗弗达城，将守卫该城的部队和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全城和平居民加以屠杀。然后，克伦威尔率领英军向爱尔兰南部进军，攻占了沿海城市威克洛。爱尔兰遭到彻底破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争。一个英国军官说，瘟疫和饥饿遍及爱尔兰，“人们在二三十英里方圆的地方，见不到一个活着的生物，无论是人、野兽或鸟雀。”另一个军官说：“地球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遭受过如此悲惨的命运。”1650 年，英军完全占领爱尔兰沿海一带，克伦威尔将征服爱尔兰之事交给了他的助手，他本人则去从事对苏格兰的征讨。

英军征服爱尔兰的工作到 1652 年 5 月基本结束，大批爱尔兰的土地被英国占领军没收，这些土地大部分落入英军高级军官和英国的大资产阶级之手。另外，还发给英军士兵们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但许多士兵因为经济困难，需要现款，就把“债券”折价卖给了军官。此后，克伦威尔以及其他许多英国的高级军官都成为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英国的军队曾是革命的主要工具，现在由于对爱尔兰的征讨和侵略，逐渐腐化变质。这支变了质的军队，日后成了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支柱。

征讨苏格兰

对苏格兰的征讨是从 1650 年开始的，苏格兰人与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即后来的查理二世）联系，企图在英国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查理·斯图亚特即以苏格兰为基地，与英吉利共和国为敌。克伦威尔率领英军同苏格兰人作战。1650 年 7 月底，克伦威尔指挥的 1.6 万军队攻入苏格兰。但由于疾疫和缺粮，到了秋天，英军只剩下 1.1 万人左右。苏格兰人挖掘壕沟，顽强抵抗，英军处境不利。但由于苏格兰的统帅莱斯利错误地将军队布置在山峦和深谷之间，使苏格兰军队无法发挥战斗作用。在 9 月 2 日晚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克伦威尔指挥的英军在邓巴尔发动猛攻。9 月 3 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英军高呼：“上帝高升，粉碎敌人。”在英军猛烈攻击下，苏

W.C.Abbott, op.cit.Vol. , P.107.

“英国的道路很差，但爱尔兰的道路更差；英国的气候潮湿，但爱尔兰的气候更潮湿。”对水土不服的英国军队来说，当地流行的瘟疫比爱尔兰人的抵抗更可怕”。Ibid.

C.Firth,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in England, 1953, P.259.

C.H.Firth, op.cit.P.278.

格兰人溃不成军。克伦威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 1651 年春，苏格兰人又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由查理·斯图亚特率领攻入了英国。这时克伦威尔仍在苏格兰指挥作战，闻讯即率领英军从苏格兰回军追击，在伍斯特附近追上了查理·斯图亚特，将其彻底击溃。

克伦威尔在击败了苏格兰的军队后，将苏格兰正式并入英国。1654 年发布了合并的命令，苏格兰的议会被取消，在英国议会里增添了 30 个议席给苏格兰的代表。

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航海条例

这个时期英国在海外贸易上的主要竞争者是荷兰。荷兰的航运业颇为发达，许多欧洲国家，在从事海外贸易时多用荷兰的船只。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后，为了打击荷兰的海上贸易势力，以争取英国在海上贸易的优势地位，就在 1651 年针对荷兰颁布了一个“航海条例”。从 14 世纪以来，英国曾陆续制订过一些航海条例，目的都在于使英国的航海商船垄断英国和它的属地的贸易，但都未获得预期的效果。1651 年制定的“航海条例”规定：凡是从欧洲运到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送到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国的有关殖民地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以及英国沿海的商业往来，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这些规定对荷兰海外航运业是沉重打击，所以荷兰要求英国废除“航海条例”。当英国拒绝后，1652 年 6 月，英荷两国之间的矛盾就演变为战争。

英荷战争（1652—1653）

英荷战争开始后，英国由于工业比较发达，可以应付战争所引起的暂时的损失，而荷兰的商业经营在战争时期却受到很大的破坏。到 1653 年 6 月，荷兰不得不向英国求和。1654 年 4 月，双方缔结了和约，荷兰承认“航海条例”，英国在海上贸易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四、克伦威尔护国公制的建立

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残余议会”中议员的态度

克伦威尔在镇压了平等派，驱散了掘地派，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并在英、荷战争中击败荷兰之后，在国内的权力日益增加。国内中下层人民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斗争虽然被武力镇压下去了，但不满的情绪仍然到处洋溢着，它以“第五王国派”等神秘的宗教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在议会里，虽然经过“普莱德清洗”，独立派的议员在“残余议会”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之间仍然经常争吵，意见不一。就其大多数来说，“残余议会”绝不是一个革命的团体，虽然其中有 200 多个议员是在“普莱德清洗”之后和 1653 年底被解散之前当选的，但其中只有 60—70 人经常开会。而真正的激进分子比这个数字更小，有 43 人在处决国王的法令上签了名，另有 28 人在处决国王之前就与议会里的保守分子意见不一，反对同国王谈判，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坚定。然而即使这 71 个核心人物，也很少有人能被称为真正的激进派。

由于“残余议会”内部纷争，意见不一，而少数激进的议员仍然不时在议会的讲坛上对克伦威尔的政策进行抨击，克伦威尔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感到，为了维护他们已经取得的权益，防止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护国公制的建立

上述这种愿望，自然集中到权势、地位已空前增长的克伦威尔的身上。1653 年 4 月，克伦威尔解散了表现不十分驯服的“残余议会”。4 月 20 日，他在议会发言中说，这些人在议会中当议员时间已够长的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色鬼……有些是酒鬼，有些是品德败坏的人，让这些人去宣传福音简直难以令人容忍，不应该叫他们再呆在议会里了。”“残余议会”被解散后，在 7 月 4 日召集了一个“小议会”，由于这届议会中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贝尔朋，故又称“贝尔朋议会”。“小议会”中的议员大部分是“声名不扬”的人物。克伦威尔原希望它成为驯服的工具，但议会中的一些左派议员仍表现得不肯驯服。他们不断提出社会经济改革等的要求，如要求释放因负债而被囚禁的人，救济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等。这些激进的要求，引起克伦威尔的不满。克伦威尔及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利用议员中的激进分子和温和派人员的

D.Underdown, *Pride's Purge*, 1985, PP.213—216.

以前的史学著作认为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是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力。实际上，克伦威尔当时所以要解散“残余议会”，一方面是他忽左忽右的神经质的性格的反映，同时也是他在“残余议会”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环境下，无法继续在两者间维持平衡，为了取得军队的拥护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B.Worden, *The Rump Parliament*, 1974, PP.345—348.) 在当时，克伦威尔此举是整个政治斗争客观环境的产物，虽不能把它说成是克伦威尔个人野心的单纯表现，但也不能否认它是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政治集团要求巩固并加强自己政治权力的一种反映。

Ibid.P.1.

E.Hyde Clarendon, *The Great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Vol. , P.282.

矛盾，对之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压力下，1653年12月12日，“小议会”中一部分温和议员提议“自动辞职”，“小议会”即行解散。接着，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12月16日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形式上，护国公的权力受到国务会议的限制，但由于“施政文件”规定，当国务会议的委员会缺额而需要补充人员时，护公有决定人选之权，同时议会的法案又必须经过护国公的批准才能生效，护国公的权力实际上超越了议会和国务会议。护国公制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它的主要职能是镇压下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是为了防范王党分子的叛乱。

“施政文件”规定，在护国公制度之下，立法权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行政权由护国公和护国公任命的国务会议共同掌管。按照这一文件，护国公不仅在立法权、行政权方面享有广泛的职权，同时还是军队和国民军的总司令。1654年9月，按照“施政文件”所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有些议员企图审查“施政文件”的规定，以限制护国公的权力。这一举动使克伦威尔大为恼怒，他声称议会无权规定护国公的权力，不久就将这届议会解散了。1655年3月，发生了一次保王党人的叛乱。克伦威尔在镇压了这次叛乱后，以此为借口加强统治。此后，克伦威尔未再召集议会，而是进行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将全国划分为11个军区，每一军区由一个陆军少将领导，民政权和军事权全部集中在陆军少将手里。护国公制下的统治，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比较起来，效率较高，政府部门中的腐败现象也减少了，行政部门和人员间的矛盾、纠纷和争权夺利的现象逐渐消失。然而在它的专制高压下，一切民主空气和生机都被窒息。

护国公制同君主制已很少区别，它是走向君主制的方便形式。在护国公制的最后几年，议会里有些议员企图恢复公开的君主制。1656年9月，议会废除了陆军少将制。次年5月25日，议会又向克伦威尔提交了一份“恭顺的请愿和建议书”，建议恢复国王的职位和上院，由克伦威尔担任国王，议会里的议员由国王直接任命等，但这一建议受到高级军官的反对。克伦威尔的一个朋友威廉·布拉德福致书克伦威尔说：“在议会中有人建议你当国王，但也有少数人反对。而在军队中那些接近你的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反对的。”他劝克伦威尔无论如何也不要接受国王的称号。“我也是属于反对者之列的，我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仍然忠诚于你，从埃吉山到邓巴尔，我一直和你在一起的。至于那些要你当国王的人，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克伦威尔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未敢贸然接受国王的称号，但同意了其他建议。1658年初，克伦威尔将刚刚召集起来的议会加以解散，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个人独裁统治。当年9月3日，他因患病不治而在白厅逝世。这时在护国公制度的高压下疲惫衰竭的人民，在沉默中迎接了他的死亡的消息。护国公政府的秘书塞尔洛记载当时的情况说：“连一声狗叫都没有，到处是一片寂静。”到11月23日克伦威尔尸体被埋葬的时候，另一个当对的人以明显挖苦的口吻写道：“这是我所见到的一次最欢乐的葬礼，因为除了那些被喝着

G.E.Aylmer, *State's Servants*, 1971, P.167.

C.H.Fir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1909, PP.163—164.

Thurloe State Paper, Vol. , P.375; M.Ashley, *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 1957, P.389.

酒、吸着烟的士兵吆喝驱赶而吠叫的狗之外，连一个哭的人都没有。”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弓弦必须稍微松弛一下了，因为弦绷得太紧了。”

在对外关系方面，1654年，护国公政府在荷兰承认“航海条例”的基础上同荷兰订立了商约，同时又分别同瑞典、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商约。1655年11月，英国在法国支持下同西班牙发生了战争，英国舰队占领了西属加勒比海岛屿牙买加，使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E.S.de Beer (ed) ,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 1955 , Vol. , P.224.

John Buchan , Oliver Cromwell , 1934 , P.443.

第五节 研究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史学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历来就是历史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和进行论战的“著名战场”。早在 17 世纪，托马斯·梅、克拉兰敦、霍布斯、哈林顿等学者对这次事件已是人各异词，分歧很大。辉格派和托利派形成之后，两派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都常把 17 世纪革命当作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工具。克拉兰敦的巨著《英国的叛乱与内战史》就是为此目的而在 1702 年—1704 年出版的。18 世纪中叶以后，休谟等托利派的观点在史学领域占了支配地位。按照该派的观点，17 世纪的叛乱所以发生，是由于议会中一些人不顾民族利益，争权夺利，破坏了君主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但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由哈兰姆和麦考莱所阐述的辉格派史学，在社会上广为宣扬，很快就取代了托利派而在思想界处于优势。麦考莱把 17 世纪的革命看成是以一些下院议员为核心的爱好自由的人们为了争取思想自由和信仰原则而进行的反对专制暴政的斗争。这一观点，以后又在伽狄纳、费尔斯、屈勒味林等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伽狄纳，他的 18 卷巨著集中论述了 1603 年—1656 年的英国史，卷帙浩繁，资料翔实，直至今日，仍是关于 17 世纪英国革命史的最为完备的著作，影响甚为巨大。“清教革命”这一名词就是首先由他提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世界各地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辉格派单纯用思想和宗教信仰因素来解释革命历史的看法，不再令人信服。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英国革命前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从这些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革命是由社会经济中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而引起的。这时，有些学者对辉格派史学提出了批判。越来越多的历史家抛弃了辉格派的观点，另辟蹊径，去寻找关于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新解释。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发生了以陶尼、斯通等为一方，以屈沃—罗伯尔等为另一方，同时有许多学者参加的关于“乡绅问题”的论战。论战延续

J.H.Hexter (ed),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1979, P.163.

R.C.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7, Chap.2.

E.H.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the Civil Wars in England*, 1958, Vol. , P. .

D.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1983, Vol. , P.155 and Passim.

T.B.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861, Vol. , P.128 and passim.

伽狄纳认为：“清教不仅构成反对国王查理的力量，而且它也是英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力量。”他把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称为“清教革命”。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895, Vol. , P.9.

R.H.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A.P.Newton, *Colonizing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Puritans*, 1913; J.U.Nef, *The Rise of British Coal Industry*, 1932, Vol. .

R.G.Usher,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S.R.Gardiner*, 1913. Cf. J.H.Hexter, *Storm over the Gentry*, in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1979, PP.117—163.

L.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8; C.Hill, *Revolu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War*,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58. 王觉非：《当代英美历史学家关于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新思潮》，载《欧洲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0—71 页。

了几十年，仍未取得公认的结论。在此期间，海克斯特和韦吉乌德等历史学家，又对论战的双方同时进行了批驳。他们坚持认为，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英国的政治斗争的实质，仍然是下院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法律、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这样，他们使辉格派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

辉格派的观点虽然再度复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声势。许多学者不愿再遵循传统的轨道，而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其中有些学者用纳米尔学派的集合传记归纳法，去研究长期议会的议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长期议会中500多个议员，不论是拥护国王的王党分子，还是反对国王的“反对派”，其阶级成份和政治成份，基本上没有区别。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地方史的研究，他们在研究大量地方档案后认为：革命前英国的政治并不是以国王政府为一方和以议会反对派为另一方的斗争，而是地方分权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此外，以艾尔顿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宪政史的学者，在仔细研究革命前的议会时发现，议会和国王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一致而不是冲突。

上述这些学者的结论，不仅与辉格派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看法。

从70年代中叶以来，又有一批学者纷纷发表有关17世纪初英国史的论著，进一步否定了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传统史学观点。他们声势煊赫，在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人们把这批历史家称之为“修正派”，有的学者已开始著文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驳。一场新的论战又在兴起，它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修正派”虽然没有共同信奉的指导理论，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思想倾向。这首先表现在他们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反对把17世纪的英国革命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其次，他们否认17世纪英国革命具有原则性斗争的意义，认为议会与国王之间并无原则性的冲突，他们所发生的矛盾，只是为了暂时的利益。在内战爆发之前的数十年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不但没有原则性的斗争，而且当时政治领域的主要特征不是冲突，而是和谐一致。——“修正派”将以前历史家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基本论点几乎全否定了。他们宣称要彻底抛弃“传统”史学所散布的“偏见”，对原始资料重新进行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回到画图板

J.H.Hexter, *Storm over the Gentry*, in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C.V.Wedg-wood,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History Today*, Oct, 1955; *The King's Peace*, 1955; *The King's War*, 1958. P.Zagorin, *The Court and the Countr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1969.

D.Brundon and D.H.Pennington, *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 1954. PP.19—20.

A.Everitt, *The Community of Rent and the Great Rebellion*, 1966, P, 13.

G.R.Elton, *A High Road to Civil War?* in Charles Career (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1966, PP.325—347.

Conrad Russ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1973.

参见王觉非：《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修正派》，载《欧洲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39页。

Mark A.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England*, 1986, P. ; G.B.Elton, op.cit.P.327.

前去”，另绘新图，而不要在原来已被歪曲的画面上修修补补。

“修正派”的言论在西方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不少学者著文加以批驳。

围绕着“修正派”的著作所开展的论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修正派”观点的形成有其客观因素。从认识论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呈现一种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再由理性回返到感性，然后又在新的高度上再上升为理性……如此螺旋形发展的过程。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在19世纪初以前，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它和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一样，都是一种偶然的事件，好像自然界突然爆发的地震或飓风，令人无法理解。但经过学者们长期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特别是人们有了新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后，就从中发现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现在“修正派”回过头来，利用新的资料，号召“回到画图板前”去研究原始资料，另绘新图。我们相信，等到他们经过若干时期的研究之后，他们又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出关于英国革命的规律性的认识。“修正派”观点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和当前世界形势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许多历史家抛弃了原来在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辉格派的观点，而去采用社会经济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现在，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而资本主义各国却相对稳定。在此环境下，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观点等一概否定。但是，科学的理论总是会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经不起批判的是教条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Kevin Sharper (ed), *Faction and Parliament*, 1985, PP.1—42.

R.Cust and A.Hughes (ed), *Conflict in Early England*, 1989.

F.Guizot, *History of English Revolution*, (English edition), 1851, PP. - .

第三章 复辟时期（1660—1688年）

第一节 查理二世的初期统治

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克伦威尔去世后的形势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位护国公。理查性格懦弱，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垮了的狄克”。王党分子称他“小丑”，“乡下佬，土包子”。一些高级军官不服他的统治，他本人也不能把政权强有力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原有的各派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国家政治生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658年11月，理查召集了新的一届议会。议员中包括共和党人、中间派人士及一些军队里的军官，但缺少一个享有威信、支持政府的核心力量。理查原指望把文职人员作为依靠力量，但却遭到军官们的反对。而下院议员对军队也甚为敌视，认为如果军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于国家内，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因而要求每个军官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干预议会的正常进行。当1659年4月20日议会通过决议企图限制军队干预政治的权力时，以弗利伍德为首的一批军官，即所谓“瓦林福德寓所的贵人”，采取行动，强迫理查解散议会。

这时军队里的下级军官由于待遇太低，不满情绪日趋高涨，他们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并与共和派人士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在他们的要求之下，1659年5月7日再次召集议会。不料议会里的共和派文职议员仍然表现出敌视军队的情绪。到秋天，军队要求解散议会，并驱逐企图进入议会开会的议员。议会在高压下屈服。“所有这些都是未逮捕任何人，未流一滴血，也未在伦敦城区或郊区引起任何混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弗利伍德和兰伯特为首的军官掌握了实权。议会被解散后，以弗利伍德为首的一些军官组成了一个“安全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政府。“安全委员会”要求理查·克伦威尔和他的兄弟亨利·克伦威尔放弃世袭护国公的地位，但答应为他们安排住所并给予年金。理查和亨利不得已先后表示同意。理查退位，得以寿终。原来的护国公印玺被劈为两半，护国公制正式被废除。

君主制复辟

以弗利伍德为首的“安全委员会”建立后，伦敦城的资产阶级拒绝服从这些军官的统治，同时军官中也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时，率军驻扎在苏格兰的乔治·蒙克将军，听说伦敦局势混乱，就借口保卫议会，带领他的军队向伦敦进发。

Ivan Roots, *The Great Rebellion, 1642—1660*, P.238.

“瓦林福德寓所”是弗利伍德在伦敦的住宅。

G.F.Warner (ed), *The Nicholas Papers, 1920*, Vol. , P.148, P.194.

蒙克是个职业军人，年轻时参加过英国同荷兰的战争，英国内战期间曾站在国王查理一世一边，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同议会军作战，被议会军俘虏后投到议会阵营，以后先后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内战后率军驻扎苏格兰。蒙克平时沉默寡言，令人感到神秘莫测。当英格兰内部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时候，他对自己统率下的驻扎在苏格兰的军队严加控制，使之不受政局波动的影响。许多士兵只知服从蒙克的命令，而不清楚自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使命。不过有些士兵估计到，“他们的父辈曾将那个当父亲的（查理一世）驱逐出去，而他们现在将要把当儿子的（查理二世）请回来。”当蒙克得知议会被一部分军官强制解散后，宣布坚决支持议会，反对解散议会的行为。1659年秋，他率军驻扎在特威德河畔。英格兰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请他南下恢复秩序。他即于1660年1月1日率领部队越过苏格兰边界进入英格兰，向伦敦进发，并与驻扎在约克城的费尔法克斯的军队会合。与此同时，在约克，残余议会派代表邀请他进驻伦敦保卫议会，于是蒙克以保卫议会为名，势如破竹，直趋伦敦，沿途得到广泛支持。驻扎在爱尔兰的军队和顿斯地方的海军也和蒙克采取同一行动，虽然受命去阻挡蒙克的英格兰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指挥互不统一，而且军心涣散，毫无斗志。蒙克在未遇任何严重抵抗的情况下，于1660年2月3日进入伦敦，随即他将英格兰的军队分为几个互不统领的部分，并将之派遣到几个不同的地方，伦敦的卫戍部队也被撤换。

在蒙克到达伦敦之前，以弗利伍德为首的“安全委员会”由于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不得不在1659年底辞职，将政权交回议会。蒙克进入伦敦后，将以前被“普莱德清洗”驱逐出议会的那些还活着的议员召回到议会中来。这些议员以前大多数是长老派，被清洗出议会以后，政治上逐渐倾向保王派。他们回到议会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自1648年12月“普莱德清洗”以来所制订的所有法律条文无效。然而这届议会在经济残破、社会混乱的状况下，也无法维持国内的法纪和秩序，以致民怨沸腾，不得不在3月16日宣布自行解散。这样，自1640年11月开始的“长期议会”，在断断续续存在了约20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

这时，英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中已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维持巩固的统治，人们就把目光投向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上，甚至盼望查理·斯图亚特早日返国。当时人裴皮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每个人都举杯祝福国王的健康。以前，人们除了在私下这样做之外很少人敢于这样做。”1660年4月25日，在革命前选举法的基础上选出新的一届特别议会。议会决定政权应该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也就是要恢复君主制和上院，并决定派人到荷兰去同查理一世的儿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商谈在英国复辟的问题。在蒙克授意下，查理在荷兰的布列达发表宣言，宣布他复辟以后，在内战期间没收的王党分子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允许信仰自由；承认土地实际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实行大赦；除了直接与处死查理一世的事件有关的人之外，其余在过去20年中反对过君主政体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1660年5月26日，查理在多佛登陆，在29日他30岁生日的这一天回

G.F.Warner, op, cit.P.122.

G.F.Warner, op.cit.P.98.

R.C.Latham and W.Mathew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 1970, 6, March, 1660.

J.P.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66, PP.357—358.

到伦敦，登上了王位，称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

二、查理二世统治初期的政策

1660 年的特别议会

1660 年 5 月底查理二世在伦敦登上王位后，把他的统治正式定在从 1649 年 1 月 30 日开始，这是他的父亲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日子。他原指望能恢复革命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 1660 年 4 月英国特别议会在向他发出回国进行统治的邀请时，并未向他提出任何附加条件，甚至以前在内战时期几次向国王提出的和谈条件一项也未提及。因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十分混乱，除了无条件恢复君主制之外，已找不到任何别的办法来恢复英国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表面看来，要想恢复君主专制似乎并无太大困难。

1660 年时，英国本来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历史好像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恢复到原来的地位，英国又要回到革命前的状况了。人们可以从以前“20 年中所犯的 error 中醒悟过来，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了。”但实际上，1660 年复辟以后的君主制已不可能恢复革命前的君主专制。复辟是以“布列达宣言”为基础，并且以承认 1641 年—1642 年查理一世曾经承认过的法令为前提的。原来的法令中只有两项被废除，即 1642 年关于将主教从上院驱逐出去的法令和“三年法案”。因而 1660 年复辟的君主制和 1640 年前的专制君主制并不完全一样，而是在革命开始后，经过长期议会中以皮姆、汉普顿为首的议会派人士不断斗争后国王权力受到限制的君主制。

查理二世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专制制度，与下列因素不无关系：他本人能力平庸，生活腐化；平时挥霍无度，债台高筑，许多措施都因为财力不足而难以实施，因而虽想建立起类似欧洲大陆的国家，如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那样的专制君主制，但却无力达到此目的。但更重要的却是，经过长期革命之后，英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查理二世只能在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统治。因此，他即位初期所颁布的一系列法案，不得不承认革命时期所造成的一些既成事实：承认查理一世同意过的法令的有效性；确认对“监护人法庭”的废除；制定“赦免法案”，规定除革命时期直接与处死查理一世的“弑君罪”有关的 57 人之外，对其余“因敌对行为而造成的过失”加以赦免。同时，在数十年的反复斗争之后，议会的地位已经有很大提高，它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统治机构。现在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普遍认为，王权应该受到议会的约束；国王的意志不能代替法律；凡是重要的法律，必须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通过以后才能生效。君权神授的理论，现在只有少数人才相信。

同时，查理二世即位时，英国国内的客观现实，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

J.R.Jones (ed), *The Restored Monarchy, 1660—1688*, 1979, P.9.

J.P.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66, P, 361, PP.382—

对查理二世本人的评价，虽然历史学家仍有不同意见，但他生活腐化却是事实。他一生有过许多情妇，由这些情妇所生的私生子，能够确认的就有 17 人之多。

到 1664 年时，查理二世的欠债已高达 125 万镑。C.D.Chandaman, *English Public Revenue 1660—1688*, 1975, PP.203—209.

J.P.Kenyon, *op.cit*, PP.365—371.

使他在处理政治的和宗教信仰问题时，不得不兼及各集团的利益，以致许多重要问题都因意见分歧而得不到顺利解决。

在当时的形势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是政治和社会混乱下无可奈何的办法。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当权者和贵族地主阶级表面上目的相同，实际上却各怀鬼胎，同床异梦。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说：“1660年，一方面是有地产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是查理二世，他们都在同一时间游向同一救生艇。他们浑身透湿，惊魂未定，赶紧喘一口气，彼此都在庆幸死里逃生。然而，救生艇毕竟太小，这使他们的勉强建立的友谊不可能长久维持。”

在政治上，查理二世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枢密院，其成员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现任的高级官员，另一部分是长期以来一直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其中有些来自名门望族，有些有广大的地产。这样，查理二世就不得不把不同政治态度的人都任命为他的枢密会议的成员。其中既有王党分子，如海德（1661年被封为克拉兰敦伯爵）、奥蒙德公爵、爱德华·尼古拉斯公爵等，也有曾在克伦威尔政权中担任过职务，“反叛”过国王政府的人，如阿尔伯马尔公爵（即蒙克将军）、爱德华·蒙太古（即桑德维奇伯爵）、安东尼·库伯（萨夫茨伯里伯爵）。这些人有的自始至终是顽固的保王分子，有的曾与共和派一起反对过王党。后者对君主制并无坚定的信念，只把复辟看作是恢复国内已经瓦解的社会秩序的权宜之计。顽固的王党分子，对查理二世起用过去那些曾反叛过君主的人耿耿于怀。他们抱怨查理二世不是坚定地依靠他们，而是去“酬报他的敌人，以给他们一些甜头使之驯服，而对他的朋友却只给予原则上的安慰，以维系他们的忠心。”这些人之间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势所难免。在宗教问题上，各派的分歧也十分尖锐。在当时既有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徒，也有不奉国教的长老派、独立派以及天主教徒。宗教信仰问题在17世纪英国人的思想、生活以及国家的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查理二世刚登基时，主张英国国教与长老派宗教达成协议，为此，他在1660年10月25日在克拉兰敦位于伍赛斯特的寓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会后发布了一个宣言。宣言中说：“国家的和教会的和平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并提出一个使主教的权力受到长老会议约束的方案。同时查理二世还任命了一些非国教徒担任教会领导职务，但是这种对非国教徒实行宽容的试图并未成功。因为关于宗教问题的分歧意见太大，而且查理二世的政府也并非真心实意想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查理二世声称，他之所以主张实行宗教宽容，是因为他想使40年代以来由于宗教分歧而分裂的国民“重新团结起来”。实际上，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想运用国王的权力取悦非国教徒，使非国教徒对抵制宗教宽容政策的议会产生反感，从而在国王政府同议会的斗争中站在国王一边，使查理二世得以实现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的企图。所以他作出这种宽容的姿态无非想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后来他见有人反对，也就顺水推舟，不了了之。

在查理二世即位初期有两股潮流：一股是政治上以查理二世为首的统治者逐渐加强专制制度的倾向；另一股是宗教上查理二世以及以后的詹姆斯二

John Child, 1688, History, 1988, P.402.

Memoirs of Thomas Earl of Ailesbury, Vol. , 1890, PP.6—7.

R.W.Harris, Clarend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83, P.298.

J.R.Jones, Charles , Royal Politician, 1987, P.184.

世日趋强烈地恢复天主教的企图。这两种倾向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朝着恢复革命前君主专制的方向逆转。在复辟的王党分子看来，革命以前，特别是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的英国，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内政治稳定，秩序井然。就国外来说，当时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是他们向往的榜样。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专断独行，不受议会的牵制，使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些到过法国的英国政界人士，对法国的专制制度颇为羡慕。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法国专制制度的实质，同时，反动王党分子竭力企图建立专制君主制，实行倒行逆施的政策，使他们丧失人心，最后导致斯图亚特王朝的倒台。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时，历史的钟摆才又重新摆了回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在这个新重心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反动之风

复辟后，社会风气顿时改变。以前在革命时期，清教盛行。清教规定，禁止赌博、跳舞和戏剧演出。现在，这些活动又恢复了。同时，对过去的“弑君犯”进行惩处。这时，被判定与处死查理一世直接有关的57人中，大约有20人已经去世，另有10余人已逃往国外，剩下来还有20余人。查理二世将其中一些人赦免死罪，而把9人定为“弑君犯”，判处死刑。但极端王党分子对此表示不满，觉得过于宽大。因而又把已死去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布拉德肖等人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棺木中拖出来，装在囚笼里拉到泰伯恩的绞刑架，在绞刑架上吊了24小时，然后将头颅砍下来，挑在高竿之上。剩下的肢体和骸骨被扔到垃圾堆里。皮姆和其他20余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出来埋在一个土坑里。过去新模范军的将军兰伯特和亨利·文也被判犯罪。复辟前夕，兰伯特企图抢夺国家领导权，并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一世的儿子约克公爵，现在作了阶下囚乞求赦免，经过约克公爵为他说情，得免死罪。

亨利·文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从他父亲那里将枢密会议的记录偷出来交给议会领袖皮姆。在该记录上，记载着斯特拉福伯爵建议将爱尔兰军队调到英国来镇压革命。这是斯特拉福的重要罪证之一，以后致使斯特拉福被判死刑。亨利·文竭力为自己辩解，声称法庭无权对他进行审判。不过，当年6月，他还是被处死。

骑士议会的召开

1660年12月29日，“特别议会”解散。1661年5月8日，召开了新的一届议会。这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数都是王党分子，史称“骑士议会”，又称“领取退休金者议会”，因为议员中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退伍军人。

John Miller, *The Potential for Absolutism in Later Stuart*, History, Vol 69, 1984, P.198.复辟时期，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执行宗法政策，使路易十四对英国的政局发生很大影响。英国有很多人认为，法国之所以如此强大，主要是法国路易十四享有专制独裁的大权，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完全正确的。John Miller, PP.188—192.

Ivan Roots, *The Great Rebellion, 1642—1660*, 1979, PP.261—263.

J.Willcock, *Life of Sir Henry Vane the Younger*, 1913, P.328.

不过，在 500 多个议员中，仍有大约 100 多个是过去“长期议会”的议员，他们曾经反对过王党。在“骑士议会”期间，虽然通过不少具有强烈保王情绪的议案，但有些议员口头上拥护国王，实际上却不愿受国王的约束，议会并未完全成为国王的应声虫。在政治上，英国仍然未成为专制君主制的国家。

“骑士议会”反对国王的斗争是逐步展开的。最初它对国王滥用权力、独断专行的行为还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且还通过条例，规定凡是敢于宣称议会权力高于国王权力的人都要加以逮捕。1662 年又通过了一个“民兵条例”，将民兵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国王。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不同，后者的军事组织和国防力量都是由常备军组成。但英国由于其历史传统，一般人都把常备军和专制暴政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宁愿要一支业余的民兵，由地方上的乡绅加以领导，平时用于维持国内治安，战时抵御外敌入侵。1642 年所制订的“民兵条例”规定民兵由议会统辖，到复辟前夕，国内局势混乱，议会已失去了对民兵的实际统辖权。1660 年 2 月，民兵的领导权已从“没有爵位和高级身份的人”的手中转到了“由贵族和有权势的乡绅们所组成的政府”手中。1664 年又通过新的“三年法案”，把 1641 年时所制定的“三年法案”的民主内容完全阉割，以致以后查理二世可以任意解散或召集议会，甚至否决议会的立法或停止议会所制订的法律。

克拉兰敦法典

虽然“骑士议会”中有些议员对非国教徒表示同情，但大多数议员却决心要将非国教徒从政治和宗教领域中完全排挤出去。他们为此制订了一系列法令，即《克拉兰敦法典》，以打击那些非国教徒。实际上，克拉兰敦并不是这些法典的制订者，他甚至对法典中的某些条款表示过异议，企图加以阻止，不过未成功。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法典，不过是因为他是当时政府中的主要大臣。

《克拉兰敦法典》包括下列几个法令。

“市镇社团法”。该法令规定，所有担任市政职务的人，都要宣誓不违抗当局；所有的宗教管理都必须按照英国国教去进行；圣餐、洗礼等圣事活动，也必须符合英国国教的规定；此外，必须宣誓拒绝以前长老派的“神圣誓约”。这一法案的目的是，只有忠于国王的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市政职务，而当时下院议员的选举必须获市政当局通过。所以这一法案如果实行，国王即可由此而控制下议院议员选举。

“划一法案”（1662 年）。根据这个法案，所有的教士和高等学院的教师、中小学的校长，都必须遵守英国国教的公共祈祷书中对宗教事务的规

J.Child, *The Army of Charles* , 1976, P.220.不过，民兵的实际指挥权由各地的地方官掌握。以后，各地的豪绅成了当地民兵的实际统治者。

J.R.Western, *The English Milit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1965, Chap. — .

Edward Hyde Clarendon,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 1958, Vol. , P.176.

J.P.Kenyon (ed) *op.cit.* PP.382—383.

A.Browning (ed) ,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 Vol. , PP.375—384 ; J.P.Kenyon , *op.cit.* PP.376—386.

J.P.Kenyon , *op.cit.* PP.376—378. PP.378—382 , PP.383—386.

定。

“集会法”（1664年）¹。该法案禁止非国教徒举行5人以上的宗教集会，违者罚款。

“五英里法案”（1665年）。要求所有未在“划一法案”上签名者必须宣誓不反抗英国国教，也不试图改变英国国教。凡拒绝这样做的人，不准进入距离有选举权选区、市镇5英里的范围内。

《克拉兰敦法典》以一系列法律条例，将英国国教确立为英国官方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使其他一切非国教教派都处于受排挤、迫害的地位。这些教派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不得不聚集力量起而抗争。实际上，这就使英国人民在宗教信仰上产生了分裂。英国国教本来想以此来实现自己对宗教事务的垄断，但反而使自己处于与几个派别并列的、互相敌对的地位。其领导人也丧失了作为全国统一教会领袖的尊严，同时也丧失了受到多方支持的机会。

从此，在英国政界和宗教界出现了一条越来越明显的界限。在界限的这一边，是所谓的“宫廷派”，包括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随从。1663年左右，国王的近臣国务秘书本奈特作了许多工作，力图在下院中形成一个拥护国王的“宫廷派”，但并未完全如愿以偿。在界线的另一边是受到排挤的所谓的“乡村派”。以后，这个界限逐渐发展成了一道鸿沟，而“托利党”和“辉格党”也就渐渐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而非国教徒此后也不断斗争，以争取信仰自由，这个目标到1688年才得以实现。到19世纪中叶，英国国教的独尊地位逐步丧失。

不奉国教的新教徒在受排挤打击期间，在政治领域更处于无权地位，于是他们就把精力和时间用到生产、科技方面。在这些领域里非国教徒取得了许多成就。

A.Browning, op.cit.Vol. , PP.375—384.

T.H.Lister,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Edward First Earl of Clarendon 1838, Vol. , P.231.不过，这时所谓“宫廷党”和“乡村党”尚未定型只能说这一分裂已埋下了种子。R.W.Harris, Clarend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83, P.347.

三、第二次英荷战争和克拉兰敦的倒台

英国和荷兰的矛盾

在“骑士议会”中，议员们对国王的挥霍无度和对财政补助不断增长的要求日益不满。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后，议员们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复辟时期，英国已不再像克伦威尔时代那样受到欧洲的重视，而是被欧洲大陆诸国看成无足轻重的岛国。在欧洲大陆的人们看来，英国内部纷争，社会混乱，无法与欧洲相对稳定的君主制国家抗衡。

当时，除了荷兰人之外，欧洲很少人懂得英语，了解英国历史和文化的的人也很少，而英国人自己还抱着一种畏惧外国人的心理。在17世纪，荷兰是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主要敌手，当查理二世同葡萄牙的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结婚时，作为凯瑟琳的嫁妆，除了80万镑现款外，还有非洲摩洛哥北部港口丹吉尔和印度的孟买。但孟买的葡萄牙总督却拒绝将孟买交给英国人，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却为荷兰人聚集了大量财货，并将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向荷兰。同时，荷兰人还在北美的新英格兰扩张势力，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了殖民地。英国人眼看在海外贸易的斗争中落到了荷兰人的后面，即集中力量建造新的船舰，添置大炮，准备与荷兰人一决雌雄。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把克伦威尔时代在欧洲大陆占领的敦刻尔克以40万镑卖给了法国。出售敦刻尔克虽然得到国王和约克公爵的同意和支持，但主要是克拉兰敦的主张。克拉兰敦此举主要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查理二世政府每年需支付10万镑给驻守在敦刻尔克的卫戍部队，查理二世的政府无力担负这笔沉重开支。虽然克拉兰敦为此而受到国人的谴责和诽谤，但这是英国集中力量与海上主要劲敌荷兰作斗争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第二次英荷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发生于1652年）在1664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不过到1665年2月22日才正式宣战。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和荷兰海外商业利益的冲突。1651年英国制订的“航海条例”，其主要矛头就是对准荷兰。到1660年英国议会制订新的“航海条例”，对荷兰更加不利。1663年，英国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商品产地法案”，企图将荷兰的商业完全排挤出英国殖民地。根据这个法案，当从欧洲把货物输往英国的各殖民地时，必须从英国本土运输出去，或者用英国的船只运送。

1664年3月，查理二世宣布将北美洲哈德逊河口的新尼德兰（原属于荷兰）的土地赠予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这种擅自将别国属地宣布为己有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和战争无异的行为。对这种行为，宫廷内部意见分歧。包括克拉兰敦在内的一些大臣认为，战争可能会使政府已经很困难的财政问题更为严重。他们的这种态度遭到主战分子如约克公爵、亨利·班奈特、托马斯·克利福德等人的驳斥。到1664年，查理二世向伦敦城区借到20万镑款项，就更加积极准备向荷兰开战。查理二世认为，依靠英国海军袭击荷兰商船，可

J.L.Price, *Restoration England and Europe*, in *The Restored in Monarchy*, 1660—1688, 1979. PP.118—135.

有人诬指克拉兰敦接受了法国人的贿赂，克氏在伦敦新建的住宅也被人称之为“敦刻尔克宅”。也有人认为这幢房舍的建筑费用来源于荷兰人的贿赂，将之称为“荷兰宅”。R.W.Harris, *Clarend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83, P.374.

以获取很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在 1652 年—1654 年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英国就曾因为打败荷兰使英国的商船船队的吨数增加了一倍。

英荷战争的开始

英荷海军于 1664 年在非洲西海岸开始交战，后战争逐渐转移到英国领海。1664 年 11 月召开的新的一届议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争辩，最后通过给查理二世 500 多万镑的费用，这足够查理二世用来同荷兰作战。然而战争开始后，英国海军却未得到预期的胜利。1665 年 6 月，在洛斯托夫特，双方的主力舰队发生了激战，英荷双方都有数名将军阵亡。荷兰舰队司令的旗舰被英国大炮击中，舰上弹药库起火爆炸，荷兰遭到失败。但荷兰的德莱特将军从西印度群岛回到荷兰后，重新组织舰队反击英国的进攻。1666 年 6 月，双方在北福尔兰发生大战，英军遭到重创，蒙克和鲁伯特指挥的两支舰队退回到泰晤士河。虽然后来英国舰队重整旗鼓，再度击败荷兰人，但荷兰人仍然顽强战斗，而英国此时在外交上反而陷入孤立的境地，法国和丹麦加入到荷兰的一边反对英国。同时英国政府的财政困难也更为加剧。1667 年，荷兰舰队溯麦德韦河而上，冲毁查塔姆港口的水栅，在伦敦可以听到荷兰舰队发出的炮声。查理二世即向荷兰及其盟国求和，荷兰人也不堪战争的沉重负担，1667 年 7 月 21 日，英国与荷兰、法国、丹麦签订了布列达条约，结束了第二次英荷战争。根据条约，英国和荷兰都承认当时两国所占有土地的现状，英国继续保有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荷兰继续占据苏里南。

1665 年春天，伦敦发生了一次大瘟疫，这是 1348 年发生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接着在 1666 年 9 月伦敦又发生了一次大火灾。大火首先是从伦敦桥附近发生的。这里到处都是木板房，街道狭窄，熊熊烈火一连烧了几天。查理二世下令拆毁一些居民的房屋，以隔开火势，防止大火蔓延。这次火灾造成重大损失，死亡人数达 7 万人之多，大多为贫苦的人民。大火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在 9 月 2 日至 6 日连续几天的熊熊大火中，伦敦城区大部化为灰烬，有 13,200 所房屋被毁，89 座教堂荡然无存，被焚毁的货物约值 350 万镑。

当时人们对国内财政困难、经济萧条已非常不满，再加上外交上的挫折以及大瘟疫和大火灾，所以愤懑之情日益高涨，很多人把忿怒发泄到当时在政治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克拉兰敦身上。查理二世也不信任克拉兰敦，1667 年 8 月 30 日，查理二世要求克拉兰敦辞职。10 月，议会再度开会，有人提出对克拉兰敦进行弹劾。克拉兰敦知道 20 多年前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的下场，所以赶忙逃亡到法国。在流亡国外时，他写了著名的《英国的叛乱与内战史》一书。

C.D.Chandaman, *English Public Revenue, 1660—1688*, 1975, P.223.

D.Ogg,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1956, P.305.

这次大火之后，伦敦在废墟上重建，修筑了宽阔的街道，许多房屋都改用石头或砖块建筑。伦敦较繁华的西区，以更快的速度修建。著名的圣保罗教堂由著名的建筑师克利斯朵夫·瑞恩重新设计改建，成为存留至今的著名建筑之一。

R.Latham and W.Mathews (ed),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2, September, 1666.

克拉兰敦倒台后，行政权力暂时由阿林顿掌管。议会认为，应该扩大政府的代表性，所以从 1668 年起权力又转到了由几个人组成的所谓“卡巴尔”的枢密会议的手中，“卡巴尔”是未来内阁的胚胎。不过，这时“卡巴尔”并不固定，在“卡巴尔”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彼此之间常常互相敌对，政策的实际制订者仍是国王本人。查理二世的周围，除“卡巴尔”五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

所谓“卡巴尔（Cabal）”是由枢密会议中 5 名主要成员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拼组而成的。他们是 Clifford , Arlington , Buckingham , Ashley , Landerdale。另外，在英语中 cabal 有阴谋小集团之意。

D.Ogg ,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 1955 , P.329.

第二节 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

一、围绕天主教问题的斗争

反天主教情绪的发展

自 16 世纪中叶英国宗教改革以来，英国社会就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情绪，到 17 世纪初，这种情绪更趋强烈，并在政治领域反映了出来。虽然在革命时期，关于宗教宽容的思想受到普遍重视，不过人们对天主教的敌视情绪并未因而减弱。这是因为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是和专制君主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是邪恶的。而且在英国人看来，法国、西班牙等与英国争夺海上贸易霸权的国家，都信奉天主教。16 世纪，“血腥的玛丽”站在天主教的立场残酷迫害新教徒；1640 年，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又发动过叛乱。在国外，1572 年法国的巴特罗缪大屠杀，后来路易十四时代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使许多胡格诺教徒逃亡到英国。1685 年 10 月，法国废除了南特敕令，逃到英国来的胡格诺教徒为数更多。这些逃亡的胡格诺教徒在英国散布了关于天主教迫害新教徒的种种恐怖情景，使英国人民仇视天主教的情绪更为强烈。荷兰的奥兰治的威廉在 1672 年掌握政权后，为了破坏查理二世联合法国的政策，在英国广泛制造舆论，宣称查理二世联法的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加剧了英国人对天主教的恐惧和仇恨。

天主教问题与政治斗争的关系

荷兰人在英国宣传反对查理二世联法和信奉天主教的政策，使英国人反天主教的斗争更加强烈，而且带上了政治色彩，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以信仰自由和维持民族团结为借口，主张实行宗教宽容，给天主教以自由，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政治目的。而“乡村党”之所以主张实行宗教宽容，则主要是为了给新教徒信教自由，以此来拉他们的选票。

在当时全国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情绪下，英国大多数人都把天主教和专制君主以及法国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东西是三位一体，都是英国人民可恨的敌人。因此，查理二世所推行的企图恢复天主教并对外与法国联合的政策，遭到议会中多数议员及广大政界人士的反对。1667 年同荷兰的战争结束后，英国曾同荷兰、瑞典缔结了三国同盟，共同反对法国的对外扩张。由于英、荷及瑞典都是信奉新教的国家，所以三国同盟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法国的路易十四利用英国与荷兰存在着争夺海外商业贸易霸权的矛盾，挑拨英荷之间的关系。他秘密与查理二世谈判。由于查理二世的妹妹亨利·艾塔是路易十四的弟媳，所以他与查理二世的联系比较方便。当路易十四提出希望英国与法国联合，并希望查理二世皈依天主教时，查理二世就直言不讳地说，英国议会已向他表示，如果他执行反对法国的政策，议会就给他以足

Roloin Clifton, Fear of Popery, in Conral Russell (e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1973.

A.A.Seaton, The Theory of Toleration under the Later Stuarts, 1911.

够的补助金供他使用；现在如果他要转而同法国友好，那么首先在财政上要摆脱对议会的依赖。他要求路易十四提供给他以相当数额的补助金，以便他能够摆脱议会的阻挠而独立行动。路易十四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在 1670 年订立多佛条约时，查理二世就同路易十四在其中订立了一项密约。密约中说：“大不列颠国王认识到天主教的信仰是正确的，准备在对他的王国无害的时候加入天主教。法国国王陛下支持这一行动，愿给大不列颠国王以 200 万利弗尔，并向他提供 6000 步兵。”这一密约除少数大臣如阿林顿和克利福德之外，别人一概不知。

1672 年春，英国站在法国一边同荷兰作战，但议会与伦敦城区的资产阶级都认为法国是比荷兰更可怕的敌人。荷兰政府也秘密派人到英国向议员游说，说英国同法国联盟可能会危及新教的地位，在社会上也散布舆论，制造反法气氛。在这种环境下，议会拒绝通过给查理二世以对荷作战的补助金。“卡巴尔”政府不得不在 1674 年 2 月与荷兰讲和。

政治和宗教斗争的基本形势

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局势作一鸟瞰，就可以看出，处于政治斗争核心地位的中坚力量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最为强大。处在这股力量左侧的是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他们在政治上强调议会应享有较大的权利。在中坚力量右侧的是以国王为首的宫廷派。他们力图加强君主专制，恢复天主教，尽管他们人数较少，然而他们掌握着最高政权。在这三股基本政治力量斗争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国教徒为主的中坚力量日益感到国王宫廷对他们的威胁，不得不与左侧的新教徒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宫廷王党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是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和立宪君主制的建立。

约克公爵詹姆斯至迟到 1669 年时已秘密皈依了天主教。至 1673 年复活节时，詹姆斯已不按照英国国教的仪式进行宗教仪式，正式暴露了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根据当时的宣誓法案，当年 6 月，詹姆斯不得不辞去了海军中的职务。

詹姆斯的妻子在 1671 年去世，1673 年 9 月詹姆斯与信奉天主教的莫德纳的玛丽结婚。这时，查理二世的王后已不可能生育。本来查理二世之后由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即位为王，一般英国人已难以容忍，如果詹姆斯之后又由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儿子继位，这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更是不堪想像的事。就这样，反天主教运动和政治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反对国王恢复天主教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英国国教徒和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们逐渐团结一致。他们公开反对查理二世同法国联盟的政策，反对约克公爵詹姆斯同天主教徒结婚。1673 年，议会制订了一个宣誓条例，规定每一个获得政府官职的人必须宣誓忠实于英国国教，从而使约克公爵、克利福德等不得不辞职。1674 年

A.Browning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966, Vol. , PP.863—867.

K.H.D.Haley, William of Orange and the English Opposition, 1672—1674, 1953, P.139.

J.P.Kenyon, op.cit, P.402.此法案到 1828 年才正式废除。1689 年通过了一个法令，赦免了那些在任职期间未皈依国教的官员，所以这个宣誓条例，并未长久严格执行。另外，所谓不奉国教的官员，实际上大都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个条例虽然是针对天主教的，但实际上对其他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也发

初，议会又制订了一些法案，其中包括必须对国王的子女进行新教教育等，目的都在于限制国王的天主教倾向。国王周围的一些大臣，如劳德戴尔和伯金汉等也被指责为天主教徒而被从枢密会议排挤出去。另一大臣萨夫茨伯里曾劝说查理二世同原来的王后离婚，另娶新教徒的妻子，不但遭到查理二世的拒绝，反而将萨夫茨伯里解职。萨夫茨伯里随即投身于将约克公爵詹姆斯从王位继承人的地位“排斥”出去的斗争。他后来成了反对宫廷的主要领导人。

二、丹比执政时期的政策

丹比执政

詹姆斯的天主教徒身份暴露后，他拒绝放弃天主教信仰，不肯按“宣誓条例”的规定进行宣誓，并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其他几个大臣的职位也发生了变动。萨夫茨伯里赞成“宣誓条例”，转到了反对政府的立场上，成了反对派的领袖。白金汉也加入了反政府的行列，阿林顿由于不得人心而被免职，财政大臣克利福德是天主教徒，拒绝按照“宣誓条例”的规定进行宣誓，被迫辞职，不久后去世（可能是自杀）。财政大臣的职务就由托马斯·奥斯本继任。此人原为约克郡的一个地主，他把议会中反宫廷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674年6月，他被封为丹比伯爵。丹比担任财政大臣后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是厉行节约，稳定查理二世的财政，另一方面在维持英国国教会的基础上，竭力促使查理二世同议会关系的缓和。在对外政策上，设法使国王不依赖法国。在丹比的努力下，国王的财政状况比以前有了改善，但丹比企图使国王同议会关系缓和的努力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要使议会同国王保持一致，国王必须尊奉英国国教，并执行反对不奉国教尤其是反对天主教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国王必须放弃亲法政策。然而，查理二世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竭尽所能暗中推行天主教，并坚持要他的兄弟约克公爵（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在将来继承王位。同时，由于他同法国订立的秘密条款中答应皈依天主教，并在英国推行天主教，以换取路易十四提供的补助金，所以更不可能改变原来的立场。这样就使他不可能与议会消除隔阂，互相结合，丹比的努力终于落空。

丹比的财政政策

在整顿财政问题上，丹比本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因为他本人曾在财政部工作，富有理财经验，而且自17世纪60年代末起，英国进入了一个商业繁荣时期。这时英国的几项主要税收，包括炉灶税和关税都有了改进。特别是关税的增长，使国王受益匪浅，因为1671年9月查理二世取得了直接控制关税的权力。然而，即使有这些有利条件，到17世纪70年代末丹比离职时，他除了遗留下75万镑债务外，并未完成预期的整顿财政的任务。其原因主要是查理二世挥霍无度，宫廷的收入固然在增长，然而其开支增长更快。

如果国王能在财政上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他就可能完全摆脱对议会的依赖，从而加强国王专制独行的权力。现在由于国王在财政上仍不得不依赖议会，这就使国王企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必然受到重大挫折。

丹比执政时期国王同议会的关系

由于查理二世坚持要使他的信奉天主教的兄弟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坚持同法国联盟的政策，因而受到议会及议员的反对。为了缓

和查理二世同议会的关系，克拉兰敦和克利福德当政时曾多次说服议会支持国王，但都未收到显著效果。丹比接替克利福德当政后，一再劝说查理二世放弃给天主教以信教自由的政策与英国国教相协调，严格执行“市镇社团法”和“五英里法”，以惩处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同时重用英国国教徒。此外，他还在议员间进行联络，说服议员支持国王，并为此写信给一些有势力的议员。他还通过他的助手韦斯曼对一些议员进行劝说、贿赂，并对一些散布对国王和宫廷不满言论的人进行迫害。1675年，他提议，凡担任官职和当选议员的人都必须首先宣布，一切抗拒国王的行为都是有罪的。他企图把中央及地方各项政权机构都掌握在他们这一派的手中。在议员补缺选举时，他耍弄手腕，操纵选举，安插自己的党羽，同时将比较激进的清教徒完全排除在政权之外，对当时成为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工具的咖啡馆进行限制和检查，以防止反政府的言论和思想的传播。但所有这些努力，非但未能改变议员的反对立场，反而引起广泛不满，而刚去职的前大臣萨夫茨伯里和白金汉（现在是上院议员）就竭力反对丹比的措施。萨夫茨伯里把丹比的行为说成是“只图提高国王和教会的权力，却抛弃了大宪章和人民的自由”。

在1675年召开的两届议会中，丹比企图严格推行英国国教的计划，未获得议会的支持，因为议会中多数人对国王的亲法政策和天主教倾向的忧虑始终未能消除。事实上，查理二世在1675年8月和1676年2月又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订立了两个秘密条约，进一步加强同法国的联盟。丹比企图说服查理二世放弃亲法政策，转而同荷兰和好的努力终于失败，从而使他在国内的一些措施也不能奏效，他原来企图组织一批人拥护国王的计划也化为泡影。

玛丽同奥兰治的威廉的婚姻

在查理二世同议会的关系甚为紧张而丹比虽想尽方法也无法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的时候，1675年，丹比建议让詹姆斯同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玛丽与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结婚，以平息议会的怨气。如果玛丽能同奥兰治的威廉结婚，那就表明英国有与荷兰改善关系从而疏远法国的可能。如果查理二世能够同新教国家联盟，那么在国内政策上也可能改变他一直倾向天主教的状况。当时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查理二世是否会同意这桩婚事。尽管玛丽本人对这件婚事颇不满意，不愿嫁给一个小国君主，但出人意料的是查理二世竟然同意了。查理二世为何一反常态愿意与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联姻，有很多人感到费解。看来，查理二世可能想通过婚姻来稍微缓和一下议会对他的不满，同时这也可能是他为了改变同路易十四打交道时处处仰人鼻息的状况，他企图以这一举动来增加自己同法国国王谈判的筹码。不过，事实证明，查理二世这些想法都落空了，路易十四对他的态度仍未改变。在国内，

这些信件有的保存至今。A.Browning, Thomas Osborne, Earl of Danby, 1951, Vol. , PP.150—151. K.H.D.Haley, The 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 1968, P.374.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此时丹比已组成了一个“宫廷派”，而以萨夫茨伯里为首的一批人则组成了与之相对立的“乡村派”。(A.Browning, Thomas Osborne. Vol. , P.173; D.Ogg,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 1956, P.535.)实际上，在1675年丹比的“宫廷派”尚未形成，而萨夫茨伯里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则是到1680年初“排斥危机”发生之时。

议会对他的不满也未减少。1677年，有一个名叫安德鲁·马维尔的人写了一本名为《论天主教和专制政府的势力增长》的书。该书一开头就写道：“几年来，有一种阴谋一直在进行着，这就是要把英国的合法政府变为一种专制暴政，并将英国现存的新教变成彻头彻尾的天主教。”这些话表达了当时许多英国人的顾虑。

玛丽同奥兰治的威廉结婚，使他们能够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入主英国，在历史上成了一件大事。不过在刚结婚的时候，不论是查理二世、约克公爵或其他人，都未料想到这一点，因而未加以重视。

三、“天主教阴谋”

罗织谋杀案

1678年秋，一个名叫泰特斯·奥茨和一个名叫艾斯列·佟吉的人向政府报告，一些天主教耶稣会士1678年4月24日在“白马旅店”中拟订了一个暗杀国王的计划，并说，如果暗杀不成，就叫王后的医生乔治·韦斯曼将国王毒死。虽然这两人的报告中把这项“阴谋”讲得非常具体，然而仍有人认为两人的报告中有些细节与事实不符。当枢密会议受命对之进行调查的时候，查理二世也曾表示，上述两个人是“骗子”，他们的报告不可信以为真。不过，从1678年初以来，英国到处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浓烈气氛，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徒什么邪恶的行径都干得出来，所以很少有人冷静地想一想上述两人的报告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事实。9月28日，在枢密会议听取奥茨和佟吉的揭发时，奥茨指出詹姆斯的忏悔牧师托马斯·伯丁费尔德曾收到过具有“罪恶内容”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一名耶稣会士写给他的。当枢密会议的成员将有关信件交给奥茨指证时，虽然只出示信件的一两行，奥茨立刻就能指出这是某人所书写的。当时枢密会议的人员也未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奥茨和佟吉会如此轻易地辨认出信件的作者？他们更未怀疑这些信件可能是上述两人故意伪造出来的。相反，枢密会议对两人的表现深信不疑。到10月21日议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经过10天的讨论，议会中多数人表示相信这个阴谋确有其事，并推论阴谋的策划者是企图杀死国王，并进一步颠覆英国的新教教会。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公开怀疑这个报告的真实性的了。在奥茨指控的人中，有一人是詹姆斯妻子以前的秘书爱德华·柯尔曼。他从1673年起曾多次和耶稣会士及法国人通信，信中谈到如何在英国推广天主教的问题。柯尔曼因此被捕，被捕前他匆忙将大部分信件烧掉，但仍有一些信件被缴获。这些信件提到了如何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及天主教徒对查理二世的失望等，这使人们更加相信关于“天主教阴谋”的说法。1678年10月12日，最初取得奥茨指控书并对柯尔曼进行审讯的法官戈弗雷爵士突然失踪。5天以后，人们在格林贝里山（现名普里姆罗斯山），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吊死，尸体上有被他自己的剑刺破的伤口。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天主教徒刺杀的，目的是免得使更多的天主教徒的阴谋被揭发出来。为此，当局进行了侦察，并将3个嫌疑的“凶手”加以逮捕，并处以绞刑。以后研究人员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也没有查出戈弗雷爵士的真正死因。

“天主教阴谋”案件的影响

从1678年下半年到1679年，英国各地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谣传说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军队即将攻打英国，有的谣传英国的天主教徒已在秘密地收集武器，准备暴动。在伦敦，谣言更多。有人担心天主教徒会再次在伦敦放火，伦敦又将发生1666年时大火灾（以前有人谣传说1666

J.P.Kenyon, *The Popish Plot*, 1974, pp.302—309, P.80.

这3个人是格林、贝里和希尔（Hill山），3个名字加在一起正好是格林贝里山。此乃偶合。

年的大火就是天主教徒放的)。

在很多地方，天主教徒的住宅被搜查，并被勒令交出武器，有的地方召集了民兵，做好战斗准备。伦敦的民团处于战斗戒备状态。1678年11—12月，柯尔曼和上述3个嫌疑犯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到1681年，总共有35人因“天主教阴谋”案被处死。

英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在欧洲大陆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国家出版了一些书籍，对此加以谴责。后来又有一个名叫威廉·贝德罗的人指控王后，说杀死戈弗雷是王后策划的。这一指控是如此荒诞，以至很难令人信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所谓“天主教阴谋”并非完全可信。人们的情绪慢慢冷静下来，社会上因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歇斯底里逐渐平息。由“天主教阴谋”事件所掀起的针对约克公爵的敌对情绪反而得到了反效果，加上政府宣传说，那些反对政府的极端分子可能会将国家引向内战，就像1641年时的那批反政府人士所作所为一样。有些人对此感到恐惧，认为尽管王位继承人约克公爵有很多缺陷，但为了避免国家陷入混乱，还是保持王位的正常继承性为好。

丹比倒台“骑士议会”解散

在“天主教阴谋”事件上，丹比最初主张对奥茨所指控的情况进行调查，他认为这一事件可以促使新教各派力量在天主教的威胁面前团结起来。然而，事实证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议会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国王的基本政策，查理二世亲法政策和在国内恢复天主教的企图受到人们普遍反对。1674年—1678年，英国政界弥漫着一种敌视查理二世的浓厚气氛。1678年冬，英国原驻法国大使拉尔夫·蒙塔古在下院展示了丹比1678年1月和3月写的两封信。信中包含了代表国王同法国路易十四订立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查理二世执行联法政策，而路易十四则给查理二世以补助金。两天之后，议会通过了指控丹比的决议，丹比被解除了财政大臣的职务，并被逮捕送往伦敦塔囚禁。查理二世为了避免他同路易十四订立的秘密条约暴露，就在1679年11月解散了这届“骑士议会”。

J.R.Jones , The Restored Monarchy , 1660—1688 , 1979 , PP.205.

R.Ashcraft ,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1986 , PP.330—337.

D.T.Witcome , Charles and the Cavalier House of Commons , 1663—1674 , 1966 , PP.127—181.

蒙塔古之所以揭露丹比有其个人因素，因为1678年初丹比曾反对任命蒙塔古为国务秘书，同年6月丹比又同意解除蒙塔古驻法大使的职务。

四、反政府情绪的增长

人身保护法

查理二世在 1679 年将“骑士议会”解散后，下令举行新一届议会的选举。虽然宫廷在选举中进行贿赂和收买，并做了一些让步，将被人们所痛恨的约克公爵送往国外，但反政府的一些主要人物仍然在议会选举中当选。这使人回想起 1640 年“短期议会”被解散后，在重新选举时，很多原来反对政府的议员仍被选进了“长期议会”的情况。而原来忠实于王室的 150 名议员中，只有 30 人再度当选。反对政府的主要人物之一萨夫茨伯里应邀参加政府，新议会里反政府的情绪仍很强烈。反对王室的人提出了一些针对政府的议案，包括取消约克公爵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这个法案在下院通过后，还未来得及送至上院，查理就亲临议会将会解散。

这届议会实际上只取得了一项胜利，即在 1679 年 5 月通过“人身保护法”，查理二世在下令解散议会的那天批准了“人身保护法”。根据这个法案，任何一个被逮捕的人，都有权要求出示法院逮捕令，并要求将之立刻送往法院，法院必须判定逮捕是否合法。如果案件不能在最近一次开庭时审理，则被告在交纳保证金后应被释放。法案还禁止将英国人流放到殖民地。

“人身保护法”可上溯到 13 世纪，后来经过发展、变化。但直到此时，原来的规定仍有不少漏洞，未能真正起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特别是政治犯，更缺少应享有的人身保护的权力。例如，在 1641 年 8 月关于废除“星室法庭”的法令中，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有权要求知道他被囚禁的真正原因。当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被捕囚禁于伦敦塔时，他的姐妹们曾引用“人身保护法”反对将他无理逮捕，但政府却将他从伦敦塔监狱转送到一个不应用“人身保护法”的小岛上。现在的“人身保护法”则防止了这种漏洞。

从长远观点看，“人身保护法”在英国的人权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意义，然而在当时反对派同查理二世的斗争中并未起多大作用，即使议会在讨论这个法案时，也未引起议员的很大重视。议会中的议员之所以通过这个议案，是因为当时的各个政治派别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派占绝对的优势，谁都有可能将来成为阶下囚，都需要某种法律形式的保护。

围绕“排斥法案”进行的斗争 辉格派与托利派

J.P.Kenyon, *op.cit.* PP.430—432. “Habeas Corpus”, 拉丁文, 意为“你可拥有你的人身”。英国古代即有“人身保护令状”, 中世纪时的“人身保护状”用拉丁文书写, 开头字句为“Hebeas Corpus”。保护状规定下级法庭应将有关案件移呈高等法庭等事宜。到亨利七世时, 内容演变为保护个人人身不受政府非法侵犯, 但仍有不少漏洞。

W.S.Holdsworth,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 P.115 ff.Cf.J.P.Kenyon, *Documents*, P.425.

A.Browning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 P.193.当克拉兰敦在 1667 年受到指控时, 罪名之一就是, 他曾将“国王的臣民”囚禁于“遥远的岛屿上”使之不能受到“人身保护法”的保护。

据说上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时, 议员们正在同一个大胖子议员开玩笑, 未顾及去详细研究这个法案即草草通过。C.Falk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 1972, P.180.Helen A.Nutting, *The Most Wholesome Law*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LXV, 1960, P.527.

在 1679 年春召集的新一届议会中，议员们提出了一项“排斥法案”，目的是要“排斥”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法案规定，如果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继位为英国国王并行使国王的权力，将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任何人如果帮助约克公爵攫取王权，也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虽然这个法案两次提出两次被否决，但主张排除詹姆斯继承权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在“天主教阴谋”案的调查过程中，特别是詹姆斯和他的妻子的前秘书柯尔曼的信件被揭发，暴露了詹姆斯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通信的事实，使议员中很多人对詹姆斯大为反感。在 1679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议会中，托马斯·皮尔肯顿提议对詹姆斯处以“大逆不道”罪。接着他在 5 月 15 日的议会中又提出一个议案，主张在查理二世死后，不得将王位交由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而是要交由一信奉新教的人继承。这个法案以 207 票对 128 票通过。但不久，查理二世即下令议会休会，以后又在 1681 年 1 月将之解散。

在 1680 年议会休会期间，政治领域中的两个持不同政见的党派逐渐显露出了轮廓。这时，以萨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一批议员坚决反对约克公爵詹姆斯继承王位。他们递交请愿书表示自己的态度，并要求召开议会讨论“排斥法案”。这批人被称之为“请愿者”，而另一些人对“请愿者”大表反感，他们被称之为“憎恶者”。两派互相敌视，互相攻讦，并互为对方起了含有贬意的蔑称。“请愿者”被他们的政敌称之为“辉格”，而“憎恶者”则被他们的政敌称之为“托利”。两派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渐渐定型，形成英国历史上两大政党，即辉格党和托利党。到 19 世纪，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托利党演变为保守党。

这时在议会中围绕着“排斥”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辉格”派支持“排斥法案”，而“托利派”则加以反对。到 1680 年秋天以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萨夫茨伯里站到了反对政府的前列。萨夫茨伯里认为如果詹姆斯继任国王就会推行专制独裁，宗教宽容政策将不可能实现，因而他主张为了阻止詹姆斯即位，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在他的组织和鼓动下，主张通过“排斥法案”的辉格党人在议会里占了多数。

枢密会议

查理二世支持托利派，但他表面上对辉格派的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1679 年 4 月，他把枢密会议加以扩大，将一些反对詹姆斯的人如萨夫茨伯里等也吸收了进来。但另一方面，他在关键问题上却毫不动摇，仍然坚持要求他的兄弟詹姆斯继承王位。另外，查理二世还接受英国驻荷兰大使威廉·坦普尔

J.P.Kenyon, op.cit.PP.469—471.

B.Coward, The Stuart Age, 1985, P.285.

J.R.Jones, The First Whigs, 1961, PP.55—51.

“辉格”（Whig）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原意是“盗马贼”，本来是人们对苏格兰长老派的讥称，由于“请愿者”中大多数人都是长老派，所以他们的政敌如此称呼他们。“托利”（Tory）源于爱尔兰地方的凯尔特语，原意为“不法之徒”，本来是人们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讥称，由于“憎恶者”中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或同情天主教者，故他们的政敌如此称之。

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人数较少，但拥有实权的枢密会议。枢密会议由辉格派和托利派各推举 30 人组成，以取代原来的“卡巴尔”政府。枢密会议成立后，查理二世任命反对派领袖萨夫茨伯里为召集人。不久之后，枢密会议中又形成了一个人数更少的核心，掌握了实权，但萨夫茨伯里一直未停止反对国王的斗争。

1680 年 10 月议会开会时，萨夫茨伯里再次为通过“排斥法案”而积极活动，结果该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送交上院后又引起激烈争论。特别是哈里法克斯侯爵，虽然他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查理二世同法国亲近的政策，但他认为如果让玛丽或者让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继承王位，将是对君主世袭原则的破坏。至于上院的贵族议员，他们更关心维护自己的土地财产世袭权利。如果君主世袭的原则遭到破坏，可能有朝一日他们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因而竭力反对“排斥法案”。而一些英国国教徒，则从宗教道德角度出发，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私生子（蒙默思）登上英国王位。结果上院以 63 票对 30 票否决了“排斥法案”。

在议会外，辉格党人展开了广泛的宣传，竭力反对信奉天主教的人继位为王。在伦敦以及许多外省城市都组织了诸如“绿色飘带俱乐部”等组织，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印刷品、小册子，到处鼓吹自己的观点。在伦敦及其他城市，他们将印制好的请愿书到处散发，广泛征集签名。1680 年 1 月，在伦敦和威尔特郡，有两份签名人数达 9 万人的请愿书被呈交给查理二世。在 1681 年进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有许多选区的议员都收到选民的委托书，要求将天主教徒排斥在王位继承权之外，有的还提出了关于议会权利等问题。实际上，辉格派 1679 年—1681 年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主要是靠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虽然辉格党人在排斥问题上曾一度占上风，但辉格派内部对谁应代替詹姆斯来继承查理二世的问题却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应由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继位，但有人反对，因为蒙默思没有继承王位的合法身份。关于由蒙默思继承王位，也从来未正式列入反对派的纲领之中。另一些人主张由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继位，但玛丽已嫁给了奥兰治的威廉，如果她继位，可能将使英国和荷兰关系过于紧密，从而把英国拖入同法国的战争。辉格派在这个问题上犹疑不决，内部分歧意见很大。托利派利用辉格派的内部分歧指出，如果合法的继承人不能继承王位，将会造成混乱，以后人们的私有财产也无法合法继承。同时，如果剥夺詹姆斯的继承权，还有可能发生詹姆斯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内战，使英国遭到重大破坏。他们拿 1641 年—1642 年的内战为例来进行恐吓。

查理二世竭力支持托利派，这使托利派占据了优势。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如拥护辉格派的人多，他们的组织也不如辉格派严密，但实际势力仍超过了辉格派。

J.P.Kenyon, op.cit.P.452.

O.W.Furley, Pamphlet Literature in the Exclusion Campaig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II, 1957, P.31.

J.R.Wester, Monarchy and Revolution, 1972, P.43.

第三节 “光荣革命”

一、查理二世恢复专制君主制的企图

“牛津议会”

上届议会在 1681 年 1 月被解散后，查理二世又于 1681 年 3 月在牛津召开新的议会。这届议会所以要从伦敦改到牛津召开，是因为查理二世觉得伦敦的反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辉格派在伦敦城区的资产阶级中有众多的支持者，萨夫茨伯里及其追随者常以其人多势众来要挟国王。为控制议会，查理二世将军队调到牛津，派军驻守在从伦敦通达牛津的要道之上。下院议员见此情形，也成群结队前往牛津，以壮声势。伦敦市民闻讯，也有很多人涌向牛津。形势颇为紧张。与此同时，查理二世又和路易十四进行谈判，他向路易十四表示，他将不参加奥兰治亲王所组织的反法联盟。路易十四则表示，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查理二世补助金。两人谈妥条件以后，查理二世感到不再需要议会通过议案给他以补助金，他不再害怕议会的要挟，就在当年 3 月将“牛津议会”解散。这是查理二世在位时期的最后一届议会。查理二世解散了“牛津议会”之后，感到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缓和人们的强烈不满情绪，于是在 4 月间宣布重新实施“刑事法”。但不久之后（1684 年 10 月），在詹姆斯的建议之下，政府部门又讨论关于暂停实施“刑事法”的问题。

“莱伊宅阴谋”案

1683 年，政府利用所谓“莱伊宅阴谋”案件对辉格派的领导人加以镇压，使辉格派的力量大受影响。事情的经过是：当约克公爵詹姆斯从国外回到英国后，人们担心，一旦他继承王位，他肯定将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并对英国新教徒进行迫害，所以一些辉格派人士秘密计划，设法消除这种威胁。1683 年，辉格派人士听说国王和约克公爵要到纽马凯去观看赛马，归途中将经过赫特福德郡一条大路，路边有一所“莱伊住宅”。这里地势险要，正好过去参加过革命的伦勃德就住在这里。有人认为，如果在这里埋伏数十名武装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将国王的卫队制服，然后就可以将国王和约克公爵除掉。但纽马凯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赛马未能按计划进行，国王和约克公爵提前回到伦敦，密谋败露。辉格派政治活动家罗素、西德尼被处决，蒙默思、拉雷、韦尔德曼等被流放，另一个辉格派政治家埃赛克斯伯爵在受审前自杀。这就是所谓的“莱伊宅阴谋”案。关于“莱伊宅阴谋”事件，并无充分的证据。被处决的罗素勋爵并未图谋暗杀国王，而西德尼也只是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论述了抵制专制王权的思想。两人在受审时，始终坚强不屈。当时也有许多人怀疑所谓的“阴谋”是否真有其事。经过这一事件，整个辉格派都受到

A.Browning, 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 Vol.X, PP.394—395.“刑事法”（PenalLaws）是关于反对非国教徒尤其是天主教徒的法令。早在 1571 年和 1593 年，这类法令即已制订，到 1606 年和 1610 年时又加以扩充。各个时期的“刑事法”对天主教徒的限制程度不完全相同。“宽容法案”实施后，“刑事法”即取消。

了不利的影 响，在政界的势力骤然衰落。原来在“天主教阴谋”案件发生后，英国曾掀起一股反天主教的狂热，一时辉格派影响大增。现在“莱伊宅阴谋”事件的消息传出后，辉格派却成了这次事件的政治受害者。

查理二世在 1681 年解散了“牛津议会”，1683 年处决了一些所谓“莱伊宅阴谋”的参与者之后，又对地方上的许多郡政府加以清洗，将反对国王专制统治的辉格派人士加以撤换，使地方上的治安法官大多为拥护政府的人，其中许多人都是托利派。本来，以前就曾发生过多次国王政权企图控制地方政府的事。20 年代、40 年代以及 1661 年“市镇社团法”，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但这一时期查理二世政府企图加强对地方政权机构的控制的措施规模最大。地方政权机构被清洗之后，辉格派在地方上的势力受了很大的打击。另外，为了制造忠君气氛，并从社会舆论上压服那些反对专制王权的辉格派，查理二世的政府还在各地有计划地组织成百上千的人签名，向国王递交表示效忠的请愿书。

在经济政策上，从 1683 年—1684 年起，查理二世直接控制了对炉灶税和货物税的征收，使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到 1684 年—1685 年时达到 137 万多镑。财政状况的改善，加强了他推行专制统治的势头。这时他的策略已不是去一味地推行天主教，而是利用非国教徒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当一些托利派的领导人迫害天主教徒和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时，他非但不加制止，反而鼓励。而一些托利派人士对查理二世的倒行逆施、专制独裁的行为也听之任之，不予反对。1684 年，当查理二世不顾“三年法案”的规定逾期不召集议会，并且把为人所痛恨的詹姆斯吸收到枢密会议时，并未引起任何公开的抗议。

J.R.Jones , Parties and Parliament , in J.R.Jones (ed) , The Restored Monar - Chy , 1660—1688 , 1979 , p.55.

“炉灶税”是 1662 年—1689 年实行的一种税则。该税则规定对每户人家生火的炉灶课征 2 先令的税。政府企图以此来代替残存的封建赋税，以保证政府的固定税收。

C.D.Chandaman , The English Public Revenue 1660—1688 , 1975 , PP.254—255.

二、詹姆斯二世的反动政策

詹姆斯二世加强天主教的企图

1685年，55岁的查理二世因中风去世。由于“排斥法案”未能在议会通过，所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刚继位时，查理二世遗留给他的的是一个地位相当巩固的王权，一些政界人士也向他表示祝贺，并对他表示效忠。他在即位初期所执行的政策，也相当有节制，并未表示出不顾议会而实行专制独裁的意向，也未表示要把天主教作为唯一的宗教，而将其他新教一概加以禁绝。相反，当他的顾问们向他提出一些极端主义的建议，如强迫女儿安妮信奉天主教；立他的养子贝尔维奇公爵为正式继承人；在法国帮助下，在英国强行推行天主教等，他都拒绝。

然而，詹姆斯“从表面上看去虽然是平静的、忠诚的，对他的兄长的专制独断的行为表示驯服，但在这种假象之下他却隐藏着愤恨、野心、宗教偏执。”他在即位后发表的宣言和谈话中，虽然一再声明他将保持英国国教会的原则，宣称为了民族利益，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将维护英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等，然而，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他就到他的小礼拜堂去做天主教的弥撒。这说明他的上述宣言不过是为了稳定局势的一种权宜之计。

托利派这时在政治上占有优势。一方面，詹姆斯二世即位初期的一些言论表明政府的政策将会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议会选举中，他们的领导人桑德兰进行活动，拉拢选票，使托利派的候选人多数当选。在195个当选议员中，除9人为辉格派外，其余都是托利派人士。

蒙默思起义

詹姆斯二世即位后不久，爆发了两次起义。一次是1685年5月在苏格兰爆发的阿吉尔领导的起义。苏格兰人不满英国政府迫害新教徒和加强专制制度的措施，故起而反抗，但起义很快被镇压。

另一次起义是蒙默思领导的。1685年6月，在萨默塞特和西多塞特、东狄容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信奉新教的纺织工人和其他城市中下层人民，拥戴信奉新教的蒙默思起而反对詹姆斯二世。起义者人数达数千人，声势浩大。

蒙默思本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1685年查理二世突然去世时，他正作为

以前麦考莱等辉格派的历史家把詹姆斯二世说成是一个行为乖张的极端主义者，这种说法已为新近一些历史家的研究所否定。B.Coward, *The Stuart Age*, P.294.

J.Haswell, *James*, 1972, PP.235—236.

J.S.Clatec, *Life of James the Second*, 1816, Vol. , PP.3—5.

Peter Earle, *Monmouth's Rebels: The Road to Sedgemoor 1685*, 1977, PP.196—212, 以前的许多历史著作都认为蒙默思的起义队伍中主要是农村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但近年来，有些学者经过研究查明，蒙默思的起义队伍包括了更多的城市中的手工工场工人和中下层人民。

奥兰治亲王威廉的贵宾，在荷兰的海牙同他的情妇温特沃思跳舞、滑冰，寻欢作乐。他原来以为他作为查理二世的男性后裔可以继承王位，未料到他的叔叔詹姆斯坐上了国王宝座。消息传来，他身边那些因参加 1683 年“莱伊宅阴谋”而被迫流亡的人，竭力怂恿他回国去夺取王位。于是他就同他的追随者于 1685 年 6 月乘小船在波特兰岬角不远处的一个港口登陆。登陆后，他立刻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一天之内就有千余人聚集在他的周围。蒙默思指控詹姆斯二世毒死了查理二世，并宣称现在的议会为非法，必须解散。他的言论起了反效果，在政界引起了恐慌。他在英国西部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他在短期内就集结了二三千人的武装，使一些政界上层人士感到，这可能会导致像 40 年代那样可怕的内战。“这是他们所预想到的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最坏的事，因而他们希望将蒙默思的反叛尽快加以彻底击败。”包括辉格派在内的政界上层人士及一般的贵族、乡绅，都对蒙默思起义抱敌视态度。

事实上，复辟时期的政治基础，本来就是城乡有产阶级对 40—50 年代革命运动的反动，是为了防范中下层人民的“反叛”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当蒙默思的起义中涌进了大量城乡中下层人民之后，当蒙默思发表了上述激烈的言论之后，统治阶级立刻联合起来反对起义。

詹姆斯二世听到蒙默思的起义队伍在英国登陆的消息后，立刻派大军前往镇压。议会及各地地方政府也纷纷表示向国王效忠。在反叛者的威胁面前，统治阶层团结在一起，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地位反而得到暂时巩固。

蒙默思的队伍在英国登陆后不过一个月，就遭到国王派来的大军的四面围困。这时苏格兰由阿吉尔和伦勃德领导的起义已被镇压。虽然蒙默思起义队伍中的手工工人、矿工及其他中下层人民英勇奋战，但终究敌不过国王派来的大军。1685 年 7 月 15 日，起义队伍在赛吉穆尔被政府军击溃。蒙默思只身逃走，几天之后被俘获，然后被处决。随后，大法官杰弗里斯被派到西部地区，对被俘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审判”，绞死了二三百人，并不顾刚通过的“人身保护法”的规定，将 800 多个起义者流放到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有产阶级的贵族和乡绅对此却无动于衷。

詹姆斯二世加强君主专制的企图及人民的反应

蒙默思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只是一个插曲，主潮仍然是以詹姆斯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并推行天主教，而以英国国教徒为主的托利派和以新教左翼为主的辉格派等，则对詹姆斯二世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行为竭力抵制。这两股势力的斗争仍然是决定英国当时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蒙默思的起义被镇压以后，社会中下层人民反叛的威胁已经消除，詹姆斯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即着手去加强君主专制并强行推行天主教。他在议会发言中表示，为了防范社会动乱，被派去镇压蒙默思起义的军队不能解散。非但如此，他还把原来只有 5000—6000 人的军队扩充到 3 万人左右，并将其中约 1/2 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伦敦城区人民可能发生的骚

J.R.Jones , 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 1972 , P.59.

与 1688 年时奥兰治的威廉率军在英国登陆时的情况显然不同。

B.Coward , The Stuart Age , 1985 , P.295.

乱。他还不顾“宣誓法案”的规定，在军队中提升天主教徒为军官。以前查理二世企图用控制民兵来加强其专制统治，现在詹姆斯二世则想用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在这段历史时期，英国人民对军队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各国有明显的不同。英国一般人民以及乡绅、贵族一向把军队看成是加强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议会里一些议员也认为，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在40年代革命时期，自从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之后，军队就成了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议会处处受军官们的摆布，所以詹姆斯二世此举在政治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詹姆斯二世的上述行为，还受到了一些枢密会议成员的反对。虽然詹姆斯二世认为枢密会议的主席哈里法克斯肯定不会支持他的这些政策而立刻将之解职，另任桑德兰伯爵接替（桑德兰是一个无原则的投机家，他为了取悦詹姆斯二世皈依了天主教）。但其他大臣，如掌玺大臣诺斯以及伦敦主教亨利·坎浦敦等也对詹姆斯二世公开表示不满。尽管如此，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当诺斯去世后，他任命了以残暴闻名的杰弗里斯担任掌玺大臣，并在11月20日下令议会休会，以后再未重新召集议会。

詹姆斯二世的行爲在英国社会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法国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事件。消息传到英国，更使人们大为震动。法国许多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英国，他们讲述了许多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人对天主教的更大愤恨，从而更坚定了他们反对推行天主教政策的詹姆斯二世的决心。但詹姆斯二世早已皈依了天主教，面对国内公众的反对，不为所动。而这时发生的“高登控告赫尔斯案件”也助长了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决心。

高登控告赫尔斯案

1686年6月，罗马天主教徒赫尔斯的仆人高登向高等法庭控告赫尔斯未按照“宣誓条例”进行宣誓就担任了军队的军官。高等法庭审理此案时，在12个法官中，有11人认为国王有权对个别信奉天主教的人实行“赦免”，使其可以不遵守“宣誓条例”的规定在民政或军事部门担任职务。理由是：“第一，英国国王是英国的最高统治者；第二，英国的法律就是英国国王的法律；第三，英国国王有权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暂缓实行刑事法。”只有1名法官表示反对。这个案例，使詹姆斯二世觉得他可以利用他的赦免权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天主教。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其性质类似在1641年经过“长期议会”的斗争被废除了的特权高等法庭，其职能是防止英国国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布道行为。

J.P.Cooper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Britain and Netherlands , ed.by J.S.Bromley and E.H.Kossmann , 1960 , P.62.

H.C.Foxcroft ,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George Savile , Marquis of Halifax , Vol. , PP.448—449.

J.P.Kenyon , op.cit.PP.438—439.

Ibid.P.439.

J.R.Jones , Country and Court , England , 1658—1674 , 1978 , P.232.

以后，詹姆斯二世又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去争取人们皈依天主教，除了大肆宣传活动外，还采取个别谈话（所谓“密室策略”）的办法，但收效不大。直到1688年，在治安法官中，天主教徒只占1/4左右。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中，只有1人即桑德兰皈依了天主教。

詹姆斯二世同伦敦主教的冲突

在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过程中，他同伦敦主教的冲突使他受到很大的挫折。天主教教徒在詹姆斯二世的保护下，势力日甚一日。他们公开建立组织，传播天主教教义。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又发布指示，要求布道者根据教义问答手册中所规定的内容传教，而不应传播反对天主教的论述。但伦敦副主教约翰·夏普却不遵守这个指示，詹姆斯二世即命令伦敦主教康普敦暂停夏普的布道权，但康普敦拒绝照办。詹姆斯二世就在1686年9月停止了康普敦的职务。康普敦以前曾在枢密会议任职，后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枢密会议，现在又被停止了主教职务。然而康普敦坚决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在接连碰壁之后，詹姆斯二世企图取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对英国国教中那些坚持不宽容政策的人。1686年，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决定，但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接着他又派遣威廉·宾恩（即美洲宾夕法尼亚的开拓者）到荷兰去会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要求两人支持他在英国执行取消“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的政策，但上述两人见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声名狼藉，不愿与他合作。

詹姆斯二世虽然遭到一连串挫折，仍刚愎自用，不肯改弦更张，反而转过头来将两个英国国教大臣克拉兰敦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免职，并企图任命一个天主教徒担任牛津马格达仑学院的院长。当罗马天主教教皇计划派遣使节访问英国时，詹姆斯二世命萨默塞特公爵主持欢迎仪式，但后者拒绝。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地推行天主教的行为，已引起了英国许多人士的公开反对。关于詹姆斯二世的任性和固执，据说查理二世生前曾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将会看到，当我的兄弟作了国王之后，他将由于他的宗教狂热而丢掉他的王国，并将由于他的不加检点的放肆行为而丧魂落魄。”果然，詹姆斯二世不通情理的蛮横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

辉格派和托利派在反对詹姆斯二世上的联合

詹姆斯二世加强天主教的企图，引起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辉格派和托利派在这个问题上逐渐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在这样的局势下，詹姆斯二世企图建立以他为首的包括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联合，以作为他巩固统治的基础。1687年4月4日，他发布了“赦免宣言”，并取消了反对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条例”。他原希望此举能得到非国

J.Miller, *Poper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660—1688*, 1972, P.219.

F.C.Tunmer, *James*, 1948, P.458.

J.P.Kenyon, *op.cit*, PP.410—413.

教徒的响应和议会的支持。但是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詹姆斯二世的这些措施，不过是加强天主教的一个步骤。哈里法克斯在致非国教徒的信中说：“非国教徒们，人们现在紧紧地拥抱我们，只不过是除了在另外的时候更加压榨我们。罗马天主教徒不但不喜欢他所允诺的自由，而且在原则上，他也是不可能给人以自由的。”詹姆斯二世未能如愿，就在1687年7月将议会解散，并决定新议会的选举延期举行，因为詹姆斯二世感到拥护他的人不可能在新选举中占据多数。

为了对以后的议会选举加以控制，詹姆斯二世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由于当时地方上的选举是受各郡郡长和地方法官控制，而城镇里的选举则由市政机关控制，所以詹姆斯二世将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地方官和市镇机关的人员大量撤职，改任一些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担任这些职务。桑德兰、杰弗里斯等人在许多选区都建立了组织，酝酿他们所挑选的候选人，但此种行为使地方上的贵族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更为不满。到了1688年春，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

七主教请愿书

1688年4月27日，詹姆斯二世重新发布“赦免宣言”，并命令在以后的两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宣读。他指望这个“宣言”能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从而使英国国教徒陷于孤立。然而“宣言”发表以后，许多英国国教徒指责国王的这个举动为非法，大约有90%的教士拒绝服从。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和另外6个主教拟订了一份“请愿书”，指出国王此举是非法的。“请愿书”中说：“国王的‘赦免宣言’是建立在国王豁免权基础上的，但这种豁免权，议会早已多次宣布其为非法。”

政府下令将7名主教以煽动罪交付法庭审讯。但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如此不得人心，甚至连他自己的亲信大臣桑德兰和杰弗里斯对此都不以为然。结果法庭在6月30日正式宣布7个主教无罪，政府威信扫地。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基础受到严重破坏。

J.R.Westen, *Monarchy and Revolution, The English States in the 1680*, 1972, P.227.

J.P.Kenyon, *op.cit.*PP.441—442.

三、1688年“光荣革命”

矛盾的爆发

就在全英国各政治、宗教派别的人士联合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王后玛丽在6月10日生了一男孩的消息。原来人们还抱有一种希望，即在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死后，将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继位，君民之间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可望逐步消失。现在国王有了男性后裔，将来必将由他继承王位，而这个王子很可能将是一个天主教徒。人民的希望破灭了，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

群众的政治态度这时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来自40年代革命以来，英国人民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和主教们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支柱。但现在由于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强烈反对詹姆斯二世，似乎变成了反对君主专制的英雄，群众对主教们的态度很快改变。当上述7个主教被国王下令送往伦敦塔囚禁时，沿途群众对他们欢呼致意。6月29日7个主教被带到法庭受审时，许多人密切注视着审讯的结果。当次日法庭不顾国王的旨意而宣布7名主教“无罪”时，群众以欢呼迎接他们。甚至军队里的士兵，对此也欢声雷动。

围绕着詹姆斯二世之子的出生，还流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人怀疑，王后多年不生育，现在却突然生了一个男性继承人，可能是天主教徒在其中做了手脚。有人甚至肯定这个男孩是被人从外面偷运到王宫内的。一时之间，王子是否亲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许多人由于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反动政策，也随声附和说王子不是亲生的说法。

致奥兰治的威廉的邀请书

直到这时为止，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虽然不满情绪甚为强烈，但是还尽量避免过激的行为，以免再次发生像4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但詹姆斯二世仍然一意孤行，毫无让步之意。到了6月30日，即七主教被法庭宣布为无罪的当天晚上，当群众到处都在欢呼、歌唱以庆祝七主教被释放时，刚被释放的7个主教聚集到施鲁斯伯里伯爵的家中，商量致书给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邀请他率军到英国来反对詹姆斯二世，他们则保证给予协助。信中说：“我们深信我们的状况将一天比一天坏，而我们又无力保卫我们自己，因而我们恳切希望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能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我们也将对此作出我们的贡献。”7人还商量好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每个人所将担任的具体任务。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国内的整个形势，仍然尚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

Additional Manuscripts, British Museum, 41816. Cf. J.R. Jones,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 1972, p. 239.
J.R. Western, *Monarchy and Revolution*, 1972, pp. 211—212.

这7个签名的主教是 Edward Russell, Henry Sedney, Lord Lumley, Bishop Compton, Earl of Shrewsbury, Earl of Devonshire, Earl of Danby.

J.R. Jones, *op.cit.*, p. 240.

步。当七主教致书奥兰治的威廉的消息传出后，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太过分了。诺丁汉伯爵表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法”行为。

诚然，如果没有奥兰治的威廉的入侵，“光荣革命”或许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然而，我们看到，从复辟以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它的主流的方向却是不可改变的。这个历史发展的主流就是：复辟君主专制的倾向和议会民主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从长远来看，这一斗争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复辟君主专制的企图必然失败，议会民主在有限的程度内，也就是说，类似40年代内战开始之前的君主权力受到限制的制度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

奥兰治的威廉很早就密切注视着英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并派人到英国去打听虚实。1687年春，他派遣了冯·狄雅克维尔特到伦敦。表面上，他是作为奥兰治的特使到英国来祝贺詹姆斯二世的弄璋之喜，并试图劝说詹姆斯二世采取温和的政策，但实际上，他却多方与一些大臣接触，试探他们的态度。结果他发现，不论是辉格派或托利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满。于是他就向这些人暗示，一旦需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

本来，威廉对英国事务的关心，主要是担心英国政府执行的加强天主教并与法国联合的政策，可能危害到他的利益。后来，由于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威廉的地位渐趋稳固，到1687年左右，只剩下英国的王室仍与法国联合，成了威廉时刻担心的问题。所以威廉加紧向英国秘密派人刺探情报，制造反天主教和反对法国的舆论和活动。到了1688年6月，威廉又派了苏列斯坦到伦敦，进一步和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此时，威廉通过各种渠道，已感到对英国的入侵有了较大把握。6月30日英国7个著名人物向他发出邀请书请他前来英国时，他即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入侵英国。1688年11月1日，他指挥下的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

“光荣革命”

奥兰治的威廉率军入侵英国之时，正巧碰上一些有利的因素。1688年9月，法国决定派军去攻打德意志的选帝侯国，使威廉解除了后顾之忧。当威廉率领1.4万军队，分乘500艘船舰扬帆西驶时，原拟于英国北部登陆，英国的丹比等贵族已按预定计划等候在那里准备与他会合。但由于风向不定，他率领的船舰先被吹回，后又被一股“清教之风”——人们对当时刮起的东风的称呼，吹过多佛海峡，于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而英国在海

J.R.Western, op.cit.P.237.现代有些历史家认为，如果后来没有奥兰治的威廉的入侵，当时英国国内的形势不致导致革命事件的发生。

J.Dalrymple, *Memoi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773*, Appendix, Part I, P.232, P.237, P.239. Cf. J.R.Jones, op.cit.P.239.

S.B.Baxter, *William*, 1966, PP.224—225.

A.Browning,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660—1714*, PP.120—122.

岸警戒的船舰则因为逆风，只得停泊在港口内无法驶出。

威廉在托尔湾登陆后，率军向内陆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 1.4 万人，而英国的军队则有 4 万人，是英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众寡悬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则在进入艾克赛特之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作是 17—18 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威廉刚在英国登陆，立刻就受到当地地方官的欢迎。以后他所到之处，都遇到同样的场面，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辉格派，也包括托利派。不过他们中也有分歧，以哈里法克斯和诺丁汉为首的温和派，主张要慎重行事。他们顾虑一旦英国军队转而支持国王，他们的地位将会处于危险之中。而以丹比、施鲁斯伯里、德汶希尔为首的一批人则比较坚决，因为他们早在 1688 年春就和威廉在秘密联系了。在英国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奥兰治威廉的妻子），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计划逃往法国。在逃走之前，他以绝望的心情说：“我在受到这样的遭遇之后，如果我要出走的话，谁还会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这支军队是我从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建立起来的，我对它给予了大量恩宠。如果像这样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么我还能对那些我来曾给予过什么恩惠的人什么希望呢？”随后，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往法国，他自己在 12 月 11 日深夜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奔向达特默思，想乘船逃往爱尔兰。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渔夫与市民一起押送伦敦。奥兰治的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斯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1689 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 1689 年 12 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上述 1688 年—1689 年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C.Duffy,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1987, pp.189—190.

E.S.de Beer (ed),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1655*, Vol.IV.P.624.

F.C.Turner, *James II*, 1948, p.448.

The Bill of Rights, 1689.in W.C.Costin J.S.Watson (ed), *The Law and Wor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Documents*, 1961, Vol. 1, pp.67—74.

四、“光荣革命”的意义和史学

新的历史发展重心

1640年以来，历史的发展经过几番摇摆和螺旋形的发展，到1688年—1689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

1640年革命开始后，经过两次内战，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发展呈上升的趋势。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掌握政权后，即转过头来镇压以平等派和掘地派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民主力量，从而破坏了共和国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这时上层统治集团把巩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个人身上。1653年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都集中于护国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少数野心分子，争权夺利，离心离德。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这个唯一的权力集合点崩溃了，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他只在历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从政坛上消失。当蒙克率军进入伦敦后，仍然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无可奈何之余，认为只有君主制复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国各界人士本来指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复辟并不能将1640年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恢复原位。有人认为现在应该从过去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过去20年中，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能重新恢复原状。不要说中下层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时期曾经受益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益。连查理二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布列达宣言”及复辟后初期所颁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认过去20年中发生的一些事实。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兰敦等人，也认为必须执行温和政策，对现状不能作激烈的变动。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1649年以来，历史逆流就已开始出现，到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建立，这股逆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质上，它已为以后的王朝复辟开辟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复辟时，反动的历史逆流像冲决了堤坝的洪水汹涌而来，它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力量。王党分子一旦得势，岂肯善罢甘休。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以查理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刚站稳脚根，立刻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恢复不受议会约束的专制王权。与此相配合，他们又竭力想加强天主教的势力，并采取措施使军事力量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贯穿于复辟时期28年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斗争焦点而展开的：第一，力图实行君主专制的势力与维护议会权利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国王企图将军事力量（先是民兵，后来是新建立的正规军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属于这个斗争范围。第二，国王用种种手段企图恢复并加强天主教，

而英国国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则反对这种企图。

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展开的斗争，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 20 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 60—80 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当蒙默斯起义和 1685 年、1688 年事件发生时，就显露出起义的力量既分散又软弱，而且缺乏社会的广泛支持。

因而，在当时的英国，不经暴力而经过妥协来解决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 年的“光荣革命”，实质上就是走的这样的道路。从 1640 年革命爆发以来，经过了几次反复曲折，终于在“光荣革命”时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以后的英国历史就以这个重心为新的起点，以徐缓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起来。

英国立宪君主制的世界历史意义

英国在 1688 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利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 17 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的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等级森严，绝对专制君主制更为强大。1688 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 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关于“光荣革命”的史学

自 18 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 1688 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 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

Cf. P. Anderson, *The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1974, Trevor-Aston (ed.), *The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1980.

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著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

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著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著《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著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著作雷同。

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当代托利—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备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

“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中叶，

H.T.Dickins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o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istory*, Vol.IXI, 1976, PP.28—45; J.Child, 1688, *History*, 1988, P.398.

T.B.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ed by.C.H.Firth, 1914, Vol. II, PP.214—215.

T.B.Macaulay, *Miscellaneous Writings and Speeches*, 1889, P.154.

G.M.Trevelya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1938, P.59.

D.Ogg,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1955;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James II and William III*, 1963.M.Ashle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1966; *The Descent on England*, 1969.

J.A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1969, P.8.

M.Belgion, *David Hume*, 1965, P.5.

Cf.R.C.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P.45—46.

W.S.Churchill, *Marlborough, His Life and Times*, 1967, Vol.I, P.226.

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 1848 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 1826 年出版的《1640 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 1848 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 1688 年的“光荣革命”与 1640 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 1640 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1850 年，基佐专门为《1640 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著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 17 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 1640 年—1653 年间，把 1653 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 1653 年—1688 年的历史作为 40—50 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

最近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著。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有人说，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

在我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 1640 年—1653 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 1688 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 17 世纪 40 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我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近几年，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

F.Guizot, *Purquoi 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neussit ? De Scours Surl'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 1850, P.168.

Cf.J.R.Jones, *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1972, PP.330—331.

H.Nenner, *The Traces of Shame in England's Glorious Revolution*, *History*, 1988, June, P.243.

J.Child, 1688, *History*, 1988, Oct.P.398.

第四节 17 世纪英国的思想和文化

一、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发展变化

人民在思想上的觉醒

1640 年革命爆发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土崩瓦解，那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它们禁锢、约束人们思想的作用。原来以盲目信仰为基础的思想原则和君权神授等理论动摇了，而理性主义的因素却逐渐萌发滋长。这时在评价一个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善恶时已不再单纯地用上帝的意旨和君主的命令作为价值标准，而是进一步考虑它是否合乎正义和理性。在 1647 年秋“普特尼辩论”会上，当独立派高级军官艾尔顿指责平等派所拟订的“人民公约”破坏了军队在“庄严协约”中向议会许下的诺言时，平等派的代表魏尔德曼回答说：“问题首先在于订立的盟约是否诚实，是否合乎正义，如果以前订的盟约是不诚实的、不正义的，那么都可以废除。”

平等派代表雷因波洛在为他的普选权的主张辩护时说：“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投票权的不是财产，而是理智。否定一个人的投票权就是否定他运用其理智的权利。”有时，平等派还用自然权利的理论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诺曼枷锁”说，把英国人民被奴役归因于诺曼人的征服，而不再引用上帝意旨和《圣经》教义。当斗争激化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引证历史的做法也加以抛弃，而直接诉诸理性，“因为理性是没有先例的，理性正是所有正义的先例的源泉。”虽然人们在申诉自己的见解时也还常常引用《圣经》，但此时《圣经》中的话只不过是他们为现实尘世利益辩护的工具。对那些引用《圣经》的人来说，“《圣经》只是一部内容广泛的书，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任何他们所需要的证据。”

同时，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各种政治色彩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出来。过去，在革命之前，英国政府曾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任何出版物必须经过检查才能出版。戏剧作品甚至必须经过两次检查才能出版和上演。全国没有公开出版的报纸。即使富有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只能靠私人传阅的新闻通讯来互通信息。从国外进口的书籍须经主教严格审查后才能出售。如违反上述规定就会遭受残酷的刑罚。李尔本就是因此而遭到鞭打、游街。革命爆发后，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和箝制舆论的工具陷于瘫痪。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641 年以后，各种政治色彩的出版物像春潮泛滥一般大量涌现。诗人弥尔顿眼见这种人民精神焕发、思想解放的情景，不禁热烈欢呼，

A.S.P.Woodhouse (ed), *Puritanism and Liberty*, 1974, P.27.

A.S.P.Woodhouse (ed), P.54.

C.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86, PP.58—125.

C.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980, 153.

C.Hill,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1993, PP.43—44.

C.Hill, *ibid.*P.149.

H.N.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80.

将之比喻为一个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挣断身上的枷锁奋然站起。平等派的主权在民和反对一切形式暴政的思想，在城乡中下层人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得到热烈响应。

革命时期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不论其范围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留给后世一个宝贵的民主、自由的传统。

复辟时期的思想逆流

1660年君主制复辟后，反动逆流倾泻而出。1662年又颁布了“书报检查条例”，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有关政治内容的书籍，而且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等书籍也要先经审查才能出版。国务秘书等政府部门的人，宗教界的领导人如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牛津、剑桥等大学校长，都被授权进行书报检查工作。

从1660年到1679年，英国只有一份官办的报纸《伦敦公报》。1679年废除书报检查条例后，报刊和小册子才开始大量出版。然而，其中有些对政府部门不满的著作，仍被以违法罪名加以禁止。1680年，大法官斯柯洛格斯通知所有的出版社和书商：“印刷和出版任何新闻报刊或关于新闻的小册子，都是犯法行为。”处于政治高压气氛下的许多学者都噤若寒蝉，不敢自由发表自己的思想。有些学者在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之后，时刻担心会由于这些著作的内容招来灾祸。霍布斯就曾担心出版不合当局口味的书而被主教烧死。甚至一些学术殿堂也成为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1683年，牛津大学把近几年出版的重要的政治理论书籍和论文，包括霍布斯、弥尔顿、巴克斯特等人的著作，都加以公开的批判，并将之焚烧。1675年，一些咖啡馆也被封闭了，因为自从17世纪50年代以来，咖啡馆已成为人们交换信息、抒发自由思想的场所。

当时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只有像菲尔默的《家长论》这一类鼓吹君主专制的书。菲尔默的《家长论》写于复辟前，由于其反革命性质而未能出版。菲尔默本人也于1653年去世，到了复辟以后，此书才在1680年出版。书中所宣扬的主要思想是：君主是一个社会的家长，就像一个家庭中的子女、妻子都应该服从父亲一样，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王；根据上帝的意旨，绝对君主专制是唯一合法的统治形式；英国君主应享有绝对的、专制的权力；臣民的权利，包括议会的权利，都是由于君主的恩宠才得以享有的，所以君主可以随时取消他以前给予臣民的权利。菲尔默的书出版后，受到复辟王朝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在1684年—1685年间和1695年—1696年间一再重版。

菲尔默的主要论据是圣经的“神意”，而另一个专制君主制的鼓吹者布拉迪则在他的思想寻找历史根据。他宣称，在诺曼征服时，盎格鲁—撒克逊

参见本章第一节。F.S.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1952, P.191.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ress, 1680. in W.C.Costin and J.Steven Watson (ed), *The Law and W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Documents 1660—1914*, Vol.I.1961, P.253.

Peter Laslett (ed), *Par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 of Sir Robert Filmer*, 1942, PP.47—48, P, 83.

人的权利已被全部剥夺掉了，专制王权已交给了威廉一世。议会只是到亨利二世时，才由国王加以召集，它不过是国王的恩赐而已。国王享有绝对的权力是合理的，国王有权将由他召集起来的议会随时解散。

二、17 世纪英国重要的思想家

约翰·弥尔顿

弥尔顿是 17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一生经历了革命、内战、共和国、复辟等几个时期，自幼受人文主义教育，潜心研究科学和诗歌。1637 年—1639 年他曾到法国、意大利等处旅行，在巴黎会见了格劳秀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近郊会见了因科学发现而受到天主教迫害的科学家伽里略，回国途中到过日内瓦。

1644 年 11 月，当议会中的长老派恢复已被革命扫除的书报检查制度时，弥尔顿发表了《为言论自由致议会的呼吁书》(Areopagitica)。文中认为，言论自由是维护共和制度的必要条件。应该实行出版自由，把一切门户打开，让阳光照射到每一个角落。真理犹如永不枯竭的源泉，如果真理之泉不是永远奔流不息，它们就会变成一潭不流动的死水。如果杀死一个人，那不过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但如果是毁了一本好书，那就是消灭了理智本身，因为人都是具有理性的。如果实行言论自由，人们就可以通过自由交换思想和辩论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真理。文中还以伽里略的遭遇为例说明自己的思想。此书在 17—18 世纪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 1905 年俄国革命时还被译为俄文。

1649 年 1 月 30 日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国内王党分子掀起一阵喧嚣咒骂。在 2 月份就有一本名为《圣容》(Eikon Basilike) 的书出版，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年之内在伦敦就再版了 35 次，在国外出版了 25 次。著者以查理一世的口气，记述了他对 1642 年以来事件的看法。王党分子对此书备加赞颂，说它是“无可比拟的、最受敬仰的书”，是一本值得永久纪念的书，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高大。有人甚至说，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查理一世，与其说是一个人或国王，还不如说更似一个神。不过，此书是否为查理一世亲手所写，曾引起长期争论。现在公认的看法是：它原是查理一世在 1642 年以后陆续写的片断感想，后落入苏格兰人之手，最后传到了牧师约翰·高登手中。高登将之整理、誊写，并加了最后的 3 章，然后出版。该书出版后发生了很大影响。为了驳斥由此书所引起的王党分子对革命的诬蔑，弥尔顿

这书的全名是：Areopagitica ;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the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Areopagitica”一词来源于雅典卫城附近的山脉 Areopagus，这里是雅典最高法庭开会之处。

L. Miller, Milton's Areopagitica, 1975, P.309.

Eikon Basilik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1966.

C. Hill,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9, P.172.

Ibid. P. XIV.

C. Wordsworth, Who Wrote Eikon Basilike, Considered and Answered 1842, P.110.

Francis F. Madan, A New Bibliography of the Eikon Basilike, 1956, PP.138—140. H. R. Trevor-Roper, Eikon Basilike, the Problem of the King's Book, in Historical Essays, 1957, PP.211—220.

连科学家艾萨克·牛顿都从这书中抄了一些诗，送给他的女友。J. Carey and A. Foulger: The Poems of John Milton, 1968, P.261.

写了《反对偶像崇拜》(Eikonoklastes)一文。文中指出,查理一世是挑起内战的祸首,人民反抗暴君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在欧洲大陆,君主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也对处死查理一世之举掀起一阵鼓噪。这些人的论点,集中反映在莱登大学教授萨尔马修所写的小册子《为国王查理一世辩护》中。此书是应查理一世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的请求而写的。书中号召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在英国恢复君主制度。为了反击这些反对革命的言论,弥尔顿在1651年受共和国政府之托,用拉丁文写了《为英国人民声辩》。文中反驳了萨尔马修的国王只对上帝负责的说法,指出,国王不过是英国人民的公仆,不论是根据上帝的法律或是根据民族的法律,国王都应该像任何别的人一样受法律约束。当一个国王变成暴君时,人民有权对他进行审判并将之处死。弥尔顿的书传到欧洲后,君主主义者对之气恼之极,在巴黎和普鲁斯被反动分子焚毁。1654年,弥尔顿又写了第二篇《为英国人民声辩》,其中包含了一些自我辩护的自传性的段落。

共和国成立之后,弥尔顿被任命为国务会议的拉丁文秘书,他担任此职一直到1660年复辟时。复辟前夕,他出版了《建立自由共和国的简便途径》。文中为“昔时美好事业”即共和主义辩护,并指责当时四处泛滥的君主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被错误引导的和腐败的人民大众的缺陷”。

复辟后,弥尔顿一度躲避了起来,后被捕,因已双目失明被处以罚金后释放。此后他即隐居,专门从事写作。由他口授,他的女儿笔录下来两首诗和一个悲剧,包括著名的《失乐园》。《失乐园》写于1658年至1663年间。

它引用《圣经》中撒旦反抗上帝,被上帝打入地狱的故事,把上帝描绘为一个被一群阿谀奉迎的天使们所包围的自私自利的暴君,而撒旦却具有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虽被打入地狱,仍尽量设法复仇。诗中反映了著者对复辟王党的憎恨之情。其中关于撒旦和上帝交战的描述,反映了议会同国王斗争的情景。当写到撒旦时,有声有色,铿锵有力,常有强烈的同情语调,但也指出了撒旦的野心和骄横跋扈。这反映了弥尔顿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也可能是他对革命胜利后掌权的资产阶级贪权而谋取自利的不满,其中隐含了对克伦威尔的批判。

不过,关于《失乐园》的中心思想,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不仅对这篇作品,而且对整个弥尔顿的思想评价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说:“弥尔顿是英国诗人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在他身上所引起的争论,甚至比英国革命本身所引起的争论还要多。”英国和美国的天主教徒、君主主义者对弥尔顿恨之入骨,然而进步思想家如英国的布莱克、雪莱,俄国的赫尔岑,法国的米拉波以及美国的杰斐逊等则对弥尔顿的作品评价甚高。英国的宪章派人士大多都是弥尔顿的“知音”。凡是爱好自由、民主,痛恨专制暴政的人,当读到弥尔顿的《论言论自由致议会的呼吁书》时,无不为之感动。一个当代历史家写道:“即使在我们这个老于世故的时代,谁能够不为弥尔顿在《为言论自由致议会的呼吁书》中表现出来的对言论自由的热烈信念而激动不已呢!”

C.Hill, Milton and English Revolution, 1979, P.355.

Ibid.Introduction.

H.N.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6, P.671.

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是 17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曾担任过卡文迪什勋爵的教师，多次随卡文迪什到欧洲旅行。在欧洲，他认识了意大利的伽利略、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革命开始时，他写了《法律要义》、《论公民》，后流亡法国，在那里曾当过后来成为英国国王的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先后写了《利维坦》、《长期议会》等著作。

霍布斯认为，从思想上说，宗教是无知和恐惧的产物，不过，在政治上，宗教教导人们服从，所以还是有益的。根据他的理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之中，那时并无私有制，人们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是天生平等的。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财物而不断争战，人对人像狼一样。后来，人们为了避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订立协约，共同建立管理公共秩序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和平。这时，人们就放弃了原来享有的对一切财物的天然的平等权利，而由国家把这些财物在人们中进行分配，作为各人的私有财产，别人不得侵犯。从此，争战停止，和平到来。他认为，由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因而应该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力的最高权力，人们应该对这个最高权力完全服从。最高权力不能分割。“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统治者，就不可能有政府。” 17 世纪的内战，就是一种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最初是议会同国王争权，后来是克伦威尔领导的军队与议会争权。这是错误的。这种争夺最高权力的思想根源，是作为“叛乱之核心”的大学发布的无节制的“反叛思想”。霍布斯的这种政治思想是很保守的，实质上和中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思想并无区别。在当时，他反映了那些上层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思想，这批人害怕革命变乱，宁愿在君主制的卵翼下安安稳稳地发展资本主义。

詹姆斯·哈林顿

詹姆斯·哈林顿是共和主义者，出身于贵族世家，青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次到国外旅行。1639 年回国后，曾在查理一世的宫廷中任职。1642 年内战爆发后，哈林顿依附于议会。但当第一次内战结束，查理一世作了俘虏后，哈林顿又去当了查理一世的侍从，并受命去同议会谈判。他竭力在双方之间斡旋，企图达成协议，建立立宪君主制性质的政府。当 1649 年初查理一世被斩首时，据说是哈林顿陪他走上断头台的。

1649 年后，哈林顿成了共和主义者。1656 年他发表了《大洋共和国》一书。所谓大洋共和国实际上就是指英国。书中其他假托的名字也是暗指现实的。哈林顿认为英国内战的起因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内战之前，英国传统的政府建立在国王、贵族、人民之间的平衡关系上。但这种平衡关系，由于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94 页，第 131—132 页

Tonnies (ed),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1969, P.77, P.95.

Tonnies (ed),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1969, P.77, P.95.

如 Oceana 指英国，Marpesia 指苏格兰，Emponium 指伦敦，Panthemia 指伊丽莎白一世，Morpheus 指詹姆斯一世，Olphans Megaletton 指奥利弗·克伦威尔等。

土地从国王和贵族的手中转到了人民（主要指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有产者）手中而遭到破坏，因而导致了内战。内战的结果使那些在土地转移过程中掌握了大量土地权的人也掌握政权，达到了新的平衡。

哈林顿采用了培根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即对事实进行收集、观察，然后进行分析、综合，并应用到实践中去，由实践检验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哈林顿在研究政治的时候，首先研究历史。他在《大洋共和国》一书中说：“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是历史家或旅行家，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因为，只有当他知道什么必然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时，他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就是从研究英国历史出发而得出了英国内战必然发生的结论。

哈林顿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引起英国内战的根源的理论，近年来受到英美历史家的重视。著名历史家托尼专门写了一篇《哈林顿关于他的时代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英美历史学界热烈展开的关于乡绅问题的争论中，哈林顿的观点多次被引用。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是个感觉论者。在政治思想上，他以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起源，主张立宪君主制和三权分立。他的政治学说，后来成为辉格派的思想基础。

洛克的父亲是个法学家，曾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工作。洛克年青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语言，后研究政治理论。洛克生活在1632年至1704年，“在他一生的72年之中，他看到了当时在思想界、科学界，以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远比他的祖辈们的时代更为深远、更为迅速的变化。同时，这也是在英国比世界任何别的地区变化得更为剧烈的时代。”他在1667年至1675年和1679年至1682年间先后和当时的重要政治家萨夫茨伯里伯爵两度共事，以后又在1694年至1700年和政府主要政治家苏默尔恩共事。这些对洛克的思想发展都发生了影响，从80年代初开始发表关于政治的论文。1690年，他出版了《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一书。书中批判了菲尔默在《家长论》一书中所鼓吹的君权神授说。菲尔默将君主的权力追溯到《圣经》中的亚当，声称亚当是从上帝那里得到对人及财产的统治权和所有权的，因而君主的权力来源于神，君主的专制是合理的、不可违抗的。菲尔默的书1680年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那些“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愚昧

S.B.Liljegrem (ed) : James Harrington's Oceana , 1924 , P.135.

R.H.Tawney :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 No.27 , 1941.

R.C.Richardson ,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77 , PP.13—15 , 89—90.L.Stone :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1979 , PP.38—39.

H.R.Fox Bourne : The Life of John Locke , 1876 , Vol. .P.466 , Vol , , P.166.J.Locke :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ed.by.P.Laslett , 1988.P.16.

H.R.Fox Bourne , The Life of John Locke , 1876 , Vol.I , P.466 , Vol. .P.166.

P.Laslett (ed) , Patriarch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 of Sir Robert Filmer , 1949 , P.48.参见本节“复辟时期的思想逆流”。

和偏见的撰述者的思想源泉。” 洛克在《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的第一部分中， 针对菲尔默的封建专制理论进行了批判。

另外， 洛克还批判了霍布斯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国家最高权力的理论。 洛克认为财产最初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用劳动创造出来的。 那时国家还未出现， 人们都处于自由、 平等的状态中， 并且享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但由于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互相争夺， 没有判断是非的标准和法律， 为了牢固地保卫这些自由、 平等的权利和私有财产， 就互相缔结契约， 建立国家。 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保卫人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天赋的生存权、 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 这也是国家君主的主要职责。 对洛克来说， 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不受君主的侵犯应受到特别重视。 如果君主不履行契约的有关规定， 人民有权不服从他。 君主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也就是说， 应该建立立宪君主制度。

关于洛克思想的评价， 以前学术界一向认为， 它是资产阶级和贵族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是 1688 年资产阶级和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但近年来， 有的学者根据对洛克的私人文件和资料的分析研究， 认为洛克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 实际显示出它是要求进行一次革命， 而不是为了对已发生的革命的合理性的辩护 ”。

洛克的学说， 不仅对以后英国政治发展为立宪君主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而且对英国和法国思想界也发生了重要影响。

Ibid.P.41.

J.Locke ,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 ed.by P.Laslett , 1988 , PP.141—263.

Ibid.PP.344—345.洛克：《政府论》，中译本，下册，第 77—78 页。

J.W.Gough , J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 1950 , PP.90—92.J.Dunn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 1969 , PP.120—147.

J.Locke , op , cit.PP.398—420.洛克：《政府论》，中译本，下册，第 133—136 页。

J.Locke , op cit , P.47.

第四章 18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

第一节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立宪君主制的建立

王权的衰落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从 1640 年开始，后经过两次内战，到 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时达到最高峰，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经过 1653 年克伦威尔的军事专政，到 1660 年君主制复辟反动逆流到了顶点。以后又经过了复辟时期的曲折发展过程，到了 1688 年“光荣革命”时，历史的钟摆才又摆了回来，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此后历史就以这个新的重心为基点，开始向前发展。

“光荣革命”后的二三十年间，过去长期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余震仍不断发生，主要表现为辉格党和托利党互相争权、互相攻击，但以前长期作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主要因素的国王宫廷和议会的冲突，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王权逐渐受到限制而衰落，而议会的权力却节节上升，终于超过了王权，成为英国政治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机构。

1688 年“光荣革命”后，大商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用当时的形势，尽量扩大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限制国王的权力，逐渐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议会的权力不断扩大的立宪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本来在此之前，除了革命时期之外，行政权完全集中在国王和由国王所任命的大臣手中。这些大臣不过是国王的助手，他们根据国王的指示进行行政管理并直接对国王负责，议会的权力只限于对国王所颁布的命令或法案进行讨论，通过或者否决。除此之外，议会无权直接从事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工作。

1688 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光荣革命”时，辉格党和托利党联合一致赶走了詹姆斯二世，而新国王威廉和玛丽是被他们“邀请”来共同统治英国的，国王的权位事实上为这两个党派操纵。对威廉和玛丽来说，既然是靠了议会里的两党才得以入主英国的，所以对议会限制王权的措施就不得不屈从。同时，“光荣革命”是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口号下进行的，限制王权自然就成了理所当然、光明正大的事了。以后辉格党和托利党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进一步削弱国王的权力，提高议会的地位。除了前述“权利法案”规定“为了缓解[臣民]苦难，为了修改、加强和维持法律，议会必须经常举行”之外，议会又在 1689 年制订了“叛乱法”，规定平时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只能维持一年。该法令通过后，每年都要重申一次，以免国王破坏。同年所通过的另一法案，给予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以有限的宽容。另外，议会还对王室预算的金额和用途作了限制性的规定，议会的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国王在财政问题上有不正当的行为。与同时期欧洲大陆法国和西班牙等一些具有庞大官僚机构的专制国家相比，英国的行政管理部门人员较少，经费不多。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

英国的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外事部门因对法国的连年战争，外交活动较多而有所扩大，其余扩大的机构和人员，主要是那些新设立的机构，如邮政局、关税局和执照局。1707年，苏格兰合并于英国后，新成立了处理有关事务的机构。除此之外，一些老的政府部门，人员都较少。即使国王宫廷和王室管理人员的人数也比以前有所收缩。当对英国中央机构管理人员之少，给一些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英国地方上的各个郡也没有法国与西班牙等国那么多的军事机构和军队，地方上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法律的执行都是当地的乡绅担任的，这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点。另外为了保证议会能经常召开，防止国王排斥议会而独断专行，议会在1694年制定了一个“三年法”，规定议会至少每3年召开一次；各届议会的任期也不得超过3年。关于议会经常召开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连年的对法交战需要大笔经费，这笔开支需要议会通过议案征收捐税解决。所以有人说：“必须定期地或在短期内征收捐税，是必须经常召开议会的最好保证。”在议会通过的许多决定中，1695年废除“书报检查法案”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后这个法案未再恢复，出版事业得到相对的自由。

在英国立宪君主制建立过程中，1701年的“嗣位法”具有重要作用。“嗣位法”除了有关王位继承的规定外，还规定国王所作的任何决定必须由同意该决定的身为枢密院成员的政府大臣签署。此外，还规定以后法官的更动权不再属于国王而属于议会，以后凡议会定罪的人，国王都不能任意加以赦免等。这些规定，包含着原则性的意义，它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司法独立于王权的原则。至于国王所作的任何决定必须由枢密院成员签署的规定，实际上也包含着很大意义，因为它实际上是在防止国王专断独行。当一个大臣对国王的决定表示同意时，他首先必须考虑这个决定是否合法合理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另外，中世纪以来，英国一直盛行这样一条政治原则，即“国王不可能犯错误”，这使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恣意为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现在的这一规定，使原来“国王不可能犯错误”有了新的解释：国王的错误应由签署国王决定的大臣负责，实际上就是有了追究国王错误的法理根据。

内阁制的形成

英国政治中的内阁制是长期演变的产物。早在中世纪的末期，协助君主进行管理并向君主提出建议的“国王大委员会”中产生了“枢密院”。1540年，枢密院正式成立。最初“枢密院”成员约20人，主要由国家官员和王室成员组成。在一般情况下由国王主持会议，并定期召开。会议内容是讨论政府的重大问题。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枢密院成员越来越多，非常庞杂，活动不灵便。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并且在枢密院成员之间就某些问题达

J.M.Beattie, *The English Court in the Reign of George*, 1967, P.18.

J.H.Plumb,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 1967, P.116.

E.N.Williams, *op.cit*, PP.49—50.

G.Burnet,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1753*, Vol. , P.61.

E.N.Williams, *op.cit*.PP.56—60.

成一致意见，以便向国王提出，渐渐在枢密院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组，由一些最有势力的枢密院成员组成。他们把一些重要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查理二世在位时，常把这些少数重要的大臣召集起来，在自己私人的房间（cabinet）开会，征询他们对政府一些重要政策的意见。国王也根据他们的建议来制定政策，而不再去召开枢密院的全体会议，原来的枢密院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安妮女王时，有些大臣虽被撤职，但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枢密院的成员，女王也不去将这些人从枢密院中除名，因为枢密院实际上已形同虚设。

到威廉三世统治时，国王经常与枢密院中这个小集团在一起开会，以征求他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特别是外交问题的意见。本来，威廉三世并不赞成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位时期曾有一年完全未召开过内阁会议，而把军事、外交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因为他经常离开英国到荷兰去，而把治理英国的任务交给王后玛丽，而玛丽缺乏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经验，当时又正值英国同法国进行战争之际，所以不得不召开内阁会议，以征求大臣们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威廉三世也强调指出，当他不在国内时，“所有的重要事务，无一例外都必须于王后在场下的内阁中进行讨论”。这种会议仍在一个小房间（cabinet）中举行，人们开始称这种会议为内阁（cabinet）会议，意即在小的密室中举行的会议。这时，内阁成员一般为9—16人，他们之间是否能取得一致意见并不重要。内阁成员的人选，也常常由当时在政府中掌权的大臣如桑德兰、施鲁斯伯里和马尔波罗等操纵。他们向国王提出人选，由国王指定。政府中的一些高级官员都力图参加到内阁中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到安妮女王时，内阁会议的召开已有固定的日期，当时一般都是在星期日举行，参加人员也渐渐固定为少数几个高级大臣。这几个大臣本来也是内阁会议的一般成员，但是在内阁会议开会时，为了使会议更有效、更有准备，他们就事先举行碰头会，讨论将要向内阁会议提出的建议，并就这些议程拟订初步的意见。这样少数几个人的碰头会，由于经常举行，渐渐变成了实际上的“有效”内阁。而原来由较多的人组成的内阁却变成没有实权的“名义”内阁了。以后，名义内阁停止召开，只剩下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有效内阁”。不过直到1714年以前，内阁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定的组织，内阁中也还没有“首相”这一职位。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虽然她经常参加内阁会议，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内阁所通过的决定而已。一般说来，安妮女王很少过问政事，内阁所通过的决定也从未受到她的阻挠。虽然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行政权仍在国王手中，但自从“光荣革命”以来，君主制下最高权力的非个性化过程却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安妮女王时议会所通过的一些法案，在讲到国王的时候就好像讲到政府一个最高行政部门一样。

到汉诺威王朝时，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以外国人的身份入主英国。他们不但对英国的情况不熟悉，无从制定适合国情的政策，而且不会讲英语。在

以前的一些历史著作，因为未利用荷兰文的有关史料，认为威廉三世不大过问英国政府的政事，实际上威廉三世因为对军事和外交事务比较熟悉，所以对政府中许多大事都亲自过问。S.B.Baxter, *Recent Writings on William*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Vol.37, 1966, P.264.

G.Holmes (ed) ,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 1978 , P.51.

M.A. Thomson ,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642 to 1801* , 1936 , P.182.

内阁会议中，要用拉丁语才能同大臣们交换意见，颇为不便。乔治一世甚至把出席内阁会议当成了负担，不再参加。在内阁会议中掌权的辉格党人，利用这一情况将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慢慢疏远国王。久而久之，国王不出席内阁变成了惯例，内阁只须在会后把讨论情况通知国王就行了。事实上，从1714年以后，国王也从来没有否决过议会的议案。不过，到这个时候，最高行政权从国王向内阁转移的过程并未完成，从宪法角度来看，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内阁会议开会时，在国王不出席的情况下，为了在讨论时取得一致意见并把意见集中起来通知国王，渐渐在内阁大臣中出现了一个主持讨论的人。国王本人也感到有了这样一个人可以使意见容易集中，避免分歧，既有利于他对内阁意见的掌握，也有利于使内阁的意见在议会获得通过。这样，在内阁会议中就渐渐突出了一个主持内阁会议的领导人物。最初，这个人物并无固定称谓，所谓“首相”（Prime Minister）是后来才出现的名称。首相的另一称呼“Premier”是一个法文词，可见不是英国所固有的事物。而且在安妮女王的时候，有时在称呼“首相”时用的是复数“首相们”，以指那些首要的大臣们。

后来沃波尔在内阁中实际上起了首相的作用。当时他的政敌称他为“首相”含有讽刺的意味，认为他不适当地突出自己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同僚，违反了宪法精神。1741年有人公开指责沃波尔攫取大权，突出个人，以首要大臣（首相）自居，侵犯别人的权限，违反宪法精神：“根据我国宪法，我们并无唯一的和首要的大臣（首相），我们应该在国家事务上经常设置若干个首要的大臣们和官员们。每一个这样的官员都有他自己的适当的部门，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干预属于别人的部门的事务。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位大臣（按指沃波尔）却攫取了我们所有其他公务顾问们的独立权限。他不但享有对所有公共事务的单独指导权，而且把那些不接受他的指使的公务人员都撤除了。”面对这样的指责，沃波尔为自己辩解说：有些人“……首先硬是说我具有一种令人可笑的高傲，并把我形容为一个首要大臣（首相）。他们把那种不能容忍的贪权的行为归咎于我，而这不过是他们捏造出来并强加于我的。”沃波尔自己从来未组织过内阁，也没有在下院领导过一个多数派。在1742年他下台时，他的同僚们并未因此一齐辞职，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后世那些首相的职能还处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尚未成定规。

二、议会权力的增强

政治观念的演变

自 17 世纪 40 年代革命以来，王权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君权神授和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原则也无法复活了。虽然在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 1688 年“光荣革命”后，另一个国王又登上了王位，但是这时议会和国王的的关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是由国王来召集议会，而是由议会“邀请”国王来登位。所以从 1688 年以后，议会颁布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国王的举动，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王权的削弱和议会权力的增强成为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倾向。

在封建时代，对国王不忠是大逆不道的叛逆罪。但是到了专制君主制的统治发生危机时，这一概念已发生动摇。1629 年 3 月议会在一份“抗议书”中说：凡是推广或引进天主教或阿米尼安教，从而改变英国现有宗教者，“都将被谴责为王国和全体国民的大敌”；凡是不经议会同意而主张或实际征收吨税或磅税者，“也将被谴责为王国和国民的大敌；”凡是不经议会同意而自愿交纳吨税和磅税的商人，“也将被谴责为英国自由的叛徒和敌人。”这就意味着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和意志高于国王。对国王的不忠，并不就是对公共事业的背叛。1649 年，英国高等法院以英国人民的名义宣判国王查理一世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并将之斩首，国王的地位更降到国家和人民之下。“光荣革命”时，英国王家海军曾站在詹姆斯二世一边，企图阻止威廉到英国来登位。威廉在谴责这部分海军的时候并不是谴责他们公然反对国王，而是说这些人是不列颠王国的敌人。另外，议会在 1696 年和 1707 年所制订的法令规定，当国王去世的时候，议会仍应继续开会，枢密院和民政的、军事的官员们仍应留在自己的职位上 6 个月，除非继任国王将他们解职。这些都说明，将近 100 年以来政治斗争的反复错综的发展和王位的几番更迭，使得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再也树立不起来了。

议会除了采取法律手段来削弱国王的权力之外，还力图通过控制财政权来使国王不能任意动用国库作不正当的开支。1688 年以后，国王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继承下来的王室岁收。不过这笔款项每年只有 70 万镑，虽与克伦威尔护国政府时相比增加了 7 倍，但维持宫廷和民政管理之用仍是不够的，当时由于对法国的连年战争共花费了 1.3 亿镑。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10 年—1711 年），一年的军事费用相当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 11 年的军事费用。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每年的军事费用为 165 万镑。而威廉三世时每年的军事费用相当于这个数字的 3 倍。安妮女王时每年的军事费用又增加到相当于这

J.Rushworth (e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Private Passage of State*, Vol. , 1659, P.670, from J.P.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966, P.85.

S.R.Gardiner (ed),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27, P.377.

W.C.Costin and J.S.Watson (ed), *The Law and Wor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Documents*, Vol. , 1961, P.84, P.113.

个数字的 5 倍，因此政府财政状况甚为紧张。如果国王需要更多的款项，则必须经过特别的手续才能拨付。从 1690 年起议会对政府的费用规定了专门的用途，不能随意挪用，而且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政府的开支。到了安妮女王统治的末期，财政部每年把预算提交议会审查已成为惯例。

在外交事务上，议会也对国王的权限进行干预。威廉三世即位之初，由于他对外交事务比较熟悉，并且可以代表荷兰、英国两个国家在外交场合活动，所以许多外交政策都由威廉自己直接制订。但到 17 世纪末，威廉在对外政策上遭到一连串挫折，议会中即发出了不满之声。1701 年的“嗣位法”作出一条规定，即英国人不能由于一个外国国王而卷入一场保卫不属于英国领土的战争。这一规定使威廉三世在外交活动中不得不考虑议会的意见，不敢擅自作主了。

议会的选举

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英国的议会选举有某些改进，增加了一些选区，选民人数也逐渐扩大。到 1715 年大选时，英国的选民人数达到 250,700 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从 1689 到 1832 年改革时的任何一次议会选举的选民人数。它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4.3%，在成年男子中几乎每 5 个人就有一个选民。不过，在 18 世纪初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的议会选举仍实行古老的制度，选区的分配并不按照各地区的人口数字，选举权也不完全一致。一般是自由产业所有者年收入 40 先令以上的人拥有选举权，只有少数选区（大约 12 个左右，包括威斯敏斯特选区）实行接近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制度。

议会下院的议席英格兰和威尔士共 513 个，苏格兰 45 个。选区并不是按照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人口数或范围大小来设置的，在英国南部和西南部，选区最多。下院中有 1/4 的议员是由 5 个郡选出的，它们是：康沃尔郡（44 个议席）、德文郡（26 个议席）、多塞特郡（20 个议席）、索默塞特郡（18 个议席）、威尔特郡（34 个议席）。有些选区居民人数很少，但根据古老的传统仍有选举权。例如，在萨里郡的加顿，只有 6 间房子、一个选民，但仍享有选举一个议员的权利，因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就把这个议员席位的选举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议会选举中的这种腐败现象，受到当时许多人的谴责。约翰·洛克、丹尼尔·笛福、大卫·休谟、乔那桑·斯威夫特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此痛加批判。洛克曾讽刺说：“一个城镇，只要凭它的名字，就可以选派和一个郡同等数量的议员。”在一本据说是出自丹尼尔·笛

G.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1978, P.22.

E.N.Williams, op.cit.P.59.

W.A.Speck, Tory and Whig: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encie, 1701—1715, 1970, PP.16—17.

有的学者估计当时英国的人口数为 550 万人（苏格兰人口约 100 万人不包括在内）。但有人不同意这一估计。在 1801 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只有格里高里·金（Gregory King）在 1695 年根据炉灶税的数额计算过当时的英国人口数，其他学者的估计可能只是一个约数。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7, PP.5—6.

J.H.Plumb,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79, PP.38.

Cf.J.Ca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 1973, PP.24—25.

福手笔的小册子中，详细地揭露当时选举制度的腐败。他指出，在康沃尔及其他许多郡中，一个郡的所有自由持有农中只能选出 2 名议员，而这个郡里的城镇则可选出 40 多名议员。他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深表愤慨。

由于选举是以公开方式进行的，所以出卖选票、收买选民，以及威胁利诱等现象司空见惯。由于议会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地位的重要，它成了许多想升官发财人的终南捷径。所以议员席位的价格也不断增长。在一个地方，1689 年 8 镑 6 先令 8 便士可买得一个议员席位，但到 1727 年，一个伯爵为买这个席位却花了 900 镑。那些靠掠夺印度人民而发财致富的纳博布，成了购买这些议员席位的主要主顾之一。政府也公开在选举上舞弊，它除了通过国库进行收买贿赂之外，还通过授予关税职务及其他官职来控制选举。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之下，议会议员的选举就被操纵在少数人手里。18 世纪中叶，上院的 51 个贵族和下院的 55 个议员操纵着 192 个议员席位的选举。在苏格兰，所有各郡的议员实际上是由不到 3000 个选民选出的。而这 3000 个选民中，有一半是由地主制造出的所谓“法格特”选民。 —

D.De foe, *The Freeholder's Plea Against Stock-Jobbing Elections of Parliament Men*, 1701, PP.16—19.这本小册子一般认为是出自笛福之手。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1977, P.117.

J.P.Plumb, *op.cit.*P.39.

“纳博布”(Nabob),指 18、19 世纪那些在印度掠夺了大量财富的人。这个名词来源于“纳瓦布”(Nawab),它原是莫卧儿某些王公的称号。

第二节 辉格派的政治优势

一、辉格派政治优势的建立

辉格派和托利派

辉格派和托利派这两个名称是在 17 世纪末围绕着对詹姆斯二世是否能继任国王这一问题的分歧而产生的，不是近代意义的政党。“光荣革命”以后，虽然这两个名称继续存在，但它们仍然只是指一些不固定的派别，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只能说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或政治思潮。辉格派和托利派之间的分歧“并非集中在特定的问题上，因而在政治上无法划定一条把它们区别开来的界限。”但在 18 世纪初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上的自由和公开化，每个政治家都可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反对他所不同意的政策和政治人物。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关心政治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好恶，所以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人物的政治态度，一般比较清晰可辨。而且这个时期政治上发生分歧的两派是后来党派分野的直接渊源，所以将“辉格”党和“托利”党应用到这个时期的不同政治派别和人物身上，并无不当。至于有的学者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词，不仅可以应用到 1702 年—1714 年几乎每一个下议员身上，而且可以应用到所有上院的贵族议员身上，甚至可以应用到参加议会选举的大量的选民身上”，则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随着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两个党派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辉格党现在不再害怕君主专制卷土重来，因为君主的权利已受到种种限制，君主成为统而不治的虚位，他们对这种受到限制的君主制积极拥护。而托利派也不再坚持专制君主制的要求，因为这种恢复旧王朝的企图遭到了不断失败。同时在两派的内部也分别产生了分歧。辉格派内部分裂为“爱国者派”（站稳立场派）和“宫廷派”（丧失立场派），托利派内部分裂为“詹姆斯党人派”和“汉诺威派”，其中一部分“詹姆斯党人”在 1715 年支持“老僭位者”，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但他们的阴谋遭到失败。这种复辟旧王朝的思想即使在托利派内部也不得人心。真正坚持复辟旧王朝的人很少，有不少托利党人对此抱消极冷淡的态度，另有一些托利党人公开表示反对。实际上这次事件使托利党的声望大为跌落，1745 年苏格兰的“小僭位者”查理王子发动叛乱时只有少数极端托利分子参加。

辉格派和托利派虽然在政治上并无重大原则性的区别，但他们在物质利益、租税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为争取制订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利用官职来提高自己的权势和钱财收益，为争夺议会的议席和内阁的官职，双方展开不停的争斗。由于辉格派和托利派时而这个时而那个在议会中占多

Robert Willman, *The Origin of "Whig" and "Tory"* in *English Political Langua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XVLL, 1974, PP.247—264.

Sir Lewis Namier,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1, PP.179—180.

G.Holmes,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 1967, P.382.

R.Sedgwick (ed), *John, Lord Harvey, Memoir of the Reign of George*, 1931, Vol. , P.3.

数，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三世感到最好是任命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的成员作为内阁大臣，以免在政治事务上互相掣肘。1694年，辉格派在议会里占了多数。这时，威廉三世恰巧又离开了英国，回到他的故乡荷兰，一去数月未归，而这年冬天，王后玛丽又因患天花去世。国内政府需要一个政治家来“管理”（当时人的说法）。本来，这时在政府中桑德兰的势力最大，而且他为人精明、圆滑、经验丰富，但他不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受人攻击。于是他就拉拢辉格派的“小集团”（Junto），叫他们出来组织政府。辉格派“小集团”是一些为了权位而不顾原则的人，他们竭力支持威廉三世与法国为敌的外交政策，“小集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苏默斯、蒙塔古、瓦顿、罗素等人，虽然个性、脾气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不像查理二世时的“卡巴尔”小集团那样，彼此倾轧、争斗，而是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渐渐地权力揽在自己手里。不过，威廉三世对辉格小集团并不十分信任，他只想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桑德兰也一向反对由清一色的辉格派组织政府，他认为威廉三世应该“使他的政府有尽可能广泛的基础，并尽可能的巩固。”这次叫辉格“小集团”掌权，无非是权宜之计。所以辉格派“小集团”虽然建立了一党政府，但地位并不巩固，到1698年托利派在下院占多数时，就改由托利派组织政府。这一原则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制度，即哪个政党在下院占多数，即由哪个政党组织内阁。

辉格派政治上的优势

在争夺议会席位和政府官职的斗争中，辉格派终于取得了托利派的明显优势。从1714年到1761年，辉格派长期执政并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辉格派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优势，主要是因为辉格派的政策得到乡村里的大地主的支持，城市里的商业资产阶级也拥护辉格派的信贷制度和保护关税的政策。辉格派当政时又制订了有利于自己的法案，因而使他们的政治优势得以巩固。这些法案先后制订于1707年和1710年。1707年的法案规定，如果一个议员获得领取政府薪俸的职务，那么就失去议员的资格，不过如果他在补缺选举中重新当选，则仍可以继续任议员。这个法案表面上是防止议员担任政府官职，但实际上当时辉格派政治势力强大，经济力量雄厚，而且议会选举贿赂盛行，所以他们可以使辉格派的议员重新当选。而托利派在这方面就无法与之抗衡。1710年的法案规定，年收入600英镑以上的人才能担任各郡的议员，城市居民必须拥有3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才能担任议员。这是指纳税后的数字，实际收入还应比这大得多。这就使城乡中下层人士无从问津议员资格。而托利派在乡村的中等绅士，很少有人每年收入达到600英镑，而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则更少拥护托利党的人。

托利派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不得人心，也是辉格派趁机崛起，长期执掌

“Junto”一词是从1695年春天起人们对辉格派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称呼。“Junto”一词来源于西班牙语“Junta”，意为小集团。

E.L.Ellis, William and the Politicians, in G.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1978, pp.125—126.

E.N.Williams, op.cit. pp.189—190. pp.192—193.

政权的重要原因。早在 1713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托利派政府订立乌特勒支条约时，人们就认为这个条约使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托利派啧有怨言。托利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博林布罗克和奥蒙德公爵等人，看到在国内的政治阵地逐渐丧失，就先后离开了英国，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詹姆斯党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活动上，他们加入了詹姆斯党的老僭位者的行列。但博林布罗克同奥蒙德公爵的意见不一致，博林布罗克主张率领叛军在英国南部登陆，然后号召英国的普通人民起而响应。奥蒙德公爵则主张在苏格兰起事，从苏格兰攻入英国，同时奥蒙德公爵坚持君权神授的原则，认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不论品行如何，都应按照传统的王位继承原则继承王位。两人争执不下，直到 1715 年 9 月，马尔伯爵率军拥戴老僭位者在苏格兰起事，才终止了两人的争论。

伦敦的英国政府早就得知斯图亚特王朝的老僭位者企图掀起叛乱，夺取王位的消息，所以在马尔伯爵正式起事后不久，政府就派了阿吉尔公爵率领军队前往镇压。虽然阿吉尔公爵领导下的军队在数量上只相当于苏格兰老僭位者叛军的三分之一，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所以经过数月的对峙之后，马尔伯爵的叛军最后遭到失败。

这一事件之后，托利派的声誉扫地。辉格派以此为口实，把托利派说成是詹姆斯党人，而且进一步把其他一些反对辉格派的人士也说成是詹姆斯党人，使辉格党人势力大增，加上他们竭力表示拥护信奉新教的国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而得到国王的信任，在政府中独揽大权。1745 年小僭位者的叛乱失败后，托利派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跌落。从 1721 年至 1761 年，辉格派独掌政权达 40 年，在两党角逐中占了明显的优势。

沃波尔的执政

从 1714 年起，辉格派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它的领导人罗伯特·沃波尔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721 至 1742 年他一直是内阁的领导人。

沃波尔出身于诺福克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701 年当选为议会议员，参加了辉格派。1714 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次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托利派掌权时期（1710 年—1714 年），他和马尔波罗等辉格派遭到打击。在军队中，马尔波罗以前任命的一些军官被解职，而沃波尔则被控以贪污罪，投入伦敦塔监狱。由于托利派的内部矛盾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中不少人参与了詹姆斯党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活动，使他们声名狼藉。到 1714 年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继位时，形势已变得明显有利于辉格派。不过，由于辉格派在当时缺乏公认的有权威的领导人，以沃波尔、

H.T.Dickinson, *Bolingbroke*, 1970, P.138.

Isaac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1966, PP.120—121.关于托利党人和詹姆斯党人的关系，近年来在历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大多数托利党人都是詹姆斯党人。（E.Cruikshanks, *Political Untouchables*, 1979.）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托利党人忠实于汉诺威王朝的新国王，并不热衷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L.Colley, *In Defiance of Oligarchy: The Tory Party 1714—1760*, 1982.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曾亲口对外国驻英使节讲过，他们觉得任命辉格党人担任政府官职比较可靠，而对托利党人则表示反感。J.Black (ed), *Britain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4, P.6.

唐森德和斯坦霍普、桑德兰为首的两个派系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分歧很大，互不团结，所以从 1715 年到 1721 年之间，英国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是这两个派系的斗争，辉格派的政治优势还未稳定下来。

沃波尔在处理轰动一时的“南海泡沫”事件中，挽救了南海公司，使之免于彻底破产，因而得到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热烈赞扬和支持，使他名声大噪。

所谓“南海泡沫”事件，即南海公司破产事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8 世纪初，英国由于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特别是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 年—1714 年），开支庞大。为了弥补不断增长的支出，政府除了向英格兰银行（1694 年成立）借债外，还向一些商业公司借债。这些商业公司中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从国债中收取政府支付的利息，迅速发财致富。1711 年，这些国债持有人将他们的短期国债作为股本，建立了南海公司。该公司主要与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贸易，并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1714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乌特勒支和约规定，英国商人可以同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直接贸易，不必再由西班牙人从中转手，同时也规定英国每年可以派一支船队贩运黑人奴隶到西属南美，因而公司把主要目标投向金融投资事业。为了使自己的目的得逞，公司大施拉拢贿赂等手段，政府里的许多大臣接受了他们的贿赂。1718 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全部国债的计划。1720 年，该计划经过修改后被议会通过，除了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国债之外，所有英国的国债都由该公司承包。南海公司为了进一步搜罗资金，大量发行股票并提出种种诱人的诺言，一时之间各地掀起了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热潮。但为时不久，有人产生怀疑，随即转而抛售该公司的股票。股票价格一跌再跌，许多人因而破产。当时有人说，在这次事件中遭到毁灭的人，甚至比伦敦大火和一场瘟疫所毁灭的人还要多。人们讽刺地称这次事件为“南海泡沫”，意即南海公司的招摇撞骗像气泡一样不切实际。国内一片混乱，许多大臣因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贿赂而声名狼藉，甚至连王室也牵连到这一丑闻之中。这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沃波尔，因为他是少数未接受南海公司贿赂的大臣之一，而且素有善于理财的声誉。1720 年秋，沃波尔接受国王的委托，着手整顿南海公司的股票，并将国债重新分配，逐渐控制住了股票下跌的势头，国家财政状况趋于平稳。沃波尔的这一措施，深受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感戴。1721 年 3 月，沃波尔再度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年桑德兰去世，沃波尔即继任为第一财政大臣，实际上，在 1720 年沃波尔已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在桑德兰之后继任第一财政大臣，不过是将这种地位加以合法化而已。以后直到 1741 年，沃波尔一直担任此职。当时财政大臣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不但政府的各项活动必须有大量财源作为基础，而且在议会议员选举及议会活动时，由于贿赂公行，有了大量金钱，就可以操纵议员的选举和影响议会的活动，从而通过议会来达到政治目的。因而，如能掌握政府的财政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命脉，掌握了一笔用以政治活动的“秘密服务资金”。因此，在当时英国的内

W.A.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1977, P.198.

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1977, P.173.

J.H.Plumb,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 1979, P.172.

J.H.Plumb, *Sir Robert Walpole*, Vol. , 1956, P.358.

阁成员中，财政大臣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沃波尔被任命为第一财政大臣后，人们有时称他为“首要大臣”即首相，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在各大臣中处于首要的地位。在沃波尔担任第一财政大臣职位期间，其他各大臣名义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实际上都听命于他。在讨论或执行政策的时候，往往唯他的马首是瞻。名义上，他本人也是由国王任命的，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却主要依靠议会里的辉格派议员的支持。事实上，沃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

二、英国政府 18 世纪上半叶的内外政策

沃波尔的国内政策

沃波尔当政初期，整个政治环境对他非常有利。托利派因为有人参与了詹姆斯党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其影响大为跌落。沃波尔抓住这个机会不断败坏托利党的名声，以提高辉格党的政治地位。托利派内部分裂，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且贪财图利，进一步败坏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南海泡沫”危机期间，辉格派的一些大臣也牵连进丑闻中。托利派本可以趁机抓住辉格派的这一弱点，在政治上进行反攻，然而由于它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未能借此扭转不利的形势，致使 1720 年—1725 年辉格派势力迅速增长，许多托利党人转投到辉格党人方面来，托利党人被排挤到政治舞台的边缘，只能到地方上谋取一官半职。沃波尔的政治地位如日东升，不断伸张。

沃波尔执政后，他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内的财政经济，消除人们由于“南海泡沫”事件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和恐慌的心理，进而树立起政府的威信，同时采取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虽然议会里有一个占多数的辉格派支持他，但在政府部门中却有一些过去追随桑德兰伯爵的人对他不完全顺从，他需要把这些人清除，换成拥护他的人，以便把政治管理权、指挥权更有效地运用起来。要实现这些目标，他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年代后，英国各阶层人士也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

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幸而有几件事，使他的政敌势力受挫，沃波尔的威信进一步增长。在这方面，他遇到了很好的机遇，他的政敌斯坦霍普去世后，1721 年桑德兰也去世了。1721 年—1722 年有 7 个主教区的主教职位空缺，沃波尔即任命拥护他并为他所信任的辉格派人士担任这些职务。桑德兰旧日的亲信围绕在国务大臣卡特莱特周围，不断对沃波尔发起攻击，并挑动爱尔兰的托利派反对沃波尔。沃波尔当机立断，揭露卡特莱特的破坏活动，并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责成他去平息由他引起的麻烦，否则将对对他进行追究。卡特莱特无奈，只得照办。卡特莱特是一个十分傲慢自大，又很懒惰的人，他的政治势力的跌落，使沃波尔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少了一块绊脚石。沃波尔就这样巧妙地消除他的政敌的残余势力。1714 年辉格派刚执掌政权时，由于内部纷争及政敌的干扰，政局仍有些摇摆不定，但从 1720 年起，辉格派的政策“已变得比较明确，并且朝着确定不移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沃波尔在排除了这些政敌以后，地位日益巩固。而这时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国际上的和平环境，更有助于他的威信的不断增长。

沃波尔当政时期，英国的经济稳步增长。从 1720 年到 1740 年，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 6.5%。国内经济的增长，是和沃波尔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分不开的。为了鼓励农业和工商业，他改革关税制度，鼓励谷物和农产品

J.Black (ed). Britain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4, P.23; R.Sedgwick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715—1754, 1970, Vol. , PP.30—31.

J.H.Plumb,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 1979, P.176.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7, P.78.

出口，并对许多出口商品免税，对英国手工工场所需要的一些原料产品则免除或降低进口税。沃波尔的财政改革，内容具体明确，它并非仅仅是财政上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英国长时期以来所追求的财政政策的继续。早在 17 世纪末，英国为了刺激本国商品出口已减免了一些商品，如布匹、肉类、谷物、面包等的出口税。经过 1721 年沃波尔的财政改革，这一过程有了进一步发展。不过，对煤的出口不但未减免出口税，而且到 1714 年后出口税还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国外市场需要英国的煤，增加出口税可以提高煤价，获取更大利润。对那些可能与本国工场产品竞争的商品，则禁止进口。为了防止走私，从 1723 年起对茶叶、咖啡、可可等征收消费税，实行货栈制。所谓货栈制，就是商人在输入商品时，可将商品暂时存到国家设立的货栈，如果这些商品不运往国内市场销售而是直接转运到国外的市场，则无需交纳关税，如果运到国内市场销售才交关税。实行货栈制后，上述几种商品可以在进口后再顺利出口，这就减轻了商人的负担，同时也提高商品运转的效率。

沃波尔除对上述几种货物征收消费税外，还考虑从其它地方开辟财源。但他不愿增加土地税，而且还设法使原来的土地税稍稍降低，因为下院政府和宫廷的许多官员都是地主。这样做在政治对他有利。不过，当他提出征收盐税时，却由于遭到议会反对而未通过。1727 年，他设立减税基金来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开支。减税基金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的，为了偿付国债，反过来又需要增加税收。1733 年，沃波尔制订了一个消费税法案，目的是向烟、酒开征消费税。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有人声称这将增加他们的负担，普通百姓则担心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以后如全面对其他消费品都征税将会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在博林布罗克的领导下，沃波尔的政敌展开攻击沃波尔的宣传。博林布罗克的朋友伦敦市长约翰·巴贝尔组织了伦敦城区的抗议活动，辉格党人约翰·巴纳德爵士则领导议会里的伦敦议员反对消费税。他们的刊物《工匠》更是集中火力抨击沃波尔的消费税法案。一时群情激愤，各地纷纷向下院递交请愿书，表示抗议。沃波尔见众怒难犯，只得急流勇退，将消费税法案撤回。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

1603 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成为英国国王（即詹姆斯一世）后，两国共有个君主，但苏格兰仍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在此后的 100 年中，英国和苏格兰常常发生争端，英国政治家多次试图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但终未成功。威廉三世统治时要求政府中的大臣戈多尔芬和马尔波罗在议会提出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议案，这个议案 1707 年获得议会通过。苏格兰议会经过长期争论，也通过了关于合并的条约。

英国政府之所以竭力主张同苏格兰合并，主要是出于战略地位的考虑，因为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仍企图以苏格兰为基地进攻英国，在英国复辟，而英国的宿敌法国也企图联合苏格兰打击英国。英国对卧榻之旁的这

C.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1966, PP.267—270.

H.T.Dickinson, *Bolingbroke*, 1970, P, 233.

S.B.Baxter, *William*, 1966, P.375.

个怀抱敌意的邻国一直怀有戒心，只有实行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方可一劳永逸解决这个忧虑。在这方面，不仅英国王室和政府，而且大部分辉格党的政治家也深感为了坚决与法国这个敌人斗争，并断绝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党人的复辟梦想，有必要与苏格兰订立合并条约。另外，英国政府还认为，与苏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军队可以作为同法国、西班牙等进行斗争的一支力量。不过，托利派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则反对与苏格兰合并，因为他们觉得苏格兰太贫穷，和它合并不免会拖累英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托利党人比喻说：“如果一个人与一个女乞丐结婚，那么只可能得到一只虱子作为嫁妆。”托利派反对合并的另一条理由是苏格兰人信奉长老会宗教，和英国国教不同。然而，现实的需要更为有力，特别是1701年英国制订“嗣位法”时，苏格兰并未制订相应的法律，这就有可能在安妮女王之后发生王位觊觎者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件。英国必须及早预作防范，对苏格兰这个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基地作相应的处置。

在苏格兰方面，在英国的安妮女王即位之际苏格兰人并无任何要求与英国合并的迹象，相反朝野上下仍弥漫着反对英国的情绪。1705年，英国船长格林的一艘船在驶往伍斯特途中，被苏格兰人以“海盗”的罪名扣押，随后格林和另外两个船员被处决。苏格兰反英的歇斯底里气氛甚嚣尘上，后经英国和苏格兰互派特使进行交涉关系才缓和。1706年—1707年，苏格兰议会大多数人同意合并。苏格兰大多数人为什么在1706年—1707年之前一直反对合并，而到了1706年—1707年议会讨论合并时却一反常态，赞成合并？这一问题在历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不是一种“诚实的和正当的行为，而宁可说是一种‘政治把戏’”。并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英国政府贿赂、收买了苏格兰议会议员的结果。当时有人也作过这种猜想，有一个亲眼见到苏格兰议会通过这个合并条约的詹姆斯党人说，这些苏格兰议员所以在1706年11月至1707年间投票赞成合并，“完全是为了金钱和官职。”但当时也有人认为，“这些投赞成票的人，是按照他们的良心觉得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勇敢地不顾敌人的攻击而这样做的。”这些看法究竟谁是谁非，难以断言，然而有一些客观因素却是无可怀疑的。在17世纪以来的100余年时间里，苏格兰的对外贸易已从以法国、欧洲西北部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为主要对象，逐渐转移到以英国为主要对象，如果能通过合并撤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关税，对苏格兰的牲畜、谷物、小麦向英国出口将大有好处。另外，英国的“航海条例”使苏格兰人无法直接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进行贸易。苏格兰的农业发展缓慢，必须发展对外贸易，才能维持原有的经济状况，而英国当时经济繁荣，又与苏格兰毗邻，其优越的条件非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可比。即使从政治上看，苏格兰同英国合并也利大于弊。因为苏格兰的高地人大多支持詹姆斯党人，而苏格兰的低地地区则是长老会的天下，两种势力，常起纷争。如果来日苏格兰高地人支持詹姆斯党发动叛乱反对英国，必将引发同英国的战争，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了以上这些客观因素，苏格兰议会通过合并条约也就不足为怪

T.C.Smout, *The Road to Union*, in G.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1978, P.176.

W.Ferguson, *The Making of the Treaty of Union of 1707*,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XL, 1964, p.110.

G.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1978, P.194.

了。

根据 1707 年 5 月 1 日通过的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条约，合并后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一个国家，苏格兰人可产生 16 名上院议员、45 名下院议员参加议会，两地自由贸易，统一关税。这样，从 1603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共有一个君主以来，现在又有了一个共同的议会和统一的经济。不过，苏格兰仍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宗教信仰。

18 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政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继英国在 16 世纪击败西班牙，17 世纪击败荷兰之后，到了 18 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地方面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在 1701 年—1714 年间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两国展开了正面冲突。

1700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欧洲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按照王朝世系，有继承权的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外孙，路易十四主张应该由他的孙子安茹大公菲利普继承西班牙王位。另一人为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他也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外孙，是菲利普三世小女儿的儿子，巴伐利亚选帝侯。他是现任国王查理二世妹妹的孙子。但从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来看，英国和荷兰等国绝对不能容忍法国或奥地利由于继承西班牙王位而与西班牙合二为一。所以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布他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后，英国即与荷兰、奥地利结成“大同盟”反对法国，后来葡萄牙及德意志的一些小邦也参加到“大同盟”中来。

“大同盟”的军队，在英国的马尔波罗和萨伏依的欧仁公爵指挥下，于 1704 年—1709 年取得了对法国军队的一连串的胜利。英国军队先后攻占了直布罗陀（1704 年）、米诺卡岛（1708 年）和新斯科舍（1710 年）。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为了争夺经济霸权，特别是西印度群岛财富的斗争。事实上，这次战争的本质也正在于此。但对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英国的新教国王的王位合法性问题。如果法国继续支持詹姆斯党人在英国从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活动，英国政府的地位将不得安稳。从 1715 年老王位觊觎者叛乱时起，英国政府的当权者最关心的是信奉新教的国王的继承权问题。这一问题直到 1745 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失败后才最终解决。

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国内对这次战争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最初，分歧发生在威廉三世和托利党人之间，后来，分歧发生在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用什么战略才能更好地扼制和击败法国。托利党人反对辉格党所领导的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到攻打法国陆地上设防坚固的堡垒之上，认为这样将使战争旷日持久，耗费不货。他们主张攻打法国的薄弱环节，即法国的港口和海上通道。同时，这次战争费用庞大，有些托利党人坚决反对继续战争，主张尽早缔结和约。这次战争共耗费了 1.3 亿镑。仅 1710 年—

1711年一年所用去的费用就相当于查理二世时11年所用的费用。

在托利党人的不断攻击下，1710年6月至9月，安妮女王任命了一些托利党人参加政府，以替代原来的辉格党人。“所有这些变动的主要动机，是由于对和平的‘绝对需要’。”托利党人的政府随即与法国进行和谈。1711年12月达成了初步协议，1713年在乌特勒支订立了和约。条约规定：法国承认英国新教国王的继承权，法国、西班牙分立为两个国家；法国割让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德逊湾给英国；西班牙割让直布罗陀、米诺卡岛给英国；西班牙与英国订立协议，规定英国每年将一船非洲的黑人奴隶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

乌特勒支条约使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增强，虽然在制订乌特勒支条约时，在英国国内及“大同盟”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最后条约的内容证明英国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强国。到了30年代，法国又与西班牙订立联盟，共同反对英国。法国答应帮助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回直布罗陀，西班牙则同意取消英国在西班牙殖民地从事商业贸易的特权，将之转交给法国。此后，西班牙即着手限制英国在西属殖民地的贸易活动，造成英国船只同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冲突。

根据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的规定，英国每年可向西班牙的南美洲殖民地贩运一船黑人奴隶。由于贩运黑奴的利润很高，英国商人贩往西属南美殖民地的黑奴往往超过规定的数额。由于非法贩运黑奴的活动越来越猖獗，西班牙政府即派缉私队拦截和检查，并将被查获的走私船的部分货物分给缉私队。因此，缉私队千方百计搜捕英国船只，包括一些从事合法贸易的船只。据估计，从1713年到1737年间，约有180艘英国船只被西班牙的缉私队搜捕。英国商人纷纷向议会请愿，要求对西班牙采取强硬态度。议会里以老威廉·皮特为首的一批所谓“爱国者”反对派，指责沃波尔政府软弱无能。他们以保卫国家荣誉为由，要求对西班牙进行打击。当时英国同西班牙的商业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如同西班牙继绝关系，对英国经济发展不利，另外将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它本想拉拢老盟友荷兰，但荷兰此时正处在衰落状态中，况且荷兰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商业贸易关系也很密切，因此，荷兰不愿站在英国一边与西班牙、法国等为敌。西班牙当时正处于国力衰微的过程中，所以也不希望与英国关系破裂。经过英西两国政府的努力，双方达成初步妥协，西班牙缉私队减少对英国船只的搜捕范围。1734年—1737年，被搜捕的英国船只有20艘左右。但英国议会里反对沃波尔政府的反对派仍不断加强活动，要求对西班牙开战。就在这个时候，在1738年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有4艘英国船只被西班牙缉私队查获，并被强迫驶向西班牙，船员遭到囚禁。此事本非异常，但反对派趁机鼓动反西情绪。在一次议会开会时，一个名叫詹金斯的英国船长被带到下院，他拿出一个装着被割掉的耳朵的瓶子，声称他在1731年被西班牙掳去吊上桅杆，并被割掉了耳朵。虽然此事究竟是否属实，未能查清，但反西班牙的情绪因此火上浇油。沃波尔不得不派

G.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1978, Introduction, P.22.

H.William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1963, Vol. , P.174.这是斯威夫特1710年9月9日给大主教金氏信中的话。

J.Black (ed), *Britain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4, P. 154.

J.B.Ow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25*, 1974, P.47.

遣一支海军舰队到地中海，向西班牙表示强硬姿态。最后，在 1739 年 10 月终于爆发了所谓的“詹金斯耳朵之战”。战争开始后，英军失利，国内群起批评沃波尔领导战争不力，一些城市的商人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对政府在备战和领导战争中的错误加以指责。当这些问题在议会进行讨论并交付表决时，反对派获得了多数。沃波尔失去了议会多数的信任，于是辞职。此举开创了内阁首脑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时必须辞职的先例。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真正的敌人仍然是法国而不是西班牙。英法争夺殖民地是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

沃波尔下台后，老威廉·皮特为首的辉格派少壮分子，即所谓的“爱国者”掌握了政权。他们代表当时势力日益壮大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法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夺海外殖民地。他们的要求得到刚从流放地回来的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的同情，老威廉·皮特政府即积极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 年—1748 年），打击支持普鲁士的法国。1742 年，英国派军队到尼德兰，次年同法军发生战斗，1744 年正式向法国宣战。英国军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以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在欧洲战场并无重大行动，后同普鲁士缔结了汉诺威条约，停止了两国间的军事行动。1748 年又同法国缔结和约，双方维持战前的状态。然而，与法国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在欧洲、美洲和印度双方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1756 年—1763 年）是以英国、普鲁士和汉诺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的冲突，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而发生的。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虽然英、法在 1748 年订立了和约，但英法之间在北美和印度的地方性冲突仍持续不断。根据 1748 年的和约，法国应将印度的马德拉斯交还给英国，但法国仍然利用当地的土邦，在南印度扩展自己的势力。根据 1748 年的和约，英国占领布雷顿角岛地区。该地位于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之间，圣劳伦斯河南端入口处的地段，英国千方百计加强在这里的地位。然而法国的加拿大总督却建造了一条碉堡线，力图将加拿大与路易斯安那连结起来，而把英国在北美沿海的 13 个殖民地限制在沿海地区，不令其向西发展，法国却可以借此向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西部地区扩张。

英法在北美和印度的商业和殖民扩张上的矛盾决定了双方无法长久维持和平。1756 年，双方终于发生了延续 7 年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英国支持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同法国斗争，而法国则同它以前的敌人奥地利人站到了一起，荷兰保持中立。

战争初期，英国处于不利地位。它在欧洲大陆的同盟者普鲁士遭到一连串失败，而奥地利、法国、俄国却联合起来与它为敌，并且步步进逼。瑞典也站到了法国一边。英国议会就如何进行战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几位主要的政治家意见分歧，争论不休。有些人对战争的失败感到羞耻和愤慨。社会上则因担心敌人入侵英国而产生一阵惊恐。威廉·皮特（1766 年被封为查

塔姆伯爵)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他决心将战争进行下去,并竭力鼓舞陆海军将领和士兵的斗志,表现出英国向海外殖民扩展的狂热劲头。

七年战争开始时期,英国一方面在欧洲封锁法国的沿海,并炮轰法国沿海的城市,另一方面却把主要力量放到北美和印度同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上。老皮特认为英国必须在欧洲、北美、东方同时与法国斗争,而不应把战争仅仅局限在一个地区之内。由于英国在海上占有优势,同时在北美殖民地也足以与法国抗衡,如果把战斗扩大到世界各地,就可以使法国不能集中力量而打乱它的作战计划,将法国的势力从北美和印度排挤出去。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法国军队顽强抵抗英军的进攻。老皮特派了大批英军前往,攻占了加拿大的一个接一个地区。先是占领布雷顿角岛,接着又占领了安大略湖畔的弗隆坦纳、尼亚加拉堡(后改名为匹茨堡),最后占领了加拿大首府魁北克。到1763年,英国占领了加拿大的全部领土,把法国的势力完全排挤了出去。

在印度,英国同法国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英国同法国在印度的冲突很久以前就一直在进行着。印度早就与东西方各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关系。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相继侵入印度。这些国家利用本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掠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这些东印度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商业贸易公司,而是拥有特权和大量的职员和军队并有权宣战媾和的组织。它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居民还享有审判权。

18世纪中叶,印度的大莫卧儿帝国(1526年—1761年)陷于崩溃,印度出现了许多互相争斗的封建公国。这时英国和法国殖民侵略者的活动更为猖獗。在英法争夺印度的斗争中,1757年加尔各答附近的普拉西战役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战役中,法国的同盟者——孟加拉的土邦王公出动了7万军队,而英国的罗伯特·克莱武所指挥的军队总数不到3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士兵。但是孟加拉土邦的一些封建主在战前就与克莱武有了勾结。在战斗正在进行之际,这些封建主倒戈投到英国人一边,使英国人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此后孟加拉完全落入英国人统治之下。这次事件奠定了英国在印度进一步殖民扩张的基础。

当英国在加拿大和印度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同时,在欧洲大陆上,英国所支持的普鲁士却遭到失败。早些时候,威廉·皮特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了一支由3.6万汉诺威人和2.4万普鲁士人和黑森人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只采取壁上观的态度,无所行动,被人称之为“观察军”。1760年,俄国军队攻占了普鲁士首都柏林。英军在汉诺威同法军的战斗也遭到失败。在此情况下,法国趁机提出和谈的建议,但英国的老皮特自恃英国力量较法国强大,提出了法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如英国要求法国停止援助奥地利,而它自己却保留继续支持普鲁士的权利;英国还要求法国将当时被英国占领的地区完全让予英国。这样,谈判就拖延了下来,未能缔结和约。

战争的延续在英国国内引起不满,辉格派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老皮特为首的一批辉格派,代表侵略性最强的资产阶级,力主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另一部分辉格派认为,到1760年,英国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可以满足。这一批人得到了托利派的支持。而国内广大的普通人

民由于战争以来，费用庞大，赋税增加，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也普遍要求停止战争。这时的国王乔治三世（1760年登位）也不赞成老皮特的态度，老皮特被迫在1761年10月辞职，由布特代之执政。布特上台后，匆忙进行和谈，1763年2月英法缔结了巴黎和约，战争结束。

根据巴黎和约，英国巩固了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所占领的全部土地，法国在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土地全部丧失。这些土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东（除新奥尔良）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土地，布雷顿岛和圣劳伦斯各岛。在印度，英国将法国的势力排挤了出去，法国只能够在印度保留沿海的本地治理和另外4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不得构造防御工事，只能作为商栈之用。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它与法国长期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此后，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巩固了起来，它标志着英国在建立殖民帝国的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以后英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在世界各地扩充它的殖民侵略。有些学者认为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763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后，英国从向北美移民、扩张领土，转向通过在亚洲和太平洋设立商栈，建立全球商业基地并互相联系以扩展商业的帝国。”此说已为多数史学家所否定，因为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在北美所追求的目的“并无什么新东西”，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和愿望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连贯性”。

英国之所以能在七年战争中战胜法国，主要是因为从17世纪末以来，英国建立起了一套效率高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次在18世纪后半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经济部门各个领域蓬蓬勃勃，迅猛发展，使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在外交上也可利用充足的财源使用收买手段，拉拢盟国在欧洲大陆上为它效力，自己则集中优势力量在北美和印度与法国斗争。至于法国，在18世纪中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封建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治制度腐朽无能，国内矛盾尖锐，不能统一意志与外敌斗争，虽然法国当时的军事技术与英国处于相等的水平，但却不能发挥较高的效率。

Cf.P.J.Marshal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mpire*, in J.Black(ed), *Brit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from Walpole to Pitt, 1742—1789*, 1990, P. 194.

R.W.Tucker and D.C.Hendrickson, *The Fall of the First Empire*, 1982.P.194.

第三节 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

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开始于英国。它以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体制的变革为起点，进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变革。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起因要从英国区别于西欧其它各国的历史特点中去探寻。

一、农牧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以前，农业（包括畜牧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英国农业的发展变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为其它欧洲国家所不及。

首先是牧羊业的迅速发展与农牧业的商品化。在农牧业生产商品化进程的直接推动下，英国逐步确立起“地主—租地农”式的土地关系体系。这种土地关系体系以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亦即地租与利润的结合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具有合伙关系的性质。它将土地的所有与土地的经营纳入了一种更能发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技术改革的近代资本主义体系。

在近代资本主义土地关系体系确立的过程中，自 16 世纪以来，英格兰农牧业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尽管这一时期的技术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它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调整了畜牧业与种植业的关系，提高了谷物总产量和主要谷物的亩产量。增加了牲畜头数和体重。更为重要的是，农牧业技术改革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进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农业技术改革是在农牧业生产商品化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17 世纪中期以后，农畜产品价格普遍低廉，造成利润减少，欠租增加。这就迫使地主和农场主设法采用新技术。因此，农业技术改革实际上是对价格—成本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其次，农牧业技术改革构成农牧业全面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为农牧业技术改革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集中而自由地使用土地。正因为如此，积极圈地买地的人，一般也积极倡导和参与技术改革。大农场的兴起为技术改革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大农牧场更多地具有技术改革的内在动力和经济实力，因此几乎所有技术改革的尝试都是在大农场上进行并取得成功的。与此同时，技术改革又为大农牧场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后者正是通过技术改革不断地为其创造出新的技术基础，才保证了对于小农的经济优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牧业经济在商品化进程中发生全面变革，并在变革中实现资本主义化，是英国农业区别于欧洲大陆各国农业的显著特点。英国农牧业较早确立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则成为变革的内在动力。相对于其它欧洲国家而言，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广泛更深入，这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潜力所在。农牧业经济的全面变革，既变革了自身，也改变了本身的地位，与其它经济部门建立起商品交换关系，因而从供求两方面对其它部门，尤其是工业提出要求。一方面，农牧业的变革不断地建立起工业劳动力市场、生活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这就必然要求工业有相应的发展，以便吸收游离出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Dean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P.67.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P.41; M.Tur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Crop Yiel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d. XXXV, 4, 1982, P.14; B.Coward, *The Stuart Age*, 1980, P.14; M.K.Bennett, *British Wheat Yield Per Acre for Seven Centuries*, *Economic Journal* 3, 1937, P.24.

Louis Moffi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40—1760*, P.7; Dean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 68.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 127 页。

来的剩余劳动力和商品化的农畜产品。这样既可以保证农牧业自身的继续发展，又使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非农产品的需要量就越大，因而工业的发展对农牧业来说就越不可缺少。因此，农牧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对工业的推动力。农牧业同手工业之间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手工业的框架，建立起近代的机器大工业。

二、手工业的发展

以往，我们在考察手工业发展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时，只注重于手工工场的专业化和分工。其实，手工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的必然性是通过它的一系列特点表现出来的。

首先，部门结构上表现为部门齐全，种类繁多，既包括轻工业，又包括重工业；既包括资源工业，又包括制造业；既包括消费资料工业，又包括生产资料工业。可见，城乡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部门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内部各部门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推动手工业向前发展。

其次，地区分布上表现为广泛性和专业化。英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相应的手工业。早在 16 世纪，仅英格兰就有几十个村庄的家庭手工业者在成千上万的农舍里从事手工业活动。每一种手工业广泛地分布于许多地区。纺织业几乎遍布英国城乡各地，成为民族工业；冶铁业广泛分布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采矿业则广泛分布于西南部、中部、北部及东北部。城乡手工业的发展把城乡各地卷入商品化的工业生产活动之中，从生产的广度上把手工业生产推向前进，在广泛分布的基础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专业化工业区。毛纺织业形成了西乡、东盎格利亚和约克郡西区三个中心；采矿业形成了东北部、西南兰开郡、南北威尔士和米德兰等生产基地；冶金业先后形成了威尔德郡、肯特、南威尔士、迪恩森林、西米德兰、北威尔士等中心；棉纺织业则高度集中于兰开郡。工业区的形成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把农村商品经济引向深入，从生产的深度上推进手工业的发展。

工农关系上表现为结合型和分离的趋势。小地产收入的不足，促使农民从事其它非农业活动。季节性的农闲以及非农耕地区的就业不足，为城乡家内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部分手工业活动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在农闲时间从事的。瑟尔斯克的研究表明，在 16 世纪，近一半的农业人口在农闲时从事手工业活动。劳动力在工农业活动之间季节性地流动。城市手工业在劳动力来源上也依赖于周围乡村。城镇手工业正是不断地雇佣乡村的外来劳力，才逐步将行会手工业转变为家内手工业。施鲁斯伯里和布里斯托尔在其近邻的村社里雇佣的劳动力非常多。即使一些以工业活动为主的独立小手工业者，仍保有一小块土地，以便在工业活动缩减时耕种，补充其家庭收入。然而，手工业者的这种双重身份，毕竟具有过渡性。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也在进行着。这种分离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的变革来实现的。一方面，农牧业的发展将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力转向工业方面，同时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又使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无须再经营小地产，从而变成专门的工业劳动者。另一方面，手工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农民手工业者无力顾及农业生产，只能专门从事手工业活动，同时也使一些小手工业者无力经营手工业，从而变成工资劳动者。可见，农牧业的变革和手工业本身的发展，都具有推动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的内在趋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正是这种内在趋势发展的结果。

生产体制上表现为多样性和过渡性。首先，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组织形

G.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P.15, P.23.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 33 页。

L. Moffi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40—1760*, 1963, PP.53—54.

式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采矿、冶金等重工业部门，较大企业的发展快于纺织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其次，每一部门又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以毛纺织业为例，较低层次的是由老板兼工匠的独立手工业者所组织的独立家庭手工业。在这种形式的手工业当中，生产的组织者亲自参加劳动，自己拥有少量资本，从羊毛商那里购进原毛，在家人和几个帮工的协助下从事生产。较高层次的是由商人资本家控制下的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工场。呢绒商插足于家庭手工业之中，雇人参与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经手加工者已丧失实际上的独立性，成为受雇于呢绒资本家的工人。呢绒资本家因而获得了“商人企业家”的称号。最高层次的一类手工业是集中的手工工场：一批完全靠工资为生的专职工人，按照不同的分工，组织在一个集中的、装有资本设备的厂房里从事协作生产。呢绒资本家控制了原料、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及商品销售的一切方面。再以采煤业为例，在东北地区出现了若干家雇佣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大企业，而在内地的许多矿区，则普遍存在着不过十几人的小企业。这种多种形式的并存，是一种动态的共存，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转变趋势：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日益集中，设备日益资本化，从而不断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这种转变达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产生机器工业。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 41—43 页。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 71.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71.

三、国内外市场的形成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农牧业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城乡手工业的发展，是在供求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因此，考察工业革命的起因，需要考察英国国内外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

在国内贸易发展过程中，英国各地普遍形成了专门的市场城市。据当时人记载，17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市场城市758个，1741年增加到786个，平均每郡有16个。随着市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的数目不断增加。一般的市场城市都有一个以上的市场。在笛福时代，伦敦有大约40个市场。在市场较多的城市里，往往有好几种专业化的市场。到1740年，伦敦有专门的鱼市场10多个，还有专门的蔬菜市场、水果市场、干草市场、皮货市场、谷物市场和呢绒市场。各种市场不仅日益专门化，而且在一定的地区相对集中起来。如小麦市场主要集中于伊普斯维奇、法纳姆、贝辛斯托克等地，绒线和布料市场则主要集中于东盎格利亚、约克郡和东南部的若干城市。在市场城市广泛分布的基础上，地区性贸易中心逐步形成：西部的布里斯托尔，中部的伯明翰和诺丁汉，东部的诺里奇、金斯莱和赫尔，西北部的利物浦和卡莱尔，北部的约克和纽卡斯尔。

随着市场的增多和扩大，投放市场的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尽管由于缺乏具体资料而无法确定各种商品的比重，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煤炭、木材、谷物、牲畜、羊毛、盐、呢绒等无疑是国内贸易的重要商品。其二，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些产品，不仅仅是消费资料，其中绝大部分又作为工业原料或燃料进入生产过程。由此可见，英国的国内市场体系既包括了生活资料市场，也包括了生产资料市场。商品的地区流向反映各地区之间的产销关系。各种产品均以伦敦为集散中心。至17世纪早期，伦敦谷物市场的货源扩大到东北沿海地区和西南沿海地区的康沃尔及威尔士。与此同时，伦敦乳制品的货源也由东南部扩大到东北沿海地区的林肯郡、约克郡、达勒姆及诺森伯兰郡，进入18世纪以后，又进一步向米德兰地区和西部地区延伸。至于伦敦的肉食供应更是以全国为基础的。东北沿海地区的煤炭主要是通过沿海贸易运入伦敦，其中一部分又通过伦敦转运内地。运入伦敦的小麦、大麦和牲畜，大部分又加工成面粉、肉制品、皮制品和饮料等运往各地。正如当时人所言，英格兰的每个郡都或多或少地为伦敦提供货物，不仅有制造业产品，也有农产品，整个英格兰在产品的销售方面都普遍地依赖于伦敦。此外，

L.Moffi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40—1760*, 1963, P.233.

T.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 1955, PP.63—64;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9, PP.44—45.

F.J.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in E. M. Car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I, 1954, PP.135—140.

L. Moffi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40—1760*, 1963, P.143.

D.Defoe, *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1928, Vol.I, P.3.

各种产品也在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之间，农耕地区与畜牧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流通。例如，林肯郡、莱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的羊毛向西南运往赛伦塞斯特和西乡的其它呢绒业城镇；兰开郡中部和东部混合农业区的谷物大量地供给以畜牧业为主的沿海平原牧区和高地牧区；乳制品生产基地每年将大量乳制品提供给工业城市及其它人口中心。可见，各种产品的流通已经超出了不同地区余缺调济的界限，构成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资料市场。

总之，在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若干世纪当中，英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全国性贸易中心—地区性贸易中心—地方市场镇三位一体的、连接不同经济区的国内市场体系。这个体系是一种生活资料市场与生产资料市场共存的统一体。它将英国大部分地区纳入产销联系的运动之中，使不同经济区相互连接，从而使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依据经济运行的需要而自由地流动。因此，英国的国内市场更多地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

国外贸易的发展

伴随着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英国也建立起日益广泛的海外市场。说到英国海外市场的建立，人们往往把它同殖民扩张联系起来。这虽然不无道理，但仅以西欧历史上普遍有过的殖民扩张现象来解释英国海外市场的确立，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考察英国海外贸易，还必须考察英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

16世纪末以来，英国商人的活动渗入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更远的地区，并且进入东印度，穿过大西洋，建立起一系列的海外贸易公司。海外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带来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英国海外贸易价值净增2倍。然而，外贸总增长只反映英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而外贸地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才反映其特殊性。

首先，在市场范围扩大的过程中，传统市场与新市场之间的相对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欧洲大陆市场（或曰传统市场）的相对重要性日益减弱，而加勒比、北美、西非和远东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则日益增强。在进出口贸易价值总额中，前者的比重日渐降低，后者的比重则日益上升。第二，新旧市场在类型上的变化更值得注意。欧洲大陆市场作为英国工业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进口市场及再出口市场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作为英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则日益丧失其重要性。18世纪初，英国再出口贸易的77%进入欧洲，而国内制造业产品进入欧洲的比重则日益降低。与此同时，非欧洲市场作为英国的工业原料、生活资料及再出口商品的进口市场和英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则日渐重要起来。1660年—1700年，除呢绒以外的制造业产品对殖民地市场的出口增长200%以上。1752年—1754年，美洲吸收了英国所有国内制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1977, P.134.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P.138 ; Dean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Table .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138 ;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29 ; E.M.Carrus - 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 PP.270—171.

C.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1980, P.182.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25%，除呢绒之外的所有其它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50%。17 世纪末，烟草、蔗糖和白布构成从非欧洲市场进口货物的 2/3，而且大部分又用于再出口贸易。第三，市场类型及地域分布伴随着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发生着变化。就国内产品的出口构成来看，毛纺织品的比重显著下降，而其它制造业产品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在进口货物中，纺织业及其它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日益下降，而纺织业原料和其它工业原料以及再出口品的比重则日益上升。__毛纺织品主要出口到新开拓的市场。

上述三点集中反映了英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关系呈这样的发展趋势：以传统的毛纺织品及再出口品换取它所必需的工业原料及其它生活资料。而与非欧洲市场的经济关系则表现为：以本国生产的制造业产品及再出口制造业品交换它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生活资料及再出口商品。可见，新市场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开发新产品、更新产业结构和提高自身生产能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连传统的毛纺织业也不例外。到 1640 年，“新布”出口的比重已接近“旧布”，而且大约 2/3 是运往西班牙、非洲和地中海各港口的。需要指出的是，新航路开辟后的市场需求，对任何一国来说，只是一种潜在的需求。它能否成为一国的有效市场，并不单纯取决于市场本身，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以自己的生产能力来达成足以占领这些市场的贸易成交额。由于英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不断地更新产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到 18 世纪中期，它已在海外市场上牢固地确立起优势地位，并且将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连成一体。这样，英国不仅通过国内市场体系加强了国内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通过海外市场使它的对外经济关系日益超出一般的商业关系，将生产、交换的总进程延伸到海外，通过供求矛盾运动将自身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总而言之，由英国国内外市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国内外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西欧其它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英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建立起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为成熟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因而更具有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内在动力和条件。因此，国民经济自我运行机制的形成，无疑是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144, P.64.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144, P.69.

四、其它因素

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科学文化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英国之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是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总体结果。

政治制度的变革与政府行为的转变

近代前期是英国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时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也在逐步地发生变化。都铎王朝的专制主义政体是在封建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府专制主义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具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没收和拍卖教会地产、鼓励发展工商业、支持海外扩张和殖民事业等等。不过，在这种专制政体下的政府政策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根本的一致。尤其是当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国后，封建专制政体更加走向反动，推行了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于是，1640年开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政体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斗争。英国革命时期和革命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如废除了骑士领地制，确立了土地的绝对私有权，为土地制度的变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废止了反圈地法，并逐步开始了议会圈地，从而加速了土地制度的变革；推行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国债、税收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使资本家得以通过税收渠道和政府财政杠杆积累了大量资本；取消了专制王权对工商业的许多限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大力开拓殖民地，为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寻找海外市场等等。革命后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保证了政府的行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革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具有自我调整的机制，因而能够促成整个经济在总体上向资本主义经济演进。革命后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政府行为的转变对工业革命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社会结构和观念的转变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更新也对产业革命起了促进作用。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商品化，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近代社会的结构特点开始显现。首先，英国社会日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英国工农商三大行业之间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为英国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提供了物质条件。英国社会的各阶层，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比较自由地流动于各个经济部门，从而使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上层彼此开放。地主不仅经营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农牧业，而且往往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人，与土地贵族在经济上也有诸多联系，而且往往也购置地产，向地产投资。可见，“竖立在英国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的墙不像其它地方那样高。”至于下层劳动者

G.E.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3, PP.190—193.

汉斯·蒙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3页。

之间的开放和流动就更加明显了。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促使工商业活动的全面展开，加快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与流动，从而使经济更加活跃起来。第二，在开放性和流动性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三层结构开始显露。在上层贵族与下层人民之间，中产阶级日益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发明家和革新家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在农村，由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工所组成的三层结构开始出现。这种三层结构加快了农业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气也在产生并逐步确立起来。地产经营上日益倾向商品化和企业化。由于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使地租与利润相结合，一些地主便开始改变过去单纯“坐享其成”的观念，利用其地产上的资源追求利润和效率。他们逐渐认识到，“由持地 200 英亩以上的大租地农租种，并支付定额租金和保持地力的地产才称得上是好地产。”富裕而有魄力的自耕农，开始不满足于“一亩地两头牛”，极力设法变成一名较大的租地农。正是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近代农业改革家，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投资，就是运用商业精神”。一般的小土地持有者在经营面临困境时，也抛弃传统的观念，卖掉小块地产，租种更大的地产，从而变成租地农。逐步树立起来的新观念，对土地制度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同时，社会日益形成了重商、务实、敢于冒险、富于进取的社会风气。“许多英国人不断地从事实业活动，渴望赚钱，潜心追求利润。这一点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人不仅养成了积蓄的习惯，而且形成了投资的风气。这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

17 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人类社会活动。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弗兰西斯·培根。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率先批判了崇尚空谈不能务实的旧科学传统，强调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用新发明丰富人类生活。__他所开创的科学实验方法以及他的科学活动，对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科学开始研究具体现象，从而使英国的科学研究活动较其它国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17 世纪采矿、冶金和造船等生产需要已促使科学家和发明家开始致力于研究解决某些生产技术问题。科学逐渐地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观察、试验和合理思考，可以使工业获得发展。这种新的科学观念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据不完全统计，1660 年—1750 年，英国有 60 多位杰出科学家，约占当

R.H.Tawney ,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1912,PP.188—189 , P.21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 127 页。

T.S.Ashton ,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 The 18th Century* , 1955 , P.36.

T. S. Ashton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 Oxford , 1968 , P.7.

《16—18 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 27 页。

参见 R.K.默顿：《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 章。

《16—18 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 27 页。

时世界总数的 36%以上，他们的科学成就约占世界总数的 40%。

日益迫切的经济需求，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以及开放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因而也有利于科学技术产生实际的生产效益。有些知识渗透到了工业社会的中层，而在较高的层次则建立起制造业者和科学家的联系。发明家很多是企业家和科学家。他们通过各种公办私助协会联系在一起。企业家请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为科学实验活动提供物质资助，甚至请他们入股。皇家学会会员中有工程师、冶铁商、仪器制造者和工业化学家。

此外，英国还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爱德华三世、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都曾先后鼓励外国移民进入英格兰。据估计，在宗教迫害之前，有 3 万佛兰德尔编织工逃到英格兰。他们带来新的技术和制作工具。17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法国对胡格诺教徒的大肆迫害，导致大量教徒逃离国外。据估计，1670 年—1690 年，约有 8 万胡格诺教徒逃到英格兰。他们大部分是法国最优秀的丝织工。外国移民传入的技术，对英国的羊毛业、呢绒业、丝织业、玻璃制造业、制帽业、排水工程等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提供了经济推动力，而相对的政治自由以及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为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促使科学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力。科学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59 页。

T.S.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P.13.

M.Creighton, *The Age of Elizabeth*, 1876, P.92; G.M.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1978, P. 169.

第四节 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

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经济变革时期，是以机器的应用和工厂制的产生为起点的。只有当机器应用于生产使相关方面的变化不可避免，从而使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工厂制不可缺少时，才能引发经济史上一个连续的，但又可以区别出来的演进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始于 18 世纪 70 年代。

一、纺织业的技术革新

早在 1717 年—1721 年，托马斯·隆比曾在德比附近装上按照意大利图样制造出来的捻丝机，建立起英国当时的第一家工厂。然而，捻丝机的使用并未成为任何新发明的起点，并没有引起丝织物的织造和精整方面的旧方法及其小生产体制的相应变化。在 1721 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当中，英国只有 10 家规模相近的丝织厂。第一架纺织机虽然出现于 1733 年，但长期没能得到实际应用，因为它尚不完备，不能立刻产生利润。约翰·怀亚特和刘易斯·保尔虽在北安普顿开办了英国的第一家棉纺厂，但终因机器的缺陷和不能产生利润而陷于破产。结果，纺纱机的发明未能传播开来，为利用这项发明所做的尝试也很少惹人注目。1733 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但“它的目的和结果仅仅是使手工业者不用助手就能生产出较宽的布”，并未显示出突破家内制生产组织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它的发展非常缓慢，18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传播，1800 年才开始在约克郡使用。总之，上述最早使用的纺织业中的机器，未能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显示出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性，未能引起与之相关的连锁反应，因而还不足以引起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组织形式的一体性变革。虽然预示了产业革命，但尚未引发这场革命。

18 世纪 60 年代，随着飞梭的应用，棉纱织业内部纺与织两大部门间的平衡开始被打破。棉纺供应紧张问题成为促进纺织技术改革的重要障碍。1764 年，兰开郡的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台多锭纺纱机，取名“珍妮机”，1768 年投入使用，次年取得专利。珍妮机最初为 8 个纺锭，1770 年增至 16 个，1784 年又增至 80 个。这种机器的优点在于，它能使一个工人同时纺出多根纱线，因而使纺纱功效大为提高。由于它很适合于家内制手工业，因而得到了较为迅速的传播，尤其是在兰开郡。据计算，至 1788 年英国已有珍妮机 2 万台。但是，珍妮机实际上只是旧式纺车的简单改良，仍需人力操作，而且纺出的纱细而易断，不能作经线，因而尚未解决生产纯棉布的技术问题。1769 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取得卷轴纺纱机的发明专利。它最初以马力为动力，后又以水力为动力，故名水力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每台装有数十个纱锭。它的显著特点和优点在于，它不用人力操作而以水力为动力，这就在机器动力方面跨进了一大步，而且纺出的线坚韧结实，可作经线，从而解决了生产纯棉布的技术问题。由于水力纺纱机体积很大，家内工业作坊无法使用，只能建立多层建筑的工厂，同时由于体积很大，手工无力操作，只能以大的铁瓣水轮推动。因此，水力机显然比珍妮机更具有建立工厂制的条件。1771 年，阿克莱特在富有水力资源的克罗姆福德建立棉纺厂，装上卷轴纺纱机，以水力作为动力，雇佣 300 余名工人。他的工厂迅速得到发展，办厂 10 年后，在厂工人数净增两倍。尤其重要的是，阿克莱特的成功，引发了一个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工业取代手工工场工业的演变过程。在阿克莱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9, P.89.

保尔·芒图：《18 世纪产业革命》，第 164 页。

保尔·芒图：《18 世纪产业革命》，第 167 页。

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 Century*, 1955, P.109.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86. 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第 289 页。

A.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1979, P.80.

特办厂 10 年后，英国已有 20 家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至 1790 年增至 150 家。1784 年，兰开郡有 41 家水力推动的棉纺厂，德比郡和诺丁汉郡分别有 22 家和 17 家。至 1800 年，英国已有阿克莱特式的纺纱厂 300 家。1775 年，阿克莱特又获得梳棉机和粗纺机的发明专利。前者能把原棉抽成连续的棉层，从而为纺机作业做好准备。后者能把梳好的棉花变成自行粗略捻绞的长圆形捻子，并进而将之纺成纱。这样，棉纺织业的设备不仅日益增多，而且日趋系统化，因而使工厂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组织。不过，水力纺纱机所纺的线太粗，因而尚需改进。

童工出身的纺纱工人塞缪尔·克隆普顿经过 5 年努力，于 1779 年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是综合多轴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而制成的，故名“骡机”。这种机器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又结实，从而为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它完全具备由家庭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的技术条件，因而很快得到了应用。到 1800 年，英国已有 600 家骡机纺纱厂。

这样，经过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纺纱部门机械化的技术革新已基本完成。伴随技术革新而来的是生产组织系统的变革。机器的应用促使棉纺织业生产日趋集中，工厂制获得较快的发展。由于具有技术先进、组织严密等优势，工厂制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纺纱工人的劳动效率。棉纱产量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织布行业的加工能力。棉纱大量过剩，导致棉纱出口迅速增长。于是，在棉纺织业这一相互连接的生产序列中，出现了纺与织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调。如不加以改变，则非但织布业得不到发展，而且连纺纱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要受到极大的阻碍。可见，织布业的技术革新已经势在必行了。

1785 年，牧师埃德蒙德·卡特莱特发明自动织布机，提高织布功效 40 倍。1791 年，他在曼彻斯特开办第一家机器棉织厂。据说，在他的工厂里，一名童工利用水力织布机一天所织出的布，相当于用旧方法一周所织出的布。后经贺洛斯等人改进，自动织布机日臻完善，很快得到推广。继卡特莱特之后，在 18 世纪 90 年代，又有几家机器织布厂相继建成投产。到 1812 年，英国已有 2400 架动力织机。此时，机器织布已经能够同手工织布进行有效的竞争了。

在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应用过程中，与之相关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革新。除了前文所述梳棉机和粗纺机外，还发明了印花机、漂白机、整染机和净棉机。1783 年，苏格兰人托马斯·培尔制成了滚筒印花机，使印花工作量比人工提高 100 倍，兰开郡随即开办了一些大的棉布印花厂。此外，氯气漂白法也开始普及。

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明和应用，基本上完成了棉纺织业生产的全面技术革新。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棉纺织业中首先开始，有着某些特殊原因。首先，从棉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英国棉纺织业是通过改造传统纺织业而产生的。当时英国的棉纺织业面临着来自国内传统毛纺织业和进口印度优良棉布两方面的激烈竞争。棉纺织业要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工业部门，

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8th Century*, P.117.

E.Pawson, *The E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5, P.88.

G.D.H.Cole and R.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961, P.134.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88.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P.191.

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革新本身的技术，从棉麻混纺转变到生产纯棉布，并且大大提高生产效率。18世纪初，棉纺织业在生产纯棉布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最终解决了生产纯棉布的技术问题。第二，从国内外市场需求模式的变化来看，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市场对传统商品（如毛呢）的需求势头日趋减弱。以柔软、质薄、穿着舒服而见长的棉布，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国内外市场对棉布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正是这种需求模式变化的结果。第三，从棉纺织业本身的特点来看，棉纺织业有技术革新的迫切要求，又有日益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棉纺织业是一种新兴的工业，它没有传统，没有特权，不受行会制度的限制，因而享有自由发展的有利条件。加之，棉花具有比羊毛更有粘合性而少弹性、更易于搓捻和拉长而成为连续纱线的优点。因此，面对变化着的需求模式，棉纺织业得以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使自己由小变大，后来居上，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门。

“从棉纺工业中发出的那种决定性的刺激，在不几年内就普及到整个纺织业。”在棉纺织业机械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毛纺织业也缓慢地走上了机械化道路。1773年，约克郡开始使用多轴纺纱机纺毛，1785年开始大量使用珍妮机纺毛。1780年—1800年，约克郡西区有数百家小型的粗梳工厂和大约30家精纺工厂建成。其间，利兹、哈德斯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在90年代相继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工厂。1800年，约克郡有18家精纺工厂，多数以水力为动力。此后，约克郡的毛纺织业中开始普遍使用多轴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纺毛，用飞梭织出。卡特莱特发明的梳毛机自19世纪初开始为许多毛纺厂使用，1824年—1840年得到进一步推广。在西乡地区，1795年起开始建立机器毛纺厂，不过直到1830年为止只有几家。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828年前后始见使用精纺机。苏格兰边界的卡拉设尔到1825年有9家毛纺厂，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牛顿和兰尼卢等地也出现了几家毛纺厂。毛织业的机械化晚于毛纺业。迟至1820年左右，机器织布机才实验性地使用于毛织业。总地说来，传统的毛纺织业在采用机器和建立工厂制方面要缓慢得多。1825年以后毛纺织业才迅速地机械化。

在麻纺织业中，机器的采用和工厂的建立更为缓慢。1787年以后，达林顿陆续出现了几家亚麻纺织厂，其中最有名的是约翰·马歇尔创办的马歇尔工厂。从1790年到1840年，这家亚麻厂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18世纪90年代后，麻纺机被引入苏格兰亚麻工业。到1800年，亚麻业中心敦提有5家亚麻纺纱厂、2000多个纺锭。麻纺机的使用范围很有限，自1820年以后，各种麻织业才开始使用机器。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1977, P.163.

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53页。

A.E. 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P. 89.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9, P.111.

A.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P.89.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9, P.111.

二、蒸汽机的使用

动力问题是工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风力、畜力、人力和水力曾被广泛地作为动力应用于多种工业活动。工业革命开始后，水力日益成为主要的机械动力。以水力取代人力和畜力，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正是在“水力机时期”英国迈开了工业机械化的关键一步，建立了第一批近代工厂大工业。然而，以水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机械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水力资源是一种“自然赋予要素”，具有易变性和地理分布上的限制，而工业在机械动力上仰赖于“自然赋予要素”，必然带来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工业只能分布于有限的地区。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在英国，只有彭宁山脉附近、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其余地区则由平原构成，河流缓慢，无法使用水力机。其次，工业活动无法连续进行。由于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化及河流落差等限制，水的供应不能常年保持不变，从而造成工业生产的季节性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这种局限性越来越大。于是，引入新的动力便成了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

利用蒸汽机作为机械动力的研究活动很早就开始了。1698年，英国人萨维利发明了蒸汽抽水机，但升水高度只有100尺左右，而且有易爆危险。1705年，纽康门在改进萨维利抽水机的基础上制成了可用于矿井的抽水机。它是靠蒸汽冷却产生的部分真空所形成的压力来运转的。与萨维利抽水机相比，纽康门的抽水机虽然冷凝更加迅速而完善，易爆危险也已克服，但仍然效率很低，耗煤量很大，因此没有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应用。将蒸汽力变为大工业的机械动力的任务是由詹姆斯·瓦特完成的。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修理工。在著名热力学学家、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热力学理论的影响下，他在修理纽康门抽水机的过程中发现它有两点缺点：一是恢复汽缸内部高温需要耗去大量热量，二是冷却不足导致冷凝不完备。于是，瓦特在潜热原理指导下，经过几年实验发明了与汽缸分离的冷凝器，以蒸汽取代气压作为动力，从而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并于1769年取得发明专利。这种机器克服了纽康门蒸汽机汽缸温度变化不定的缺陷，使热效率大为提高，并且大量节省燃料。然而，单动式蒸汽机的制成，只是变蒸汽动力为机械动力的第一步。要使它直接能用于发动各种机械，尚需进一步研究改进。在工厂主马修·波尔顿的合作和资助下，瓦特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它通过传动装置可作旋转运动，能直接与纺纱机相接，并且运行可靠，耗煤量低，不仅可以用作各种机器的动力，而且功率大为提高。这样，复动式蒸汽机的制成，基本上完成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改造过程。蒸汽力取代水力作为机械动力，从根本上克服了水力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局限性。从此，工厂可以设在原料、燃料、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及市场条件较有利的地方，生产要素得以突破地域限制而实现最大程度的优化组合。蒸汽机的改良和应用开始了一个机械动力蒸汽化过程。

瓦特的蒸汽机最初运用于马修·波尔顿的索霍工厂，用以推动鼓风机、滚轧机和汽锤。该厂应用蒸汽机的成功，引起其它工厂的仿效。至1783年，

G.D.H.Cole and R.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P.133.

G.D.H.Cole and R.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P.133.

已有 66 台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 2/3 用于采矿业和铸造业。1785 年，在帕普尔维克出现了英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此后，罗伯特·皮尔、彼得·德林克沃特、理查德·阿克莱特等人相继将蒸汽动力引入他们的工厂。1785 年—1800 年生产出的蒸汽机有 82 台供棉纺厂使用，其中 55 台用于兰开郡的工厂。至 1831 年，格拉斯哥有 41 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蒸汽动力在棉纺织业中占据了优势。蒸汽动力的应用使纺锤数大量增加。18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纺锤数约为 170 万，1844 年—1846 年为 1950 万，增长 10.5 倍。1791 年，蒸汽机开始用于棉织厂。1806 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作为动力的棉织厂，1818 年增至 14 家。18 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棉织业中手工织机占绝对优势。手工织机 20 万台，而动力织机只有 2400 台。1844 年—1846 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动力织机增至 22.5 万台，而手工织机则减少到 6 万台。而且，蒸汽动力超过了水力。至 1833 年，蒸汽马力数为 4.6 万匹，而水力马力数为 1.2 万匹，前者为后者的近 4 倍。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随着机械动力蒸汽化的完成，工厂制最终确立起来。到 1840 年，棉纺织业的工厂工人数已经超过手织机工人数 1 倍多。可见，蒸汽动力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工厂制度的发展。

在棉纺织业的带动下，其它纺织业部门也相继开始了机械动力蒸汽化过程。1794 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毛纺厂。1800 年，约克郡西区毛纺织厂中有 8000 台蒸汽机投入使用。毛纺织业使用动力蒸汽化迟于棉纺织业。至 1835 年，整个毛纺织业的动力织机约 5000 台。1838 年，动力织机中蒸汽马力超过了水力马力数。不过，至 19 世纪 50 年代，毛织业中动力织机的数量才超过手工织机。第一家完全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纺丝厂在 1819 年—1820 年建成。至 1835 年，英国共有 2000 台动力丝织机。1838 年，动力织机中蒸汽马力数已为水力马力数的 2 倍。随着机械动力蒸汽化过程的进行，蒸汽机的数量不断增加。1800 年为 1200 台，1825 年增至 1.5 万台，增长 11.5 倍。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是人类生产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一个突破。它给工业革命以极大的推动力，保证了英国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

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01 页，第 122 页。

汉斯：《近代经济史》，第 292 页、第 291 页。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P.191.

B.R.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185, P.182.

B.R.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185, P.182.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8.

B.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198.

B.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210.

A.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P.112.

三、冶金、采煤业的技术革新

机械化近代大工业的普遍发展和最终胜利，不仅取决于机器动力的蒸汽化，而且有赖于冶金和采煤业的技术革新来为之提供建筑材料和工业燃料。

冶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已成为英国的重要工业之一。但由于长期以来一直以木炭作燃料，冶铁业的发展日趋缓慢。至 17 世纪，随着森林资源的日渐短缺，铁产量开始逐年下降。结果，富有铁矿和煤矿的英国，却要靠进口生铁来发展本国的金属制造业。尽管英国史学界对木炭短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冶铁业是否因缺乏燃料而发展缓慢等问题尚有不同看法，但以木炭为燃料造成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以木炭为燃料使冶铁业的经营规模无法扩大。直到 1720 年左右，全英国只有 60 座高炉，年产生铁仅 1.7 万吨。

这一史实说明，靠木炭来冶铁无法建立起适应本国需要的冶铁业。第二，以木炭为燃料不是立足于开发自然资源，而是单纯地减少森林资源。因此，从长远来看，既缺乏发展潜力，也不利于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三，以木炭为燃料不符合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规律，无法将铁矿与煤矿藏量丰富而且比较接近这一“要素赋予”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鉴于木炭冶铁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早在 17 世纪初，就有人著书认为，以煤为燃料冶铁可以大量节省燃料，保护森林资源，带来大量的利润，并且能保证冶铁业持久而迅速的发展。

1709 年，阿伯拉罕·达比在希罗普郡的科尔布鲁克代尔以焦炭冶铁获得成功。但是，用达比冶铁法炼出的铁含硫磺等杂质太多，而且质地很脆。18 世纪 30 年代，达比的儿子改造了制造焦炭的方法，加强了水力鼓风机的风力，并将生石灰与矿石混合，以防止金属在熔化时变质。此后，焦炭冶铁法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1756 年，威尔金森在斯塔福德郡的布拉德利建立了最早的焦炭冶铁炉之一。但由于冶铁炉和鼓风设备没有重大改进，焦炭冶铁法未能显示出它的经济优势。直到 1750 年为止，焦炭生铁与木炭生铁的相对价格一直有利于木炭冶铁。因此，焦炭冶铁法的传播仍很缓慢。176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 17 座焦炭炉，而苏格兰实际上还没有。1761 年以后，约翰·斯米顿发明的带有汽筒的鼓风机开始投入使用。它可以使一座高炉的周产量由 10—20 吨提高到 40 多吨。此外，从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 20 年代，生产需求量以每 10 年 50% 的速度增长。于是，随着生铁需求的日益增长和鼓风机的改进，木炭冶铁开始失去价格优势，而焦炭冶铁法传播的步伐则开始加快。1774 年，英国的焦炭炉增至 31 座。1775 年以后，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于鼓风炉，使风力大为增强，炉温升高，减少了硫磺等杂质，提高了生铁质量，同时又降低了耗煤量，从而提高了焦炭冶铁的经济效益，使木炭冶铁与焦炭冶铁的相对价格转而对焦炭冶铁有利。价格优势的获得，促成了焦炭冶铁法的迅速传播。焦炭炉由 1788 年的 53 座增至 1790 年的 81 座，而木炭炉则由 1717 年的 61 座减少至 1790 年的 25 座，此时英国生铁产量的 90% 出自 81 座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 217 页。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15, P.116.

保尔·芒图：《18 世纪产业革命》，第 238 页。

M.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1985, P.36.

焦炭炉。这样，至 18 世纪末英国完成了由木炭冶铁到焦炭冶铁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焦炭冶铁法的应用，产煤区日益成为冶铁业的主要生产区，煤矿与铁矿储量丰富的天赋条件变成了经济优势。英国的冶铁业在煤铁结合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1806 年，焦炭炉增至 162 座，年产量 26 万吨，残存的 11 座木炭炉的产量已经无足轻重了。据统计，1788 年—1830 年，开工的冶铁炉净增 2 倍，生产量增长 10 倍。焦炭冶铁法的完善极大地提高了生铁产量。至 18 世纪末，仅达比家族的铁矿的产量即相当于焦炭冶铁取代木炭冶铁之前英国生铁总产量的 3/4。可见，随着蒸汽鼓风设备的发展而完善起来的焦炭冶铁法，使英国的冶铁业出现了新的飞跃。

生铁冶炼法的技术革新促成了熟铁生产和炼钢技术的改革。1740 年，本杰明·亨茨曼发明了熔炉精炼优质钢的方法。1774 年，设菲尔德已有 7 家铸钢厂应用此法。由于英国不能生产熟铁，只好从俄国和瑞士进口条形铁。生铁产量的日益丰富为改用国产铁炼钢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只有进一步改革冶铁技术，将含有杂质的生铁加工成熟铁，才能实现这一可能性，生铁业才能获得广泛的国内市场。

1784 年，在海军服役的工程师亨利·科特发明了“搅拌法”和“辗压法”。所谓“搅拌法”是指，当生铁在熔炉里化成半流体状态时加以搅拌，以烧掉生铁中含有的碳素，从而炼出熟铁。它的发明，使以焦炭冶炼出高质量熟铁得以成功。所谓“辗压法”是指，以辗压机取代铁锤将熟铁辗压成钢。它的发明使锻铁效率提高 15 倍。科特的发明使英国冶金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此自成一体的英国钢铁工业开始建立起来。1785 年，在设菲尔德建成第一座近代型的炼钢厂，其熔炉比过去增大 50 倍，冶炼效率大为提高。科特法首先在南威尔士广泛应用，1800 年开始传入苏格兰，至 19 世纪 20 年代，在斯塔福德郡和英格兰的其它产铁区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经过不断改进，冶铁效率日益提高。使用原来的拉特法用 2 吨生铁可炼成 1 吨条铁，到 19 世纪 40 年代只用 1.37 吨生铁即可生产出 1 吨熟铁。随着科特法的应用和推广，英国由熟铁进口国变成了熟铁出口国。1815 年—1833 年，英国条铁出口量增加 1 倍。英国既摆脱了对昂贵条铁的依赖，又在国内形成了从生铁到熟铁直至钢生产的一体化钢铁工业体系，在斯塔福德郡、约克郡，尤其是南威尔士建立了许多一体化冶金企业。从煤和矿石的开采，到铁条的切割和成品的生产，都在同一地点由同一企业进行。这些一体化钢铁企业中，最著名的有苏格兰的卡伦铁厂、威尔金森的铁厂。冶金业的一体化加快了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冶金业各环节的发展。

机械动力的蒸汽化、焦炭冶铁技术的推广以及工业革命期间人口的迅速增长，大大地增加了对煤的需求量，使煤“成为英国工业技术转变的关键性

M.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36 ;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83 ;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221.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16。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第 195 页。
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第 124 页。

保尔·芒图：《18 世纪产业革命》，第 239 页。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526 页。

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24 页。

燃料”。因此，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使采煤业的技术革新必不可少。在采煤业的技术革新当中，蒸汽力的应用占有突出地位。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矿井蒸汽抽水机已经投入使用。随着蒸汽机效率的提高，蒸汽抽水机得以应用到更深的矿井。1775年以后，东北部和米德兰地区若干较大的煤矿采用了“波尔顿—瓦特式”蒸汽机。至19世纪，蒸汽抽水机已普遍用于矿井。18世纪90年代，一些矿井开始以蒸汽卷扬机取代旧式的马力装置。19世纪40年代，在兰开郡和北部的矿井中，卷扬机的功率增加到100—170马力不等。用滑条升降金属车起煤的方法早在1800年以前即已开始试用，1830年后遍及约克郡的浅矿井。1834年—1835年，赫尔设计出了一种双层的金属升降台。这种起煤装置特别适合于深层矿井。19世纪40年代，在一些技术先进的煤矿中，重型起煤机都已安装了金属缆绳。1831年开始采用蒸汽凿井机。1815年戴维发明了安全灯，减少了地下瓦斯爆炸的危险。19世纪40年代，北部煤田的一些较深的矿井使用了火灯通风法。英国的煤炭资源不仅藏量丰富，而且易于开采。英国煤产量的增长非常迅速。1700年—1760年，英国煤产量由300万吨增加至500万吨，1760年—1800年又由500万吨增至1100万吨，至1840年增到3370万吨。英国成为重要的煤炭出口国之一。

M.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P.36.

DeaneandCole, *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 P.55, P.216.

四、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

交通运输业既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先行部门，又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部门。它处于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因此，社会经济的每次重大飞跃，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变革。

内河和沿海水运是英国当时最廉价、最方便的运输方式。自 15 世纪起，英格兰政府就授权一些公司改善内河航运。至 18 世纪初，除山区外，英国绝大部分地区距离通航内河不过 15 英里。18 世纪中期，可航内河的总长度已接近 1400 英里，但各大内河的航线尚未将各大经济区相互沟通。事实表明，仅靠改良原有河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尤其是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的要求。于是，随着桑基运河（1757 年）和布里奇沃特运河（1761 年）的完工，英国掀起了开挖运河的热潮。运河的开凿得到议会的支持。1758 年—1820 年，议会通过 165 项“运河法”，对运河的开凿起了推动作用。至 183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运河 300 英里，苏格兰有 183 英里。至此，英国已大体形成了一个沟通各大内河、连接内地各大经济区并由四大港口通向海外市场的国内水运网。国内水运网的形成，对工业革命的开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运河运输的局限性甚至在它发展之初即已相当明显了：运河网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因此直达运输只限于最小的船舶；严重依赖自然供水状况，造成运输的不定期性和延缓性等弱点；运河运输的船只仍以木材制造，以马力和人力牵引。上述种种缺陷只有用机器大工业来改造水运业才能克服。

将蒸汽动力用于水上运输的试验始于 18 世纪后期。1788 年，苏格兰威廉·赛明顿制成了船用蒸汽机。他制造的“丹达斯”号汽船于 1802 年在福尔斯河至克莱德河之间的运河上试航成功，成为第一艘实用的汽船，但因其明翼激起波浪对河岸损伤较大而未被广泛采用。1812 年 1 月，亨利·贝尔的“慧星”号汽船在克莱德河试航成功。此后，英国的内河和沿海水域开始了定期的汽船运输服务。至 1815 年航行于克莱德河的汽船有 10 艘，航行于英国其它河流的汽船更多。19 世纪 20 年代，汽船运输业已由江河口湾运输发展为春夏秋三季的远距离沿海和跨海峡运输。英国的汽船数量和吨位由 1814 年的 11 艘 542 吨增至 1828 年的 338 艘 30,912 吨。1825 年“英国与殖民地汽船航运公司”的建立，标志着穿越北大西洋的汽船运输试验活动的开始。1838 年，“天狼星”号和“大西”号两艘汽船横渡大西洋成功，并且全程使用蒸汽动力。两年后，穿越北大西洋的定期汽船运输服务正式开始。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一些较大的汽船公司相继建立，专营远洋汽船运输业，英国成了远洋汽船运输的主要国家。当然，汽船运输业此时尚处于起步阶段。

水上运输的另一项重大技术革新是船体铁器化。第一批铁制的小型试验船于 18 世纪末建成。1787 年，约翰·威尔金森的一艘 70 英尺铁制驳船建成

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 1955, P.33 ;J. Walker,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700—1982*, 1982, P.77.

D.H.Aldcroft and M.J.Freeman, *Transpor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83, P.101.

J.Walker,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700—1982*, P.78.

D.R.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1981, P.18.

D.H.Aldcroft and M.J.Freeman, *Transpor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63.

下水。1821年，第一艘铁制汽船“阿伦曼比”号建成下水。它以蒸汽为动力，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塞纳河。以铁取代木材制造的汽船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第一，国内冶铁业的发展为铁船的建造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建筑材料。木船每吨成本由1600年的5镑上升到1805年的36镑，而每吨生铁的成本则由1801年的6.3镑下降到1830年的3.44镑。这不仅使铁船的制造有了原料上的保证，而且使铁船建造成本低于木船。第二，铁制汽船增加了船体硬度，减少了船体重量，从而扩大了船的载货空间，增加了载货重量。一艘铁船的重量比一艘排水量相同的木船小3/4，载货空间大1/6。木船的载货重量只占船总重量的55%，而铁船的相应比重则为65%。由于铁船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至19世纪中期，铁已成为制造船体的主要材料。

航船动力的蒸汽化和建筑材料的铁器化，促进了推进器的改进。1838年，船上开始安装一种新的推进器——螺旋桨，至40年代末，螺旋桨成为普遍采用的推进器。1843年建成下水的“大不列颠”号是当时最大的一艘装有螺旋桨的铁制汽船。由于汽船这种新的水上运输工具刚刚产生，尚需改进和完善，如需要消除海水对锅炉的腐蚀以增大压力，进一步改进船体水面冷凝器等等。在40年代，不论是远洋运输动力的蒸汽化，还是船体的铁器化，尚未最后完成，在远洋运输中木制帆船仍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运输动力的蒸汽化和船体铁器化直接与工业革命的进程相联系，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远洋运输的革命必将最终完成。

19世纪以前，与水运相比，陆路运输在内地运输中处于次要地位，其发展也较为缓慢。自18世纪初，一些税道公司相继建立，负责维修公路。至19世纪30年代，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税道公司1000余家，税道2.2万余英里。这时，英国形成了以伦敦为巨大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的公路运输体系。由于采用了著名筑路师麦特卡夫、特尔福德和麦克达姆的新技术，税道黑夜雨天皆可通行，既加快了运输速度，也降低了运费。因此，正如运河的开凿一样，公路的改良也对工业革命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改良公路毕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内地陆运的状况。迟至1838年，改良的税道只占英格兰驿道总长度的1/6。而且，税道所行驶的一直是木制马车，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如威尔士山区和彭宁山区）则流行着更为落后的畜力驮运。很显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马车运输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内地运输的需求。铁路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内地陆运的状况。

铁路运输业是通过运输动力蒸汽化和运输轨道铁路化而建立起来的。近代铁路的真正始祖是矿车轨道。约在1630年，纽卡斯尔附近的煤矿首先使用木制的矿车轨道。因木料容易磨损，不久便以板轨代之。自18世纪60年代起，铸铁轨开始取代木轨和板轨。18世纪末，纽卡斯尔附近的煤矿开始使用熟铁轨，至19世纪初，其它地方也开始出现熟铁轨。当铁路时代到来时（1825年），英国已建成铁路300英里—400英里。起初，铁轨上留有轨底，以防

D.R.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P.146, PP.142—143.

S.Pollard and P.Ro berston, *The British Shipbuilding Industry 1870—1914*P.14.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41; J.Walker,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700—1982*, P.73; D.H.Aldcroft and M.J. Free-man, *Transpor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60.

Webb, *The Story of the King's Highway*, 1965, P.193.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230.

车轮脱轨。1789年又将轨底改在轮子上，这种方法成为后来铁轨制造的基本模式。

蒸汽机车的发明和应用也有一个演变过程。1784年，威廉·默多克在康沃尔制造了一个火车头模型。1804年，他的弟子特里维西克制成了第一台蒸汽机车，它牵引着5节车厢行走了10英里，但是由于难以保持足够的蒸汽压力，机车无法连续运行。1814年，乔治·斯蒂芬逊制成了一台更为完善的定置机车。它在威尔士的一家煤矿以5英里时速牵引10吨货物试行成功。其缺点是，机车本身及所用煤的重量太大。后来，他又发明了压力通风法，使蒸汽机车完善起来。早期的机车制造者用铸铁制造锅炉，后来开始以熟铁代之，使机车得以按照要求定期运行。1825年，全长37英里的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建成通车。斯蒂芬逊的机车牵引着一列80吨重满载客货的列车试行成功，车速为平均每小时12英里。这条铁路是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客货列车的公共铁路。但是，有的地段仍需使用马力牵引。1830年，全长31英里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建成通车。列车由斯蒂芬逊的“火箭”号蒸汽机车牵引，全线运行成功，最高时速可达29至30英里。这是第一条全线通用蒸汽机车牵引并正式从事客运业务的铁路。

上述两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很快显示出铁路运输业的优越性，英国随之出现了修建铁路的热潮。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继建成了大连接线、伦敦—伯明翰线和大西线等铁路。至1844年，英国已建成通车的铁路线长达2235英里。英国铁路网的主干结构已初步形成：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略呈不规则X形，穿过中部经济区，并由几大港口通向海外市场；在苏格兰则表现为东西连接、沟通海洋并与英格兰相通。这种布局奠定了近代英国铁路建设的基础。铁路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直接推动了采煤、冶铁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降低了运费，保证了各种物资和商品的畅通，从而保证了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

A.W.Kirkaldy and A.D.Evans ,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s of Transport* , 1931 , P.31.

M.C.Reed , *Investment in Railways in Britain 1820—1844* , 1975 , P.2B.R. Mitchel and P.Deane ,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 1962 , P.225.

五、机器制造业的初步建立

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机器本身的生产革命化，即建立机器制造业。机器制造业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最先投入使用的一批纺织机器，几乎全是木制的手工产品，或是由使用人自行制造，或是由钟表匠、木匠和工具制造匠为使用人定制，甚至蒸汽机最早也不是由波尔顿—瓦特商号制造的。他们只提供图纸，监督生产。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开始时虽有机器生产，但尚无真正的机器制造业。

手工生产木制机器有着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成本很高，产量有限，转速不匀，容易磨损，构造简单，功效不高。上述缺陷是由手工方法与木料相适应、相结合而造成的。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那些缺陷，必须从建筑材料、制作方法以及加工工具三个方面进行改革。随着冶铁业的发展，人们逐步开始以铁代替木材来生产机器零件，工厂越来越多地使用金属设备。威尔金森提供的优质汽缸，保证了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成功。铁器零件和设备的应用，必然要求制造方法和工具的改革。铁取代木材，增加了机器材料的硬度，而机器构造的日益复杂则要求零件的精确性和标准化。对此，原有的手工方法及所用的工具已无法满足需要。“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能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

1770年前，波尔顿曾经制成了几部碾压机和车床，但因以水力推动，功率不大，缺乏实用性。这说明，机器制造业同样需要解决动力机械化问题。此后，一系列的机器工具相继出现。1789年—1794年，木匠布拉默和他的助手亨利·莫兹利对重型螺纹切削机床进行了改进。1810年前后，莫兹利应用滑动原理发明了滑动刀架，使切削机得到重大改进，解决了制造精密圆柱体和螺丝的技术难题。后来，理查德·罗伯茨在改造凿穴机的基础上制成了钻孔机和切削机。1821年，几位工程师制造出一部金属刨，后来，罗伯茨又做了改进，使它的形式固定下来。1830年前后，罗伯茨首次制造标准型板用以复制机器零件。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惠特沃斯制成了新的计量工具，改进了计量工作，使工程能够达到相当高的精确程度。随着机器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一些机械商号相继出现。它们借助于工具机生产机器，并且逐步生产出可以替换的机器部件。这表明，机器制造在向独立的工业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机器制造要成为一个得以自立的工业部门，还有赖于动力的机械化。1839年，纳斯密兹发明蒸汽锤。它的锤击力不仅大大加强，而且可以调整以适合各种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种锤特别适合于造船厂和其它大型机器制造厂。它促进了锻造技术的改革，有了它就能生产出安全可靠的远洋轮船主轴和制造机车。另外，工程师们还制造出了结构较为复杂的锻造机，用以锻造纺纱机的纱锭、螺栓、锉刀等机器零件和金属工具。1848年，罗伯茨发明镗床。随着一系列工具机的发明应用，各种形状的金属加工不仅日益精确和标准化，而且能进行配套生产。于是，到19世纪40年代，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工业部门——机器制造业开始发展起来。机器制造业的建立，实现了机器本身的变革，从而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最终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机器制造业发

展的基础上，工业革命才最终得以完成。

第五节 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及历史意义

开始于 18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已经产生了重大后果。它不仅促成了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经济变革，其重大后果首先表现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工业革命开始后，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制和手工工场制。结果，这些工业部门的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均有较快的增长。首先以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门棉纺织业为例。1780年—1800年，不列颠的原棉消费量由655万磅增加到5160万磅；1800年—1849年，整个联合王国原棉消费量由5200万磅增加到6.3亿磅。据迪恩和克尔计算，1810年—1816年，棉纺织业原料投入年均增长率为3.5%，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25年里则为6.5%。与原料投入的迅速增长相并行，棉纺织品产量也在迅速增长。1785年—1850年，棉织品产量由4000万码增至20亿码，增加49倍。19世纪最初25年中，棉纺织品产量增加2倍，1816年—1840年增加3.5倍。

尤其重要的是，原料投入与成品产出的增长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据埃利森计算，到1812年，一个纺工生产的棉纱数量相当于珍妮机发明前200个纺工在同样时间里所生产的棉纱。另有人估计，在1827年的一家棉纺厂里，750个专业合作者利用机器可以生产相当于20万个手纺工所生产的纱线，即提高劳动生产率260多倍。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表现为劳动成本的降低。据埃利森等人估算，19世纪20—40年代，纺纱和织布业的单位产量劳动成本分别减少一半和一半以上。再以采煤、冶铁业为例。煤的开采量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至1850年的4940万吨，净增7.2倍。大不列颠的生铁产量由1788年的68,300吨增加到1847年的200万吨，增长30倍。1788年—1806年，英国生铁产量净增约3倍。进入19世纪后，生铁产量的增长率显著加快，1806年—1847年增长7.2倍。

随着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也不断提高。1770年—1840年，英国工人每一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7倍。英国工业产值如果以1791年为100计算，1841年则增长为425.1。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生产大约增长4倍以上。根据克拉夫茨的最新估计，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760年—1780年为0.7%，1780年—1801年为1.32%，1801年—1831年为1.97%。

B.R.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178, P.179.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P.186, P.187.

P.Dae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83, P.189.

H.Perkin,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1969, P.112.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21;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216.

B.R.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Statistics, P.131.

M.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1700—1820, 1985, P.36.

N.F.R.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85, P.45.

这一估算虽然比过去引用的数据要低，但仍表明，工业革命即使在其发展还不充分时，即已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

经济结构的变化

工业革命不仅促成了主要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而且引起了从手工生产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向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的转变。

棉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门。它率先通过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应用完成了技术改革，进而在 19 世纪 40 年代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初步确立了工厂制大工业的优势地位。这一结构转变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棉纺织业的面貌，从而为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进一步高涨奠定了基础。在棉纺织业的影响和带动下，其它工业部门也相继开始了由手工生产向机器工业的转变。到 1850 年，这一转变在精纺部门已大体完成，而在呢绒、亚麻和丝织业中则正在加速进行着。采煤业和冶金业的某些环节也先后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如蒸汽鼓风设备和蒸汽锤的应用，实现了冶铁动力的蒸汽化；蒸汽抽水机、蒸汽卷扬机及蒸汽凿井机的应用则部分地解决了采煤业的动力蒸汽化和机械化问题。在内地运输业中，作为机器大工业产物的蒸汽机车和铁路迅速战胜传统的公路马车运输和内河木船运输；在沿海和近海运输中，汽船运输已占据主导地位；在远洋运输中，汽船运输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总之，至 1850 年，各主要产业部门或已经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转变，或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使国民经济的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进而引起工业部门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工农业结构的相应变化。

工业革命期间，由于各主要工业部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先后和快慢不同，它们之间的相对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工业革命前，毛纺织业被称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占据绝对优势，而棉纺织业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弱小工业。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这种地位逐渐改变。至 19 世纪最初 10 年的中期，两种工业的成品产值已大体相等。1811 年，棉纺织业产值已占不列颠国民收入的 7%。可见，棉纺织业由于率先而且迅速地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一跃成为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而毛纺织业则由于机械化的缓慢而丧失了其垄断地位。至 19 世纪中期，毛纺织业产值占不列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降至不足 3.2%。在 1812 年的英国工业总产值中，采矿业占 6.9%，钢铁业占 9.2%，棉纺织业占 12.2%，毛纺织业占 11%。同时，交通运输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显著上升。工业革命的展开，使工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工业革命中发生了技术变革的纺织、采煤、冶铁和交通运输业，在英国工业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从而奠定了英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坚实基础。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一向是英国经济的重心。到工业革命前夕，在西北部和中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85, P.199, P.239.

A.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1978, P.78.

W.G.Hoffmann, *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 1955, PP.18—19.

部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兴工业，但是，地区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工业革命开始后，由于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革新，工业生产逐步打破地域限制，分布于更广大的范围内，尤其是向煤、铁资源较为集中的英格兰西北部、苏格兰南部和威尔士南部等地扩展，形成了像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里兹、格拉斯哥等新兴工业中心城市。随着工业重心的转移，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发生变化。工业城市在西北地区的兴起，促使大批人口自东南地区流动到西北地区，人口重心随之向西北地区转移。

经济结构的变化还突出地表现为工农业结构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职业人口的分配和产值构成两方面的变化来说明。工业革命前，职业人口的最大部分分布于农业部门。工业革命开始后，尤其是进入 19 世纪以后，农业部门的职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而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则日益上升。据迪恩与柯尔估算，1801 年—1851 年，不列颠的总职业人口中，农林渔业所占的比重由 35.9% 下降至 21.7%，而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比重则由 29.7% 上升到 42.9%。与此同时，工农业产值所占国民产值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801 年—1851 年，大不列颠国民总产值中，农林渔业所占比重由 32.5% 下降至 20.3%，而工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则由 23.4% 上升到 34.3%。这样，到 19 世纪中期，英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率先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

推动了农业变革

农牧业经济的变革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农业的彻底变革，则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才最终完成的。首先，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加速进行并最终得以完成。在工业革命时期，议会圈地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760 年—1840 年，议会通过圈地法令 3800 多项，圈地面积达 570 万英亩以上。尽管推动圈地运动加速进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城市的发展对农畜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无疑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正因为如此，18 世纪末、19 世纪上半期的圈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更多的商品化农畜产品。另一方面，大工业的发展排挤了农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割断了小手工业者与小农生产的联系，使他们手中原先保有的小块土地转入农业资本家手中，从而彻底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据 1851 年官方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 英亩以上的大型农场占耕地面积一半以上，100—200 英亩的中型农场占耕地面积 20% 以上。可见，正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地主—租地农”式的土地关系确立起来，大农业经营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二，工业革命前早已开始的农业技术改革向纵深发展。工业革命不仅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而且为农业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农业领域得到利用和推广。1788 年—1816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42, P.166.

J.L.and B.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920, P.17.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 557 页。

年，先后发明了条播机、收割机、刈草机、扬场机、松土机和割草机等。化学工业的技术革新产生了制造化学肥料的方法，使化学肥料的使用开始扩散。在工业动力蒸汽化的影响下，蒸汽机也被应用于农业排水。19世纪40年代，发明了陶制排水管，使排水设施有了显著改进。自19世纪30年代起，蒸汽机开始用于农业机械的动力，几乎每个农场主都有一台蒸汽机。这时，专门生产和出售农用机械的公司不断出现。随着农用机械的广泛应用和施肥、排水技术的改进，诺福克制得到推广；施肥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肥料种类日益增加；畜种的改良进一步发展，新品种不断出现。总之，在工业革命期间，农业技术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结果，英国农业生产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据克拉夫茨的最新估算，1780年—1801年英国农业产量年约增长率为0.75%，1801年—1831年为1.18%。

英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前夕，就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来说，英国并不比其它国家高出多少，英国工业的某些技术还落后于一些国家。然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至182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煤产量的75%，生铁产量的40%。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尽管其它国家的工业化有了发展，但直到1850年，英国的煤铁产量仍然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60.2%和50.9%，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仍然高达39%。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1820年—18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8%上升到21%。英国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工商业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英国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作为“世界工厂”，英国在原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方面日益严重地依赖于海外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了它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推销地。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完全依靠进口，至1850年，英国加工了全世界46.1%的棉花。就连传统的毛纺织业在原料的供应上也日益依赖于进口，1845年—1849年，毛纺织业原料进口的比重高达43%。在1844年—1846年进口总额中，生活资料及原料所占比重高达95%。原料和生活资料依赖国外市场，必须以大量的工业品倾销来平衡外贸收支。1849年—1851年，棉纺织业成品产值的出口比重达到61.4%。1850年—1854年，毛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分别为25%和38.7%。19世纪初以后，亚麻工业产值的出口比重也逐渐超过20%。至1850年，英国工业产品大约一半要在国外市场销售。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最突出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

N.F.R.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42.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96.

根据 D. Ralp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979, Table 40 计算得出。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87, P.196, P.205, P.225.

二、社会的变革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同时也是一场社会变革，它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

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

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推动者。工业革命对人口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经济水平不高和抗病能力弱等因素，英国人口增长缓慢，1740年以前英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25%。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太高。18世纪20—30年代，死亡率高达33—37%。

工业革命的发展为人口持续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45%，1811年—1821年更增至1.8%。

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人口迅速增长，而且改变了人口增长模式。以前，人口的缓慢增长，是在保持高死亡率条件下靠更高的出生率来实现的。例如，18世纪初，英国人口死亡率在26—30‰之间，而出生率则为32‰。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情况逐渐起了变化。工业革命提供了人口数量增长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工厂制大工业的发展又将大量童工抛进生产领域。因此，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出生率继续上升仍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工业革命期间的高出生率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了，它是在新的物质条件和新的经济需求下产生的。死亡率的下降成了人口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据人口统计学家布朗利的推算，英国的人口死亡率由1751年—1760年间的30.3‰下降到1831年—1840年间的23.4‰。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尤为显著。据1835年公布的一项估计材料，伦敦的婴儿死亡率在1750年—1830年间减少一半。18世纪前半期，伦敦有近3/4的婴儿不足5岁就夭折，而一个世纪之后，相应比率下降为不足1/3。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饥荒的减少和救济制度的变化等等，而这些因素又都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出现的。事实表明，工业革命使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成为促进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而改变了人口增长的模式。

阶级关系的变动

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口增长的模式，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地位，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关系。工厂制的发展使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及能源等

R.A.Dodgshon and R.A.Butlin,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1978, P.314.

D.V.Glass,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00—1801*, in D.V.Glass and D.E.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1968, P.241.

R.A.Dodgshon and R.A.Butlin,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1978, P.314.

D.V.Glass and D.E.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1968, P.241;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P.124.

D.V.Glass and D.E.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P.241.

G.D.H.Cole and R.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961, P.137, P.138.

一切生产资料统统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使资本家得以直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工人既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又失去了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立性，完全受制于资本家。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利用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左右劳动条件，而在工厂制下，则是工人附属于机器，劳动条件支配工人。这样，资本就最终完全支配了劳动生产的全过程。大工业的发展，以其廉价的工业品为武器，摧毁了无数的城乡小生产者，将他们抛进无产者的行列。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把许多独立的小农也变成了无产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社会日益两级分化，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居民中的一切差别都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作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产物，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形成并壮大起来。

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严重摧残着工人的健康，可怕的失业常常威胁着工人。这一切迫使工人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起初，工人们尚未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能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别开来，于是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机器，掀起了捣毁机器和破坏工厂的斗争，即历史上有名的“卢德运动”。19世纪初，卢德运动以诺丁汉为中心，扩大到全国各个工业区。在斗争过程中，工人们逐渐组织起来。18世纪末，熟练工人开始以俱乐部形式组织工会。自1792年起，兰开郡的工会开始组织地区性罢工。至19世纪20—30年代，分散的地方性工会发展成为全国性工会，并开始领导工人从事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起初，工人们与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议会改革运动。在斗争的实践活动中，工人们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开始认识到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家是根本对立的，因而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意识。于是，工人们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独立的政治斗争。它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一个自发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创造出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工业革命开始后，以阿克莱特、波尔顿和威尔金森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积极投入到技术革新和创办企业的热潮之中，借着机器工业的经济优势，靠着自身的才能和努力，在财富的阶梯上步步高升。随着工厂制不断取代手工工场，由无数个工厂主组成的工业资本家集团日益兴起，与工业无产阶级相对立，成了英国社会的两大阶级。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业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矛盾。

社会结构的变化

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它使英国最先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城市的发展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直到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变革力量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工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60年的

25%上升到 1851 年的 50%以上。1760 年—1814 年,5 万人以上的城市由两个增加到 24 个。此时,全国近 1/3 以上的人生活在 2 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至 19 世纪中期,“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代。

在城市化过程中,英国城市社会的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至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社会已经明确地演变出三股主要社会力量: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和下层工资劳动者,由这三股社会力量所构成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大体形成。在这种社会里,工业成为广大居民的主要劳动部门,工业财富、工业资本及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着中心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在人数上、财富上和社会力量上压倒土地贵族,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

A.E.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1978, P.140; E.L.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700—1939*, 1942, P.229.

J.Steven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1760—1815, 1960, P.517.

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

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曾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工业革命的开展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工业革命的发展为科学试验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新的研究、试验手段。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许多实际问题，要求人们去认识、解决，从而促使人们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活动。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为了提高工厂的生产率，开始注重工人的技术知识培训。企业家马修·波尔顿曾及时地认识到，要使蒸汽机的应用获得成功，就必须培养优秀工人。早在1760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安德森教授首创工人教育。至1826年，英国各大城市和许多中小城镇设立了职工讲习所。它们给广大的非熟练工人传授了必要的知识，使他们很快适应了机器大生产的需要。工业革命对技术的需要，促使英国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19世纪上半期，英国兴起了创办机械学校和工学院的热潮。著名的伦敦大学创办于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和欧文学院也分别于1826年、1851年创立。这些新建学院将实用科学放在首位，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与此同时，英国的各种文化团体相继建立，例如皇家艺术协会、伯明翰新月会和曼彻斯特文学哲学协会等等。据统计，1780年—1850年英国的各种科学团体由14个增至139个。这些团体创办刊物，交流信息，培养人才，资助科研，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自然科学方面，出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焦耳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文学艺术上，产生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四、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

工业革命在确立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它在欧美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欧美各国资本及生产资料的主要供应者，英国在工业革命中所产生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设备和管理方法，很快突破国界的限制，传入到欧美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英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欧美及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的国家相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即使到 20 世纪中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在继续着自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始的工业化道路，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时代。

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前的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生产力的水平仍未达到维持人人温饱的程度。然而，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就英国来说，在 19 世纪的一百年当中，人口增加 3 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却增加 4 倍。就世界范围来看，1850 年全世界有 12 亿人，1950 年增至 25 亿。联合国的有关资料说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足以保证全世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人达到温饱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可见，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工业革命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卷入世界贸易的地区开始具有全球性，世界贸易规模日趋扩大，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变革力量，把尚处于世界市场之外的一切民族和国家统统卷入世界贸易的漩涡。机器大工业不仅生产出可供世界市场消费的工业品，而且产生了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于是，随着工业革命向欧美各国的扩散，建立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近代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工业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新阶段。

总之，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实际上超过一般的政治革命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从石器时代走向金属工具时代的革命差可与之相提并论。当然，英国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一些阴暗消极的结果。两百年来，在英国及其它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上的贫穷和贫富不均现象非但没有消除，甚至有所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不平等也显示出不断增长的迹象。至于大量的失业现象，更是工业化国家所从来未能治愈的痼疾。整个生产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造成无法避免的社会混乱。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都被吸引到追逐物质财富上去了，物欲横流，金钱第一，连友谊、安闲、艺术、时间都要用金钱来衡量。可见，工业革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幸。不过，相比之下，前者是第一位的。

H.Perkin,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1918, P.1, P.4.

R.M. 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979, P.1.

第六节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史学述评

英国工业革命不仅在英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一直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恩格斯在 1845 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书中对工业革命作了科学的定义，并且对它的实质和结果作了深刻的分析。1880 年—1882 年，阿诺德·汤因比在牛津大学首次开办工业革命讲座，开始把工业革命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列入历史学科。1884 年，汤因比的学生把讲稿整理成《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讲义》一书正式出版。此后，研究工业革命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细致。与此同时，学者们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里，仅就下列几方面的争论略加述评。

A. Toynbee ,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1884.

一、“工业革命”是不是“革命”

“工业革命”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末。当时人们对英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印象，因而以“革命”一词加以表述。至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就是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引起了英国“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好像哲学革命对德国，政治革命对法国一样。”汤因比在论述工业革命的后果时讲道：“首先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人口更快地增长……其次我们注意到，农业人口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在工业中，最重要的现象则是，由于机器的发明，工厂制代替了家庭手工业制度。”可见，最初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化，并且认为“这些变化……是突然的和猛烈的。一些伟大的发明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总之，这一批人把工业革命看成英国经济发展的飞跃，是明显的转折。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一词的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批人可以称之为“革命论”者。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工业革命”所指的那些变化经历了长时期的准备，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也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于是，他们对“工业革命”一词的科学性提出异议，认为像这样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过程，用“革命”一词规范不太合适，“很需要一个新的标签”加以代替。克拉潘在《现代英国经济史》（1929年—1932年间出版）中对那种认为在较短时期内发生猛烈变革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比尔斯说，“工业革命”一词令人困窘，因为被称为革命的那些变化是渐进的，你不可能找到这个变化的开始和结尾。新的经济思想、修改了的经济政策、调整了的经济关系，都是逐步形成的。总之，在这批人看来，“工业革命”所指的那些变化并非突变，而是渐进的，因而不能称之为“革命”。这一批可以称之为“渐进论”者。

对于“渐进论”者的异议，霍布斯鲍姆争辩说，“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或大约这个时期的突然的、质的和根本的变化都不是革命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含义了。”我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不同于政治事件。一场政治革命从开始到结束，一般都是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完成的，带有突变的性质。而社会经济的演变相对于政治革命来说，则是一个长

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早在1788年，阿瑟·扬把技术上的重大变革称为“工业革命”；（2）一位法国作者在18世纪首先创造出“工业革命”一词；（3）法国人布朗基在19世纪初首先使用“工业革命”一词；（4）汤因比在《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讲义》一书中首创“工业革命”一词；（5）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首先使用“工业革命”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81页，第296页。

A. Toynbee, op.cit. P.85, P.90.

H.B. Gibbons, Industry in England, 1897, P.341.

R.H. Tawney (ed),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Gunwin, 1927, P.15.

H. Heat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932, P.5.

E.L. Beal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30, 1958, PP.28—30.

E.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 1962, P.29.

期的过程。将“革命”一词引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其意义显然是指一个相对迅速的、具有特定内容的变革时期。对工业革命全过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即使“渐进论”者也无法否认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革命论”者也无法否认工业革命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延续性特点。如果将前文所论述的英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那些重大变化放在人类社会经济史的长河中考察，那么，英国工业革命即使经历了上百年的长期过程，仍然具有猛烈变革的“革命”意义，而并非一般的经济演变过程。

二、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

对工业革命起因的解释，大体上可分为“单因论”（或“主要原因论”）和“多因论”两派。汤因比认为，英国社会的“自由”对工业革命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是主要推动力。坎宁安认为，日益增加的资本积累和不断扩大的市场相结合，是英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保尔·芒图考察了工业革命前夕的各种变化，认为，工业革命本质上是商业现象，“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包登等一些历史学家强调需求和市场的作用，认为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海外市场的日益扩大使新的生产方法必不可少。哈特威尔等人则更强调国内需求的作用。他们指出，工业品最大的市场在国内，“是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广泛的领域内刺激了工业的增长……”由此可见，这一批史学家虽不排除其它因素的作用，但主要强调一个或两个原因的主导作用，因而实际上是“单因论”者。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起因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李普森认为，工业革命的起因与下列因素有关：海外贸易的扩大、资本的积累、人口的增长、煤炭的早期开发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艾什顿在《1760年—1830年英国工业革命》一书中，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方面分析了工业革命的起因，认为“不断增长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使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迪恩和柯尔认为，农业的变化和人口的增长在18世纪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派学者把工业革命的发生看作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称之为“多因论”者。

不论是“单因论”，还是“多因论”，对工业革命起因的解释都存在着缺陷。英国的工业革命是最早开始的，它的起因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与经济因素有关，而且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因素有关，用一两个因素来说明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英国工业发展中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其它国家（如法国）同样存在。因此，像“多因论”那样仅仅列出相关的因素也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将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因素作综合分析，找出英国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总体性特征，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A.Toynbeen, op.cit.P.64, PP. 204—220.

W, 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Times, 1882, Vol. ,P. 610.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67页，第68页，第84页。

W.Bowden, 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toward the End of Eighteenth Century, 1925, P. 68.

R.M.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967, PP.74—75.

Ibid.第189及以后几页。

T.S.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1968, P.17.

P.De 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9, PP.82—97.

三、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争论

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变化，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普遍幸福的生长，还是灾难临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

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的后果是“悲惨的和可怕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贫穷也大大地加深了。“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罗杰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整个劳工史上最坏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企图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工业革命首先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好处。利瓦伊根据他对 1851 年—1880 年工资的统计，认为在此期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 59%，而企业家的家庭平均收入却降低了 34%。另一本书认为，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穷人的人数略有减少，而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的平均收入比 50 年前多了两倍，因此“穷人得到了几乎所有那些在过去 50 年所取得的巨大物质发展的好处”。此后，两派长期争论不休。

20 世纪初，哈孟德夫妇写了几部著作，集中论述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根据英国王家委员会的报告和当时人的言论，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认为工厂主对待工人就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工人麇集的大城市“不过是工业的兵营”，“那里没有色彩、曲调和笑声，只有男女老幼在里面劳动、吃饭和睡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史家克拉潘以其他人编制的工资物价统计资料为依据，认为在 1790 年—1850 年，就广大城市和工业工人来说，不论是幸运的或不幸运的，工资额提高约 40%。对此论点，哈孟德夫妇指出，虽然在个别场合，工人的工资待遇从数字上看有所提高，但是工人的生活“质量”却大大降低了。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他们的人格受到屈辱，精神受到折磨，在无情的大生产体制中忍受煎熬。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他们都沉沦于黑暗和悲惨的深渊。此后，参加争论的学者日益增多，进而形成了以霍布斯鲍姆为主要代表的“悲观派”和以哈特韦尔为主要代表的“乐观派”。

霍布斯鲍姆承认，从长时期发展来看，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工业革命进行期间，从工人死亡率和失业率

参见王觉非，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11—437 页。

A. Toynbeen, op. cit. P. 93.

T. Rogers, Preface to Abridged Version of Works and Wages, 1885, P. 128.

L. Levi, Wages and Earning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85, P. 55.

R. Giffen, The Progress of Working Classes in the Last Half - Century, Reprinted in Essays in Finance, 2nd series, 1886, P. 406.

J. L. and B. Hammond, The Town Labourer, 1978, P. 27. 哈蒙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第 216—217 页。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 687 页，第 171 页。

J. L. Hammo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Discont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st series 1930, PP. 215—228.

以及食品消费来看，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而是恶化了。哈特韦尔对此提出批评，他通过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得出结论：1801年—1851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5%。工人运动史家汤姆逊研究了工人的发病率和消费方式后认为，1790年—184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稍有进展，但这种进展在居民不同阶层中的分配情况并不清楚。而且，物质收入水平并不等于生活内容的全部，“人们可能消费更多的商品，但同时却变得更为不幸和更不自由。”1790年以后，南方人民的食品中，小麦渐被马铃薯、燕麦取代，而在北方，小麦的地盘逐渐被马铃薯侵入。——在他看来，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长期以来，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一直未能得出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其原因如下：1. 在争论的时限上各有选择，由于时限不同，即使同样的资料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2. 研究的地区也不一致，不同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用局部地区的资料当然无法对全国范围的实际工资水平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估算。3. 忽略了不同行业和部门中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差异，以熟练工人工资提高的事实掩盖了广大非熟练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4. 关于“生活水平”的内涵理解不一。“悲观派”强调工人生活的“质量”，着重揭露工人群众工作环境的恶劣、劳动时间的漫长、居住条件的拥挤以及女工童工的悲惨待遇，而“乐观派”则强调可以计量的物质因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工资水平、价格水平、平均实际工资等等。“悲观派”强调国民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分配的不平均状况，而“乐观派”则习惯于统而论之。5. 资料方面有缺陷。“悲观派”主要依据当时人的描述及各种调查报告，缺少定量分析；“乐观派”主要依据统计资料，但这些统计资料既不全面，又不准确，有些甚至只是猜测和分析。6. 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那些对无产阶级的苦难抱有深刻同情的左翼作家，大都持“悲观派”的态度，同样，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肯定会带来幸福的人则持“乐观论”的态度。政治立场不同决定了双方着眼点的不同，因而无法取得双方一致的结论。

今天我们来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和历史意义，已经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少或降低多少上面了。实际上，如果把起点放得高一些，视野开阔一些，就会看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乐观派”所斤斤计较的那些数字。至于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阴暗、消极现象，不仅在工业革命进行的时候非常严重，即使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是英国及其它工业化国家所天天面临的现实，是千万人朝夕焦虑的问题，怎么能够回避呢！

E.J.Hobsbawm,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92—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 1970, P.49, P.57.

E.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Working Class*, 1979, P.39.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P.347, P.248.

P.Deane,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65, P.238.

四、关于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在以机器大工业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迫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它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成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原始积累全过程的基础。” 英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圈地剥夺了小农的土地，把他们抛向城市，从而形成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例如，斯莱特在《英格兰农民与公田的圈围》一书中认为，圈地导致了土地的集中，引起了农民阶级的消失和无地雇工的增加。同时代的人留下了许多关于圈地使小农减少的记录。但是后来，有些人对上述论点提出异议，特别是在现代，反对上述观点的人越来越多。H.L.格雷教授详细考察了牛津郡的记录后得出结论，圈地与自耕农的消失没有必然联系。明格认为，圈地并不是产生无地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农村劳工因圈地陷入贫困而到城市求职的现象并不普遍。有的人更加明确地指出：“轮种制和圈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严重地限制了农业为其它经济部门提供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业劳动力，不是来源于圈地运动驱赶出来的农村劳工，而是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 另外一些人对前述两种观点予以修正，提出了折衷的观点。他们承认农村劳工向城市转移的现象，但又认为，不是通过圈地赶去的，而是被城市里的高工资吸引去的。

事实上，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涉及到城乡人口的增长情况、农业的发展变革以及工业的发展诸方面，任何简单化的研究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前述英国史学界的三种观点都有商榷的必要。首先，认为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人口自然增长的说法，显然有悖于历史实际。众所周知，直到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人口中仍以农村人口居多。工业革命开始后，城乡人口相对比重发生了变化，至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工业在业人口比重也超过农业在业人口比重。如果说工业劳动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人口自然增长，那么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必须大大高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然而，根据人口史专家们的研究，在工业化初期，城市人口死亡率普遍比农村高，而出生率又不比农村高。可见，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会高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只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显然不能保证城市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和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开展。第二，认为农业技术改革和圈地运动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因而农村不可能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说法，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农业技术改革和圈地运动确实增加了农业劳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

G.Slater,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 Fields*, 1907.

L.Moffitt, *England on the Ev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40—1760*, 1963, P.56.

G.E.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3, P.186.

J.D.Chambers and G.E.Minga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1880*, 1984, P.99.

R.Flound and D.McClosk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1981, Vol, I, P.190.

A.Redford, *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1800—1850*, 1964, P.184; 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 1955, P.129.

动力的数量。但是，农业人口的增长远远低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于工业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大为下降，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远低于产量的增长。这些公认的事实说明，农村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第三，认为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充当工业劳动力是被城市里较高的工资吸引而去的说法是片面的。工厂工人收入高于家庭手工业者的事实是存在的，但工厂主并不是毫无困难就能将他们变成工厂工人。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家庭手工业者向工厂工人的转变，既取决农业的变革，也取决于工业的发展。第四，把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工厂工人的现象仅仅归因于圈地也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小农的衰落是个复杂的经济淘汰过程。它既与圈地运动有关，又与土地市场有关，还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有关。总之，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不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由农业变革和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农村过剩人口的转移。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否认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的变革，否认了英国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

J.D.Chambers, *Enclosure and Labour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st ser.V 1953, PP.522—523.

G.D.H.ColeandR.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746—1946*, 1961, P.139—140.

E.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9, P.92.

第五章 18 世纪 60—80 年代的英国

第一节 60 年代的英国政局

一、乔治三世时期王权的加强

乔治三世登位时的社会背景

60 年代，由于英国资本主义深入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来临，英国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转变时期。1760 年乔治三世登位后，英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动荡多变的局面，政府更迭频繁不定，党派斗争越演越烈，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在此政局中，乔治三世力图恢复某些已失去的君主权力和君主权，建立其个人统治。18 世纪上半叶相对平缓的历史发展时期结束了。

此时，英国贵族地主阶级仍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主宰政治生活。不过，这个阶级本身已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在 18 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坚持旧生产方式和经营方法的地主贵族在经济上已趋没落，同时，他们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农业改良技术，并兼营一些工商业。如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所指出的：“前一代贵族只对狩猎感兴趣，仅仅谈论马和犬；这一代则谈论肥料、轮种、苜蓿和萝卜。”这种变化造就了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其次，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圈地运动发展速度加快，形成新高潮。1760 年之前，议会共颁布了 214 项圈地法令，而在 60 年代就颁布了 385 个圈地法令，圈地 70 余万英亩。70 年代的圈地法令则多达 642 个。资本主义化贵族地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由此大为增强。所以，在 18 世纪英国，“土地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至 18 世纪末，已经有 400 个大地主家族，各自拥有至少 5000 英亩以上的土地，年均土地收入约 1 万镑。还有大约 4000 个称作乡绅的家族，每个乡绅的土地年收入约为 500—1000 镑。这些地主在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中都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

在 18 世纪的英国经济发展中，资产阶级也进一步成长壮大起来。其上层是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经济实力雄厚，如英格兰银行、大贸易公司和交易所的银行家和大股东们，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资产阶级中很大部分是以普通商人、手工工场主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越来越活跃，60—80 年代仅是它的早期发展阶段，但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逐渐增长。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使他们感到自己分享的权力与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称。1761 年的议会大选中，商人在下院仅占 50 个议席，不足议员总数的 1/11。追求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已成为这个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

18 世纪后期的社会经济大变革使小农、贫穷市民、手工业工人等下层人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127 页。

L.W.Moffi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5, P.105.

P.Horn, *The Rural World 1780—1850*, 1980, P.24.

L.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1957, P.170.

民陷入深重苦难。圈地运动的浪潮无情地吞没着小农经济，小农作为一个阶级正遭受灭顶之灾。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使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或进入工厂出卖劳力。工业无产阶级也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下层人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是常见之事，他们因而时常掀起反抗斗争，反对圈地运动，举行“食物暴动”，捣毁机器。当时曾有人惊呼“盗贼”蜂涌，天下不太平。小沃波尔曾就当时社会治安写道：“一个人若是不得不去旅行，即使在大白天，也好像是去上战场。”

主要社会矛盾

在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贵族地主阶级同其他两个阶级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贵族地主阶级是英国社会中保守顽固的阶级。为了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和对政权的垄断，这个阶级极力反对一切不合其私利的社会变革和内外政策，并自视为国家主人，睥睨其他阶级。资产阶级则在经济和政治上与贵族地主有着矛盾。依据重商主义理论而制定的保护性关税已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扩张的重大障碍。他们谴责贵族地主利用手中权力推行谷物法，“增加了制造业主的开支，阻碍了我们的工业品出口，”抨击地主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在制定政策时忽视工商业的利益。从60年代起，这个阶级举起激进主义大旗，要求改革议会，公开向贵族地主争政权。1761年，一位伦敦城的议员在下院中宣称：关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国家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亦能使之烦恼忧愁，他们对此感受最深，有权对国家的状况和行动加以干预。”这是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明确呼声。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之间矛盾日趋深化，开始出现公开的激烈斗争。

自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之后，由少数辉格党贵族组成的政治权势集团一直紧紧地控制着政府的议会。来自德国汉诺威的君主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甚至连英语也说不不好，有时还长居于自己在德国的领地不理朝政，充当挂名虚君。在辉格党寡头统治之下，政府与议会中的腐败堕落现象层出不穷。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裙带关系、操纵选举等等丑行司空见惯。政府内外政策也常招致非议和抨击，尤其引起工厂主、商人们并包括不少中小地主的强烈不满。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虽然战果赫赫，但代价巨大，国家债台高筑，物价大涨。战前，国家一年的征税约为400万英镑，开战后3年即猛增至每年近2000万英镑；至1763年时，国债已高达13.2亿英镑。而且，为了补充军队兵源，政府甚至派人在大街上四处肆意强抓壮丁，更使民怨鼎沸。后来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当时就曾险遭被抓壮丁的命运。七年战争使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开拓了空前广大的殖民地市场，使他们财源滚滚，获得长远利益。因此，他们希望继续乘胜进行战争并扩大这场战争，

G.E.Mingay,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1956, P.129.

H.T.Dickinso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18th Century*, 1974, P.35.

R.Pares and A.J.P.Taylor,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Namier*, 1956, P.66.

J.S.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1760—1815, 1960, P72; C.G.Robert-son, *England under Hanoverian*, 1928, P.288.

坚持要求也同西班牙开战。正在领导英国进行战争的老皮特坚决主张把竞争对手法国“不是打得跪下，而是要彻底打翻在地。”反对进行和谈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急于进行海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他抨击和谈的主张是忘记了“英国的商业和海上霸权的最可怕敌人正是法国”。与之相反，贵族地主们鉴于1761年时英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但战争仍在扩大，战费持续大增的情况，要求进行和谈，结束战争。因为他们主要经营农业，不仅不能直接从战争中和战后的殖民商贸中获取更多利益，反而继续承担了部分战费。此外，多年的战争使人们怨声载道，加剧了多种社会矛盾。这些反对战争和辉格寡头统治的不满情绪，终于为乔治三世及其拥护者们所利用。

王政思潮

还在50年代，在贵族地主阶级中就掀起了一股以“爱国”和“忠君”为口号的拥护“爱国君主”的王政思潮。“爱国君主”一词表面上是针对乔治一世、乔治二世而发的，因为他们都不是英国血统，只是“外来的”虚君。实际上，这股王政思潮表明贵族地主阶级企图利用已几近虚名的王权，加强本阶级的政治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也反映了长期在野的托利党对辉格党的强烈不满。“爱国君主论”是托利党首领博林布罗克首先提出的。他的代表作《爱国君主思想》于1752年问世，突出地表现了这股王政思潮。他在政治思想上是霍布斯的追随者，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他毫不掩饰地对成长壮大中的资产阶级表示恐惧，惊呼资本利益已成为土地利益的政治对手。他强调贵族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次关系，认为“地主才是我国政治航船上的真正主人，而资本家只是船上乘客。”他还主张君主集权，反对“篡权”的内阁与政党，认为国王应是“人民的中心”，“作为人民的首脑而统治”，“爱国君主”是“不信奉党派的，而是作为万民之父进行统治”，“党派乃是一种政治罪恶”，“要镇压一切党派”，“爱国君主”应该“一登位即开始统治”，首要之事就是惩治旧大臣，起用“明智而不狡猾的大臣”。他视“爱国君主”为贵族地主利益的唯一保障，认为“只有他才能把国家从现在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博林布罗克的《爱国君主思想》1752年公开出版后，王政思潮渐渐风行起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攻击辉格党、鼓吹王权，甚至为斯图亚特王朝公开翻案的书刊。大卫·休谟抨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史》大受欢迎，成了畅销书。60年代，“国王之友”派大肆鼓吹恢复国王权力，猛烈抨击辉格党寡头建立的内阁篡取了原属于国王的权力，称乔治三世“正奋力铲除这根深蒂固的内阁制度”，要求国王“既不要把政府完全交给大臣们，也不让他们徒具虚名，只把他们当大臣使用……当做手中的权力工具”。一本小册子呼吁国王“要下定决心打破一切结党联盟”，认为宪法的真正精神“不是国王

C.G.Robertson, op.cit.P.158.

J.H.Plumb, Makers of History—Chatham, 1965, P.90.

H.T.Dickinson, Bolingbroke, 1970, P.252, P.290, P.264.

H.T.Dickinson, Bolingbroke, 1970, P.252, P.290, P.264.

L.Stephen, History of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 1927,Vol. .P.177, P.178.

依赖大臣，而是大臣依赖国王”。更有人直接请求乔治三世“绝不要像乔治二世那样变成带着枷锁的国王”。1765年后，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在他那陆续出版的法学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内阁制度未见诸法律，不能改变君权，并力陈国王的种种权力。

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早年丧父，其母是封建意识浓厚的德国公主。她极力向王子灌输君主思想，经常告诫儿子“要像国王”。小沃波尔在当时曾如此描述这位太后：她“野心勃勃，欲图在新朝之中显露自己……热衷权力，贪求名利。”

“在乔治三世登上王位后，她的举动就像她有权指挥他的政务一样。”这位王子的周围多是所谓“托利党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乔治三世憎恨辉格党人，认为乔治二世屈从于辉格党是一种耻辱。他曾写下《论阿尔弗雷德国王》一文，表达自己对这位受命于危难之时，完成英国统一大业的封建帝王的倾慕之情，希望能效仿他，“挫败一切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欺骗者的阴谋诡计。”1758年，他在写给布特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表明他要亲自掌权的决心，并预先为之策划：“大概你的担心是，我将对我的大臣们说话不够坚定有力，或者如果他们提出我未预料到的问题，我会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至于前者，我可以极为明确地保证使他们任何人都看不到我的言行举止中缺乏坚定，至于后者，我可以尽力拖延，直至和你充分考虑应采取的适当对策。”此信还谈及布特在乔治三世登位后的任职。乔治三世登位后还高弹“爱国君主论”，谴责“党派是这个可怜的国家最大敌人”，认为大臣不过是国王手中的工具。他公然蔑视资产阶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帮下贱的店主竟妄想对整个立法机构发号施令！”

1760年11月，他在国内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登上王位。

他在登位诏书中称自己生活在英国，受教育于英国，以英国为荣，借此表示自己与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不同，以便博取民心。但他随后又表示“我决不让大臣作践我，”否则“我的臣民们就会认为我不配为国王。”他首先利用“七年战争”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笼络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摧垮辉格党寡头的长期统治，为加强王权实行个人统治铺平道路。他曾在登位诏书草稿中企图公开谴责“七年战争”是“血腥和耗资巨大”的战争。这是向主战的

H.Butterfield, George and the Historians, 1957, PP.46—48.

S.Macooby, English Radicalism 1762—1785.1955, P.17.

H.Walpole, Memoris of theReignof George, 1970, Vol., P.10, P.14.

W.Hunt,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to the Close of Pitt's First Administration, 1930, Vol.10, P.4.

L.Namier, England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1974, PP.92—93.

L.Namier, Crossroads of Power, 1962, P.134.

R.Sedgwick, Letters from George to Lord Bute, 1756—1762, 1939, No.290, March 30, 1763.

C.G.Robertson, England under Hanoverian, P.217.

R.Sedgwick, op.cit.No.63.

Annual Register, 1762, P.179.

辉格党发出的直接挑战，虽在老皮特等人的强烈反对下修改成争取持久和平的言辞，但仍在朝野中引起巨大震动。他的宠臣布特后来证实他有一项排斥限制王权的大臣、聚集拥君力量而独揽大权的计划。

L.Namier , England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 P. 59.

E.N.Williams (ed) , The 18th Century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m-tary , 1960 , P.88.

二、“国王之友”政府

布特政府和“国王之友”派

乔治三世登位后，在布特等人的参预之下，清除异己，培植君主势力，依靠那些“一贯以依附王权为唯一原则而行动的人们”进行统治。60年代中，英国10年间更替了6届政府。当时由国王亲信人物组成的政府被称为“国王之友”政府。第一届“国王之友”政府于1762年5月正式组成，以布特为首。布特从40年代起，就与当时尚是孩童的乔治王子有了密切接触，后为其监护人，经常出入王子的宫廷，深得这位未来君主的宠信，并且对他有过很大的影响。乔治三世与他长年书信交往频繁，并称他为“最亲爱的朋友”，经常与他磋商自己的许多重要私事和政务。在60年代前期，布特不仅是国王心腹亲信，也是“国王之友”派的核心人物。

乔治三世在1761年3月宣布举行议会大选。“国王之友”们利用对辉格党寡头长期统治的种种强烈不满，积极进行各种贿赂拉票活动，在选举中沉重打击了辉格党。选举前夕，布特就稳操胜券，兴高采烈地预言：“新议会必将是国王的议会。”选举后，辉格党首领之一纽卡斯尔公爵被迫承认：“在英格兰许多地方，辉格党人都被抛弃了。”1761年大选后辉格党一蹶不振，国王大受欢迎。这次大选标志乔治三世取得了贵族地主的支持，也为布特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同时，乔治三世开始一反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不直接干预政务的惯例，经常操纵或直接主持内阁会议。他不顾老皮特等辉格党人的强烈反对，坚持由国王任命大臣的做法，1761年3月任命布特进入辉格党纽卡斯尔公爵和老皮特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以此作为自己直接控制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乔治三世于9月在致布特的信中明确表示要在一个适当时机将老皮特逐出政府。10月，老皮特被迫辞职。从此，布特在实际上控制了政府。次年5月，乔治三世任命布特为首席财政大臣，取代了纽卡斯尔公爵，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国王之友”政府。纽卡斯尔公爵的下台，宣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辉格党统治的崩溃。

乔治三世和布特随后在政府中大肆清洗异己，辉格党人以及反对“七年战争”停战和谈的官员都统统被赶走，甚至退休者的年金也被褫夺，“国王之友”派宣称这是一场“宫廷革命”。乔治三世声称：“除了君主青睐者外，无人能逃过这些清洗。”一位贵族写信给布特：“被我们征服的敌人昨夜还十分傲慢无礼，但只要陛下不予宽厚相待，不会再有这种情况。考虑到他们在陛下政府中的庞大势力，阁下要特别注意不要留下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您心目中的敌人。”另一方面，乔治三世和布特一直在积极网罗各种势

L.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1957, P.8.

S.Ayling, *George the Third*, 1972, P.73.

L.Namier, *England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P.140.

R.Sedgwick, *op.cit.*P.63.

H.Buttfield, *George and the Historian*, PP.45.51.

R.Pares, *George and the Politician*, 1953, P.104.

W.E.H.Lecky, *A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1899.Vol. , P.56.

力以培植君主个人力量。自 1745 年斯图亚特王朝残余力量最后一次复辟行动失败后，不少詹姆斯党人感到复辟无望，欲图改弦易辙。乔治三世则与他们握手言欢，利用他们支持自己。这些人现在趾高气扬地出入从前是他们禁地的国王宫廷。小沃尔波尔就此写道：“他们抛弃了旧主子，却带着往日的偏见，保留了他们的原则，来到了宫廷……君权一词又时髦了起来。”大封贵族是乔治三世拉拢地主势力支持自己的又一重要手段。1760 年前英国仅有 174 名贵族，而乔治三世仅在 60 年代中就封了 42 名贵族，70 年代则封了 33 名贵族，其目的是能借此控制议会上院。在下院，乔治三世也以贿赂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控制了一大批议员。如 1761 年选出的 558 名议员中，仅约有 300 人未从政府获取职位、合同或年金。乔治三世借这些手段逐步造成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君主势力集团，大大加强了对国家政府机构的控制。布特明确说过：“‘国王之友’们已联合起来，这是支持国王独立的唯一手段。”此时，半个世纪以来处于瓦解和在野状态的托利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国王之友”派为其核心得到复兴。

旧辉格党长期寡头统治的崩溃和布特的“国王之友”政府的上台，是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开始形成的第一步，也是此后 20 年英国政界中党派分化组合和纷争不已的开始，旧辉格党本身也随之瓦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辉格党长期的政治腐败使其失去人心，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内的贵族地主纷纷投向乔治三世。此后，旧辉格党分化为几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如老皮特派、罗金厄姆派等。

“七年战争”结束及布特下台

布特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结束“七年战争”。经过反复的谈判，1762 年 10 月，英国同法国拟订了和约草案。1763 年 2 月，英法签订巴黎和约，尽管这个和约有利于英国，但为了使议会顺利批准，乔治三世和布特仍不惜以大量金钱贿赂议员。政府公开收买议员，而议员们则以 200 镑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票。有的财政官员后来承认，一个早上就花去了 2.5 万镑，半个月之内就收买了一个巨大的议会多数去批准和约。表决之日，尽管老皮特以 3 个半小时的长篇演说反对和约，但和约仍以 319 票赞成，65 票反对获得通过。

王权的增长，托利党的复兴，贵族地主们的嚣张气焰和巴黎和约的签订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布特则成为他们猛烈攻击的首要目标。还在 1760 年 11 月乔治三世刚刚登位之时，伦敦皇家交易所就出现一幅标语：“不要女人政府！不要苏格兰大臣！不要乔治·塞克维尔勋爵！”此标语分别暗指国王的母亲、布特（他是苏格兰人）和詹姆斯党人。布特的模拟像曾在伦敦大街被焚毁。关于布特与国王之母有暧昧关系的流言蜚语更是四处流传。1763 年初，布特政府为解决巨额战债问题而征收苹果酒税，引起了强烈不

H.Walpole, *Memoris of the Reige of George* , Vol.I , P.13.

L.Namier , *England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 P.224.

L.Namier , *Crossroads of Power* , P.83.

H.Butterfield , *Ge orge and the Historian* , P.113.

满。在捐税重压之下的各阶层此时都把任何增税视为暴政。资产阶级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抨击布特。伦敦城的资产阶级更是一马当先，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多次通过请愿向国王和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废除苹果酒税。苹果酒产地的贵族地主们也对政府深表不满。在接二连三的猛烈攻击之下，布特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政府中呆下去，乔治三世亦感到换马为宜，于是决定布特退居幕后操纵。1763年4月布特宣布辞职。在他的安排下，另一位“国王之友”乔治·格伦维尔组成了新一届政府。

《北方不列颠人报》事件

格伦维尔的上台使在野的老皮特、罗金厄姆等辉格党人更为不满，他们加紧了对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派的反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由威尔克斯主编的《北方不列颠人报》，该报一直尽力抨击“国王之友”政府，经常含沙射影地攻击国王，成为乔治三世的眼中钉。1763年2月，乔治三世就曾向布特表示：“我希望法官对该报采取行动。”4月布特下台后不久，在老皮特等人授意之下，威尔克斯在该报第45期上载文直接抨击国王及其政策，宣称国王不过是头号治安官，执行君主权力时要向人民负责；在任命大臣的“特别职责”中，国王与最低下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他还警告国王不得步斯图亚特王朝专制君主的后尘，高呼“自由是英国人民的特权”。如此大胆的抨击震怒了国王和“国王之友”内阁，他们立即蓄意违反法律，由大臣直接下达未指明逮捕何人的非法逮捕令，拘捕40余人，并破坏议员受保护的司法特权，将议员威尔克斯投入伦敦塔，搜查其住宅。随后，乔治三世又要求追查后台人物。他欲借此实现两个目的：以专制手段压制反对派，开创非法逮捕令这一专制手段的先例，并转移资产阶级对巴黎和约的攻击。以乔治三世为首的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由此爆发了一场激烈斗争。

尽管少数辉格党头面人物畏缩不前，但伦敦资产阶级却挺身保卫威尔克斯，接连举行游行示威，焚烧国王之母和布特等人的模拟像。5月6日，威尔克斯受审，法庭内外聚集了数千群情激昂的群众。威尔克斯指出对他的审判将决定“英国的自由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影”。由于法官站在辉格党人一边，威尔克斯获释。这位法官在法庭上说：“为了取得证据，凭无名字的逮捕令就进入一个人的房子，这比西班牙宗教法庭还要糟糕……这是对人民的自由的大胆而公开的袭击，破坏了大宪章第29条，而这一条正是针对专制权力的。”从此，“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呼声不胫而走，成为激进主义的政治口号。

乔治三世不甘失败，在贵族的影响和压力下，下院多次以绝对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宣布第45期《北方不列颠人报》违法，说它是“对国王陛下前所

R.Sedgwick, *Letters from George to Lord Bute*, No.269, Feb.22, 1763.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1974, Vol.I, PP.387—390.

G.Rude, *Wilkes and Liberty*, 1962, P30.

L.Peter, *Success in British History*, 1981, P.14.

H.L.Brougham, *Historical Sketches of Statesmen Who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George*, 1854, Vol.I.P.263.

N.S.Jucker (ed), *Jenkinson Papers, 1760—1766*, 1949, P.168.

未有的极大傲慢无礼和侮辱咒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严重的诬蔑诽谤，是对全部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并肆无忌惮地企图离间人民对国王陛下的感情，煽动人民不服从王国法律，进行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下院还作出决议：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不适用于“写作和发表煽动性诽谤的案件，也不应阻碍法院迅速有效地对罪恶滔天和危险的罪犯提出控诉。”下院还命令公开焚烧该报。在接二连三的迫害甚至暗杀的威胁之下，威尔克斯被迫出逃法国。议会随即将他除名，并宣布为逃犯。

在《北方不列颠人报》事件之后，贵族地主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又围绕北美殖民地问题展开了斗争。1765年，格伦维尔政府决定向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以弥补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巨大财政亏空和支付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费用。长期以来，贵族地主们一直想直接瓜分殖民利益，英国向殖民地增加征税可以减轻他们的纳税负担。印花税法是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征收直接税的第一个法令，它遭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激烈抵制。同时，北美殖民地人民抵制英货也使英国对北美的贸易急剧下降，直接损害了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导致工人失业的大量增加。以老皮特和伯克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在议会中猛烈抨击格伦维尔，使之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国王之友”派内部也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是在乔治三世短暂生病后的摄政问题上，格伦维尔不甘为傀儡工具，要求掌握更大的权力，因而与其他“国王之友”派头面人物发生冲突。此外，格伦维尔政府的北美殖民政策，尤其是印花税法令，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国内也大失人心。在内外压力之下，格伦维尔只好于1765年7月下台。辉格党人罗金厄姆趁机利用“国王之友”派的内部矛盾和国内对印花税法的不满而入主政府。

三、威尔克斯事件和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确立

“威尔克斯与自由”

60年代中期后，英国社会的矛盾更趋尖锐化。下层人民频频掀起反圈地斗争和食物暴动。1766年，《年度纪事报》写道：“在英格兰各地，由于穷人造反，发生了许多暴动，造成无数伤害之事。一切生活品的价格都过于高昂，把穷人逼到发疯的地步。”这种斗争的矛盾自然首先指向操纵粮价上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粮价飞涨也十分不满。同时，北美殖民地人民斗争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之间关于殖民政策的矛盾更加深化，政局也更加动荡不定。罗金厄姆政府极力主张废除印花税法。经过一场斗争后，议会被迫同意取消印花税法。然而，从一开始起就处在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们的反对之下的罗金厄姆政府，维持了不到一年也被迫下台。老皮特与乔治三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同“国王之友”派的格拉夫顿·诺思组成新政府。但老皮特很快就发现自己为此大失人心，自己的政策也难以贯彻实行，加之健康不佳，便在家中长期休养，随后辞职退出政府。政府大权又落入“国王之友”派格拉夫顿手中。

1768年，威尔克斯事件爆发，形成18世纪后期第一次大规模激烈的社会斗争。该年2月，威尔克斯回国参加大选。3月28日他当选为密德塞克斯的议员。该夜，伦敦灯火通明以示庆祝。威尔克斯重新当选为议员是对乔治三世的直接挑战，引起了国王和托利党人的恐惧。几天后，国王指示“国王之友”派首领诺思：“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一事，非常重要，必须实现。”在诺思的组织下，议会借口威尔克斯曾“诽谤”国王和议会，通过决议剥夺其议员资格。不久，他又因此被判处22个月的徒刑和一大笔罚款。但伦敦资产阶级坚持斗争，将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三次选为议员，均为议会否决。下院最后竟悍然宣布让在竞选中惨败的托利党候选人当上议员，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下院的倒行逆施直接破坏了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政治民主权利，危及其政治地位。老皮特将此痛斥为“砍向自由之树根部的利斧”，伯克愤怒地谴责下院的行径“动摇了宪法”，“颠覆了宪法”。

资产阶级为捍卫其政治民主权利准备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下层人民也在“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下，趁机大规模行动起来反抗剥削压迫。3月底，伦敦下层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当时正在伦敦的富兰克林描述说：“暴民们……在每条街上吼叫，要来往马车中的绅士淑女们也呼喊‘威尔克斯与自由’……甚至城外15英里之内的每座房子的门窗上，差不多都画上了No. 45（第45期《北方不列颠人报》）。”4月中旬，许多地方的人民群众用刀枪棍棒武装起来，向富人进攻，并捣毁其房屋。《绅士杂志》当时惊呼伦敦响起了枪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多次在街头兵刃相见，死伤多人。

R.L.Tames (ed), Document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1971, P.114.

E.P.Cheyney (ed), Readings in English History Drawn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1935.

J.H.Plumb, Makers of History—Chatham, P.135; E.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Burke, 1981, Vol. , PP.228—229, P.302.

G.Rude, Wilkes and Liberty, P.17, P.55.

伦敦一家机器锯木厂因使许多锯木工人失业而遭到破坏。伦敦、纽卡斯尔等港口的水手强行扣押港口船只，要求增加工资。据海军部报告，有一段时间泰晤士河上许多船只停航，伦敦港口瘫痪。许多地方的织工捣毁织布机，农民反对圈地，袭击地主。王宫甚至有一次被围，伦敦市政厅屡遭攻击。一些下层人民还喊出“不要国王”、“诅咒国王！诅咒政府！法官该死”等口号。他们公开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最好革命时机。”一些地方的工人斗争还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伦敦等港口的水手们组织“海员委员会”，协调斗争行动。伦敦织工还写信给爱尔兰织工试图采取联合行动。显然，斗争已超出威尔克斯事件的原有范围，发展为下层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

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统治阶级十分惊慌。他们惊呼：“社会形势正在紧张到最后程度，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有许多令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乔治三世与托利党大臣们积极策划镇压。5月10日，数万群众聚集在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此时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说：“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事先埋伏的军队开枪射击广场上的群众，当场打死6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圣乔治广场屠杀”。在新科克莱因，军队镇压织工时，双方枪战，互有伤亡。其他地方亦有类似战斗。同时，议会颁布了第一个镇压捣毁机器者的法令，规定十余项可以处死的罪名，旨在保护地主利益。各地贵族地主纷纷给国王写效忠信表示支持。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利益受到威胁，也支持了镇压。

请愿抗议运动

自1769年5月起，资产阶级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运动，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捍卫政治民主权利，向国王和贵族地主们发起反击。各地资产阶级纷纷集会，散发传单，起草请愿书，征求签名。运动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有18个郡、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有6万多选民在请愿书上签名。约克郡请愿书针对议会指出：“现在有一种异常情况……即人民的代表反对人民。”著名的尤利乌斯信件公开警告乔治三世：“如果英国国王遭到痛恨和蔑视，他将必然是不幸的。而这大概就是唯一的政治真理。国王应信服它，不可以身相试。”“仿效斯图亚特王朝行径的君主，其下场也将是一样。”此信毫不掩饰地警告：这样的国王会失去王冠。

这个运动由两支力量组成。一支是以伦敦“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为中心的中产阶级激进派。该协会成立于1769年2月，旨在“维护和保卫人民合法的自由和支持威尔克斯及其事业”。他们的请愿书强烈抗议国王和政府破坏法制肆意捕人，屠杀人民，践踏选民权利，还抗议北美殖民政策破坏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它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解散议会并重新举行大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P.75.

S. Ayling, *George the Third*, P. 156.

G.Rude, *Wilkes and Liberty*, P.66.

D.Read, *The English Provinces, 1760—1960*, 1964, P.7.

Annual Register, 1769, P. 205.

G. Routledge (ed), *Junius Letters*, 1875, P.217, P.211.

选，撤换托利党大臣等。一些请愿书还重申了大宪章、权利法案和“光荣革命”中制定的限制王权的文件和原则。伦敦“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号召各地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共同行动。外地激进派响应了伦敦的号召，他们成立若干协会，壮大了斗争声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重新分配选区，实行议会改革。

另一支力量是大资产阶级。他们起初犹豫不决。罗金厄姆甚至一度指责激进派“走得太远”。随着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大资产阶级看到若是仍然按兵不动，就有失去群众和失去运动领导权的危险。伯克因此催促辉格党首领投入运动。他在给罗金厄姆的信中写道：“我们面临一个巨大危机，公众事务的前途取决于您此刻的举动。”大资产阶级投入运动后，他们控制下的各郡和城市的请愿书显得较为温和，措辞恭顺，内容多限于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只有少数请愿书要求解散议会。辉格党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借此打击托利党，逼迫乔治三世让他们上台执政。

此时的英国正面临严重的内外局势。在国内，下层人民的反抗仍可能重新大规模爆发，请愿运动和激进主义的兴起震动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在国外，北美和爱尔兰人民斗争风起云涌，殖民统治频频告急。法国和西班牙一直伺机报复英国。法国夺取了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科西嘉岛，威胁着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西班牙则占领了福克兰群岛，扣留了英国军舰。英国与法西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此内外危机中，贵族地主们急于强化以对付危机局面。他们纷纷向乔治三世写信表示效忠支持。埃塞克斯郡地主的效忠信写道：“我们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支持陛下的权威，镇压一切煽动性和暴动性的企图，这些企图威胁要摧毁国家，破坏陛下的幸福和荣誉。”乔治三世则声称：关于威尔克斯事件，“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并凶相毕露地威胁说，如他在议会中失败，就将“求助于宝剑”。

1770年1月，议会开会讨论请愿书，两种政治势力的重大冲突即将来临，全国气氛紧张。托利党先后四次以压倒优势击败辉格党人，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贵族地主阶级再次坚定地支持乔治三世。请愿运动归于失败。这一失败也是必然的，请愿运动虽声势浩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劣势，6万选民签名者中，仅有46人是下院议员，不足下院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一个托利党人认为请愿运动不会产生很大效果，“因为这个国家中最庄重、最有分量的部分没有参加。”而这个部分就是贵族地主阶级。

乔治三世随后清洗了政府中辉格党人和军队中具有辉格主义思想倾向的高级军官。早已徒具虚名的格拉夫顿傀儡政府就此倒台。其后托利党首领诺思上台，从此执政达12年之久。乔治三世完全直接控制了政府决策大权，而诺思只是他的驯服工具。诺思与国王自幼便有总角之交，长期以来一直是乔治三世各项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他在1763年的《北方不列颠人报》事件中初露头角，就带头提出指控该报第45期煽动叛乱的议案，此后又竭力支持乔治三世的北美殖民政策。乔治三世曾替他一次还清2万英镑的私人债务，免去他

J.A.Woods (ed) , The Correspondence of E.Burke , 1963 , August 13 , 1768.

Annual Register , 1769 , P.193 ; S. Ayling , op.cit. P. 159 ; W. E. H.Lucky , op. cit.Vol. , P.153.
G.Rude , op.cit.P.136.

全家牢狱之灾。这样的首相自然唯国王之命是从。

60年代大规模激烈的政治斗争终于以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的先后失败而告终。

伦敦城的抵抗与失败

请愿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斗争一度趋于消沉。只有伦敦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堡垒仍在抵抗。1770年3—6月，伦敦市政府多次向乔治三世提出抗议书。抗议书谴责说：“在一个秘密而邪恶的势力影响下……下院的多数派剥夺了陛下臣民最宝贵的权利。他们所作所为的结果，较之查理一世的船税或詹姆斯二世的专权更具有毁灭性。”抗议书还要求“恢复宪法政府”，解散议会，免去那些“邪恶大臣”的职务。伦敦市长当面对乔治三世指责“下院已不代表人民”。而乔治三世指责抗议书是对国王的极大不敬，是对议会的中伤诽谤。“国王之友”们则扬言要控告抗议书的起草者，甚至要求取消一切人向议会请愿和抗议的权利。议会两院于3月23日曾联名致信国王，表示对抗议书的“关切和愤怒”，重申对乔治三世的坚决支持，要求他与议会一致行动。不久，下院决议公开谴责伦敦资产阶级，并颁布法令，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法庭控告任何一名议员。此项法令实际上旨在取消对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法律保障。

1771年2月，下院又挑起了事端，指责伦敦激进派报纸报道议会辩论是破坏议会特权进行“诽谤”的行为，为此传讯了8家报刊的出版人，禁止他们报道议会活动。此举旨在进一步打破伦敦的反抗，破坏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伦敦城大胆进行了反击，扣押了一名议会派来的官员，并公开宣称：“你们表现出专制意识，人民就要表现出反抗精神。”乔治三世迅速表示：“如不支持下院马上将伦敦市长和副市长奥利尔投入伦敦塔，下院的权威就会彻底毁灭。”下院以170对38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逮捕了伦敦正副市长。伦敦街头因此发生严重骚乱，诺思首相等高级官员被袭击致伤。议会又以“率领暴民闹事”为由拘捕伦敦的治安官。面对可能再次爆发下层人民反抗斗争的威胁，辉格党人惊慌至极。伯克说：“我完全不知怎么办了。”老皮特一方面十分担心“最坏的暴政”，一方面又指责伦敦城的挑战是“荒唐”的。伦敦的斗争几乎是孤军奋战，外地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它被迫释放议会官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长关在牢狱之中。

此后，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斗争长期低落。一些辉格党重要人物甚至表示对政治“厌倦”，要退出政界。中产阶级激进派的“权利法案协会”也瓦解了。

f E. N. Williams (ed), op. cit. PP. 311—312, P. 238.

G.H.Guttridge, op.cit.P.29.

G. Routledge (ed), op. cit. P.228.

J.H.Wiener (ed), The Lion at Home, Vol.I, P.428.

W.E.H.Lecky, op.cit.Vol. , P.259.

J.A.Woods (ed), op.cit.March 27, 1771; G.Rude, op.cit.P.163.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确立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确立和巩固有着直接原因：首先是贵族地主阶级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决意恢复王权以对付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维护其既得利益。乔治三世也逐步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国王之友”派。1770年，下院已有190名所谓“有官职的议员”，这些人在议会则身为立法者，在政府则身为执法者，形成了一个听命于君主的官僚集团。第二是下层人民的巨大力量分散孤立，他们尚未具有较高斗争觉悟，其斗争频频受挫，不可能阻止地主贵族恢复王权的迅猛来势。第三，18世纪的经济已提出继续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但又未能使之成熟到足以战胜贵族地主的程度。此外，资产阶级虽要求改革议会，反对王权，但仍缺乏一个明确一致的政治斗争纲领，内部分歧严重，各派往往为争权夺利而彼此拆台，如老皮特和罗金厄姆便是这样。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确立表明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以君主个人专权形式建立了新的寡头统治，为全面推行其政策铺平了道路。这种统治形式的确立也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膨胀到了顶峰。王权复兴，内阁名存实亡，政党被视为大逆不道，“爱国君主”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现实。此时，“国王的政治优势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他的意志就是对大臣的法律，而大臣在议会两院中都拥有压倒多数……人民与议会的争端消失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冷漠时期。权力平衡的重心，在沃波尔内阁时，是由上院滑向下院，现在却是从议会滑向君主，”但是，“风暴就在前面，当国家这只航船遇到它时，国王个人统治及许多其它东西，都将倾覆于波涛之中。”就在乔治三世统治的第二个十年，这一风暴已在北美大陆掀起，它继而跨洋越海席卷英伦三岛，激荡着英国社会，震撼着大英帝国。

第二节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结束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经济发展和政治

英国向北美殖民扩张的前奏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资助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他率领3艘船经过6个半星期的艰苦航行之后，于该年10月12日抵达中美洲。此后，其他欧洲国家的许多航海者也接踵而至，从此揭开了美洲“地理大发现”的开端。

美洲刚刚被发现，欧洲的殖民入侵就开始了。到16世纪后期，西班牙已占据拉丁美洲的大部，葡萄牙占据了巴西。1497年英王亨利七世得知哥伦布的发现后派遣意大利人约翰·卡波特率领一支18人的探险队乘“马修”号帆船由布里斯托尔港前往美洲，估计抵达纽芬兰岛。但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在一百余年后才在美洲建立自己的永久性殖民据点。

从16世纪下半叶起，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它对美洲的殖民活动逐步积极起来。当时英国流行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获取大量的金银财富对一个国家的权势是必不可少的，海外殖民地则可以提供金银和原料，并进行移民以解决国内“失业”问题，使英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美洲正是这样一个理想之地。在16世纪60年代，英国人约翰·霍金斯开始从非洲贩卖黑人到美洲；70年代，英国航海家马丁·弗罗比歇在美洲寻找黄金和新航线过程中发现了哈德逊海峡。80年代成为英国开拓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开端。此时，一些殖民主义的鼓吹者著书立说，主张向海外扩张英国势力，反映出英国资本主义寻找更大的海外殖民市场的要求。1584年，英国地理学家理查·黑克罗特写出了《西方殖民论》一书，劝说英国向美洲移民，建立殖民地，旨在一方面为英国提供市场和原料，一方面对抗西班牙和法国。他还编写了《英格兰民族的海上航行、贸易和发现》一书，鼓励英国人从事海上冒险事业。同时，英国同西班牙在海上争霸的斗争越演越烈。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从70年代起经常袭击劫掠航行于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西班牙船队。1587年，沃尔特·雷利爵士曾派一批人前往北美的弗吉尼亚，在其附近的罗诺克岛上建立了英国殖民地，但三年后这些殖民者就原因不明地失踪了。1588年，英国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确立了海上霸权，为下个世纪大规模向北美进行殖民扩张扫除了重大障碍。

当时英国社会参与开发美洲殖民地的人中既有富商和贵族，也有中产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1606年，一些英国商人和贵族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不久后分成了伦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并取得开发北美殖民地的王家特许状。1607年，伦敦公司派遣100余名移民抵达北美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英国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詹姆斯城。它日后逐渐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有102名英国清教徒从荷兰出发，乘“五月花”号船漂洋渡海来到北美的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从17世纪初至1732年的一百余年中，英国在北美大陆的13个殖民地先后建立起来。

对北美殖民地的血腥征服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又同英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屠杀和与法国、西班牙等殖民国家的激烈争夺联系在一起。印第安人曾热情地接待和帮助过早期欧洲移民，但他们很快发现了这些殖民者的野心。这些殖民者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甚至大规模烧杀。1675年—1677年印第安人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动的“腓力浦王之战”是其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印第安人曾摧毁了约20个殖民者的城镇，杀死了新英格兰殖民者士兵的6%。但印第安人最终遭到更血腥的屠杀而失败。印第安人在北美反抗殖民者的斗争持续了300年之久，直至19世纪他们被集中于荒瘠地带的“保留地”之中。英国殖民者以印第安人的惨重牺牲为代价，使之直接从原始社会阶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以后又与荷兰殖民者在17世纪进行了殖民争夺，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条例”，并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其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和特拉华（即现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在1689年—1763年之间，英国又同法国在北美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夺，经过“威廉王之战”（即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年—1697年）、“安妮女王之战”（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年—1713年）、“乔治王之战”（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4年—1748年）和“七年战争”，英国终于击败法国，在北美夺取了加拿大，巩固和发展了13个殖民地，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

殖民地的经济开发

随着13个殖民地的发展，大批移民源源而来。至独立战争爆发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估计达到250万，其中黑人约50万。白人移民来自欧洲许多国家，但主要来自英国。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堪忍受祖国的贫穷、战争动乱和宗教压迫而来到北美寻求自由和新生活。如在17世纪，许多英国移民就是不堪忍受斯图亚特王朝迫害的清教徒。许多贫苦劳动人民无力支付横渡大西洋的旅费而沦为定期服役的契约奴。这种契约奴到18世纪中叶已占北美殖民地人口的半数。成年契约奴通常服役4—7年，儿童则服役到21岁或24岁，服役期满后，他们通常可获得若干生产工具和50英亩土地。他们和黑奴一样是开发建设北美殖民地的基本劳动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最早黑奴是1619年由荷兰人贩卖给詹姆斯城的。1665年—1667年的英荷战争打破了荷兰对贩卖黑奴的垄断，从此，英国奴隶贩子通过所谓“三角贸易”源源不断地从非洲将黑奴输入北美殖民地。对契约奴和黑奴的剥削成为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契约奴和黑奴的辛勤劳动使殖民地经济得以发展起来。

100多年中，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有很大发展，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在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农业人口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九。至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可分为北部、南部和中部三种类型。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克、罗得岛）气候较冷，许多土地并不肥沃，尽管移民们大力发展，但其收入毕竟有限。因此，移民中的商

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根据地理和资源等条件发展了商业、渔业、伐木业、造船业和制铁业等。农业虽是粗放经营，但能使该地区粮食自给有余。渔业，尤其是捕鲸业，由于靠海发达起来，从事渔业者达数万之多，能满足殖民地消费并向欧洲出口。有 1000 多艘商船和近 3 万名海员从事对英贸易，还将糖酒、鱼类、木材、铁块和矿石等运往欧洲，再将欧洲的工业品运回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另外，奴隶贩子还从事罪恶的“三角贸易”，获利甚丰。随着经济的发展，新英格兰逐渐成长为英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在南部（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土地辽阔而肥沃，气候适宜，而且其移民中有许多原是拥有资本的英国大地主贵族。他们使南部逐渐发展成大种植园经济，那里种植的烟草成为北美殖民地的大宗出口商品，此外还生产小麦和蓝靛等。同时，由于大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力而输入黑奴，黑奴制在南方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中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则兼有南北殖民地的特点，出产谷类、肉类、蔬菜和水果，经营皮毛贸易，木材业、酿酒业、制铁和纺织等工业的发展已能与英国一争高低。走私贸易也大大促进了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曾是荒野之地的北美殖民地经过一百余年的开发，工商业和农业逐步发展起来，终于成为英国对外贸易中仅次于欧洲的重要贸易对象。在独立战争前夕，英帝国三分之一的航运从事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仅仅只是由于同美洲的贸易，英格兰和苏格兰沿海那些不足挂齿的小村庄才一跃成为大城市。”而北美的纽约、波士顿、费城逐渐发展为殖民地的工业中心。到独立战争前夕，英国商船的三分之一是由北美殖民地制造的。北美殖民地的成长壮大使北美人民同英国在政治经济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

殖民地的政治管理

13 个殖民地都是根据王家特许状成立的，有公司特许殖民地、自治殖民地、业主殖民地和王家直辖殖民地四种类型。英国对北美的统治机构由国王任命的各殖民地总督、参事会和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组成。英国政府未设立专门的统一机构管理这些殖民地。英王是北美殖民地最高统治者，也是所有未授人的土地的主人。国王往往由一位国务大臣代表。枢密院负责殖民地的有关法律事务、发布命令；财政部负责税收等经济事务；陆军部和海军部负责防务；议会制订有关法令；英国大主教掌管国教会；贸易局为咨询机构。1634 年查理一世虽然设立了一个贸易与殖民委员会，但也只是咨询机构。实际上，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较为松弛。1640 年前，斯图亚特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对殖民地的控制就更为削弱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甚至在 1644 年还否认当时的英国议会有权约束它。1650 年英国颁布了所有北美殖民地都隶属于英国议会的法令，次年又为打击荷兰颁布了“航海条例”，实际上限制了若干北美贸易。但北美殖民地基本上保持某种实际独立状况和自由贸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英国于 1685 年至 1688 年将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等几个殖民地合并为新

英格兰领地，以波士顿为首府，派驻一名英国总督统一管理。但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发生时，这个“新英格兰领地”就瓦解了。北美殖民地在 17 世纪实际上几乎是自由处理内部事务，逐步产生出自治倾向。有的史学家认为北美殖民地几乎在建立之初就让英国的“地方自由的传统深深扎根于美洲”。

18 世纪，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1685 年时北美还只有两个王家直辖殖民地，而在 1763 年时共有 8 个殖民地变成王家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的总督管理。在理论上，总督可以任命官员，召开或解散议会，有立法否决权，主持军务和治安，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工具。参事会是总督的咨询机构和高级法院。但在实际上，总督总是受到地方议会的很大牵制，彼此间存在争夺统治权的激烈斗争。绝大多数总督不得不依靠当地议会来取得经费，包括自己的薪俸，因而他们很难直接对殖民地进行统治，而殖民地的英国官吏们往往是一些平庸无能之辈。国王和政府大臣常把殖民地官职作为自己对支持者或亲朋旧友的私人赏赐。即使总督是颇具才干者，他也发现执行英国政策治理殖民地是件非常棘手之事。参事会往往由精心挑选出的上层商人和农场主组成，用以拉拢他们支持英国殖民统治。但是，参事会是北美殖民地统治中最薄弱的一环，被人描述为是“一个供鲸鱼游戏的浴盆”。

殖民地的自治倾向

由于北美殖民地毕竟是英国资产者建立的，在其政治制度中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如自治制度便是其中之一。1619 年，弗吉尼亚议会的建立和 1620 年的“五月花号公约”被誉为“美国制度的两大基石”。1619 年 7 月 30 日由弗吉尼亚 11 个选区选举出的 22 名“公民代表”同参事会开始举行 6 天会议，制订若干法律。此后，它自己制订议会规则并负责征税和司法等事务。它远非现代民主机构，却是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个代议制机构。1620 年，漂洋渡海前往美洲的部分清教徒在“五月花”号船上订立了一项公约，要求实行按多数人意愿自治管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以后各殖民地的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630 年，一批清教徒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及其特许状从英国转移到北美，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该公司的股东每年投票选举总督等官员，建立了具有两院制形式的地方议会，英国国王和议会对该殖民地都无直接控制权。这种体制后为其它殖民地仿效，具有独立的倾向。这样，北美殖民地内部政治制度还在其早期建立过程中，就出现逐步同英国分道扬镳的迹象。

当然，北美殖民地的地方议会远非是民主的，其选举权受到财产和宗教等多方面限制，在 18 世纪前期通常是由占人口 10% 的富有者选出来的。但这些地方议会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削弱了英国殖民统治。它们制订法律、征税、控制地方财政、任命官吏，置总督于自己的制约之下。各殖民地也尝试着要由分散走向联合。在 1643 年—1754 年的百余年中，曾有过许多关于各殖民地合作的建议和计划。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普利茅斯等殖民

J.C.Miller, op.cit.P. 29.

J.C.Miller, op.cit.P.33, P.34.

M. Smelser, American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y, P.101.

地于 1643 年组织了“新英格兰同盟”，旨在共同对付荷兰人和印第安人。1689 年莱勒斯反英起义中，起义者在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纽约和康涅狄格组织了殖民地联盟，建立了政权，被认为是北美殖民地由分散走向联合的一个尝试。1754 年 6 月，英国政府为了对付法国的威胁，曾在阿尔巴尼召开了关于各殖民地进行合作的会议，即著名的“阿尔巴尼会议”。会上至少提出了 6 个关于殖民地联合的计划。会议最后通过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计划：在英帝国管辖下各殖民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组织成联邦，设立一个由各殖民地议会选举出的大委员会，但各殖民地仍自主处理内部事务。这一计划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因为它太“民主化”了，会增强殖民地的团结而不利于英国统治；各殖民地议会也拒绝批准这一计划，认为它限制了殖民地的自由和权力。富兰克林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为 1774 年的大陆会议作了准备，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二、北美独立战争

经济上的殖民压迫政策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英国的殖民利益和统治与之逐步产生出日益加深的矛盾。长期以来，英国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殖民地的政策与法令，以保护其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1651年，英国颁布了第一个“航海条例”。1660年又颁布了“列举商品法令”，明确规定殖民地的糖、烟草、棉花和染料等只准运往英国出售。此后，被“列举”的商品越来越多，至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的重要产品中只剩下咸鱼一项未被“列举”。1663年“主要产物法令”严格规定了欧洲产品必须先经英国港口才能转运至北美殖民地。1673年的一项税法规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某些商品贸易也须纳税。1684年又禁止北美殖民地铸造自己的硬币。1696年，英国重申以前各项航海条例，命令北美殖民地的官吏严格执行并打击走私活动，为此设立了贸易与殖民地局和海军法庭。1699年的“毛织品法令”禁止北美殖民地进行毛织品贸易。1718年的一项法令禁止英国熟练工匠迁往殖民地。1733年的“糖蜜法令”对北美殖民地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外进口的糖类和酒类课以重税。1750年的“制铁法令”虽鼓励北美殖民地生产生铁块，但禁止生产铁制品，甚至不许生产大头针，也禁止建立铁工厂。

这些法令中只有极少数在客观上曾一度有利于北美运输业和造船业等的发展，如1651年的“航海条例”，但绝大多数旨在限制甚至扼杀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发展，使之成为英国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保证英国掠夺丰厚利润。如南部殖民地的烟草被迫转道英国后再出口至欧洲，使南部种植园主为之付出双重的运费、保险费和佣金，较之直接向欧洲出口，每桶烟草减少3镑的收入。英国商人通过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和倾销商品等手段，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巨大贸易顺差，使北美殖民地负债累累。1760年，北美殖民地欠英国商人的债务已高达400万镑之多。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迅速全面激化。北美殖民地人民在经济上要求摆脱英国宗主国所强加的种种压迫限制，在政治上争取自由平等地位，开始走上要求独立的道路。而英国则极力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压榨和政治控制。“七年战争”的胜利固然使英国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殖民帝国，也使英国债台高筑，国债高达1亿多万镑。1756年—1763年，英国在北美的开支达798万镑，而在1740年—1775年共支出1619万镑。北美殖民地在“七年战争”中也支出了256万镑（但英国议会决定补贴106万镑）。如何控制和掠夺北美殖民地并把巨额战费转嫁到殖民地人民身上，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战后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在此问题上，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派代表贵族地主和若干大殖民商业公司的利益，坚持已趋没落的重商主义，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一系列加紧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的高压政策，结果适得其反，既促使北美人民进行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斗争，也

J.C.Miller.op.cit.P.9 , P. 15.

P.Marshall and G.Willams (eds) ,The British Atlantic Empire before theAmerican Revolution , 1980 , P.77 , P.98.

导致英国内部发生了关于殖民政策的激烈争论。

英国贵族地主们极力主张实行旧式殖民掠夺，向北美殖民地直接征税。因为他们以农为主，难于直接从利润丰厚的殖民贸易中直接获利，却承担了部分殖民战争和殖民地开发的费用。他们要求向北美殖民地人民转嫁财政负担，并借此进而直接瓜分殖民地利润。他们推动英国政府和议会接二连三地通过一系列法令，以实现他们的利益。英国的一些大殖民商人为了进一步控制北美殖民地经济，也加以支持。

1763年，西部印第安人在首长庞提亚克率领下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英国政府借口将西部土地保留给印第安人，于10月颁布了英王诏令，宣布禁止13个殖民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西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魁北克以西的地区移民，从而将13个殖民地限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区，使殖民地不得进一步扩大。但是，殖民地劳动人民，尤其是新来的欧洲移民，渴望向西部迁徙以取得土地；南部大种植园主因掠夺式经营使原有土地的地力耗竭，也渴望取得西部的肥沃土地；许多土地投机者商人也指望在西部大发横财。禁令使他们的梦想归于破灭。西部问题成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重大矛盾之一。

1764年，格伦维尔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下颁布了“税收法令”（即“糖税法”）。该法令旨在增加英国税收而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并以此收入支付殖民地的防务和管理费用，还规定了更多的殖民地商品为“列举品”，只能向英国输出，扩大了对殖民地输入商品的征税范围并提高了税率，但同时降低了英国酒的税率以便使之能向北美殖民地倾销。为此，英国增派海军加强缉私并严格控制殖民地海关。该法令给北美殖民地各阶层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同年，格伦维尔政府还颁布了“通货条例”，禁止北美殖民地发行纸币。由于对英贸易的巨大逆差，北美殖民地长期缺乏流通硬币，殖民地曾以自己发行的纸币供商业流通和偿还英国人的债务之用。不过，这种纸币经常贬值。该法令直接而沉重地打击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不少种植园主和工商业者因此无法还债，或因缺乏流动资金无法经营面临破产，许多劳动者因此失业。

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驻营条例”和“印花税法令”。当时有1万名英军驻在北美殖民地，这支军队实际上是用来对付北美人民的，年耗费用达35万镑。“驻营条例”规定由殖民地人民为英军提供食宿，它成为英军常驻北美的法律依据。不久，英国议会又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令”，规定北美殖民地一切印刷品、商业票据、法律文件乃至报纸、小册子、广告、遗书、历书和毕业文凭等都必须购买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票附贴于上。北美殖民地几乎一切经济与文化活动都要向英国支付税金。而且，该法还规定违抗者将受到不设陪审团的海军法庭审判。仅此一项法令，估计可使英国每年增加收入6万镑以上。

反印花税斗争

印花税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征收的直接税，直接触犯了北美殖民

地各阶层的利益。他们担心此例一开，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将受到英国的搜刮。正如塞缪尔·亚当斯所担忧的：“如果我们的贸易被征税……为什么我们的土地产品，以及我们所拥有或使用的一切就不能被征税呢？”在北美人民看来，印花税法还剥夺了他们决定征税的权力。他们重申约翰·洛克关于财产与自由和生命不可分的论点。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中疾呼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力征税，“没有代表权的征税即是暴政！”10月，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举行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重申“除各地方议会自行决定者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符合宪法的课税，”而印花税法有“破坏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明显趋向”。代表们认为由于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代表，他们不应纳税。“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立即传遍北美。这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有力挑战，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明显地尖锐化了。此外，北美人民还组织了“自由之子社”，以暴力手段进行反抗，摧毁税局，封闭法庭，焚烧印花税票，迫使印花税代销人辞职，甚至把他们抓来涂上柏油粘上羽毛去游街示众。一些英国官吏的住宅也遭到袭击。同时，北美人民还掀起抵制英货的运动，使英国对北美贸易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大批英国工人失业。小沃波尔抱怨：“来自北美的一切订货都停止了……诺丁昂有1000工人失业，曼彻斯特每10个工人中就有3个被解雇，英国的北美贸易不仅停止了，而且有失掉的危险”

北美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印花税法无法实行，也造成了英国国内的激烈争论，迫使英国统治阶级重新考虑印花税法。1765年7月，推行印花税法的格伦维尔在内外重重困难中下台。继任的罗金厄姆辉格党人政府，代表因北美人民抵制英货而大受损失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提出取消印花税法，但遭到议会中贵族地主势力的强烈反对。已下台的格伦维尔主张派兵去北美强制执行印花税法，布特等人也坚决反对取消印花税法。然而，北美局势日趋严重。在国内，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成千上万名失业者扬言要进军伦敦，取消印花税法。1766年3月17日，当投票表决是否取消印花税法时，下院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商人。他们向下院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印花税法。在种种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同意取消印花税法。不过，议会紧接着又颁布了“公告令”，申明英国议会和国王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全部权力和权威去制订管束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法律法令，北美殖民地应臣服于议会和国王，无权自己制订法律法令。实际上，这一“公告令”几乎是逐字照抄1719年使爱尔兰完全沦入悲惨境地的“爱尔兰公告令”，被北美人民称为北美殖民地自由的“死亡证书”。英国议会中各党派尽管为是否取消印花税法激烈争吵，这次却几乎是一致赞成通过了“公告令”，因为它反映了英国在北美的根本利益。

取消印花税法只是暂时缓和了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英国并未放弃向北美征税的企图。罗金厄姆下台之后，格伦维尔在下院问继任的格拉夫顿公爵敢不敢再对北美征税，格拉夫顿给予了肯定答复。格拉夫顿拟议把对英国地主征收的土地税从20%降至15%，其差额则由对北美殖民地的征

J.Allen and J.L.Betts , op.cit.P.77.

S.E.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191页。

S.Macoooby , EnglishRadicalism , 1762—1785 , PP.53—54.

H.Weiner (ed) , Great Britain :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1971 , 1972 , Vol. , P.2092.

税加以弥补。从 1767 年起，英国政府接连颁布了几个以当时的财政大臣唐森德为名的征税法令，规定对北美的玻璃、茶叶、纸、颜料和铅等征收苛刻的新税。其部分收入用于支付英国殖民官吏的薪俸，以摆脱北美殖民地议会对他们的控制，从而加强殖民统治的力量。唐森德法令还批准执行一项缉私条例，规定英国税吏有权搜查民宅，并增设新的海军法庭和一个海关总署。1768 年，英国又设立了美洲事务大臣和美洲部，增派英军进驻北美殖民地。

波士顿倾茶事件

唐森德法令再次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反对，抵制英货运动重新掀起，一系列暴力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1770 年 1 月，纽约的“自由之子社”与英军在戈登山发生战斗，英军杀死“自由之子社”成员 1 人，杀伤多人。纽约因而被称为美国革命的“首次流血”圣地。3 月 5 日，波士顿惨案发生，有 3 人被英军开枪打死，2 人受伤。英国政府再度陷入困境：若取消唐森德法令，会被认为有损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权力和威信；若不取消，又会面临更大的冲突。此时，诺思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取消唐森德法令，但保留茶税，以示英国对殖民地的“权力和威信”。1770 年 4 月，上台不久的诺思内阁以 5 票对 4 票通过了这个折衷方案。然而，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根本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相反，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773 年 12 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使北美局势急转直下。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濒于破产，积压了大量货物，其中包括 1700 万磅茶叶。一旦东印度公司破产不仅影响英国政府每年从该公司得到的 40 万镑收入，也可能动摇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政府在 1773 年颁布了旨在挽救东印度公司，打击北美茶叶走私贸易的“茶叶条例”，规定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以走私茶叶一半的价格在北美倾销，使东印度公司完全垄断北美茶叶市场。英国统治阶级指望如此廉价的茶叶“将完全压倒美洲人的爱国主义”，从而拥护英国。然而，事与愿违，茶叶条例不仅遭到北美茶叶走私商的反对，也遭到北美其他商人的强烈反对。北美著名的走私大王和“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名者汉科克就宣称如执行茶叶条例，就会使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都落入英国手中。12 月 16 日晚，他和亚当斯组织“波士顿茶党”分子化装成印第安人，潜入波士顿港，将 3 艘东印度公司船上价值万余镑的数百箱茶叶倾入海中。这一倾茶事件鼓舞和推动了北美对英国的反抗斗争，同时也使英国政府能借机实施高压政策镇压北美人民。1774 年 5—6 月，英国颁布了 5 项“强制法令”：（1）封闭波士顿港；（2）改组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停止其自治；（3）根据新的驻营条例，英军可自由驻扎在殖民地的旅馆和公共建筑中；（4）英国官吏不受殖民地司法管辖；（5）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俄亥俄河以北的土地划归魁北克，阻止北美殖民地向边疆扩展。这些法令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人民间的矛盾。北美人民纷纷组织起反英的通讯委员会，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武装民兵。在这种形势下，1774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22 日，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们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

J.Allen and J.C.Betts , op.cit.P.79.

J.C.Miller , op.cit.P.339.

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通过了较温和的“权利和怨情宣言”以及给英国的请愿书，陈述北美殖民地的抗议和不满，但未公开提出独立要求。然而，乔治三世在 11 月决心实行武力镇压政策：“只有战斗，才能决定他们是屈从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诺思也曾扬言：“现在是坚持向他们挑战，并坚定不移和毫不畏惧地行动之时了。”

英国方面的内部分歧

长期以来，面对日益高涨的北美独立运动和乔治三世及其历届“国王之友”派内阁所坚持的殖民政策，英国统治阶级内部贵族地主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尽管他们在维护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各自的具体利益不同，双方就采取何种殖民政策产生了激烈争论。从“印花税法”之争开始的北美殖民政策大辩论持续至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反映出英国贵族地主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矛盾。伯克曾指出北美问题事关英国的商业、财政、宪法和政策等。在经济上，贵族地主阶级希望通过尽可能多地对北美殖民地征税，以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进而直接瓜分殖民利润。在政治上，他们看到北美人民的斗争将促使英国国内要求议会改革运动的发展，从而危及自己对议会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支持乔治三世推行的一系列反动的殖民政策。与之相反，以老皮特、罗金厄姆、伯克和福克斯为首的一小批辉格党人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要求对北美殖民地实行怀柔政策，作出某些让步，以图在经济上保持北美殖民地的一定繁荣和稳定，使之成为英国长期可靠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政治上，他们也不希望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因对北美殖民地实施高压政策而得到加强。坎登等少数人甚至已预见到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已是必然之事，为了英国的长远利益，主张同北美保持良好关系。经济学家塔克尔也认为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英国拥有超出别国的资本和工业优势，就可以在同北美的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双方的剧烈冲突则是毁灭性的。亚当·斯密亦主张自动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而与之缔结商约。在是否应给北美殖民地以英国议会中的代表权的问题上，老皮特认为北美殖民地无代表权是“宪法的腐败部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是被放弃，就必定是被斩断。亚当·斯密也主张给北美殖民地以议会代表权，使之自动服从英国。对于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内阁所推行的北美殖民政策，辉格党人一直大加抨击。伯克于 1766 年指出：“在北美增税 1 便士比在英国增税 3

E.P.Cheyney (ed), op.cit.P.634.

J.Adolphus,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King George to the Conclusion of Peace in the Year 1783, 1810, Vol. , P.79.

B.Perry (ed), Selections from E.Burke, 1869, P.23.

W.Hunt,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10, P.13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卷，第 186 页。

Max Beloff (ed), The Debat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 1949, P.95.

亚当·斯密：前引书，下卷，第 192 页。

便士，使英国贸易承受的负担更大。”伯克在猛烈抨击殖民政策时还提出：“我的帝国思想是……在一个共同的首领之下许多国家的集合体。”“其各附属部分要求有许多地方特权和豁免权乃是常有之事。”然而，这种以联邦分权为特点的思想显然与以集权为特点的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是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抨击国王和政府：“当国内一切事情都以无约束的专制主义处理时，对外则相应是全部专制精神。”而格伦维尔则代表“国王之友”派指责下院辉格党人：“殖民地的反叛精神起源于下院的反对派。”

在关于北美问题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也遭到失败。波士顿倾茶事件后，伯克在下院痛斥诺思政府的高压政策：“你们本应派出和平天使，但你们正在派出毁灭之神，而这两种精神冲突的结果正是我不敢说出口的。”老皮特曾提出从波士顿撤军的议案，但为议会否决。1775年1月，他又在上院发表长篇演说，猛烈抨击政府的武力镇压政策，反对政府向北美派出1.7万名军队，主张撤销5项“强制法令”。他已深感局势十分危急，指出“每个小时都充满了危险——或许就在我现在说话之时，决定性的一击已经开始了。”——他提出的和解主张再次为议会否决。2月，下院以296票对106票通过决议；支持国王和政府武力镇压北美人民，上院亦予以支持。这项决议表示要在北美殖民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强制它承认最高立法机构的权威和顺从法律，”“支持陛下反对一切叛乱企图；”而乔治三世则保证“采取最迅速有效的措施”实现这一目的。此时，辉格党人坎登“悲伤地注意到，土地利益集团几乎是一致反对美洲人”。政府和议会还部分取消人身保护法，镇压反对派。如著名的激进派分子哈恩就因公开支持北美人而被捕判刑。资产阶级的斗争力量不断分化瓦解。8月，伯克不得不承认：“商人们已离开我们……他们之中的主要人物被各种各样的合同、汇单和假公济私的生意填饱了，所以不遗余力地使其他商人保持沉默。”“各种大宗订货单刺激了商界，诱使他们不把美洲的战争视作自己的灾难。”更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是伦敦商界院外集团的完全瓦解。这个院外集团势力庞大，一直是辉格党的重要支持力量。1775年，这个集团举行有450人参加的会议，却只有105人在反对进行北美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两个月后，只剩下60人愿意在第二个反战请愿书上签名。

独立战争

1775年4月，马萨诸塞总督接到英国政府逮捕汉科克和亚当斯并镇压当地爱国者的命令。18日，他派出800名英军前往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两地搜查当地爱国者的军火。当地的民兵获悉后做好了战斗准备。19日晨，英军抵达列克星顿，战斗打响了。英军当时打死了8名民兵，打伤10人。但在随后的

H.Weiner (ed) , Great Britain : Foreign Policy , Vol.3 , P.2111.

Max Beloff (ed) , op.cit.P.216 , P.98.

H.Weiner (ed) , Great Britain : Foreign Policy , Vol.3 , P.2110 , P.2118.

Annual Register , 1775 , PP.247—248.

W.E.H.Lecky , op.cit.Vol.3 , P.386.

J.A.Woods (ed) , op.cit.August , 1775.

战斗中，越来越多的民兵在各隐蔽处袭击英军，使英军伤亡达 270 余人，最后撤回波士顿。列克星顿的枪声宣告了反对英国殖民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北美独立战争的开始。

5 月 10 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军队，并于 6 月 15 日正式任命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6 月 17 日在崩克山战斗中，美军沉重打击了英军，使 2000 余名英军死伤一半。然而，大陆会议在是否宣布独立的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7 月 6 日大陆会议发布了“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宣布“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将使用敌人迫使我们拿起的武器……捍卫我们的自由。万众一心，决意死为自由人，不愿活着当奴隶，”但紧接着又委婉表示无意要建立独立的国家。两天之后，大陆会议又通过了致乔治三世的“橄榄枝请愿书”，表示对英王的效忠，希望“和解”。然而，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已决意用武力镇压北美人民。8 月 23 日，乔治三世颁布告谕，宣布北美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12 月，英国议会决定派遣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在内的 5 万名军队去北美增援，并断绝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联系和贸易，封闭其港口，捕捉其船只。

次年 1 月，托马斯·潘恩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常识》，号召北美人民展开争取独立的斗争。3 月，弗吉尼亚议会首先宣布独立。7 月 4 日，大陆会议终于通过了“独立宣言”。宣言列举了乔治三世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庄严宣告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建立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这一宣言根据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肯定了人人生而平等，有不可让渡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当政府损害人民权利时，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马克思曾称誉这个宣言是“第一个人权宣言”。

在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即 1775 年至 1777 年 10 月，英军以其军事优势据有主动权。英军装备优良，训练有素，陆海军互相配合，力图速战速决。美军在装备、训练和数量诸方面皆处于劣势，几乎是连遭败绩。乔治三世在 1776 年 11 月 4 日给诺思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叛军很快将作鸟兽散。”次年 2 月他又写道：“来自美洲的消息十分令人惬意。”而华盛顿率领的美军连连丢城失地，到 1776 年底时，他的 1.8 万名军队因伤亡逃跑和复员等原因只剩下 5000 人，而且许多士兵在天寒地冻之时还缺少御寒衣物，粮食和弹药都不足。这支军队士气低落，几乎濒于瓦解。华盛顿本人也备受责难。大陆会议则匆匆准备撤离费城以避英军攻击。在此危急情况下，华盛顿认识到必须取得胜利以鼓励士气，振奋全国精神。1776 年底，在风雪交加的圣诞节之夜，华盛顿率军渡过特拉华河，奇袭特伦顿的德意志雇佣军，大获全胜。几天后，华盛顿率军又奔袭普林斯顿的英军再次获胜。这两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和军队的斗志。

然而在 1777 年 9 月，英军占领了费城，重创华盛顿的军队，使之被迫退往福吉谷。美军在福吉谷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6 个月中 1 万名士兵死去近 1/4。此时，年轻的美国面临十分严重的局面：优势的英军深入国土，控制了主要城市并封锁了海岸线；为数不少的效忠派分子公开或隐蔽地进行各种破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 21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0 页。

Max Beloff, op.cit.P.634.

坏活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奸商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成风以致严重影响军需供应，致使军队缺衣少粮。大陆会议发行的货币急剧贬值。然而，美国人民在华盛顿这样杰出领袖的领导下以顽强的意志，坚持进行独立战争。

1777年10月17日，英军柏高英部8000人在萨拉托加被围投降。这一战役成为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此后4年中，美军逐步走向胜利。1781年10月19日，英军在约克镇败降。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英国和美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三、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结束

英国的困境

英军在萨拉托加的失败使英国陷入重重内外危机之中。乔治三世在此后不久被迫承认对战争形势“要给予最严重的关切”。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两大使命趋于失败。

首先，英国陷入日益严重的财政和兵源困境之中。战争使物价腾贵，捐税猛增，工商贸易剧降，国家债台高筑。议会甚至不得不对每个男仆征收21先令的高额税。加之人民不愿去北美对同胞作战，政府大抓壮丁。结果民怨沸腾，连贵族地主也因征税而叫苦不迭。乔治三世高价雇佣德意志军队也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英国要继续进行战争，已日渐困难。地主们早已感到失望和不满。他们说：“我们那些最为乐观的胜利期望将无法实现，我们正被拖得精疲力竭。”

其二，战争形势日趋恶化。英军在北美节节失利，被迫采取防守战略。英国在殖民扩张中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分别于1778年和1779年对英开战，1780年荷兰也加入反英战争，从而迫使英国卷入一场国际性战争，多面受敌。1779年法、西联合舰队甚至控制了英吉利海峡，而英国本土兵力空虚，仅有20余艘装备不良的战舰，陆军不足1万人，沿海防御工事年久失修，不能御敌。政府一度被迫下令疏散沿海地区的人口物资，防备敌军登陆。

其三，国内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渐高涨，各地暴动事件频频发生。在爱尔兰，人民大力抵制英货，并借口防备法国入侵，组织了8万武装民兵。爱尔兰人领袖弗勒德明确表示，组织武装民兵的目的就是要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爱尔兰的权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乔治三世和诺思政府胆战心惊，被迫同意爱尔兰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

其四，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围绕军事、外交和财政等问题吵成一团，彼此推诿责任，相互指责。议会中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

长期无所作为的辉格党人迅速振作起来，趁机猛烈攻击政府。罗金厄姆在听到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后竟高兴地说：“这下我可放心了。”老皮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种种不幸的根源在于“10多年来有一个‘宫廷体系’，以及‘党派力量的削弱与破碎’”。伯克抨击说：“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¹他们强烈要求诺思政府下台，结束战争。少数辉格党人还要求承认北美独立。更重要的是贵族地主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上院在萨拉托加战役后不久就委婉地要求乔治三世“寻求一个适当时机结束流血和各种灾难”，下院亦提出这样的要求。此后，诺思抛出一个“和解”方案，同意取消除贸易条例外的反动法令，愿就除独立以外的一切问题同北美大陆会议谈判。该方案无疑承认了英国无法

Annual Register, 1778, P.286.

L.Namier, Crossroads of Power, P.24.

J.S.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 1760—1815, 1960, P.210, P.335.

Annual Register, 1778, P.57, PP.287—289.

赢得战争这一事实，但仍为北美人民拒绝。

此时，贵族地主们开始感到无力单独应付危机，加之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因战争失利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这两支力量联合的可能性。1778年3—5月，伦敦四处传言：诺思下台，老皮特和布特将组成联合政府。乔治三世被告知：“各阶层普遍认为现政府无力应付当前局势。不仅那些最信赖大臣们的人，甚至大臣们自己也都普遍如此认为。”老皮特之所以可能东山再起，既因为他指挥英军在“七年战争”中获胜，也因为他坚决反对北美独立，愿意同北美人实行“和解”的政治态度。但乔治三世明确表示：“我宁愿冒个人风险，也不愿给查塔姆勋爵或反对派中任何人以帮助。”“我宁可失去王冠，也不愿在他们的镣铐下戴着王冠蒙受耻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有人写道：“各阶层都寄最后希望于查塔姆勋爵，我遇见的每个人都为此抱怨并感到奇怪：为什么陛下竟还不公开指望那能……挽救国家的唯一帮助。”

正在这紧要关头，老皮特突然中风死去。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政府侥幸地渡过了一次危机。但是，在乔治三世与贵族地主阶级之间出现了裂隙：贵族地主对国王和政府表示很大不满，而乔治三世则开始违抗贵族地主的意志。这裂隙随着内外危机加剧而扩大。6月，乔治三世抱怨下院“不听话”。11月，诺思突然要求辞职，并写信告诉国王：“在此危急时期，应有一位负责全面指挥的大臣，由他筹划政府全部行动并控制其他行政部门。”显然，这种由一位大臣掌管政府的主张是针对乔治三世的。诺思不过是转达了部分贵族地主对国王的强烈不满。乔治三世惊慌失措，拒绝诺思的辞职，在议会中大声呼吁贵族地主给予“同心协力的最大支持”

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攻击

1779年夏季至1780年初，内外危机达到高峰。英国许多海外殖民地如直布罗陀、印度、西印度群岛等受到攻击；法、西舰队仍在英国沿海游弋，北美战局依然不利；政府内部种种腐败无能的丑闻日益公开。国内各阶层的不满日趋严重。下院甚至对国王的内外政策未能获得“应有之成功”公开表示“关切和遗憾”。一些托利党重要人物已在议会中直接斥责政府。两名大臣也宣布退出政府。而辉格党人则准备弹劾政府。乔治三世四面楚歌。

第一支反对力量是卷入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的乡绅。这个运动于1779年底从约克郡兴起。约克郡的绅士、教士和地主们向国王和议会呈送了一份有9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主要内容是：一、要求限制王权；二、“数年来国家处在一场耗费最大而又最不幸的战争中，”“国债大增，捐税沉重，王国的工商业和地租急剧衰落；”三、抨击政府浪费太大，行政效率太低，冗

W.E.H.Lecky, *op.cit.* Vol.4, P.80.

S.Macooby, *English Radicalism, 1762—1785*, P.246.

W.E.H.Lecky, *op.cit.* Vol.4, P.80.

D.Douglas (ed), *op.cit.* Vol.10, P.120.

Annual Register, 1779, P.336, P.321.

Annual Register, 1779, P.336, P.321.

员闲职太多，“对国家入不敷出深感惊恐，深信有必要在所有政府部门厉行节约；”四、要求议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补救这些难以容忍的种种苦难。请愿的发起者威维尔指出，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组织起一个能对抗王权的乡村党。”约克郡请愿震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共有28个郡、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其规模超过1769年的请愿运动。约克郡掀起的这场请愿运动表明乡绅地主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支持动摇了。

第二支反对力量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危机使激进运动重新高涨，成立了“宪法知识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广泛地在整个王国传播关于宪法自由伟大原则的知识，特别是有关代议机构选举和任期方面的知识，”并“防止因人民无知导致的在任何国家都会产生的暴政。”他们不仅攻击乔治三世个人统治，也攻击了整个旧议会选举制度。

第三支反对力量是辉格党。1780年2月，伯克在下院提出了有名的“节俭改革”方案，并为此发表长篇演说。伯克主张，第一，“出于自由和财政的原因，”一切徒费开支、压制人民、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机构均须裁撤；第二，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廉价而高效”的政府；第三，严格控制行政开支，把各项政府开支分为九等，把各部大臣的薪俸列为末等，若有超支，则取消大臣本人的薪俸；第四，在官吏的薪俸方面，以固定的工资制度取代由国王和大臣任意给予的“封赏制度”。这个方案的目的，正如伯克所说：“节约钱财是次要的，削弱王权才是首要之事。”伯克的方案成了辉格党的基本政治纲领，也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王权的共同要求。

第四方面的反对来自托利党上层人物。他们对乔治三世不但未能完成其使命，反而引起一系列内外危机十分不满，加之乔治三世不仅拒绝辉格党加入政府，甚至拒绝与任何辉格党人来往，妨碍了他们与辉格党的妥协交易，更促使部分贵族地主势力决心采取重大行动，迫使乔治三世就范。他们幕后与辉格党首领们频繁接触，进行政治交易，准备共同行动。福克斯在1779年12月就指出：“上下两院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们已决心正视这个增长中的、令人惊恐的王权势力……对危险的共识产生了这个联盟。”为了推卸各种罪责，能与辉格党妥协共同应付危机，部分贵族地主准备抛弃乔治三世。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

唐宁决议

与此同时，“北方武装中立同盟”成立，英国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暂时丧失了海上霸权，加剧了种种危机。英国国内各种力量加快攻击乔治三世

D. Douglas (ed), op.cit.Vol.10, P.212, P.220.

N.C.Phillips, E.Burke and the Country Movement 1779—1780.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76(1961), P.120, P.229.

D.Douglas (ed), op.cit.Vol.10, P.212.P.220.

Wei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Vol.I, PP.439—450, P.439.

D.Marshall, 18th Century England, 1962, P.471.

N.C.Phillips, E.Burke and the Country Movement 1779—1780.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76(1961), No.229.

的步伐。4月初，除部分顽固地主贵族势力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矛头都直指乔治三世。

4月6日，议会准备讨论各地的请愿书。上午，伦敦数万人民在议会外集会。辉格党人福克斯等发表演说。此时，议会四周出现了大批军队。伦敦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辉格党立即发出警告。福克斯呼吁说：“如果有一帮家伙被放出来镇压人民的合法集会，所有参加这种集会的人们必须拿起武器。”下午，下院在紧张激动的气氛中开会。辉格党人唐宁动议：“王权势力已经增长，并且仍在增长，务必削弱，”并声称对付王权的其他一切手段都失败了，因此，“议会的职责是采取决断措施”去限制“这个日益膨胀、危险的和反宪法的王权”。乔治三世的支持者竭力反击，为王权辩护。双方异常激动，喧嚣争论之声不绝于耳。时至夜半，在表决前的关键时刻，诺顿打破议长不轻易表态的惯例，发表演说。他代表相当部分的贵族地主势力支持唐宁决议。他指出“王权的增长是一个事实”，并认为当前“王权的势力的增长已超出了在本质上”“受法律限制的君主制度”。下院最后以233票对21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唐宁决议。这项决议宣布，王权势力已经增长并仍在增长，务必削弱，下院有权检查并纠正王室开支及其他一切财政收支中的种种弊病。在代表40个郡的80名乡绅地主议员中，70人参加投票，61人支持唐宁决议，仅9人反对。显然，乡绅地主的“反叛”对唐宁决议的通过起了决定性作用。

唐宁决议是贵族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作出的重大让步，是乔治三世个人统治走向倒台的转折点。辉格党人欣喜若狂，近20年来的反王权斗争似乎大功告成。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乔治三世很快就进行了反扑。

随后几天之内，几个旨在铲除王权势力的议案均以几票之差被否决。带头“反叛”的诺顿议长也突然“生病”，下院只得休会。辉格党的攻势被有效地阻止了。10天后，下院复会，辉格党人发现形势不利。唐宁仿效1641年长期议会的榜样动议：在下院采取削弱王权势力的实际措施之前，国王不得解散下院，但该案却以254票对203票被否决。

戈登暴动

6月2日，伦敦约6万人在戈登勋爵带领下向议会呈送反对天主教的请愿书。戈登本人一直是“北美人民事业的朋友”，他曾对诺顿议长诉说其政治不满，诺顿劝他与辉格党人合作。他也得到伦敦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支持。一些辉格党反对派原打算利用天主教问题向议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却不料由于议会拒绝接受请愿书，街头数万群众趁机行动起来，变成了伦敦下层人民反抗剥削的大暴动。2—7日，他们控制了伦敦，四处攻打政府部门，甚至英格兰银行，并占领几所监狱，释放囚徒。一些大臣的住宅被毁，许多富人的

E.Rhys,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Liberty*, 1958, P.176.

Annual Register, 1780, PP.164—167, PP.170—171.

Annual Register, 1780, PP.164—167, PP.170—171.

G.B.Adams (ed), *Selected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35, P.494.

房屋和工厂受到袭击，全城数十处起火，烽烟滚滚。街上响彻暴民的呼声。

此时伦敦兵力空虚，统治阶级一时措手不及，无力镇压。大英帝国的心脏几乎瘫痪。对此，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慌忙放下彼此的斗争，决心联合支持乔治三世进行血腥镇压。7日，有辉格党首领参加的紧急御前会议一致决定，允许乔治三世打破军队镇压暴动要地方治安法官下令的惯例，直接命令军队开枪镇压。结果在镇压中打死打伤600多人，100多人被捕，80多人被判处死刑或徒刑。

“戈登暴动”震慑了资产阶级和地主。他们感到一时还离不开乔治三世的统治。乔治三世趁此向议会邀功，声称是他“镇压了各处叛乱”，“提供了公众安全”；上院则对他“深表谢意”，并声明对他“最完全的信赖、依恋和热忱”；下院亦“出于最深切的感激、责任和爱戴之情，对陛下作为臣民之父，公众安全的保护者，……迅速有力地镇压叛乱，谨致谢意”。在这种形势下，乔治三世更加猖狂地向改革势力反扑。8月，他下令解散下院，举行大选，试图利用此有利时机打击辉格党。为此，他不惜金钱贿选。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所花的钱比1760年以来历次大选都要多出两倍。结果，上百名议员落选，诺顿被不体面地解除了议长职务。新议会中国王势力得到巩固，很快就扼杀了伯克的“节俭改革”。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斗争暂时偃旗息鼓，一时间摇摇欲坠的国王个人统治在白色恐怖中暂时得到稳固。

但是，这并未解决任何社会和政治矛盾，相反，危机在进一步加剧。1781年，伦敦城向乔治三世呈交的一份抗议书颇能说明危机形势：“许多重要的制造业正在衰退之中，原料供应日益困难，因为陛下的舰队在世界各地都敌不过敌人的力量。全王国的土地财产都贬值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国王陛下的臣民在公债投资中的财产损失已达1/3以上……陛下的舰队丧失了往日的优势，陛下的军队已被击败，（北美）领地已经丢失，而且陛下的臣民一直处在捐税的重压之下。”抗议书要求结束北美战争，清除所有主战派官员。抗议书为大英帝国的狼狈处境勾画出一幅悲惨的写实图画。这种恶劣形势如果继续恶化，对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革命势必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此时都深切感到：这场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刚建立不久的殖民帝国甚至可能崩溃。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结束

决定性的危机终于到来。该年11月25日，英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约克镇投降的消息不仅震动了整个英国统治阶级，也震动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国王个人统治的斗争重新大规模兴起。

乔治三世仍顽固拒绝承认失败。他十分明白，承认战争失败将意味着其个人统治的末日来临。27日，他要求议会“坚决地协力相助，击败我们的敌人”，要继续进行战争。这引起了辉格党的猛烈抨击。议会为了应付法、西等国的军事威胁，勉强通过一个含糊其词的决议，要“维持和保护陛下和人

Annual Register , 1981 , P. 217.

Annual Register , 1980 , PP.333—335.

Annual Register , 1781 , PP.320—322.

民的基本权利和永久利益”。此时，各派政治力量活动频繁，托利党和辉格党的首领们不断往来接触，谋求妥协，以图联合应付危急局面。唐宁决议时联合反对乔治三世的形势再度出现。贵族地主向乔治三世施加压力，要求他停止战争，实现和谈。1782年1月21日，乔治三世正式拒绝这一要求，坚持反对承认北美独立。几天后，托利党重要人物邓达斯再次通过诺思要求乔治三世解除主战的北美大臣的职务，以便结束北美战争，开始和谈，但又为乔治三世拒绝。

此时，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国海军连遭败绩，西印度群岛的几个重要港口相继失守，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据点米诺加守军向法国投降。

2月，辉格党在下院动议：立即停止北美战争，凡继续坚持进行战争者，都将被“视为国家和陛下的敌人”。¹该案在下院全票通过，无人反对。这一决议和投票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完全承认其失败，他们将在内外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乔治三世严重损害了贵族地主的基本利益，加之顽固坚持战争政策，反对与辉格党妥协，终于使自己成为贵族地主们必须摆脱的政治障碍。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此时，辉格党人罗金厄姆在与托利党暗中交易后，正式提出自己上台执政的三条件：1.承认美国独立；2.实行“节俭改革”方案；3.实行两项旨在铲除议会中王权势力的法案。这无异是迫使乔治三世投降的最后通牒。乔治三世断然拒绝。3月8日，下院有人动议：“本院认为所有灾难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国王陛下的大臣们缺乏远见和能力，”逼迫“国王之友”政府下台，但这一动议以10票之差被否决。3月15日罗斯再次动议：现政府继续执政“将毁灭国家，撤除他（诺思）可以防止这种毁灭”。该案又仅以10余票之差被否决。但在表决之后，下院托利党首领格罗夫纳代表乡绅地主通知诺思：“现政府不能再继续下去，徒劳无益的斗争只会产生公众的灾难和混乱……此后我们将停止反对……下院的意志。”次日，他再次向诺思声明他们决心放弃对政府的最后支持。诺思同时得知辉格党正在准备弹劾政府的议案，而许多托利党人已决心支持该案。

18日，诺思在写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现政府的命运已绝对无可挽回地被决定了，”下院“无论如何都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急流太强大，无法抵挡。陛下完全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陛下的前任君主们……曾不止一次地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屈从议会的决定……他们的让步从未被视作不体面，而是被认为是他们明智的标志。”“议会已改变他们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无论对错，终将占上风……如陛下仿效您那些光辉的前任君主们，最后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失去任何名誉。”“除了罗金厄姆和谢尔本爵士同他们的党派外，无人能够，也无人愿意组织新政府，而且他们不愿同本届政府合作……我谨此……冒昧地建议陛下召请罗金厄姆和谢尔本爵士组织政府。”诺思的信实际上转达了贵

Annual Register, 1782, PP.285—291, PP.171—172.

Annual Register, 1782, P.173.

L. Namier and Brooke (eds), The House of Commons, 1754—1790, Vol. , P.380.

L.Namier and Brooke (ed), op.cit.Vol. , P.557.

D.Dougla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X, P.122.

族地主阶级的最后决定：国王个人统治必须结束，应由辉格党人上台收拾残局。19日，乔治三世回信表示拒绝。

20日，辉格党人准备提出一个“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议案。出席下院会议的议员和观众的人数空前。下院刚刚在混乱不堪、叫骂之声震耳的激动气氛中开会，诺思就不顾一切地要求抢在辉格党之前发言，因为他害怕对方会首先提出弹劾政府案。下院顿时大乱，双方都急于抢先发言。诺思声嘶力竭地宣布他的政府“已不存在”，但未说明国王的態度。辉格党人拒绝相信，坚持要提出自己的议案并立即付诸表决。诺思又被迫承认自己是“恢复良好的政府和秩序的障碍”，自称乔治三世已同意他辞职。乔治三世3天后被迫接受罗金厄姆的3项条件，由罗金厄姆上台组织政府，辉格党人迅速接管了政权。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终于结束了。这种统治的失败有利于巩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光荣革命”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二元君主立宪制，君主虽受限制，但仍是权力中心，政府向君主负责，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色彩。而在议会君主立宪制中，议会是权力中心，政府向议会负责，君主统而不治，民主制度较发达，资产阶级逐渐取代贵族地主势力占有主导地位。洛克主张立法权归议会，行政与联盟权属君主的二权分立思想，反映的正是二元君主立宪的原则。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的正统政体被普遍认为是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彼此制约，而君主是保持上院贵族和下院平民之间平衡的力量，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是唯一的行政首脑。”这种二元君主立宪不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更不能满足工业革命时资产阶级希望直接掌握政权的需要。

限制王权及其意义

在反对国王个人统治的斗争中，伯克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理论上发展了君主立宪思想。1770年初，伯克发表了他最主要的政治著作之一：《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针对当时盛行的王政思潮，他提出：“要划一条把宫廷和政府分开的界限。迄今为止，这两者被视为同义词。但是为了未来，宫廷和行政部门应当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君权的行使“只能依据公众原则和国家立场，而非宫廷的好恶、阴谋或其他意图”；“国王、大臣和政治家都必须服从人民的公断”；关于组织政府，“人民拥有拒绝支持的议会否决权”。他还主张“立即划分立法与司法的法令，将此两者彼此分开”。

亚当·斯密抨击说：在国王统治下，不会有公正和平等，如是最坏的国王统治，那就一塌糊涂了。如果君主控制司法权，“无论如何滥用，亦无法矫正”，“如司法权不脱离行政而独立，要想不为所谓世俗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①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主张三权分立，确立议会主权原则，剥夺君主的实际权力。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Vol. I, PP.465—468.

H. 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1979, PP.145—146.

E.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Burke, Vol. , P.235, P.241, P.260, P.26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2页，第284页。

从 1782 年起，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议会和几届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首先，议会迫使“国王之友”政府下台，使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党上台，就实际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巩固了政府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国王负责的议会主权原则，而这正是议会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其次，议会通过两项法案，剥夺了约占选民 1/6 的政府官吏和政府承包商的选举权。再次，对效能低下、开支庞大而又依赖国王的政府机构实行大改革，裁撤合并许多政府部门，大批裁减冗员，并实行以英格兰银行监督政府财政开支，废除国王和大臣规定官吏薪俸的“封赏制”等措施。此外，下院不仅为威尔克斯平反，宣布剥夺他的议员资格是对全体选民的权利的“颠覆”，而且还宣布在下院议决问题时，凡是企图以国王意愿影响表决者被视为犯下了重罪。

由此，国家政权理论中相当部分的关于王权至上的封建残余思想被扫除，政府和议会中的君主个人势力基本被摧毁，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君主对国家政权的干涉和侵犯。“爱国君主论”的破产使内阁制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在如何轮流执政，分配政权的重大问题上扫除了王权这一障碍，实现了妥协。而且，贵族地主的离弃使乔治三世失去坚实的社会基础，君主不再是一种重要的独立政治力量。乔治三世曾哀叹：他被迫放弃一切据以行动的原则，成为“奴隶”。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是在英国 18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为强化君主个人权力而建立的专制统治形式。它的倒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英国社会变革中，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贵族地主统治是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尤其是这种统治以个人统治形式出现时，就更不可能长久了。另一方面，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倒台只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一次妥协。后者被迫抛弃国王个人统治，前者则只求限制王权，不触动贵族地主的根本利益。这一妥协在于两者毕竟有共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利益。同时，英国已有的政治制度也有较灵活地处理内外形势变化的应变能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妥协余地，不致极端恶化而不可收拾。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及其倒行逆施政策的结束，为工业革命和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重大政治障碍。议会君主立宪制从此巩固，英国经济从 80 年代起开始“起飞”。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兴败也表明：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紧密相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

第三节 改革思想的兴起

一、改革议会的要求

资产阶级的不满

自“光荣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对贵族地主阶级垄断政权把持议会深怀不满，渴望通过议会改革获取对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1711年，一本题为《真正的辉格党人的原则》的小册子写道：“一个正确的辉格党人认为，经常选举议会是宪法的基础部分。”这是因为议会的经常选举不利于任何人长期把持议员席位，可以借此打破贵族地主阶级的垄断。但此后不久议会任期却被延长到7年。贵族地主阶级加强了对议会的垄断。在随后的辉格寡头长期统治时期，一些激进分子仍在坚持要求改革议会。1744年，议会中有人曾提出过每年选举议会的议案，1758年也有人提出过要求缩短议会任期的议案，但均遭否决。在议会之外，鼓吹议会改革的呼声也时有所闻。1747年的一篇匿名文章提出了每年改选部分议员、缩短议会任期、降低财产资格、议员支薪等激进主张。但是，在18世纪上半叶既未实现议会改革，也未出现一个略具声势的激进运动，鼓吹改革的人主要只是少数“书生气十足的激进分子”。

这并不奇怪，此时的英国仍是农业国，“农业远远超过工商业”，是“经济生活中的主宰”。因此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相对软弱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在政治上还不能直接与贵族地主进行激烈对抗。其次，直至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之时，斯图亚特王朝的残余势力在强大的封建法国支持下图谋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封建复辟的威胁，资产阶级还需与享有既得利益的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维持同盟以巩固“光荣革命”的成果，并不急于与之公开对抗。再次，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矛盾尚处在发展过程之中，资产阶级在思想、舆论和组织等方面也未成熟到足以发动一场向贵族地主争夺政权的大规模政治斗争。

然而，在18世纪60—80年代，英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以威尔克斯事件为启端的激进运动。这个激进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几乎大都是属于那些处于握有国家权力的贵族圈子之外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发展中已进一步地成长壮大了起来，日益感到自己的政治权利与其经济实力太不相称，不愿再寄人篱下。中产阶级在18世纪中叶已被誉为“英国社会的脊梁骨”，伦敦城的代表人物贝德福德在1761年声称：“支撑着英国的，既不是暴民，也不是那200个大贵族，而是中产阶级，我们的力量就在他们之中。”1776年还有人写道：“大地主们恼怒地看到不是地

H. T. Dickinson, op. cit. P. 26.

G.S.Veitch, The Genesi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1964, P.34.

J. Cannon, op.cit.P.45.

P.Horn, The Rural World, P.13.

C.Bomwick, English Radicals and American Revolution, 1977, P.XIV, P.XV, P.3.

P.J.Corfield, op.cit, P. 132.

主利益者，而是商业利益者造起了新式马车，在宫廷显耀财富。他们深信，商业已经成为九头蛇怪物，除非它的头被砍掉，否则它会吞噬这个王国中大宗的土地财产。”处于这一变动的时代中，激进派明确要求进行议会改革，争夺政权。他们说：“起初的议会代表制产生于土地几乎是唯一地方财产的时代……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工艺品、工业制品和商业已成为一个不同的财富源泉之时，这个代表制就不平等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除了谴责贵族地主阶级利用手中权力在制订政策时无视工商业的利益，要求对许多工业品减税之外，还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旗帜批判重商主义，呼吁自由贸易。

随着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逐步形成，尤其是自《北不列颠人报》和威尔克斯被剥夺合法当选为议员的资格等事件后，英国社会面临如何对待议会和政府滥用权力，确保人民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的迫切问题。激进派痛感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无力与贵族地主势力抗衡，惊呼工商利益被排斥在议会外：“对选民权利的破坏使国家失去自由，我们手中没有权给自己以正义；”认为“仅靠撤换大臣已不足以补救邪恶”；在一个腐败议会之下不会有自由的安全保障，只会产生最坏的暴政。他们深感政权重要性，因而抨击不合理的议会制度造成贵族地主对议会的垄断，提出：议会的腐败将毁灭国家，“应有一个更平等的人民代表制度”，以法律制止王权的增长和议会的腐败。虽然各个激进派别提出了种种具体的议会改革要求，但议会改革的大旗已经高高举起，成为对国王和贵族地主的霸权发动攻击的有力武器。

激进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思想理论方面，激进分子不仅继承了以往的民主思想，也受到18世纪启蒙思潮的影响，以“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等思想为理论依据，疾呼理性、自由和平等。一些激进分子如夏普、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还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自然权利说在激进派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普赖斯宣称“人从上帝那里来时便有了自然权利”，上帝创造人类时便将平等独立赋予了人。夏普的一本小册子名为：《人民对立法机构的自然权利宣言：这一权利是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剑桥宪法协会的决议写道：“在我们看来，人类中的每个人与生俱来皆有生命、财产和自由的自然权利。”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论民众政府》一文中深信人的自然权利是以对普遍利益的尊重为基础的，任何国

J.C.Miller, op.cit.P.88.

J.Brewer, op.cit.P.212.

J.Brewer, op.cit.P. 255; G.Rude, op.cit. P.113.

S.Macooby, EnglishRadicalism, 1762—1785, P.140.

C.Bomwick, op.cit.P.13, P.16.

L.Stephen, op.cit.Vol. , P.177, P.61.

J.C.Clark, op.cit.P, 331.

C.Bomwick, op.cit.P, 13, P.16.

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是衡量国家一切事务的伟大标准。人的自然权利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从中引伸出了自由和平等两个原则。

威维尔认为对自由的热爱深深扎根于人类思想本质之中，任何人类中的权威都无法将其根除；人的自由权利乃是公理无须证明，也不可能为特许状、习惯或法律所认可，反而这些却应是以自由为基础，并实际体现人的自由。普里斯特利将自由分成政治自由、民权自由和宗教自由：政治自由是社会成员保留给自己参与政府，至少是投票选举官吏的权力；民权自由是一个国家中的成员保留给自己的行动权力，官吏不得侵犯；宗教自由则是前两种权力在信仰中的体现。普赖斯则将自由分成人身、道德、宗教和政治四种，认为要自由就是以自己的意愿为指导，屈从于他人意愿即为被奴役。他的人身自由即不受外界影响而自我决定自己行动的原则；道德自由即自己所决定的判断是非的权力，无此权力人将沦入邪恶之中受到暴政的诱惑；宗教自由即不受干涉地以自己的良知决定对宗教的信仰；政治自由即一个社会或国家以自己的决断或自己制定的法律治理自己本身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预的影响。

激进主义者一般在理论上都认为平等与自由是结伴而来，然而在具体问题上，激进主义者们却表现出不同观点。卡特莱特上校认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人们之间彼此不应区分出差异。他争辩道：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然权利，感到自己本身的重要性时，都会认为自己与任何人都完全平等，对那些无论是如何取得的财富和权势的考虑都应摒除。不过，大多数激进分子都难以接受他的“极端”观点，仍然坚持要尊重财产权利。如在选举权上，普里斯特利主张分等级的选举权制；柏格主张有产者应比无产者有更多的选举权。而卡特莱特、威尔克斯等则主张普选权。许多激进分子虽然认为平等的议会代表制度对于自由政府至关重要，但又认为财产资格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福祉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对于这些激进分子来说，平等只是中产阶级向贵族们争取政权的根据，而不是穷人取得更多权力的理由。

在自然权利、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基础上，激进派进而提出社会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并代表人民要求取得更大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认为人民是权力的真正来源，如果人民不是根据自己同意和意愿而被统治即是不自由的人民。柏格在《政治研究》中提出：“一切合法之权威、立法和行政权力皆源于人民，人民权力犹如太阳之光……权力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授与，只代表人民并为人民限制。统治者要考虑向人民负责，而人民只向上帝负责。”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变更统治。1760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很快就影响了一些英国激进分子。1768年普里斯特利发表了《论民众政府》，公开接受卢梭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础就是一个“交易”，每个人由于考虑到要有部分“政治权力”而自愿放弃部分“民权”。根据这些思想，激进派抨击“光荣革命体系中的缺陷”给国王之友们“留下……暗中伤害而又不可

L.Stephen , op.cit.Vol. , P.177 , P.61.

C.Bomwick , op.cit.PP.16—18.

C.Hampton (ed) , op.cit.PP.319—321.

J. C. Clark , op. cit.P.323.

L.Stephen , op.Cit.Vol. , P.61.

抵御的大祸患：宫庭势力”。卡特莱特上校批评“光荣革命”未能为“公众自由的繁荣奠定持久的安全保障基础”。普赖斯更指出：“光荣革命”在宪法中留下的最重大的缺陷就是议会代表制度中的不平等，“一个王国的立法机构代表制是宪法自由的基础，也是一切合法制度的基础，进而言之，无此基础的政府不会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篡夺。”普里斯特利更进一步提出：“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作为人民之仆却忘记了自己的主人及其利益去追求自己的权利，不认为是自己为人民服务，而认为是人民为自己服务，践踏人民权益，人民当然有权作出自己的判决”将其扫除。柏格指出：英国宪法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之上，800个人（指议会全体议员——作者注）统治全体人民，其中300个是无论合格与否都是天生的统治者，其他据说只是由极少之人所选出（指上院贵族和下院议员——作者注）。在此不合理状况之下，人民的意志能被严重曲解或错误反映，议员遵从选民的指示要求只能证明是近于无踪影之事。

选举权与自由和财产

不过，绝大多数激进分子在抨击议会和政府之时，并不要求根本改变现存政治制度，只是根据上述思想要求革除其中种种弊病和缺陷，争取选举权利。这些反映在一位自称为“真正的人民之友”的匿名作者的文章《大不列颠平民的权利宣言》之中。这位作者提出，英国的统治与立法之权应置于国王、上院和全体自由人的代表（即下院——作者注）的手中；每个平民，除儿童、精神病人和罪犯外，都是自由人，有权享有完全的自由；自由包括任命立法者及生命、财产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权力，穷人也应有平等之权力；无选举权者即无自由者，他们处于有选举权者的绝对奴役之下；英国的绝大多数平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因而被一小批享有排斥性特权者所奴役。这位作者最后根据古老的神圣法律提出，平民有权要求普选权和每年改选议会等。

激进派要求改革议会的一个理论根据是“权力应追随财产”原则。他们认为议会代表权“应依据财产而公平分配”，反映了资产阶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强要求重新分配政权的主张。“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从北美殖民地越过大西洋传到英国后，立即引起了激进分子的共鸣。1765年，詹宁斯在他的《简论反对英国立法机构对美洲殖民地之征税》一文中写道：每个英国人都被征税，然而每20人之中连一人也没有在议会中被代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的人也无选举权，难道他们都不是英国人，或没有被征税吗？1768年，《政治纪事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即使在土地利益集团内也有财

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204.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Vol.I, P.501.

J.C.Clark, *op.cit.*P.332.

C.Hampton (ed) *op.cit.*P.321.

C.Hampton (ed), *op.cit.*P.325.

C. Hampton (ed), *op.cit.*PP.330—331.

Max Beloff, *op.cit.*P.121.

D. Marshall, *18th Century England*, 1962, P.369.

产与权力间的不平均，如约克郡在财富方面比拉特兰郡多出6倍，却同样只有2名议员；至于金融利益集团在议会中完全没有被代表，1亿镑以上的财富在议会中无一股份，除非这些人另有其他资格！商业利益集团也大致如此。如一个商人或制造业主一年能出口价值50万镑的货物，只因是商人或制造业主也未能在议会中被代表；伦敦、威斯敏斯特和南威克付出全国513份土地税中的80份，只能选派8名下院议员，而康沃尔和达文两地仅付出29份土地税，竟选出不下70名议员。作者主张每个交纳了窗户税的房主均应有一票选举权，财产多者则应有2—3票选举权，并建议实行秘密投票以制止腐败选举。另外，也有一些激进分子主张穷人亦应有选举权。柏格认为穷人承担了相当沉重的种种生活用品税，也应有选举权。而雅伯则认为下院是人的下院，而不是物的下院、财产的下院，所以穷人应有选举权。

对激进主义的多种反对

此时，尚有极少数共和派激进分子，他们对现存社会与政治制度提出根本性挑战。如女历史学者麦考莱夫人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潘恩等。不过，他们产生较大影响乃是80年代后期的事。此时反对激进主义思想也大有人在。乔治三世曾宣称英国宪法至善至美，坚决表示要反对攻击这个完美的宪法。1766年2月3日的《大众宣传者报》载文，谴责说，“普选制的主张完全推翻了现存的完美的英国宪法，摧毁国家中的全部秩序、等级和顺从，变社会结构为一堆废墟。”罗金厄姆派也不赞成激进主义思想。虽然他们出于限制王权，加强自己势力的需要，也主张清除若干议会弊病，但他们认为宪政基本是良好的，议会无须立即根本变动，力图限制激进运动走向极端。伯克对激进派意欲迅速求成表示异议，提出他的“渐进改革”主张：“无论何时我们进行改革，为以后的进一步改革留下余地都是正确的。为审视我们自己，对我们已做的工作进行检查加以考虑也是必要的。然后，由于我们以明智开始，我们才能有信心地继续进行下去，”若操之过急，就会产生各种弊病。“我的改革思想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要求逐渐行动，某些好处将在较近时期内到来，某些好处则须待较远的时期。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伯克等人面对此时的议会改革运动，担心它走得“太远”。

60年代后期的激进运动高潮

60年代后期，要求改革议会的活动逐步形成一个高潮。1765年，激进分子巴龙在伦敦的一份报纸上呼吁增加各郡议员名额。1766年一篇激进派文章提出一系列更激进的改革要求：改革或废除衰败选区，让新兴城市拥有代表权；扩大选举权，秘密投票；限制贵族势力并惩治违宪操纵选举的贵族和官吏。同时，老皮特在下院公开谴责议会代表制的不合理。威尔克斯被剥夺当

S.Macooby, *English Radicalism, 1762—1785*, PP.85—86.

J.C.Clark, *op.cit.*P.323.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Vol.I, PP.436—437.

J.Brewer, *op.cit.*P.212.

选为议员的合法资格后，一些激进派组织于 1769 年 2 月在伦敦组成了“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保卫人民合法的宪法自由和支持威尔克斯及其事业”，要求实现平等的人民代表制，每年改选议会和从议会中驱除王权势力等。这个协会被称为“现代政治组织的先驱”，它在两个月内就募集了 2 万镑用以支持威尔克斯，并向各地发出信件号召外地组织起通讯协会展开斗争。在此号召之下，一些地方成立了激进组织。激进分子在报刊和小册子中纷纷提出各种议会改革主张。此时，为表达对重大问题的公众意见而举行的群众性集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群众集会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个郡都有集会要求，本选区的议员必须反映和执行选民的意志。1770 年 1 月，老皮特在议会发表要求改革议会的演说：“这个国家的选区已被十分恰当地称作宪法中的腐败部分……宪法的生命力不在于那些依附于人的小选区，而在于，也只能在于大城市和大郡。我愿意增强这种力量，因为我认为，这种力量是反对这个时代中那些放肆行径，反对人民中的腐败部分和防止王权野心的唯一安全措施。”他要求每郡增选一名议员，企图以此加强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虽然这是一个颇为温和的要求，并为议会否决，但它却是激进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正式在议会中提出的改革要求。爱德蒙·伯克也在当年发表《对当前不满之源的考虑的看法》，主张缩短议会任期。休谟也在 1771 年发表的《关于英国宪政的评论》一文中提出每年改选议会、秘密投票、剥夺衰败选区代表权、扩大选举权等激烈改革主张。同年，威尔克斯提出缩短议会任期、争取公正平等的人民代表制度的主张，要求每个议员在当选时立下誓言，签署一项声明，保证全力支持议会改革。威尔克斯说，“选举自由是宪法的首要原则”；“没有真正的人民代表制，我们的宪法就有重大缺陷，议会就只有一个欺世之名。”1773 年，伦敦议员奥利尔在议会提出缩短议会任期等议案，宣称经常举行选举是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也是人民保持和享有真正代表制度的唯一手段。另一激进分子布尔亦认为经常选举对恢复古老的宪法和立法机构的公正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要求改革议会的运动在 70 年代转入低潮，许多激进派组织如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都瓦解了。

80 年代的议会改革

从 1780 年起，由于英国在北美战争中逐步走向失败，国内矛盾重新激化，改革议会运动再起高潮。1780 年约克郡的一份要求改革议会的决议抨击议会代表制极不平等，“大多数议员只是从腐败和贫穷的选区选出，而这些选区不是掌握在君主和少数几个大家族手中，就是贿赂盛行。”而政府的任何措施，不论对国家利益具有多么大的毁灭性，总可以得到议会支持。不平等的选举制度是许多政治罪恶的主要渊源，要施以激烈的治疗建立合适的人民代表制。这个决议提出了至少增加 100 名下院议员和议会任期至多 3 年等

C.S.Emden, *Selected Speeches on the Constitution*, 1939, Vol. , P.112.

T.M.Parisones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and Anti-Parliament in British Radical Politic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1973), No.348.

J.Brewer, *op.cit.*P.164.

改革要求。此时，许多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激进派组织是1780年成立的“宪法知识协会”。它在3年之中就出版了30余种小册子，印行88.2万份，并在伦敦之外27个城市中拥有会员，形成全国性网络。它的主要发起者卡特莱特上校曾于1776年发表《抉择》，大声疾呼：“不要相信君主，也不要相信大臣，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吧！”1780年6月2日，激进派里奇蒙公爵在议会提出了实现男子普选权、每年改选议会等要求的激进改革议案。时值“戈登暴动”发生，里奇蒙公爵的议会改革法案在一片狂乱喧嚣之中被否决。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结束之际，改革议会的呼声更趋高涨。1782年，小皮特登上了政治舞台。5月，他在下院提议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议会选举状况，以便采取“适当措施”，但为下院以161票对141票否决。此后，他仍向“宪法知识协会”许诺继续在议会中提出改革议案。1783年，他又提出在不废除衰败选区的条件下增加大批议员名额的议案，再遭否决。两年后，小皮特又在下院提出以100万镑重金“赎买”36个腐败选区代表权转交给伦敦等地的改革方案，又遭到以诺思为首的贵族地主势力的强烈反对，福克斯等激进派也对此议案如此“温和”大为不满。结果，这个议案又以248票对174票被否决。从此之后，小皮特再也不愿以自己的首相职位去冒险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小皮特曾说：“在暴风雨时去修理房子是明智的吗？”此话曾风行一时，使从乔治三世到衰败选区的渔民都松了一口气。

D.Douglas (ed) , op.cit.Vol.10 , P.213.

D.Douglas (ed) , op.cit.Vol.10.P.211.

M.Joseph , TheTaintof Politics , P.85.

二、激进主义与北美独立运动

英国激进主义与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持。

“一个传统的两个分支”

北美独立运动的许多激进的思想理论起源于英国。因此，英国激进主义与北美独立运动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个传统的两个分支”。正是英国向它的殖民地提供了反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英国激进分子所运用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平等、自由、正义、反对暴政等等思想观念，几乎都在北美独立运动中的那些反对英国的思想言论中得到反映。这并不奇怪，北美殖民地正是由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新建立起来的。这些移民背井离乡、漂洋渡海前往新大陆开拓殖民地时，也一起带去了英国的种种文化和思想。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是由于祖居之地的种种迫害而抱着向往自由和新生活的希望而前往美洲。当这个殖民地与其宗主国发生冲突之时，殖民地的思想家们自然就会利用这些思想传统作为自己斗争的思想依据。富兰克林曾宣称北美人是“积极热情的辉格党，自由的朋友，并为种种革命原则所哺育。”¹ 约翰·亚当斯也经常提及汉普顿、弥尔顿、哈林顿和洛克等人。一位北美大商人为“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作辩护时说，“确定无疑的是，在本源上，在诺曼征服之前，出席决议诸事的国家谏议会的权利就属于王国中的每一个自由人。”他认为移民们也早将此权利带到了美洲殖民地。老皮特于1766年1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颇能反映英国激进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说：“我认为英国无权对这个殖民地征税。……他们也是王国的臣民，与你们拥有同样的人类的自然权利和英国人特有的种种权利。”“征税不是统治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而是出于人民自愿的礼物。”他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强调只有人民同意方可征税，认为北美无代表权反映了宪法的腐败，不可能永久持续。它如果不被放弃，就一定会被推翻。

一些英国激进分子对北美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自己在英国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能够在那里实现。普赖斯在1775年10月就颇有预见性地指出数十年之后，这个北美殖民地将拥有数倍于英国的人口，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由若干州所组成，在对人类的幸福和尊严所做的贡献方面甚至超过英国。1784年他在《美洲革命的重要意义之观察》一书中指出，美国建国之初将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美国有不少有利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没有那种在英国摧残改革努力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在英国，改革之声很快就遭到反对而夭折，而美国却无此种种偏见。“在那里，时间还未使种种陋习弊病得以养成而神圣不可侵犯。在那里，通向社会尊严和幸福之路畅通无阻，理性之声充满自信获得成功。”夏普则郑重地向富兰克林建议在美国实行十户联保制，在此十户联保制中人们互相督促以确保良好行为和社会正义，尊重自由和法律，

C.Bomwick, op.cit.P.63.

C.Bomwick, op.cit.P.63.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Vol. , P.2091.

C.Bomwick, op.cit.P.167.

拥有广泛的选举权利以保证立法机构直接向人民负责，并实现土地平均以防止少数人垄断土地。他认为这种制度曾是英国法律和宪法的基础，但他现在对此制度在英国的作用已不抱希望而希望美国能采用它。当然，这几乎可算是又一个新“乌托邦”，反映了英国激进分子对美国的期望和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的理想。

富兰克林等人与英国激进派

北美一些人士同英国激进分子之间有相当密切的个人联系。富兰克林是这种关系中最显著的人物。在他离开英国回到北美，在这之前的20年中，除少数几年，他一直长期留居英国，并且是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议会的驻英代表。他交游甚广，在英国社会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就是英国的激进分子。当时的伦敦等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协会。富兰克林则同其中不少协会有交往联系。他不仅是皇家学会会员，也同被誉为“工业革命尖兵”的月球学社有往来，而且同“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这类政治组织也有往来。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等人不仅是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同行，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颇有共同之处的好友。普赖斯就是由富兰克林提名加入皇家学会的，并同他长期保持友谊直到富兰克林去世。另一名激进分子柏格则称他同富兰克林的友谊为平生最大之幸事。北美大商人李同英国激进派有着密切联系。他曾直接参加过威尔克斯运动，并且是“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成员。他常常以“美洲的尤利乌斯”的笔名在英国写文章出版小册子，直接为北美人民的利益和英国激进主义摇旗呐喊。他声称：“美洲的事即全英国的共同事业……双方都有同样的怨情，因而也就互为朋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里的人民同美洲人民联系起来”。如富兰克林一样，他在英国也广交朋友，政府的反对派如伯克、谢尔本，提出限制五权决议案的唐宁以及激进分子麦考莱夫人、威尔克斯、普赖斯等都同他颇有交往。即使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的困难条件下，一些英国激进分子仍同富兰克林等人以种种方式暗中保持通讯联系，从中了解战争进程，并相互鼓励。富兰克林等人同这些激进分子的友谊加强了英国社会内部对北美人民独立事业的关注与同情。一位英国激进主义者对北美要求拥有议会代表权深有同感：“我们的伯明翰、曼彻斯特、里兹和哈里法克斯与你们的波士顿、纽约、费城……一样都没有正式的代表权。”他还说：“既然英国人的代表权都是非常不平等的，那么美洲人根本就不会有此权利。”而北美对英国激进主义者也大力支持。如北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就公开向“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捐款1500镑。

英国激进分子对北美独立的态度

60年代中期之后，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冲突逐步激化，英国社会对北美的关心程度也显著增加。英国大量出版有关北美的著作并翻印北美书刊。在1720年—1780年，伦敦出售的各种书刊之中有关北美的占1/10，而在1774

J.Brewer, op.cit.P.204, P.214.

J.Brewer, op.cit.P.211, P.209.

年—1779 年则占 1/5。北美出版的书刊往往数月后即在伦敦等地的书店出现。如杰斐逊、亚当斯和潘恩等人的著作文章及北美大陆会议的文件都在英国发行。英国激进分子哈里斯不仅热心再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作品，也热心翻印北美人的宣传品。

在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印花税之争直至独立战争的 20 年中，英国激进主义者一直关注北美事态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北美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其斗争。同时，他们也利用北美斗争形势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服务。北美“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很快就为他们借用，作为自己要求议会改革的根据之一。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大力宣传将财产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纳税与代表权不可分离”。

在唐森德征税法令颁布后不久，普里斯特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及其殖民地中的自由现状》。他猛烈抨击英国对北美的政策比国内政策更为专横和强暴，主张英国政府和议会作出让步，以同北美和解。普赖斯认为北美是英国的“自由的朋友”，可寄以期望的国度。1774 年卡特莱特上校发表了《美洲独立》一文，指出北美殖民地已经成长起来了，具有了自治能力；英国作为母国也无权施以暴政。面对北美急速发展的独立趋势，他和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不愿看到北美脱离英国，希望事态能沿着一条“中间”道路发展，因此他提出英国和北美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持久的，就像一个大家族各分支之间那样的联盟。激进分子就北美问题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案和建议大都是如此，旨在将英国和北美的关系建立在“自治、相互尊重和依赖”的基础上，力图把北美留在英帝国之内，不要完全走向独立。他们这种“和解”主张实际上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已卷入政府的殖民政策之中的既得利益者立场。他们显然有低估北美争取独立的能力的倾向。为此，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积极在政界活动。其中一些同议会中的反对派，如老皮特和谢尔本勋爵等保持密切联系，以求通过他们在议会中呼吁实现“和解”以挽救危机。威尔克斯等议员也多次提出议案，要求改变对北美的政策。另外一方面，若干激进分子还直接在英国政府和北美大陆会议之间充作调解人。1774 年 11 月至 1775 年初，富斯吉尔等人在富兰克林和英国的北美事务大臣之间穿梭往来，企图使之达成和解。其计划的基础是，英国撤消遭到北美反对的法令，并承认议会无权干涉北美内部事务，不向北美征税，但北美在英国处于战争之时应予以财政等支持。但激进分子的这一努力由于诺思政府的最后拒绝而宣告失败。不久之后，列克星顿的枪声宣告了北美独立战争爆发。

此时，英国社会充满了战争喧嚣。即使是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一向对北美抱有同情之感的大城市之中也出现逆转的情况。许多商人放弃了对北美的支持与同情，而在“爱国”口号下站到了政府一边。政府也对激进分子严加镇压打击。那些发表同情北美言论的作者和出版商受到了警告。一些激进分子如图克等还被监禁判刑并罚以重金。激进主义运动一度处于困难境地。

随着英国军队在北美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这些激进分子又重新活跃起来，疾呼停止战争。其中一些人又再次充当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调解人，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和解”，不希望北美完全脱离英国。即使在约克镇战役已确定了英国的败局之后以及后来的和谈之中，他们仍抱有希望。但是，

一个幅员辽阔、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美利坚合众国，已不再可能回到英国的怀抱之中。

第四节 18 世纪的英国文化

一、哲学和社会科学

哲学的发展

在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之后，英国哲学领域中虽有人坚持和发展唯物论，但更多的是转向唯心论。

约翰·托兰德（1670—1722）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主张物体不仅具有广延性，而且具有内在能动性，认为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并具有多种运动形式。他发展了自然神论的思想，否认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及神创造世界的观念，提倡自由思考和讨论，推崇理性。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托兰德的主要著述有《基督教并不神秘》和《给塞烈娜的信》等。18 世纪后期，普里斯特利（1733—1800）又发展了英国的唯物主义，肯定了物质实体的积极能动性，认为大脑是思想的自然所在。他还进一步提出：“自然界，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和自然规律，将会越来越服从于人的意志。”

在唯心主义哲学中，18 世纪英国出现了托马斯·瑞德（1710—1796）为代表的二元论的“苏格兰学派”（亦称常识哲学），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贝克莱主教和大卫·休谟。贝克莱（1685—1753）作为西欧近代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创始者，将洛克的经验主义由唯物论转向唯心论，成为“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他完全否定客观物质存在，把外界事物看成“观念”（即感觉）的复合，而一切观念的根据是“无限心灵”，即上帝。贝克莱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反对无神论，维护神学。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我们的研究中应占首要位置的，乃是对于上帝和我们的天职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人类知识原理》和《希勒斯与斐勒斯的三篇对话》等。

出身没落贵族的大卫·休谟兴趣广泛，不仅对哲学，而且对历史、经济、宗教和政治学均有研究和著述。他是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者，同贝克莱一样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他认为经验由包括印象和观念的知觉所组成，而知觉之外是不可知的领域，即除了知觉，一切皆不可知。在他看来，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宇宙万物都不过是一束知觉之流，而每一知觉又是特殊的和互不关联的。至于知觉如何获得，知觉之外是否有客观实体存在，他认为这是人们不可能知道的。他说道：“除了对知觉而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完善的观念……当人们问：知觉是寓存于一个物质的实体中，还是寓存于一个非物质的（精神的）实体中时，我们甚至不懂得这个问题的含义，那么如何还能加以答复？”休谟完全否认了客观物质存在是产生知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5 页。

梅林：《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0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69 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6—18 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第 576 页。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262 页。

的根源，否认了知觉同外在事物的联系。另一方面，休谟的不可知论与贝克莱的哲学不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宗教的哲学思想形式。恩格斯指出这种不可知论实际上否认了神的存在。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后来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颇具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等。

休谟和贝克莱在政治上都主张对现存政权的顺从，反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用过的思想武器，如社会契约论等。他们的哲学也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在确立其统治后转向保守在理论上的反映。

经济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 18 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它起始于威廉·配第（1623—1687），以亚当·斯密（1723—1790）为典型代表，至大卫·李嘉图（1772—1823）结束。从 17 世纪后期起，重商主义逐渐不能适应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探索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并论证其优越性，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得以充分发展。这一学说的主要贡献和科学成分在于：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自觉地发现了剩余价值；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三个社会阶级，并探讨了这三个阶级间的矛盾。

配第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资本略论》和《政治算术》等。他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运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成为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奠基人。他把价格分为“政治价格”（即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即价值），并着重研究后者，但他的研究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

此后百余年中，由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得到深入发展。洛克从“自然法”和“自然权力”的理论出发，认为劳动果实应为劳动者所有，利息和地租都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占有。洛克的经济思想中已有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达德利·诺芝（1641—1691）则将借贷资本与货币分开。马克思赞扬诺芝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关于 Stock 即资本明确概念。”诺芝还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约瑟夫·马西（？—1784）则第一次指出利润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决定于利润率。他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一书为马克思誉为“划时代”之作。贝克莱在经济学方面亦有所研究，他注重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单纯的土地和矿山不是财富，只有与劳动生产结合才能成为财富。休谟提出了第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流通量，商品价格取决于货币流通量的多少。

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家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于 1767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系统阐述了重商主义观点。他探索了利润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第 389 页。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 卷，第 632 页。

起源，并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初步分开，这是他的有益贡献。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亚当·斯密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终建成一座辉煌的知识大殿。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兴起，重商主义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扩张的重大障碍，这个阶级迫切感到需要取消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和政策。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次把当时一切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旨在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提供理论武器。全书中心内容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全书分五篇：第一、二篇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工与资本；第三、四篇虽然是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但实质上是论证国家政策正确与否对国民财富和生产的影响，主张最好的经济政策是不干涉个人经济活动；第五篇是财政学，论证国家收支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认为收入超出支出才能增加财富。他不赞成征收资本家的利润税，认为地租是最合适的征税对象。这一观点鲜明地表现出亚当·斯密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部巨著之中，亚当·斯密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并把社会明确分为工人、地主和资产阶级三大阶级，研究了这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不过，亚当·斯密在方法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他看来，不是经济关系决定人的本性，而是人的本性决定经济关系。

历史学的发展

18世纪的英国史学尚未完全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不少政治家、哲学家等也涉足于史学领域。历史著作大多仍是描述政治与宗教事件及显贵人物的活动。但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之下，有些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历史的“原因”和如何解释历史。

18世纪前半叶，大卫·威尔金斯（1685—1745）在中世纪研究方面达到较高水平，主要著作有《公元446—1717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宗教会议史》。托马斯·马克多斯（？—1727）著有《英国王室度支部的历史和古代制度》等。他是第一个深入到原始档案资料中进行研究的英国史学家。他还在自己的著述中颇为详细地讨论了历史批判的性质和方法。

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休谟、威廉·罗伯逊（1721—1793）和爱德华·吉本这样一些重要的史学家。休谟的名著是《从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他承袭王党史学家克拉兰敦的观点，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大叛乱，同情被杀的查理一世，但他也衷心拥护1688年“光荣革命”，提倡自由、宗教宽容、理性与科学。休谟代表开始踏进权力宝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既要防止暴力革命，又要防止封建复辟，力图建立历史运动中的因果关系，并突破史学中以帝王将相和战争等为中心的传统局限，重视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威廉·罗伯逊自称为伏尔泰和休谟的追随者，著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等。他治学严谨，文笔优美，其著作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所引用的史料出处，以昭信实。

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幼年丧母，父亲严厉，因而性格内向。他

靠自学博览群书，后去法国结识了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受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27岁时吉本游览了充满魅力的罗马。他写道：“我伫立在这座古都的废墟里，在夕阳残照中缅怀往事，陷于沉思时，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在朱庇特神庙唱晚祷诗，于是我脑海里第一次闪过一个念头，要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以20年之心血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1776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该书共6卷，71章，120余万字，所述历史时间上下1200余年，涉及的国家繁多，史事纷杂，然而吉本的文笔生动自然且典雅堂皇，叙事之中以简驭繁，条理清晰。他大胆地从理性出发批判了基督教和封建愚昧，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原因在于基督教破坏了罗马人的务实精神。虽然吉本忽视了社会运动中的经济因素和普通人民的历史活动，但这部巨著仍不失为史学杰作。

二、文化艺术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成为此时文学艺术的社会实践源泉。文化普及范围的逐渐扩大，出版审查法的废除，社会的开放性及相对的宽容性，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印刷发行等有关物质条件的改善，都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且，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趋势也更多地倾向于正在进一步成熟壮大的资产阶级，反映这个阶级的生活、思想和向往等。在文学中，古典主义尚有一定影响，现实主义蓬勃发展成为主流，至 18 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又随之兴起。同时，具有英国特色的绘画艺术正在脱颖而出，建筑艺术有所创新。英国文化艺术走向繁荣，并对欧洲产生了相当影响。

戏剧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剧院曾被清教徒关闭或拆毁。至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戏剧活动才重新开始，但仍局限于宫廷与贵族之中，与社会联系甚少。在 18 世纪，戏剧逐步发展起来。此时的主要剧作家有约翰·盖依（1685—1732）、乔治·李洛（1693—1739）、菲尔丁、哥尔斯密、谢立丹（1751—1816）等。

李洛的代表作《伦敦商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情感和道德观，被认为是最早的资产阶级戏剧。盖依的《乞丐的歌剧》则尖刻地讽刺了上层社会的黑暗腐败，曾引起伦敦的轰动。菲尔丁的三部政治讽刺剧：《唐·吉珂德在英国》、《巴斯昆》和《1736 年历史纪实》抨击了上层统治人物的唯利是图和腐败政治现象，从而触怒了当时的首相沃波尔。这位首相操纵议会制订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废除的戏剧审查法，迫使菲尔丁退出戏剧界。菲尔丁的戏剧情节生动有趣，滑稽诙谐，与严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交织，达到了深刻讽刺的目的。哥尔斯密所写的《屈身求爱》是当时最优秀的风俗喜剧之一。该剧通过贵族青年与乡姑调情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英国的城乡社会生活。在英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谢立丹，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剧作家，曾写下了几部出色的启蒙时期现实主义戏剧，揭露上层社会的荒淫生活和虚伪道德。他最著名的两个剧本是《情敌》和《造谣学校》，其中后者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之后英国喜剧的典范杰作。

在戏剧表演艺术中，托马斯·贝特顿（1635—1710）是位天才的悲剧演员。他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演莎士比亚戏剧，借此对抗传统的古典主义悲剧表演艺术。大卫·加立克（1717—1779）则是欧洲启蒙主义时期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奠基人。他改革英国舞台艺术，培养出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演员，提高了英国剧院的艺术水平。艾德曼·金（1787—1833）则是著名的浪漫主义演员，其表演艺术充满强烈的感情和艺术气魄。

艺术

在绘画方面，18 世纪的英国结束了外国画家占据英国画坛的局面，造就出一批杰出的英国画家，产生出自己的民族艺术。庚斯保罗（1727—1788）

是此时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有很高的造诣，并富有音乐感，画风清莹流畅且严谨工细。荷加斯（1697—1764）是最有思想性和辛辣讽刺意味的风俗画家，其作品对社会人物及其生活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他的组画《文明结婚》表现了一对贵族青年从买卖婚姻开始，然后各自放荡，直至双双自杀死去的悲剧，从而辛辣地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腐朽。不过，荷加斯成为宫廷画师后就再无此类重要作品了。此外，被誉为英国风景画之父的威尔逊（1714—1782）、水彩画的代表画家弗朗西斯·普鲁斯（1647—1728）和爱德华·戴伊斯（1763—1804）等一批著名画家共同将英国绘画艺术推向其发展高峰。

18世纪英国的雕刻艺术并无显著建树，但英国的建筑艺术却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有了“中英公园”这样的突出成就。“中英公园”是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影响下建成的，富于曲折变化，充满诗情画意，融自然天趣与人工匠心为一体的中国园林艺术，使英国出现了一个反对严守几何形设计而流于呆板的“正规花园”的建筑艺术变革运动。自一位中国建筑家为肯特公爵建成一座中国式花园后，“中英公园”就开始在英国和欧洲流行起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1741年英国出版了《赵氏孤儿》的改写本《中国孤儿》，其改写本作者说道：多年来，中国把它的工艺品和物产品供给英国，“这一次，中国诗歌也进口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兴奋。”1759年该剧在伦敦上演获得成功。1762年，还有人编辑了关于中国语言、礼俗、宗教、诗歌、戏剧、园林艺术等文章合为《中国诗文杂著》一书在英国出版。

范存忠：《“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79年版。

第六章 法国革命时期的英国 (1789年—1815年)

第一节 法国革命对英国的影响

一、18世纪末英国的民主思想和组织

法国革命在英国引起的反响

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同样，在英国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之中。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急速分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激进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斗争也在不断发展。法国革命使英国国内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激进主义者从法国大革命中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对法国革命予以热烈支持，并更加积极地展开活动，而保守派人士则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惶惶不安，为了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免受革命浪潮的冲击，他们采取对策，在政治和宗教等问题上更加保守。

当法国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入英国的时候，最初的反应是普遍的欢欣、快慰。除了乔治三世和爱德蒙·伯克等极少数人立刻对法国革命加以谴责外，大多数英国人都对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虽然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热烈支持，有的感到轻松的快慰，也有的以一种幸灾乐祸的侥幸心理注视他们在欧洲的宿敌——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崩溃。对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法国一向被看作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专制君主制国家之一，在政治上是和立宪君主制的英国不相容的，在国际关系上是英国在殖民扩张道路上的主要敌人。现在突如其来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无疑使英国在争夺欧洲霸权和海外商业扩张的道路上，扫除了一个障碍，所以英国大多数人对这次革命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快慰。有的人以为这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的崩溃可能标志着政治民主自由新时代的到来。约翰·卡特赖特宣称：“法国人并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是在推进整个人类的普遍自由！”法国革命初期的立宪君主派领导人拉法叶特和米拉波成为英国许多人的崇拜对象。福克斯·斯坦霍普伯爵和贝德福公爵领导下的辉格党反对派对1789年法国发生的事件更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度。激进主义者普莱斯欢呼：“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时代啊！我庆幸我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亲眼看到……人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得到理解。”

当大多数英国人对法国革命抱着肯定的态度，而一些保守分子还在观望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立刻把心中蕴蓄着的对法国革命的恐惧和对英国国内激进思想的忧虑表露了出来。这就是爱德蒙·伯克在1790年11月发表的《对

F.D.Cartwright (ed),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ajor Cartwright*, 1826, Vol.I, P.182.

Asa 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1967, PP.129—130.

R.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1790.PP.40—41.from 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1979, P.236.

法国革命感想》，他把这篇著作作为对英国的警告，以防止英国走上法国革命的道路。

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感想》，最初是以同法国一个青年朋友通信讨论关于法国革命前景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理查德·普莱斯及其他激进主义者要求议会改革的言论的谴责。伯克在攻击法国革命并谴责英国那些主张改革的人士的时候，他的目标主要针对三部分人，首先是对兰斯多恩侯爵周围的一批人，即所谓“包伍德集团”；其次是对伦敦“革命协会”和“宪法知识协会”的成员；第三，是对那些所谓“新辉格”派人士，这些人把英国在18世纪的使命看成是追求改革和进步，而不是像以前辉格派人士那样认为应该保守持重。

伯克宣称，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社会上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是正常现象。由于法国第三等级的无知和嫉妒，起而用暴力去破坏了自然的秩序，造成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不道德的邪恶的行为。现在英国国内也有人要求改革，如果不批判这些人的言论，那么英国的国家、教会、社会的和谐、正义都要受到破坏，并且这将鼓励穷人去劫掠别人的财富。伦敦“革命协会”和法国国民议会互致问候之举，使伯克更为不满。他认为这“明确地表露了要将法国的事件同英国联系起来意图，想驱使我们[英国人]去仿效法国国民议会的行为。”他宣称英国的改革派人士和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们把“人权”作为武器，想以废除上院和君主制来将“教会和国家”彻底摧毁，这些人的“冒充的人权”只是在抽象的玄学上才是真实的，而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却是极其虚伪的。

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感想》这本小册子，最初并无多大影响，听信他的人不多。但是随着法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斗争越来越激烈，英国无产阶级人士的畏惧情绪逐日增长起来。与此同时，英国激进主义者的声势也与日俱增，更使那些保守人士惶惶不安，所以就有人渐渐走到伯克方面来，和伯克采取同样的政治立场。在议会中赞成改革的人数在减少，拥护政府的人数却在增加，即使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支持的人也不多。到后来，支持改革的人数大约降低到只有50人左右。

乔治三世为首的当权者，对伯克的小册子颇为欣赏。乔治三世要求每个人都应读一读。在一年之内，这本小册子曾一版再版。在法国，反动集团对伯克责骂革命的言论更是大加欢迎。

“革命协会”和“宪法知识协会”

英国社会里的中等阶层和工业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反映在左翼辉格派人士的言论上和他們所建立的一些团体的活动中。在这批人看来，法国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口号和推翻君主专制的行动，都是值得欢欣庆祝的。而法国革命中越来越多的激烈的行为，则使他们得出了不同于伯克等极端保守派的结论。他们认为，要防止像法国革命那样的暴力和破坏等过激行为，就要进行改革。这批人在1788年11月4日，为纪念1688年“光荣革

A.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The Englis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79, P.100.

E. Burke,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by C.C.O'Brien, 1969, P.91.

Ibid, P.147, P.

H.T. Dickinson,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5, P.29.

命”100周年 成立了一个“革命协会”。而在此之前于1780年成立的“宪法知识协会”，本来已经趋于萎靡不振，并于1784年后已停止了活动，现在也恢复了生机。

“革命协会”在1788年通过的决议中说：“所有行政的和政治的权威都来源于人民；”“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信仰自由，按照法律程序受审，出版自由和选择自由，应该永远成为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协会成员认为，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的根本原则，实际上比一般人原来所理解的更激进一些；同时他们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说明，只要给人民以适当的代表权，内战和无政府状态就不一定会发生；只要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政府，就可以保卫人民的自然权利。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还说明，政治平等和保卫财产以及一个阶级分化不太剧烈的社会是可以互相调和一致的。在以激进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光荣革命”的时候，这个协会的成员宣称，1688年“光荣革命”的原则并不是妥协，而是人民主权的思想。1789年11月4日，即这个协会成立一周年，普莱斯在协会举行的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指出，“光荣革命”已经宣布了自由的人具有下列一些最重要的天赋权利：良知即信仰自由的权利；反抗暴政的权利，特别是挑选他们自己的统治者的权利；拒绝执行统治者的错误言行和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不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将这些权利宣布以后，未能将它们保持住，所以现在是在争取这些权利的时候了。

对刚刚在法国发生的攻陷巴士底狱的事件，“革命协会”感到高兴。福克斯说，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在1789年11月4日这天的会议上，他们向法国的国民会议表示祝贺。

“宪法知识协会”也积极展开活动。这个协会本来是1780年4月在约翰·卡特赖特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创办者都是一些富有财产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该协会包括14个议会议员4个郡长、7个医生、14个贵族和骑士。协会的目的是在全国传播关于宪法的知识，以唤起群众要求议会改革的意识。卡特莱特在讲到议会成立的宗旨时说：它要“尽可能提供那些已被毁掉（我国古老宪法）的记录，并在我们的同胞，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思想中，重新复活他们对失去的权利的了解……从而使他们可以在那由代表而产生并应对他们负责的立法部门中恢复自由和独立。”“宪法知识协会”在英国散发了宪法知识的资料，将这些资料散发到每一个乡村、农庄，甚至茅舍农的简陋住区中。”但由于财政短缺，经费拮据，再加上它将注意力转移到废除奴隶买卖、监狱改革及为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争取公民权等斗争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它的成员数目减少。1783年时协会会员最多，后来参加协会会员的人锐减，1784年以后，实际上未再召开。几年以后，在改革和激

11月4日是威廉三世的生日。实际上，1688年11月5日威廉在托尔湾登陆的日子，更适合纪念“光荣革命”。不过这一天正好与“火药阴谋”的纪念日碰在一起，另外又和英国国教的庆祝日相混，故改为11月4日。

E.Royle and J.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1982, P.40.

R.Price, *op.cit.*

F.D.Cartwright (ed),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ajor Cartwright*, Vol.I, 1826, P134.

A.Goodwin, *The Friend of Liberty*, 1979, P.63; C.Wywill (ed), *Political Papers*, Vol. , 1804, P.465;

E.Royle and J.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1982, P.29.

进思想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它的领导人丹尼尔·亚当斯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吸收会员，其中包括少数下层人民，如补鞋匠、雕刻匠等。协会除了在各地散发它的出版物外，还在英格兰、威尔士进行关于选举制度的调查，调查结果反映在奥德菲尔德 1792 年出版的《选区历史》中。此书对当时的选举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进行揭露。协会的另一主要成员亨利·弗劳德也竭力主张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宣称法国革命发生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在英国实行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政府只有对中产阶级让步，才可以防止类似法国那样的过激事件。不过，弗劳德在议会中得不到多数支持。1790 年他曾在议会提出过一个改革选举制的议案，虽然这个议案很温和，对保守派作了一些让步，但仍不能平息保守派议员对它的的不同。弗劳德只得将议案撤回，未提交表决。

其他一些左翼辉格派人士也抱着类似的政治态度，他们同情法国革命，但是只限于同情而已，不敢把法国革命作为英国应该效法的榜样。相反，他们所以主张在英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要避免使英国走上像法国那样破坏性的革命暴力的道路。

1792 年 4 月，一批左翼辉格派人士如格雷、贝德福公爵等组成了“人民之友社”，发表了一个“告英国人民书”，宣称要避免发生像法国革命那样的悲惨事件，就必须进行温和的改革。它的一个成员指出，当时英国的选举制度有各种弊端：选区既不固定，也不合理，而且贿赂成风，营私舞弊的行为处处都是。在当时英国的行政制度下，君主和上院的权力太大，民主因素太弱，不能维持平衡。在议会选举时，11,095 个选民选举出议会中 257 个议员，而且这 1 万多个选民实际上是受 200 个大地主控制的。所以选举制度必须改革。不过，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不打算改变英国现存的宪法，而是在宪法的精神基础上进行调整。他们要求实行政治平等，改革议会选举制度，实行普选权，但是坚决反对改变财产关系，认为财产关系的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当时成立的许多要求政治改革的组织中，“人民之友社”是最温和的一个。

二、激进主义思想的兴起

伦敦通讯会社

“伦敦通讯会社”成立于1792年1月25日。这一天，以托马斯·哈第为首的9个人在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的贝尔酒店聚会，讨论当时的经济困难和物价高涨等问题，其中8个人建议成立一个社团，以后每周聚会一次，每次交纳一个便士，讨论如何解救穷人的生活苦难。哈第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兼司库。后来律师莫里斯·马格丽特成了该社的第一届主席。

“伦敦通讯会社”在制订政治纲领时，除了提出穷人生活问题之外，还提出了实行普遍选举权，议会每届任期一年，每年进行选举，重新分配选区和议员名额，减少衰败选区议员名额，增加大城市议员名额等。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他们的主张，广泛吸收会员，并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它的基层组织是分部或小组。到1792年5月，共有9个分部，每个分部的会员为30人左右，但有些分部会员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如最活跃的第2分部的会员最多时（1795年底）达到1700人。当时伦敦有75万人，流动性大，信息灵通，很多人政治斗争的积极性较高，且富有革命传统，所以当“伦敦通讯会社”成立之初，一经号召，即有许多人踊跃参加，会员人数急速增长。本来在1795年3月左右，“伦敦通讯会社”的成员曾一度减少。但未过多久，会员又迅速增加，除了原来已参加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外，许多工资劳动者也纷纷加入。据说6月有400新会员，9月有700—800新会员入会。同时还新成立了许多分部。到9月底，分部的数目已从3月的17个增加到41个，10月又增加到70—80个。为了加强各分部之间的联系，由每个分部选举代表组成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再选出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会社的工作。到1795年，这一套比较系统的组织已粗具规模。由于组织严密，所以当1795年政府颁布“妨害治安集会法”，禁止50人以上集会时，它能够继续存在下来。

“伦敦通讯会社”积极主张进行议会改革，实行普遍选举权，建立共和制度。他们把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翻印，广为传播。平等派关于普遍选举权和成立一院制共和国的思想，再度吸引了广大中下层人民。在工人、手工业者以及进步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伦敦通讯会社”的拥护者。

1792年“伦敦通讯会社”致函法国国民大会，表示英国人民也要走法国革命的道路，去争取自由。大部分会员支持法国的雅各宾派。当英国参加了反法联盟的军事行动以后，“伦敦通讯会社”的会员们支持法国革命者抗击反法联军的斗争，他们希望英国在战争中失败。当听到法国军队获得胜利而

1794年冬至1795年初有人诬告“伦敦通讯会社”的3个成员阴谋刺杀国王。后经调查，罪名不实，3名会员未经审讯即释放。但消息刚传出时，使“伦敦通讯会社”声誉一度受影响。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P.154.当时无精确统计，有关数字只是大致估计。

H.Collins, *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in John Saville,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1954, PP.103—134.

英国遭到失败的消息时，会员们在自己的集会上举杯互相祝贺，甚至有些会员还募集志愿人员站到法国国民大会方面与反法联军作战。

“伦敦通讯会社”会员的人数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无充分史料可供参考。同时在会员中，哪些是积极的固定的成员，哪些是偶而参加集会的同情者，也很难确定。以前历史家对这个团体人员数目的估计一般偏高。“伦敦通讯会社”的人自称他们的会员有 5000 人。不过，据有关资料分析，在 1792 年底，它大概有会员 650 人左右。后来一直在这个数字上下徘徊。人数最多的时候是 1795 年秋。这时，有一个星期参加各分部集会的人达 3576 人。但随后人数即迅速跌落。到 1798 年被迫解散前夕，已只有约 400 个积极参加者了。

至于“伦敦通讯会社”会员的成份，以前的著作认为该会的会员中，小店主和工匠约占一半人数，其余都是出身于社会较高阶层的人。现在有的学者认为，“伦敦通讯会社”成立时，特别是 1792 年下半年，物价猛涨，实际工资降低，许多生活困难的中下层人民，投身于激进主义组织中，希望能找到一个解救他们苦难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就把“伦敦通讯会社”当作这样的组织团体。“伦敦通讯会社”也开始以生活贫困的中下层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后来又以全国的中下层人民的发言人姿态出现。在“伦敦通讯会社”中，工匠和小店主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它主要由小店主和工匠所组成。它的活动，虽然受到广大工人、手工业者、中小资产阶级的欢迎，但仍不能说它是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群众组织。

除“伦敦通讯会社”外，其他许多城市，如利兹、德比、诺丁汉、伯明翰、爱丁堡、纽卡斯尔、敦堤、格拉斯哥、斯特林等也建立了同样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彼此之间互相通信联系，对许多问题互相交换意见，使他们的力量显得更加壮大。

潘恩及其他激进主义者

“伦敦通讯会社”和当时的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托马斯·潘恩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潘恩在各激进主义团体和激进派人士中影响很大。他所写的《人权论》一书，在英国中下层人民中受到广泛欢迎。1793 年，一本小册子说该书的销售量达到 20 万册，在许多矿区、农村，包括苏格兰高地、威尔士的北部地区，都有这本书在传播。据说，在设菲尔德，“每一个磨刀匠”都有一本。在纽卡斯尔，潘恩的书“人手一册”。特别在那些制陶业的雇工中，潘恩的书更受欢迎。潘恩的《人权论》已和《鲁宾逊漂流记》等著作一样成了最受欢迎的书。这本书之所以广泛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直接为劳动群众

有些史料记载了个别分部的会员人数及会员的社会成份，如在“Treasury Solicitors Papers”中记载了第 30 分部的 34 个会员的具体社会成份，但各分部会员的数目和社会成份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拿一个分部的资料作为典型去推断整个“伦敦通讯会社”的会员成份。Cf. E. Royle and J. 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1982, P. 52.

Mary Thale (ed), *Selections from Papers of 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 1983, PP.

Ibid, P.

的权利而呼吁，并号召解除下层人民的生活困苦。同时，它的文字通俗易懂，条理清楚，能将现实问题的论述与富有想象力的说理密切结合在一起，加以它出版了大量的廉价本，所以书一出版，立刻销售一空，在短期中出版了 6 版之多。

《人权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 1791 年出版，第二部分在 1792 年出版。它本来是为了批驳伯克对法国革命和英国民主改革要求的攻击而作的。潘恩不同意伯克对 1688 年光荣革命的歌颂，认为 1688 年的光荣革命远不能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相比。他也不同意伯克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赞扬，他认为英国在 1688 年以后保留的君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只有共和国才能适合人民的利益。任何合理的政府形式，都应该是由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任何君主政体都应该加以废除。像美国这样的“混合制”的政府，事实上也是“腐败的、浪费的、不正义的”，都是应加以废除的，并应代之以共和制。新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享有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为了使人民的权益得到保证，为了使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应该制订一部成文宪法，行政权应该从属于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后者应该受到人民最高权力的制约。只有在废除君主制度后，才可以在各国人民之间保持和平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非是各国君主之间的争吵。

潘恩在论述自己的见解时，不是像有些民主主义者，如约翰·卡特赖特和图克那样，依托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把人民的权利说成是古已有之，只是后来被统治者所侵犯，而是直接诉诸人的生而俱来的自然权利。潘恩反对伯克等人推崇 1688 年光荣革命，把 1688 年—1689 年的一些措施当作后世的效法榜样。他认为不论是“1688 年的议会和人民，或者是别的任何时代的议会和人民，都不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来处置当今的人民。”他说：“我坚决地维护活着的人的权利，反对那些已经失掉的，由已死去的政权所控制和编订的权利。以前有些历史例证，只是对保守主义者有利，因为保守主义者正是把以前的历史例证作为他们限制人民权利的根据的。现在的改革者应该抛弃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的说法和关于 17 世纪的“万应灵药”，而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建立在天赋人权方面来。潘恩依据理性主义者约翰·洛克和普莱斯的理论，宣称根据共同的人性，人生来就享有一些任何人和政府都不能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为了保证这些原则的实行，应建立起人民最高主权的原则，并制订一个超越一般行政和立法权的最高法律来宣布这些人民主权，任何人和政府都不能违反。不过，潘恩虽然不屈不挠为改革事业而奋斗，但他却从来未号召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在他看来，只有当统治阶级用武力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对人民进行镇压时，才可考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为了解除穷人的痛苦，潘恩主张向贫民儿童每年发 4 镑补助金，到 14 岁为止。对 50 岁以上 60 岁以下贫苦老人发 6 镑补助金，60 岁以上的贫苦老

T.Paine, *Right of Men*, ed. by H.Collins, 1969, PP.102—106.

T.Paine, *op.cit.*P.63.

Ibid, P.64.

Ibid.另见下列著作对此所作的分析：G.A.Williams,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8, P.14.

人每年发 10 镑补助金。当穷人婚丧之时，国家也给予补助。

1797 年潘恩发表《土地正义》一书，主张以赎买的方式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来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实行累进所得税。而对一般的赋税则加以削减，以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

潘恩因从事激进主义活动，受到政府的迫害。为了避免被政府逮捕和审判，他逃往法国。在法国他得到了公民权，并被选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过，潘恩因支持吉伦特党，所以在雅各宾派执政后被捕，后来从法国逃往美国，在美国又受到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排斥。

本来，1774 年潘恩曾从英国到了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潘恩正在美国，他积极支持美国的独立事业。现在，当他在 1802 年不得不再度到美国时，却到处无法容身。

除潘恩外，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葛德文和托马斯·斯潘斯也都与“伦敦通讯会社”有密切联系，并且在当时的激进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葛德文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将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发展。他青年时曾当过牧师，后因受到法国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辞掉了圣职，从事写作。1793 年发表《关于政治正义的探讨》一书，献给法国国民大会。该书宣扬社会改革，但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希望富有的人能自愿地把多得的钱财拿出来分给那些最需要这些财富的穷人。他和“宪法知识协会”及其他一些通讯会社的成员一样，很重视政治教育的问题，认为通过政治教育转变人的政治态度，是达到改变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基础。他在《关于政治正义的探讨》一书中写道：“一个慈善家所渴望看到的国家革命变革……主要存在于这些国家人民的情绪和气质变化上。”同时他还谴责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斯潘斯原为纽卡斯尔地方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在 1775 年向当地“文学与哲学协会”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取消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把土地转交给公社掌握等主张。这次演讲词后来以《人的权利》的名称出版。斯潘斯主张通过革命来达到废除土地私有制。在他看来，只要人民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就可将土地从地主的手中夺过来。他在一本小册子中以 1797 年发生的水兵起义为例，证明就像水兵联合行动起来之后，军官无法阻止他们将兵舰夺取到自己手中一样，只要人民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地主也无法阻止人民将土地据为己有。他的思想，对其他激进主义者发生了很大影响。

A.O.Aldridge, *Man of Reason, The Life of Thomas Paine*, 1960, P.241.

W.G.Go 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 Vol.I, P.202. See E.Hellmuth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1990, P.547.

T.Spence, *The Restorer of Society to Its Nature State*, in H.T.Dickinson (ed), *The Political Works of Thomas Spence*, 1982, P.18.

第二节 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

一、政治斗争的两极化

激进派的国民大会

英国国内对法国革命的反响，随着法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两极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中下层人民中那些对英国现实政治经济状况极端不满的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更加坚决，特别是当法国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们对雅各宾派所采取的一些坚决措施感到欢欣鼓舞。但当时执政的托利党人及其他保守派人士则日益惶恐不安，他们开始准备采取措施镇压激进民主派运动。

英国的各地激进派组织虽然积极活动，但是此起彼伏，互不统一，力量分散，所以收效不大。他们也感到，像这样零敲碎打，议会不会因而采纳他们的建议，实行改革。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改革运动的发展，有将各地激进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只有联合自己的力量，才能促使议会通过他们所建议的民主改革，所以他们考虑召开全国的大会。早在 1774 年，詹姆斯·伯格就已提出了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大会”的设想。这个想法，后来得到潘恩和约瑟夫·杰拉尔德的支持。潘恩等人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拟订一个宪法，可用以与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相对立，作为对它进行改造的一个步骤。关于拟订新宪法的计划，只有少数政治态度比较坚决的人同意，不过，许多激进派协会的成员仍同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协调各协会的力量，以期共同制订一个改革方案，并号召人民为此而斗争。

1792 年 12 月，苏格兰的改革派人士在爱丁堡召集了第一次“国民大会”，来自 80 个协会的 16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主张制订一个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不过来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代表托马斯·缪尔等人则坚持激进的主张。当大会休会时，与会代表模仿法国革命者的模式，全体起立，高举右手，发誓“不自由毋宁死。” 1793 年 4 月 30 日，当“国民大会”再度在爱丁堡集会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分歧。激进派提出，应召开一个更大的会议，邀请更多的英格兰激进人士参加，这个提议获得通过。但就在这个拟议中的会议即将召开时，缪尔被政府判罪。罪名是他发表叛乱性的演说，散布潘恩的著作，并以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名义，发表支持爱尔兰人反叛的讲话。虽然缪尔在为自己辩护时，申明他的主张改革的言行全部是合法的，是在宪法范围之内进行的，而且他的辩词也为检查官所承认，但法官仍认为他“散播不满和叛乱的种子”而将之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布坦尼湾，为期 14 年。政府的这一措施激起社会更加广泛的抗议。许多激进派组织反而决定派代表参加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伦敦通讯会社”派了莫里斯·马格丽特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伦敦“宪法知识协会”派了查理·辛克莱和亨利·约克参加会议。英格兰的代表由于他们的经验和声望，在这次会上起了

A.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1979, P.284.

H.W. Meikle, *Scot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9, P.272.

C.B. Cone, *The English Jacobins*, 1968, P.173.

决定作用。

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从1793年11月19日开始，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激进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主张实行普选权，缩短议会议员的任期，每届议会一年。大会向法国的国民大会致祝贺信，祝贺雅各宾派取得胜利。

苏格兰“国民大会”的活动，引起了苏格兰政府的恐慌。会议经过两个星期之后，即在12月5日和6日被苏格兰政府勒令停开，会议的一些著名领导人被逮捕。虽然会议中并无主张进行暴力活动的提议，但政府仍在1794年由随便拼凑起来的一些法官，以叛乱罪将它的领导人马格丽特、斯克爾文、杰拉尔德判罪。后经艾尔斯金的有力辩护，指出判决的罪证不确，政府才不得不将他们开释。哈第和图克等激进派领导人，也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受审，但由于艾尔斯金的有说服力的辩护，政府也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消息传出，伦敦城内中下层人民热烈欢迎庆祝，但政府中当权人物并不甘心。在政府的纵容下，一些暴徒捣毁了哈第的书店，并将有关“伦敦通讯会社”和“宪法知识协会”的文件全部抢走。潘恩的画像被焚烧。

“国民大会”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联合一致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也表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限于思想宣传和地方性的活动，而且还要改造国家政权。不过它的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不清，对当权者的迫害缺乏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

英国政府对激进主义者的镇压

为了镇压激进民主派运动，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794年5月，乔治三世写信给议会，指责“伦敦通讯会社”蔑视议会，在英国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动叛乱。小皮特在议会中提出了终止人身保护法8年的议案。他在说明理由时说，国内流行着越来越多的阴谋，它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宪法，而代之以所谓的人民权利，政府、法律、宗教以及英国人所珍视的其他制度都有像法国那样被毁灭的危险。这个议案在议会辩论的时候，左派辉格党人福克斯和谢立丹等反对通过这个议案。而赞成的人却以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作为例证，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已在威胁着英国，在目前混乱的状况下，不得不暂停人身保护法，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结果议会以201票对39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从1794年5月23日到1795年7月，人身保护法暂停生效。后来在1798年4月至1801年3月，再度停止生效。不过，激进民主派的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参加各种激进民主组织活动的群众仍然很多。

当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人哈第、图克等被控犯有重大叛逆罪，但由于罪证不足，法庭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时，在其他一些城市，有些“通讯会社”的成员却被判了刑。为了抗议政府迫害激进民主派人士的行为，“通讯会社”

H. Twiss, *The Public Life and Private Life of Lord Eldon*, Vol.I (1884), p.283.

E.Royle and J.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1962, pp.72—73.

E.Royle and J.Walvin, *op.cit.*p.70.

A Habeas Corpus Suspension Act, 1794, in W. C. Costin and J. S. Watson, *The Law Working of Constitution and Documents*, Vol. , 1964, pp.7—8.

在许多城市组织大会。在伦敦，参加大会的人数据说达 15 万人。当乔治三世乘车在街上行进时，有人挡住马车，并向他投掷石头。小皮特政府以此作为进一步镇压民主人士的借口。1795 年 11 月，政府颁布了两个旨在迫害民主运动的法令。一是“叛逆行为法”。根据该法令，每一个企图刺杀、推翻国王的人，每一个在口头上或报刊上要求国王改变政策或政府成分的人，都将被作为国事犯，可不经司法程序，立刻处死。另一个是“叛乱集会法”。该法令规定，凡举行 50 人以上的集会，须经 3 个以上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治安法官可下令解散，直至调用军队，拒绝解散者可处以死刑。这两个法令实际上把群众的言论或集会自由完全取消，一切民主活动，几乎都成为违法。

这时，法国雅各宾专政已在 1794 年 7 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法国开始了一个政治、经济、思想全面反动时期，原来鼓舞英国激进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外在动力急剧衰落。在政府的不断打击迫害下，英国国内激进民主运动很难向前发展。1795 年以后，“伦敦通讯会社”分裂为一些小团体，它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激进民主派的组织所以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之外，还因为它本身存在着的一些缺点：它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也有一些工人参加，但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工人基本群众并未包括进来。这时本是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组织也在不断壮大，但激进民主派人士未能把激进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激进民主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大城市，未能扩展到全国各地。

民众的保守主义与保王主义情绪的增长

激进派的失败，还和当时民众的保守主义与保王主义情绪的广泛增长有关。

随着法国革命的发展，暴力和恐怖事件日趋增长，特别是“热月政变”后，热月党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执政府、督政府的不断对外侵略战争，使英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害怕这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的火焰也会蔓延到英国来。所以，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就从同情转为恐惧、憎恶，对英国国内政治的态度，也从主张改革转而拥护现行宪法和君主制。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兴起了一种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情绪。这时，有些英国

Treasonable and Seditious Practices Act, 1795, in W. C. Costin and J.S. Watson, op.cit.PP.10—

The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 Act, 1795, in W. C. Costin and J. S. Watson, op. cit.PP.12—16.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PP.158—159.

L. Colley, The Apotheosis of George III, Loyalty, Royalty and British Nation, 1760—1820, in Past and Present, No. 102 (1984), P.122.

这一现象以前未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近年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激进派并不像以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深得人心，而且基础也不十分牢靠。政府对激进派的镇压也不像以前一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有效和残酷无情。现在有些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法国革命对英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它使民众的保守主义情绪有了巨大增长。”（H.T. Dickinson (ed),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我们看来，这种保守主义情绪主要是当法国革命后期，特别是热月党人在法国掌握政权，在国内实行白色恐怖并转向对外侵略扩

人认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繁荣，是英国现行议会君主制和法制的产物。当英国的激进派与法国的革命者进行联系、互致问候，并要求在英国国内实行彻底的改革时，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破坏宪法、造成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企图。

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和保王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政府请愿，泛泛地表示对国王的忠心和对改革派的反感，而是进一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与激进派的活动相对抗。当时著名的保守主义者约翰·里夫斯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为英国的现行政治和宗教制度辩护，并谴责激进派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同时，他们还组织社团和志愿协会，以帮助政府对激进派进行打击。早在1790年，这种社团就已出现，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出现了“教会与国王俱乐部”。其宗旨就是反对激进派关于改革教会和政治的要求。1791年11月20日，约翰·里夫斯在“皇冠与铁锚”旅店成立了一个“维护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的组织。3天后（23日），在拥护政府的《明星》报上宣布了这个组织成立的消息。接着，有些人写信给里夫斯表示支持。随后，从1792年末到1793年初，在英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建立了许多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团体。数目达到几百个，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组织数量最多者之一。

其数量之巨，超出了以前历史家们的估计。如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现存的“里夫斯文件”中，曾记载在英格兰西北部的8个城市中建立了保王主义组织，但实际上至少有30个城市都有同样性质的团体建立。到1795年时，仅曼彻斯特一地就至少有22个保王主义的俱乐部。

法国革命后期对英国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这种广泛的保守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保守主义，一方面是由于法国“热月政变”后，反革命的热月党及以后的执政府、督政府的当权者的倒行逆施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热月政变”后，法国的当权者，特别是拿破仑连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而兴起的。

张后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和恐慌而发生的。

T.P.Scheffeld,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Britain in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Journal*, (1986), PP.601—622.

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1977, PP.195—269.

Robert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English Loy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3, P.66.

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现存“里夫斯文件”（Reeves Papers）中记载了当时与里夫斯（R.Reeves）联系的组织共200个，但实际数目还不止此。R.Dozier, *op.cit.* PP.124—125.

二、群众斗争和起义

工人运动和反结社法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不仅数量迅速增长，而且生产的性质和生产组织也在迅速变化。大工厂制纷纷出现。原来的手工工场和家庭手工业越来越多地为大规模的工厂所取代。特别是巨大的炼铁厂和采矿业，规模大，雇佣工人多。虽然在全国范围来说，大工厂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不过，工人数量的增多和工人的集中，却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在有些大工厂密集的城市中，工人们集中的程度更高，这就使工人相互之间增强了联合和团结，他们在大企业中与雇主之间的阶级界线与阶级对立也更加明显。

在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资待遇非常低。对法战争时期，工人的状况更趋恶化。物价高涨，工资虽然也有所提高，但远比不上物价上涨之速。军费开支庞大，赋税不断增加，国债大量发行。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在劳动群众的肩上。

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 and 待遇，有些地区如约克郡的呢绒工人、纺纱工人等组织了工会。工会的数量和性质也在不断变化，参加的工人越来越多。因这时正值激进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所以工人们也越来越受到激进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后的 10 年左右时间里，广大的新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受到了一次革命和民主的洗礼。英国各地弥漫着的激进民主思潮，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组织和社团，使人又想起 17 世纪初英国革命时的情景。虽然不久以后激进民主运动即渐趋消退，许多激进社团也先后瓦解，但这个时期在工人和社会中下层人民中汹涌发展的激进民主思想和到处建立起来的组织，对以后英国工人阶级自觉意识的成长具有深刻的意义。激进民主思想潮流和工会运动这两股力量虽还未融合在一起，但是彼此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使民主运动的声势更为强大。

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雇主们感到了恐慌，于是在雇主们的请求下，1799 年 7 月，议会通过了第一项禁止结社的法令，凡违反者，治安法官均可加以惩处，并将受到 3 个月的监禁。1800 年又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对原来的法案作了小的修改，使之比原来的稍温和一些，这个法案一直存在到 1825 年。

反结社法虽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某些阻碍作用，但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力量不断壮大，工人运动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水兵起义

英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波及英国的海军士兵。在对法战争期间，由于国家开支庞大，赋税不断增加，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特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P.194, P.

Seditious and Treasonable Societies Act, 1799, in W. C.Costin and J.S.Watson (eds), *op.cit.*Vol. , PP.18—20.

别是贫穷人民度日维艰。那些靠固定收入的人，由于物价不断上涨，生活也日趋拮据。1797年，小皮特在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赋税的增加，对那些贫穷的人的打击特别大。那些被征召入伍到前线作战的士兵，留下了妻子、儿女，无人养育，许多人被迫四处寻找生计，忍饥挨饿。据当时一个人在日记中记载，1797年初，在小镇奥德海姆，由于青壮年外出参军作战，镇上留下了20个妻子、79个子女，他们只有靠教区的救济才能生活，两个月后，依靠救济的妻子的数目又增加到70人。

在沿海的一些港口，情况也是一样。海军军官将港口一带所能找到的水手都强行入伍，并以战时编制编入海军，使住在海港一带的被强征的水兵的家庭更加困难。他们的妻子儿女的生活大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不能不影响水兵的情绪。

在海军舰队的水兵中，由于待遇低，军官态度粗暴，水兵不能忍受而常发生骚动。1794年4月，停泊在朴茨茅斯港口外面斯皮海德的一支舰队的水兵，首先举行起义，要求提高待遇，补发欠饷，并制止下级军官滥用权力、任意惩处水兵的行为。此外还提出议会改革，给英国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等要求，并表示除非这些要求能够被接受，否则他们拒绝出海作战。起义者组织较好，他们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得到广泛同情。经过谈判，政府不得不同意提高水兵的待遇，同时对他们的行为不加追究。

接着，在1797年5月，担负着封锁荷兰任务的北海舰队在诺尔地方也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更为激烈，不过组织较差。起义爆发后，停泊在雅茅斯的一支分遣队也参加了进来。起义军舰共达40艘左右。各条军舰上都升起了红旗。后来起义者就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条件问题发生了分歧。6月间，政府稍作让步，以提高经济待遇、只要停止起义就对他们不予追究等欺骗手段，将起义平息。起义领导者理查·巴克尔被处绞刑，其他许多起义参加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流放。

激进民主主义的组织是否与这次水兵起义有联系，历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起义刚平息后，政府派了人员到出事地区调查，结果未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伦敦通讯会社”等激进民主组织曾和水兵起义有过联系。然而，从这些水兵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们显然受潘恩的思想和法国革命所倡导的原则的影响。而起义水兵的文化水平不高，大都未受过良好教育，从这方面来看，又使人觉得激进民主主义者与起义者曾经有过联系。

爱尔兰的激进运动和爱尔兰人起义

在水兵起义发生后不久，又爆发了爱尔兰人起义事件。起义是在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爆发的。18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从它的起源、目的甚至社会成分上，都和英格兰、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很相似。

Clive Emsley,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war*, 1979, P.1.

Cf.N.Rodger, *The Wooden World: An Anatomy of the Georgian Navy*, 1986, P.150.

A.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1979, PP.408—409.

H.T.Dickinson,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1985, P.44.

在这个时期，爱尔兰是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的。总督对英国政府负责，并由他任命一些部长管理爱尔兰的事务。在爱尔兰还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由于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而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天主教徒，所以议会选举实际上被少数新教徒大地主所控制，即由少数富人、主教和地主组成的所谓“新教上层集团”控制着爱尔兰的政治、宗教权力。他们不愿给占人口 2/3 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以政治权利，同时也把主要由苏格兰人的后裔构成的爱尔兰不奉国教者（他们大都住在厄尔斯特）排除在议会选举权之外。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重重压迫之下，爱尔兰的劳动群众陷于悲惨的处境之中。当 1741 年爱尔兰发生旱灾时，大约有 40 万人饿死。所以当爱尔兰激进主义兴起之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除了争取政治权利之外，还有争取民族解放、宗教信仰自由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任务。这比英国的激进主义者要困难得多。

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与西班牙都站在殖民地人民方面与英国作战，英国陷入困境。同时它害怕法国趁机攻入爱尔兰，利用爱尔兰对英国的不满，挑起反英斗争，所以就积极筹备爱尔兰的防御，以抵抗法国的进攻。但英国本身已无兵可派赴爱尔兰，只得于 1778 年在爱尔兰征集志愿军。志愿军达到 10 万人左右，爱尔兰的资产阶级在其中掌握了领导权。爱尔兰人既掌握了武装，就趁机迫使英国作出一些让步，如允许爱尔兰有贸易自由，取消对天主教徒在取得并继承租地上的限制，英国放弃对爱尔兰的立法权等。当 1783 年英国议会公布放弃对爱尔兰的立法权的法案后，爱尔兰在形式上获得了自主权。不过，英国国王仍然是爱尔兰的行政首脑，英国国王所任命的官吏仍然掌握着爱尔兰的行政管理权。这种行政、立法的二元制，导致了以后两种权力的不断冲突。

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爱尔兰后，激起了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的浪潮。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唐恩说：“法国革命事实上是爱尔兰自由的晨星。”爱尔兰人在法国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更加鼓起争取自由、独立的勇气。在 1791 年—1792 年间，爱尔兰存在着普遍乐观的气氛。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当法国革命一周年之际，人们广泛举行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在厄尔斯特，当 1792 年 11 月传来了法国革命者把入侵的外国军队击退的消息时，人们张灯结彩，以示庆祝。

托马斯·潘恩的著作在爱尔兰人民中受到热烈欢迎。1791 年 3 月，《人权论》的第一部在爱尔兰出版。爱尔兰的改革者出资资助该书的出版发行事宜，使书的售价降低、销量不断增加，仅在都柏林一地就连续再版了 3 次。1791 年 5 月之前，共销售了 1 万本。爱尔兰的各界人士从潘恩的著作中吸取了为自由、平等和独立而奋斗的思想养料。在爱尔兰的长老派的人士中，潘恩思想的影响最大。潘恩书中的语句，也被人们广泛加以引用。1794 年，拥护政府的《自由人杂志》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道：“潘恩的想法，在这些被蒙骗的可怜虫的胡言乱语中，随意加以断章取义地摘引。”另外它还指出，在诺斯城，“潘恩的思想完全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立法者，而把对上级的尊敬完全抛到九霄云外。”

A, Goodwin, op cit.P.417.

M.Elliott, Ire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H.T.Dickinso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9, P.87.

领导反英斗争的是爱尔兰人联合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的爱尔兰人去争取政治独立。会员中许多人是潘恩思想的信奉者。联合会除了提出普选权、每年召集议会和议员发薪等议会改革的要求外，还提出废除教会什一税、降低地租等要求。最初爱尔兰人联合会只想以激进主义的宣传和广泛吸收群众的支持来达到目的。他们未想到诉诸武装斗争，也未企图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更未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有些天主教徒觉得，如果和平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则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他们把目光投向法国，希望得到正在与英国进行战斗的法国政府的帮助，以打击英国。

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要求，得到爱尔兰中下层人民的广泛拥护，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1793年英国公布法案，允许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天主教徒参加议会选举。然而与此同时，又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并在全国开始大规模的逮捕。爱尔兰人联合会即向法国的执政府求援，它的军事领导人费兹杰拉德勋爵曾写信给住在巴黎的潘恩，商讨法国支持爱尔兰进行革命的可能性。1796年，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唐恩等到了法国，他们夸大爱尔兰的革命形势，声称只要法国派遣一支数目可观的军队前往爱尔兰，爱尔兰将立刻爆发起义。这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实际上已把法国军队的入侵当成他们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从而对法国产生了依赖心理。1796年12月，法国派1.5万名士兵前来支援爱尔兰。因遇风暴，法军在爱尔兰登陆未获成功，只得又驶回法国，这时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没有驻军。这次法军登陆失败，对法国和爱尔兰来说都是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过，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唐恩继续与法国联系。这时法国的盟国西班牙、荷兰在同英国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法国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在爱尔兰登陆。法国政府感到，只有当爱尔兰人首先在爱尔兰起义之后，法国才可能派军前往支援，否则不愿贸然从事，因为孤注一掷，必遭失败。而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除非得到法国军队的支援，否则，在此之前，不愿掀起无成功把握的起义事件，以免受到更大的牺牲和失败。因而，双方互相观望，使爱尔兰问题迁延不决。到1798年，法军支援爱尔兰的计划又因拿破仑将法军派往埃及而未果。

英国政府得知爱尔兰与法国的秘密谈判之后，即开始对爱尔兰人联合会实行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优柔寡断、不敢起义。他们的犹豫不决，使内部分歧越来越多，群龙无首。一般成员有的彷徨动摇，有的单独行动，结果收效甚微。联合会领导人之一阿瑟·奥康诺被当局逮捕。他们在贝尔法斯特出版的主要报纸《北极星》也被查封。当局下令在厄尔斯特实行戒严，许多领导人逃往英国或法国。奥康诺在被囚之后，也设法逃往英国。由于许多领导人在预定的1798年5月起义之前就已被逮捕，起义遭到失败。

当1798年一些爱尔兰天主教徒因不能忍受压迫而发动起义时，已得不到有力的领导，法国军队也未前来支援。起义的领导者多人被捕，起义失败。在被捕者中有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沃尔夫·唐恩。曾有人引用“人身保护法”为他辩护，争取将他释放，或要求重审，但唐恩于11月19日在狱中自杀。这次起义失败后，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一蹶不振，急遽衰落。英国政府镇压了爱尔兰起义之后，决定取消自1783年以来爱尔兰所享有的有

M.Elliott, *Partnership in Revolution, The Winted Irishma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2, PP.59—61.

T.Pakenham, *The Rear of Liberty: The Great Irish Rebellion of 1789*, 1969, P.345.

限独立。英国议会制订了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和取消爱尔兰议会的法案。当这个法案向爱尔兰议会提出时，虽然有些议员表示反对，但议会中大多数人害怕群众运动而甘愿接受英国政府的保护。根据 180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英、爱合并条件：爱尔兰的议会被取消，爱尔兰有权派 100 名议员到英国下院，32 名议员到英国上院，出席上院的议员从贵族中选出，终身任职，但他们不能像英国上院议员那样世袭。

1801 年 1 月，有爱尔兰议员参加的第一届联合议会开幕，爱尔兰丧失了政治独立。

1798 年的爱尔兰起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但领导起义的主要是由爱尔兰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该会未能广泛吸收并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起义也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以致遭到失败。

上述激进民主运动、工人运动、水兵起义、爱尔兰人民起义等事件，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英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同时，法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使英国国内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尖锐，处于重重压迫之下的中下层人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不过，就英国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来说，自从 17 世纪革命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化，已逐渐建立起可以自我调整其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机制。所以它和海峡对岸的法国不同，国内矛盾虽层出不穷并不断激化，但终究未达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 —

第三节 英国参加反法战争

一、英国参加并组织反法战争

反法联盟中的英国

如上所述，当法国革命刚爆发时，包括英国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英国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人看来，法国国内已被革命斗争弄得天翻地覆，秩序大乱。它必然抵御不了对它抱着极端敌视态度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干涉，无需英国出面。当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鼓动各国政府联合起来支援法国的君主，共同干涉法国革命时，英国政府不为所动，继续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注视着欧洲大陆所发生的纷争。一直到法军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法国革命的浪潮步步深入，英国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以及法军越过了莱茵河，控制了奥属尼德兰的大部地区时，英国政府才感到对欧洲大陆的局势不可等闲视之。这段时期，在英国担任首相的是小威廉·皮特。他从1783年12月起至1801年，后来又从1804年到1806年，一直担任首相之职。虽然他在两届任期之间的4年中失去了官职，但在政治上仍具有很大势力。这些年来，英国的对外政策是在他的主持下制订的。像许多英国人一样，法国革命发生后，小皮特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待这次事件。他认为革命将给法国以沉重打击，至少使法国在短期内不再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同时，小皮特也一直认为法国是英国在外交斗争中的主要敌手，但他不愿使英国单独同法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竭力想在欧洲大陆找到同盟者，以便假别人之手来打击法国。起初，小皮特寄希望于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然而俄国女沙皇认为英国反对俄国的东方政策，曾力图反对俄国向里海沿岸推进，所以俄英关系不睦。小皮特不得不转向欧洲大陆上的普鲁士，同普鲁士缔结了针对法国的同盟条约。

1789年秋，当法国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临近的奥属尼德兰（比利时）时，当地爆发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起义者宣布脱离奥地利而独立。小皮特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出面干涉，以加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1790年，小皮特在给普鲁士政府的备忘录中，建议与普鲁士就共同干涉奥属尼德兰的革命达成协议。同时小皮特要求普鲁士与奥地利停止争夺霸权的斗争，与英国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法国革命。1790年7月，当奥、普代表在莱亨巴赫举行会议时，英国和荷兰的代表也参加了。会上经过英国代表的努力游说，与会几国缔结协定：普鲁士与英国有义务帮助奥地利恢复其对奥属尼德兰地区的统治，而奥地利则应停止正在进行的同土耳其的战争，并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反对法国革命。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英国唆使下，走向了反对法国的联盟。1790年12月，奥地利攻占了布鲁塞尔，镇压了比利时的革命。1791年，奥普两国又在西里西亚的皮尔尼茨公布了一致反对法国革命的宣言。次年2月，奥地利与普鲁士订立了联盟，两国同意各出2万军队反对法国。当时普鲁士的目标是想占领阿尔萨斯，而奥地利则想在比利时扩大自己的领地。

1792年春，法国要求奥地利与普鲁士解除联盟，并停止庇护那些法国的反革命分子，奥地利加以拒绝。法国的立法会议即于4月20日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议。

最初，英国并未参加对法国的战争。在法国，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执政的吉伦特派，也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然而，法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在英国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影响，英国国内的激进民主派运动在法国革命思想激荡下日益广泛的发展。这些都引起英国统治阶级的惊恐。加以法国革命势力迅速向欧洲大陆广大地区扩散，特别是伸展到低地国家，更使英国政府感到不可容忍。当1792年11月法军炮轰并占领荷兰的安特卫普后，英国外交大臣于12月31日照会法国政府。照会中说：“英国决不会同意法国擅自以冒充的天赋权利为借口，把自己当成唯一的裁判官去裁决由神圣的条约建立起来，并由所有大国一致加以保证的欧洲政治体系。英国坚持它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准则，对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使自己成为低地国家（比利时）的主人，或成为欧洲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决不会置之不理。”英国已走到对法战争的边沿。英国政府决定直接参加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

英国参加反法战争

在反法联盟中，小皮特实际上成了主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推上断头台后，英国在1793年1月就将法国驻英国的代表逐出了伦敦，并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这时法国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同时他们还指望能得到英国国内民主派人士的支持，所以他们对英国和普、奥等国的威胁毫不畏惧。法国军队在比利时取得胜利后，随即开进了荷兰，并在1793年2月1日向英国宣战。小皮特政府则纠集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荷兰以及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从而开始了长时期的英国反对法国的战争。

英国所以积极参加并组织反法战争，其目的虽然具有反对法国革命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和法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这个问题，容易在观念上引起混淆。特别在1793年英、法之间战争初起的时候，爱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言论在英国社会上广为流行，反法联盟各国的封建专制君主们也纷纷举起保卫秩序、反对叛乱的旗帜，因而使人觉得英国参与反法联盟似乎主要是反对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行动。实质上，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反对法国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从这个观点出发，下列问题就可得到合理的解决：为何资产阶级当政的资本主义英国，要和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作殊死的搏斗。

1793年春，当第一次反法联盟的战争行动刚开始时，英国凭借它强大的

21年后，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说，在欧洲大陆，英国所唯一关心的是保卫荷兰和比利时，这也是英国参加反法战争的主要原因。C.K.Webster (ed), *British Diplomacy 1813—1815*, 1921, P.265.

J.Ehrman, *The Young Pitt, The Years of Acclaim*, 1969, P.158 ;T.C.W.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1986, PP.158—159.

Piers Mackesy, *War without Victory: The Downfall of Pitt, 1799—1802*, 1984, P.84.

海军舰队，炮击敦刻尔克，并占领了科西嘉岛。但在进攻法国的土伦港口时，受到法国军队的英勇抵抗。1793年12月，法军解放了该港口，英国舰队不得不撤离。

英国除了在战场上从事反对法国的战争之外，还派遣了大量间谍到法国国内从事破坏活动。1794年7月“热月政变”之后，法国的雅各宾派下台，而英国反对法国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1795年，英国舰队帮助几千个法国流亡的王党分子登陆回国，并且还积极帮助旺岱地方的法国王党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法国王党分子内部彼此倾轧，纷争迭起，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虽都仇视革命，但对在扑灭革命后应该建立什么制度却各有不同主张，有的主张建立立宪君主制，有的主张恢复绝对君主专制。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尽量避免卷入他们的争吵。英国人反对法国革命的“过激”行为，特别是反对没收私有财产，因为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稳定的、可靠的政府的基础。同时他们还主张恢复君主制和教会，将被没收的逃亡者的财产归还本人，并给那些在革命时期购买了这部分财产的人以经济补偿，但他们反对在革命后恢复绝对君主专制，而倾向建立立宪君主制。英国首相格仑威尔认为，专制君主制不能恢复，也不应该恢复。他觉得，既然专制制度已导致了革命的爆发，那么如果再恢复专制君主制，必然又将导致新的革命。因此法国王党分子，虽然他们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但他们非但对英国政府没有感恩戴德的想法，反而在内心里对之十分憎恶，这是英国政府始料不及的。

反法联盟各国除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可怕威胁之外，没有更多的共同利益。1795年4月，普鲁士同法国订立和约，退出了联盟。1797年10月，奥地利又同法国订立了和约，英国在反法联盟中又失去了一个帮手。

法国的督政府本拟派遣军队从土伦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接攻击英国本土。但在1798年担任法军统帅的拿破仑，认为法军准备不够充分，改变了计划，转而进军埃及，以便从埃及威胁英国的重要殖民地印度。拿破仑在出发之前故意散布空气说，他要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绕过西班牙，进攻正在发生起义事件的爱尔兰，以便从那里打击英国。而当时欧洲很多人只知道法国南部各港口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有大量法军不断开往法国南部，但这些军队究竟开往哪里，人们无从捉摸。在地中海指挥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也摸不透法军的意图。当他指挥的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等候法国舰队的到来，以便迎头打击的时候，却听到法国舰队在拿破仑统率下已驶向东边的马耳他岛。纳尔逊估计法军将前往埃及，就下令所有舰船扯起风帆急驰直追。然而由于过于匆忙，反又超过了法国舰队。当英国舰队重新回过头来驶往君士坦丁堡寻找法国舰队时，拿破仑的军队已在埃及登陆。

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后又占领了开罗。这时法国的舰队停泊在亚勃基尔湾。纳尔逊派了一支分遣队驶往亚勃基尔湾。1798年8月1日清晨，英、法舰队发生战斗，结果法国舰队彻底失败。13艘主力舰中有11艘被击沉，两艘逃之夭夭。此后，英国舰队控制了地中海，并占领了马耳他等重要据点。

英国虽然在海战中取得胜利，但并不能扭转整个战争局势，所以，小皮

H.Rose, Pitt and Napoleon, Essays and Letters, 1912, PP.258—259.

叶弗·塔尔列：《拿破仑传》，中译本，1957年版，第45页。

特在 1798 年底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参加的除了英国之外，还有俄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等。

联盟军中的俄军在意大利和爱奥尼亚群岛取得一些胜利。英国军队则在荷兰登陆。但奥地利却节节失利，并于 1800 年 6 月在马连戈遭到惨败。1801 年 2 月，奥地利同法国订立了吕尼维尔和约，退出了联盟。而俄国沙皇保罗一世也同法国谈判讲和，并和瑞典、丹麦、普鲁士组成了中立联盟。虽然 1801 年 3 月俄国发生宫廷政变，保罗一世遇刺身亡，但谈判仍在继续。1801 年 10 月，法俄订立了和约，此外还订立了一个秘密协定。在奥地利退出联盟之后，普鲁士也在拿破仑的胁迫下退出联盟，至此第二次反法联盟瓦解。英国的小皮特政府在此情况下被迫辞职，由阿丁顿组阁。阿丁顿属于托利派的一个集团，受到乔治三世的宠信。

1801 年英国联合土耳其击败了埃及的法军以后，以阿丁顿为首的英国政府即开始同法国和谈。阿丁顿指望法国在雾月 18 日政变后，其政治局面会发生不利于革命的变化，指望新上台的拿破仑会亲手镇压法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所以就在 1802 年 3 月 27 日在亚眠与法国缔结停战协定。根据协定，英国被迫放弃了战争年代中所占领的一些殖民地，将之交还给法国及其盟国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但继续保留锡兰和特里尼达岛；法国则保留在欧洲对比利时和荷兰的监督权，并将埃及归还土耳其。

二、反法战争后期的英国和维也纳会议

大陆封锁

亚眠和约订立之后，英国实际上仍在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1803年，阿丁顿政府为重建英国的海军舰队而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时期，英国军事建设的规模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英国共保留了13万正规军，其中有5万人驻扎在海外，8.1万人留守在英国本土。此外，英国还有5万民兵，并建造了许多要塞。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了拿破仑可能动用的、渡过英伦海峡进攻英国本土的军力。

由于英法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双方又都在继续备战，所以亚眠和约未能维持多久。第二年春，英、法之间的战争又起。英国资产阶级觉得只有小皮特才能有魄力去与拿破仑对抗。所以在1804年5月，小皮特又代替阿丁顿成为首相。他匆忙地组织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参加者有英、俄、奥和那不勒斯。

拿破仑则把西班牙和荷兰拉到自己一边，并决定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接攻打英国。为此，他在布洛涅和其他沿海城市集结了大军。一俟天降大雾，即起锚渡海。拿破仑说：“只要有3天大雾，我就将是伦敦、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主人。”但反法联盟中的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仍在大陆上展开广泛的战斗活动。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拿破仑不得不放弃渡海征英的计划，撤掉了布洛涅营，回师东指，去迎击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他先击溃了奥军，10月间迫使奥军在乌尔姆要塞投降。在库图佐夫指挥下的俄国军队，不得不赶快撤退到多瑙河彼岸。

1805年11月13日，拿破仑率军进入了维也纳，12月2日，也就是拿破仑加冕一周年，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里茨村附近发生了一次大战，俄、奥联军遭到彻底失败。至此，第三次反法联盟实际解体了。

对英国来说，拿破仑渡海登陆的危险已被消除，因为1805年10月21日在特拉法加发生了一次大海战，英国名将纳尔逊指挥的舰队彻底击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这次著名的海战中，纳尔逊要求英国舰队上的官兵“人人尽责”。大战结束时，法、西联合舰队只有9艘战舰回港，4398人阵亡，而英国仅阵亡449人。纳尔逊在这次战役中，也受了重伤，并因伤势过重而去世。这次战斗使法国海军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在海上与英国较量。

1806年1月，小皮特去世。这时，拿破仑在大陆上正所向披靡，不断取得胜利。英国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为了更有效地同法国进行斗争，英国建立了以格伦维尔为首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联合政府，由福克斯担任外交大臣。福克斯一向以反对小皮特的政策而著称，他当了外交大臣后，立即派代表到巴黎与拿破仑进行和谈，但拿破仑不相信和谈能取得实质成果。他决定首先给普鲁士以狠狠的打击。为了巩固对德意志西部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统治，拿破仑建立了莱茵同盟，参加同盟的包括德意志西部和中部的一些小邦国。

Ian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1982, P.261.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上册，第190页。

1806年7月12日，德意志各国君主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签订了相应的条约，同时还“选举”拿破仑为同盟的保护人，这样存在了大约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再存在了。奥地利皇帝不得不接受拿破仑的建议，放弃这个历代奥地利皇帝所享有的、表示其对分裂的德意志各邦的最高权力的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与此同时，拿破仑积极准备新战争。9月13日，英国唯一竭力主张同法国议和的外交大臣福克斯去世。在普鲁士，主张同拿破仑作斗争的势力抬了头。拿破仑在准备好之后，于1806年10月8日下令将军队开进普鲁士的盟国萨克森，继而攻入普鲁士。法军长驱直入，于10月27日进入柏林。11月8日，普鲁士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投降。接着，拿破仑于11月21日在柏林发布了“大陆封锁令”，宣布对不列颠群岛实行封锁，禁止一切与不列颠群岛的贸易和联系。后来连邮政和其他方面与英国的联系都一律禁止。同时拿破仑还下令，逮捕各处的所有英国人，并没收他们的商品和财产。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其目的在于在经济上使英国陷于完全瘫痪状态，最后导致英国经济破产而不得不向法国屈服。他力图把大陆封锁转变为战争武器。实际上，只要拿破仑一天不掌握制海权，他就不能完全封锁英国。拿破仑没有充分估计到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力。他错误地认为，英国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信贷和出口之上的，只要断绝了它的海外贸易，这种经济结构就将瓦解，并将引起破产、失业，甚至革命，最终将导致英国屈膝投降。实际上拿破仑战争期间战事主要在欧洲大陆进行，英国并未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工商业上层人士的生活未受到很大影响。针对法国的“大陆封锁令”，英国于1807年1月发布了一些所谓的“内阁法令”，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所有港口实行反封锁。“敌人宣称要断绝英国的商业，我们的回答是，除非通过英国，我们的敌人（就其广义而言）的一切商业都将断绝。”法国的大陆封锁和英国的反封锁的实施，对英国的经济固然影响不小，但对法国的经济也是沉重的打击。从1807年起，法国的经济开始萎缩，到1811年2月时，在法国的1700个纺纱厂中，只有300个继续开工。由于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加以农业歉收，粮价高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普鲁士被击溃之后，拿破仑又率军东进，向俄国边界尼门河进发，同时他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缔结和约。1807年7月，两个皇帝在梯尔西特尼门河一个木筏上临时盖起来的两个亭子里会晤，缔结了梯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俄国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第四次反法联盟解体。

第四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在英国政府中引起了不满情绪。原来由托利党和辉格党共同组成的联合内阁倒台，改由托利党的波特兰公爵出任首相，外交大臣由年轻而干练的乔治·坎宁担任。坎宁在下院拥有巨大的势力，成了内阁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新内阁对法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除了更加严格地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港口实行封锁之外，还派了军队到比利牛斯半岛去同法军作战，开始了所谓的“半岛战争”。

G.M.Trevelyan, Illustrated English Social History, 1952, Vol. , P.4.

E.F.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1922, P.88.

叶·弗·塔尔列：《大陆封锁》，《叶·弗·塔尔列著作集》，1958年俄文版，第3卷，第457页。

叶·弗·塔尔列：《大陆封锁》，《叶·弗·塔尔列著作集》，1958年俄文版，第464页，第605页。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葡萄牙因和英国关系密切，所以当拿破仑宣布“大陆封锁令”后，拒绝参加，而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却站在拿破仑的一边。于是拿破仑就通过西班牙对葡萄牙施加压力，但葡萄牙仍拒绝屈服。拿破仑即派军经由西班牙去进攻葡萄牙。1807年11月，法军占领了里斯本，然后又占领西班牙北部，进而占领整个西班牙，并将西班牙王室从马德里掳掠而去，使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当了西班牙国王。拿破仑本以为西班牙人在他的武力镇压之下，必然会俯首贴耳，任其宰割，何况西班牙军队不足，常备军总共不过8.6万人，而且没有骑兵，武器落后，数量也很少，所以只派了他的中等才能的将军率领少量军队前往，其中只有1/3是他的精锐部队。但西班牙人民为了反对法国的侵略和奴役，到处组织游击队，英勇奋战，给法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游击战”这个名称，就是从这次战争中才出现的。在西班牙文中，所谓“游击战”（guerrilla），意为“小战争”。

1808年，在葡萄牙军的协助下，韦尔斯利将军，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指挥2万英军在葡萄牙登陆，当年8月将法军从葡萄牙赶走。不过，这只是局部的胜利，对整个战争的成败，不能起决定的作用。韦尔斯利将军对由下层人民组成的西班牙游击队抱着轻蔑的态度，不愿去帮助他们。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比利时，英军也未取得明显的胜利，而拿破仑的势力却不断增长。当时，法兰西帝国的版图，除了法国原来的土地之外，还包括比利时，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彼蒙特、热那亚，瑞士也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拿破仑的3个兄弟分别担任荷兰、那不勒斯、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统治者。巴伐利亚王国和华沙大公国则是拿破仑帝国驯服的附庸。翻开当时的欧洲地图，可以看到从欧洲北部的汉堡、不来梅、但泽向南直到欧洲南部海滨的爱奥尼亚群岛和亚德里亚海岸，都处于拿破仑的势力范围之内。到1811年时，仅法兰西帝国本土就包括了128个郡和大约4300万人口。面对蒸蒸日上的拿破仑帝国，英国国内有些人不免忧心忡忡。

英军在反法斗争中的迟疑不决，引起英国国内一部分人士的不满。在英国政府内也发生了分歧。外交大臣坎宁不满陆军大臣卡斯尔雷优柔寡断的态度，结果内阁辞职，由托利党人帕西瓦尔组成新内阁。

拿破仑为了准备进攻俄国，在1811年把派往西班牙的一部分军队抽调出来。这时，英军在西班牙才能采取积极的行动。1812年8月12日，英军与西班牙人组成的队伍进入了马德里，法军虽然反攻，但未能得逞，不得不撤退到葡萄牙。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的惨重失败，使他的整个战争计划受到重大挫折。整个欧洲的形势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英军趁机巩固自己在西班牙的地位。1813年把法军赶出西班牙，并帮助西班牙的保守势力在那里恢复封建秩序。

英美战争

C.W.C.Oman,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Vol.I , 1902 , PP.91—92.

G.Bruun,Europe and the French Imperium,1938 , P.137.

英国同拿破仑的斗争也影响了它同美国的关系。因为1806年拿破仑在柏林宣布“大陆封锁令”后，英国也对法国实行了反封锁。这时，英国的商品无法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市场，就大量向美洲出口。但美国所生产的商品却因为受到法、英封锁和反封锁政策的影响而无法运往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利用它强大的海军，严格搜查一切与法国及其盟国进行贸易的船只，并且封锁了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包括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港。由于拿破仑已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所以美国对英国这一举动非常不满。1807年6月，英国军舰“豹子”号欲对一艘美国巡洋舰“切萨皮克”号进行搜查，遭到拒绝，英舰竟对之开火，使美国人更为愤慨。为了对英、法进行报复，并对他们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改变对美国贸易的政策，美国政府也在1807年12月公布禁运法案，禁止同任何交战国进行贸易。然而这影响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美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于是美国政府又决定，英、法两国中任何一国如果废除对美国贸易的限制，那么美国就一方面同它贸易，另一方面则停止同它的敌国的贸易。法国政府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宣布废除对美国贸易的一切限制。接着美国在1811年宣布停止同英国和英国的所有领地的贸易往来。这一措施大大影响了英国的出口贸易，使之在一年中下降了1/3。

英国鉴于情况严重，准备采取措施，改变原来限制美国贸易的政策。但恰好这时，首相帕西瓦尔去世，由于忙于组织新政府，问题被拖延了下来。等利物浦伯爵领导的新政府于1812年6月26日宣布废除对美贸易的一切限制时，为时已晚，因为美国已于6月18日向英国宣战。美国统治集团所以向英国宣战，除了受到贸易限制的原因外，还想趁英法激烈斗争之际夺取加拿大。从表面上看，美国向英国宣战是因为英国人从美国的船上抓走了英籍水手并强迫他们服劳役；英国对美国实行贸易封锁；英国禁止美国人同法国控制的港口进行贸易等。但历史学者在研究了有关资料后指出，美国所以向英国宣战，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海上贸易，因为东部沿海新英格兰地方的美国人虽然最关心海外贸易，但他们竭力主张和平，反对同英国交战。相反，坚决主张进行战争的是美国西部的一些有势力的集团。这些集团在西进运动中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林地。他们对邻近的英属加拿大的大片土地垂涎欲滴。他们编造一种说法，即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抵抗，是靠了加拿大人在背后支持，所以必须击败英属加拿大人，把加拿大人的广大土地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夺取过来。这派人是美国政治上的“鹰派”，是他们鼓动了英国的战争。同时，独立战争以来，美国立国的指导思想和法国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都是植根于“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主权在民的原则，自然对法国抱有同情心。虽然美国在反法战争时期并未与法国结成同盟，但美国人民中却普遍抱着亲法仇英的态度。1812至1814年的英美战争，事实上是美国和法国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

英美战争开始后，英军虽然在1813年曾一度失利，并在海上战斗中受到一些挫折，但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1814年8月，英军占领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把华盛顿的一些建筑物付之一炬。由于美国人民奋起反抗，誓死保卫这个新获独立的国家，才阻止了英军夺取巴尔的摩和纽约的企

B.Perkins,Prologue to War,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5—1812, 1961, Ch.2.

Asa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1967, P.166.

E.J.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1984, P.102.

图。1814年12月，双方在佛兰德尔的根特签订和约，战争结束。双方同意恢复战前状态。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刚获得不久的独立地位，英国则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同拿破仑法国进行斗争。

维也纳会议中的英国

拿破仑1812年在俄国失败后，欧洲各国反拿破仑的气氛又高涨起来。1813年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的有英、俄、普鲁士、奥地利、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反法联盟各国的军队在莱比锡与拿破仑的军队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民族之战”，结果拿破仑遭到失败。1814年初，联军攻入法国。1814年3月31日，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下诏退位。盟国把他遣送到意大利近旁的厄尔巴小岛，让他作这个小岛的全权统治者，并保持皇帝称号。

但反法同盟各国对法国以后应建立什么样制度的问题意见不一。英国认为恢复原来正统的波旁王朝是防止拿破仑东山再起的最好办法，这一意见得到俄国沙皇的赞同。1814年5月3日，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钟声和礼炮声中回到了巴黎。

1814年10月，欧洲各国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会上围绕着波兰问题和萨克逊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原想拉拢各战胜国建立一个防止法国东山再起的同盟，但由于各国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而未果。经过一段周旋之后，卡斯尔雷觉得“俄国可能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建立起它在各个方面和每个问题上的优势地位。”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卡斯尔雷就转过头来拉拢法国和奥地利反对俄国和普鲁士。1815年1月3日，英国与法、奥缔结了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条约。

拿破仑利用英、俄等国的矛盾，于1815年2月26日偷偷离开厄尔巴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路未遇任何抵抗，于3月20日抵达巴黎，又当了大约100天的皇帝，即所谓拿破仑的“百日”。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各国代表闻讯，不得不赶快达成协议，并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联军在英国的威灵顿指挥下，于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彻底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下诏退位，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遥远的圣赫勒那岛。1821年，拿破仑在那里去世。

在长达20余年的战争中，欧洲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死亡人数达100万人。但有些人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以致以后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拿破仑，还在一些人编造的“神话”中被吹捧为“英雄”、“天才”。难怪有的史学家把这些人比作是被逼迫去建造金字塔的奴隶，反而去歌颂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的帝王；被凌辱的青楼妇女，反而去赞美那些鞭打、折磨她们

C.K.Webster,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1812—1815, 1931, P.350.

G.Bodart,Losses of Life in Modern Wars,1916, P.133.

的人。

滑铁卢战役前几天，即6月9日，维也纳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与会各国代表签署了“最后文件”，包括121条条款和17条附款。根据这个文件，英国得到了非洲南部的开普敦、亚洲的锡兰岛、西印度的特立尼达。另外，英国保持了对马耳他岛的占领权，还夺取了塞舌耳群岛和马达加斯加海岸边的毛里求斯岛，并从丹麦手中夺取了北海的重要据点赫尔戈兰岛（这个岛后来在1890年时归还法国）。爱奥尼亚群岛也置于英国保护之下（1863年后成为希腊的领土）。

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的许多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区，使它进一步确立了在世界上作为第一号殖民强国的地位。这样，自17世纪末以来同法国争夺殖民地的长期斗争，就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了。以后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作用不断加强。而欧洲其他国家除了俄国由于它的落后而相对稳定之外，法国经过革命和战争的长期动荡已精疲力竭，德意志和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相比之下，英国政治比较安定，经济蒸蒸日上，在国际上地位更加突出。

维也纳会议之后，俄、奥、普三国君主于同年9月26日在巴黎签署了建立“神圣同盟”的条约，目的在于保证已划定的国家疆界的不可改变性，并协同一致地镇压在各国可能发生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运动。三国君主签约后，又邀请其他国家相继参加。英国虽然由于立宪制度的制约未正式参加同盟，但英国政府表示，它完全同意同盟的基本原则。但是经过法国革命爆发以来20多年的地动山摇的大震动之后，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的旧制度再也无法恢复原状了。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俄国和土耳其以西、斯堪的那维亚以南的任何欧洲大陆国家，都未能摆脱法国革命和战争的影响。20年代以后，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地区，重新燃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烽火。在英国，民主、改革的潮流也以新的力量兴起。

P. Geyl, *Napoleon, For and Against*, 1957, Preface.

E.J.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1984, P.116.

第七章 1832 年的议会改革

第一节 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拿破仑战争对英国的影响

经济萧条

随着滑铁卢大战枪声的沉寂，延续了 23 年之久的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到来。人民在战争中忍饥挨饿，流血牺牲，现在战争过去了，人们憧憬着幸福的未来，希望享受和平与繁荣。科贝特在描述人民欢庆的情景时说：“整个王国呈现出一派无穷开销、花天酒地的景象，人们仿佛都醉得发狂、疯得发狂。”人民对和平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指望和平会带来幸福。

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和平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反而带来更大的萧条。人们本以为大陆市场重新对英国开放后，能刺激英国的工业生产。因此在 1815 年，厂家、商人囤积起大批商品，准备向大陆倾销。然而当英国人重返大陆时，他们面对的却是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完全无力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同时，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每年要订购 5600 万镑的军需品，战争结束后，这笔订货突然停止，国内市场因之骤然萎缩，工业受到更大的打击。除此之外，还有大约 40 万退伍军人解甲归田，到各行各业去谋求生路。早复员的人尚能在不景气的经济中找到工作，等大批军人从大陆回来时，等待他们的只是失业。于是，大批无业人员在全国游荡，给经济造成很大压力。总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之后，英国无力完成从战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迅速转化，致使经济处于全面不景气的境地。

这次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来势相当凶猛。战争最后一年，英国出口总值曾达到创纪录的 5000 万镑，到 1819 年却跌为 3500 万镑。铜的价格从每吨 180 镑跌为 80 镑，铁从 20 镑跌为 8 镑，麻从 118 镑跌为 34 镑，大量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厂倒闭，大批企业破产，政府公债高达 5000 万镑，英格兰银行的纸币面值下跌 30%。在 1814 年—1816 年的 3 年时间里，全国约 700 家地方银行中，至少有 240 家停止支付现款。1801 年的济贫税为 400 万镑，到 1818 年时，几乎增加了一倍，相当于全国每个人支出 13 先令 9 便士。在有些地方，比如莱斯特郡的辛克利，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中，济贫税高达每镑收入抽取 52 先令。

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直线下降。南威尔士的铁工厂主一再宣布降低工资，最后降到每星期 6 个先令，而当时，南威尔士的小麦价格是每夸特 100 先令。兰开郡的手织工若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每周也只能赚 6 先令 5 便士，而其中还要扣掉 9 便士的原料消耗费。在 1815 年，克朗普顿一个中等水平的手织工若每天工作 10 个半小时，每星期可收入 11 先令 9 便士，1816 年降为 9 先令，1817 年只有 6 先令 6 便士，扣除各种开支，在 3 年中实际用于衣食的费用分别是 8 先令 $5\frac{3}{4}$ 便士、6 先令 $2\frac{1}{2}$ 便士和 4 先令 $1\frac{3}{4}$ 便士。

然而，即使是如此低廉的工资，有时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经济萧条把大批工人抛进失业者的行列，比尔斯顿周围地区有 1.5 万名失业工人，而著名丝织业中心斯皮特尔菲尔兹，据说有 2/3 的工人没有工作，埃塞克斯郡的霍尔斯特德共有居民 3279 人，其中靠救济过活的就有 2012 人。

农业大衰退

农业的景况也不比工业好。在战争中，由于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廉价的大陆粮食难以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粮食匮乏，价格高昂。1800 年达到每夸特 114 先令，1801 年达 120 先令，1812 年竟高至 155 先令。粮价上升使英国农耕面积不断扩大，原先不适宜种植的土地也开垦出来生产粮食，而原先肥沃的土地，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尽管战争期间人民生活很苦，许多人经常吃不饱，但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大贵族大地主）却收入丰厚，大发战争财。战争结束后，大陆的粮食重新涌进英国，粮食价格骤然下跌，1816 年 1 月小麦价格竟降至每夸特 52 先令 6 便士，战争中开垦出来的贫瘠耕地更是深受其害，许多农场主不肯再租种这一类土地，于是耕种面积大大缩减，造成农业大衰退。据民间的“农业理事会”的调查，在被调查的 322 个地区中，有 37 个地区凡农场主能退佃的已全部打算退佃，有 103 个地区绝大部分人宣布要退佃，111 个地区中有一些人要退佃，只有 71 个地区还没有人要退佃。农业萧条造成大量农业工人无事可干，各教区济贫税急剧增加，这给仍然租种土地的农人增加了负担，农业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剧。肯特郡议员布兰德说：

一个农人到我这儿来，恳求我指教他该怎么办，因为他无力承受沉重的压力了，他是本郡本教区最后一名租土地者，因此，济贫税也就自然落到他头上。我听说只剩下他一人，就问他其他租用土地者到哪里去了，那农人说：“先生，他们被险恶的时运压垮了，已不能再经营土地。”

农业萧条使农业工人生活贫苦，许多人靠吃白菜帮度日。在剑桥郡，最强的劳动力每天也只能挣到 8 便士。就连小康人家的农场主也无法度过这艰难的时日，他们除负担济贫税外，每镑还要抽 2 先令交纳所得税，因此，小农场主大量破产，据《利物浦信使报》1815 年 9 月 15 日报导：监狱中已关满了负债的农人，萨福克郡 1814 年为此签发的保释状为 430 份，1815 年上升到 850 份。

在如此萧条的景况中，垄断国家政权的的地主阶级却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1815 年，他们操纵议会，通过谷物法，规定对进口谷物严加限制。英国过去的谷物法都是为鼓励出口而制定的，这一次却是限制进口。按新谷物法的规定，凡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在每夸特 80 先令以下、裸麦豆类在 53 先令以下、大麦 40 先令以下和燕麦 27 先令以下时，禁止进口外国的各相应品种。这样，国内谷物价格就人为地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上，从而保证地主阶级的超额利润。但这种高价是建立在谷物匮乏的基础上的，它使国内粮食始终不够。因此 1815 年谷物法是一个纯粹的阶级立法，它只对土地阶级有利。对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它限制贸易自由，人为地维持食品的高价，造成生活品和原料昂贵，工资抬高，从而利润减少。对工人阶级来说，昂贵的物价使其本来就

艰难的生活更为困窘。因此谷物法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1816 年是气候极其恶劣的一年，冬天很冷、多雪，春夏又潮湿、多雨，7 月份大雨滂沱，9 月初就浓霜盖地，到 11 月底庄稼还在地里收不上来，等收上来时绝大多数谷物已腐烂变质。然而由于谷物法的限制，霉烂的小麦仍然上市。按惯例，8 月 15 日是港口开放日，外国粮食可以进口，但在这一天之前连续六星期的小麦平均价格只有 79 先令多，够不上谷物法规定的标准，结果从波罗的海开来的运粮船只被禁止入口而返航。等到 11 月 15 日另一个开港日时，小麦价格已超过 98 先令，粮食可以进口了，但波罗的海此时已封冻，地中海国家则因为本身收成不好而禁止出口，结果几乎没有什么粮食进入英国。谷物法就这样帮助地主阶级获取了超额利润，而人民群众则在水深火热中苦度灾年。

二、反动政治倾向的加强

1812年，利物浦勋爵出任首相，一直到1827年中风，他一直担任政府首脑。但利物浦在托利党内一向只起平衡作用，是党内各派间的缓冲器。在他任首相的前几年，决定政策的主要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和内政大臣西德默思子爵，即1801年—1804年出任首相的亨利·阿丁顿。这些人都是小威廉·皮特最忠实的信徒，因此在政治上完全继承小皮特的衣钵。1818年，威灵顿加入内阁，更增加了政府的保守色彩。另一方面，利物浦内阁也从托利党内吸收了一批比较年轻的政治家，他们后来成为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其中主要人物有乔治·坎宁、罗伯特·皮尔和威廉·哈斯基森等。战后，他们逐步步入政坛，在政府内担任比较低级的职务。

战争结束时，托利党政府秉承小皮特故伎，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扶持欧洲各国的“正统”王朝。这时，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因此保守主义思潮主宰着英国的官方政治。政府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护现存秩序上，反对在任何方面作出任何变革。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持现状，任何变动都可能打破已有的平衡，造成社会动荡。因此，他们竭力反对修改选举制度，害怕些微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反对在政治上解放天主教徒，尽管这时对天主教徒的限制已纯粹是一种歧视。在经济上，他们操纵议会通过谷物法，维护贵族地主阶级一己的私利，而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却不闻不问。西德默思曾说：“在上帝定为灾荒的地方，人不能造出丰腴。不要指望政府和议会的干预会减轻困难。”以此来推卸政府的责任。

卡斯尔雷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维持现状，力图在列强间保持实力平衡。英国虽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于1815年11月与俄、奥、普三国组成四国同盟，这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根据条约规定，四国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欧洲的重大事务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可以用武力进行干涉。但相比之下，英国更关心的是维持各大国间的均势，因此主张用四国同盟来保证欧洲各国的边界安全，阻止任何一国扩张自己的势力。由此出发，英国不赞成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生怕这样会打破列强间的平衡。但俄、普、奥三国认为任何革命运动都会打破欧洲的现状，造成力量的不平衡，因此主张四国同盟充当欧洲警察，随时准备扑灭革命火星。1820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爆发反对专制的人民革命，四国联盟出兵干涉。英国虽没有直接参与干涉活动，却默认了法、奥等国的行动。卡斯尔雷的政策引起英国国内普遍不满，许多人认为英国在这些侵略活动中起了帮凶作用。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是英国政治上最保守的时期之一，统治者置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于不顾，坚决维护旧社会秩序，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因此，这几年也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几年。

三、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一个中等阶级激进派分子在回顾战后这段经历时曾说：“打仗是为了压制据说有害于古老制度继续生存的言论，然而当和平恢复时，针对那积蓄已久的恶习的言论又出现了。”工人激进派塞缪尔·班福德对这一段历史叙述得更清楚。他说：“这已是历史了：当我们胜利的兵士第二次攻占巴黎所取得的荣耀尚停留在眉梢时，动荡的种子却已散布到劳动人民之中；1815年谷物法引起了一系列动乱，而且除短暂的间歇外，一直持续到1816年年底。”

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当人民发现和平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痛苦时，不满情绪立即爆发。谷物法通过后，全国到处出现骚乱。伦敦群众首先走上街头，这使人们想起1780年的戈登暴乱和1810年的另一次暴乱，更想起半个世纪前“威尔克斯和自由”这个口号。中部地区再次发生卢德派活动，仅1816年6月28日一天，拉夫巴勒一家工厂就有53台织袜机被捣毁，价值6000镑。霍尔斯特德失业饥民们在捣毁机器时发生动乱，地方骑兵义勇队费了好大周折才把它镇压下去。许多地方还不断发生抢粮风潮，饥饿的居民攻打粮仓，强迫囤积粮食的商人以平价售出国粮。在布里德波特、阿普尔多和比德福，群众围住船只，不许它们把马铃薯运向外地。中部的矿工推着煤车向伦敦进发，车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无人愿乞讨。”萨福克的农业工人则提出这样的口号：“没有面包，便是流血！”1816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内，这个郡发生了11起纵火案，其它地区也不断有纵火事件发生。在东盎格利亚，骚动的中心是小港，1500名示威者手持棍棒，穿街而过，抱怨物价太高，工资太低，打谷机又夺去了农工们冬天的工作。伊利岛也发生农业工人的骚动，结果78人受审，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真正处死的有5人。一个曾经对雅各宾派抱有同情的前激进分子在描述这种形势时说：这“不再是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也不是辉格党和托利之间的事了，这是在社会解体时有所失的人和有所得的人之间的事。”1819年辉格党一个头面人物也说：若经济情况再不好转，“就会有一场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但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无组织的自发行动，它更表现在议会改革运动中。

Edward Royle and James 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1982, P.

Samuel Bamford,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ed. by W.H. Chaloner, 1967, P.6.

John Can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 P.167.

第二节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

一、1800 年以后的激进主义运动

秘密结社活动

1799 年 7 月，议会通过“结社法”，指名取缔了“伦敦通讯会社”等群众组织，议会改革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这以后，一切合法活动都“非法”了，英国进入恐怖而黑暗的时代，90 年代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停止了，化为细水流入地下。19 世纪最初 10 年的人民运动，就是以地下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结社法公布后，“伦敦通讯会社”并没有停止活动，至少在 1800 年 11 月，人们还能看到它暗中活动的迹象。“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隐蔽得更深了，更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组织，分布在北、中部广阔的工业区里，秘密地进行活动。据地方官报告：1801 年，约克郡西区的许多工业城镇发现有地下活动，特别是当年工人运动的中心设菲尔德，秘密会议极为频繁。《里兹信使报》也报导类似的集会在利兹附近相当多。1802 年，还发现一份 8 页纸的传单，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推翻暴政。同年秋，两个设菲尔德人被交付审判，罪名是“非法起誓”。据说他们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有 1000 多人，正在打造武器准备起事。各地组织间还有经常的联系，据兰开郡地方官说，1801 年 1 月该郡曾召开一次秘密代表会议，伦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约克郡许多地方都有人参加。7 月，约克郡的哈里法克斯也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参加者来自许多纺织市镇，还有设菲尔德的代表。与会者必须回答 3 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是否应当改变现存的制度？

由于处于地下，组织的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因此，这些组织一般都比较严密，有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在吸收新会员时，更加显得谨慎。新会员入会须有可靠人介绍，且经过一定的考察；入会要履行手续，主要是进行宣誓。1801 年，博尔顿有一个叫“议会改革政治同盟”的秘密组织，它的誓词说：“我自愿宣誓，为争取全体英国人的友好相处，不分宗教信仰；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平等代表权，我将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为履行以上职责，我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永不背弃本会或兄弟协会的任何成员。无论是有意无意，直接或间接，都不泄漏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决不提供不利于他们的任何证据。”许多组织在宣誓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悬挂死神像、念符咒、歃血为盟等等。有些组织要求当着死神像宣誓严守机密，永不叛离，一旦泄漏组织秘密，愿意接受死的制裁。凡此种种，不仅使局外人觉得神秘莫测，就连宣过誓的会员，也时时感到一种死的恐怖在笼罩着，因此，绝不敢轻易吐露真言。由于组织非法，其活动也就隐秘异常，往往是聚无影，散无踪，昼伏夜出，深更半夜在荒山野地里聚会议事。1802 年有一个叫“黑灯照”的组织在里兹一带活动。里兹市长有一次写信给郡守报告说：这个组织“星期五晚上的子夜时分，在离利兹 6 英里、伯斯托尔 4 英里，远避一切交通要道的一段荒路或峡谷中开了一次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说，他企图假扮

成开会的人，但发现老远就有人把守。最外一道防线的人走过来搭讪，想把他引到不同方向去。他吵着要过去，这时他发现还有一道不固定的流动防线，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当他继续向‘黑灯照’挤过去时，一声口哨响了，随即他听到人的说话声，其言词和声调使他决不敢向前再走一步。”利兹市长接着说，他从其他情报来源得知，那天晚上集会的是“黑灯照”的总委员会，约200人，每个人又代表其他9个人。“‘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就是头领们提出的口号，也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到圣诞节时他们就能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与这封信几乎同时，伦敦收到了许多地方当局发出的武装起义警报。

1802年11月，政府逮捕了德斯帕德上校，说他阴谋推翻政府。德斯帕德出身于爱尔兰一个地主家庭，年轻时从军，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作过战。1790年他应召回国，从此断送了立军功的前程。不久，他投身于工人运动，参加了“伦敦通讯会社”，当选为总会代表。“伦敦通讯会社”被镇压后，他被关押两年而未加审判。1800年从狱中出来，他就开始紧张的活动，在伦敦工人中进行工作。他每天出入往返于工人聚集的下等酒吧间，与一群又一群工人、士兵会晤交谈。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军官兼绅士，这是非同寻常的，因此他的举动受到严密的监视。政府指控他通过这些活动组织了一支革命军，仅在萨索克一地，就有7个“师”外加8个“旅”。这支革命军遍布伦敦所有工人区，工人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此外，他还策划兵变、推翻政府、逮捕或杀害国王。据此，政府对他提出起诉。但在审判过程中德斯帕德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宣判死刑后，他才否认曾引诱过士兵，这使人觉得他仿佛是默认了密谋的存在，只不过从事策反工作的不是他。当他登上绞刑架时，他说：“我知道，由于敌视政府那些血腥、残酷、强制而又非法的手段，政府已决意拿我开刀，却又用他们津津乐道的法律作借口。公民们，祝你们健康、幸福、昌盛。虽说我不能活着体验那神圣的变化带来的幸福，然而请相信，公民们，那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

卢德运动

秘密结社活动的最高潮是1811年—1812年的卢德运动。这个运动的细节至今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运动的地方性很强，从未发生过全国性行动。但其组织性之强、活动方式之相似、步调之一致，又好像存在着统一领导，至少是地区性的联合委员会。参加运动的人昼伏夜出，在茫茫月色中，几十个人乃至数百人，头戴假面具，手执棍棒武器，突然出现在某村某镇，专与欺压工人最甚的老板作对，捣毁他们的设备，破坏违反行业生产规程的机器，对严格遵守行业规定的厂商和织机又严加保护。行动完毕，一声令下，就悄然散去。这些说明卢德运动是相当有组织的行动，他们事先对一切行动都作过最严密的规划。他们声称自己受“卢德将军”管辖，各地区都有他的一名代表——“上尉”在具体负责。至于“卢德将军”是谁，或者有没有这个人，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卢德派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可从他们的誓词看出来。有

A.Aspinall,Early English Trade Unions,1949.P.53.

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Ch.9.

一份卢德派誓词说：“我，某某，于此自愿起誓：我将永不泄漏本秘密委员会任何成员的姓名，否则将受惩罚，被第一个碰见我的兄弟送回老家；我并进一步起誓：如果出现叛徒，我将带着无尽的复仇心追踪他，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卢德派还有暗号和隐语，以便不同地区的卢德派彼此辨认。有一个记载说：“你必须把右手高举过右眼，假如有另一个卢德派在场，他将把左手高举过左眼……他会说：你是干啥的？回答：铁了心眼儿的。他会说：为啥？你回答：自由。然后他将和你说话，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卢德运动发源于诺丁汉市。1811年3月11日，诺丁汉市的织袜工停止工作，在市中心商场举行群众集会。附近许多村镇的群众也赶来参加。当晚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乘夜色潜入阿诺德村，捣毁了一个顽固商人的60部袜机。这以后，运动就猝然爆发，迅速扩展，起先还只在诺丁汉市一带，随后扩大到整个诺丁汉郡。不久，又在德比和莱斯特郡蔓延开来，捣毁织袜机的行动几乎夜夜都有，整个织袜区一片动荡不安。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力量，仍无济于事。到第2年2月，总共捣毁织袜机约1000架。只是在多数袜商接受了工人条件，议会又通过镇压性条例，重判砸机罪以后，运动才突然停止。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运动表现得更为激烈。兰开郡的手织工曾与雇主谈判，要求恢复工资。雇主起先答应，然后又反悔，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骤然而起。1812年3月20日，手织工开始袭击工厂，砸毁机器。以曼彻斯特为中心，附近几十个纺织村镇同时卷入运动，并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统一协调行动。厂主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一家工厂被围攻了3次，最终才被烧掉。4月20日，在米德尔顿的一次冲突中，厂方开枪打死5人，还有10余人受伤。第二天，卢德派出动了好几百人放火烧了厂主的住房，这时，军队赶来镇压，又死伤多人。在约克郡，当卢德派围攻威廉·卡特莱特的工厂时，厂中守军和工贼开枪射击，重伤2人，后来这2人被卡特莱特抓去折磨至死。卢德派为报此仇，便企图暗杀卡特莱特，未遂，于是就枪杀了另一个与工人坚决作对的厂主霍斯福尔。这个案子到半年之后由于叛徒告密才得破案。1813年1月约克郡巡回法庭开庭，一次就处死17个卢德派分子，流放7人。正因为卢德运动如此激烈，哈孟德夫妇在写《技术工人》一书时，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

卢德运动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约克郡西区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一个名叫贝恩斯的老共和派分子说：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打倒嗜血的贵族”。他说：“我欢呼你们起来反对压迫者，希望它发展下去，直到世界上没有暴君为止。”他还说他“希望看到民主制度胜利的时刻。”1812年5月26日，曼彻斯特各业代表会议也通过决议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名义上的议会代表……已不再是人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忠实卫士了……希望唯一所在，就是赶快对下院进行有效的激进改革。”

卢德运动为战后的工人激进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干部和基本群众，从这个

David Dougla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XI, 1959, pp. 534—535.

J.L.B. Hammond, The Skill Labour, 1979, p. 1.

Frank Peel, The Risings of the Luddites, Chartists and Plug-Drawers, 1880, pp. 55—57.

John Dinwiddy, Luddism and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Counties, in Social History, Vol. 4, No. 1 (1979), pp. 46—47.

角度上说，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

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议会改革运动重新兴起时，隐藏在地下的秘密结社突然涌出地面，劳动人民又成了改革运动的主力军。因此，19世纪最初15年的秘密结社活动，是两次人民运动高潮的纽带。

中等阶级议会改革运动

在工人群众积聚力量，培养阶级意识的时候，中等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也经历了一个重新组织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开始。1806年小皮特死后，由格伦维尔出面组成所谓“贤能内阁”，囊括了除皮特派以外的两党一切巨头，其中包括辉格党的福克斯和格雷。这使中等阶级改革派觉得有了一点希望。1807年，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全力投入大选，推举伯德特爵士和科克伦勋爵为激进派候选人，与托利和辉格两党对抗。但他们处境十分困难，普雷斯记载说：“我们没有钱，没法做宣传，没有人加入我们，托利党瞧不起我们，辉格党嘲弄我们。被人嘲笑才是最糟糕的呵……能经得起别人咒骂的人，经不起别人的嘲笑。”但选举结果却使人大吃一惊：两席全部被激进派赢去了。这次胜利使议会中出现一个新的激进派改革集团。为首的是乡绅伯德特，其他都出身于门第低微的市民阶层，如马多克斯是律师的儿子，纳普是杂货商。这样，议会在10年没有反对派之后，终于又出现一个吵吵嚷嚷的激进小集团。

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激进派能在一无后台二无钱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全靠竞选委员会的功劳。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存在了10年，为战后改革运动的蓬勃兴起准备了干部。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后来在激进派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全都是委员会成员。

这一时期改革派的主要喉舌是威廉·科贝特。他在1802年还是政府的支持者，在陆军大臣温德姆的帮助下，创办了《政治纪事》报。但1804年他开始攻击政府腐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806年他转向议会改革，此后《政治纪事》就一直是改革派的主要报纸。1807年，他参加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工作，是这次竞选活动的主要宣传家。他利用威斯敏斯特选区工人阶级选民占优势的特点，直接向手工工匠进行宣传。正是由于他的宣传，改革派才取得工匠选民的普遍支持。

科贝特虽是宣传的大师，但行动的巨匠却是70年代的改革老将，《抉择》的作者约翰·卡特莱特上校。他在18世纪90年代显得不那么出众，但在19世纪初阴暗的日子里，当老一辈中等阶级激进派都对改革丧失信心时，只有他坚持不懈，为改革力量的重新组合作出了贡献。自1811年起，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龄3次出游北、中部工业区，向工人传播他的改革福音。他曾坐着颠簸的邮车，在29天里行程900英里，所到之处都召集群众大会，一个月内在35个地方讲演。他的本意是“把不满转到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上，”从而阻止“煽动穷人侵犯富人财产的企图”，其结果却是复活了工人群众有组织的公开活动。1812年他和伯德特共同发起“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其纲

领是“保证人民自由选举下院代表”和“改革下院代表制”。但这个组织贵族味太重，它的会员必须有300英镑的财产资格，每年会费2几尼（2镑2先令）。卡特莱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写道：“在社会一大部分人眼中，它当然是个特殊的团体。”当时白色恐怖盛行，上中层人物对议会改革敬而远之，因此到1814年，只有3名会员经常参加活动；到1815年3月，只剩下卡特莱特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卡特莱特只好转向工人群众，把改革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工人身上。于是，他第二次、第三次出巡北、中部工业区，在劳动人民中大力发展俱乐部组织。因此，到战后俱乐部运动兴起时，这个运动已基本上成为劳动群众运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亨特，这是位小康农家出身的改革派，体格雄伟，声音宏亮，说话很有鼓动性，是名噪一时的演说家。由于他在战后许多重要场合充当演讲人的角色，因而获得了“雄辩者亨特”的美名。在所有激进派领袖中，他最接近劳动人民，思想也最和他们相通，因此，观点也最激进。他的口号是“要么普选权——要么什么都不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人民的不满又汇成一股群众运动的洪流。活跃在这一运动中的中等阶级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至于辉格党，他们在整整20年中悲观失望，游离于运动之外，甚至连改革都不敢提，深怕会把党内最后几个大贵族吓跑。他们把自己上台的希望寄托在威尔士亲王身上，认为“仅有的一点微弱希望在朝廷，即朝政易手的时候”。1806年他们参加“贤能内阁”，福克斯是最主要的阁员。但这届内阁根本未把议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辜负了許多人满腔的希望。

Cole and Filson (eds) .op.cit.PP.140—141.

R.J.White,op.cit.P.134.

ArchibaldS.Foord,His Majesty'sOpposition,1964 , P.419.

二、人民运动的重新高涨

汉普登俱乐部运动

战争结束后，议会改革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次高潮主要是由劳动人民发动的，工人阶级是战后激进运动的主力军。

科贝特在这次运动中起了点火作用。以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宣传集中在城市中等阶级和乡村农场主身上，他的《政治纪事》报主要就是给这些人看的。长期的斗争使他看到上中层人士对改革并不感兴趣，只有工人阶级最坚定地要求改革。因此只有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1816年以后，他转而面向普通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直接对话。他知道《政治纪事》每份1先令群众买不起，就把报上的文章摘录成辑，命名为《每周政治纪事》，以2便士的价格出售。在第一期《每周政治纪事》上，他刊出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号召工人阶级投入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在他的鼓动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汉普登俱乐部运动勃然兴起。

汉普登俱乐部的主体是各地的手工工人，其领导人也都是工人激进派。班福德是米德尔顿镇俱乐部的书记。据他说：到他们那个小教堂来开过会的各地领导人中，有7个手织工、两个印刷工、鞋匠、裁缝、刻石工、制帽工、制木履工、医科学生、棉织品制造商、棉布商各1人。其中棉织品制造商就是当年卢德派领袖奈特，他本人也是手织工出身。1817年，政府曾对激进派领袖进行大搜捕，与班福德一同被捕押往伦敦的人中有两个手织工，其他的则有磨刀匠、箍桶匠、漂白工、外科医生和酒店老板等。这些人中身份最高的是“医生”，不过据班福德说，这只是个自学起家的走方郎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见这时期工人激进派的领袖，实际上与伦敦通讯会社时期并无二致。

运动的主要斗争方法是请愿和召开群众大会。在运动高潮中，各地共提交527份请愿书，签名的据说有60—100万。这使一个叫作“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工人组织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在伦敦举行群众集会时发动起义。12月2日，集会在矿泉地召开。大会开始后，斯潘斯协会的领导人小沃森等人号召群众向伦敦塔进军，另一个领导人卡斯尔则搞来一车武器。进军群众一路上抢了好几个枪械铺，夺走了大量武器，还沿街鸣枪以壮声势。到伦敦塔后，许多人爬上墙头，要士兵们投降。但皇家卫队迅速赶来，平息了骚乱，并很快将起事的领袖全部逮捕。直到出庭审讯时，斯潘斯派才发现那个一直深受他们信任的卡斯尔原来是个奸细，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中。幸亏为政府作证的只有卡斯尔一个人，伦敦陪审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是政府设圈套引起动乱，便开释了斯潘斯博爱主义者。

矿泉地事件不仅使政府找到了镇压的借口，也使激进派领袖陷于分裂。伯德特指责亨特操之过急，表示不再参加即将举行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会议。卡特莱特和科贝特认为普选权要求不合时宜，因而提出房产主选举权。只有亨特一人坚持普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1817年1月22日开始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会议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次大会有70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经过一番争论，最终采纳了亨特的意见，并由科克伦在1月28日向议会呈交要求普选权的请愿书。中等阶级的动摇以及对普选权原则的三心二意使

没有房产的工人代表感到汉普登运动已经无望。

就在科克伦等人向议会呈交请愿书的同时，政府却以迅雷般速度开始镇压。3月3日，政府中止人身保护法，紧接着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3月29日），这个法案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小皮特1795年的杰作。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有一个“阴谋”正在发展，它要“全面推翻现存的一切制度，瓜分这个国家的地产，消灭这个国家的资产。”阴谋的主使者是“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因而斯潘斯协会被点名封禁。刚露头的议会改革运动被压下去了。伯德特几乎退出运动，科贝特只身逃往美国，俱乐部运动濒于瓦解，斯潘斯派正在候审，只有亨特一个人还在活动。

科贝特的出走对改革事业极为不利。但一份由工人创办的报纸《黑矮人》填补了《政治纪事》的空缺，成为改革运动的主要喉舌。《黑矮人》指责科贝特出走是临阵逃脱，背叛改革事业；同时相信：人民将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完全胜利。《黑矮人》登上舞台表明工人阶级自己接过了理论领导权，它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它说：“没有什么比所谓的中等阶级的庸俗猥琐更叫我讨厌的了，”因为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只具有动物的感觉，除了拚命谋取生存外没有别的动机，而生活的唯一目的就只是吃、喝、睡、穿”。靠这种人是不能把改革斗争进行到底的。所幸“群众已开始为自己说话了，贫穷造成的勇气和坚定，将大有希望完成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不能、或不愿实行的一切！”《黑矮人》在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发动工人群众投身改革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暴力派活动

当局中止人身保护法后，许多改革派转入地下，暴力主张开始抬头。许多地区组织了秘密委员会，彼此间相互串联，企图发动武装起义。暴力派在北、中部工业区的活动十分频繁。1817年6月9日，诺丁汉附近的彭特里奈村发生织袜工人的武装起义，数百名工人在失业织袜工布兰德雷斯率领下向诺丁汉进军，企图与那里的起义人员汇集。由于他们沿途搜罗武器、人员，耽误了许多时间，未能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结果在离诺丁汉7—8里路的一条河边碰到一小队骑兵，起义人员很快逃散，其领袖也很快被捕，布兰德雷斯等3人后来被判处死刑。

这次起义虽然一枪未发就失败了，但它证明英国工人运动中确实有主张暴力的倾向。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与政府派出的奸细奥利弗的煽动有关——奥利弗曾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使工人中的暴力派错误估计形势，采取盲目行动；但更重要的是暴力派本身忽视群众基础，热衷于密谋活动，因而严重脱离群众。尽管如此，彭特里奇起义却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尝试。以前工人们曾有过革命的言论，下层人民中也有过自发的暴乱，但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动武装起义，这是第一回。彭特里奇工人起义在英国近代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它铭记着英国工人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英雄业绩。

彼得卢事件

1817年农业丰收，物价下跌，经济回升，这使严峻的形势得以缓解。与此同时，由于政府采取镇压性措施，大多数改革派领袖不是流亡，就是入狱，因此改革运动一时消沉，局势渐趋稳定。1818年，经济情况再度恶化，农业歉收，原棉、原丝的过度进口造成市场过剩，工业衰退，工人罢工再次兴起，各地骚动不断。随着人身保护法按期恢复，改革运动很快又进入高潮。

7月12日，伯明翰召开一次盛大群众集会，《黑矮人》的编辑伍勒等出席了大会。会上除提出“普选、年度议会、无记名投票”等改革基本要求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选出该市的“立法代理人”，要议会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接纳他出席议会会议。这是一个首创，表明大工业城市第一次正式向议会挑战。伯明翰是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黑色金属工业的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资格选派议员。这个行动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斯托克波特等城市竞相效法。曼彻斯特的工人改革派也作出决定，要召开一次盛大群众集会，选举曼彻斯特的“立法代理人”，并请亨特来主持会议。

大会由和平派发起，丝毫不带革命倾向，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此，大会的组织者曾一再强调过。大会组织委员会曾下达指示，要大家操练时不用武器。开会那一天也不准携带器械，包括棍棒在内。开会前一天，亨特与大会组织者见面时，还再三强调和平与秩序，当有人提出如果人民先受攻击，有进行自卫的权利时，亨特严加斥责，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动武，而应紧紧地依赖法律。后来，当政府对大会的组织者开庭审讯时，就连政府方面的证人也几次三番地证实大会的和平性质。尽管如此，曼彻斯特市政当局在托利党政府默许下，却下决心镇压。

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地区的6万至8万名工人，身穿节日盛装，到邻近村镇整队出发，前往圣彼得广场参加大会。各队打出的旗帜上写着各种口号，包括“年度议会”、“普选与无记名投票”、“宁要作人死，不当奴隶卖”以及“不要谷物法”、“没有平等代表权毋宁死”等等，最后一条标语后来被当作是“推翻政府”的首要罪状。大会开始后，先由亨特发表演说。他走向讲台时，群众一片欢呼声，乐队奏国歌。亨特演说时，地方官已在会场周围布置好兵力，其中包括第31步兵团全部、第88步兵团一部、炮骑兵一个连，以及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下卓越军功的第15骠骑兵团6个连，加上特别巡捕、义勇队等，有好几千人。随后，地方官一声令下，义勇队首先发动，策马扬刀冲向人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砍大杀。整个会场立刻大乱，人们纷纷向四处逃散。这时，军队蜂涌而上，特别是第15骠骑兵团，这个因滑铁卢战役而声震全欧的团队冲入人群，使本来已经很混乱的局面更为混乱，结果死11人，伤400多，死伤者全部是工人。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事件”。

彼得卢事件后，托利党政府对改革运动全面镇压。他们以摄政王的名义对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加褒奖，并立即在议会通过一系列镇压性法律，即所谓的“六项法律”。六项法律中的第一项禁止操练，违者可判7年流放；第二项禁止携带武器，并授权地方官可随时逮捕拥有武器的个人和搜查私人住宅，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第三项法律对公众集会加以限制，使群众大会难以召开。还有3项法律则针对出版物，授权法庭可任意没收“煽动性”报刊，并对其作者起诉判刑。这6项法律因主要是限制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

利的，因而被讥讽是“六项钳口令”。至此，托利党的反动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最保守最专横的一个时期。

三、托利党自由派和 20 年代的改革

1822 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自杀身死，乔治·坎宁接替他的位置，并充任下院领袖。随着他的升迁，在战争中追随小皮特的老保守派退居二线，托利党的领导权落入有一定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人手中，这批人被称作托利党自由派。除坎宁外，托和党自由派还有皮尔和哈斯基森等。

乔治·坎宁 1816 年参加政府，任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当时的托利党内阁中，他是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因此颇得民众好感。在他就任外交大臣之前不久，罗伯特·皮尔也接任内政大臣。皮尔的父亲是工业革命初期发迹的棉业大王，在 1802 年曾提出第一个“工厂法”。老皮尔把小皮尔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希望他日后能步入仕途。由于这种出身和经历，小皮尔要比他的托利党同僚们“自由”得多，被他的政敌讥称为“珍妮纺纱机”。他在许多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并且不完全敌视改革。1823 年，财政专家哈斯基森也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这使自由派实力大增。由于这些人事变动，政府实际上落入自由派之手，英国由此进入保守的自由时期，在 1822 年—1830 年间进行了一些温和的改革。

首先在外交政策上，坎宁不把四国同盟作为欧洲均势的基础。过去卡斯尔雷也不支持列强干涉小国内政，但两者的出发点实际上却不同。坎宁认为和平的保障在民族主义，他对俄、奥、普、法的干涉政策极为反感。他曾说：“我们若想在海外保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国内有力量的源泉，这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和政府间的和谐，它存在于公众的感情与协商一致中。”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外交政策要考虑到民意，不可违背民心。这样，他就给英国的外交打上了自由主义的印记。

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时，四国同盟正在讨论西班牙革命问题。英国代表接受坎宁指示坚决反对武装干涉，结果同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823 年，法国在俄、奥、普支持下出兵西班牙，英国未能阻止，但当这些国家提出要干涉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时，英国拒绝出席会议，并声言只有西班牙才有权对殖民地进行干涉，而实际上西班牙当时根本不可能干涉。由于英国控制海洋，抵制干涉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次年，英国进而承认南美独立国家，保障了英国新近在该地区获得的商业利益。1826 年，英国派兵进入葡萄牙，阻止西班牙复辟王朝干预葡萄牙革命。当希腊爆发独立运动时，英国也持同情态度，并于 1832 年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1824 年—1825 年接连给希腊两笔贷款，1827 年又与法、俄共同出兵打败土耳其，帮助希腊取得独立。由于这些行动，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无形中突破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神圣同盟体系。

在内政方面，由皮尔负责修改了刑法。英国的刑法是英国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先例和法律逐年累积，形成习惯上使用的量刑标准。但这些标准有许多具有中世纪的残酷性，比如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一共有 200 多种罪名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其中有许多在制定时只是为了应付一种临时的需要，但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形成极其可笑的局面。许多罪名实际上是够不上死罪的，比如扒手掏腰包，农民偷鱼，在商店盗窃 5 先令以上的商品，甚至涂黑了脸在大路上行走等等。这种情况使法官在定案时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许

多法官为了不让一点小罪行判处一个人死刑，就干脆不定罪，罪犯一律开释，即使证据确凿也是如此。这样，法律实际上无法执行，犯罪率因而有增无减。1808年，塞缪尔·罗米利在议会提出法案，将扒窃由死罪降为流放，这是刑法上的第一次改动。罗米利去世后，刑法改革运动由詹姆斯·麦金托什领导，并在1819年成立一个议会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刑法问题。皮尔上任后接手这项工作，于1823年让议会取消了约100种死罪。此后刑法改革继续进行，直至最后只剩下3项罪名可定死刑。1829年，皮尔还在首都创建一种新型的警察部队，后来推广到全国。这是一种专司维护治安的准军事部队，身穿蓝制服，手持警棍，用以取代过去临时招集的义务巡捕队。警察在初创时遭到各方面反对，人们害怕政府手中会多一个镇压反对派的工具。应该看到，皮尔的刑法改革尽管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此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主要目的仍是使统治者能够进行更有效的统治。警察创立之后，一方面有助于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使人民的无组织反抗更难于进行。

在哈斯基森领导下，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向自由贸易迈出了第一步。他废除了实行近两个世纪之久的航海条例，并降低了许多商品的进口税，其中包括原料（如丝、铁、羊毛），消费品（如糖、咖啡、葡萄酒）及某些工业品（如棉织品、毛织品）等。他还取消了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而这种禁令曾实行了好几个世纪。1826年，由于收成极坏，政府让议会通过法令，允许粮食进口可以不受谷物法限制。1827年，坎宁正式提出修订谷物法，但受到以威灵顿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的反对，在上院未能通过。威灵顿组阁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坎宁提案的基础上修订谷物法，允许粮食随时进口，但以浮动的关税加以限制，也就是国内谷物价格越高，则进口税越低，小麦价格达到73先令一夸特时，即可免税进口。托利党自由派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是托利党中受工业资产阶级影响的一翼。

第三节 1832 年的议会改革

一、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彼得卢事件”后，议会改革运动一时沉寂下来，从表面上看，局势相当平静。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却蕴藏着深刻的不满，这在“王后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1795 年，当时还是王储的乔治四世娶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公主为妻，婚后感情不好，不到一年两人就分居了，卡罗琳后来长期住在国外。1820 年乔治继承王位，卡罗琳要求同时加冕，取得王后称号。乔治不愿，就指使内阁操纵议会，准备通过离婚令。这时内阁仍在卡斯尔雷等老保守派的把持下，因此对国王言听计从。人民对托利党早就心怀怨愤，于是借此机会一齐宣泄出来。他们把对政府的痛恨转变为对王后的同情，认为王后受了委屈，是“受压迫”的人。于是，“受压迫的人”都团结在王后周围，为王后鸣冤叫屈。这种情绪被一个贵族妇女看得很透彻，她说群众把王后“看作是受压迫的人，而她实际上是压迫人的人。”他们支持王后，是因为“他们痛恨国王。”当王后从国外回来在多佛港登陆时，港口礼炮齐鸣，以示敬意；从多佛到伦敦，一路上人群欢呼，列队相迎；在坎特伯雷，骑兵团的军官为她护卫；在查塔姆，牧师们向她祝词。伦敦民众沿街游行，若发现哪家门口不张灯结彩，就群起而攻之。一连好几个月，支持王后的示威不断，结果政府只好放弃了通过“惩戒法”（惩罚卡罗琳）的企图。不久后，卡罗琳忽然病死，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这次事件强烈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为托利党自由派上台铺垫了基础。此外，辉格党在这件事中得益不少，自 1794 年波特兰公爵率大批党徒投奔托利党之后，辉格党早已奄奄一息，现在却突然举党一致成为政府的反对派，而且俨然是人民意志的代言人。其重要成员布鲁厄姆还充当王后的辩护律师，这对辉格党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此后，辉格党开始在政治上重新活跃，在经历改组和重建的过程后，一些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党的领导层，例如布鲁厄姆、麦考莱、罗素、达勒姆等。这些人在政治上接受边沁学说，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社会价值方面崇尚个人竞争、强者获胜，并且主张议会改革，因此与自由资产阶级十分接近。但是以兰斯多恩侯爵为首的贵族集团坚决反对改革，因此在 1820 年—1830 年的 10 年中，辉格党仍不能行动一致。

20 年代中，工会运动取得很大进展。在中等阶级激进派普赖斯和约瑟夫·休谟等人努力下，议会于 1824 年废除“结社法”，搬掉了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拦路石。普雷斯等人原以为只要使秘密结社公开，消除了它的神秘性，就可以消除它对工人的吸引力，从而消灭工人结社，不想反而使工人结社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发展了。1824 年，全国出现了许多工会组织和工人罢工，使统治阶级深感恐惧。1825 年，议会又通过新的法律，限制工会活动，结果，工会虽可合法存在，但工会的许多活动却属非法。

尽管如此，工会运动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当时英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尚局限在手工工人范围内，工业革命的产物——产业工人，起先是由于人数少，后来又受“反结社法”压制，一直未能形成强大的阶级组织。废除“反结社

法”后，工人活动的最大障碍扫除了，工会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转眼间就浩浩荡荡，组织林立。尤其是北、中部工业区，几乎村村镇镇都有工会组织，并逐步联合，形成全国四大工会——建筑、纺纱、陶瓷、呢绒工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多尔蒂领导的纺纱工会。1829年，多尔蒂领导兰开郡纺纱工人大罢工，失败之后，他认识到必须联合更多的工人共同战斗。因此，他于当年12月发起组织“不列颠和爱尔兰纺纱工人总工会”。1830年2月，他进一步扩大组织，成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是组织全国性跨行业产业工联的第一次尝试，其成员最多时号称10万。1831年9月，他还想在伦敦成立全国总工会，但未得到伦敦的支持。后来，“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因内部争吵而陷于瓦解，工会运动的中心转向建筑业。

1832年，建筑工人成立“建筑工人工会”。它是全国性行业组织，由7个与建筑有关的行业组成，每个行业组成自己的分会，共同成立“建筑工人议会”，掌管全工会的事务。各分会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到1833年，共有会员3万多人。这一年，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资方斗争，利物浦建筑工人先反对承包商居中剥削，雇主予以反抗，强迫每个工人都签字画押，保证不参加工会组织，否则解雇。“建筑工人工会”于是号召全体会员举行罢工，各地纷纷响应。在曼彻斯特，罢工持续了16个星期，伯明翰也掀起规模巨大的斗争。这些罢工到1833年年底才失败，伦敦的罢工则一直延续到1834年9月。“建筑工人工会”生存到1834年年底。这时，由于长期的斗争耗尽了资金，同时内部又发生争执，全国性组织才告瓦解。

1834年，欧文还发起组织了“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这将在下一节中详述。

与工人斗争同时，农村兴起了“斯文大尉”运动，这是农业工人的自发反抗活动。1830年夏天，人们传说有4个人饿死在一座篱笆下，这成为“斯文大尉”运动的导火线。这一年收成不好，农业区灾荒四起，农业工人普遍受饥饿的威胁，因此运动一发动，就很快蔓延开来。农业工人这时尚未成立工会，也从来没有成立过任何形式的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呈现出散乱、无组织的特征。运动从肯特郡开始，逐渐扩散到苏塞克斯、埃塞克斯、汉普郡等地，直至整个南部农业区。一群群农业工人，彼此间并无联系，他们手持棍棒、草叉在农村中四处游荡。他们从一村走到另一村，有的围攻乡绅，有的包围法官，有时跑进农场，拿农场主出来问话。他们的要求都是经济性的，比如给一个有家室的农业工人每天2先令3便士的工资，或是要富人施舍，解他们一时之难。他们特别痛恨打谷机，因为打谷机夺去了他们的饭碗，叫他们在冬天无事可做。8月28日晚，第一台打谷机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下哈德雷斯被砸，此后，砸毁打谷机就成了运动最明显的特征。他们要求牧师减免什一税，要求农场主提高工资。对那些最为人痛恨的农场主，他们就烧掉他的草堆，有时还扒掉他的房屋。在运动中，放火事件遍及全国34个郡。据说这些行动大多是由神秘的“斯文大尉”指挥的，使人回想起卢德运动中的“卢德将军”。有一封署名“斯文大尉”的信说：“先生，谨此告知：若你自己不把打谷机砸毁，我们将开始行动。”另一封信则说：“谨此通报诸绅士知晓：若你们不将机器拆毁，不增加穷人工资，有家室者不给2先令6便士一天而只给2先令一天，我们将把你们的谷仓，连你们在内一起烧掉。此为最

后的通报。”

政府出动大批军队镇压“斯文大尉”运动，骑兵、步兵，甚至龙骑兵都奉命赶赴出事地点，运动很快被平息。接下来是严酷的审判，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特别巡回法庭，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被捕提交法庭。最后，有9人被处死，457人被流放，更多的人被监禁。然而，尽管政府出1000英镑悬赏告密者，却没有一个饥饿的农工背叛自己的同伴——没有一个人向政府告密。

二、议会改革运动的复苏

改革力量的集结

19世纪20年代，争取改革的力量经历了集结、改组的过程。

首先是辉格党在议会恢复活动，他们在“王后事件”中受到了鼓舞，重新把议会改革作为自己的口号。1820年初，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还在悲观地说，在他有生之年将不能看到议会改革了，因此不必为此操劳太多，但1821年1月，他已经把“完全彻底地改变政府体制”视为己任。1822年4月，罗素勋爵在议会提出改革动议，要求把100个衰败选邑的席位各减去一席，分给郡选区和没有议员选派权的大城镇。这项动议以164 269票失利，但这是1785年以来获得支持最多的一项改革动议。1823年罗素再次动议改革，但成绩远不如上一年好，接下来的两年辉格党毫无作为，好像对改革失去了信心。1826年，辉格党对大选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指控，逼迫议会剥夺了东雷特福和彭林两个镇的选邑权。但当罗素提出要把这两个镇的席位转给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时，却受到托利党贵族的强烈反对，议会为此辩论了3年，结果还是把这些议席转到附近农村去了，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家在希望完全破灭后，带着一腔怒火投入改革。

工业资产阶级在此之前很少投身议会改革，他们或者游离在改革外，或者站在政府一边反对改革。“彼得卢事件”中参与屠杀工人改革派的主要就是曼彻斯特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义勇骑兵团。但东雷特福—彭林事件后，工业资产阶级大量转向改革。1832年工业家弗赖尔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50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商业区和工业区是合而为一的，一荣俱荣。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

工业资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是英国黑色金属工业的心脏伯明翰；它的领袖人物是托马斯·阿特伍德。伯明翰是个小企业林立的地区，迟至1843年，当地大部分工厂也还只雇用6、7人至30人不等。由于企业小，老板略遇风浪就破产，帮工稍聚几文便开店，因而阶级分化不明显。1829年经济萧条，伯明翰受到沉重打击。5月8日，在一次地方性会议上，阿特伍德花了3小时宣讲币制改革，然后通过一项决议，送交议会。但政府很快就退回了请愿书，谈吐中还不乏轻蔑之辞，这大大触怒了伯明翰的工业家。于是，阿特伍德这个在1825年还发誓“不和激进派来往”的人，一夜间竟成了激进改革派。1830年1月25日，他发起成立了改革斗争中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伯明翰政治同盟”。它的成立宣言说：

大贵族在下院有充分的代表权……工业和商业却几乎全无代表！它们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是国家财富与力量的源泉，相比之下它们代表不足，而和国

John Cannon, op.cit.P.184.

Asa Briggs, Thomas Attwood and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 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No.9 (1948), P.194.

家的累赘（指贵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每一项利益，却被代表得足而又足！因此，改革这种状况对国家的昌盛极为重要。一般来说，下院中“市镇公民”的代表应该是真正的“市镇公民”，即经营实业，积极关心它，将其毕生的财产与幸福委托于它的人。

由于伯明翰阶级分化不明显，同盟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和工匠，因而声势特别大。尽管如此，它仍不失是纯粹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同盟的6个创始人，阿特伍德是银行家；斯科菲尔德是银行家兼工业家，伯明翰的头号巨富；琼斯是金银器兼纪念章制造商；索尔特是灯具制造商；哈德利是钮扣制造商；芒茨开金属辗轧厂。此外，当地辉格党首脑，后来成为同盟二号人物的约瑟夫·帕克斯，是大厂主的儿子，本人是律师。同盟政治委员会的36名委员会中，有蒸汽机制造商、制绳商、铸铜商、商店老板、律师、小学校长等等，只有一个工人，其阶级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除工业资产阶级外，“中等阶级”还有另一个阶层，这就是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旧”中等阶级。他们是商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正是他们最早形成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而且长期以来发挥着重要作用。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克斯事件和80年代的“宪法知识协会”都是他们活动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时他们也曾投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世纪初，他们的活动陷于消沉，但20年代末又开始重新复活。1830年3月8日，伦敦成立“首都政治同盟”，表明“旧”中等阶级又有了自己的组织。

和中等阶级一样，这时工人阶级也可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工业革命前就有的手工工人阶层；一个是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工厂工人阶层。工厂工人受欧文的影响相当深，多尔蒂就自称是欧文主义者。建筑工会领袖莫里森曾写信给欧文说：“我希望您将毫不迟疑地指出我的错误、偏见和天生的弱点。您的学说使我成为更完善更幸福的人……”但欧文是反对改革的，他说即使实行了普选制，“也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大好处，甚至根本不会有好处。”

因此在他的影响下，工会运动和其他产业工人运动都偏重经济斗争，对议会改革兴趣不大。尽管如此，工会组织对议会改革仍持积极的态度，比如1831年3月5日，辉格党政府提出改革法案的第5天，多尔蒂创办的《人民之声报》就表态说：“尽管法案具有较强的人民性，超出我们对现政府的期望，但仍然没有一项条文……是为工人利益制定的。……然而人们将从选邑贩子们那里取得某种东西，假如法案不夭折……通向其他更有用的改革的路就筑起了。”6月18日，多尔蒂更明确地说：“法案是通向我们的目标——建立普遍的政治自由——的辉煌的一步。”

手工工人则有悠久的政治斗争传统，为争取普选权而长期斗争过。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掀起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伦敦通讯会社”就是他们的组织。19世纪初，当辉格党贵族和中等阶级改革派都销声匿迹、意气消沉时，只有他们仍然坚持斗争，把运动推向高潮。但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态度是：要么普选，要么什么都不要。因此他们在1830年—1832年的改革高潮中坚决反对辉格党政府的提案，认为这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他们要求实行彻底的

Cole and Filson (ed), op.cit. PP. 226—227.

A.L.Mort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1962, P.42.

A.Morton, op.cit.P.124.

Michael Brock, The Great Reform Act, 1973, P.168.

成年男子普选权，实际上是要求工人阶级选举权。他们的态度后来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下文将会谈到。1830年5月，伦敦手工工匠成立“工人阶级全国同盟”。这是在改革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手工工人政治组织，它自称与外省104个类似的组织有直接联系。

就在改革势力积聚力量的同时，反改革阵营却在剧烈分化。20年代初，托利党自由派实行某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党内保守派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托利党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保守派利用他们控制的地方势力暗中排斥自由派，比如1826年大选，自由派的重要人物、陆军大臣帕麦斯顿子爵突然发现他稳坐了14年的剑桥大学议席受到威胁，当地托利党在某些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准备把他轰下台，于是他不得不投靠辉格党以取得支持，这样才保住了席位。帕麦斯顿忿忿地说：“这是我和托利党分手的决定性的一步，而他们是侵犯者。”

1827年，首相利物浦中风，乔治四世不得已任命坎宁组阁，使斗争更趋尖锐。托利党长期以来在爱尔兰问题上观点不一，一派主张解除对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力；另一派则主张维护国教的“独尊”地位，继续实行歧视政策。自由托利党人除皮尔外，都是解放天主教徒的坚定鼓吹者。尽管如此，坎宁组阁时，仍遵守党内惯例，不准备提出天主教问题。但以威灵顿公爵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决心不让自由派组阁。他们以坎宁支持天主教解放为借口，一致退出内阁，以为这样就能整垮坎宁。坎宁为摆脱困境，不得已与兰斯多恩派辉格党结成联盟，联合组阁。在这次事件中，皮尔也站到了保守派的行列。此后，托利党自由派便称坎宁派。坎宁死后，联合内阁垮台，威灵顿出面组织清一色的托利党政府，但托利党内的分歧已不可弥合。1828年5月，坎宁派在东雷特福议席转让问题上投票反对政府，主张让伯明翰获得议席。随后，哈斯基森率坎宁派离开内阁。至此，他们除议会改革外，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和辉格党一致。经过10年的演变，托利党左翼终于分化出来。

随后，辉格党也开始重新集结。1830年3月开始，各派就在消除分歧。4月，隐退10年的格雷伯爵终于出山，到伦敦考察局势。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很像大革命前的法国：人民情绪激昂，政府软弱无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英国的贵族将与腐朽的制度同归于尽。格雷的复出使辉格党获得当然领袖，派系间争斗全然消除。接着，格雷决定与坎宁派结盟。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制定出“和平、节俭、改革”的共同纲领，坎宁派终于在改革问题上也接受辉格党立场。不久，帕麦斯顿代表坎宁派通知威灵顿政府：他们“将投票支持”议会改革。至此，改革力量的集结全部完成。

这样，经过10年的集结、分化、改组，到1830年时，全国三大阶级6股政治力量中，只有托利党一小撮最顽固的保守派反对任何变革，其他各种力量都支持某种程度的议会改革。因此，从阶级力量对比看，议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托利党贵族仍掌握政权，而且有国王在暗中支持，所以，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还需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

Sir Henry L. Bulwer, *The Life of Viscount Palmerstone,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1871, pp. 147—148.

天主教解放法

改革的序幕是由“天主教解放法”拉开的。自英国征服爱尔兰后，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还举行过武装起义，企图摆脱英国的控制。1801年，英国通过“爱尔兰合并法”，用收买政策合并了爱尔兰议会，这以后，爱尔兰形同英国的殖民地。根据英国法律，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当选为议员，因此占爱尔兰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事实上成了二等公民，他们虽然可以有选举权，却不能选举天主教徒代表担任议员。这种政治上的歧视不仅为一般人民深恶痛绝，就连信仰天主教的中上层人士也大为不满。1823年，丹尼尔·奥康奈尔创立“天主教同盟”，受到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迅速成为当地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势力。

1828年坎宁派退出内阁后，威灵顿指派菲茨杰拉德接任贸易大臣，菲氏是爱尔兰克莱尔郡的议员，根据法律，他必须在原选区补选一次。菲氏主张天主教解放，得到当地选民的支持。这本来不成问题，但政府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前面说过，天主教同盟此时已是爱尔兰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威灵顿对此十分不快。1828年6月10日，他在上院威胁要取缔天主教同盟，同时又声称：假如天主教同盟自行解散，政府“就有可能做点什么”来满足天主教徒的要求。这使天主教同盟处于两难境地：若解散吧，解放的事业当然就此告终；不解散呢，政府就可以说是天主教同盟妨碍了解放进程，因而为进行镇压提供了借口。威灵顿对自己的这一妙招十分得意，却没料到它把天主教同盟逼入绝境，迫使它背水一战。他们让自己的领袖奥康奈尔出面与菲茨杰拉德竞选，选举中动用了一切政治的、经济的、道义的力量，结果一举获胜，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天主教徒出身的爱尔兰议员。

这次胜利使政府大吃一惊。他们害怕克莱尔选举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各地都选出天主教议员，那么虽说他们不能进入伦敦议会，却足以组成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地方议会，爱尔兰的独立也就难以避免了。事实上，天主教同盟受这次胜利的鼓舞，斗志大增，正准备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爱尔兰的新教徒（主要是英格兰裔地主）害怕失去特权地位，则开始组织武装力量，打算进行反扑。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威灵顿政府不得一反300年的基本国策，于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以此为条件，解散了天主教同盟，保住了爱尔兰。

但“解放法”把火引到了托利党自己身上。党内反对天主教解放的极右派突然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若不是“腐败的”议会制度通过了“解放法”，威灵顿决不能实现可耻的“背叛”！于是一大批“极端派”托利党人转向议会改革，托利党再次分裂。1829年6月2日，布兰福德侯爵破天荒以托利党人的身份提出一项改革案，将70年来几乎一切改革动议都集于一纸。这虽然有点滑稽，却表明政府已孤立无援，处于左右反对派的全面包围中，托利党的垮台指日可待了。

1830年7月，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举国震惊。国内工人罢工，农业工人发动“斯文大尉”运动，更使得政局不稳。辉格党决定在此时提出改革问题，向托利党政府发动总攻。10月31日，辉格党决定由布鲁厄姆于11

月 16 日在下院提出改革案。但不等提案提交，事态就发生急剧变化。11 月 2 日，格雷在上院发言鼓吹改革，威灵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宣称：

我不仅不准备提出任何这种性质的方案，而且愿当场宣布：就我本人而言，只要我在国家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我就认为我的职责是当其他人提出这类方案时进行抵抗。

威灵顿发言刚结束，坐在他身旁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就告诉他：“你宣告了你的政府的垮台。”果然，两星期后的 11 月 15 日，托利党极端派与辉格党、坎宁派一同投票击败政府。次日，威灵顿政府辞职，格雷伯爵受命组阁。

E.P.Cheyney (ed), *Readings in English History Drawn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1908, P.680.

M.Brock, *op.cit.*P.118.

三、1832 年改革

辉格党的改革方案

12 月初，格雷授命达勒姆、罗素、格雷厄姆、邓坎农 4 人起草改革法。据格雷厄姆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从内阁得到的指示是：改革措施要“达到足以满足公众的舆论，为抵御进一步改革提供可靠保证，但又必须以财产为基础，以现有选举权和地域划分为基础，这样才不致冒破坏（现存）政府形式的风险。”

人们对辉格党政府并不抱太大希望。近 10 年来，罗素是辉格党中最热衷改革的政治家，但他在几个月前提出的议案不过是把少数几个席位转给大城市，根本不涉及选举权问题。四人委员会中，只有达勒姆还稍稍得到激进派信任，但这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格雷政府是历届政府中最贵族化的政府。内阁中除两个人外，所有大臣都是大土地贵族，或大贵族的儿子，而那两个不是贵族的阁员，仅格雷厄姆一人就有 2.6 万英亩土地。对这样一个政府，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因此，激进派冷眼旁观，不抱幻想；托利党则镇定自如，量格雷也不会走多远。

但 3 月 1 日政府公布草案时，却使全国大吃一惊。改革派欢欣鼓舞，保守派发誓要血战到底。政府到底提了个什么方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它有 3 条原则：一是取消衰败选邑，把席位转给大城市和各郡。以 1821 年人口普查为据，居民数在 2000 人以下的 60 个镇失去选邑资格，2000—4000 人的 47 个镇各失一个议席，这些议席分配给 1 万人以上而没有选邑权的大城镇，以及 15 万人以上的大郡县。二是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制。除原有选民外，在农村凡是年收入 10 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和 50 镑以上的租约农，城镇选区年值 10 镑以上的房产持有人均拥有选举权。三是减少议员总数，从 658 席减为 595 席。由此可见，这个提案的“中等阶级”性质很重，它基本上满足了中等阶级的要求。

辉格党之所以做如此大的改革，其目的格雷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这件事具有头等重要性。”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只有避免革命才能拯救现存制度。辉格党是贵族，一方面要维持垄断政权的寡头制；另一方面，他们对它的弱点又知之甚深，知道它社会基础不雄厚，在财产和人数方面都很单薄。1830 年事态发展更使他们深信革命形势已经形成，若不立即采取措施，一切都将在革命的狂飙中荡然无存。所幸的是，中等阶级虽已觉醒，劳动人民亦在骚动，但局势尚未发展到中下层人民结盟的地步，所以还没有爆发英国的“七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树中等阶级为敌不如拉他们为友；一旦中等阶级自己得到满足，就会站在财产和秩序一边来，成为贵族制度的卫护士。出于这种信念，辉格党愿意主动后退，让中等阶级进驻自己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格雷才说：“不做点什么是是不可能的，但做得

不足以满足公众期望……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政府对起草委员会的指示，也才有起草委员会的自白：“……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同时立即并永远消除社会上有理智而独立的那部分人抱怨的理由。”

其次，还必须考虑到辉格党自身的利益。罗素曾说过，假如改革后的议会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再来一次改革，那么辉格党就失败了，就要垮台。

“假如按照我过去的计划，加顿和萨勒姆各保留一个席位，那么改革后议会的第一个议案，不就是拿掉这些地方余下的议席吗？”从这一点出发，辉格党认为他们的提案必须是“永久”的，至少经得住40年。在40年时间里贵族制不受新的威胁，辉格党就算坐稳了。

辉格党提案受到全国的普遍欢迎。一般老百姓都对议会辩论十分关心。据记载说，人们往往在吃饭时捧着饭碗到街上打听消息，乡下人则步行几十里进城探问，或几个人合买一份报纸看。方案提出后，激进派领袖纷纷表态：伯明翰同盟于3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向国王和议会发出贺信；亨特原则上表示支持；科贝特被政府指控为煽动农人暴乱，正在等候审判，但他也写文章赞扬法案，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最后，正以分裂国家罪受到起诉的奥康奈尔也宣布赞成法案，使政府得到了爱尔兰的坚定支持。唯一反对法案的是伦敦的工人激进派，这在上文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1831年3月23日，法案以一票优势通过二读，从而进入小组委员会阶段。但4月20日托利党议员盖斯科因的一项修正案击败了政府，这预示法案在三读时可能失败。于是，在辉格党政府要求下，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

大选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的情绪。“法案、法案、完整的法案”这一口号提出来了，改革派到处胜利，反改革派纷纷失败。伦敦的4个议员中本来有一个反改革派，选举开始的第二天，他就被迫退出了竞选。多佛市头一天就选出两名改革派议员，当地长官威灵顿未能控制局势。索思沃克的改革派议员威尔逊支持改革法，但又投票赞成盖斯科因修正案，因此他虽然是格雷的挚友，却仍未能幸免于失败。盖斯科因本人更惨，他在利物浦市当选议员已35年，这一次，选举开始仅10个小时，他就不得不认输。大选中托利党惨败，辉格党则控制了局势。英格兰40郡82席中，辉格党全胜的有35郡，托利党总共只得到6席。许多即将失去选邑权的村镇也选出了改革派议员，他们到议会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投票取消自己的席位。由于国王解散了议会，伯明翰同盟给他写感谢信。在他们看来，“国王……虽不在事实上，却在原则上是同盟的一员，他同意了同盟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正因为如此，伯明翰同盟号召各地保持安定，说对改革最好的支持，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静等国王和政府放手改革！

大选结束后，政府得到134票的多数，下院的绝对优势建立起来了。6月24日，罗素提出第二次改革案，内容几乎与第一次完全一样。在辩论中，尽管托利党拼死抵抗，逐字逐句反复争夺，也尽管皮尔披挂上阵，亲自组织一次次反扑，但法案还是轻易通过，没有遇到多少麻烦。9月22日，法案提

Donald Read, *The English Province*, 1964, P.85.

Norman Gash, *Aristocracy and People*, 1979, P.147.

John Prest, *Lord John Russell*, 1972, P.42.

Carlos Flick, *The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 and the Movements for Reform in Britain*, 1978, PP.55—56.

交上院。

反改革的托利党贵族，此时只有上院可以掘壕据守了，议会改革触犯利益最大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当然要拼死一战，准备借上院否决法案。

改革派的斗争

一旦上院否决法案，辉格党政府应采取什么对策？兰斯多恩认为应当辞职，打退堂鼓，但下院改革派议员举行集会，谴责辞职即是背叛。当激进派议员提出应当册封足够数目同情改革的贵族，以迫使上院通过法案时，辉格党议员又不肯支持了。这种犹犹豫豫的态度使“中等阶级”大为不快，伯明翰的工业家们于是走到了运动的前列。

10月3日，伯明翰政治同盟召开群众大会。上午10时，伯明翰教堂钟声大作，各街道打铃召集居民开会。市民们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连妇女儿童也都关门闭户，到指定地点整队，前往纽豪尔山会场。同盟过去就与周围几十个地区有直接联系，此时为壮大声势，便召请附近约20个镇的代表与会。那天上午，各地同盟纷纷打着自己的旗帜远道赶来，乘车的，骑马的，浩浩荡荡，甚是壮观。每当一地代表敲锣打鼓地进入会场时，在那里的群众便振臂高呼，响声如雷。近午时分，阿特伍德与同盟政治委员会成员前往会场，一路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据大会组织者后来回忆说到会者有10万，一说15万。这是改革高潮开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行动，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

但这次大会并没有对上院起什么影响，10月8日，上院以41票多数否决政府法案，一场人民与贵族的对抗就由贵族老爷们亲手挑起了。当晚，伯明翰各教堂丧钟呜咽，通宵不息；首都改革派报纸套黑框刊载表决结果；消息传到各地，全国哗然，但此时政府却准备妥协了。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托利党贵族中分化出一个温和派，以汪克里夫男爵和哈罗比伯爵为首，称作“动摇派”。他们唯恐长期对抗会削弱贵族的力量，造成政治危机，因而希望两党贵族捐弃前嫌，各作让步，团结一致，拯救宪政。政府也想与这个集团谈判，企图通过某种妥协，使上院通过温和的改革法。但“动摇派”提出以下条件：1. 提高选举的财产限制；2. 保留较多的衰败选邑；3. 不允许市镇居民参加郡县选区的选举，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以保证地主对乡村的绝对控制。很明显，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中等阶级的利益将大受其害。这样，中等阶级才重新想起：辉格党到底是贵族，斗争必须自己去赢得。

因此，在10、11月两个月中，中等阶级的活动骤然加剧。10月12日，在与政府会谈的当天，普赖斯就着手组织首都地区的改革派同盟，月底，成立了“全国政治同盟”。这个组织自称代表“各阶层”，实际上是旧中等阶级激进运动的中心。该同盟成立后，与伯明翰同盟密切合作。此后，“中等阶级”的两个分支就完全统一行动了。10月20日，伯明翰同盟号召各村各镇都成立组织，以加强人民运动的声势。这以后，各地不断有新组织出现。

如果说中等阶级的勃兴已使政府感到不安，那么工人阶级的活动简直就使整个统治阶级如坐针毡了。上院否决法案后，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0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万人集会，抗议上院行径。会上通过要求普选的决议，纯粹是工人的纲领。11月17日，里兹成立了一个工人改革派组织，提出普

选政纲。在博尔顿，工人力量如此之大，以至在当地政治同盟第二次大会上，中等阶级竟退出会场。在伦敦，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也加紧了活动。

工人中还发生了一系列自发行动，首先发难的是德比市。上院否决法案的当晚，该市群众袭击反改革派住宅，导致3人被捕。次日，大批群众包围市监狱，要求释放被捕者，守卫开枪打死1人。于是群众砸开监狱，放出囚犯，接着又去围攻郡监狱。群众与当局的对抗持续了3天，死伤多人，直到军队赶来才镇压下去。10月9日，诺丁汉市也开始闹事，群众举行盛大集会，接着便占领并烧毁了纽卡斯尔公爵的诺丁汉堡。11日，骚动继续蔓延，群众开始袭击工厂、花园等地，12日军队增援后才逐渐平息。类似的骚动在莱斯特、伍斯特、埃克塞特等工业城镇先后发生，但规模最大的是在布里斯托尔。10月29日，市法院推事韦瑟罗尔从伦敦回城主持巡回法庭开庭式。韦瑟罗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反改革派议员，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引起严重骚乱。群众开始搜寻他，袭击他可能藏身的一切建筑。尽管他已爬房顶逃出布里斯托尔，当局也宣读了防暴令，群众的骚动仍无法阻止。军队不得已撤到郊外，暴动持续了3天。其间群众捣毁了市政厅、市议会、监狱、税所、海关、主教官邸、船坞等公共设施，损失估计达30万镑。3天后，军队重新控制局势，群众死伤数百。当军队冲进广场时，发现威廉三世的塑像上竟戴了个自由小帽。

这些骚乱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一个反改革贵族在达林顿附近被人认出来，只得跳下车落荒而逃，结果被堂皇的马车碾成碎片；伦敦德里侯爵被人围住，幸亏近卫军赶到才得以脱险；达勒姆主教被围在官邸里不敢露面；埃克塞特主教府则不得不由海岸警卫队把守防卫；皮尔自知道人怨恨，便在庄园里囤集军火，准备抗变；威灵顿也在住宅窗框上钉了铁条，以防围攻。对辉格党来说，这些无异是提醒他们：后退是不行的，下层已经起来了，万一与中层联合行动，天下就不可收拾了！因此，布鲁厄姆警告说：“假如中等阶级反对政府，想做下层百姓的盟友，甚至只是在动乱时中立或无动于衷，镇压抢劫犯就完全不可能……须知，即使在伯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政治）同盟也是由那些必然站在我们和亨特式、布里斯托尔式的打家劫舍者之间的人物组成的。”因此，稳住中等阶级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稳住中等阶级的唯一方法，就是不从原有立场后退。

布里斯托尔事件还产生一个奇妙的后果，中等阶级害怕了。他们担心万一动乱四起，军队会无力控制，布里斯托尔就是明证。于是他们开始谈论建立一支法国式的“国民自卫军”，以便在工人起义时用以自卫。11月初，伯明翰同盟指定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同盟改组问题。委员会建议按准军事形式重组伯明翰同盟，总部下设支队或连，各配备军事指挥人员。阿特伍德并指示：暂时先不装备武器，但一旦需要，就要能拉出一支队伍。

中等阶级的武装企图引起了工人阶级的警惕，他们认为有产者拿起武器，无非是将枪口对准无产者，于是就越来越多地谈论工人武装的必要性。10月底，“工盟”按军事组织改组，并宣布11月7日召开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团体在各地同时开会，争取普选权，推翻贵族制。它要求与会的工人各带1条2尺长的短棍以显示实力。消息公布后，有产者大惊。“全国政治同盟”立即宣布它也准备武装起来，托利党的报纸则号召贵族拿起武器，保卫教会和国家。这样，当时三种社会力量都号召武装起来，内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格雷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它相继采取了3项相关的措施。一是镇压工人。11月5日政府下令取缔“工盟”预备召开的大会，否则将强行镇压。二是拢络中等阶级，劝说伯明翰同盟放弃武装计划。结果，11月21日同盟宣布不准备武装，政府则宣布一切群众武装为非法。最后，政府为重新取得中等阶级的信任，中止了与托利党“动摇派”的谈判。12月10日，双方最后一次会晤，政府故作冷淡，结果不欢而散。政府的妥协企图到此为止，辉格党终于未敢倒退。两天后，政府拿出第三个方案。和前两个相比，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13日，伯明翰同盟声明对提案完全满意。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英国两次避开了革命危机。

这个法案很快在下院获得通过，并于1832年3月26日提交上院。如果上院再次否决法案，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马上册封50名新贵族，让改革派在上院取得优势；要么辞职，让托利党组阁。辉格党希望第一种前途，但国王未必肯这么干；万一国王不肯，就只有第二种前途了。由于“动摇派”投票支持，法案于4月4日通过二读。但威灵顿早就声明他将率领顽固派顽抗到底，因此当法案进入小组委员会阶段时，摊牌就在所难免了。5月7日，托利党贵族林德赫斯特的一项动议获得胜利，迫使政府立即摊牌。当日晚，内阁要求国王册封足够的贵族以确保法案成功，否则就辞职。次日晨，国王通知政府“接受他们的辞呈”。改革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开始了。

伯明翰同盟本以为改革已绝无问题，直到4月底，他们才觉得事情不太妙，因此决定5月7日召集群众大会，同时决定：一旦法案失败，他们就要“永不终止地运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合法手段，争取更全面更有效地恢复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满足于改革法打算给予的那一些。”大约有10万至15万人参加了大会，同盟二号人物帕克斯在会上说：他相信“假如格雷勋爵被赶下台，或者法案被扼杀，全国各地的政治同盟将3倍、4倍地增长。”他还说，他“但愿”事情不要发展到“用内战和武力抗争的最后手段来争取自由，或是用不必要的革命恐怖来影响英国贵族”的地步，因此，他“恳请上院不要把内战强加给改革派。”

但大会开晚了，大会刚刚结束，政府已经失败了。5月10日晨，政府辞职的消息传到伯明翰，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全城。同盟会员自发向总部集中，默默地守在门口，等待领袖们作出决定。5月10日上午，阿特伍德赶到同盟，他命令会员们摘下身上佩戴的会徽，因为会徽上有英国王冠。下午，同盟在新厦山召开第三次大会，附近人民陆续赶到，聚成近10万人的人群。前两次大会的节日气氛不见了，到会的多是男子，仿佛在应征出战。阿特伍德号召耐心等待，随后写出请愿书，派人立即送往伦敦。

各地改革派反应强烈。5月9日，“全国政治同盟”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议会在辉格党政府复职前停止财政拨款，这一要求立即获得全国支持，各地请愿书都写上了这一条。在5月9日至19日的10天危机中，全国召开了200多次群众大会，呈交300多份请愿书。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各政治同盟，仅9至12日参加“全国政治同盟”的就有5000人。

5月12日，国王宣布由威灵顿组阁，危机迅速激化。当日，各地改革派代表赶到伦敦会商对策，随后伯明翰代表与普雷斯会谈。许多年后，普雷斯

The Morning Chronicle, April 30, 1832.

Alam Bullock and F.W.Deakin (eds), The English Radical Tradition, 1952, PP.104—105.

声称他当时与帕克斯商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约定一旦威灵顿组阁成功，伦敦就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制造动乱，拖住 7000 正规军；伯明翰则乘机发动革命，与全国联系，成立临时政府。

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革命发生与否的重要因素，五月危机是工人态度最积极的时期。也许他们意识到托利党组阁会对他们更不利，因而对改革法的热情突然高涨。5 月 10 日到 18 日，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不断召集群众大会，反对托利党组阁。在会上发言的人措辞激烈，他们提出了许多行动建议，其中包括抗租、抗税、银行挤兑，以及一旦托利党建立政府，就抵制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改革方案等等。会上有人甚至提出“不是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

5 月 14 日，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与工厂主联合召开 10 万人大会，会场就在当年彼得卢大惨案的旧址。由于意识到改革可能前功尽弃，当年无情屠杀工人改革派的曼彻斯特工商业主被迫在口头上承认了彼得卢大会的基本原则——普选权，这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据记载，双方的协议为：“一方承认人人有权为议会所代表，另一方则把目前的要求限于改革法，保证不提出基于更激进原则上的改革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连一贯反对工人阶级支持改革法的《贫民卫报》，也表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只要中等阶级把工人当作“朋友和兄弟对待”，“真心诚意地主张完整的法案，并坚持争取自由人的公正、平等和真正的权力”，“我们就将帮助他们取得自己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直到 5 月 12 日，即宣布威灵顿组阁的那一天，《贫民卫报》还在号召工人阶级“袖手旁观”，“不参加战斗”。可见一个托利党军政府的现实危险，正在把利益不同的各阶层都联合在一起。在整个改革法斗争中，只有五月危机时表现出工人阶级愿意与中等阶级结盟，并采纳共同的纲领。同时，也正是在五月危机中，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承认工人阶级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说，五月危机发展下去，很可能出现法国那种中下层人民联合作战的情形，因此这个时候是英国最接近于发生革命的一个时期。

面对“暴动”或“起义”，中等阶级实际所做的仅仅是经济制裁。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普赖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就贴满伦敦内外，并迅速传向外地，引起大规模黄金挤兑。据估计，英格兰银行原有黄金储备 300—400 万镑，10 天内提出 160 万镑，几近一半。有人说 5 月 18 日格雷觐见国王前，英格兰银行代表请他转告：若危机延续下去，4 天内黄金储备就会枯竭。因此后来有人说威灵顿是被黄金挤兑挤掉的，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五月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表面上局势高度稳定，这与前一年的十月危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平静使统治阶级格外害怕。统治阶级第一次感到局势捉摸不定，深怕不知不觉中爆发革命。这一切又因改革派议员加强了议会攻势而显得更加可怕。5 月 14 日，下院通过决议，宣称下院将永远不接受由托利党政府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这使人想起长期议会。下院表明如果托利党组阁，议会将和他们发生持久冲突。同一天，伯明翰同盟发表“庄严宣言”，要求国王召回格雷，号召全国人民在宣言上签字。宣言送往全国，指望得到 400 万人的签名。

Poor Mans Guardian, May 19, 1832.

M.Brock, op.cit.P.295.

Poor Man's Guardian, May 12, 19, 1832.

但这已经不需要了。托利党首领在议院内备受围攻，在议院外压力重重，皮尔不肯入阁，威灵顿终于承认组阁失败。5月15日，威灵顿交回委任状，建议国王召回格雷。国王则在辉格党的强大压力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一旦需要，他就会应内阁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册封任何数目的贵族。此后，有影响的托利党人都退出上院。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便激流勇退。事实上不退也没有其他出路。

1832年6月4日，法案在上院通过，3天后得到国王批准。经过18个月的艰难奋战，改革终于成功了。

改革的结果

根据改革法，55个衰败选邑失去选邑资格，另外30个选邑各失去一个议席，这些被剥夺的席位有的分给较大的工业市镇，使工业资产阶级能够向议会派出代表；有的则分给郡县，使人口较多的郡可以多选出一些议员。在选举权方面，除原有的40先令自由持有农外，农村选区收入在10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长期租约农，以及收入在50镑以上的短期租约农及交租50镑以上的佃农也获得了选举权。在城镇选区，选举资格划一为年值10镑以上的房产持有人，原有的选举权可酌情保留。选举权方面的改革使城乡中等阶级大部分成为选民，从而获得了政治权利。在工业城镇，工业资产阶级控制了本地选举。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完全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由于1832年的改革，全国选民人数从1831年的48.8万人上升到1833年的80.8万人，由占人口比例的约2%增加到3.3%。

1832年改革是人民斗争的成果，英国人为争取改革成功，已前赴后继地战斗了好几代，其中有牺牲，有流血，有痛苦，有眼泪，但最后是人民的意志胜利了，人民的意志不可抗拒。1832年改革又是各阶层共同奋斗的结果，从辉格党贵族到中等阶级到苦难的工人阶级，尽管他们要求改革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在改革这一点上结为联盟，使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次改革是英国中下层人民为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一次联合行动。在改革中，各阶级都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战，因此改革过程本身就充满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然而改革只使中等阶级取得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他们置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这以后，政治斗争的焦点不再是“人民”与土地贵族的矛盾了，而是没有权利的劳动人民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的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英国的阶级阵线改变了。

通过改革，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等阶级”）取得了选举权，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政权仍在贵族手中，资产阶级仍处于从属地位。但贵族不再能垄断政权了，资产阶级不满足于自己的配角角色，他们从已取得的成果出发，发动新的斗争，争取更大的权利。这是理解1832年改革后，资产阶级发动新攻势（例如反谷物法运动）的关键所在。

工人阶级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出力最大，结果却一无所获。他们被整个剥削阶级排斥在权力之外，成了唯一无权的阶级。这使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继续斗争，于是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之所以是纯粹的工人阶级运动，其原因大概也就在此。

1832年改革是一次和平的改革运动，它证明在工业资本主义443的条件

下，改革之路在英国仍能行得通。这就为英国以后的历次改革开创了先例，以后的改革也就不再这么艰难。1832年改革打开了通向民主之路的大门，但民主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它还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第四节 19 世纪初的英国文化

一、大卫·李嘉图和边沁

大卫·李嘉图和边沁是 19 世纪初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他们的理论为工业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摇旗呐喊，因此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们的学说也越来越具有官方的性质，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地位的资产阶级学说。

李嘉图（1772—1823）是伦敦交易所一个犹太经纪人的儿子，家中十分有钱，14 岁时他就随父亲去交易所做事，深得其中的奥妙。后来由于与信基督教的女子恋爱，遂与家庭决裂，一个人单独去做交易所生意，在这些活动中大发其财，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以后，他研究自然科学，与别人共同创建地质学会，但很快就转向经济学研究，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819 年，他当选为议员，在议会中屡次发言攻击谷物法，主张自由贸易，是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的代言人。

李嘉图的成名之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发表于 1817 年。这本书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是一本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李嘉图继承亚当·斯密关于价值的学说，认为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但他指出在这方面亚当·斯密并不彻底，因而造成经济学理论的混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在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中发展了他的理论，指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认为在相同单位时间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不同。他还把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指出只有直接劳动才能产生价值，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去。他还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每个生产者实际上所耗费的劳动，而是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从这一点出发，他指出资本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作为资本的形式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原有产品中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新的价值只能由活的劳动才能产生。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工人阶级所接受，成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根据。但李嘉图并不考虑利润的存在是否合理，在他看来，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资本家既在生产中投放资本，理所当然应取得利润。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地久天长、从来就有的合理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之处。他认为资本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之，正因为如此，他不区分生产者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而把它们一概称为资本。

李嘉图的研究重点在产品分配方面，正是通过这些研究，他天才地看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三大阶级的对抗。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说：“劳动、机械和资本在土地上面联合使用，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的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地主有土地、资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资本、劳动者则以劳力耕作土地。”全部生产物就在这三大阶级中进行分配，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分给地主，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分给资本家，劳动者则取得工资。他认为“这种分配，支配于一定法则，确定这种法则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工资是由工人及其家庭所消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中华书局，1949 年版，“原序”第 1 页。

耗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利润是支付工资后商品价值中所剩余的部分，地租则是农产品中超过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他认为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这三种分配形式在量上此消彼长，这就使社会上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互相对立。他指出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工资增长则利润减少，利润上升则工资降低，因此工人和资本家利益不同。他认为地租是上、中等土地的出产物多于劣等土地出产物的结果，地主从这个差额中获取地租。然而由于人口增多，粮食需求量不断增长，最劣的土地也必须耕种，这就使地租必然增加，并造成农产品价格提高，而这就会导致工人的货币工资也随着增加，于是资本家的利润就会减少，因此，资本家和地主间也存在利害冲突。但是在地租和货币工资都有增长时，地租取得真实的增长，工资却只有虚假的上升。因为工资增长跟不上谷价的上涨，结果货币工资增加了，实际工资却在下降，工人对谷物的支配权反而减少。所以，工人与地主的利益也互相对立。这样，李嘉图就看出了当时三大阶级彼此对抗的三角关系，对当时的阶级状况作出了真实的描述。但李嘉图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地主阶级，因为在他看来，地主取得地租纯粹是不劳而获。只要谷价上涨，即使最劣质的土地投入使用，都能使自己的收入不断增加，因此，这是一种不义之财，而且地主阶级还利用政权人为地提高谷价，增加自己的收入。与此同时，地租增加会使利润减少，实际工资收入也会减少，这样就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而工业才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李嘉图是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在他的社会冲突模式中，资本家和工人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地主阶级。李嘉图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李嘉图是经济学中为工业资产阶级呐喊的代言人，那么在政治学中就要数边沁了。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伦敦一个讼师的儿子，12岁就去牛津学法律，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对当时流行的习惯法规则十分反感，于是决定致力于法学研究，企图创立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他一生写了许多法学和政治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道德与立法的原理》、《惩罚与奖励的理论》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功利主义的政治学说，认为这是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出发点。

边沁反对自然权利的政治学说，认为自然权利的概念混乱不堪，没有明确的定义，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对“社会契约”也提出质疑，认为国家的建立是靠暴力，而其延续是靠习惯，根本不存在“社会契约”这种东西。既然如此，理想社会何以实现呢？他认为必须依靠功利。边沁从“苦”与“乐”着手阐述功利。他说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追求幸福是一切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本能，因此，避苦求乐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然的法则。而这种避苦求乐的天性就是“功利”，于是功利便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基本标准。但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有可能与别人的“乐”发生冲突，人类的欲望并不总是和谐的。而且，由于道德等原因，人的行为还会有对错之分，错误的行为并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既然如此，用什么来判断人类行为的正误呢？由此，边沁提出他的学说中最有名的一个论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这既是判断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在判断个人行为时，只要其行为不与这根本的准则相冲突，就应该被看作是合理的；而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也必须以此为标准，为社会上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福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实际上是在为工业资本主义寻求理论基础。根据边

沁的说法，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只要他的活动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利，即使其出发点完全出于私利，他的活动也获得了合理的基础，而工业资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情况正是如此。国家若推行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也能够取得相同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边沁学说反对的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他在为自由竞争争一席之地。

边沁认为个人的功利与社会的功利也可能发生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功利主义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边沁认为在一切利益中只有个人利益是真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集体的幸福寓于个人幸福之中，无数个人在追求自身的幸福时，就会形成一种总体幸福。所以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虽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却是可以沟通的，而沟通的手段就是国家。由此边沁的功利主义进入第二个论题：关于国家。边沁认为国家要沟通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就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出发制定政策。根据这个原则，他主张积极的政治参与，主张人人都有选举权，让每一个人的要求都能明确而及时地反映出来，以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愿望。他因此支持议会改革，宣扬民主政治，反对不合理的议会选举制度。边沁的这种态度曾给中等阶级激进派以巨大鼓舞，并为中等阶级的激进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大多数中等阶级激进派都是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大力宣传议会改革的。在这方面，边沁有重大的影响。在边沁的政治思想中，国家除了能沟通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外，还具有能干涉个人利益的一面。他认为国家和法律就本质来说都是一种恶事，是万不得已才建立和制定的。但国家和法律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国家，就不能维护社会和平，没有法律，就不能保障个人安全。法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律代表的是惩罚，即“痛苦”；人在避苦求乐的追求中惮于受法律惩戒之苦，就不得不遵守社会准则，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但国家既有这种强制的性质，也就有可能用强制的手段来干涉每一个人的幸福，所以国家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不妨碍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为此，边沁认为国家的立法只应针对“公益的道德义务”，也就是社会的事；而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即私人生活方面，国家不应横加干涉，而应让每个人自己去处理。由此推论，国家就不应该对工作时间、工资数额、劳动条件等等个人的事务制定立法。正因为如此，功利主义者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自由放任”，支持济贫法，反对工厂法。因此，功利主义深受工人阶级的怀疑。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功利主义的阶级性质十分明确。它坚决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社会特权，并不顾及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政治学说上的反映。但功利主义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它不仅为反对贵族垄断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且体现了正在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它又是理性主义的突出成果，它把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显然比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千年王国”的到来上的神学教谕高明得多。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罗伯特·欧文

英国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法国相比要弱得多，其最高表现是罗伯特·欧文的理论和实践。然而在欧文之前还应该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托马斯·斯潘斯（1750—1814）。

斯潘斯 1750 年出生在太因河畔的纽卡斯尔。父亲是织网工，后来贩卖五金器具。他自己给人当过簿记员，以后又当教员，办过一个学校，最后到伦敦谋生，靠开书亭度日。从 1795 年起，他就不懈地宣传自己的土地计划。他把土地公有的主张印成传单，写成墙报，四处散发，但他的宣传收效甚微。他活着时默默无闻，他死后，才由其信徒们扬出名来——倒不是因为传播他的学说，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矿泉地大会事件和卡图街密谋。

斯潘斯的思想闪烁着天才的光辉。他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之前，将没有真正的平等可言，他把财产公有叫作“真正的人权”。1775 年，他以此为题第一次表达了公有制思想：“土地财产权和人民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下必然平等，对这一点应当说很少有人会愚不可及地去否认的。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人民所共有，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地产，拥有用这份地产上的动物、植物和其他出产去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生存的所有自由。”他为社会开列了一个救世良方——土地公有计划。他的土地公有制是一种教区集体所有制，教区以全体居民的名义占有土地，但不得买卖。教区的土地可以招标出租，教区向租种者收取地租。地租收入中一部分用来修路造桥、开办学校、设置医院和图书馆、照管病人及失业者，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福利事业，其余的款项则在教区一切居民中平分，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在这种公有制的基础上，教区将成为国家的基层组织，由全体居民共同管理。教区居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此外，每个教区还有权向全国代表机构派出一名议员，由全体居民普选产生。中央政府只拥有国防、仲裁、协调等几项极有限的权力，其他社会职能全部由教区执行。从生产资料公有出发，斯潘斯推导出一个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

如果说斯潘斯代表的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到罗伯特·欧文时，社会主义已开始与工业社会联系起来。

欧文是威尔士蒙哥马利郡人，1771 年出生，父亲是工匠。他小时候只读过初级小学，然后就开始当学徒。1781 年，他来到伦敦独立谋生，后来又辗转回到林肯郡的斯坦福城，最后回到伦敦，在一家铺子里当店员。他这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下班后连站都站不住，但他仍利用休息时间看一些书。1787 年他来到棉纺织业的中心曼彻斯特，先给别人当雇员，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办一个小工厂，此后又独自经营过纺纱厂。这时，他的经营才能被别人发现，于是就被请到一家有 500 人的大工厂当经理。他在此如鱼得水，工厂被他经营得蒸蒸日上，成绩斐然，在工业界崭露头角。随后，他又和人合伙组织公司，经营工厂。1799 年，他以公司的名义买下苏格兰的拉纳克纺纱厂。这是个有上千工人的大厂，位于拉纳克镇的克莱德河畔。1800 年，欧文正式来此担任经理，他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卓越地位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欧文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因此有一种顽强不拔的精神。但他和其他许

多在工业革命中发迹的人不同，他对积累个人财富并不感兴趣，童年的痛苦经历以及对工人苦难的耳闻目睹使他很早就立下志向，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创立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办厂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想用自己的实践为别人树立一个样板，证明工业的进步应该也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幸福。他把新拉纳克厂办成巨大的试验场。他试图表明：资方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可以调和，只要经营得当，企业主在大大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时候，仍可以为自己赚取大量利润。他对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使用童工，为儿童开办学校和托儿所；开办商店，为工人提供便宜的生活品；修建工人住宅，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改进卫生设备；建立食堂，发放抚恤金，设立互助保险，提供医疗服务等等。由于经营得当，实行这些改革时，企业不仅没有亏本，而且产值提高一倍以上，工厂获得大量利润。试验的成功不仅震动了英国，而且名闻欧洲。于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纷至沓来，他们怀着好奇的心理来看新拉纳克这个尤物，看它如何能既取得利润又优待工人，欧文因此而成为尽人皆知的大慈善家。

欧文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慈善的目的，而是为证明他的社会理论。他看到工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与前景，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却是无穷的苦难和邪恶。他认为这些都是“人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性格”这种荒谬的论调所造成的，因为这种论调给富人提供借口，认为穷人的苦难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好，他们自我放纵，不加约束，所以得到应有的报应。欧文说：“人的性格毫无例外地总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只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正确的引导，任何人都能够从良弃恶；而现在在工业区流行的贫穷、罪恶和道德败坏，只是因为工厂主不关心工人的生活，给他们制造恶劣的环境才造成的。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样板能说服一切富人，让他们共同努力，为人类创造出较好的生活环境。他在1812年—1814年所写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就是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他在新拉纳克厂开办学校，还有各种为成人设置的“陶冶性格”的机构，其目的就是证明性格是由环境造就的。欧文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这是欧文主义的一大特色。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经济萧条，失业现象严重，济贫税大大增加。欧文认为社会有办法解决失业问题，而不必增加济贫税负担。他在这时提出建立“合作村”计划，引起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的注意。因为这也许可以不让游手好闲的穷人领取救济，而让他们到合作村去自食其力。但这时欧文已认识到不合理社会的根源是竞争，而造成竞争的，是一贯被看作天经地义的私有制。1817年，他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和盘托出他的思想。他坦率地表明合作村计划不仅是为了解决失业，而且是为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以取代迄今为止一直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存社会。从这一天起，他的说教就不再为上层阶级所欢迎了，在他们眼中，欧文从慈善家变成了狂人。这以后，欧文的的活动就不再具有全社会的性质，他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开始认为机器的使用造成了贫困，但罪过并不在机器本身，造成工人苦难的是机器的错误使用，是机器与人的竞争，是人与人的竞争。他说，当资本家发现“机器比人力便宜”时，“人就被解雇，人的劳动的价值因而迅速下降，接着一切商品的价值几乎都跟着下降了。这样一来，马上就带来了普遍的贫困，这是每

时每刻都使你们受苦受难的基本原因。”但资本家为什么不顾工人的痛苦，一意要用便宜的机器去代替人呢？这是因为现存社会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这种个人利益的原则，引起了人类的一切分裂……造成了忿怒与罪恶的情绪，以及人类直到现在所遭受的罪恶与苦难。”这个原则“本身就是贫困的唯一原因。如果没有这种原则在起作用，财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早就不会成为争夺的目标了。”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消除贫困的方法不应是过去提倡的国立教育制度和慈善试验，而是消灭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的合作：人们在合作中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样，欧文就从博爱主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一阶段，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清楚地表现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在这篇论文里，他第一次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发展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劳动创造了一切价值，但工人消耗的产品价值要比他们创造的少得多，在这里有一个差值，这就是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正是利润的来源。但迄今为止，创造了利润的工人阶级却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就应该实行公平的分配，消除剥削，让劳动者享有全部劳动产品。他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合作村”的计划，希望劳动者的合作可以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以排斥资本在生产中的垄断地位。

他为“合作村”设计了详尽的方案，其原则是“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财产公有根本的特征。“合作村”既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又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农、工、商、学统一在“合作村”组织中。每个成员都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又共同消费劳动产品。“合作村”中全体成员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管理公社事务。显然，欧文是把“合作村”当作新社会的基石来设计的。为了使他的计划具有吸引力，他甚至为合作村设计了占地大小、人员多少、建筑物的分布、式样等等各种细节。按照他的设计，“合作村”将成正方形，中间是主建筑物，为公共场所，四周是住宅、饭堂、托儿所等，外围是花园，最外层是大片农场。但正因为他把这一切都设计得太细了，因此他的计划就显得特别不现实，始终具有空想的性质。

合作村计划并没有在英国得到多少支持，欧文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受旧社会的腐蚀太深，于是便满怀愤恨地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实行他的宏伟计划。1824年，他从宗教派别拉普主义者手中买下印第安那州的“新和谐”村，开始为期4年的社会主义试验。起先，这个试验呈现一派兴旺的景象，移民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其中许多人是仰慕欧文的大名，到这里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移民中派别繁多，各有各的想法，没有统一的思想，在如何办好“新和谐”村的问题上总是不能统一。欧文企图像在新拉纳克一样，用家长制的指导方式来维护统一，结果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各派四分五裂，“新和谐”村濒临瓦解。欧文对此大失所望，于是把4个儿子留在那里继续维持局面，自己回英国寻找别的出路。“新和谐”村尽管以失败告终，它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第一次伟大实践。这以后，社会主义不再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一种有实践意义的真实存在了。

1828年欧文回到英国时，发现他在英国的信徒们已经把他的合作思想解

《在伦敦中心区酒家的讲演词》，《欧文选集》，上卷，第252页。

《致拉纳克郡报告》，《欧文选集》，上卷，第324页。

释得走了样。欧文的合作思想在手工工匠中传播最广。他们从欧文的思想中吸取灵感，决心用合作来改善工人地位，避开中间人的居中盘剥。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消费问题上，于是就出现一大批消费合作社。工人们自筹资金，建立商店，用批发价格购进货物，优惠出售给社员，同时将商业活动赚取的利润作为集体积蓄储留起来，指望这种积蓄最终可以买到足够的土地，让社员们迁徙过去进行耕作，摆脱工业资本主义的厄运。除了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外，还有一些生产合作社，是失业工人或受大工业排挤的手工工人为抵制资本的压力而联合起来的生产性组织。它们力图不让资本在生产中插手，因此更接近于欧文的本意。然而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并不多，欧文回国时碰到的主要是那种走了样的合作运动。此外，工会运动也在1824年之后蓬勃发展，在1830年前后进入高潮。尽管欧文清楚这些运动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社会理论，他仍然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希望把它们引导到自己设想的方向上来。

欧文设想改造社会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造生产部门，二是改造流通领域，目的都是把资本从经济领域排斥出去，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和流通。1832年，他创办了“全国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地址设在伦敦的夏洛蒂街。交换市场发行劳动券，用劳动券来取代货币。但劳动券的面值不使用通用的货币单位，而是“1小时”、“2小时”、“5小时”等，体现了欧文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投入市场的商品首先要按劳动时间估价，根据这种估价发给相应的劳动券，作为所花费劳动时间的凭证，持券者可以随时到市场提取等价的其它商品。劳动市场引起工人的很大兴趣，伯明翰、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劳动市场对解决生产合作社的原料和销售问题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可以使个体手工劳动者免受商业资本的盘剥。在1829年—1832年间，合作运动发展很快。据估计，到1832年6月，全国合作社总数已有400—500个。1833年，召开了全国合作社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种合作社、工会和欧文主义宣传团体。欧文在会上建议成立“全国生产阶级道义总联合会”，即全国总工会，用这个机构来指导全国生产，一举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他想把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在合作生产的基础上合而为一。

但根据这个建议最终出现的组织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原先各工会的联合会。这时，各地区各行业已经有许多地方性的行业工会，它们在尖锐的劳资冲突中日益感到势孤力单，迫切要求实现联合。1834年，“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它的章程规定：“虽然联盟的目的首先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反对工资的继续下降，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但是联盟的终极目的，应当是采取一些措施，使社会上无知的、寄生的和无用的人实际上不可能……占有我们的劳动果实，以便确立基本的劳动权和人权。因此盟员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建立另一种秩序的工作中互相支援和彼此协助。”也就是说，它把建立协作、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的目标，维持工资只不过是眼前的利益而已。由此可见，它在理论上还是多少接受欧文的观点的。大团结工会成立后发展迅速，许多地方性工会表示愿意归并，其人数迅速增加。它很快就号称有百万会员，但从它的帐簿上看，实际交纳会费的只有1.6万人，其中多数集中在伦敦。

欧文虽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不主张阶级斗争，甚至根本反对阶级

斗争这个概念。他始终想通过教育手段来说服上层阶级与劳动群众一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大团结工会成立之初，他并没有参加进去。大团结工会成立后，阶级斗争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展起来。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都借助工会进行罢工。雇主则以停业来对付工人，并要求每个工人立保具结，保证不参加工会，否则就不予以雇用。辉格党政府也积极支持雇主，指示地方政府要严厉压制工会的活动，促使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罢工此起彼伏，还有人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雇主对此顽强抵抗，工会很快就发现其基金枯竭，无力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不久，曼彻斯特有6名农业工人因组织工会被捕，法庭判其流放7年，这对工会是严重打击。欧文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出面领导工会，担任了大团结工会的主席。工会资金告罄和曼彻斯特审判案使工会运动陷入低潮。1834年年底，大团结工会已濒临瓦解。欧文看到它难以继续维持，便突然宣布它不再存在。

这时，大多数合作社也因资金周转问题而解散，劳动市场也在1834年关闭。这以后，欧文全力以赴想重振他的“合作村”计划，并确实建立了一些“国内移民区”。但这些活动也不能维持很久，欧文主义越来越变成“理性的宗教”。欧文主义团体几经易名，最后改名为“理性宗教者协会”。他们向各地派出许多“传教士”，逐渐成为宣传、慈善性质的团体。欧文本人自1835年以后已不再参加实际的工人斗争了，他写了一些书，又进行过一些“合作村”的试验。1858年11月17日，欧文在家乡纽敦逝世。

欧文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欧文不仅设计了社会主义的蓝图，而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人阶级来实现，因此积极地投入并指导英国工人运动，是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从欧文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过许多有益的教诲。欧文的思想对后来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一定影响，欧文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第八章 宪章运动时代的英国

第一节 经济和社会

一、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经济的发展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结束。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经过工业革命,原来只有零散村落的地方现在出现了繁荣的工业区,新兴的城镇出现了,工业的发展把大批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中来,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750年英国只有两座城市的居民在5万人以上,它们是伦敦和爱丁堡;1801年已有8座5万人以上的城市;1851年有29座城市在5万人以上,其中有9座城市超过了10万人。居民的职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801年人口调查时,在密德塞克斯、沃里克、约克、兰开郡等各郡受雇于工业和商业的人口有50%至60%,而在柴郡、莱斯特郡、诺丁汉和斯塔福德郡至少有50%的居民在工业部门中工作。工业中使用的机器数量在与年俱增。纺织工业使用的动力织机在1813年是2400台,1829年增加到5.5万台,1833年增加到8.5万台,1835年增至10万台。

英国工业生产在19世纪前50年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在拿破仑战争以后25年间,棉织品的生产以每年6—7%的比率增长。30年代中期棉织品的出口占英国出口商品总值的二分之一。1820年—1845年,英国工业产品的输入额大约增长了40%。

英国的工业分布也发生了变化,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和科尔比附近的南斯塔福德煤田,北部纽卡斯尔、兰开郡和约克郡,以及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威尔士的南部煤铁产区成为英国新的工业中心。

30—50年代英国的铁路有很大发展。在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建成以后,自1825年至1835年间,议会通过54项铁路条例。在1834年6月英国通车的铁路已有1900英里。

在铁路发展的同时,英国的冶金和采矿业在这个时期也有很快的发展。30年代初英国铁产量年均为65—70万吨,1835年左右年产量将近100万吨,1840年—1841年为150万吨,1847年—1848年为200万吨。

从30到50年代,英国产品的出口额有很大增长。1825年—1830年,不列颠和爱尔兰出口商品额平均为3500万镑一年,1845年—1850年平均出口额为6100万镑。

Eric 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15—1945*, 1979, P.18.

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2, P.489.

E.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P.56; D.J.Rowe, *Chartism and Spital-field Silk-Weavers*, in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 Dec.1967, P.483.

E.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PP.68—69.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525页。

克拉潘:前引书,第587页。

二、自由贸易运动

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理论实行了禁止进口、鼓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对于谷物出口实行免税，并予以奖励。其目的是保证地主阶级的高额利润。1815年议会制定的谷物法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国外廉价谷物进口，以保持国内市场谷物高价为目的的谷物法严重损害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便以争取自由贸易、废除谷物法为口号，掀起一场运动，旨在改变政府的经济政策。

“自由放任”口号是19世纪以前在法国提出的。它在英国提出则稍迟一些，但最早在英国提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则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出版）出版两年后当选为议员进入英国议会下院，自由放任理论则得到英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护。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实现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各种组织也出现了。

1820年以曼彻斯特商会为据点形成了曼彻斯特学派。它的成员不是理论家，而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商人和工业家，以科布登和布莱特为领袖。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国家对商业和工业不要过多的干涉，结束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谷物法，结束旧的殖民体制。这一派的刊物有在伦敦发行的《经济学家》杂志和在里兹发行的《里兹使者报》。1820年该派曾向下院递交了一份要求自由贸易的请愿书。

1836年底在伦敦成立了“全国反谷物法协会”。参加者有自由主义和激进派议员乔治·格罗特、休谟等人。该协会的机关报是《太阳报》，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支持。

1838年9月一批工厂主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科布登和布莱特是它主要的领袖。1839年1月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次大会，来自36个城市50万反谷物法分子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同年3月正式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它把以合法手段建立地方组织、发表演说、印发传单、进行议会请愿以废除谷物法作为自己的任务。反谷物法同盟设立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曼彻斯特。从1839年起，反谷物法同盟以城市为重点展开了反谷物法的宣传工作。在1841年的大选中，反谷物法同盟的成员科布登和鲍林当选为议员。反谷物法同盟在活动中游离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外，努力争取工人群众对它的支持，但工人阶级认为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运动，左翼工人的组织始终持抵制态度。

19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已有过一些自由贸易的迹象。1823年—1825年，曾任小皮特政府财政大臣的哈斯基森作为内阁成员进行了商业政策改革。他赋予北美以商业贸易的自由，并在1825年通过“互惠法令”，把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有国家。他还进行了关税改革，降低了几乎所有工业制造品的进口税。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最后一次延期20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对华贸易改为自由贸易。

1841年底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组阁执政。皮尔虽系托利党人，但出身纺织业主家庭，信奉自由贸易学说，属托利党自由贸易派。随后，皮尔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修改了1828年的谷物法，对谷物税实行调节制。这个

谷物税调节制打击了投机，但尚未实现自由进口谷物。在此同时，皮尔还进行了所得税改革。

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近代社会结构趋于成熟的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内部的成份和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也已接受自由贸易理论。自由贸易政策势在必行。1845年秋季开始了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爱尔兰马铃薯病虫害，酿成大灾荒，大量饥民流离失所。这年10月皮尔召开内阁会议，建议暂停实施谷物法，召开议会，但未取得一致意见。于是，12月5日皮尔辞职以示抗议。随后，辉格党领袖罗素组阁失败，皮尔再次出山，于1846年1月召开议会，提出他的废除谷物法的提案。这一法案得到托利党和辉格党中自由贸易派和激进派的支持，在6月24日通过上院三读，成为法令。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全面放弃保护关税政策。在谷物法废除之后，1849年6月26日辉格党政府废除了航海条例大多数条款。

作为自由贸易政策胜利的产物，曾提到两个有世界影响的事件。1847年9月中旬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经济学家会议。这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弹冠相庆的聚会，会议的中心是“自由贸易的益处”。来自欧洲各国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有鲍林、汤普逊、布朗，《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詹姆斯·威尔逊等。他们鼓吹说自由贸易可以实现所有阶级的兴隆和持久的世界和平。第二个事件是伦敦1851年召开的国际博览会。1851年5月1日国际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开幕。这座巨大的建筑几乎全部是用玻璃建造成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精良的工业品陈列其中，博览会持续了6个月，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地的600万人参观了博览会。博览会的召开显示了中等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被视为“世界工厂”。

J.A.R.Marriott, *England since Waterloo*, P.175.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21页。

第二节 社会改革运动

19 世纪 30—50 年代是英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最后阶段。英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在这个时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同时也猛烈地冲击着旧的经济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新制度建立过程中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劳动群众带来剧烈的阵痛，同时更暴露出其根本性的弊病。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英国各种改革派别和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历史学家曾把这个时代称为英国的改革时代。投身当时改革运动的不仅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有工会运动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持不满态度的土地贵族，改革派别极其庞杂。投身改革运动的各阶级和各政治派别时常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彼此的政治社会见地相去甚远，形成一种百舸争流的局面。

一、工厂立法改革

反对非人道的压迫工人的工厂制度的运动早在 18 世纪末就已开始。到 19 世纪 30—50 年代发展到高潮并取得了一系列立法成果。从争取工厂立法改革运动参加者的成份来看，有 4 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第一类参加者是在手工工业时期中工人中待遇较优裕的上层工人，如在密德兰地区使用编织机的工人、约克郡的剪羊毛工和梳绒工、广大手工纺织机工人。他们在工业革命前有手工技艺因而处境较优越，工业革命后机器的使用给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打击很大，收入骤减。这一运动的第二部分参加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改革者，他们中有沃林顿的约翰·艾金、曼彻斯特的托马斯·珀西瓦尔等。他们很早就在为工人的健康而呼吁，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注意。第三部分参加者是英格兰北部的一批教会人士，他们主要是国教会教士，旧式的监理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士也有一些参加这一改革运动。这一派在工厂立法改革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的工厂立法改革的领袖奥斯特勒便是一个新教徒。第四派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土地贵族反对工业资本主义情绪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中有好几个文学家，如萨缪尔·柯勒律支、罗伯特·骚塞、威廉·华兹华斯，此外还有里兹的亚麻商人萨德勒、“青年英国”的成员亚历山大·科克伦等。工厂立法改革运动的主要领袖是托利党人和教会人士。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约翰·摩莱曾评述说，工厂运动“是乡绅和工厂主广泛斗争的一个部分，托利党把劳动者的状况作为其笑柄，他们利用工厂状况这个笑柄作为反驳工厂主的理由。”马克思在 1853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说：“土地贵族受到资产阶级在改革法案、废除谷物法的打击和挑战，用强迫议会通过 1847 年的十小时法案进行报仇，这就是这场论战的‘秘史’”。

1802 年托利党议员罗伯特·皮尔爵士提出了“关于徒工的健康和道德的法令”，把棉纺织业徒工的工作日定为 12 小时。1815 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开始为争取童工每日 10 个半小时的工作制而努力。同时，工会领袖约翰·杜赫蒂也积极地为改善工人的处境而斗争。1830 年 10—12 月，奥斯特勒在《里兹使者》上发表了关于揭露“约克郡奴隶制”的信，揭露了童工每天工作 13 个小时的悲惨处境，在英国社会中产生很大影响，使工人状况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832 年春，在哈利法克斯、里兹、布雷德福等地工人成立了“缩短劳动时间委员会”，投身于争取工厂立法改革运动。1832 年 3 月 16 日萨德勒提出了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他成为工厂立法运动最主要的组织者。在议会中，托利党领袖阿希利积极支持这一法案。1833 年议会通过一项工厂法，它规定在 13 岁以下的儿童，除在丝厂准许每天工作 10 小时外，在其它纺织业部门中不得每天工作 9 小时以上或一周工作 48 小时以上。凡 9 岁以下儿童除在丝厂外，不得在任何其他工厂劳动。13 至 18 岁的青少年不得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 69 小时以上，13 岁以下的儿童除劳动外每天应当学习 2 小时。法令还规定设立巡回视察员 4 人，监督本法令的执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人们满意。1833 年 10 月奥斯特勒的支持者创立了工厂改革协会，11 月罗伯特·欧文和菲尔登创立了促进全国革新会社，继续推进工厂立法运动。从 1834 年开始，工厂立法改革运动和反对新济贫法运动

发生交错，奥斯特勒一派和工业区原先积极投身工厂立法改革运动的工人群众转而投入反对新济贫法运动。宪章运动的爆发则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工厂立法改革运动暂时低落了。1842年夏季，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爆发了以“拔塞”运动为重要斗争形式的50万工人大罢工，震动了英国政府。第二届保守党皮尔内阁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于1844年通过格拉姆提出的一项法令，规定8—13岁的儿童每天工作6.5小时，外加3小时教育时间，13—19岁的青工和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1847年5月十小时工作日的提案，在下院通过，6月8日“十小时法案”得到王室批准成为法令。以后在1850年和1853年又通过两项工厂立法，有效地限制了所有纺织工人的劳动时间。工厂每天最多开工12小时，女工和童工每周工作不超过58—60小时，周日每天不超过10.5小时，周末不得超过7.5小时。这是工厂立法改革运动的一个胜利。

二、反对新济贫法运动

反对新济贫法的请愿是由于英国议会修改济贫法而引起的反抗运动。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到 18 世纪英国一直存在着大量无业贫民，圈地运动、物价上涨，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后采用了机器，给纺纱工和手工织布工人以很大的打击，使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这样便剥夺了乡村劳动者习惯的收入来源之一，就业者的收入减少，还造成大量无业流民，群众骚动不断发生，穷人甚至抢劫商店夺取面包等食物。1795 年 5 月英国曾制定过一项济贫制度，它规定，随着市场食品价格的变动，贫民的救济金数额也要相应变动，并规定允许在教区内济贫院以外发放贫民救济。这种户外救济制度使希望得到救济的贫民有较大的居住和工作的自由。由于工业革命使劳动群众的社会分化加剧，一部分群众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加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认为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增多，会使懒惰和不劳而获之风滋长，于是，1832 年成立了以解决济贫法为任务的王室委员会。1834 年济贫法委员会的纳索·西尼尔和埃德温·查德威克起草了一份报告，指出现有的济贫制度不合理，提出修改济贫法的若干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给所有成年人的救济以后将只在井井有条的济贫院中发放，而不采取户外救济的形式；负责济贫事务的中央机构对地方实施济贫工作的官员有管理权，试图统一全国的济贫工作；同时，政府设立济贫法委员会，由 3 名拥有实权的官员负责。根据王室委员会的报告，英国议会于 1834 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基本上采纳了该委员会的建议。1834 年 8 月该法案得到王室的批准，得以实施。济贫院内供给的食品很少，劳动极其繁重而且毫无意义，并且实行夫妻子女分居的违反人性的隔离制度，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工人们愤怒地咒骂济贫院是“穷人的巴士底狱”。由于工人害怕因进济贫院而遭到家庭被拆散，并且要卖掉他们的工具和其他物品，所以他们往往宁可接受低劣的条件到工厂去当工人。这样，新济贫法的实施起到了为工业资本家提供更多可供雇佣的自由劳动力的作用。此外，地方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担心中央政府以济贫法修正案的实施为契机，削弱和剥夺地方自治形式的政府的权力，控制地方行政权和教职任命权，触及他们的权益。反对新济贫法运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各个阶级参加的运动，但贫苦工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

新济贫法最先是 1834 年底在英格兰南部农业区实施 随后便是东盎格利亚和南部诸郡首先爆发了农民的示威和骚动。1835 年 5 月在贝德福德郡的安普山爆发了示威，群众高呼“面包或者流血”的口号，有的地方工人们占领了济贫院，要求按照旧济贫法的方式来救济穷人。随后萨福克郡发生了反对新济贫法的斗争，有的地方并和军队发生冲突。在英格兰北部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从争取工厂立法改革迅速转到反对新济贫法运动中来。反对新济贫法最激烈的地区正好是工厂法改革运动势力最强大的地区。1837 年 11 月在里

A.E.Bland, P.A.Brown and R.H.Tawney (eds),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1914, PP. 655—656, PP.663—665.

A.E.Bland, P.A.Brown and R.H.Tawney (eds),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1914, PP.655—656, PP.663—665.

A.R.Schoyne, *Chartist Challenge*, 1958, P.34.

兹创刊的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发表了大量抨击新济贫法的文章。到1838年在北到里彭南到柴郡的区域内共有38个反对新济贫法的协会建立。参加反对新济贫法斗争的还有其它阶级的一些人士。科贝特、马休·弗莱彻、斯蒂芬斯、菲尔顿、萨姆·罗伯斯、约翰·理查逊和佩利等是领导反对新济贫法斗争的领袖，这一斗争的中心是兰开郡和约克郡。这个运动的高潮持续了两年。宪章运动1839年第一次高潮到来时，曾积极参加反对新济贫法运动的工人群众转而投身宪章运动。

三、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

从 20 年代末起,在伦敦和外省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工人的工会组织和政治民主组织。英国这个时期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主要受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此外也受到了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土地改革派的思想影响。但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兴起之时正值争取 1832 年议会改革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工人阶级积极投身于这场政治民主运动,他们的一些组织采纳了政治民主斗争的纲领。

1829 年 5 月 11 日在伦敦成立了“不列颠促进合作知识协会”,这是一个处于欧文主义影响下的伦敦地方的工会组织。它的宗旨规定,其任务是通过廉价的小册子传播合作的知识,以最佳的途径建立合作协会,在合作协会之间建立劳动交换所,通过展览会出售他们的产品。不列颠促进合作知识协会把欧文倡导的合作的原则和出版不贴印花税票的廉价出版物这两项任务有机地结合在自己的纲领中。这个组织汇集了一批日后成为工会和改革运动领袖的杰出分子,如威廉·洛维特、詹姆士·沃森、约翰·克利夫等。

1830 年,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工人进行了 6 个月的罢工斗争后,约翰·杜赫蒂建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它的机关报为《工会合作杂志》,后改名为《人民之声》。这是一个欧文主义的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的的工会组织。

1831 年 5 月,在不列颠促进合作知识协会和 1829 年 9 月成立的“激进改革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它后来经常在一座可容纳千人的圆顶大厅开会,故又被称为“圆厅党”。它的领导人中有赫瑟林顿、洛维特、沃森、本鲍、达文波特、奥斯本等。从思想来源而论,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兼而吸收了潘恩、亨特、科贝特关于改造“腐败的旧制度”的政治民主主义、关于废除英国与爱尔兰合并的做法、欧文主义和斯宾塞主义土地改革的要求、关于合作运动的设想,以及霍奇斯金和汤普逊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有较严密的组织,每 30 至 40 人组成一个班(“class”),每周开一次会,各“班”的领导人每周也开一次会。它有很多基层组织,在曼彻斯特有 27 个分会共 5000 会员。它从 1831 年 7 月到 1835 年发行机关报《贫民卫报》(周刊)。这是一个以工人政治民主派为主体的组织。1833 年以后,这个组织趋于衰落。

在 1833 年到 1834 年初,全国建立了不少强大的工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建筑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陶器工人工会”、“缝纫工人工会”和“西雷丁毛纺织工人工会”。1834 年 2 月在欧文的倡导帮助下,以这些行业工会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其会员在 80 万以上,机关报为《先锋》。这个组织在它的“纲领和宣言”中,把“说服统治阶级”,“使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作为其任务,表现出纯粹经济斗争的方向。在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成立前和成立以后,它下属的工会发动了一系列规模大和持续时间长的罢工,例如德比大罢工持续了数月之久。支持下属工会的罢工,消耗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财力,政府和雇主的破坏使得它的参加者在思想上的分歧加深了。该组织的左翼是以摩里逊和史密斯为首的

P.Hollis (ed), *Pressure from Without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1974, P.109.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8, PP.875—876.

William Lovett, *Life and Struggle of William Lovett*, 1967, P.55.

工团主义者，他们主张发动总罢工，从“左”的角度反对欧文主义者和工人政治民主派。1834年6月欧文排斥了摩里逊和史密斯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内部分裂并在同年8月解体。宪章运动在1836年以后的兴起使得受欧文主义指导的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标的工会运动进入低潮。

40年代中期，合作运动在英国重新兴起。1844年12月在英格兰北部纺织工业区的罗其代尔成立了“罗其代尔先锋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领导人都是欧文派社会主义者。它最初的社员大多是纺织业各部门的织工。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他们中有宪章派，有欧文主义者，也有工会会员。罗其代尔先锋合作社的章程规定，它通过按股集资按股分红的办法筹集资金，用这笔奖金开设店铺销售食品衣物，并建筑房屋供希望改善状况的社员迁入居住。此外还要购买土地供失业和贫困的社员耕种，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罗其代尔先锋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855年社员已增至1400余人。到1851年英国成立的罗其代尔式的合作社已有130个左右，社员不下1.5万人。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尤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宪章派。合作运动具有非政治性的、局部改良和空想的特征。所以50年代左翼宪章派在反对中产阶级运动时也坚决批评合作运动的温和和改良主义的性质。1852年1月厄内斯特·琼斯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劳埃德·琼斯曾在哈里法克斯进行了辩论，厄内斯特·琼斯批评劳埃德·琼斯鼓吹合作主义的见解。他指出：“人民不事先取得政权，劳动者的合作社就无法顺利实现，”“合作社只有在事先取得政权的同时，才能起到作为治国良药的效果。”这反映了当时工人宪章派左翼对合作社运动的见解。

R.W.Postgate (ed) ,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 PP.86—88.

Notes to the People , Feb , 7 , 14 , 1852.

第三节 宪章运动

一、宪章运动的兴起和第一次高潮

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

1836年6月9日，洛维特和一批工人政治民主派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街考文特花园聚会。这是伦敦工人协会的第一次会议。洛维特在会上宣读了伦敦工人协会发起书草稿。6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份发起书，并选出一个委员会起草伦敦工人协会的规则和章程。在6月26日的会议上，规则和章程被一致通过。7月17日，形成了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核心共33人，他们中有洛维特、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加斯特、哈特韦尔、克雷等。洛维特任书记，赫瑟林顿任司库。这些人中有19人是4月成立的“争取廉价与正直报刊工人协会”的成员。伦敦工人协会要求“使社会上一切阶层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它强调紧密团结城乡各工人队级中有知识和有影响的那部分人，搜集有关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利益的情报，采取适当的方式和态度来表达思想和感情，通过最能造成正义、深刻而有力的舆论方法，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最终不必通过暴力或骚乱而逐渐获得改善。它主张通过教育、宣传等和平的方式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选举制的民主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36年10月，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了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平等的代表权、议员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等五项要求。11月，伦敦工人协会发表了题为“腐败的下议院”的通告，号召工人不要做有产阶级政党的工具。伦敦工人协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上层工人的组织，规定了较高的入会费，采取关门主义的组织路线，只吸收“有智识和才能的”，“高尚和清醒的”成员，把广大贫苦工人排斥在外。它认为没有文化的工人缺少教养，容易冲动，不利于实行该组织稳健温和的活动路线。它的会员最多时也只有291人。多数成员来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部门，如排字、书籍装订、钟表、马车制造、银器宝石业等，只有少数会员来自收入较低的行业。伦敦工人协会的这种构成有其社会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工厂制在英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伦敦在30年代仍缺少工厂制度和产业工人。

伦敦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洛维特，康沃尔人，海船船长的遗腹子，早年为制绳工匠，1822年到伦敦，受雇于木匠铺，后为家具木工，并担任了家具木工协会的主席，以后到伦敦技工学院学习，受到霍奇斯金的影响，成为欧文的信徒。他曾担任1829年伦敦合作工会协会的司库。他认为逐渐聚集资本的方法可以使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在合股劳动协会中，靠这种方法及工业的技艺和知识，他们可以最终把国家的贸易、工业、商业掌握在自己手中。1830年，洛维特开始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并加入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曾因为要求改善丝织工人的悲惨处境，向政府提出抗议而被捕。1834年全国

M.Hovell, *The Chartist Movement*, 1925, P.60.

George Howell, *A History of the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rom 1836 to 1850*, 1970, P.15, PP.35—40.

W.Lolett, *op.cit.* PP.76—77.

I.Promero, *Chartism in London*, in *Past and Present*, No.44 (1969), PP.76—105.

各业统一工会瓦解后，洛维特提出通过争取普选权解放工人的主张。他强调工人们要成为社会和改革的改革者，否则就永远享受不到自由。赫瑟林顿是排字工人，伦敦技工学院最早的学生。和洛维特一样，他也受了激进主义和欧文主义的影响。他是工人阶级反印花税法请愿的领袖，他发行了一系列不贴印花税的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1831年开始发行的《贫民卫报》。与其说赫瑟林顿是革命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临终时在遗嘱中表示，他拥护欧文的主张。沃森早年为里兹商店学徒，20年代末参加合作运动。1831年，他创办一家书店，并参加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发行各种激进主义书籍，其中有伏尔泰、卡特莱特、卢梭、雪莱以及欧文主义著作，推销《贫民卫报》。实现政治民主化，是伦敦工人协会关注的主要问题。

1837年2月28日，伦敦工人协会在伦敦皇家铁锚酒家召开了一次大会，在这次有伦敦主要激进派政治家参加的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由洛维特起草的“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下议院的请愿书”。会议的发言者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摆脱有产者阶级的政治领导，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可能办到的，而必须依靠工人自己。大会通过了上述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宪章运动中第一次提出六项政治要求，即平等的代表制、成年公民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无记名投票选举、议员支取薪金。正像洛维特在一份手稿中写道的：《人民宪章》发轫于请愿书。皇家铁锚酒家大会和伦敦工人协会的请愿书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以普选权为中心的政治民主要求，早就是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民主派组织开始汇集到宪章运动中来。这些组织中比较重要的有菲格斯·奥康诺领导的“普选权俱乐部”和奥布莱恩领导的“中央全国协会”。

菲格斯·奥康诺出身于爱尔兰科克郡富有的新教地主家庭。父亲罗哲和叔叔阿瑟受到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伏尔泰和伏尔尼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投身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是18世纪90年代爱尔兰人大同盟的领袖。奥康诺除受到父亲和叔父的影响外，还受到科贝特、亨特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他曾进都柏林三一学院和伦敦皇家法学院以及格雷法学院学习。他对爱尔兰农民秘密团体白衣队的活动持同情态度。在1831年—1832年，他积极投身议会改革运动，成为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奥康奈尔的追随者，1832年在科克郡当选为议员。30年代初奥康诺到伦敦后，支持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和辉格党政府作斗争，1835年9月，他在伦敦创办了有资产阶级激进派参加的大马里本激进协会，以后该协会和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残部合并。在此基础上，1836年6月，奥康诺建立了工人阶级激进派组织——“普选权俱乐部”。奥康诺本人则在1836年底成为伦敦工人协会的名誉会员，但他逐渐把注意力转到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群众身上。此外，奥布莱恩在1837年3月创办了“中央全国协会”，从1837年1月开始发行《布朗特里的全国改革者报》。该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彼此间实现社会平等”，为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取得政治平等”，为此，“必须更加广泛和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R.W.Postgate (ed),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pp.113—116.

D.Read and Glasgow, *Feargus Oconnor Irishman and Chartist*, 1961, p.57.

哈尼和伦敦民主协会

1837年1月29日，东伦敦民主协会在伦敦东区创立，1838年8月改称伦敦民主协会。东伦敦民主协会和伦敦工人协会一样，其参加者和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有密切联系，他们中不少人在20和30年代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主要活动家有乔治·哈尼、查尔斯·尼索姆、艾伦·达文波特。东伦敦民主协会的书记是乔治·哈尼。乔治·哈尼是肯特郡人，其父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是皇家海军水手。他本人受教育不多，11岁进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毕业后曾作为船长侍从到过布鲁塞尔和里斯本。他积极参加了赫瑟林顿领导的反印花税法斗争。他崇拜奥布莱恩，称他为“向导、哲学家和朋友”，接受了奥布莱恩的阶级斗争思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杰出的民主派马拉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哈尼曾因出售不贴印花税的报纸被囚禁6个月。1837年初，哈尼同共和主义者达文波特、尼索姆等共同创立东伦敦民主协会。

东伦敦民主协会和伦敦工人协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参加者不是熟练的上层技工，而是东伦敦的码头工人和类似于法国无套裤汉的贫苦工人，他们的革命性较强。他们的会员卡上印有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权力——如果可能，我们就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将诉诸武力。”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宗旨是通过传播托马斯·潘恩所宣传的原则，改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利用一切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有效地确立社会和政治普遍平等的原则。”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希望把一切没有代表权的阶级统一在一个兄弟团体之中，以争取普选权。这个协会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没有自己足够的忠诚代表以前，决不会得到公正的立法。他们呼吁用任何可能的措施和努力去改变暴虐的、丑恶的、阻碍传播自由思想不纳税的和正当的出版物发行的非正义的法令，并且彻底、无条件地取消臭名昭著的新济贫法，缩短工厂和作坊的劳动时间，完全取消童工劳动，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成年人根本没有被雇用，连成年工人也没法每天干满8小时工作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情况下更是如此。最后，他们还要求一切会员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支持工人利用每个合适的机会反对资本家的政党和君主，因为这些人无论在何处总是企图减少劳动者的工资，延长苦役时间，或者用宪政手段来反对劳动者。东伦敦民主协会突出的特点是，除了要求普选权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取消新济贫法，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取消童工劳动。

1837年，由于纺织业的萧条，格拉斯哥纺纱工人的工资被削减15%。4月8日，格拉斯哥罢工工人同雇主收买的工贼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冲突中，一个叫史密斯的工贼在街上被打死。随后政府逮捕了领导罢工的保卫委员会全体委员，把杀死史密斯归罪于罢工工人，指控工人企图通过非法的密谋、宣誓、谋杀、纵火手段，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1838年1月，政府根据一些难以置信的“证据”判处5名罢工委员会委员流放7年的徒刑。格拉斯哥纺纱工人审判案震动了全国。工人们感到这是4年前托尔普都尔农业工人审判案的重演，整个工人阶级民主派和工会运动都行动起来。在伦敦，各工会

J.Epstein and D.Thompson(eds),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 1830—1860 , 1982 , P.95.

David Jones , Chartism and Chartist , 1975 , PP.69—70.

和工人协会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领导支援格拉斯哥棉纺织工人的斗争，他们派出为被捕工人辩护的证人，并发表了告工人阶级书。各地也成立了支援格拉斯哥工人委员会。政府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反对下，对该案只好不了了之。

《人民宪章》的起草

皇家铁锚酒家的大会引起了一些下院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的兴趣。1837年5月31日，在伦敦不列颠咖啡馆，伦敦工人协会的代表和几个激进派议员开了一次会议，双方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随后，与会者达成协议，由洛维特负责起草一项争取普选权的法案。在洛维特最初拟定的草稿中，包括有妇女选举权的内容。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普雷斯提出，如果普选权把妇女也包括在内，会遭到社会上层的反对，普雷斯修改了这一条款，把普选权限于成年男子。这样就确定了《人民宪章》的原则基础：凡年满21岁，精神正常，未因犯罪而坐牢的男子，均有选举权；秘密投票；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限制；平等的选区；议会每年改选。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则保证在议会中提出《人民宪章》。

伯明翰政治同盟

1837年5月23日，伯明翰政治同盟复兴。它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托马斯·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父亲和兄弟都是托利党人，作为伯明翰地方的银行家，阿特伍德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和一些同伴长期以来一直鼓吹以实行纸币为中心内容的币制改革计划，但始终没有取得成果。30年代初，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日益加剧。他们意识到只有利用工人群众实行议会改革的要求，才能达到自己的改革计划。因此，阿特伍德在群众讲演中鼓吹：“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是一致的，如果雇主兴隆了，工人也就随之而兴隆。而当雇主遇到困难时，这些困难必然加倍地落到工人头上。因此雇主应当抓住工人的手去敲政府的大门，以消除他们共同的不满。”1837年6月，该组织在纽豪尔山大会上宣布了它的纲领：实行户主普选权或纳税人代表制；议会三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议员薪金。在该组织工人成员的强烈反对下，资产阶级领袖才不得不把户主选举权改为男子普选权，但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平等选区的要求。因为阿特伍德认为，如果选举权的分配完全按照《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内容实行，其结果会使最下贱的爱尔兰人取得这个国家的立法权。1839年，伯明翰政治同盟又提出了取消谷物法、取消皮尔的金本位制立法、取消新济贫法和工厂立法改革等四项要求。

《北极星报》和大北联合会

宪章运动开始后，伦敦工人协会和伯明翰政治同盟先后派出使者到各地

去发动工人群众。1837年下半年，政府加紧在工业区实施新济贫法，使得反对新济贫法运动在英格兰北部迅速发展起来。1837年11月，南兰开郡反济贫法协会成立，到1838年，在兰开郡和柴郡已有38个地方分支机构。此外，各地工人建立了各种工人协会和激进协会。但是，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宪章派并不仅仅把普选权作为自己斗争的最终目标，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1837年夏季起，奥康诺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积极从事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他了解工业区贫苦工人的情况，对这部分力量极为重视。他和活跃在工业区的奥斯特勒、斯蒂芬斯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年5月，奥康诺提出在北方创办一份激进派报纸的计划，1837年11月，《北极星报》终于发刊。《北极星报》系周刊，它为全国的宪章运动提供了一个讲坛，尤其满足了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和兰开郡宪章派斗争的需要，受到各地宪章派和激进派的欢迎。奥布莱恩参加了《北极星报》的工作，从1838年10月起，他在该报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力的指导性文章。

当时活跃在北部工业区、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威信的还有鼓动家、卫理公会传教士约瑟夫·斯蒂芬斯。

1838年4月，里兹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大北联合会”，奥康诺担任该联合会纲领起草委员会的秘书。5月3日，由奥康诺起草的纲领在里兹召开的另一次大会上通过。大北联合会宣布成立。该会指出：“由于改革法案已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而且所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会至今一直被交替争取国家政权的两个政治派别所愚弄，人民应当进行一场伟大斗争，迫使政府放弃其政治特权。除此以外，工人阶级无法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在政治和社会上连成一体工人阶级这个整体内部不存在什么单独集团的利益。”“当一个工人团体受压迫时，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受压迫。”大北联合会同东伦敦民主协会相仿，代表了贫苦工人的利益。在策略上，它不仅主张采取和平的方式，也主张必要时采用暴力。它的建立对联合和协调英格兰北部宪章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宪章》和《国民请愿书》

1838年5月8日，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发表。洛维特这份文件的起草人。《人民宪章》是递交议会的法案，它用法律文件的格式写成，全文共有8开纸19页，分绪言、选举资格条件、平等的选区等13个条款。它的中心内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支薪、平等分配选区、议会每年改选。洛维特在公布《人民宪章》时发表了一份宣言。他说：“我们确认的政治原则是：实行代表制的自治政府是政权唯一公正的基础，它是宪法权力的唯一真正的基础，也是良好法律的唯一源泉。”他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利弊大多导源于腐败和独占的立法权，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现今的少数人操纵的权利交给大多数人去行使。”

Northern Star, May 5, 1938, P.8.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第25—26页。William Lovett, Life and Struggle, PP.315—330, PP.141—142.

《人民宪章》的要求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继承了英国由来已久的民主思想传统。早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在1647年的《人民公约》中就提出解散长期议会、议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各选区的议席按居民人数分配、成年男子有选举权。1771年，休谟提出了“恢复萨克森时代的原则”、改革腐化的宪政、每年改选一次议会、剥夺衰败选区的代表权、把选举权扩大到苏格兰人和户主、秘密投票等民主要求。1776年，约翰·卡特莱特在《抉择》一书中提出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成年男子普选权、平等的代表权和议员支薪的要求。1780年，约翰·杰布起草的“威斯敏斯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比卡特莱特更进一步，提出了日后收入《人民宪章》的全部六项要求。英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十分熟悉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伦敦工人协会在其文件中详细地追溯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但他们现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在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人民宪章》的同时，伯明翰政治同盟在1838年5月4日发表了由其领导人之一，《伯明翰报》编辑道格拉斯起草的《国民请愿书》，这是宪章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纲领。这份请愿书在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时把工人阶级的痛苦和资本家、商人的抱怨糅合在一起。它说，“我们的商人已面临着破产，我们的工人濒于饥寒；资本得不到利润，工人得不到报偿；工人的住宅已看不到灯火，典当业的库房已堆积如山；贫民院有人满之患，制造厂已凄凉至极。”请愿书呼吁，“雇主资本的正当利润决不能再被剥夺，工人劳动的正当报酬决不能再被剥夺。”国民请愿书的基本要求是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一次议会、规定议员的薪金、取消财产资格限制。这说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民主要求比工人阶级软弱得多。

在伦敦工人协会和伯明翰政治同盟的发动下，宪章运动在1838年蓬勃发展起来。5月28日，苏格兰宪章派在格拉斯哥的格林草坪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大会。8月6日，宪章派在伯明翰的纽豪尔山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会。这两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宪章运动的新高潮。

《人民宪章》成为团结和鼓舞成千上万工人群众和民主派进行斗争的旗帜。但是，由于《人民宪章》的条文仅限于政治民主内容，没有写进工人阶级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也没有提出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因此给宪章运动的各个阶层和派别留下了很大的理解和解释的余地。宪章派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取得政治民主是宪章运动的最终目的，只要实现了普选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普选权足以“摧毁套在工人脖子上的锁链”。他们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希望通过普选权产生一个“好政府”，“防止苛法并保障安全”。这代表了宪章派右翼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宪章》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斯蒂芬斯则认为，宪章运动归根到底要解决“刀子和叉子的问题。”“我们国土上每一个劳动者，应该身上有一件好上衣，头上有顶好帽子，全家有安静的住处，桌上有可口的晚餐。”工人宪章派还提出了废除新济贫法、取得廉价的食物及土地的要求。对宪章运动任务的不同认识，反映了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和下层群众思想上的分歧，这是以后宪章运动中发生派别斗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第30—31页。

G.D.H.Cole, *Chartist Portraits*, 1941, P.74.

争的阶级和思想根源。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是否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以及采取何种活动策略等问题上。

1838年下半年，宪章派为了召开国民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一系列群众大会，其中最主要的有8月6日伯明翰大会、9月17日伦敦帕雷斯场大会、9月24日曼彻斯特附近克撒尔荒原大会、10月18日皮普草地大会和12月8日爱丁堡卡尔通山大会。会上，宪章派领袖发表了演说，并推选当地出席国民公会的代表。宪章运动达到了高潮。

国民大会的召开

在《人民宪章》和《全国请愿书》公布后的9个月中，宪章派在各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推选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征求群众在递交下院的全国请愿书上签名，募集宪章运动的基金“国民捐”。到1839年2月，全国各地共推选出国民大会的代表63人，一些有威望的宪章派活动家如奥布莱恩、哈尼、泰勒、文森特等在几个城市同时被提名。国民公会的代表中有20名来自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8名来自伦敦，5名来自伯明翰，3名来自东米德兰，2名来自威尔士。由于宪章运动初期阶级构成复杂，因此国民公会代表中不仅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有一些工人代表由于贫穷，无法前往伦敦参加会议，因此实际到会的53名代表中只有24名是工人。国民大会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分歧的种子。这次宪章派代表大会被称为国民公会，它是英国民主运动史上经常提到的一个术语。在1817年和1819年的民主运动中，民主派曾希望召开一次民选的国民公会来对付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政府的反动高压政策。1832年以后，激进派理查德·李、威廉·本鲍、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曾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机构。因此，国民公会这一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和议会权威相抗争的意义，作为统治阶级议会的对立物出现的。宪章运动时期不少宪章派把国民公会看作现存政府的替代物，视之为工人阶级的政府或人民的议会。1839年2月后，宪章派称之为“人民的议会”，一些代表甚至在自己姓名之后写上表明议员身份的缩写符号（M.C.）。1839年国民公会的《章程和规则》规定：它的目的是监督实现全国请愿书，用一切合法的宪政手段来实现人民宪章所规定的保证人民公正代表权的法令。

1839年2月4日，宪章派国民公会在伦敦不列颠咖啡馆开幕。会前共有50万人在全国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征集到967镑国民捐。国民大会推选洛维特担任常任秘书，大会主席则由代表们每日轮流担任。国民大会发觉签名的人数和国民捐远远不够，便从2月下旬起派出15名使者到各地去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国民大会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联系，争取他们对请愿的支持。2月5日，英国议会开幕，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致词中指责：“英国某些地方有人不遗余力地煽动我的公民忤逆和反抗法律，并诱惑他人从事危险和违法的行动。”并且暗示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对付宪章运动。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态度，宪章派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134.

Poor Man's Guardian, Oct.24, 1835; Northern Star, Feb.9, 1838.

都烟消云散，国民大会的议题很快就转到宪章派的策略问题上来。2月9日，代表马休·弗莱彻希望国民大会通过决议，说明英国人民自古以来便有使用武器的权利，提出了在请愿失败后发动暴动的主张。随后，代表们很快在策略问题上分裂成三派。哈尼、尼索姆、里德、马斯顿、泰勒、卡都、赖德、巴锡、洛厄里以及弗罗斯特等构成了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左派。他们认为起义比任何演说和请愿都要牢靠，他们大多来自东伦敦和工业区，多数是贫苦工人的代表，但也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极端激进派分子。他们刚好坐在大会主席台的最左端。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地区的大部分代表属于右翼，其中有科贝特、索尔特、哈德利、沃德等。他们主张严格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应当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法律的行动。这两部分人只占代表的少数，多数代表虽然主张采取合乎法律的斗争手段，但不完全摒弃在必要时使用暴力行动。

国民大会开了一周以后，开始就本身的权限问题进行讨论，即国民大会仅仅是为了把国民请愿书递交议会，还是一个拥有权力的议会；如果请愿书被否决，它是否有权采取“最后措施”。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科贝特提议不要再讨论“最后措施”，不应当采取任何和法律相抵触的措施。但他的提议被国民大会否决，随后科贝特宣布退出国民大会。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索尔特则拒绝实现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诺言。而这时，宪章派左翼通过大会内外的活动推动宪章运动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2月28日，伦敦民主协会在技工学院大厦举行会议，哈尼、赖德和马斯顿提议，“《人民宪章》应当在一个月内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国民大会应要求人民准备采取最后措施。哈尼在3月初给《工人报》的信中说，“如果国民大会还要拖延很久，我将卷起袖子动手干。”3月16日在伦敦皇家铁锚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奥康诺、哈尼和弗罗斯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号召群众拿起武器。奥布莱恩在会上报告说，约克郡和兰开郡的群众已经拿起武器，如果其它地方的人们也以他们为榜样，很快可以获得宪章。宪章派左翼提出的“暴力”政策对国民大会震动很大。

从3月底到5月，由于资产阶级激进派无法接受左翼宪章派的“暴力”政策，哈德利、索尔特、道格拉斯、沃德、马休以及罗哲斯先后辞去代表职务，退出国民大会。他们的位置由新选出的具有较强革命性的代表来补充。这样，随着代表成份的变化，国民大会的性质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3月18日，国民大会就议会正在制订的“乡村警察法”进行了讨论。代表们指出，政府实行乡村警察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强制推行新济贫法和制止可能发生的起义，他们估计警察将利用间谍和暗探来破坏宪章运动。从这时起，国民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转到武装斗争，各地宪章派的武装活动也有所加强。根据负责同激进派议员联系的委员会报告，议会已不可能通过宪章派的请愿书，从4月9日起，国民大会开始讨论人民是否有权拥有武器这一问题。曼彻斯特的代表理查逊提议起草一份备忘录，说明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大会通过了弗莱彻的提议，人民有权拥有武装。

伦敦民主协会从4月13日起创办了《伦敦民主》周刊。哈尼在这份报纸

A.R.Schoyne, *The Chartist Challenge*, 1958, PP.55—56.

William David, *John Frost*, 1939, P.131.

Schoyne, *op.cit.*P.58.

上表述了阶级斗争思想。他不像科贝特和奥康诺那样，迷恋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他认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漫长的人剥削人的时代，是“一个没完没了用阴谋对付工人阶级的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代，多数人总是少数人的奴隶，很少有例外。”工人阶级要结束自己的奴隶地位，只有推翻最后一个统治者——中等阶级才能实现。哈尼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护他们的双亲，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暴君从地上赶走，把压迫者从法庭上赶走。

4月底，国民大会发布宣言，指出决不要指望当权者会给大会什么帮助，除了人民的坚决斗争外，再无别的希望，号召代表们参加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指导人民采取秘密措施。这时波兰革命流亡者本尼乌斯基也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提出从英格兰北部进攻伦敦的计划。

兰尼卢暴动

4月底和5月初，外省一些工业区和农业区的斗争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展开。在兰开郡和南威尔士，许多宪章派在准备长矛和简易武器，一些地区的工人进行了军事操练。4月下旬，兰尼卢的宪章派从农场主那里取得枪支，开始了秘密训练。4月29日伦敦派出几名警察到兰尼卢来逮捕工人领袖。第二天早晨，当地宪章派召开了一次大会，治安法官召集临时警察逮捕了3名宪章派领袖，把他们押进一家旅馆。宪章派向这家旅馆发起进攻，捣毁了这家旅馆，救出了被捕的宪章派领袖，并狠狠地惩罚了当地的警察头目和来自伦敦的警察。暴动胜利后，宪章派控制兰尼卢城达一周之久。几天以后，治安法官才在一队步兵及自耕农骑兵保护下进入兰尼卢城。他们在沿途仍遭到宪章派的袭击，随后，当局逮捕了数十名宪章派分子。在兰尼卢暴动前后，各地宪章派也在密谋暴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准备用专政手段镇压革命宪章派。5月3日，内务大臣约翰·拉塞尔颁布“王室宣言”，禁止群众武装训练和使用武器，授权治安法官没收平民的武器，宣布一切携带武器参加群众集会者均为非法行动，怂恿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义勇军”维持秩序。在农村则实行警察制度，同时还从爱尔兰调回3个军团的正规军以应付事变。

国民大会在领导群众运动时表现出一些弱点。许多宪章派领袖分散到各地去做鼓动工作，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国民大会对全国宪章运动的领导工作上。奥布莱恩在4月的9天中曾在19次群众大会上作讲演，至于参加较小的会议则不计其数。奥康诺在1个月内曾跋涉1500英里，参加了22次大型群众集会。哈尼每天平均要在群众集会上讲演两小时。由于代表到会人数很少，国民大会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此外，伦敦和工业区不同。在伦敦，宪章运动无法取得众多热情的工人群众的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和贵族聚居的城市对宪章运动态度冷漠。鉴于宪章运动在伦敦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民大会决定迁到靠近工业区的伯明翰。

5月7日，国民大会把群众签名的请愿书用马车送到激进派议员菲尔登家中。奥康诺和洛维特代表宪章派要求阿特伍德再提出一个以人民宪章原则

London Democrat, April 20, 1839.

D. Williams, John Frost, pp.156—158; Dorothy Thompson (ed), The Early Chartist, 1971, pp.222—225.

为基础的法案，但遭到阿特伍德的拒绝。他反对人民宪章中平等选区的要求，不希望爱尔兰人得到很多的议席。

5月初，在英国殖民地牙买加，由于白种人殖民统治者暴虐地对待自由黑人，造成了牙买加的政治危机。墨尔本勋爵内阁在牙买加问题上发生了分裂。5月7日，墨尔本内阁辞职，议会忙于组织一届新内阁，于是宪章派递交请愿书一事也就搁置下来。

在迁往伯明翰以前，国民大会向各地宪章派发出一份征求意见书，要求在7月1日以前对宪章运动应采取的策略进行讨论，即表明他们是否准备提出在银行中的存款，把纸币兑换成金币，举行神圣月（即一个月的总罢工），武装起来，推选宪章派的代表在伦敦集会，以实现人民宪章的伟大目标。

国民大会第二阶段的活动

5月13日，国民大会代表35人乘火车来到伯明翰，受到数万群众的欢迎。当天在茅宫饭店举行了欢迎大会。第2天，国民大会在劳伦斯街教堂继续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奥布莱恩起草的给宪章派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只要我们的压迫者还根据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付人民，则和平、法律和秩序还应该继续作为大会的标语，但如果我们的敌人以战争代替和平，或以非法的暴力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纪律的运动，我们便要本着人民神圣的原则，以武力对抗武力。”“如果我们的上等和中等阶级压迫者违背现行国法，支使地方当局用武力攻击人民，那末他们必须对这种凶暴的煽动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负全部责任。”

5月20日在纽卡斯尔猎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集会，群众来自周围20英里，会场飘扬着100多面旗帜。哈尼、泰勒、洛厄里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发言者声称，他们决不同压迫人的制度和不公平的原则和平共处，他们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进行斗争，他们不承认那些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宪章派警告当局说，不要再无视全国人民的权利，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痛苦不堪，以致即使流血沙场而死，他们也在所不辞。5月21日在西雷丁区皮普草地举行了2万人的集会，奥康诺、奥布莱恩、泰勒、布西等到会并作讲演。奥布莱恩在讲演中宣布了召开“人民议会”的计划。他说，“下届大选时，必须由宪章派来做我们的代表。”他指出，一个由900万或1000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30万或40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有着根本区别。他表示将不懈地宣传“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统治”的原则。但奥布莱恩没有看到，只要资产阶级的议会和政府还存在，人民的议会就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会利用自己的专政机器无情地摧毁任何建立人民议会的企图。5月25日在克萨尔猎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这一时期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些妇女宪章派组织和妇女政治协会也参加了会议。劳动妇女不仅为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斗争，她们还提出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利物浦、卡莱尔、达勒姆郡的森德兰猎场、格拉斯哥、南希尔兹、哈德斯菲尔德、蒙默思郡、设菲尔德等地也召开了规模较大的群众集会。到会的宪章派显示了实现《人民宪章》的决心。在5月底散发的一份号召暴动的传单

中宪章派写道：“现在到了考验每个人灵魂的时候了，你们武装好了吗？你们有足够的火药和子弹吗？你们鼓起浑身的勇气了吗？你们是否希望做一天的工作有一天公平的工资？你们自己问一问这些问题吧！你们要记住，要靠你们直接武装的力量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打算让你们的母亲、妻子、孩子和情人仍旧长期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做工？除了你们的步枪和剑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暴君清醒的了。”

6月1日《伦敦民主》发表了库姆比写的颇具洞察力的文章。文章说：“你们的整个社会制度要求革命，你们的商业制度要求革命，你们的政治制度要求革命，只有一场社会大变动才能消除这些弊病。”文章的结论是，缓慢的立法不能解决人民的苦难，最终必须求助于起义来解决问题。

7月1日，国民大会在伯明翰如期复会。这时伯明翰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了。早在5月中旬，伯明翰当局就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布朗和法塞尔，7月初，又禁止工人在当地经常开会的广场——“牛场”集会。7月4日，当局从伦敦调来60名临时警察。当晚8、9点钟，这批警察开到牛场，这时近千名宪章派正在举行一次集会，警察当即挥舞大棒，大打出手。起初，工人们措手不及，几分钟后开始与警察对抗。工人的反击非常有力，打得警察四处逃窜，有10名警察被打伤送进医院，在搏斗中，也有几十名宪章派被打伤。在这场对宪章派无理的袭击之后，当局又从伦敦派来增援的警察。7月5日晨，逮捕了国民大会代表麦克道尔、泰勒和其他17名宪章派分子，宣布禁止露天集会，并封锁了街道。愤怒的工人群众冲击了当地的教堂，并在召开国民大会的金狮饭店周围聚集起来。7月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由洛维特和柯林斯签署的决议案，谴责警察违反宪法，以血腥的手段对伯明翰群众施加残酷、恶毒、不义的暴行。这项决议公布后，洛维特和柯林斯遭到当局逮捕。牛场事件以后，纽卡斯尔、森德兰和曼彻斯特的宪章派都起来声援伯明翰宪章派的斗争，并谴责当局的野蛮行径。纽卡斯尔宪章派群众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倘若政府坚持用暴力驱散符合宪法规定的公共集会，纽卡斯尔人民决心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并根据我们的权利和宪法，用合乎宪法的反抗来对抗非法暴力。”

第一次全国请愿书

1839年6月14日，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受宪章派委托在下院提出国民请愿书，并通过一读，交付印成议会文件。二读将于7月12日在下院进行并付之表决。经代表一致同意宪章派国民大会迁回伦敦等待表决结果。7月12日，阿特伍德在下院提出二读的动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阿特伍德描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斥责了寡头政治，但他把罪恶的原因归结为金币流通。他回顾了请愿的历史，认为伯明翰是这次请愿的发起地。他力图表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都是工人阶级中有文化的优秀分子，而不是资产者所痛恨的、企图触犯法律的流氓、盗贼和声名狼藉的歹徒，借以平息

London Democracy, June 1, 1839.

M.Hovell, Chartist Movement, P.150.

R.M.Postgate (ed), Revolution, PP.126—127.

资产阶级议员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不安。他指出英国重商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认为必须实行符合工业家利益的改革。他要求议会批准请愿书，如果不能批准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那么批准户主选举权和3年召开一次议会也好。他在宣读请愿书后补充说，他反对采取任何合法方式以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由阿特伍德提交议会讨论的“全国请愿书”由伯明翰政治同盟成员道格拉斯起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产物。它没有写进《人民宪章》包含的全部六项要求，它在为工人的利益呼吁的同时，也要求保护工业资本的利益。下院对全国请愿书进行了表决，以235票对46票否决了请愿书。

“神圣月”

全国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后，国民大会从12日起集中讨论是否举行“神圣月”的问题，即为期一个月的全国总罢工。代表洛厄里提出，工业区已做好大罢工的准备，应当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但一些来自工业区的代表却一改以往支持大罢工的态度，认为现在举行总罢工为时过早。弗莱彻说：“人们充满热情，甚至热情很高，但是仅仅是有热情并不足以立即发动罢工。”伦敦民主协会的尼索姆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全国休假日应当提前一周，从8月5日开始。布赖顿的代表奥斯本则认为，神圣月开始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苏格兰代表莫伊尔、伦敦代表卡本脱和罗其代尔的代表均对“神圣月”计划持保留态度。最后，国民大会以13票赞成，6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洛厄里的提议。然而，此间在外地的宪章派领导人奥布莱恩、奥康诺、弗罗斯特均对立即举行“神圣月”持反对态度。这时多数代表已察觉，举行“神圣月”是不明智的。他们召回了这些领导人，重新讨论了总罢工的问题，7月22日，吸取了奥布莱恩的意见。奥布莱恩提出，尽管他也认为只有实行全国总罢工才足以使工人得到权力和自由，但他不同意关于总罢工时间的决议。他认为应当让人民来决定是否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国民大会连续3天对此进行讨论，最后接受了奥布莱恩的意见，只有哈尼一人坚持异议。他强调各地人民已有充分的行动准备，如果国民大会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它将无法再次唤起人民。这场激烈的争论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在迁往伯明翰以前，国民大会曾向各地宪章派发出征询策略意见的信，到7月下旬，国民大会陆续收到各地宪章派组织的复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0个宪章派协会的复信中，13个表示反对“神圣月”，3个表示支持，1个未置可否。在苏格兰的43个宪章派组织中，只有5个赞成，大多数不赞成。这个调查材料表明，绝大多数宪章派基层组织认为准备不足，不赞成立即举行“神圣月”总罢工。在这种情况下，8月6日，国民大会在休会前夕通过一项动议，放弃“神圣月”的计划，改在8月中旬举行为期2至3天的罢工。

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宪章派。7月31日，内务大臣拉塞尔向各地发布命令，要求采取防范措施，逮捕“非法扰乱治安的”宪章派。伯明翰当局把3名在冲突中被捕的宪章派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后改为流放。本鲍被捕后判处16个月监禁，斯蒂芬斯被判处18个月监禁。仅8月份，被捕的宪章派成员就有130人左右。国民大会代表哈尼等12人被捕。麦克道尔、奥布莱恩、

J.H.Wiener(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Domestic Policy 1689—1973 , 1974 , Vol.2 , PP.1111—1113.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第76页。

尼索姆、洛维特、柯林斯，以及工会领袖希金斯都受到审讯。大批代表被捕使国民大会无法正常工作下去，9月14日国民大会宣布解散。

新港起义

在威尔士宪章运动中，文森特起了重要作用，1838年，他离开伦敦来到威尔士工业区，创办了《西部辩护士》报。文森特是威尔士地区有威信的宪章派领袖和出色的鼓动家。他参与了德维齐斯和兰尼卢两地暴动的组织工作，5月8日被捕，在狱中受到非人的虐待。几个月来，蒙默思地区宪章派一直在为营救文森特出狱而努力。但到9月中旬为止，宪章派的种种努力均未奏效，他们决心发动起义，攻打新港城，救出他们的领袖文森特。新港地区的宪章派早有武装斗争的准备，1839年初就开始购置和分发武器。他们的领袖弗罗斯特属于科贝特式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他在改革运动中的影响而被任命为新港的治安法官，后升任新港市长，直到1837年。弗罗斯特在国民大会中同左翼代表麦克道尔、理查逊组成一个委员会，拟定了全国的起义计划。从10月初开始，新港宪章派开始具体制订武装起义的计划。11月3日晚，新港地区的宪章派开始集结，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首先攻占新港城，截住邮车，以此作为信号，和其它地区宪章派成员一起向蒙默思进攻。然而，宪章派起义的队伍夜间活动时遇到很多困难，他们走了整整一夜，没能按时开到预定地点，4日清晨才到达新港城外。这时，城内准备接应的宪章派领袖已被捕，新港市长和警察局早在两三天以前就已得到情报。当局调集了整团的士兵和警察，设下埋伏。4日下午9时，宪章派攻入新港城，军警稍事抵抗便退入西门酒店，这里早已埋伏下伏兵。宪章派起义者高呼“把被捕的人还给我们”，向西门酒店发动进攻。这时埋伏在酒店内的士兵突然射击，宪章派还没来得及展开火力便在突然袭击下溃败了。有22名宪章派成员当场牺牲，战败的宪章派起义者撤出了新港城。

新港起义失败后，包括起义的领导人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在内的125人先后被捕入狱。从1839年12月到1840年1月初，当局在蒙默思对被捕的起义领导人进行了审判。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另外4位宪章派领袖均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全国宪章派和各界人士的声援与抗议下，当局被迫减刑。

资产阶级政府的两手政策

19世纪30和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以及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使得工人运动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政府当时允许工人和民主派自由出版报纸、刊物，印刷小册子和传单，允许自由集会，这使宪章运动基本上采取了合法的政治斗争方式。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时，内务大臣拉塞尔出于自己的政治观念，力主自由讨论政治问题，并主张实行改革以避免革命发生。1839年5月，有些议员提出，应当制订特别的法律以对付宪章派的活动。这时拉塞尔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不宜采取严厉的镇

压措施，否则会刺激人民的情绪，促使他们武装起来，那样会造成危害，还会引起公众对宪章运动的同情。他顶住了托利党人的压力，认为应当维持言论自由的信条。10月8日，在利物浦勋爵举行的宴会上，罗素强调说，自由集会和自由讨论是合法正当的，它可以收到社会功效。如果人民有牢骚，人民有权利集会并使人们了解他们的意见，这样政府也可以纠正弊政。他还提醒苏格兰地方军事长官和总司令，除了必须镇压暴动时，不要让军队的活动被人民看见。他还说，不要对军队中同情宪章运动的士兵予以处分。但是，内务部为了防范宪章派的密谋暴动，下令邮局拆阅重要的宪章派领袖的来往信件，以了解宪章派的秘密活动计划。除此以外，当局还大量派出暗探打入宪章派组织内部刺探情报。在宪章运动高潮时期发生的暴动密谋中，几乎没有一次不为当局所察觉并加以防范。当局还利用工业革命后刚刚建成的铁路网在夜间把军队调到宪章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以控制局势。政府还派军队控制电报公司，占用电报线，以加强通讯联络。统治阶级采取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是宪章运动的革命政策无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M.Hovell, *op.cit.*P.140.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 Vol.I, P.73.

F.C.Mather, *Public Order in the Age of the Chartists*, 1959, PP.220—221.

二、全国宪章协会和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1840年7月20—24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共有2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主要来自英格兰北部和米德兰地区。其中大多是宪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参加过1839年国民大会的仅有3人。如曼彻斯特工人詹姆斯·李奇以前默默无闻，在工厂法改革运动和与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中才崭露头角。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复兴宪章运动的各种计划，其中包括奥康诺、洛厄里、奥布莱恩、理查逊、本鲍等人所提出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共同之处是要求加强宪章运动的领导，建立一个常设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会议建立了全国宪章协会，这是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7月24日，会议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其内容如下。

全国宪章协会的目的在于谋求下院的根本改革，即实现联合王国全体人民充分和可靠的代表制。实现这样的代表制必须依照下列原则：凡年满21岁和身心健康的男子都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议会每年改选、秘密投票、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划分选区，按照选民人数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要达到上述目的，除了采取和平的宪政手段外，没有其它的途径。这包括召开公众集会，讨论现存的制度所引起的痛苦，指出改革方案的作用，并向议会请愿要求采纳这种改革。凡要求参加本会者，须签署志愿书一份，说明本人赞同本会的宗旨、原则和章程，并领取会员证，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执行委员会备有簿册，以登录王国各地的全体会员的姓名、职业和住址。如有可能，会员应分为若干小组，以10人为1组，每组每周聚会1次，或酌情另定期限；各组推选组长1名（由执委会委任），组长每周向会员收取1便士作为本会的基金。如有可能，每个城镇应按照城市自治法分为若干区分部，各区会员应每月聚会1次，听取报告并传达会务情况。上述各区领导人应当出席每月的例会，斟酌汇报该区所属各小组情况。各分部和区的第1次集会应选定一名收款员并提请执委会委任，其职责是向各班长收取他们会员的会费，收款员要在每周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把会费交给该城市和选区的司库。每个主要城镇都应成立1个由9人组成的市镇委员会，其中设助理司库和书记各1人。地方司库应当从分部收款员处收取会费款，所有的会费应交给上述城镇或郊区的协会，后者应当每月一次将上述款项的一半移交给总司库并提交用款报告。全国宪章协会的首脑机关为执行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设司库和书记各1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由全体大会选出，并且支付薪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兼任特派员，总司库每周在宪章运动的报纸上公布帐目收支情况。

全国宪章协会是一个从地方向中央递进的严密的组织机构。其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不再像国民大会那样，是一个由临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松散的讨论机构，而是对基层组织具有指导职责和权力的执行机构。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一切场合都应代表协会的利益，坚持协会的政治要求。它已具备了一个工人政党在组织方面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全国宪章协会这种高度的组织

性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所不能比拟的，它为日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还选出了全国宪章协会临时执委会。李奇担任第一任主席，威廉·蒂尔曼担任书记，艾贝尔·海伍德担任司库。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及其组织计划得到各地宪章派组织的普遍欢迎和支持。1840年底，有70个支部加入全国宪章协会。到1841年2月，该会已拥有282个支部，会员总数达1.3万人。到1842年夏季，它拥有7万会员。其影响远远超过注册会员的范围。40年代后，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在宪章运动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1841年6月，全国宪章协会选出了第一届执委会，由李奇等5人组成。以后，奥康诺每年都被选入执委会，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1841年大选

1841年夏季，英国大选开始。自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英国一直由辉格党执政。但1837年以后，辉格党政府采取了种种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因而声名狼藉，无法控制议会的多数。为了挽回影响，辉格党墨尔本内阁在任期将满之际采取了一系列微小的改革措施，试图骗取公众的信任。辉格党内阁提出的措施主要有3项：一是废除现行的谷物法，代之以每夸特8先令的固定税率；二是统一自由生产的食糖和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食糖二者的税率；三是降低进口木材的税率。1841年5月，墨尔本内阁在下院提出上述措施，并提出预算案，遭到下院多数的否决。6月5日，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利用国内对辉格党的不满情绪，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辉格党政府辞职。不久，议会也宣告解散，并决定在7月举行大选。宪章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应采取何种策略，这是宪章派领袖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大多数工人阶级民主派人士决定采取在大选中支持托利党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托利党系在野党，工人群众对它怨恨较少。其次，工人阶级对辉格党不满由来已久，因为辉格党实施了济贫法修正案，通过乡村警察法建立“穷人的巴士底狱”，囚禁了成百上千的宪章派人士。第三，一些托利党人从反对工业资本的立场出发，支持工厂立法改革，因此工人们在感情上与托利党较为接近。

1841年5月3—28日，宪章派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对宪章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有时候宁愿接受真正专制的政府统治，也不能接受背信弃义的伪善的政府统治。我们生来是辉格主义和托利主义的敌人，既然不能把两个党派一齐消灭，我们奉劝你们还是利用其中的一个党派作为消灭其他一个党派的工具。我们奉劝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推翻执政党的候选人。”然而，宪章派对于在大选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其意见并不一致。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在大选中拥护那些在议会中赞助宪章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人士，这是宪章派在无法使自己的候选人竞选获胜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第二种意见是把击败辉格党人作为宪章派的主要任务。这种意见以奥康诺为代表。他认为应当支持托利

I.Epstein, *The Lion of Freedom*, P.258.

NorthernStar, May22, 1841.

党以推翻辉格党的统治，因为辉格党一旦当选，便会在下一个7年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但如果他们被击败，将会较容易听取宪章派的要求。第三种意见以奥布莱恩及其支持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能抱任何希望。托利党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仇恨一切民主事物，宪章派不能帮助托利党取胜。但奥布莱恩等也不赞成和中等阶级联合，因为中等阶级的利益和宪章派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应当通过选举的手段来达到发动暴动的目的。一般说来，奥布莱恩的主张坚持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原则，而奥康诺的主张则较富于现实性。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地方的宪章派坚持奥布莱恩的主张。7月3日，《北极星报》发表指导性文章，号召工人阶级不要支持辉格党或托利党。在莱斯特，宪章派推选奥康诺为候选人，约克郡西雷丁区推选哈尼和皮特基思利为候选人，班伯里推选文森特为候选人，北安普顿推选麦克道尔为候选人，里兹推选李奇和詹姆斯·威廉斯为候选人，纽卡斯尔推选奥布莱恩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宪章派的这些活动表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已经作为一个较为自觉的阶级去独立进行斗争，而永远不会再追随资产阶级或土地贵族的政党。

斯特季和全国选举协会

从1841年秋天起，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已近在眼前，阴云开始笼罩全国。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在经济危机时期取得工人阶级的某种谅解，以渡过难关。工业资产阶级及代表其利益的改革派加紧活动，争取与宪章派的联合，这集中表现在以斯特季为首的全国选举运动中。1841年夏季，辉格党在大选角逐中败北以后，反谷物法同盟便开始了这一运动。它的发起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非国教徒报》的编辑爱德华·梅尔，一个是约瑟夫·斯特季。爱德华·梅尔是基督教会非国教化的鼓吹者，坚决主张基督教会不接受国家的财政资助，反对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他同情工人群众的遭遇，赞成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约瑟夫·斯特季是贵格教徒、谷物代理商，1826年加入反奴隶制协会，投身博爱主义运动。1833年布鲁姆勋爵发布解放奴隶的法令后，斯特季和朋友们发现殖民地学徒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奴隶制的残余。他搜集了各种证据，在《西印度群岛》杂志上撰文抨击，并向下院提出证词。一年以后，议会取消了奴隶制的残余。1838年，斯特季被选入伯明翰市参议会。在1839年“牛场”事件中，他努力使当局与宪章派和解，以防止发生更大的冲突，尔后，他又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冲突是由警察的暴力造成的。他努力争取为被捕工人减刑，就此而言，他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作为中等阶级的一员，斯特季曾目睹英国统治阶级不予工人普选权所造成的严重阶级对立，威胁着有产阶级和社会秩序的安宁。对此，他心中充满忧虑。他曾促使布莱顿和科布登等人 and 宪章派合作，但没有任何结果。

1841年10—11月，斯特季等人发起了全国选举运动，旨在使人民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完全的、公正的和自由的代表制”。11月7日，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同盟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斯特季指出，“我们现存的议会代表制根本不健全。”会后斯特季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1842年1月，这一派确

定把“全国选举协会”作为其组织名称，并起草了一份题为《和解》的文件，向工人阶级提出联合的建议。这个运动很快得到布莱特、乔治·汤普逊、劳伦斯·海沃恩等中等阶级改革派人士的支持，但它始终未取得绝大多数反谷物法同盟成员的支持。全国选举运动是由反谷物法同盟中一批较为激进的人士所发动的民主政治运动，它在英国40余个大城镇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由于全国选举运动愿意接受普选权的要求，同时由于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失败后一些宪章派老的领袖产生了动摇和调和的情绪，因此斯特季派阶级合作的主张在一部分宪章派领袖中得到了响应。洛维特创立的“全国促进人民的社会和政治改进协会”在这年10月曾发表一份《致中等阶级书》，其中提出“希望看到所有明智的和优秀的阶级在将来共同理智地为在社会和政治上重建人类社会而工作”。显而易见，这当中已包含了阶级合作的思想。

1842年1月，斯特季起草了一份以政治经济民主为内容的备忘录，把它送到洛维特的全国协会征求签名，然后呈送给维多利亚女王。1842年2月11日，斯特季等人在伦敦皇家铁锚酒家召开了一次争取普选权的集会，激进派议员克劳福德、托马斯·斯宾斯、约翰·布莱特以及赫瑟林顿、洛维特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双方自由地交换了看法。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斯宾斯和扬在讲话中强调要把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洛维特在讲话中对人民宪章作了一些解释，并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说明宪章派反谷物法请愿是与工人阶级相敌对的行为，因此，自由贸易派必须表明他们是否赞成人民宪章。

1842年4月5日，在曼彻斯特滑铁卢大街召开了一次大会，斯特季、沃德、斯宾斯、布赖特、索里、洛维特、柯林斯、文森特、尼索姆、奥布莱恩和理查逊等103人出席了会议。这当中有一些是不赞成奥康诺某些做法的老宪章派领袖，还有一些是宪章派教会运动的参加者。整个会议始终避而不谈全国选举协会的纲领。因为斯特季派从来没有准备接受宪章派的纲领。宪章派代表通过洛维特的动议提出了自己的六项要求，并逐条为大会通过。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的纳税人代表制的决议案被否决。布莱特提出的3年召开一次议会的提议也只得到少数代表的支持，斯特季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宪章派的6条要求只有前4条能接受。爱德华·迈尔则认为宪章派过早提出其要求是不明智的做法。宪章派不希望失去中等阶级的支持，因而作出了让步，大会决定晚些时候再召开一次会议，以便在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全国选举协会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那天，全国宪章协会也在伯明翰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代表们坚决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部要求。奥康诺和李奇出席了这次大会。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立下誓约，我们继续始终如一地为实现宪章的全部要求进行鼓动。我们认为，谁要是删减人民宪章的要求，那么，不管他是谁，也不论以何种名义，都是和工人阶级相敌对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和这个全国性的运动无关。”这实际上是对全国选举协会大会的挑战。

1842年宪章派国民大会

M.Hovell, *Chartist Movement*, P.243.

W.Lovett, *Life and Struggle*, P.227.

NorthenStar, April 9, 1842.

宪章派在工人群众革命热情重新高涨的情况下，着手准备进行第二次全国请愿，以争取实现人民宪章。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为第二次全国请愿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草案，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宪章派国民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请愿书的内容并不限于人民宪章所包括的政治民主要求，它还包含了劳动群众对所遭受的种种疾苦的抗议以及经济方面的要求。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宪章派组织接受了执委会的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为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征集签名的运动。这次全国请愿书上签名的总人数达到 331 万多人，远远超过了在第一次全国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

1842 年 4 月 12 日，宪章派国民大会在伦敦舰队街约翰逊酒家召开，共有 2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只有 7 人是 1839 年第一次国民大会的参加者。新选出的代表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有些是宪章运动中新涌现出来的勇敢坚定的领导人。和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的构成不同，这次国民大会已没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国民大会代表构成的变化，是 1839 年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日益增强的结果。它预示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将在较高的基础上展开，决非第一次高潮的简单重复。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能征集到比第一次请愿书多一倍的签名，除了与 1846 年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有关外，还和宪章派基层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分不开。全国宪章协会经过两年的发展，到 1842 年已与 400 个以上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并设立了地方支部。登记在册的会员达 4 万多人。1839 年北安普顿只有二三个宪章派团体，到 1842 年已有 10 多个。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兰开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组织也和北安普顿一样，有了相当的发展。宪章运动复兴以后，一些老宪章派领袖由于醉心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离开了宪章运动的领导集团，但 1839 年以后又涌现出一批新领袖。詹姆斯·李奇是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用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工人群众，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此外，像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利物浦的威廉·琼斯、贝尔斯托、约翰·坎贝尔都是杰出的地方宪章运动的宣传鼓动家。坎贝尔写的小册子《谷物法探讨》在与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约翰·麦克法兰是北安普顿宪章协会的书记，他在宪章运动低潮时期为保存宪章派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活动家长期不懈的努力，宪章运动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掀起高潮。

第二次全国请愿书

1842 年 5 月 2 日，一支庞大的护送全国请愿书的队伍从宪章派国民大会的会场出发。由各地的宪章派成员组成的队伍长达 2 英里，数以万计的群众聚集在队伍经过的街道两旁。到达议会后，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邓库姆向下院递送了请愿书。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同第一次全国请愿书相比，更富斗争性和革命性。它和第一次请愿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仍然以《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以成年男子普选权为中心的六条要求为口号，但在其它内容上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全国请愿书没有单独论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第二次全国

请愿书则明确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请愿书写道：“在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成千上万的人由于不能维持生存的需要而濒于死亡。你们的请愿者意识到，贫穷是罪恶的首要原因。”“你们的请愿者要求你们议会注意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工资和那些非生产者的薪俸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使统治者富有而奢侈，使被统治者处于贫穷和饥饿。”“你们的请愿者知道女王陛下每天可获得 164 镑 17 先令 10 便士的私人用款，同时也知道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日每人的收入还不到 4 便士。你们的请愿者还知道阿尔伯特亲王每天的收入为 57 镑 10 先令，而这个领地上的纳税人却不能指望每人每天有 3 便士的收入维持生计。”“你们的请愿者控诉，劳动时间，特别是工厂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人们难以忍受的程度，人们在闷热和简陋的厂房内进行非人的劳动，所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力和因体力过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你们的请愿者要求议会注意到农业劳动者不能靠工资取得温饱这一事实，当看到那些用他们辛勤劳动为人民生产主要粮食的人取得非常菲薄的工资，不能不感到吃惊和愤慨。”“你们的请愿者深切痛恨这个国家所存在的任何一种垄断，他们毫不犹豫地谴责对生活必需品和工人阶级最需要的那些物品征收任何赋税。他们也意识到取消垄断并不能使工人摆脱贫困。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拥有一种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利。你们的请愿者郑重地指出目前对于选举权、纸币、机器、土地、出版物、交通工具、宗教信仰的种种垄断，还有其它许多不胜枚举的苛政，都是由阶级立法产生的，而你们的议会却向来致力于增加这样的垄断，而不是努力减少它。”“从送到议会的许多请愿书来看，你们肯定是熟悉工人阶级的痛楚的。你们的请愿者要求你们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工人的问题，那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解除他们的痛苦，因为你们的请愿者的意思是：社会不平等实在是一种最坏的立法，把它留待人们用暴力和革命去消除。如果人们的苦难被忽视，请愿被蔑视，那么，发生暴动和革命是可以理解的。”请愿书提出了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使其得到温饱、废除济贫法和“济贫院”等工人阶级独立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第二次全国请愿书是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文件，它表明工人宪章派已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划清了界限。到 1842 年，宪章运动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

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邓库姆在将请愿书提交议会的第二天，即 5 月 3 日，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予以支持。邓库姆在演说中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300 万人只是整个英国成年男性公民的一部分，也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有 100 万以上的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邓库姆在演说中回顾了 18 世纪末以来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发展，他特别谈到历史上诸次改革都是和人民的骚动不满相联系的。在 1842 年的今天，社会情况不仅不好，而且比 1830 年时更糟糕了。他认为下院对于此时人民的意愿并不了解。邓库姆有所选择地宣读了 8 封来自设菲尔德、沃尔弗汉普顿、伯恩利、爱丁堡、普雷斯顿的书信。信中用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阶级的悲惨情景。

下院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贸易派的议员鲍林、菲尔登、罗巴克、韦克利和休谟等人先后发言支持邓库姆。托利党和辉格党议员则在发言中表示反

P.Hollis (ed),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1973, PP.217—223.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Vol. , PP.1115—1127.

对，他们敏感地察觉到宪章派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工人阶级要求政治民主的背后，隐藏着对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威胁。辉格党议员在议会辩论中表示反对普选权，一位议员认为普选权对政府和贵族政治都是致命的威胁，而且它是与文明完全不相容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而请愿者是要把资本和积累的财产都置于工人的支配之下。这就意味着对财产的没收和对富人的剥夺。他坚决反对通过请愿书。拉塞尔勋爵在发言中攻击宪章派用以论证自己政治要求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法理论，他援引古代的宪法条文证明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是没有理由的。和麦考莱相似，拉塞尔勋爵认为，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最有效的维护社会完整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的法律支柱。资产阶级议员把请愿书视为“对我们国家宪政的责难，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责难。”资产阶级把持的议会对于具有鲜明工人阶级性质的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表示了比 1839 年时更加强烈的仇视和敌意，最后以 287 票对 49 票否决了请愿书。

1842 年夏季大罢工的酝酿

到 1842 年夏季，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工业区工人的贫困状况日益加剧。工人的工资一减再减，成千上万的工人收入难以糊口，社会动乱和反抗有增无已。设菲尔德当时征收的济贫税比 1840 年增加了一倍，但贫民每周只能得到 1 先令稍多一点的救济，远不足以维持生存。在这种背景下，以兰开郡棉纺织工业区为中心的工人大罢工应运而生。地方宪章派组织和工会组织是罢工的积极组织者和发动者。

1842 年 5 月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被否决以后，曼彻斯特机械工人工会进一步加强和宪章派的联系。5 月 31 日晚，当地机械工人工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多数人同意加入全国宪章协会。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成员李奇在会上发表了讲话。6 月 15 日和 7 月 12 日，曼彻斯特的铁匠和锻工分别举行大会，通过加入全国宪章协会的决定。事实证明，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在夏季罢工以前很久就已和全国宪章协会发生了密切联系，并接受了人民宪章。

总罢工的第一阶段

1842 年总罢工以兰开郡为中心爆发。在总罢工爆发前一个星期爆发了作为先导的斯塔福德郡矿工罢工。

8 月 8 日是总罢工的第一天。早晨 5 时在海伊举行了工人集会，工人领袖克罗斯利等人在集会上讲了话，并决定向达肯菲尔德、阿希顿等地进发。到早餐后重新集结时，已有 1.4 万人。当队伍来到一家工厂附近时，那里的工人纷纷穿上外套，离开工厂，加入罢工工人的队伍，达肯菲尔德的亨德莱工厂也举行了罢工。有些地方的工厂主关闭厂门，不准工人们离厂罢工，工人们捣坏大门，冲出工厂。到下午 2 时，斯塔布里奇、阿希顿、达肯菲尔德

Schoyne, *The Chartist Challenge*, PP.111—112.

Mick Jenkins, *The General Strike of 1842*, 1980, PP.137—138.

所有的工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到这时，阿希顿的马凯特广场挤满了工人群众，后来者再也无法挤进会场。于是，大会移到一块较大的草地上去举行。下午3时，草地上已聚集了4万以上半饥饿状态的、衣衫褴褛的工人。在下午的大会上，理查德·佩林等人讲了话。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反对雇主削减工资、要求劳动一天应有一天公正的工资以及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法律的决议。下午4时，佩林率领4000—5000名阿希顿工人来到奥德姆，受到那里工人们的热情欢迎。随后，阿希顿许多工厂都举行了罢工。晚上7时，罢工工人召开了一次大会，有8000—10000工人参加了大会。

8月9日这一天，曼彻斯特及周围工业区的工厂都举行了罢工，许多工厂在几分钟内便人走厂空。罢工工人破坏了一些厂房和设施，其中以伯利工厂的斗争最为激烈。当局派出军警，并且使用了棍棒，企图平息这家工厂的罢工，但没有成功。政府增派了装备有来福枪的步兵和一队龙骑兵包围了这家工厂，并在工厂附近实行戒严，昼夜巡逻。9日下午3时，罢工工人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工人们在冲突中表现非常勇敢，打伤警察和警官多名。9日夜間和10日早晨，曼彻斯特和萨福德的几家工厂的工人也同军警发生了冲突。

阿希顿、斯塔布里奇的工人是这次罢工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大罢工中起了推动作用。8月10日，阿希顿和斯塔布里奇的罢工工人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罗其代尔。第二天上午10时，成千名来自阿希顿、斯塔布里奇和奥德姆及其它城镇的工人也来到罗其代尔，随后这些工人迅速散开，分别到各工厂中去进行动员工作。罗其代尔的绝大多数工人表示愿意参加罢工，他们拔去锅炉的塞子，加入了罢工的行列。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发生任何捣毁工厂设备的现象。到12日中午，罗其代尔所有的棉纺织厂和毛纺织厂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生产完全停顿下来，罗其代尔成为罢工的一个中心。

8月12日，在普雷斯顿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他们为争得一天的工作有一天公正的工资而举行罢工，他们将继续为实现人民宪章而奋斗。12日傍晚，所有工厂都举行了罢工。8月14日早晨，罢工工人在查德威克果树园召开了群众集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当游行到卢恩大街时，同萨缪尔·巴尼斯特率领的临时警察遭遇。罢工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市长宣读《暴动法》时，愤怒的工人用石块掷击市长，把《暴动法》公告从他手中打飞。市长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站在队伍前列的几位工人当场牺牲，一个工人的腿被打断。牺牲者中有一位梳毛工人，名叫伯纳德·麦克纳马拉，年仅17岁。至少有7人受了重伤，鲜血染红了普雷斯顿街道。

8月15日早晨哈利法克斯的工人举行了集会，随后，他们同来自兰开郡的罢工工人汇合。这支罢工队伍总人数为2—5万人，由好几个城镇的工人组成。在鲍林·狄克工厂，有6名罢工工人被捕，示威工人试图救出被捕者，因此同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射击。在韦尔兰，军队再次向罢工工人开火，但军队的暴行没有能压服罢工工人。下午2时，有1—1.5万人参加了斯克考特荒原大会，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第二，使工人的工资恢复到1840年的水准；第三，雇主得保证工人生活不再低于1840年的水平。工人们表示，不答应这三项条件决不复工。

在这一时期，整个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已经发动起来，大约有25万工人投入了罢工。

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

8月15日上午10时，曼彻斯特地区各业工会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舍伍德旅馆开幕。大会选举亚历山大·哈钦森为大会主席，查尔斯·斯图亚特为书记，同时成立了3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身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会场外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大会的结果，但后来被军警驱散。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一些代表作了报告。第2天上午10时，代表大会继续进行，旁听席上挤满了工人，会场外仍聚集着无数群众。会上，亚历山大·哈钦森宣读了代表大会告群众书。这份文件指出，代表大会代表广大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外没有其它的财富，他们生活在工人之中，他们决不会只管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让别人去干有害于工人利益的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大会作报告。有些代表报告了他们所在地的工人对罢工斗争究竟是为争取人民宪章，还仅仅是为提高工资的看法。有些代表则向大会报告了当地罢工工人的所有要求。染织业和服装业工人的代表兴奋地报告说，当地支持罢工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工会会员的人数也增加了。大会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最主要的议题上，即采取措施使大罢工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而斗争。曼彻斯特代表马诺里提议，派出代表到全国每个地方去宣传人民宪章的要求使各阶层人士都停止工作，即发动一次总罢工，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但是，同意总罢工的代表人数不多，一些代表对举行总罢工提出修正案，有的代表提出资助罢工工人及其家庭，有的则希望取得小店主和中等阶级的支持。当会议讨论到罢工究竟是以工资问题为主，还是应转到为实现人民宪章而斗争这一问题时，持前一种意见的只占少数，因为代表们看到，单纯进行经济斗争不可能长时间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大会主席查理·斯图亚特总结说：“为了保持我们的工资，最要紧的是取得政治权利。”大会进行了表决，141位代表中，赞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罢工的超过了120人，只有7人赞成以提高工资为目标。大会向工业区的工人群众发出一份“告群众书”，文件写道：“会议代表谨建议：我们所代表的各个选区将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实现人民宪章。同时我们还建议派遣代表分赴全国各地，努力争取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合作，以实现有关罢工的决议，直到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为止。”

宪章派国民大会和大罢工

8月16日，国民大会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教堂秘密举行，国民大会迅速作出一项决议，决定继续罢工，直到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活跃在兰开郡和柴郡的宪章派活动家麦克道尔指出，国民公会应当采取和各业工会一致的政策，鼓动和支持工人总罢工。库帕支持麦克道尔的意见，他认为总罢工必然会导致一场全国范围的斗争，而政府必然会使用武力来镇压罢工工人，因此要想和平进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民的武装来反抗资

产阶级政府。宪章派必须动员群众，把他们变成不可抗拒的力量。奥康诺反对麦克道尔和库帕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不是讨论打仗。”《北极星报》编辑希尔提出，宪章派准备不足，两手空空，没有能用来战斗的武器，如果仓卒战斗，只会被大炮轰散。他还认为罢工是由主张自由贸易的反谷物法同盟发动的，如果宪章派延长或扩大罢工，只会成为反谷物法同盟的工具。设菲尔德代表奥特利重申了希尔的第一点理由。国民大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表决，反对总罢工的只占少数。国民大会决定各业工会一致行动，参加罢工。大会通过的决议说，目前的罢工不是由宪章派团体发动的，但他们坚决赞成扩大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成为法律为止。决议要求代表们返回各地后对人民的活动给予正当的指导。这样，英国工人运动的两支主要力量终于融合在一起，因而使 1842 年总罢工具具有更加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内涵。

总罢工的第二阶段

曼彻斯宪章派国民大会的召开标志着 1842 年大罢工进入第二阶段。全国各地的宪章派基层组织纷纷响应大罢工的号召，工人阶级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动起来。原先较为宁静的地区，如南威尔士的默瑟尔河谷、苏格兰的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的纺织工业区也纷纷发动了罢工。这时出现了“拔塞”运动。在罗其代尔，有 5000—6000 工人到各个工厂，拔掉锅炉上的塞子，让锅炉中的水流光。但工人的斗争是有节制的，他们不像早年的卢德派那样捣毁机器。在罢工中，各地工人相互支持，如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筹集了一笔款子，派代表送到哈利法克斯等地，帮助那里的工人。

8 月中旬以后，罢工向其它地区发展。8 月 16 日，敦堤召开了群众大会，第二天，有 4000 人参加了示威游行。8 月 18 日，在马格达仑广场召开了 1.4 万余人的群众集会。到 22 日，敦堤大多数工厂停工，直到 8 月 27 日还未复工。据《北极星报》报导，杜斯伯里城完全被罢工工人控制。8 月 22 日，卡莱尔城发生了罢工，罢工波及到周围较小的城镇。莱斯特郡和希罗郡煤田的矿工相继进行了罢工。8 月 29 日，诺威治的花布织布工人举行了罢工。同一星期，诺丁汉郡有 7 座矿井的工人加入了罢工者的队伍。

在斯塔福德郡北部的汉莱、斯托克、芬顿、朗顿、滕斯托尔等城镇是著名的瓷器和陶器生产区。8 月 15 日，当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这一地区后，这里立即召开了大会。随后，汉莱附近的陶瓷工人和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攻打汉莱的警察所，工人们用缴获的警棍武装自己。随后，他们袭击了济贫税征税所和陶瓷工业区的请愿法庭。以后，一批群众袭击了治安推事的住宅和斯托克堡的济贫院，捣毁了朗顿的违警犯罪法庭和警察局。他们还捣毁了莱顿的警察局和瓷器工厂主查尔斯·马森的住宅。当局从纽卡斯尔调来军队，逮捕了一批罢工工人，但到夜间，军队被迫撤离陶器工业区。这样，陶器工业区完全掌握在罢工工人手中。

大罢工的失败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第 129 页。

MickJenkins, op, cit, PP.206—207.

1842年夏季大罢工最终失败了。从8月中旬以后，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宪章派人士。奥康诺、李奇、坎贝尔等一大批宪章派活动家被逮捕，或交保候审。起草“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告群众书”的麦克道尔受到当局通缉，被迫流亡国外。参加大罢工的积极分子也遭逮捕，仅西北地区就有1500名以上罢工工人被捕受审。1842年8月底，在索福德的中审法庭，有199名被捕者被定为重罪犯，还有159人被定为轻罪犯。10月5日，在柴郡有55人被提交审讯。在利物浦有11名工人被判处流放，此外有215人被监禁。

1843年3月兰开斯特巡回法庭对奥康诺等58人进行审讯。被审讯的除奥康诺外，还有希尔、哈尼、库帕、麦克道尔、理查德·皮林、詹姆斯·李奇、比利斯、多伊尔等全国性的工人领袖。当局在起诉书中罗织了9条罪状，指责他们“蓄意在国内和平臣民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和惊慌，以便对我国依法制订的宪法实行某种强制性的、非法的重大改革。”宪章派分子在受审中与当局展开了斗争，他们用充分的事实证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正义的。宪章派的表白表明他们是为自己起码的温饱而斗争，而不是什么暴徒和骚乱者，他们得到各阶层正直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共向下院递交了近1000份请愿书。由于被捕者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法庭和议会内外民主派人士的努力，迫使审判长判处被捕宪章派分子和工人无罪，没有一个人被判刑。

宪章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决裂

1842年12月27日，全国选举协会在伯明翰继续开会，宪章派活动家奥布莱恩、奥康诺、洛维特、柯林斯等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出席了大会，斯特季担任大会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恩克斯提出一项动议，把全国选举协会起草的“人民的权力法案”提交大会讨论。这一法案共有96项条款，尽管在内容中包括了“人民宪章”的六项要求，但它丝毫不提“人民宪章”这一名称。中等阶级改革派企图取代工人宪章派在争取普选权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把宪章运动纳入中等阶级改革运动的轨道。这一动议引起了宪章派的极大不满。洛维特首先发言，他希望删除议案中关于“以全国选举协会所提出的法案作为讨论基础”一节。他说，如果普选权协会不这样做的话，他就行使自己的职责，把人民宪章作为讨论的基础。洛维特指责斯特季派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几个月前在这个城市与你们相聚时，我们真诚地相信，你们不会擅自采取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违背的措施，而现在，你们却卑鄙地提出这一提议。”在场的宪章派代表听了洛维特的发言十分激动，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先前对洛维特极不信任的奥康诺当场发表讲话，支持洛维特的立场，对洛维特表示赞赏。他说：“我曾误解了洛维特先生的诚实和纯洁。因此，我应毫不犹豫地洛维特先生表示深切的歉意。”“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洛维特先生能用这个机会来捍卫原则，而且走在我前边。”他希望宪章派加强团结，不要再勾心斗角。中等阶级代表劳伦斯·海伊表示：“我们将拥护你们的原则，但我们决不会接受你们的领导。”海伊无意道出了问题的实质。詹姆斯·威廉斯在库帕的支持下，提出折衷的意见，把双方的文件都作为请

愿书的基础，但多数代表反对这样做。宪章派代表不愿放弃人民宪章这面旗帜，因为他们为这个纲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中一些人因此被捕、受审判，甚至牺牲了生命。宪章派和中等阶级无法在取消还是保存人民宪章这一点上达成协议。最后，大会就斯特季派的议案和宪章派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洛维特的修正案得 193 票，斯特季派只得 94 票，宪章派击败了斯特季派。斯特季随后宣布，他和他的同事将撤出这个大会，单独进行活动。这样，宪章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了决裂。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 年宪章运动的挫折给宪章运动的领袖以很大的打击，他们中一些人发生了动摇，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丧失信心，转而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计划。早在 1841 年 7—8 月，奥康诺还被囚禁在约克监狱时，就已提出了通过实行小土地所有制以解救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劳动者的计划。1843 年 4—5 月，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扼要地介绍了他的土地计划。他打算用 40 块总面积为 2 万英亩的土地安置 5000 人，每人可分得 4 英亩土地，在每块土地上建立图书馆、医院和学校。这年夏季，他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小农场的实践工作》的一部分，介绍了他所设计的独立土地所有和耕作制度，希望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奥康诺的土地计划得到了宪章派以及与小农经济有广泛联系的劳动群众的共鸣和呼应。1843 年 9 月 5 日，宪章派国民大会在伯明翰召开，有 3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了两项任务，其中之一为购买土地，为失业者提供谋生手段。会议决定通过会员的捐赠设立一笔土地基金，购置土地，然后划成以 4 英亩为单位的小农场以安置失业者。伯明翰宪章派国民大会是实行土地计划的前奏。

40 年代，宪章派同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展开了斗争。这一斗争经过两个阶段。如果说 1842 年以前工人阶级民主派同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同情的话，那末，1842 年以后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其对立明显加强。1842 年 3 月，自由贸易派在曼彻斯特破坏了宪章派的一次集会。1843 年，反谷物法同盟在农业区发动了攻势，他们积极争取佃农的支持，建立了中央农业保护协会，加速推行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和宪章派争夺群众。从 1844 年初开始，基德·狄克森、韦斯特等宪章派领袖领导了与自由贸易派的斗争。1844 年夏季，应北安普顿居民的邀请，宪章派同自由贸易派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辩论在 8 月 5 日举行，科布顿、布赖特和宪章派领袖奥康诺、惠勒、克拉克、麦格拉斯等参加了大会。科布顿首先发言，他竭力把反谷物法同盟的事业说成是正当的事业。到会的宪章派代表都希望奥康诺发表雄辩有力的演说，彻底击败科布顿。但奥康诺的演说却毫无力量，对于与自由贸易有关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始终未能透过表面探究问题的实质，使满怀希望的宪章派代表非常失望。奥康诺在大会上提出的修正案主张，为使自由贸易政策对各方面都无偏袒，应公平地调整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这是一个

Thomas Cooper, *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1971, PP.225—226, P.227.

Thomas Cooper, *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1971, PP.225—226, P.227.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第 135 页。J.T.Ward, *Chartism*, 1973, P.173.

缺乏斗争性、旗帜不鲜明的修正案。经过表决自由贸易派的决议案获得通过。

奥康诺在与自由贸易派辩论时之所以软弱无力，其根源在于他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坚决反对者，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从未超越过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主张用小土地私有制来代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他在自己的思想武库中无法找到足以击败自由贸易派的有力武器。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离开巴门来到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工厂（又称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当时还是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恩格斯来到工业区以后，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大量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在女友、爱尔兰青年女工玛丽·白恩士带领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斗争活动。他发现工人阶级蕴藏着巨大力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以后，恩格斯和宪章派活动家哈尼等人建立了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结识了詹姆斯·李奇，他是《北极星报》忠实的读者。回到德国后，恩格斯在1845年3月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用大量材料揭露了工人阶级受奴役被剥削的悲惨状况，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进行了研究，指出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大动荡，造就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恩格斯研究了早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揭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一次指出宪章运动的根本弱点是与社会主义理论相脱离。他指出，宪章运动只有同社会主义相结合，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既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

宪章派土地公司

1845年4月，国民大会在伦敦召开，会议通过了奥康诺起草的关于创立宪章派土地合作社的报告。宪章派土地合作社宣告成立。其任务是：购买土地，安置社员，以向全国证明土地可以使他们摆脱资本家的压榨，并可争取人民宪章迅速通过。土地计划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假如能集资5000英镑便可购地120英亩，安置60人。以后通过收取租金或分期出售土地的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款项，用于购置新的土地，安置新的社员。这样发展下去，便可以解决大批剩余劳动者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宪章派还成立了奥康诺、惠勒、麦格拉斯、克拉克和多伊尔5人组成的土地合作社董事会。土地计划符合那些刚刚加入产业工人队伍以及自己或前辈还和农村保持某种联系的半无产阶级的传统心理和愿望。英国工业革命刚结束时，这类工人有相当的数量。因此，土地计划受到热烈欢迎，大批股金源源不断而来。从1846年到1848年初，报名参加土地合作社的有数万人。1846年12月，土地合作社易名为全国合作土地公司，同月，创立附属于它的全国土地和劳动银行。1847年6月，土地公司在北方拥有86个分公司，在米德兰拥有48个分公司，在南部有89个分公司，在伦敦有24个分公司。1846年3月和1847年8月，土地公司先后买下在赫罗斯格特、劳班德、斯林格安德和威特尼的几块地产，但规模仍十分有限，到1848年为止，仅安置200名劳动者。这些土地的经营

状况不佳，社员们没有充裕的收入，甚至交不起地租。奥康诺的土地计划遭到哈尼和奥布莱恩的批评，他们主张土地公有和国有化，反对奥康诺的小土地私有制计划。琼斯起初支持土地计划，后来他开始认识到这个计划的不现实，转而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30—40年代，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欧洲大陆国家先后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失败后，大批革命流亡者来到英国避难，其中有一些是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他们先后成立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各民族博爱和正义的兄弟协会”。在这些国际性联合组织的基础上，1845年9月，在伦敦成立了“民主兄弟协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左翼宪章派的代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以及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流亡者。沙佩尔和莫尔在该组织的思想上和策略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1845年9月22日，民主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哈尼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强调各国民主运动具有共同的目标。发言者在谈到各国人民的团结时，认为无产者在反对政治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国际性的合作。在欧洲大陆无产阶级的影响下，英国的宪章派的思想水准有所提高，他们由原来倡导一般的国际民主派的合作上升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民主兄弟协会选出了6名书记，由3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其中英国的书记是哈尼，德国的书记为沙佩尔。民主兄弟协会的组织方式和以后的第一国际非常相似，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主兄弟协会是第一国际的雏形和前身。由于民主兄弟协会是一个以宣传、联络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因此，它的组织不那么严密。左翼宪章派组织积极参加了民主兄弟协会的活动。

三、1848 年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宪章运动的复兴

1847 年秋季，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商业和工业出现了大萧条。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促使英国宪章运动再次高涨。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伦敦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当法国革命爆发以及路易·菲力普逃跑的消息传到会场时，宪章派和各国民主派欢欣鼓舞。3 月初，民主兄弟协会和全国宪章协会派哈尼、琼斯和麦克拉思前往巴黎向法国人民表示祝贺。

1848 年 3 月，英国许多城市举行了群众集会。3 月 6 日，伦敦举行了要求取消所得税的集会，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同一天，格拉斯哥发生了饥饿示威和暴动，政府逮捕了 64 名群众。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决定 4 月初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并向议会递交全国请愿书。

4 月 4 日，宪章派国民公会在伦敦举行。大会代表共 47 名，后增加到 49 名。所有重要的宪章派领袖都出席了大会，代表们带来了大批请愿书的签名。会议集中讨论了宪章运动所面临的形势、工人群众的状况和情绪，同时还讨论了斗争步骤。各地区的代表分别提出了报告。与 1839 年和 1842 年两次宪章运动高潮时一样代表们讨论了策略问题。4 月 6 日，国民公会经过反复讨论和商议，通过了一顶关于行动纲领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如果递交下院的请愿书被否决，他们将在 4 月 24 日召开一次国民会议，以便向女王递交请愿书。国民大会决定 4 月 10 日在伦敦肯宁顿公地举行群众集会，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

肯宁顿公地请愿

随着 4 月 10 日的临近，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日益惶恐，他们准备镇压宪章派请愿。4 月 7 日，议会制订了“重罪法”和“外侨法”以对付国内外革命者。当局作了精心部署，派出 4000 多名警察防守泰晤士桥、肯宁顿公地和威斯敏斯特桥，并从外地调运大炮和 3000 多名士兵到首都。在宪章派将要经过的一些重要地带和建筑物设置了防御工事。此外，政府还从本国资产阶级和外国显贵中征募了一批临时警察，总数为 8.5 万人。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使英国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他们抛弃了民主的假面具，站到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保卫者。当时流亡伦敦的路易·波拿巴也报名参加临时警察。

4 月 10 日上午 9 时，宪章派国民大会开幕。雷诺兹担任大会主席。上午 10 时，代表们在工人的护送下从大会会场出发，上午 11 时到达肯林顿公地。这时人数之多已不可精确计数。《伦敦每日电讯报》估计人数为 8—10 万人，《泰晤士报》估计为 1—2 万人。《非国教徒报》估计为 15 万人，《北极星报》报导为 25 万人。当请愿书运抵广场后，警察局派人把奥康诺和另一位领导人·马格拉特找去，不准游行队伍通过泰晤士大桥前往议会大厦。奥

康诺随即答应放弃原订的示威到议会的做法。下午 1 时，集会解散，3 辆装着请愿书和签名的马车驶向下院。奥康诺向议会呈递了请愿书。1848 年宪章派全国请愿书的内容和 1842 年的请愿书很相似。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有 570.6 万人。议会把请愿书交付一个委员会审查，直到 1849 年 7 月 3 日议会才正式讨论请愿书，这时宪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议会在毫无革命压力的情况下对请愿书进行表决。最后，以 222 票对 27 票否决了请愿书。第三次全国请愿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宪章派领袖脱离工人群众，他们已不能反映工人宪章派的革命要求。其次，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压力下倒向反动统治阶级，使宪章运动失去了同盟者。4 月 15 日，宪章派国民公会通过了一份致维多利亚女王的备忘录，揭露了政府剥夺人民自由的卑劣手法，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

1848 年 5 月 1 日，宪章派国民会议在伦敦约翰街学院召开，有 29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狄克逊担任会议主席。会议选出琼斯、基德、利奇和麦克道尔等人组成临时执委会。会议讨论了重新组织宪章派力量等事宜。左翼宪章派代表主张对于政府的高压政策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因为失败而灰心丧气，但会议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土地公司的衰落和资产阶级改革派

40 年代中期蓬勃发展的宪章派土地公司现在也到了最后阶段。土地公司经营不佳，管理不善，财务收支混乱，此外，它没有经过正式登记，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宪章派土地公司的怀疑、嘲笑和攻击接踵而来。5 月 24 日，下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宪章派土地公司的业务。经过调查，该委员会在 6 月和 7 月提出了 5 份调查报告，认为土地公司的文件和簿册极不完善，财政情况不佳，应授权有关方面结束这一公司的业务。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土地公司的活动仍持续了 3 年，但那只不过是微弱的尾声。

肯宁顿公地请愿的失败，加快了一些宪章派和中等阶级妥协的步伐。请愿失败的第 2 天，经李奇提议，宪章派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反对把中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任何攻击的决议。1848 年 3 月 22 日，在伦敦建立了“人民宪章同盟”。参加者有几百人，其中包括库帕、沃森、赫瑟林顿及林顿。以后，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普雷斯，议员布赖特、科布登、休谟等人也加入了这组织。法国二月革命后，洛维特提出了一项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的计划，并在 4 月 8 日成立了“人民联盟”，这个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人民宪章同盟”的成员。

1848 年春，布莱特和科布登发起“小宪章”运动。他们提出的纲领被称为“小宪章”，它删改了“人民宪章”的 3 项内容，用户主选举权取代普选权，用 3 年召开一次议会代替每年召开一次议会。他们希望在修改人民宪章

D.Godway, London Chartism 1838—1848, 1982, P.76.

J.T.Ward, Chartism, P.210.

A.Hadfield, The Chartist Land Company, 1970, PP.51—64.

Royle, Chartism, 1980, P.45; J.West, op.cit.P.259.

的基础上和政府达到政治妥协。休谟还在下院提出五项动议，建议把选举权扩大到户主。休谟在议会中的活动失败以后，他们转向工人阶级寻求支持。1849年1月29日，这批资产阶级改革派成立了“全国议会和财政改革协会”。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宪章运动右翼的响应。奥康诺和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委员克拉克以及雷诺兹、麦格拉斯和霍利约克随后都表示支持休谟派的活动。

民主兄弟协会的改组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遭到各国反动政府迫害的革命者和政治流亡者一时云集伦敦，他们的思想极其混杂。1849年10月，民主兄弟协会进行了改组，哈尼参加了协会的改组和新章程的制订工作。11月3日，民主兄弟协会的新章程在《北极星报》上刊登。新章程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在提倡国际主义时，特别强调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第二，在谈到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解放问题时，它明确指出既要摧毁封建主义的压迫，又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在这样的革命纲领基础上改组重建的民主兄弟协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1849年12月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以研究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的问题，有2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五人执委会。会上，奥康诺和克拉克主张向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进行合作。克拉克认为，宪章运动已经结束，工人阶级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和中等阶级合作。哈尼驳斥了克拉克的论调，他指出，宪章派在资产阶级改革派面前奴颜婢膝对宪章运动本身毫无益处，相反，得益者是资产阶级改革派。在临时执委会内右翼分子的压力下哈尼被迫辞去临时执委会委员的职务，以示抗议。在1850年1月14日的群众大会上，双方继续展开争论。哈尼得到宪章派群众的坚决支持。1月间，临时执委会进行了改选，左翼宪章派有5人当选，以5比4取得优势，但双方的矛盾已根深蒂固。克拉克等人在1850年3月创建了“全国宪章联盟”，加快了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的步伐，同时在《北极星报》上发表长篇大论攻击哈尼和宪章运动。他们还剥夺了哈尼在《北极星报》上撰文反击的权利。哈尼断然退出奥康诺等右翼控制的《北极星报》，以示抗议。

T.Frost,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1980, P.203.

Northern Star, Nov.3, 1849.

Schoyne, op.cit.P.195.

四、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左翼宪章派与马克思

在政治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手以后，哈尼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更加密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左翼宪章派领袖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战友。3月6日，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刊登了哈尼给奥康诺的一封信，哈尼在信中捍卫了独立工人运动的原则。1850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兴地写道：“左翼宪章派这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比较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诺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帮助而大大提前了。”1849年春季，哈尼开始筹办《民主评论》月刊。该刊物的创办和发行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同时也成了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阵地。恩格斯专门为该刊撰写了《十小时工作制问题》，该刊还连续刊载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一些章节。哈尼也在该刊发表文章，剖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小宪章”运动。这份杂志起了组织一批坚定的工人宪章派展开斗争的作用。1850年，英国各地工人成立了20余个协会，隶属于民主兄弟协会。

1850年6月，哈尼创办了另一份杂志《红色共和主义者》。该刊保持《民主评论》的革命精神，第一次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杂志编辑部在为《共产党宣言》写的编者按中指出：这是“德国革命者中最先进的政党的卓越文件。”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1848年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在欧洲大陆已无法栖身的时候，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共产党宣言》，无疑是一种勇敢坚定的革命举动。《共产党宣言》在宪章派刊物上发表，表明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左翼宪章派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红色共和主义者》杂志创刊号还刊登了署名霍华德·摩尔顿的文章，题目为《1850年的宪章运动》。这篇文章强调指出：“1850年的宪章运动和1840年的宪章运动完全不同。英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已经证明，他们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迅速走上了革命的最前列，他们单纯政治改革的观点已经发展为社会改革的观点。”在7月13日出版的另一期《红色共和主义者》上，霍华德·摩尔顿又写道：“在红旗指引下的宪章主义为工人的要求辩护，它传播‘劳动者的福音’，它确认，穿粗棉布夹克和戴纸帽的工人比那些穿貂皮袍戴贵族式帽子的人更高尚。”“目前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在红旗旗下集合我们的无产阶级弟兄，开展民主和社会的宣传，即为‘宪章和更多的东西’而请愿。”50年代初期，“宪章和更多的东西”已成为左翼宪章派同资产阶级的“小宪章”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口号相对立的口号。它反映了宪章运动后期，左翼宪章派把比“人民宪章”这样纯粹民主性要求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内容纳入了自身的纲领之中。

1850年7月，琼斯获释出狱。第2天，宪章派在伦敦举行隆重的欢迎晚会。哈尼、惠勒、林顿和奥布莱恩都出席了这个晚会。琼斯在会上宣布，他

Red Republican, June 22, 1850.

Red Republican, July 3, 1850.

赞成和所有开明的阶层联合，但决不在牺牲原则的基础上实行这种联合。

奥康诺此时在政治上已沦为工业资产阶级改革派的附庸，他追随科布登，参加了在埃尔兹伯里举行的公众集会。会上，他对科布登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伦敦召开的一次集会上，克拉克也一反常态，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表示支持。奥康诺、克拉克等人的右倾态度引起了广大宪章派的不满，在 1850 年 1 月 14 日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哈尼批评了奥康诺等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这次大会以后，里兹、布雷德福、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地都举行了工人集会，哈尼派和奥康诺派继续展开论战。以哈尼为代表的左派得到广大宪章派的支持，在 1850 年 6 月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的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选为执委的主要是左派人士。1850 年宪章派内部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合作制问题。右翼宪章派主张把创办合作商店作为活动的主要内容。在同年 10 月 20 日曼彻斯特的集会上，琼斯指出：“一些人对你说，社会合作运动会带来宪章，然而合作运动不过是那些拾掌权者牙慧之辈的运动，”深刻揭露了某些宪章派人士的不切实际。

1851 年 3 月 31 日—4 月 10 日，宪章派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了国民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许多代表对奥康诺倡导的和中等阶级改革派妥协的主张失去了热情。奥康诺出席了这次大会，但没有起什么影响。代表们经过讨论，通过了由琼斯等代表执委会起草的 1851 年宪章运动纲领。这是宪章运动中思想水准最高、社会主义内容最多的一个纲领。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宪章运动领袖的影响。这个纲领的导论部分指出，宪章派组织应当有别于其它任何成份混杂的政治组织，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鉴于此时宪章运动群众基础日益衰落，纲领强调了争取农业工人支持的重要性。导论还强调了工人阶级争取全国和地方政权的重要性。它强调，政治变革必须伴随着一场社会变革，否则无法奏效。纲领还包括了在各个领域进行社会改造的设想。例如，纲领指出，土地是全人类不可剥夺的财产，土地国有化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源泉，政府应当购置土地作为国家财产，安置人民，人民则应向国家交纳地租，并禁止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再转让出去。在劳动法一章中，纲领强调，劳动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必须改变劳动者目前所处的被压迫地位，改变劳动隶属于资本的不合理状况。纲领还强调，发展合作是改变不合理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手段。总而言之，1851 年宪章运动纲领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但在某些理论方面还比较模糊。如在国有化方面，没有提出银行国有化和交通国有化等内容，也没有提出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更没有提到剥夺工厂主和地主的财产。

1848 年以后，大批外国的政治民主派人士和革命者由于在本国遭到反动政府迫害而流亡到英国的首都伦敦和其他一些大城市，进行政治避难。一般来说，这些流亡者同情并接近宪章运动，但其中各种思想和政治派别极为复杂。如何对待这些政治流亡者，宪章派领导人意见不一。哈尼当时不顾思想和政治见解，竭力把各种类型的民主派纠合在一起，以壮声势。他还把各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视为真正的革命家，和他们一起建立委员会，开展各种活动。哈尼还让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派的学说。哈尼邀请路易·勃朗、科西迪耶尔等为《民主评论》杂志撰稿，

John Saville (ed) , Ernest Jones : Chartist , 1952 , P.38.

John Saville (ed) , op.cit.P.258.

并连载路易·勃朗论述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史的长篇文章。他把在英国复兴宪章运动的希望寄托在与欧文主义、合作主义及各种政治流亡者的联合上。1850年夏末，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等人成立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其中不少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哈尼与这个组织来往密切。1850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维利希、沙佩尔从“左”的盲动路线出发组成宗德崩德，进而发展成为分裂的宗派。哈尼同这一派联系密切，1851年2月24日，他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等联合召开了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施拉姆和皮佩尔在会上挨了打，哈尼却对此无动于衷。这一事件表明哈尼完全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忍无可忍，恩格斯断然拒绝给哈尼主办的《人民之友》写稿，同哈尼决裂。琼斯同哈尼的关系也开始疏远，并最后决裂。

1851年3月，琼斯创办了《寄语人民》周刊。他认为，在50年代初英国所处的形势下，首要的不是政治鼓动，而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在工人阶级中播种革命的种子，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力量。在哈尼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上去以后，《寄语人民》事实上成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刊物，它曾发表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文章。1852年5月，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协商会议上，琼斯当选为三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宪章运动的主要领袖。

1852年初，琼斯着手创办《人民报》，因为此时《北极星报》再次易主，左翼宪章派已不可能利用它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1852年5月8日，《人民报》出版了创刊号，该报主张在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它提出，“宪章是一个引路人，它将把社会权利带到人民的家中。”马克思极其关心《人民报》的出版工作，他动员一些共产主义者为报纸撰稿，他本人也为《人民报》写了大量文章。这个时期由于宪章运动有组织的人数大大减少，《人民报》在财政上不时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濒临破产的境况。由于马克思的帮助，这个时期的《人民报》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琼斯在报上较系统地探讨了与工人阶级社会解放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力图使1851年纲领具体化。他指出，如果1851年纲领的一切措施都得到实现，就可以使每个人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劳动，自己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他指出，工人掌握生产资料，把工业生产的占有权从资本家手中转到工人手中，是实现社会平等最可靠的方法。“有了政权，人民就能够获得社会幸福。”《人民报》深受工人群众的喜爱。但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时，琼斯认为和平的方式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1853年9月爆发了著名的普雷斯顿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持续了7个月之久。各地宪章派组织积极支持这次罢工。在这些日子里，琼斯产生了一个把各业工人和工会组织起来召开一次“工人议会”的计划。1853年11月20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成立了“群众运动”委员会。它具体负责“工人议会”的筹备工作。1854年3月6日，“工人议会”在曼彻斯特人民大厦召开，5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主要来自曼彻斯特周围地区的工会和宪章派组织，全国各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幕那天，

F.G.and R.M.Black (eds) , Harney Papers , 1969 , PP.253—254.

People's Paper , March 11 , 1854.

代表们选举马克思等人为名誉代表，并邀请马克思到会。马克思未能到会，但他给工人议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努力把工人的注意力引到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去。会议通过了一项“工人议会纲领”，其中心内容是组织和合作的原则问题。纲领还设计了“群众运动”的组织机构。

宪章运动的消失

到 50 年代中期，由于群众性日益丧失，宪章运动逐渐衰落。只是在个别特别有基础的地区还保持着强大的力量。1858 年 2 月 8 日宪章派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民大会。41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来自伦敦地区的有 13 名，来自米德兰的有 9 名，来自兰开郡的有 5 名，来自约克郡西雷丁区的有 4 名，工会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在讨论和中等阶级联合的问题时，大会否决了彼得·亨利特提出的在坚持人民宪章的基础上和中等阶级联合的提案。会上，琼斯提出了实现男子普选权的方案以及宪章派拒不接受任何“不公正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的意见，暗示可以和中等阶级实行联合。在讨论中，绝大多数人主张和中等阶级实行和解。这一事件表明琼斯已不能反映和代表工人阶级的要求。会后，琼斯的主张遭到工人宪章派的严厉批评。伦敦 100 多名宪章派活动在分子在签署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面对着一个振振有词的和中等阶级结盟的协议，我们发现，我们的事业在堕落、在被人嘲弄。”“过去发生的一切已清楚地表明，单依靠社会上其他阶级，工人阶级无法争得自己的自由。”这表明英国工人宪章派群众保持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他们是宪章运动精神的真正体现者。琼斯对中等阶级的妥协态度使他的声誉迅速下降，《人民报》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859 年 9 月《人民报》转手后停止发行。

第四节 资产阶级政治的发展

工业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英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党制度、政府机构及其职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作为资产阶级政治集中体现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有显著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如果把英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发展看作是从16至17世纪开始的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末本章所讨论的时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成熟时期。但是，英国政治若干传统特征在这个时期继续表现出来。

一、政党制度的演变

1832年以后半个世纪中，英国政党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成份和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渗透影响较之过去都有了较突出的发展。但两党在社会阶级构成上继续保持了前一个时期各自构成十分复杂，相互间阶级差别不十分明显的痕迹。随着两党构成中资产阶级成份不断增加，两党组成不断发生交错和相互渗透，两党的政治色彩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到19世纪中叶，在两党构成中土地所有者的成份仍占相当的比重，它们还没有哪一个可以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资产阶级政党。

在1832年，辉格党的主要成份是地主阶级。在辉格党下院议员中，土地利益的代表所占的比例高达59%。以后土地贵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1837年为56%，1841年为49%，1847年为54%，1852年为43%，到1868年下降为30%。可以说，在1848年以前辉格党仍然是一个以地主为主体的政党，但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成份在逐渐增加。1832年在辉格党议员中铁路业、矿业和工厂主的代表仅有39人，1837年为43人，1847年为70人，1852年为79人，以后到1868年增至199人。但直到60年代后期，辉格党中工业资本的代表的人数还没有超过土地利益的代表。

托利党（保守党）的构成在这个时期也缓慢地发生着变化。这个政党中土地利益的代表人数这个时期没有明显的减少，但金融家和工矿企业主的代表有较大增长。商人代表由1832年的8人增加到1865年的15人，金融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9人增加到1866年的40人，铁路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1人增加到1865年的55人，工矿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4人增加到1865年的12人。但是在1852年保守党议员中地主阶级的成份仍占63%，直到1868年才下降为50%。也就是说，在本章讨论的时期，保守党仍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党。

两党在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名称及其政治信条也发生了变化。

托利党向保守党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托利党的名称和政治倾向都开始变化。人们逐渐用“保守党”一词来称呼托利党。“保守党”一语最早是《季刊评论》在1830年1月使用的，但使用该词的文章并非如通常所说那样系克罗克所写，撰稿人可能是富勒顿或未勒。以后，“保守党”一语逐渐取代了“托利党”，但在一些场合也仍有用“托利党”一词的。1832年以前，托利党人在伦敦没有固定的集会场所。1832年3月，皮尔和威灵顿接受了霍尔姆斯的提议，在伦敦卡尔顿巷肯星顿勋爵的宅邸建立了卡尔顿俱乐部，每个会员每年需交纳会费10镑。成立当月便有500名保守党人加入卡尔顿俱乐部，以后要求加入者剧增。卡尔顿俱乐部遂成为保守党活动中心和总部，直到1868年。保守党的活动

詹宁斯：《英国议会》，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4—68页。J.A.Thomas, The House of Commons, 1832—1901, 1939, P.4, P.6, P.7, P.14.

N.Gash, Re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English Politics 1832—1852, 1865, P.131.

R.Stewart, Found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830—1867, 1978, PP. 72—73; M.Ostrogorski, Democracy

分子和议员在这里集会，听取党魁的指示，协调保守党在各地的活动。地方保守党组织的负责人来伦敦，可以在这里找到和会见党的领袖。以后由于要求加入者激增，卡尔顿俱乐部容纳不下，又建立了小卡尔顿俱乐部，并在帕尔梅尔建立了新的保守党俱乐部——宪政俱乐部。保守党在各选区建立了登记协会。1833年达勒姆郡建立了第一个郡的保守党协会，到1837年，登记协会在全国已极为普遍。保守党还设立了总督导员、总选举代理人和选举委员会，协调保守党在下院中的活动，帮助其候选人在各地进行竞选，但这个时期保守党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党组织。

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化的实质，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党转化为一个具有地主—资产阶级混合成份的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转化的政治路标便是《塔姆沃斯宣言》。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因是1832年议会改革中托利党的败北。1830年大选中，托利党在下院取得348席，反对派别拥有310席。但是在1833年12月的大选中，托利党只取得185席，辉格党及其支持者却获得473席。

在这种形势下，托利党内一批温和派主张在保持大地主利益的条件下，兼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皮尔在讲话时强调，“我们否认在我们与中产阶级之间有任何利益的分界线或其他分界线，”就表明了这种妥协态度。1834年底，当时任首相的皮尔在塔姆沃斯选区发表了竞选演说，认为1832年改革的结果是无可挽回的现实，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他表示他和他的同僚将执行一种谨慎的改革政策，“公正地不偏不倚地照顾到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在内的各种利益。”皮尔这一著名的政策性演说在历史上被称为“塔姆沃斯宣言”。它反映了一部分托利党人不再坚持代表前工业化社会的政策，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改革采取现实主义的妥协态度。

1841年保守党在大选中以367席对291席获胜，9月皮尔组织了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皮尔政府面对当时商业和农业的萧条和赤字增加，降低和取消了若干种进出口关税，并在1844年通过银行法案，控制货币总额，规定发行纸币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和铸币作保证，限制私人银行的货币发行权。皮尔并于1846年1月22日在下院提出废除谷物法提案。该法案得到保守党和辉格党内的自由贸易派和激进派的支持，以327票对229票获得通过。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政府全面放弃保护关税政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然而，皮尔派即自由贸易派在保守党内只居少数，以本廷克、米尔斯和狄斯雷利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坚决反对皮尔派的主张。1846年7月皮尔政府垮台，保守党发生了分裂，皮尔派退出了保守党，以后狄斯雷利为首的右翼控制了保守党。皮尔派在皮尔死后走上与自由主义者联合的道路，后来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加入了自由党。

辉格党向自由党的转变 反谷物法同盟

“自由党”这一名称广泛使用于1834年至1835年间，当时把“自由党”视为“改革派”的同义语。1834年辉格党人布鲁姆在和格雷以及阿索普的谈

and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1922, Vol.I, P.145.

R.Black,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Churchill, 1970, P.297.

H.J.Hanham (ed), Nineteenth Century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PP.212—215.

话中使用了这个词。拉塞尔勋爵则在 1839 年给女王的信中把辉格党称为自由党。30 年代中期受托利党的卡尔顿俱乐部的启发，激进派摩尔斯沃思在 1836 年建立了“改革俱乐部”，随后便有 600 余人登记加入。参加者不限于激进派，许多辉格党人也加入这个俱乐部，改革俱乐部成为辉格党的重要组织。但改革俱乐部的建立并没有完成把辉格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到 19 世纪 50 年代，辉格党人中尚有 1000 余人拥有大宗地产，其中有三分之一有贵族爵位。1832 年以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围绕自由贸易政策展开的斗争和国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都给辉格党很大的冲击。

30 和 40 年代的辉格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同托利党的争夺也不应当视为资产阶级同地主贵族两大阶级的斗争。这时两党的差异并没有明晰的阶级分野，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倾向上。对于 1832 年改革，托利党认为是改革的终点，而辉格党人则主张逐步继续推行改革。托利党坚持上院的独立性和国王的特权，反对侵犯国教徒的财产特权，而辉格党不同意托利党的这些政见。这个时期的政党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 18 世纪贵族政治时代那种斗争的继续，而两党政治上界限模糊正在于其阶级构成并无本质差别。

19 世纪 30、40 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发展起来，但这支力量不是在辉格党内而是在辉格党外以“反谷物法同盟”为核心汇合起来。1836 年，下院激进派议员格罗特、休谟、摩尔斯沃恩和罗巴克在伦敦建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太阳报》是它的机关报，但这个协会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1838 年 9—10 月一批工厂主在曼彻斯特成立了新的反谷物法协会，科布登不久便加入了这个协会。1839 年 1 月，来自 36 个城市的反谷物法派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会议，并在 3 月底正式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它主张以合法的手段建立地方组织，进行宣传，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争取废除谷物法。同盟的总部设在曼彻斯特。1841 年 1 月，该同盟的主要活动家科布登和鲍林分别在斯托克堡和博尔顿当选为下院议员。这是一个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1846 年 6 月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也自行解散。科布登等一批反谷物法同盟成员以后成为自由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N.Gash, op.cit.P.165.

D.Southgate, *The Passing of the Whigs*, 1832—1886, 1962, P.70.

D.Southgate, op. cit.P.77.

二、政府机构的建设和国家干涉职能的加强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国家机构很不健全，近代形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很好地完成机构设置，因此国家不能很好地管理国内外事务，也不能很好地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状况是工业化完成以前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缓慢的一种反映。随着工业革命完成和近代资本主义关系最后确立，以及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改造国家制度中旧的痕迹使之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任务越发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19世纪中期，英国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加紧了建设工作。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1833年以前，英国的地方行政机构由大约15,500个教区、5000名左右经王室任命的治安法官和200个王室特许的选区构成。从1688年政变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的地方行政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每个教区独立地负责管理贫民救济、维修公路以及维持乡村治安等工作。地方治安法官在完全独立于中央当局的情况下行使职权，王室和中央政府很少过问地方行政事务。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地方自治权很大，无政府倾向非常严重。19世纪初，英国许多地方仍存在着市镇自治团体。这种组织通常为代表地方利益的人和寡头所控制，对地方事务持不负责任的态度。1833年6月，下院改革委员会报告说，“目前存在的市镇团体已不适应现存的社会状态。”于是，同年7月，辉格党内阁建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现存的城市自治团体的情况，约翰·布莱克斯通为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帕克斯为书记。该委员会经过广泛的调查，于1835年4月提出一份卷帙浩繁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辉格党政府颁布了1835年市镇法，对地方政府实行改革，宣布取消200余个古老的市镇自治团体，改设179个市镇选区。在这些选区中，所有的纳税人都拥有选举权，城镇由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进行管理，市长和市参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取消治安法官，设立由监督委员会控制的警察，由他们负责维持秩序，用以对付城市工人的反抗。市政委员会不得再利用其财产和权力为少数人谋利，他们必须把收入纳入选区基金中，并把所有的剩余基金用于居民。1835年市镇法使伦敦以外的城市选区实行了自治，对于各市镇寡头集团是一个打击，由此开始了地方政府的改革。1835年市镇改革的实质是保证了倾向于辉格党的城市新兴中等阶级对大多数城镇的控制，同时强化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对地方行政的干涉和控制，并用警察制来防范劳动人民日益加强的反抗。

然而，市镇法尚未彻底改善地方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1835年以后，根据不同时期先后颁布的法令建立的各种行政机构其职能和管辖范围发生严重的交叉和重叠。全国地方行政单位计有52个郡、239个自治市、70个市区、577个乡村卫生区、424个公路区、649个济贫联合区、194个街灯守望区，此外还有教区2万个左右。地方行政组织需要继续整顿和集中权力。直到1888

Asa Briggs,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1959, P.276.

H.J.Hanham (ed), *Nineteenth Century Constitution*, PP.386—390.

年和 1894 年颁布两项地方政府法，才最后完成了这个任务。

国家干涉职能的加强

英国的中央政府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仍然极不健全。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众多问题迫切要求完善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和职能。从 19 世纪初起，英国议会和政府首先在贫民救济、公共健康、铁路和工厂制度、囚犯管理、教育、矿山和移民等方面成立了 16 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协助政府调查了解各方面的社会问题。根据这些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政府加强了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以后逐步建立了相应的中央各部。对于贫民救济问题，1834 年对旧济贫法进行了修正，实行了在济贫院内救济贫民的原则。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也加强了管理。工业革命后期大批贫民拥入了新兴工业区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在这些城镇工人居住区拥挤不堪，疾病流行。1843 年以巴克卢奇为首的王室委员会奉命调查健康卫生情况，提出了详尽的报告。1845 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宣布应当采取立法措施改进工人居住区的卫生条件。1848 年通过了“公共健康法”，1854 年建立了卫生部。在 1825 年英国第一条铁路建成后，铁路业发展很快，但私人所有的铁路不受约束，政府无权过问铁路业，也无法有效地促进交通业的发展。1844 年贸易部长格拉斯顿通过议会委员会调查后于 6 月 20 日提出一项提案，授权贸易部在任何一条铁路获准经营 15 年并取得相当利润 3 年后加以收购，或对其经营严加控制。这项法案后经修改通过成为立法。

19 世纪的国家干涉还表现在对工厂制度的监督方面。在格雷政府执政时期通过的工厂法规定 13 岁以下的儿童除在丝厂工作者外，每天劳动不得超过 9 小时，还规定设立巡回视察员 4 人，他们有权到工厂调查受雇童工的状况。皮尔政府在 1844 年通过的工厂法扩大了视察员的权限，他们可以调查所有的工厂和学校，可以就工人在工厂遭伤害的事件提出起诉。

David Roberts, *The Victorian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1960, pp. 327—333.

H.J. Hanham (ed), *op. cit.* P. 341.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 516—520 页。

第五节 19世纪30至50年代英国的思想和文化

19世纪30至5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引起了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反响。在英国出现了一批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的自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作品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强化同时也产生了各种流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的思想文化。30至50年代是英国思想文化领域极其活跃的时期。

在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暴露和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背景下，英国在20到30年代出现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阐述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中，利用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他们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吸取了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认为利润是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推断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对劳动者产品的无偿占有，得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结论。他们中有汤普逊、霍奇斯金、勃雷、格雷等人。

威廉·汤普逊（1775—1833）出生于爱尔兰考克市。他最初受到功利主义者边沁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想影响，后来与边沁和欧文在思想上分手，并与他们展开了辩论。他看到阶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阶级去反对穷人。1824年他发表了主要著作《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1827年又发表《劳动的报酬》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劳动者在财产分配中的地位。他关心劳动者的利益，认为保护劳动者是平等的同义语。他认为分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劳动者应当有拥有所有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他根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说：资本“纯粹是由劳动加上物质资料创造出来的”，资本决不是物质资料的创造物，“死的物质资料不能创造任何东西。”

他努力探求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它牺牲广大生产者的利益而使少数人致富，使贫苦的人陷于绝望的贫困中？”他指出，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是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托马斯·霍奇斯金（1827—1869）是劳动价值论的积极宣传者。他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注意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回国后他目睹了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物浦等地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同边沁展开了辩论。他著有《为劳动辩护，驳斥资本的权利》、《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和讲演集《通俗政治经济学》。他在1823年参与创办伦敦技工学院，并创办《技工杂志》。霍奇斯金从批判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对早期工人运动很有吸引力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工人是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但是，资本家为了攫取利润，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是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政府不过是经济统治的一种工具。立法者是那些不劳动而又无法以什一税的方式掠夺自然财富之辈。土地所有者通过地产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教会通过什一税，而资本家则通过侵占劳动成果致富。霍奇斯金虽然指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

Richard Pankhurst, William Thompson (1775—1833), British Pioneer Socialist Feminist and Co-operator, 1954, P.48.

Richard Pankhurst, op.cit.P.26.

但他反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认为夺取政权是有害的和多余的。

约翰·勃雷（1809—1895）是工人出身的欧文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他指出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劳动者与不劳动者，全部利益是从生产者那里来的。“资本家和业主们对于工人一星期的劳动只付出了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在一星期中可获得的财富的一部分。”“资本不是自生自存的，所以现在在大不列颠的大量积累，都不是资本家劳动所生产出来的。生产者只要努力，那末他们的锁链将会永远挣断。”勃雷曾积极参加了里兹的宪章运动，并在1841年出版了《乌托邦人的海外游记》，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希望。

由于一些后李嘉图学派的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借助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古典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来说已成了一种颇具危险性的学说。所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开始抛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是通过“修改”和“补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原为律师，从1825年起任牛津大学教授，1830年离开牛津，参加政府各种委员会的活动，1847年重新回到牛津大学任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大纲》、《人口论二讲》、《政治经济学结论》、《论工厂法对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等。西尼尔反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节欲论”。西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共同“牺牲”所创造的，“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乐和休息所作的牺牲，而资本则是资本家的“牺牲”。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就应当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工资的定义是劳动的报酬”，“利润的定义是节制的报酬”。西尼尔对资本家的“节欲”加以颂扬，要求以巨额利润来对资本家这种“自我节制”给予慷慨的报酬。他反对当时正在开展的争取“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制运动，提出“最后一小时论”。他说，工厂主的利润是工人工作时间内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如果把工作日从11.5小时缩短到10小时，那末工厂主的利润就会消失，工厂就会倒闭，工人也就会失业。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接受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他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折衷主义的特征。他目睹了40年代英国尖锐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承认工人阶级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但他主张用立法支持对财富的分散，这样做就可以使私有财产的原则不会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相联系。他劝导工人阶级不要轻举妄动，要有理性。在利润问题上，约翰·密尔接受了西尼尔的“节欲论”，把利润看成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他歪曲李嘉图关于有效用的商品交换价值来源的分析，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在政治观念方面，密尔宣传人性和资产阶级自由，认为充分的个性发展才是个人幸福的根本，并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宣传自由放任主义。在国家观念方面，密尔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代议制政体，主张把英国的国家权力交给议会行使。

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第52—53页，第19页。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93页。

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边沁的弟子，著有《教育篇》、《政府篇》，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政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詹姆斯·密尔的长子约翰·密尔写下了《代议制政府》、《论自由》、《功利主义》等著作。他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自由主义，在要求国家考虑人们的利益和幸福的同时，也要求人们承认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接受国家的统治权和控制权。它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加强干涉作用的理论基础。

在法学方面，约翰·奥斯丁（1790—1859）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法理学家。他从1826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主讲法理学，创立分析法学派，著有《法理学范围》、《法理学讲义》。奥斯丁认为所有法律和规则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人类需要法，是因为法对人类有用。他反对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力说，认为一切权利都是主权者赋予的，是法律造成的。认为国家主权应有一个确定的人物代表，当权者的权力有绝对性、至高无上性和不可分割性。他认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在法。他的法律分析的主张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

第九章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

第一节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英国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化的实现导致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1850 年—1873 年常被称为维多利亚中期大繁荣时代。1848 年英国生产了占世界产量一半的生铁。在以后的 30 年中又使产量增加了两倍。生铁大多用于修铁路和造船，英国资本家出资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印度修筑了当地的主要铁路。至 1860 年占世界人口 2%和欧洲人口 10%的英国几乎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 40—50%，欧洲工业品的 55—60%。1850 年世界近 60%吨位的船舶在英国登记。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依靠整个世界作为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棉纺业不断在印度和东方开拓市场。在 1850 年英国有四分之一的生铁出口，而在不久前仅只有十分之一。英国棉纺业的原料棉花主要来自美国南方，毛纺业的原料则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另外英国大量对外投资，英镑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货币。1875 年对外投资至少已达 12 亿镑。

1870 年英国对外贸易量超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据统计，在 1850 年左右，英国控制了世界 20%的贸易量，占工业品贸易的 40%。在 1860 年左右，英国占了欧洲对外贸易量的 30%，欧洲出口工业品的 43%。具体地说，英国的出口总值从 1830 年的 6900 万镑增至 1850 年的 1.97 亿镑。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没有与之相当的工业和商业竞争者。与法国着重生产奢侈品不同，英国主要生产价廉耐用的工业品和煤铁，尤以煤铁的产量激增最为突出。有人曾形象地说：“现在大法官坐在羊毛口袋上，但羊毛很早就不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宗商品。他应该坐在一袋煤上，虽然这不是很舒服。”据现代经济学家估计，英国的国民总收入 1831 年为 3.4 亿镑，而在 1851 年已增至 5.233 亿镑。这一切都是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工业革命及其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亨利·布思曾以生动的语言描述工业化的力量，“从西至东，从北至南，”“机械装置遍及四方。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新世界的大河汹涌奔腾，不可阻挡。”

19 世纪中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已在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直至 1880 年它始终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盛誉，并影响到国内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

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1982, PP.4—5.

P.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1983, P.251.

Trevor Mar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1987, P.167.

J.F.C.Harriso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1832—1851*, 1979, P.32.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ist History 1877—1901*, 1973, P.25.

一、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与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的欧洲国家如比利时、瑞士、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在工业革命中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大量可供开采的煤、充足的资金、适应新工作条件的劳动者以及注重技术进步的企业家。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了展示英国工业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会。在专门修建的钢架玻璃结构大厅内，陈列了1.3万件来自英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展品，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工业品。“美国、俄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西班牙派来了官员、名人和学者，急切地研究水晶宫（指玻璃展厅）和展品，要想带走一切在他们国内有用有价值的东西。”而工业化的完成又具体体现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一些方面。

人口的变化

工业化的过程与人口的急剧增加是同步进行的。19世纪英国人口增加的速度惊人，在1801年至1911年的110年间，人口从1050万增加到4080万，远远超过以前的增长速度。这种现象亦被称为“人口革命”。

人口的增长又以19世纪前期速度为快。在1811年至1821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17%，增长率到达顶峰。而在1851年至1861年间人口只增长了11%。1801年—1831年间人口年增长率为1.5%，而1831年—1851年间降为1.3%，后来又降为1.2%。英国人口的这种增长速度高于当时欧洲的任何国家。

这个时期英国大量对外移民，主要是向美国移民，另外还向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移民。19世纪英国对外移民占欧洲对外移民人数的36%。这种移民起了一种安全阀门的作用，缓解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并减轻了国内的失业和乞讨现象。同时拥有技术受过培训的移民去新的国家促进了所在国的发展，也为其母国英国开辟了潜在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移民在19世纪50年代速度更快，这其中有海运效率增加、费用降低的缘故。在19世纪对外移民的几个高峰时期是1851年—1855年、1881年—1885年和1896年—1905年。19世纪后期对外移民的增加是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趋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19世纪人口的增加仍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造成的自然增长的结果。在1841年—1880年间英格兰平均每5年的出生率很稳定，保持在35.2—35.8‰间。当时限制使用节育手段以及工业化带来经济的繁荣，使得一般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普遍增加，工作机会的增多导致结婚年龄的下降，又影响到生育。在工业区人口出生率要明显高于纯农业区。另一方面19世纪中期以后死亡率明显下降。1800前后死亡率约为25%，但在19世纪30年代死亡率长时期保持在22%左右，以后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又呈直线

Horace Greeley, *The Crystal Palace and its Lessons: A Lecture*, 1952, P.18.

B.R.Mitchell and P.Deane, *Abstracts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6.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7, P.172.

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P.22.

下降趋势。因而在整个 19 世纪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一直在 10% 以上，这是这时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时医疗条件的改善还是有限的，对许多疾病尚无能为力。1832、1849、1866 年三次疟疾大流行。肺结核仍是一种不治之症。居住条件拥挤和工作条件恶劣都影响居民的健康，医生和医院的数目也不敷使用，相当部分的工人还处在贫困之中。在贫民区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因而在 19 世纪后期不断有人提出要求改善卫生条件和工作环境。

对于人口增长早在 18 世纪末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就撰文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的生产只呈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增长最终会因死亡率的剧增而停止，除非推迟结婚以及夫妇节欲。这种观点对英国社会上层阶级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事实是并没有出现因人口压力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因为马尔萨斯是从传统经济的角度看待人口问题，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能够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并逐步提高其生活水平。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经济繁荣。

维多利亚中期的繁荣

1837 年 6 月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病逝，其女 18 岁的维多利亚公主继位为女王，在位时间一直延续至 1901 年她去世之时，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期英国进入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

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般被界定为在 1850 年至 1873 年间。而 1873 年以后则被称为“大萧条”时期。

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物价呈现同步的涨落，在 1849 年—1874 年间物价上涨，被有些学者称为“物价上涨的 25 年”。当然在此同时工资亦在大幅度上涨。物价的上涨主要体现在工业原料价格的上涨上，如棉花、羊毛、锡、糖等。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如棉布的价格则并不随之上升，即使上升其幅度也要小得多，而生铁、玻璃的价格实际在下降。这就保证了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也反映了英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加工能力。

探究这一时期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外在和内在诸方面的因素。1848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及 1852 年在澳大利亚发现大金矿，大量黄金进入流通引起物价趋升；1861 年—1865 年美国内战使南方棉花难以进入英国使英国棉花紧缺；克里米亚战争使英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战争开支来源于政府借贷而不是税收，促使物价上升；工业的迅速发展急需原料的影响；以及信贷不稳定造成的影响。

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量资金投入一些主要的部门：农业、铁路、建筑、工业生产、海外贸易以及资本输出。据统计在 50、60 年代用于交通、建筑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约为总投资的四分之三，与当时英国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发展相符。再细作分析，50 年代英国的投资方向注重对外，至 60 年代又转而偏重于国内。

R.A.Church,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1975, P.11.

W.Rostow, *The British Economy of the 19th Century*, 1948, P.23.

真正推动经济发展政策上的驱动力是自由贸易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对外贸易的发展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1840年—1860年纳税商品的种类从1100多种减少到50种。国外的制成品真正能与英国商品竞争的只有丝绸。减少关税结果只是促使英国工业品出口，同时进口更多的食品和原料。尽管进口货物价格没有下跌反而有所上升，但假如不减少关税，其上升幅度要大得多。进口的增加也提高了一些国家的购买力，使得它们能购买更多英国商品。1846年后向英国出口的主要三个国家是俄国、普鲁士和美国。1860年英法又签订了一项商约。该商约消除了英法之间的关税壁垒，英国削减法国酒的进口关税，而法国则削减英国出口的煤、铁、钢、机械和纺织品的关税。随后英国又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缔结商约，降低各国对英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1863年又进一步降低间接税。至60年代初英国终于彻底放弃了保护主义原则，以自由贸易作为国家指导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基本决策。这给英国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英法商约签订后的几年中英国商品出口法国的数量大增。在40、50年代出口法国的英国商品只占不到4%，而到70年代初上升至7%。与此相比法国工业品出口英国的数量却没有明显变化。

与商品输出相应的是资本输出，且输出范围已超出欧、美包括亚洲、非洲地区。在1850年以前，对海外的资本输出最多时达到2亿镑，英国的投资者每年从中获利1170万镑。1856年—1875年资本输出每年平均为7500万镑，其利润甚至超过每年借出的新款项。对外投资又与商品输出连为一体，如在印度、欧洲和美洲投资与当地的铁路建设有关，英国就此大量输出铁轨和机车。商品和资本输出成为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两根重要杠杆。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英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诸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要比农业快得多，劳动力的安排也有相应变化，企业规模亦是如此，最终是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产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实现，最明显的变化是农业不再占据重要地位。至 19 世纪中期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已不足四分之一，在 1870 年后农产品数量实际上已不再增加，在 1881 年农业收入为国民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与此相反是工业的不断发展，两者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来了个对换，工业吸收了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而在工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发展最为迅速，且这些行业如运输、银行、保险还直接为工业服务。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品中服务业附加在其中的价值比重越来越大。投入服务业的人力也越来越多，在 1841 年为 120 万人，至 1911 年达到 400 万人，尤其是在 19 世纪中期上升幅度最快，主要是因为铁路的发展以及政府军事活动的增多。

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就呈现出劳务结构变化的趋势，主要是白领劳动者的增加。同时在全国人口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略有下降。19 世纪前期城市工人的数目激增，后期则是职员、文官、教师等中产阶级数目的激增。

上述这种人力的重新分布是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一种典型现象，随之资金亦作相应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减少，但绝对数量并未减少。直至 1870 年农业总产量还在不断增加，只是劳动力因生产力的提高等因素减少。但技术的进步给工业提供增加生产的机会要远远高于农业，农产品生产增长的幅度要低于工业品，其收益也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另外农业亦易遭受国外竞争的打击，挤占其潜在的市场。因而至 19 世纪中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从乡村转向城市。农业工人的工资明显低于熟练工人（所谓“工人贵族”），甚至低于半熟练工人。

以前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产，土地贵族据此享有特权。在 19 世纪初土地约占全国资产的一半，而在 60 年代只占三分之一，1885 年时仅不足五分之一。可见在 19 世纪中期农业彻底让位于工业。同时商业、工业和金融业资本剧增，从 1830 年占总资本的 45% 增至 1885 年的 61%。

产业结构的变化除农业的衰落（相对意义上的衰落）外，还有其生产组织规模的变化。在 1851 年现代的工厂工业雇用了约 175 万工人，其中单在棉纺织工厂中就有 50 多万人，而在传统工业中还有 250 万工人。且在大工厂中的工人许多是年幼的女孩。在 50、60 年代现代工厂制度发展很快。至 1871 年在英国的 23,346 家工厂就雇用了 200 万工人，而在现代工厂之外的传统类型工业部门只有 53.5 万人。在 19 世纪中期家庭工厂制逐渐消失。

尽管现代工厂逐渐代替家庭工场，但大规模的工厂仍然很少。1871 年平

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P.73.

H.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1969, P.114.

Ibid, P. 119.

均每个棉纺织厂的人数是 171 人。而国内 2 万多家工厂平均每个厂为 86 人。比如在 19 世纪中期大部分造船厂规模并不大，但在 1871 年发明了铁壳船后每个造船厂平均有 571 人，成为英国劳动力集中的一个部门。真正采用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是钢铁业和煤炭业，在这些行业中广泛采用机器和蒸汽动力。小工厂中主要的动力仍是水力。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运输业，铁路引起运输结构的革命。在 50 年代英国的 27 个铁路公司，每个平均雇用人员在万人以上。海运业的状况也是这样，一个海运公司往往拥有一个船队。

总之，在 19 世纪中期产业部门出现了集中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旧式的产业是遍布在城乡的小规模工场，小高炉为利用水力彼此分散，利用蒸汽使纺织厂集中在煤田附近，主要是在北部地区。专业化的趋势是一个地区以一种工业为主，如兰开郡的棉纺业、约克郡的毛纺业、伯明翰的金属加工业，使得地区间发展出现不平衡。

城市化

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农村。城市化同时又影响到社会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文明。

1851 年英国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现象。在 1900 年以前没有哪个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英国 1851 年的水平。这时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很多，只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高于以前。因为农业工人的工资显然低于工厂工人，且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少。人口向城市集中源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铁路建设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甚至在一些大工厂周围发展出新的城镇，在铁路枢纽附近也有这种情况。城镇的经济发展吸收了农村的多余人口。除此之外，尽管城市人口膨胀导致生活环境恶化，极不卫生，工厂的严格纪律也使人十分不适，但城市生活还是有着很大吸引力，年轻人有机会过独立的生活，自己随意地交友，满足一种冒险和好奇的欲望。这种非经济的动因也推动了人口的流动。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很早就开始了，但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速度加快，一直延续到 1880 年，以后又慢了下来，因为农村已没有很多的过剩人口。据估计 1841 年—1901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人口大约减少了 400 多万，300 万人流向城镇，50 万人去矿区，还有一部分人流向海外。流向城市的人中约有一半去了伦敦。在 40 至 80 年代伦敦增加的人口中本城出生与外来移民各占一半。在外来居民中爱尔兰人占了很大比例。而英格兰人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的乡村。北部的工业城镇大多是吸收附近农村的居民。

大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大的城市是伦敦，居民早就超过百万，长时期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城市，直至 20 世纪初才被纽约超过。伦敦除了是个工业中心外，还是一个政治中心、重要的港口、商业和财政中心。在各地每个郡的首府以及地方行政中心也发展起来，至 19 世纪末

除伦敦外已有 7 个城市居民超过 40 万。在这 7 个城市中只有爱丁堡是个例外，它既不是工业中心，又不是主要港口，人口却增加得很快，因为它是苏格兰的首府，是北方的政治中心。

一些相邻的城镇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城镇群落，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利物浦、纽卡斯尔、格拉斯哥就是这样。城市郊区逐渐形成小城镇，城市人口向周围扩展，然而城市中心仍然存在。这种扩展是为了减轻污染和其他不卫生的现象。交通的发展又为这种扩展提供了便利。早期向郊区迁居的主要是富裕的企业家，有自己的马车每日进城。后来有了郊区火车，普通工人才能有条件住在郊区。实质上城市向郊区发展造成居住按阶层分区的现象。在 19 世纪中期旧的城市中心区人口反而有所减少，这些中心区往往也就成为贫民区，卫生、住房条件都很差。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性。狄斯雷利在曼彻斯特看到贫富不同区域的极大差别，以“两个国家”来形容这种现象。

在 19 世纪初大多数英国人是农业工人和乡村工匠，而在一个世纪后他们成了工厂工人或职员，住在城镇和郊区。一种大众化的工业城市文明随之出现。

三、各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

这一时期农业的地位在下降，其地位被工业部门所代替。当然这种下降也是相对而言的，农业产品数量还在增加。另外，以农业为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

英国的自然条件对农业很有利，只有西部和北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不利于谷物生产，但对畜牧业发展还是合适的，而东部和南部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形成与北部、西部不同的农业区划。

在工业化的同时农业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有人提出“农业革命”的说法。农业的这一进步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在19世纪初因一系列技术发明而较为明显，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

1846年废除“谷物法”，被看作是工业利益集团战胜农业利益集团、“黑色英国”战胜“绿色英国”的标志。地主原以为失去关税保护，外国农产品涌入，英国的农业状况会很糟。但实际上迟至19世纪最后20多年才出现这种情况。在19世纪50—60年代农业还相对繁荣了一段时间。在40年代以后谷物主要是小麦进口量确实大增，在20年中的年进口量是以前的三倍，但谷物价格除短时期剧烈浮动外变化不大。小麦的价格在每夸特49—59先令范围内摆动，略有下降，相反肉类价格明显上升。谷物价格并不像保护主义想象的那样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在于国内人口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收入增加使粮食消耗量随之大增。且欧洲大陆廉价粮食的数量也有限，其本身人口亦在增长，克里米亚战争还断绝了俄国小麦输入英国。因而英国农业的前景并不很坏。另外美国粮食受到高额运费以及南北战争的影响在英国市场缺乏竞争力。粮价居高不下使经营农场相当有利可图。肉类和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铁路的发展便于牲畜运输且不会过于失膘。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真正得到大发展的是畜牧业。有些地区是谷物耕种与畜牧饲养混合在一起，牲畜可为谷物提供肥料，而谷物又成为牲畜的饲料。

在50年代因为美国发明的收割机被引入，收割逐渐开始实行机械化。至1874年在英国有47%的农民使用这种收割机，但同一时期美国有78%的农人使用收割机。其原因在于英国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机械化有困难以及英国农户的保守。在有些地区使用收割机首先要平整土地，修建灌渠，拓宽道路，反而不如人力经济。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地主对农业的投资相当大，以便在谷物法废除后能有更高的产量以免降低租金或是失去佃户，但这些投资的收益不高，无法与以前圈地运动的投资收益相比。1847年—1878年，诺森伯兰公爵在自己的地产上投资了99.2万英镑，但在1876年—1879年中每年只有占投资额2.5%的收益。他们这样大量投资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目的，还为了保住自己政治上的权势。租金数量的增加与投资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地主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而不少农场主却从维多利亚中期的繁荣中获益颇多。农业工人的数量在减少，城市的扩展使可耕地减少，生产率也有提高。1851年—1871年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30万人，约七分之一。在夏季收获季节有些地区常常劳力匮乏，又反过来促使工资和劳动条件有所改善。

根据统计在全英国拥有土地的人超过 100 万，但大部分人只有小块土地，而 7000 人拥有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土地贵族则由不到 400 名大地主组成，每人每年的租金收入超过 1 万镑。英国最大的地主是设得兰公爵，有 135.8 万公顷土地，像一个小王国，不过大多由山地沼泽组成。土地贵族之下是 4000 名拥有 1000—10000 顷土地的地主，拥有全国约 30% 的土地，其余就是中小地主。因而英国土地相当集中，且在 19 世纪还有所发展。法律规定贵族的地产要完整地继承，在地主负债累累时更多是抵押地产而不是出卖地产。至 19 世纪中期大地主仍然是完整的，即使是因破产易手也保持一个整体。而自耕农占有土地的数目在减少。

总的来看地主的经济地位在衰落，但许多个别的地主因其地理位置、财产状况、耕种的谷物种类、管理水平以及农业外的收入情况而有所不同。农业外收入中最主要的是矿业收入，地主可从在自己地产上开矿的矿主手中得到额外的收入。另一额外收入是出租城市边缘地带的土地，尤其是伦敦周围的土地用于建筑。甚至有少数大地主投资于工业、港口建设等实业，把自己的贵族声誉让股份公司借用以得到收益。工业化和城市化也给地主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以抵消土地财富的损失。

地主的土地绝大多数是租给别人耕种的，由管家选择租地农场主，确定租地条件，监督土地的使用和投资情况。由于以前圈地运动的影响，这些农场一般比较大。在 1851 年每个农场的规模平均为 102 公顷，而占总数 8% 的大农场却占了 30% 的可耕地，有少数农场占地超过 1000 公顷。英国农村社会形成三层结构，最上层是几千名大地主，中层是 30 万名农场主，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经济上收益较高，正常每年可得投资 10% 的收益，最下层是 100 多万农业工人。

70 年代以后外国农产品的竞争迫使英国逐渐放弃收益不丰的农产品如小麦种植，而专门从事畜牧业。因而英国农业是处在相对衰落之中。英国从世界市场上低价购粮，使其生活消费比保护农业的国家低，这又有利于增强英国工业的竞争能力，扩大英国工业品的出口。这是 19 世纪英国农业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纺织业

19 世纪中期英国工业是稳定发展的，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逐渐被新工业部门采用。当时英国的三个支柱工业部门是采矿业、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占了英国工业生产 60% 的产值。其次是食品工业和建筑业，占了 10% 的产值。

传统的纺织业在 19 世纪中期发展要低于其他产业。1841 年纺织业雇佣了 29% 的工业劳动力，而在 1901 年只占 16%。成衣业所占劳力也由 1851 年占 20% 降至 1911 年的 13%。纺织业是一种组织复杂、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随着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完成后就开始衰落。纺织业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 19 世纪前期，1851 年时国家十分之一以上的收入来自于纺织业，后来其地位才被铁路运输业和钢铁业代替。与农业相似其衰落也是一种相对衰落，只是增长速度缓慢。

棉纺织业是纺织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出口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40年代占到一半，在1869年—1871年占67%。特别是对经济不发达国家出口的棉织品不断增多。在1851年印度进口了英国23%的棉织品，1860年达到31%，成为最大的棉织品市场。由于出口量的增加，在19世纪前期棉纺业发展很快。在美国内战时期因南方棉花供应不足，棉纺业发生危机，以后发展极为缓慢。在技术上棉纺业后来表现出了保守性，比如美国的两项重要发明环状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就未在英国广泛推广。后来美国棉布成为英国货的竞争对手，就因为其采用新式机器并雇佣廉价劳力。英国则表现出纺、织、染、销售专业化，并按地理区域分布。纺纱集中在兰开郡东南部，织布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印染则集中在曼彻斯特。而在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钢铁业

钢铁工业是后来居上的行业，自1840年开始，炼铁炉扩大了不少，内部砌成圆形，搅炼技术也得到改进，还采用了预热空气技术，使得煤不用先烧成焦。50年代钢铁业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

国内对钢铁需要的增长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后来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使用钢铁的地方越来越多，各种机器、管道、铁桥、铁船以及铁路。国外的铁轨在价格上无法与英国商品相比。在19世纪前70年英国钢铁数量出口几乎每10年翻一番。1850年时为78.3万吨，1872年时达到338.3万吨。

钢铁制品也越来越多地输往国外。

至19世纪中期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是铸铁和锻铁，钢的数量很少，价格也高，是一种奢侈品。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发明家亨利·贝西默发明了炼“低碳钢”的新方法，并在1858年建立了一家钢厂，以高价卖出产品，获利甚丰。贝西默的炼钢新方法在几分钟内就将铸铁炼为钢，但技术难以掌握。1861年威廉·西门子发明了一种高温煤气炉，操作起来比较容易。1865年工业家马丁兄弟在煤气炉中炼铸铁和碎铁混合物。这样炼出的钢含碳量容易控制，温度也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因而质量较高，产量也较高。这时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达到顶峰。

运输业

到50年代末，英国铁路数量是西欧五国铁路数量的总和。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铁路是由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建成的，政府不干预路线的规划和资金的筹集。英国政府和议会没有提出任何一项铁路建设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都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司提出，筹集资金，监督修建，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以强制购地。有些大地主因为私产受到影响激烈反对修建铁路，要求得到巨额补偿。一般情况下10—20%的筑路开支用于购地。格拉斯顿曾经考虑过铁路国有化的计划，但遭到议会反对。1865年有157名下院议员和49名贵族是铁路公司董事，形成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也就因而出现一些混乱和浪费。比如对立的铁路公司建造差不多同一条铁路，有时一个城镇有几个车

P.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191.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P.468.

站。

19 世纪前期是铁路大发展的时期，以后发展速度变慢，至 70 年代新建铁路基本停止。这时铁路公司形成了集中和兼并的风气，几家公司合并，并且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势力，控制某条线路。有“铁路大王”之称的乔治·哈得逊在鼎盛时期控制了 1500 英里的路线，拥有资本 3000 万镑。有些铁路公司发展到了垄断某个地区的铁路运输。

对铁路发展的经济意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刺激了投资和发展，甚至认为使英国资本主义摆脱了内部危机，避免了社会压力。铁路建设的投资要远远大于修建运河等交通设施的费用，在 1845 年—1849 年铁路投资占总投资的 55%。铁路在英国经济中起了关键作用，铁路发展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至 1875 年在铁路就业人员达到 25 万人，同时甚至影响到英国的对外关系。

除铁路外，海运业的发展趋势是普遍用蒸汽机，用铁壳船代替木壳船，确保了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在维多利亚时代商船吨位增加 3 倍。至 1855 年蒸汽船垄断了至爱尔兰、海峡对岸以及北海港口的航运，至 1865 年英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商品用蒸汽船运输，成本较低，在与外国对手竞争中取得了优势。英国经常保持世界海外贸易量的一半左右。

总之，19 世纪中期是运输革命的时代，运输革命先是以铁路为主，后来转向海运，吸取了国家的大量资源，推动了经济发展。

第二节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政治

19 世纪中期英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以 1867 年议会改革为标志的一系列改革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期在政治上旧的土地贵族并未因经济衰落而失势，仍然控制着相当的权力，控制内阁政府，首相基本上由世袭贵族担任，并在下院拥有优势，至 1865 年大选时贵族的势力仍占有近半数的下院议员，另外地方立法机构还控制在贵族手中。因而土地贵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是不平衡的。

一、政党政治

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发展中政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无党时代

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政党出现了混乱。谷物法是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废除的，这导致了持关税保护主义传统的保守党的分裂，皮尔派脱离了保守党，同时借谷物法问题攻击政敌的辉格党也突然失去了攻击的目标，内部的派系矛盾爆发出来。因而这时的英国政党呈现出名义上有党而实际上无党的特点。

保守党政府下台后，坚持保守主义政策的保守党大部分成员开始与党的领袖皮尔分道扬镳。皮尔派支持皮尔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党内与保护主义者抗衡。保守党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并且党的新领袖也应运产生，主要是狄斯雷利。他本身不是保护主义者，但崇尚保守主义的等级观念。他认为，“英国仍是由传统势力统治的唯一重要的社会，在世界无耻的毁灭中它维持着荣誉、自由、秩序、权威和财富……英国并不是由按照通常字义上所理解的贵族来统治的，它是由贵族政治的原则统治着。英国的贵族政治吸引了所有的贵族，它接受了每个阶级、每个阶层和每一个遵从我们社会的人，这些是令人渴望并且是更为优越的。”但保守党作为整体仍涣散无力，在议会处于少数，仍主张执行被大多数人抛弃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有改弦更张才能使保守党重新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

辉格党也处于分裂之中，内部分为辉格集团、激进派、自由党人、爱尔兰议员等集团，起主要作用的是前两个集团。各集团的共同目标是实行自由贸易。在辉格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是以罗素为首的辉格集团，由大土地所有者和世袭贵族组成。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主要是为了获取激进派的支持。

辉格党中的激进派主要由一些工商业资产阶级、具有激进思想的乡村地主以及部分熟练工人组成，其中中产阶级激进派及工商业者与工商业有密切联系，政治上影响很大，希望限制土地贵族的权力。

辉格党党内各集团除自由贸易上趋同外在其他主张上相距甚远。甚至许多党内的人否认自己是辉格党，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这时两党都缺乏内聚力，在 1846 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无党时代”。议员不是按政党界线而是依个人政治见解在投票。“这一时期的真正分野并非由政党的标签指明，而是存在于既往的贵族和绅士的政治力量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非国教的新因素之间。”皮尔派游离在两党之间，既不回到保守党中又不加入辉格党，但在最重要的自由贸易问题上却与辉格党保持一致。1852 年保守党为保护主义政策作了最后努力之后，也终于放弃了保护主义。保守党领袖德比勋爵总结：“保护制度已被抛弃了，农民和乡村绅士对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已习以为常，至少是没听到他们埋怨了，似乎也没有什么

Robert Blake, Disraeli, 1969, P. 282.

Alan Beattie, English Party Politics, 1970, P.79.

激动得失去理智的事情，少数几个议员表示怀疑，毕竟他们人太少了。”在关于自由贸易的争执平息之后，皮尔派倾向于辉格党，两党都开始了改组、重建的过程。

两党的重建

政党的“无党时代”至 1852 年阿伯丁联合内阁建立时基本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改组、重建的时代，政党的组织也逐步健全起来。

辉格党的“辉格”这一名称已逐渐被党内大多数人所厌弃，因为这一名称和过时的贵族政治连在一起。许多人尽管支持自由贸易，但拒绝参加辉格党，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党。而在政治上辉格党又离不开皮尔派的支持，皮尔派人数不多但很精干。1858 年出现了辉格党和皮尔派联合组成自由党的潮流。辉格集团势力衰落，很少有人称自己为“辉格”，都自称为自由党人。这时辉格党又处在野地位，势力衰落，又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阻碍他们的联合。代表辉格党和皮尔派各集团利益的罗素和帕麦斯顿愿意合作，达成分割权力的协议，“如果自由党内阁得以形成，权力应该公平、平等地分配。”

在罗素和帕麦斯顿的筹划下，1859 年 6 月各集团联合在圣詹姆斯街的威利斯大厅举行了大会。帕麦斯顿表示愿意在罗素领导下的政府中任职，罗素也表示愿在帕麦斯顿领导的政府中任职，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人布莱特则保证将与帕麦斯顿和罗素团结一致，皮尔派的代表则呼吁所有自由党人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标志着联合的完成、自由党的产生，就此结束了党内的混乱局面，完成了党内贵族政治向自由主义政治的转变，自由主义随后成为党的原则。

保守党的重建主要是从内部健全组织。保守党是在彻底放弃保护主义政策后开始走上重建的道路。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保守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地主，其中不少人反对自由贸易，认为地主负担的租税太重。

重建保守党首先从组织上开始扩大党的基础。1853 年党的领袖狄斯雷利开始着手建立党的超议会组织。他选择了威廉·乔利夫为党的新任组织秘书，菲利浦·罗斯担任党的总执行书记。狄斯雷利还整顿党的地方组织，在乡村市镇以地方的律师或知识界人物为党在地方的代理人。1853 年保守党出版了《新闻》报作为喉舌。

为了重建保守党，狄斯雷利认为“要更多地考虑策略和更少地考虑原则”，以此改变保守党信仰的基础，不要再死守保护主义地盘。狄斯雷利在保守党受挫时准备与任何一个派别联合，以此确保保守党在下院的多数。保守党在组织上的努力使其议员人数在增长，并转向城镇、工商业界发展组织。在狄斯雷利努力下，保守党在下院的议会党团到 1865 年时由 200 个土地所有者和 112 个工商业者组成。保守党的成员本身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随着两党的改组、重建的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两党制开始形成。

Robert Stewart,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830—1867*, 1978, P.254.

S.Walpole, *The Lif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89*, Vol. , P.305.

二、1867 年议会改革

1832 年议会改革并没有根除贵族政治的残余，社会各阶级又提出进一步议会改革的要求。工人阶级仍坚持成年男子选举权和秘密投票。资产阶级激进派也要求议会改革。最早提出再次议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休谟，1848 年在下院提出扩大选举权范围的动议，但遭到几乎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第二年休谟提出，选举权应扩大到所有的房屋持有者，选举应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每届议会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人口代表的比例应得到更公平的分配。目的是要求有一个更有利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立法机关。保守党人坚决反对扩大选举权和议会改革。1848 年狄斯雷利就断言休谟的提议是一种“极度幻想的”东西，他认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只是要一个法案，一个完整的法案，除了法案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提案“是一种使我们感到最大不快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反对它”。辉格集团也反对改革。在保守党和辉格集团的反对下，休谟 1849 年提议在下院以 268 82 票遭到否决。

议会改革第一次形成政府的法案是在 1852 年。当年 2 月罗素使自己的改革提议成为政府的正式法案。他提出将房屋持有者选举人的财产资格从 10 镑降到 5 镑，并且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任何只要每年交纳 40 先令的直接税就应该拥有选举权，同时他还提出了合并掉 67 个不足 500 名选民小城镇的计划。保守党人激烈反对这个法案，辉格党人也压罗素撤回法案。狄斯雷利认为罗素提出这个法案“目的是加强他自己的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因而反对这个扩大城市选举权的法案。不久罗素内阁倒台，改革法案未经正式讨论就夭折了。

1860 年 3 月，罗素又提出改革法案，要求将城市选民的财产资格降为 6 镑租金，并重新分配议席。罗素提出这个法案是为了垄断改革问题，对议案能否通过并不在乎。自由党内的旧贵族集团以各种技术问题对法案加以限制，结果在法案本身获得讨论之前就有几十个修正案要先讨论。于是罗素撤回了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很少有人再提改革。自由党领袖帕麦斯顿是改革的巨大障碍，但改革作为一股潜流仍不容忽视，激进派继续号召改革，并从组织上加以努力，而工人阶级则逐渐重视改革问题，出现了与激进派联合的趋势。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后经十几年努力已重新兴起，激进派把注意力转向了工人阶级。

1864 年 4 月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会堂建立了全国改革联盟，这一组织基本上是一个兰开郡商人和工厂主的联盟，分支机构遍于全国，特别集中在工业地区。它的计划包括三年一次的议会选举、秘密投票、平等分配议席和纳税人的选举权等。1865 年 3 月工人阶级建立了改革同盟，提出的要求比改革联盟更进一步，要求成年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和秘密投票权，其力量主要分布在伦敦以及中部、北部的工业城镇，但联盟因经费由富人资助实际控制在工业资产阶级手中。

1865 年 10 月帕麦斯顿去世，改革运动的活力复苏，议会改革立即作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提到两党面前。新内阁以罗素为首相，实际上格拉斯顿是内阁的核心。1866 年 3 月，格拉斯顿基于阶级平衡的理论提出改革法案。

W.D.Jones , Lord Derby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sm , 1956 , P.253.

AsiaBriggs , Victorian People , 1970 , P.222.

主要内容为：将城市的选民财产资格从 10 镑降为 7 镑，乡村从 50 镑降为 14 镑。后来又提出一个议席重新分配法案，要求削减衰败城镇和小城镇的席位，将这些席位分配给人口众多的工业大城市。这一方案对工人阶级不很有利，如果城市选民资格降为 5 镑，则增加的工人较多。另外这是个十分有限的法案，将增加 40 万新选民，还不及原选民人数的二分之一。保守党无疑反对格拉斯顿这个法案，主要是基于政党政治的考虑，目的在于推翻格拉斯顿与自由党内阁。两党把议会改革作为政党斗争的一个筹码。维多利亚女王也注意到这一情况。1866 年 5 月女王曾要求德比不要“猛烈地、党派地反对……改革这个重要问题，应该用他对他的党的影响，不是基于政党，而是以一种解决它、尝试达到某种一致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

真正促使 1866 年格拉斯顿法案失败和自由党内阁倒台的是自由党中的反叛者阿达拉姆集团。这是一伙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辉格土地贵族联合组成的集团，目的在于阻止议会改革和反对格拉斯顿在自由党内的领导地位。其领袖罗伯特·洛反对进一步改革的理由是：改革将会以“财产和知识为代价”，使权力落入那些易受“腐化、恫吓并且爱骚动”的工人手中；改革法“仅仅顺从于人数”，数量优势的原则将毁掉议会中真正的领导权；工人阶级成了多数，将迫使议会不断地详细讨论并贯彻削弱国家团结和繁荣的政策。洛的观点为议会许多人所接受。反对改革的议员提出对改革法案进行根本变动的修正案，要求更多，致使修正案被否决，导致罗素政府垮台。

在这时工人阶级对议会改革的要求也变得强烈了，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主要是出于改善经济条件方面的考虑。1866 年 6 月格拉斯顿的改革法案失败后，工人的改革同盟决定在海德公园举行集会以表达对改革的要求，7 月 23—25 日同盟在公园内举行了连续三天的集会，集会者一度与警察发生冲突。工人阶级的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66 年保守党上台执政，为巩固其地位，主动解决改革问题。11 月 8 日狄斯雷利构思了一个包含 14 点计划的总决议案。它强调：“应当增加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和城市的选民人数，”但指出“让一个阶级或势力凌驾于社会其他部分之上是违反王国宪法的。”1867 年 2 月 11 日总决议案被送到议会，遭到嘲笑。为了掌握议会的主动权，狄斯雷利又提出一个改革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给予城市房屋持有者以选举权，以纳税和两年居住期为基础，房客和那些把他们的税混合在每星期租金中的纳税人则没有选举权；乡村选举资格从 50 镑降到 15 镑。据估计这一法案将使城市选民增加 54 万多人，乡村增加 17 万选民。狄斯雷利认为，这个法案将确保一个新的社会均衡，没有一个单独的阶级将居于统治地位，1/4 的选票将属于贵族政治势力，1/4 将属于工人阶级，一半将属于中产阶级，议会将不会成为一个基于人数的无理性力量的代议制立法机构。

以格拉斯顿为首的一些自由党人反对保守党的改革法案，提出一系列修正案，意图是阻止无选择地扩大城市居住者的选举权。但许多自由党人希望

David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956, Vol. (1), P.122.

M.Cowling, *Disraeli, Derby and Fusion*, 1963, P. 33.

“阿达拉姆”典故出自《圣经》，大卫为避难逃往迦南的阿达拉姆洞穴，有 400 人随他居住洞中。有人以此称呼自由党内的反叛集团。

F.B.Smith,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Reform Bill*, 1966, PP.138—139.

改革问题不要再被拖延，对技术性问题不感兴趣，结果格拉斯顿的修正案在议会被击败。同时激时派也提出一个个修正案，要求降低选民资格。狄斯雷利接受了这些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他极愿在任内解决这一问题，同意再一次扩大选民范围。1867年8月在三读时法案未遭反对得以通过。上院只作了较小的修正便批准了法案。同月法案经女王批准，成为正式的立法。

最后形成的1867年改革法主要内容为：在城市，纳税的房屋持有者、拥有房间并有明显年收入的房客、居住一年以上并拥有净年值10英镑的财产，可获选举权，房屋的拥有者而不是所有者应当付税。在乡村，自由持有者、终身占有者、长期契约者、有净年值5英镑财产或有12英镑可付税的财产者都应有选举权，同时也应纳税。兰开斯特等4个小城镇停止选派议员，38个城镇由原来选派2名各降为1名，曼彻斯特等4个大城市各选派了3名。另外新创立的一些城镇将选派1—2名议员，有3名议员的选区投票人可投两票。

改革法案通过的最直接后果是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新增选民有一半是工人。工人从此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在从前只能是统治阶级发言的政治舞台上公开声辩了。这次改革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政党利用改革实现自己的利益，改革的形成也影响到政党政治。原有的政党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

三、19 世纪中期其他领域的改革

在 19 世纪前期英国改革的指导原则是自由放任，国家对改革尤其是宪政改革以外的社会改革很少干预。至 60 年代情况有了变化，国家开始在改革中担任较为重要的角色，英国在许多领域进行了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可以 1868 年格拉斯顿就任首相为开端或契机。

1868 年—1874 年格拉斯顿任首相，在此之前帕麦斯顿组织了两届内阁。帕麦斯顿沿袭了过去的保守传统，很少变革。他被认为是对外狂妄自大，对内无重要建树的政治家。而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格拉斯顿却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很有才干。帕麦斯顿了解他，在晚年对别人说：“等我死后，假如格拉斯顿接替我的职位，你们将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1865 年帕麦斯顿去世后英国的改革进程加快。格拉斯顿内阁一反英国政府懒散闲适的作风，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内容涉及文官、陆军、教育、工会和司法等方面，初步奠定了英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腐败的文官制度。19 世纪英国文官的数目在不断增加，而工作效率却不高，一些庸碌无能之辈靠私人 and 家族权势的恩庇占据着文官要职。1853 年任财政大臣的格拉斯顿令斯塔福德·诺斯科特和查尔斯·屈勒维廉调查文官制度。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通过公开竞争考试选任文官。1855 年枢密院颁布命令，任命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测验被推荐到王国政府文官低级职位上的年轻人的资格条件”，考试后经用人部门试用再正式任命。1870 年格拉斯顿内阁在 1855 年文官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发布了第二个有关文官改革的枢密院命令，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文官，但外交部和内政部官员除外。将考试分为两类，分别录取决策的高级文官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低级文官。官员的提升依政绩而定。通过文官改革基本改变了凭个人好恶和私人恩庇选仕的旧制度。英国拥有了一支具备专业技能有效率的官吏队伍，同时又促进了教育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改革。高级文官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低级文官也都接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文官数目不断增加，英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体系。

这时军队也亟待改革。在陆军内部盛行捐官制度，富有的贵族可以出钱购买军官职务，这阻碍了有才干军人的提升。残忍的鞭刑在军队中非常普遍。正规军服役长达 12 年。有 6 个不同的机构管理正规军，互相扯皮。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暴露出英国军队的弱点，后来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给了英国更大的震动。作为文官改革在军队的延伸，1870 年陆军大臣卡德韦尔力主实行陆军改革。规定严禁出售军阶的做法，作为补偿给购买军阶的人赔偿。禁止在军队中滥施鞭刑体罚。缩短服役期为 6 年。全国被统一划分为 69 个区。每区有一个由两营组成的团，一个营驻在国内，另一个则驻在海外。合并各种军事力量，由陆军大臣和总司令指挥，但总司令必须服从陆军大臣。陆军改革与文官改革性质相似，是政府致力于官吏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之举。在以后的两年中，卡德韦尔重组了陆军，建立了按军功提升的制度，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提高。

1873 年又进行了司法改革，简化和改造司法制度。原来的司法制度混乱且复杂，有两套法律制度：普通法和衡平法。这次改革规定将两套法律同时

使用，如有抵触，以衡平法为准。还规定将彼此分离的 8 个法院——女王御座法院、民事诉讼法院、税收法院、大法官法院、海事高级法院、遗嘱检验法院、离婚及婚姻案件法院和伦敦破产法院——统一合并为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高等法院行使初审权，“上诉法院有上诉审判权，初审服从上诉判决”，以此简化司法程序。

另外，在 1870 年格拉斯顿内阁还制定了“初等教育法”。以前英国有不少学校，但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学校大多控制在不同教派的教会手中，没有国家直接管理的学校。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英国工业面临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将丧失保持了近 50 年的在世界上的工业和技术优势。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已建立了较完善的教育体制。普法战争和美国内战的结果都表明，有文化的士兵战斗力也较强。教育的优劣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有文化的劳动力。另外还有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全国教育同盟”的积极活动，这是非国教徒的压力集团，要求实行强制免费的世俗教育。

1870 年 2 月，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威廉·福斯特提出的初等教育法案获议会通过。这一立法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规定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若干学区，整个伦敦为一个学区。每个学区应保证本区现有的小学应有“适合于居住在该区所有儿童的充足设施”。如果设施不足，就应在这些学区建立学校委员会，以补其不足。学校委员会根据学区大小由 5—15 人组成，有权征收教育税，兴办本地的公立小学。法案要求父母督促 5—12 岁的儿童上学，穷人子女可免交学费。在实际执行中，小学都降低了收费，学费最高不超过每周 9 便士，一般情况下大都是每周 2、3 便士。对原有的教会小学仍然保留，由国家根据其教学效果给予经济资助。政府派人考核学校教学情况，考核内容为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简称“三 R”。这种考核比以前只用抽象的“道德氛围”、“思想状况”和“总体成效”来考核要准确得多。

福斯特在其议案中对这一改革的目的表达得很清楚：“全世界的文明社会正聚集起来，每个国家都凭实力竞争。如果我们想在世界民族和国家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通过增加个人的知识力量来弥补人数的不足。”初等教育改革为英国儿童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增强英国在与外国经济竞争中的实力。

19 世纪中期工会组织摆脱了资产阶级控制，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1848 年以后宪章派的影响迅速消退，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会组织取而代之。这些工会组织大多限于吸收熟练工人为会员，要交纳 10% 的工资作会费。最大的工会是机械工人联合会，成员超过万人。1861 年第一份工会周刊《蜂房》出版，4 年以后已发行 8000 份。但这时工会的地位仍是不确定的。1867 年一起盗用工会基金的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女王御座法院的法官竟判决工会基金不受“合作社法”的保护，工会因阻碍商业是非法组织。势力强大的工会竟然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1867 年熟练工人获得选举权，其地位有了提高，促使政府考虑工会的权

David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1), P.545.

George Adams and H. Stephen, 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35, PP.538—539.

Joel Wiener,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Domestic Policy 1689—1973, Vol.3, P.2164.

利。1871年议会通过“工会法”，确认工会基金与合作社的补助金基金一样受法律保护，任何工会的活动只要限制在它的职业范围内都不应被视为非法，但工会无权在罢工时设置纠察线。1875年保守党的狄斯雷利政府当政时，议会通过“阴谋与财产保护法”，修改了法律中有关条款，规定工人为罢工设置纠察线为合法行为，不得以阴谋罪起诉。这很受工会欢迎，因为不设置纠察线根本就无法罢工，反映了政府对工会的和缓态度。同年通过“雇主与工人法”，取代“主仆法”，规定工人如违反契约不应再被监禁而只能课以罚金。

这时英国政府较多地注意到社会改革。1874年保守党领袖狄斯雷利任首相，他比其前任更注重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早在1872年的一次演说中他就说到“改善人民的条件”是保守党的“一个伟大目标”。狄斯雷利的这届内阁比19世纪的任何一届内阁通过了更多的社会改革立法。

1875年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这是以前同类法案的集大成者，内容较为完善。该法案宣称要使“本国所有城镇都适于过文明的社会生活”。具体内容包括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清理垃圾、食品卫生监督、疾病预防、殡葬以及市场、照明和有污染行业的管理。三年后又通过新的“公共卫生法”，规定由市政当局收买私人的供水公司。1871年成立的地方政府部也逐渐成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主管部门，以前的济贫委员会、枢密院的卫生部门以及内政部的地方政府部门所管理的事务统归地方政府部管辖。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大，如济贫、卫生、清理贫民窟、规划公园、供水排水、煤气供应都在它的监督管辖范围以内。

影响卫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住房问题。过于拥挤以及无卫生条件的住房是不卫生环境的主要根源。工人曾试图成立住房协会提出自助计划来改善住房，但效果不大。慈善家们也曾自发地做过努力，1844年建立了“改善工人阶级条件协会”，一些富翁捐款建造楼房，但房屋少，租金高，对住房问题解决用处不大。以自助自愿方式解决住房问题难以行得通，政府开始注意解决这一问题。1875年议会通过“工匠住宅法”，授权各城市市议会负责规划被认为不卫生的区域，强迫住户购房并有权从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获得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的改革较为注重社会和经济事务，国家注重行使其管理职能。英国的政治结构没有改变，但国家官僚机构的活动增多，各项改革法令如潮水般涌来。英国在各方面向一个现代国家过渡。

究其根源，政府积极改革是为了消除革命的威胁。正如狄斯雷利1872年在一次演说中所说：托利党首要的任务“是维持国家的制度，审视发生的事以及当代有关问题的特点。我认为托利党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有各种事要做以促进党的发展……托利党的另一个目标，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维护帝国或确保我们的制度。这就是所处条件的提高”。这些改革是在维护国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由统治者作出的让步。

Donald Read, *England 1868—1914*, 1985, P.124.

Paul Adelman, *Gladstone, Disraeli and Later Victorian Politics*, 1983, PP.83—84.

第三节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政策和侵略

在 19 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加速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大量侵占殖民地，寻求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期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殖民霸主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对海外，特别是富庶的东方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同时与列强在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地区争夺势力范围。

一、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背景

早在 17 世纪初，英国就存有染指中国市场的企图。1635 年韦德尔船长首次率船 4 艘载货抵广州附近，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因遭到中国官府和葡萄牙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在英王查理二世在位期间，英国始在台湾、澳门建厂，并在澳门与中国进行小额贸易。18 世纪时，贸易重心移至广州，英国政府直接介入对华贸易等事务，公开向中国提出给予英人以种种在华特权的要求。1788 年，英国政府派出以卡思卡特勋爵为首的代表团赴华交涉“休斯女士”号事件，试图要求中国政府授予英人以治外法权，但因卡思卡特卒于途中而未果。1793 年马戛尔尼勋爵再度使华，除打算提出治外法权的要求外，还拟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割让舟山一带岛屿和广州地区及降低关税等无理要求，仍未如愿。于是，英国便一方面进行武力威胁并作武装入侵的准备。1808 年，13 艘英舰侵犯中国东南沿海，进袭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另一方面扩大对华鸦片贸易，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致使许多吸食鸦片者在精神和生理上遭到巨大伤害。19 世纪最初 20 年中，英国每年平均向中国输出鸦片 4000 余箱，1838 年—1839 年增至 35,500 箱，由此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1833 年，随着英国政府废止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英国在对华贸易及对华政策方面作重大调整。12 月 10 日任命律劳卑勋爵为第一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除负责保护英人及其在华利益和监督其商务活动外，还身兼英王的政治及外交代表。次年 7 月 15 日，律劳卑抵澳门，25 日抵广州城外，遣人致函两广总督卢坤，要求面见卢坤并“建立和保持直接的个人联系”。中方以此函不符惯例为由拒收之，但律劳卑仍坚持其要求。9 月 2 日，卢坤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撤出所有在英商馆中的中国服务人员，派军包围律劳卑之住宅。律劳卑则命两艘英舰侵入黄埔，遭虎门炮台阻击而未得逞。此时律劳卑突染重病，9 月 14 日离开广州，10 月 11 日在澳门病死。中英贸易则在 9 月 29 日重开。中英双方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峙便到此告终。

清政府内围绕鸦片贸易问题产生激烈争论，道光皇帝应允禁烟派主张，于 1838 年 12 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节制广东水师，查禁鸦片。1839 年 3 月 18 日，林则徐命令外国人将所拥有的鸦片尽数交给中国方面，行商须提供参与鸦片贸易者的名册，并申报其拥有的鸦片数量。外国人须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3 月 24 日，于 1836 年起任英国首席商务监督的义律乘船抵达广州，阻止英商及其他国家的商人交出鸦片。当晚，中国方面撤出商馆中的

1784 年，英船“休斯女士”号上一水手在广州杀一华人，凶手被移交中国官府后处决。

《英国蓝皮书》，载《中国近代史丛刊：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645 页。

Palmerston to Napier, 25 Jan. 1834, in W.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1937, P. 22.

《林则徐集·公牍》，第 59 页。

所有仆役，派兵监视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还停止中英贸易。义律在 26 日晨发布公告，命令英商缴烟。同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员在虎门当众销毁英商缴出的鸦片两万余箱和美商缴出的鸦片 1500 余箱。

战争过程

英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中国发动武力侵略。10 月 18 日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写给义律的密信中向他传达了英国的侵略计划。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 月英国议会以 9 票多数通过对华战争案。6 月中旬，懿律率舰船 40 余艘及士兵 4000 人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随即爆发，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 年 6 月—1841 年 1 月），即从英舰队封锁珠江口至义律发布《穿鼻草约》。英军发现广东一带戒备森严，无法下手，同时懿律认为北上可给中国政府制造更大的压力，遂于 7 月率军北犯福建、浙江，攻占定海。英国《伦敦时报》立即予以报道：“英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飘扬！舟山于 7 月 5 日星期日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国王在远东获得了又一块定居地。”8 月 8 日抵天津白河口。懿律通过直隶总督琦善向清廷递交帕麦斯顿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道光帝派琦善与懿律谈判，向英方承认林则徐等人在粤之举“办理不善”、“操持过急”，保证要“重治其罪”，要求英军南撤，等候清政府重派钦差去广州处理有关事宜。英方同意这一建议，于 9 月中旬将军队南撤。

9 月 17 日，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时，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11 月末，琦善到广州后即撤除珠江口一带防务，同意英方提出各项要求，但对割让香港一项不敢定夺，表示将奏请清帝以求恩准，但英方认为中方缺乏诚意。12 月懿律因病离职回国，遂由义律接任全权代表。1841 年 1 月 8 日，英军发动突袭，经 3 小时交战，陷大角、沙角炮台。1 月 11 日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内容包括中国割让香港、赔款 600 万元、恢复中英贸易，同时英军撤出定海。1 月 20 日，英方单方面公布该草约。

第二阶段（1841 年 1 月 27 日—同年 5 月 27 日），即从清政府对英宣战至《广州和约》订立。《穿鼻草约》遭中国方面的反对，同时英国政府亦对此不满意。因此，战争不久便重新开始。

1 月 27 日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动各省军队 1.7 万人去广州对英作战。

英军在探得这一消息后即抢先发起进攻，2 月下旬攻陷虎门炮台，中国守将水师提督关天培以下数百名将士阵亡。随后，英军又连陷珠江上数座炮台。3 月 6 日，英军陆军指挥官高夫率军攻下广州的一座城门。3 月 20 日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定，以便正常进行贸易。5 月 21 日夜 11 时，奕山命清军突袭泊在珠江上的英国船舰。英军即发起反攻，攻陷广州周围炮台、要塞多

座，炮击城内目标。5月27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广州和约》，规定中国军队退驻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中方向英方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及商馆赔偿费30万元。英军则在款项交清后退出虎门。至6月2日，“赎城费”全部交清。

第三阶段（1841年8月26日—1842年8月29日），即从英军进犯厦门至《南京条约》的签订。由于英国政府对义律提出的《穿鼻草约》不满，遂调义律回国，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后者于8月10日到达香港就任。不久，璞鼎查便留1350名官兵守卫香港，亲率2500人北犯厦门。8月26日摧毁厦门所有炮台，次日攻占该城。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中国守将总兵葛云飞等人阵亡。至10月中旬，英军又占镇海和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曾在镇海顽强抵抗，城破后投水自尽。此时，璞鼎查扬言：“要么北京屈服，否则沿海各省尽数归我们所有。”10月18日，清政府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对英作战。1842年2月方到达浙江绍兴。3月分兵三路，同时向宁波、镇海和定海发动进攻，均被英军挫败，又丢慈溪。5月，英军转而进犯江浙海防重镇乍浦，放弃宁波、镇海两地。5月17日以损失9人的代价攻占乍浦。6月上旬，英军又陷吴淞，守将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阵中。接着，英军连占宝山、上海等地，7月26日占领镇江。此时，道光帝派来与英方议和的耆英和伊里布接到璞鼎查的答复，璞鼎查指定南京为谈判地点。8月5日英军抵南京城。12日双方开始谈判，19日中方同意接受英方全部要求。经清帝批准，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于8月29日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1. 中国割让香港。2. 中国付给英国各项赔款共2100万元。3. 中国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在上述五地派驻领事。4. 英货关税由中英双方协商确定。5. 废除“公行”制度。该条约的订立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中英《南京条约》订立后，中英双方还于10月8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英国又获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的特权。该条约所附《海关税则》还大幅度降低中国的进出口关税。此后，美、法、俄等国均引英国为先例，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丧失了部分主权，领土被割让，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遭破坏。因此，这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的性质从此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前局势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 1851 年开始后不断取得胜利，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称天京。到 1856 年时，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胜利，击溃围攻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从而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英国等西方列强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1854 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自由活动并可购买地产、鸦片贸易合法化、改订税则、外国公使驻北京等一系列特权，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当时英法俄正在克里米亚交战，无力他顾，因此列强暂时对此未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到 1856 年，局势发生了变化。克里米亚战争业已结束，英法美又提出“修约”，再次遭到中国的拒绝。于是，列强便寻找借口，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而此时发生的“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正是列强为发动战争而制造的借口。

“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1853 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进入中国广西省西林县传教，因作恶多端而于 1856 年 2 月被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并依法处决。法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伙同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而“亚罗号事件”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广东水师在黄埔港中一只曾向香港英国当局领过通航证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 10 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广东水师上船查捕时，该船所领通航证已在 10 天前过期，船上不再悬挂英国国旗。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诬称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并送回船上水手、赔礼道歉。叶名琛对此加以驳斥道：“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21 日，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坚持原要求，并限 24 小时内答复，否则就动用武力。叶名琛屈从于压力，将水手送至领事馆，巴夏礼又借口中方未同时递交道歉信而拒收。23 日，早已做好准备的英国军舰开进内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前后历时四年有余，可分为三个阶段。

战争进程

战争的第一阶段（1856 年 10 月 23 日—1857 年 12 月 29 日），即从英军开始进犯广州至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英舰在未受阻击的情况下进抵广州城外，连日向城内炮击，29 日还一度攻入城内，大肆劫掠，后因兵力不足而退出。此后，英军继续对广州城进行炮击，在城外骚扰抢劫。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于 1857 年春得知“亚罗号事件”后，主张立即全面开战，但议会内存有不同看法，通过了对其内阁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断然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支持帕麦斯顿者在下院获多数议席，通过了对华战争

案。英国政府还任命原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一支 1500 人的陆海军来华。法国也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英法全权专使分别于同年 7 月和 10 月率舰抵达香港。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和 11 月到达香港的美国公使列卫廉都积极与英法合作，支持其侵略行为。

到 12 月，英法联军共 5000 余人集结完毕。12 月 21 日，额尔金、葛罗和联军指挥官在法舰“勇敢”号上开会，决定向中国方面提出最后通牒。英法全权专使便于 24 日和 27 日两次向叶名琛发出通牒，其中第二次通牒限 48 小时内撤军让城。同日，英法军舰开入珠江，占据江南地区驻兵，准备攻城。12 月 28 日，联军开始攻城，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不足，广州于 29 日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等均被俘。叶名琛被解往加尔各答，1859 年在囚所中病故。柏贵和穆克德讷则投降，柏贵还出任联军占领期间的傀儡头目。

第二阶段（1858 年 5 月 20 日—1858 年 6 月 27 日），即从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至《天津条约》的签订。联军攻占广州后，由于其主要侵略目的并未实现，便决定北上。1858 年 4 月，英法美俄四国（专）公使乘舰抵达天津白河口外，英舰十余艘及法舰 6 艘亦同行。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直接与清全权大臣谈判。4 月 28 日，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赴大沽与外使谈判。英法全权专使起先认为谭未被授予全权，而后又对中国的立场不满。5 月 18 日，英法决定开战。20 日两国全权专使将此决定通知谭廷襄，同时英法军舰侵入白河，经激战攻陷大沽炮台。26 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30 日，额尔金等外使抵天津。清廷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

6 月 4 日谈判开始举行。6 月 13 日，中俄《天津条约》首先签订。随后中美、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亦分别于 18 日、26 日和 27 日签订。其中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共 56 款，附有《专条》，主要内容：1. 英国公使得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2. 英国人得往内地游历、经商和自由传教。3. 英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4. 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5. 中国向英国赔款银 400 万两。6. 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11 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经谈判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其中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共 10 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1. 海关聘用英人。2. 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3. 外国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 2.5%，不再纳厘金税。4. 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银 30 两。从此，鸦片公开输入，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遭到进一步破坏。

第三阶段（1859 年 6 月 25 日—1860 年 10 月 25 日），即从英法舰队袭击大沽炮台至《北京条约》签订。在《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对所夺取的在华权利并不满足，蓄意在换约时再生事端。中国政府亦对该条约不满，尤其“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因此，中国也希望在换约时对条约作某些修订。

1859 年 1 月，英国政府任命普鲁斯任驻华公使，前往中国换约。4 月 26

日，普鲁斯抵香港，准备用武力解决换约问题。他对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说：“我们在白河口有着一支威慑力量……因而，我本人的意见是，假使要有麻烦的话（我们应该对此有准备），那么就不如直截了当地找上这些麻烦，甚至可以说最好事前就去挑起这些麻烦。”5月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抵上海后，桂良要求在上海换约。两公使拒绝这一要求。

6月20日，英法公使到达白河口外。英舰队司令何伯要求中国守军在3日内清除河口的障碍，以便联军舰队驶入。24日夜，联军炸断拦河铁链，拔毁河上铁钺。25日上午9时，中国方面派官员来约请英法公使去北塘与直隶总督恒福会面，并陪他们赴京换约，遭两国公使拒绝。下午2时30分，何伯率舰队突袭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指挥下殊死抵抗，经一昼夜激战，中国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将士36人战死。英军死伤464人，法军为14人，被击沉军舰4艘，击伤4艘，何伯亦负重伤。英舰悬挂白旗要求停战，后在美国军舰援助下退至上海。

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巨大反响。首相帕麦斯顿称“这是一件发生在中国的令人不快的事件”，扬言要惩罚中国人，“我们将派一支陆海军去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9月24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认为中国必须接受其无理要求。1860年春，新的英法联军组成，仍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包括英军1.3万名、法军6300余名、各种舰船240余艘。4月联军占领舟山，随后英军占领清泥洼（大连），法军占领烟台。7月28日，英法军同时向大沽进发。

8月1日晨，英法联军在俄使献计下在清军未设防的北塘登陆，12日发起大规模进攻，僧格林沁所部骑兵英勇抗击，死伤3000余人，战败溃退。联军占领新河和军粮城，14日又占塘沽，从侧翼对大沽守军形成包围之势。21日，英法联军对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北炮台失守，南炮台投降，僧格林沁旋即逃往通州。24日，联军进占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恒福与额尔金和葛罗议和。9月2日，清政府同意接受英法方面提出的远比《天津条约》苛刻的条件，但不许英法代表带兵进京换约。于是，英军和法军在谈判尚在进行的情况下分别于9月9日和10日离津北上。11日英军进抵杨村以北。清政府一面命僧格林沁率兵防堵，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与英法议和。9月18日，由于谈判在未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中止，所以联军进攻张家湾，双方发生激战。21日，英法侵略军进攻通州八里桥，清军殊死抵抗，损失极大，但由于主帅僧格林沁等撤队反奔，导致全线溃退，京城门户顿开。次日，咸丰皇帝离京去热河避难，命其异母弟恭亲王奕訢留京办理议和事宜。10月1日，恭亲王表示同意英法方面有关换约和签订新约的各项要求，但联军以中国方面未按其要求释放于9月18日被扣留的英驻厦门领事帕克斯等人为由，拒不退兵反向北北京进军。8日，中方释放了帕克斯及随行人员，但额尔金称部分被扣英法人员被虐待致死，于10日命联军攻入安定门，占领了京城。

英法联军入城前后大肆烧杀劫掠，悍然焚毁圆明园，进而扬言要捣毁皇宫。奕訢乞请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从中斡旋。10月24日和25日，奕訢分

de Bourboulon to Walewski, May, 1959, in H.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 1906, P.50.

Palmerston to Russell, 12 Sept.1859, in Costin, *ibid.*P.296.

Mark Mancall, *op.cit.*P.117.

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中英《北京条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共 9 款，其主要内容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以下内容：1. 开天津为商埠。2. 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3. 割让九龙司给英国。4. 对英赔款增至银 800 万两。英法等国对其野蛮的侵略行径却加以称颂。帕麦斯顿在一封信中写道：“皇帝的宫殿被焚毁，所支付的赔款亦翻了一番，对此我感到高兴。我只想若能迫使皇帝将僧格林沁的头颅作为赠礼就更好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闭关锁国、妥协退让的政策和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以及国力的微弱。然而，清朝统治者并未接受这一惨痛教训，未能坚定地走自强自立之路，以致错过了历史所赋予的机会，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艰难。而英国则从战争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殖民霸主的地位。

二、扩大对印度的侵略与印度士兵起义

英国扩大对印度的侵略

早在英国染指中国之前，它已在亚洲大陆南端的印度进行了殖民侵略，并将该国变为其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在此期间，英国殖民者通过种种手段扩大侵略，加强殖民统治和剥削。这样一方面使英国从印度掠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激化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 19 世纪中叶的印度士兵起义。

1600 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作为其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东印度公司主要通过进行贸易和设立商站和管区等方式来对印度进行搜刮，并为扩大侵略奠定基础。其中最主要的商站及管区有马德拉斯（1639 年）、孟买（1688 年）和加尔各答（1696 年），由省督管辖。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一地就设立了 150 处商站和 15 家大代理店。从这时起，英国改变侵略手段，转而主要使用直接发动战争的手段来扩大其侵略。1757 年 6 月，英国乘印度大封建主内讧，发动普拉西战役，用武力占领了孟加拉。在英法百年战争（1756—1763 年）后期，英国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独霸了对印度的统治。1773 年，英国议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改原驻加尔各答的省督为总督，由议会任命，拥有管理英属印度全部领土的最高权力。东印度公司亦巩固了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1784 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行政法》，英国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直接统治者。1799 年，英国殖民者发动第四次迈索尔战争，占领了迈索尔地区。1813 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1817 年又发动针对马拉特人的战争，侵占其居住地。1843 年，英国吞并信德地区。1846 年 3 月，英国运用武力兼并旁遮普，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征服。

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将三分之二地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对另外三分之一地区则通过印度王公进行间接统治。英国统治者利用其统治权，制订一系列剥夺印度各阶层的政策，建立一整套殖民统治制度。在经济上，英国殖民者征收各种租税、进行掠夺性贸易和控制鸦片及食盐贸易等大肆搜刮，积累资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汇回国的款项在 1813 年—1828 年间平均每年 169 万镑，1837 至 1838 年度为 230 万镑，1857 至 1858 年度增为 616 万镑，而同年度征收土地税额为 1535 万镑。

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和剥削，引起了印度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手工业者由于大量英国工业品的输入而大批失业；农民则由于各种新土地制度的推行而大大增加了田赋的负担；部分王公的领地遭蚕食或兼并；士兵遭到歧视，其宗教习惯亦得不到尊重。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印度各阶层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1848 年任印度总督的大贺胥勋爵所推行的政策更似火上加油，直接导致了士兵起义的爆发。

首先，大贺胥采取强化兼并各王公领地的政策。为此，他提出了“转属说”原则，规定没有直系后嗣的王公，死后即丧失其领地，转属东印度公司所有。用这种方法，英国殖民者兼并了萨塔拉、那格浦尔和詹西等土邦。同时，大贺胥还采用土地调查的方式剥夺印度王公和地主的土地。在士兵起义

前的5年中，他委派孟买伊纳姆调查委员会，对地主的地产所有权进行调查，在德干将两万多处地产没收。其次，殖民军中印度士兵的处境显著恶化。士兵的薪饷减少，特权被取消。1856年又颁布新募兵法，规定士兵绝对服从长官命令，并用新兵取代旧兵，企图完全剥夺其原有的权利。

此外，西方文化在印度的传播造成了一种较广泛的惊恐和仇视，而殖民者故意无视或亵渎当代宗教习惯的行径更加剧了这一趋势。随着铁路、电报等新技术的引入和西方教育的推广，寡妇殉死和杀婴等习惯被废除。1856年的《宗教资格丧失法》，对于放弃原有宗教信仰者的公民权继承权予以法律上的保障。同年的《印度教寡妇再嫁法》，承认寡妇再嫁合法化。这就使印度民众，尤其是其中的保守阶层感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要毁灭和取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当地的社会制度和习俗。英国人还漠视印度教关于种姓的一些规定：即凡渡海或到伊斯兰国家生活饮食者，将失去其原有种姓，将印度教士兵由海路运往缅甸、中国作战，或赴阿富汗、伊朗等国执行任务。军队中子弹上涂有牛油、猪油等油脂，而且使用前须用牙咬掉子弹的尖端，更使士兵们难以接受，因为这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来说，属禁忌行为。

当时的局势为士兵起义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印度军队中欧洲部队仅45,322人，印度部队为23.3万人。一些重要地区，如德里、阿拉哈巴德等均由印度士兵驻防。同时，英国忙于克里米亚战争、波斯战争和鸦片战争等，对印度的控制似有所放松。对此，英国驻密拉特的专员写道：“一种权力意识已在军队中滋长起来，而这种权力只有通过兵变才能得以行使。枪声一响，这种潜在的反叛精神便付诸行动了。”¹在1857年—1859年印度士兵大起义之前，各地已爆发了一些较具影响的起义，如居住在马拉巴尔海岸的莫普拉人于1849年、1857年、1852年和1855年举行的暴动，桑塔尔人于1855年—1857年举行的暴动。

1857年3月29日，驻加尔各答附近巴拉克普尔的第34士兵步兵团发生暴动。该团在操练时，一名名叫曼加尔·潘迪的士兵从队列中跃出，高呼：“起来！弟兄们，为了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并开枪打死英国军官。4月8日，潘迪被处以绞刑。这一事件对士兵大起义的爆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起义的过程

1857年4月20日，驻密拉特的第3骑兵团士兵中的85人因拒绝使用新子弹而被捕。5月6日，他们被军事法庭以违抗命令罪处以10年监禁。5月10日下午5时，第3骑兵团的官兵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85名士兵和其他犯人，杀死英国军官，烧毁兵营和殖民衙署。印度士兵起义（又称印度民族大起义）就此爆发。这场起义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57年5月10日—1857年9月19日），即从密拉特暴动至英军重占德里。密拉特暴动成功后，起义军于当晚向德里进发。11日上午抵德里。驻德里的所有印度士兵响应起义，大量市民和郊区农民也参加了起义。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alikinkar Datta,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1978, P.766.

Ibid.P.767.

Ibid.P.768.

他们杀死英国军官，攻占英国人的教堂、印刷所和银行，但未能夺取军火库。

同时，起义军建立了其领导机构——行政会议。该会议由通过选举产生的军人代表6人和文官代表4人组成，下设一些专门委员会。行政会议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和人事等方面的权力。另外，起义者拥立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名义上的元首。至5月16日，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德里城。

德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起义波及全国的半数地区，约有40个地方爆发了起义。起义者除了士兵之外，还有广大的市民和农民，以及当地部分王公，起义的社会基础十分广范。

恒河中游的起义以奥德省及其首府勒克瑙为中心。5月30日晚，驻勒克瑙城北的第71步兵团发动起义，很快得到该地驻军及各阶层的响应。奥德省其他地区在6月中旬时已在起义者控制之下。7月3日，起义军进攻英国驻奥德省行政长官官邸，击毙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

西南地区起义的中心是康普尔。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那那·萨希布及其家臣唐提亚·托比。他们于6月初在康普尔举事，率领起义军包围了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在被困18日之后投降。结果，英军在撤离过程大部分被杀，一些英国妇女儿童也于7月15日被处死。

詹西是中印度的起义中心。6月4日，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举行起义。次日攻占一座军火库。6日，骑兵团响应起义，击毙英军指挥官邓洛普。8日，英军投降。起义军控制了詹西。一些英国殖民者被斩首示众。除了以上地区外，印度南部的海德拉巴和孟买也发生了起义。

英军迅速调集力量，首先把镇压的重点放在德里。1857年9月14日，英军1.1万人在50门重炮的掩护下对德里发起总攻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伤亡人数均达数千。19日晚，起义军在总司令汗·巴卡特·汗的率领下向奥德撤退，德里陷落。皇帝巴哈杜尔沙等皇室成员和贵族向英军投降，其3个儿子被霍德森上尉杀害，本人也被押往缅甸，于1858年死于狱中。莫卧儿王朝也告灭亡。因此，霍德森一手“彻底灭绝了一个王朝，是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非同寻常的事件。”此后，形势急转直下，英军取得了稳固的优势地位。

第二阶段（1857年9月—1859年4月7日），即从英军开始进攻勒克瑙至唐提亚·托比的起义军被击败。1857年9月25日，英军攻入勒克瑙城内，但未能救出被困英军，也未能占领这座城市。

为了保卫勒克瑙，起义军在11月和12月之间与英军争夺康普尔城。因起义军方面指挥失误，该城被英军于12月初攻占。这样，勒克瑙与中印度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1858年3月2日，英军总司令肯贝尔指挥两万英军和尼泊尔军向勒克瑙发动攻击。3.5万多起义者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星期的顽强抵抗。3月16日晚，起义军撤出市区。3月21日又被迫撤离市郊。

这样，詹西就是仅存的起义中心了。1858年3月25日，中印度英军总司令休·罗斯命英军向詹西发动进攻。拉克什米·巴伊女王指挥抵抗。4月1日，唐提亚·托比率军救援，但被击退，损失惨重。5日，英军攻占詹西。

到这时为止，起义军所攻占的主要城市均告失守，他们转入乡村地区，采取游击战的方式继续战斗。终因力量分散，被英军各个击破。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于6月17日在瓜辽尔战死。唐提亚·托比的军队也于1859年4月被击败。他本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4月7日遇难，印度士兵起义至此被英军完全镇压下去了。

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起义的意义

这次起义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参加起义的阶层除士兵外，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市民、一些地主和土邦王公。因此，它实质上是一次反抗外来统治的民族大起义。

然而，这次起义在英国殖民者的镇压下最终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有：第一，起义的组织性不强，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易于被英军各个击破。德里起义后，起义者建立起政权机构，但它无权领导全国的起义，只具有地方性质。在英军于1857年9月猛攻德里时，其他起义军未能前来援救。此后各起义中心的陷落也与德里的情况相类似。第二，起义军内部存有各种矛盾，尤其是下层人民与上层封建主的矛盾较为尖锐，削弱了起义军的实力。德里起义后的第二天，参加起义的封建主就在皇宫集会，商讨恢复秩序问题。勒克瑙的贵族则在该城陷落后纷纷投降英军。显然，封建主参加起义的目的是恢复原有的特权的统治。这与人民参加起义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三，起义军在战略上采用防御方式，放弃了战斗的主动权。起义军在各地起义成功，占领城市后，便固守原地，不去主动攻击英军有生力量，使英军能从容休整，重新部署，向起义军发动反攻。第四，起义军的装备及通讯手段等不如英军，如印度士兵使用老式的前膛炮，其射程就不及英军配备的新式后膛炮。另外，英军能利用分布全国的电讯系统和邮政系统，较迅速地获取、交换情报，调集和部署军队。第五，除参加起义的少数封建主外，英国殖民者得到大部分印度封建主的支持，这样使英军能集中力量去镇压起义，免除后顾之忧。而且，锡克人和帕坦人等对英军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次起义是“第一次强烈的和直接的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大规模挑战。”

它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加速了印度历史的发展。并促使英国对其统治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

第一，印度政府的统治权正式转入英国女王之手。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改进法案》。它规定：“印度将在英王名义下通过一个主要的国务大臣治理，并由一个15人的参事会予以协助。”总督改称副王。

第二，改变对印度土邦及其王公的政策。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于1858年11月1日发表宣言，承认东印度公司与土邦王公签订的条约；尊重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尊重印度传统的权利、惯例和风格；不再用强制手段扩大在印度的属地；对所有犯人实行大赦，只有杀害英人者除外；实行一种公道、仁慈和宗教宽容政策，不干涉宗教信仰问题；不论种姓和信仰如何，所有人均可担任适当的官职。

第三，对军队进行彻底改组，增加英籍士兵的比例，由原来的约1：6

增加到 1 : 3 到 1 : 2。炮兵和技术兵种只由英人充任。另从锡克人、帕坦人和廓尔喀人中大量征募士兵，占印兵新兵的半数以上。解散印度海军，并入英国舰队。

英国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加深了他们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和恶感，为后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缅甸、阿富汗、伊朗等国的侵略

（一）对缅甸的侵略

缅甸是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面积约 67 万平方公里。1752 年，雍笈牙建立贡版王朝，使缅甸在历史上第三次实现了统一。19 世纪初时，贡版王朝开始衰落。英国殖民者乘机以英属印度为侵略基地，先后对缅甸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用武力征服了缅甸，将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第一次侵缅战争

英国从 17 世纪 40 年代起就介入对缅甸的争夺。最初是英荷争夺。1635 年荷兰首先在缅甸的沿海城市锡里安建立商馆。164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锡里安建立商馆，争相对缅甸进行掠夺贸易。因 1652 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英国商馆被迫于 1657 年关闭。经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取代了荷兰的海上贸易优势地位，于 1709 年重开锡里安商馆。此后从 18 世纪 40 年代起英法之间又在缅甸沿海地区展开争夺。两国插手缅甸的缅族和孟族之间的冲突。1743 年 11 月，缅族军队进入锡里安，捣毁了支持孟族人的法国货栈。不久，孟族军队又占领该地，焚毁英国商馆。英国人又于 1753 年 4 月进占缅甸的尼格莱斯岛，但在 1759 年被缅甸国王雍笈牙派兵逐出。此后，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准备对缅甸发动侵略，同时支持与缅甸相邻的一些小王国，干涉它们与缅甸之间的事务。1785 年，缅甸兼并阿拉干王国。英国便鼓动逃亡印度的阿拉干人袭击缅甸人。1819 年之后，英国还对阿萨姆、曼尼坡和卡恰尔等王国进行了类似的干预。1824 年 1 月，英缅军队在卡恰尔附近发生了直接冲突。

经过紧张的策划和准备，英国以缅甸军队侵入孟加拉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为借口，于 1824 年 3 月 5 日发动了第一次侵缅战争。英军首先在缅甸西部边界发起进攻，缅军主力开往这一带抵抗，造成后防空虚。5 月 11 日，英将坎贝尔指挥英军由海路在仰光登陆并占领该城。缅军回师仰光，班都拉将军于 12 月 1 日指挥 3 万缅军对仰光发起攻击，激战一周，终未得手。班都拉便领军北撤。1825 年 3 月，缅军在班瓦战役中击退英军。4 月 1 日，班都拉固守达努彪时阵亡。英军随后占领了卑谬。因雨季到来，英军暂停进攻。1826 年 2 月英军占领蒲甘，2 月 24 日，英缅在缅甸首都阿瓦附近的延达波签订了《延达波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缅甸向英国支付 1000 万卢比赔款；承认曼尼坡、卡恰尔和贾因提亚为英国领地；将丹那沙林、阿萨姆和阿拉干割让给英国；同意英国向缅甸首都派驻一名驻扎官。

英国尽管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英军（包括印度士兵）参战者达 4 余万人，死亡者不下 1.5 万人。

第二次侵缅战争

1846 年，吴屋被刚即位的缅王蒲甘任命为仰光市长。他对英商违法行为

严加查处。1851年7月和8月，吴屋下令逮捕了两名犯有杀人罪的英国船长谢泼德和刘易斯，令其缴纳罚金。英国认为所控罪名毫无根据，指责缅甸公开诋毁英国的名誉，并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缅战争。

印度总督大贺胥于1851年11月17日派遣东印度公司代理海军总司令兰伯特准将率军舰6艘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挑衅。缅甸政府同意英方的撤换吴屋的要求，并同意与英方进行谈判。英国方面对谈判并无诚意，便诡称缅甸代表对英方代表无礼，断然掠走了缅甸王船“水宫”号，炮轰仰光，并从海上封锁该港。接着，大贺胥于1852年2月18日向缅甸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缅方在4月1日前赔偿100万卢比，缅甸对此置之不理。4月1日，英军在戈德温指挥下从丹那沙林向缅甸发起入侵。在4月内先后占领了马达班和仰光，5月占领勃生，6月初又占领了勃固。7月，大贺胥亲临仰光指挥，至12月又占领卑谬和美获。12月20日，英国侵略者在仰光宣布勃固为殖民地，亚瑟·珀维斯·菲尔少校为勃固的首任长官。通过这次战争，英国侵占了富庶的下缅甸地区。此后，英国殖民者进一步镇压了该地区人民的反抗，还在1862年将阿拉干、丹那沙林和勃固这三个地区合并为“英属缅甸”。

第三次侵缅战争

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进一步向上缅甸进行扩张，企图在扩大对缅甸的侵略和掠夺的同时，打通入侵中国的道路。1875年，以福克斯为首的英印殖民当局代表团去曼德勒，迫使缅王曼同允许盛产柚木的红克伦地区“独立”。1878年，曼同临终前指定良渊、良宇和锡袍三位亲王联合执政。缅甸大臣们拥立锡袍为缅王，英国则将良渊和良宇送往加尔各答。英国要求锡袍同意英国驻扎官有权自由晋见缅王，不用行缅礼，以此来换取英国对他的承认和支持，但锡袍拒绝了以上要求。英国驻曼德勒的人员于1879年10月全部撤离。因当时英国忙于阿富汗和南非的战争，所以未立即发动侵略战争。

1885年，经营上缅甸柚木开采、转运业务的英商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偷税行为被缅甸方面发现。在过去两年中，该公司运出柚木8万根，但只申报了3万根纳税。为此，缅甸政府于8月20日决定对该公司罚款230万卢比，孟买缅甸贸易公司称缅甸所列出的柚木数不实，纯属捏造，因而不服从缅甸政府的决定，要求将此事交给印度总督仲裁。缅甸政府拒绝这个要求。印度总督达弗林于10月22日向缅甸发出最后通牒，主要内容为：允许英国使节进驻京城曼德勒，有权自由晋见缅王，不受缅方礼节约束；孟买缅甸贸易公司一案由英使查处；英使可带武器卫队进驻京城；缅方为英商与中国云南之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以及英国有权监督缅甸的外交。该最后通牒限令缅方于11月10日前作出答复。

在11月9日送达仰光的缅方复文中，缅方接受了除监督外交一项之外的各项要求。英国仍对此不满，特别是对锡袍所称“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保持下去”之立场尤为反感。两天之后，英印殖民当局发出进行战争的命令。11月14日，英军在普伦德加斯特将军率领下侵入上缅甸。第三次侵缅战争开始。由于缅甸政府未作任何防御

准备，因此英军一路上几乎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11月28日便占领京城曼德勒，俘获缅王锡袍。锡袍即被押往仰光，随后被流放到印度孟买附近的拉德乃奇黎岛，直至1916年12月20日卒于该岛。1886年1月1日，印度总督弗林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国殖民地，2月宣布全缅甸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由查尔斯·伯纳德爵士任首席专员。

这样，在1824年至1885年间，英国以印度为依托，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一步步地吞并了整个缅甸。从此，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在1937年改由英国直接统治。1942年又被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败降后仍为英国控制。战后缅甸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英国被迫公布缅甸独立法案。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

（二）对阿富汗的侵略

阿富汗位于亚洲腹地，属内陆国。自古以来，阿富汗就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进入19世纪，英、俄殖民者都把侵略矛头指向阿富汗，争夺对该国的控制权。

1747年，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形成。此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迅速建立和发展，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国家渐渐走向封建割据的局面。1818年，阿富汗分别为5个独立国家，分别以喀布尔、坎大哈、克什米尔、白沙瓦和赫拉特为统治中心。这时，周围国家乘机向阿富汗扩充势力，蚕食版图。1826年，巴列克查依族酋长杜斯特·穆罕默德确立了在喀布尔等地的统治。1834年，他又粉碎了原杜兰尼王朝国王沙阿·叔迦的复位企图，重新统一阿富汗。次年宣布定都喀布尔，出任国王，创立了巴列克查依王朝。

杜斯特即位后，以收复锡克族首领吉特·辛格占领的白沙瓦为其主要目标，他分别于1835年和1837年两度出战均未取得成功。于是，他便企图借助英国势力来实现其目的。英国则极欲乘机在阿富汗扩张，排挤俄国及波斯的势力，遂于1837年9月派遣亚历山大·伯恩斯率代表团前往喀布尔，打算说服杜斯特出兵解救被波斯人围困的赫拉特，进而打击波斯人的后台俄国。伯恩斯在与杜斯特会谈中陈述了英国的上述要求，却不同意杜斯特要求收复白沙瓦的计划。因此，英阿谈判未能产生任何成果，伯恩斯亦于1838年4月被印度总督奥克兰德召回。8月，固守赫拉特的卡姆朗·米尔扎在英国的支持下，迫使波斯人撤退。

第一次侵阿战争

为了实现其吞并阿富汗的野心，英国决定推翻不愿受其摆布的阿富汗国王杜斯特，支持前国王沙阿·叔迦复位。1839年4月26日，英军总司令约翰·基恩率约6万英（印）军队在几乎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坎大哈市。8月6日，英军攻下喀布尔。次日，叔迦在英国人的护卫下回到喀布尔复位。实权则控制在英首席政治代表麦克纳顿的手中。随后，大部分英军撤回印度。

1840年9月初，杜斯特返回阿富汗，依靠部族武装袭击英军。11月2日，他率军在帕尔汪达腊攻击英印骑兵，但杜斯特对战胜英军缺乏信心，因此他决定体面地投降。次日，他骑马去喀布尔向麦克纳顿投降，11月12日又在英军卫队护卫下前往印度加尔各答。

然而，阿富汗各部族并未放弃斗争。在 1841 年秋，阿富汗抗英斗争达到高潮。11 月 2 日，阿扎克查依领导喀布尔农民发动起义，得到各地部族武装的响应和支持。11 月 9 日阿富汗人民占领喀布尔市区，但阿扎克查依在战斗中受伤牺牲，杜斯特之子阿克巴尔·汗被推举为抗英武装的首领。

为挽救这种局面，英军总司令埃尔芬斯顿提出与阿富汗起义军进行谈判。12 月 11 日，麦克纳顿与阿克巴尔·汗和其他起义军首领会晤。麦克纳顿签署了一份撤军协议，同意英军在 3 日内撤回印度。但是，麦克纳顿没有履行这个协议，反而企图诱降阿克巴尔，在起义军中制造分裂。在 12 月 23 日的会晤中，阿克巴尔揭露了英方的阴谋，麦克纳顿当场被击毙。于是埃尔芬斯顿被迫同意英军在 1842 年 1 月 6 日撤军。

此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加上路上的积雪，行进极为困难。16,500 名英印军人及家属和其他人员于 6 日离开喀布尔向贾拉拉巴德撤退。7 日和 8 日，连遭阿富汗抗英部族武装的袭击，损失惨重。仅 6 人突围而出，后其中 5 人因伤而倒毙途中，仅军医布莱顿于 1 月 13 日逃到贾拉拉巴德。另外，叔伽在英军撤退后被起义者处死。

英国决定对此进行报复。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英军由波洛克和诺特率领，分别从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向喀布尔进军。波洛克的部队在 1842 年 9 月 5 日重占喀布尔，杀死几千名市民。然后，扶立叔伽之子法什·贾恩为国王。随着阿富汗人民反抗的高涨和寒冬的临近，为避免重蹈前一年冬季大撤退的覆辙，于 10 月 12 日撤出喀布尔，法什·贾恩也随英军离去。在阿富汗方面的要求下，杜斯特获释，11 月回国重新执政。第一次侵阿战争到此结束。英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且损失惨重，伤亡数万人，耗去军费 1.5 亿镑。

第二次侵阿战争

杜斯特重新执政后，大力消除战争的破坏和国内的分裂状况。经 20 年努力，终于在 1863 年统一全国。但在他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王位，酿成内战。直到 1873 年，杜斯特的第三子希尔·阿里才在这场内战中击败所有其他竞争者，确立了统治地位。

英国此时面对俄国向中亚地区扩张的势头，决定加强对阿富汗一带的扩张，以阻止俄国的南侵，维护英属印度的安全。1876 年，莱顿就任英国驻印度总督。他向阿富汗提出派英国使团常驻喀布尔的要求，遭阿方拒绝。同时，他在阿富汗和伊朗关于锡斯坦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偏向伊朗一方。1877 年 1 月至 3 月，英阿关于将《翁巴拉条约》改为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未取得任何成果。英阿关系日趋紧张。

俄国在中亚地区大肆扩张，乘阿英关系紧张的时机，对阿进行拉拢。1878 年 7 月，俄国派出以斯托列托夫将军为首的军事使团去喀布尔与阿国王进行谈判，拟订了俄阿同盟条约草案，俄国答应援助阿富汗反对外敌。

英国得知俄国使团抵阿的消息后，随即于 9 月 20 日派出以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的军事使团去阿富汗，但是阿里国王拒绝英国使团入境。为此，英国内阁在 10 月底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对阿富汗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制服。11 月 2 日，英国向阿里发出最后通牒，限阿方在 11 月 20 日前同意英方要求。因阿国王复函的传递出现耽误，英方未在限定期限内收到此函。于是，

英国便于 1878 年 11 月 21 日出动 5 万余军队，分别从坎大哈、开伯尔和库腊姆 3 个方向侵入阿富汗，第二次侵阿战争开始。阿里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首都北撤到巴尔赫，企图得到俄国的支持。俄国以种种借口拒绝了阿里的要求，反劝说他与英方议和。阿里因对俄国背信弃义十分愤怒，加上疾病发作，于 1879 年 2 月 21 日去世，其长子雅库布继位。雅库布生性懦弱，不敢用武力抵抗英国的侵略。他于 1879 年 5 月 26 日与英方代表卡瓦格纳里签订了《甘达马克条约》。主要内容：阿富汗将库腊姆、比辛和西比等东南部地区割让给英国；英国在喀布尔设置官署，派武装卫队进驻；英国保留对开伯尔和米奇尼两个山口的控制权；英国有权过问阿富汗对外事务；英国每年付给雅库布 6 万镑补助金，英军撤出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

7 月 24 日，路易·卡瓦格纳里爵士在一支五六百人的卫队的护卫下，率英国使团进驻喀布尔设立官署。卡瓦格纳里举止傲慢，干涉阿内部事务，同时英国卫队与阿军不时发生矛盾和摩擦。9 月 3 日，阿军对英使官署发起攻击，歼灭卫队，杀卡瓦格纳里，烧毁英使官署。英国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速命罗伯兹率军向喀布尔进军，其他英军亦开进阿境内进行增援。10 月 6 日，英军在恰拉西亚之战中击败阿军。10 月 8 日抵达喀布尔城下。阿军放弃首都，英军在 10 月 12 日开进该城。同日，雅库布宣布退位，前往英国军营请罪，后被押往印度。阿高级军政官员也被放逐或关押。罗伯兹于 10 月 28 日发表公告称：鉴于阿富汗的政府已不再存在的状况，英国政府在同一些主要的王族成员、部落酋长和能代表各地利益及愿望的人士协商之后，“将要宣布它为了人民得到良好政治管理而作出的长远安排。”

阿富汗抗英武装力量加紧战斗行动。12 月中旬，他们开进喀布尔，包围英军驻扎的希尔鲁尔军营。12 月 23 日拂晓，阿抗英武装对军营发起进攻。英军用先进的枪炮予以猛烈的回击，抗英武装伤亡惨重。加上英援军赶到，阿民军被迫撤离。

1880 年 1 月，流亡在俄国中亚地区的阿里国王之侄阿卜杜尔·拉赫曼回到阿富汗北部。他在俄国的支持下，组织北部人民准备与英国侵略军作战。英军打算用拉拢的方法来争取拉赫曼，从而瓦解阿人民的反抗斗争。英军驻阿司令部于这年 4 月、6 月和 7 月 3 次发函给拉赫曼，吁请他进行谈判。7 月，拉赫曼到达喀布尔。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如下：英国承认拉赫曼对阿富汗北部和喀布尔的统治权，向他提供武器援助和补助金，撤出驻喀布尔的官署；拉赫曼同意阿外交活动继续受英国的控制，允许英国在坎大哈驻军，控制该地区。这样双方实际上分裂了阿富汗国家。

这时，任赫拉特省督的阿尤布·汗成为抗英斗争的领袖。他是雅库布国王的兄弟。7 月 20 日他率领抗英武装在梅旺德与一旅英军相遇。经 7 天激战，英军全部被歼。罗伯兹在拉赫曼的配合下，率英军主力南下。8 月 31 日，英军解除了抗英武装对坎大哈的包围，击败了阿尤布·汗。罗伯兹宣布承认拉赫曼为阿富汗统治者，英军撤出阿富汗。拉赫曼则表示尊重和履行《甘达马克条约》。根据该条约，阿富汗实际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英军于 1880 年 11 月撤出阿富汗。英国通过这场战争，扶植起亲英的拉赫曼政权，并取得了对阿富汗的某些控制权，在与俄国的角逐中占了上风。但在战争中，英军遭到阿抗英武装的顽强抵抗，终未能完全吞并阿富汗。阿

富汗人民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用鲜血和生命基本保持了阿富汗的独立和完整，粉碎了英国吞并阿富汗的企图。

此后，阿富汗在 1919 年再次抗击入侵的英军，并迫使英国同意谈判，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这样，阿富汗成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赢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三）对伊朗的侵略

伊朗是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在中国古代史上称为“安息”。进入近代，萨非王朝日趋衰弱。伊朗在 18 世纪初一度被阿富汗所征服。纳狄尔—沙赫率军打败阿富汗和土耳其侵略者，于 1736 年被拥立为波斯国王，连续征服阿富汗、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等地，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帝国，但帝国不久即解体。1794 年，卡扎尔部落领袖阿迦·穆罕默德在推翻桑德王朝之后创立卡扎尔王朝，重新统一全国。

英国在伊朗的侵略活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英国加紧对伊朗的侵略活动，并与法俄在该国展开争夺。1800 年，英国派遣以马尔科姆为首的代表团去德黑兰，与伊朗缔结了一项条约。主要内容是：伊朗有义务阻止阿富汗对印度的进攻；不准法国势力进入伊朗和波斯湾沿岸地区；英国有权在波斯湾建立商馆，英货免交进口税，英商可在伊朗全境自由贸易；英国则保证在伊朗与阿富汗或法国交战时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

1804 年，第一次伊俄战争爆发。伊朗要求英国提供援助，但英国已在 1803 年与俄国缔结反法同盟，未同意伊朗的要求。伊朗遂转向法国，于 1806 年与法国结盟。1807 年 5 月，伊法正式签订同盟条约，规定伊朗废除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对英宣战，派军进攻印度，并准许法国经伊朗对印度发起进攻，伊朗为法国提供粮食等补给品，如一方对俄作战，另一方应采取共同行动。英国对此深表不安，便利用法俄关系的改善和法国对伊朗援助的停止，恢复英伊谈判，提出援助伊朗对俄作战。于是，英伊于 1809 年再次订立草约，伊朗同意断绝与法国和其他与英国为敌的国家的关系；英国则答应在伊俄交战期间提供财政援助。

1813 年，伊朗在伊俄战争中战败，10 月与俄国订立了《古里斯坦条约》。英国为阻止俄国在伊朗势力的加强，于 1814 年 11 月以 1809 年草约为基础达成英伊条约，规定英国对伊俄划界具有仲裁权；伊朗若与欧洲国家发生战争，英国每年给予伊朗 15 万镑援助，但其用途受到英国公使监督；若阿富汗对印度作战，伊朗即对阿开战。英国对伊朗的政治、财政控制得到加强。

出于对英属印度安全的考虑，英国希望保持伊朗的“独立”。1826 年，威尔顿在伊俄再度交战时写信给首相坎宁说：“我们对保持波斯王国的独立和完整感兴趣。”1837 年 11 月，伊朗军队在俄国支持下包围阿富汗的赫拉特城。英国为避免俄国染指阿富汗，竭力阻止伊朗攻城，伊朗对此表示不悦，抓获为守卫赫拉特的英国顾问递送伊军情报的英国使馆信使。英国公使马克·尼尔主张采取强硬立场，迫使伊朗让步。1838 年 6 月 7 日，他擅自宣布

中断外交关系，此后还命令英国驻伊军事顾问团撤离。尼尔在收到英国政府的指令后，立即派人向伊朗国王穆罕默德·沙赫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伊朗不停止围攻赫拉特的话，那么英国就将对伊宣战。接着，数艘英国军舰强占波斯湾中的哈尔克岛。伊朗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于 1838 年 9 月放弃对赫拉特的围攻。

1841 年，在俄国的斡旋下，英伊复交。10 月，尼尔以公使身份回到德黑兰。10 月 27 日，他与伊朗外交大臣米尔扎·阿布尔哈桑·汗在设拉子签署了一个商约，主要内容：英国商品只抽 5% 关税，豁免国内各种税收；英国在大不里士、德黑兰设商务处，在布什尔设领事馆；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允许伊朗在伦敦和孟买开设两个商务处。英国和其他列强对伊朗的掠夺和压迫，以及伊朗封建统治阶级的暴虐腐败导致了 1848 年—1852 年的巴布教徒起义。

英伊战争

1851 年，统治赫拉特的雅尔·穆罕默德·汗去世，其子赛义德·穆罕默德·汗继位，表示臣服于伊朗国王纳赛尔丁·沙赫。英国对赫拉特亲伊的倾向及其对阿富汗的危害感到不安，遂对伊朗施加外交压力，并在得到伊朗首相米尔扎·阿加·汗·努利的支持下，迫使纳赛尔丁·沙赫于 1853 年 1 月 25 日发布敕令，宣称如有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方向侵犯赫拉特，伊朗有权出兵保卫赫拉特。在击退来犯之敌后，伊朗军队立即撤出。英国则同意不干涉赫拉特内政，不向该地派驻使臣。若英国干涉赫拉特内政，伊朗方面不受以上承诺的约束。

1855 年初，赫拉特发生叛乱，赛义德·穆罕默德·汗被杀。阿富汗国王杜斯特为统一全国，在此时派军抵赫拉特城下。纳赛尔丁·沙赫决定出兵抢占赫拉特。这一行动导致伊英关系的迅速恶化。1855 年 12 月，英国关闭驻德黑兰的使馆，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856 年春，赫拉特新统治者穆罕默德·优素夫·汗请求伊朗派军帮助他抗击杜斯特的进攻，但伊军进城之后极为傲慢，对穆罕默德所提的抗议置之不理。穆罕默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伊军赶出城外。伊军随即包围该城。这年夏季，赫拉特军中发生哗变，亲伊的军人拘捕穆罕默德，并将他送交伊朗人。继任赫拉特统治者的耶萨·汗不愿投降，但在坚持一段时间后，还是向伊朗人屈服，伊朗军队于 1856 年 11 月 1 日占领赫拉特。

同日，英国的印度总督发表一项声明：鉴于伊朗背弃 1853 年两国协议，派军侵占赫拉特城。英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对伊朗宣战。英伊战争爆发。

英国驻波斯湾舰队在斯托克将军的指挥下于 1856 年 12 月 4 日攻占哈尔克岛。5 天后，英军在布什尔附近登陆。1857 年 1 月，英军进攻驻布拉兹姜城的伊军。伊军弃城而退，英军入城后炸毁伊军大库，复又撤回布什尔。伊军闻讯追击，双方在胡什阿伯发生激战，英军获胜。3 月 1 日，英军又在莫哈玛莱附近登陆，向胡泽斯坦发起进攻，击败伊朗守军。英舰驶入夏台阿拉伯河和卡隆河，占领阿瓦士。

早在布什尔失陷后，伊朗便派出使节先后通过奥斯曼帝国、美国和法国

与英国媾和。1857年1月25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伊朗特使法罗赫·汗，同意调处伊英关系。1857年3月14日，英国和伊朗达成《巴黎和约》，英国驻巴黎大使帕里克·考利和伊朗特使法罗赫·汗分别代表本国签字。该条约主要内容是：1.两国停战，英军撤出伊朗，释放双方战俘。2.伊军撤出赫拉特，永远放弃对赫拉特和阿富汗其他地区的领土要求，并永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3.两国政府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承认对方在本国开领事馆的权利。该条约的换文于5月2日完成，英伊外交关系恢复。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得到加强。

19世纪后期英俄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伊朗的掠夺和争夺。到20世纪初时，英俄两国实际上瓜分了伊朗，英国控制了伊朗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俄国则将伊朗北部纳入其势力范围。1905年—1911年的伊朗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制度和打击了英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伊朗宣布中立。但英俄两国与奥斯曼帝国在伊朗领土上作战，使伊朗遭到很大损失。至1921年6月初，驻在伊朗的英苏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伊朗。

四、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7月至1856年3月，英、法、土和撒丁等国为一方与俄国为一方为争夺欧洲优势和对中近东的控制权而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其主要战场在俄国南部濒临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故称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的起因

这场战争虽以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为主战场，但它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列强争夺欧洲霸权以及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而引起的。当时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英法等国与俄国在奥斯曼遗产问题上的争夺。

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形成于15世纪中叶。它从18世纪末起陷入危机。由于其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俄、英、法、奥等欧洲列强都对它存有野心。俄国的目标是要将奥斯曼帝国变为其保护国，独占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打通进入地中海的通道，扩大俄国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为此目的，俄国以武力等手段大肆侵略奥斯曼帝国。俄军在1828年—1829年俄土战争中，越过多瑙河，占领了亚德里亚堡，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并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将黑海东北岸领土划归俄国。1833年，以联合抵御埃及入侵为名，俄国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军陆战队在海峡地区登陆。在埃及军队撤军后，俄国迫使奥斯曼苏丹订立同盟条约，规定海峡只许俄国军舰通行，对其他各国军舰关闭。

英国对此是不能容忍的，英国与英属印度等地之间相沟通的陆路要经过奥斯曼帝国这个交通枢纽。若丧失这条陆路就只能依靠距离远得多的海路。那样的话，英国在维护其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方面就可能遇到更多的麻烦，甚至危及其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而且，英国还努力在中近东地区开拓市场和获取原料，它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为此，英国绝不能听任俄国南下扩张，将奥斯曼帝国变为其势力范围。于是，英国联合法、奥、普等反对俄国扩张野心的国家采取共同行动。1840年，英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迫使俄国取消了1833年俄国—奥斯曼条约。1841年7月，英国与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奥斯曼帝国在和平时期禁止对所有国家军舰关闭两海峡。英国在以上行动中起了主导作用。

俄国在外交方面连遭失败，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因此，它转而企图说服英国一道瓜分奥斯曼的遗产。1844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出访英国，他向英国建议，一旦奥斯曼帝国的危机爆发，俄英应共同享有这份遗产。1852年，尼古拉一世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因种种原因，英国未积极响应这些建议。

19世纪50年代关于“圣地”（即耶路撒冷）问题的争端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从18世纪起，东正教把持了对圣地的管辖权。天主教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850年5月，法国照会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苏丹确保天主教徒对“圣地”的管辖权。1852年8月，法国迫使苏丹同意了这一要求，将“圣地”管辖权交给天主教。沙皇尼古拉一世随即指责苏丹背弃和迫害东正教徒。要求由俄国来保护帝国境内所有的东正教徒。1853年2月，沙皇派海军大臣缅什科夫以全权特使的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向苏丹阿布都尔·麦吉德提出以下要求：恢复东正教对“圣地”的管辖权；俄土建立永久军事同盟；

俄国有权保护帝国境内东正教徒。在英法政府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政府拒绝了俄国的要求。5月21日，缅什科夫与俄国使团离去。俄国宣布与奥斯曼帝国断交。7月2日，俄军强渡普鲁特河，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属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战争爆发。

战争过程

这场战争以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为主战场，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和白海等地也发生了战斗。可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亦称巴尔干阶段（1853年7月3日—1854年9月），即从俄国进犯奥斯曼帝国的摩尔多瓦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至俄国从这两个公国撤军。

战争爆发后，英法即采取支持土耳其的立场。英法舰队在比斯开湾集合，沙皇对此不以为然，称“我能够得到维也纳和柏林的帮助。”9月末，在土耳其统治者的要求下，英法舰队抵君士坦丁堡。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宣战。15万土耳其军队沿多瑙河与俄军对峙，但未发生大规模战斗。10月16日，土军在高加索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一些战果，但攻占第比利斯的目标未能实现。

11月30日，俄国黑海舰队袭击了黑海南岸锡诺普港湾内的土耳其黑海舰队。经几小时激战，土耳其舰队被歼，俄国取得了对黑海的控制权，同时也激化了与英法的矛盾。

1854年1月4日，英法舰队驶入黑海。2月21日，俄国向英法宣战。3月12日，英法土三国缔结军事同盟。3月27日，英法对俄宣战。4月底，俄国围攻锡利斯特拉，遭土军顽强抵抗和反击，俄军被歼5万余人。第一阶段的战局至此发生根本改变，俄军转攻为守。与此同时，奥地利也进行干预，它于6月3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出两公国。6月24日，英法军队在瓦尔纳登陆，从侧翼向俄军逼近。9月，俄军全部撤回普鲁特河左岸，第一阶段战事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亦称克里米亚阶段（1854年9月14日—1855年9月8日），即从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至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城。

1854年8月8日，英法奥从维也纳向俄国发出照会，提出四项条件：英法奥普俄共同保护两公国，暂由奥军占领；五国共同保护素丹所属基督徒；五国共同监督多瑙河口；重申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和波斯普鲁斯两海峡的条约。俄国对此未加理会。

9月14日，英法土联军5万余人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耶夫帕托里亚登陆，随之南下进攻俄国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当地俄军兵力接近5万人。20日俄军在阿尔马战役中被联军击败。联军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城。

俄军调集援军，在拥有优势兵力的情况下于10月25日和11月5日分别发动了巴拉克拉瓦会战和因克尔芒会战，但都遭到失败。特别是在因克尔芒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 1982, P.202.

Anthony Wood, *op. cit.* P. 208.

会战中，3万俄军被1.4万联军击败，俄军损失三分之一。1855年2月，俄军再次对联军发起进攻，在耶夫帕托里亚被挫败。3月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一气之下服毒自杀，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俄军克里米亚半岛司令也“因病”“辞职”，改由戈恰科夫任此职。

8月16日，俄军向黑海边的法军据点进攻，企图解除对塞瓦斯托波尔城的包围，又一次遭到惨败。9月8日法军占领南区的制高点马拉霍夫冈，俄军退到北区，该城落入联军之手。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巴黎和会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和平会议于1856年2月25日在巴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撒丁、土耳其、普鲁士和战败国俄国代表。法国外交大臣瓦勒夫斯基任会议主席。3月14日起，和会逐条通过和约条款。3月30日，各国代表签订了《巴黎和约》共34款及若干附加协定条款，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双方占领的土地归属问题；黑海和海峡非军事化问题；巴尔干民族问题。该条约规定：双方互相归还所占对方领土；禁止外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中立；禁止在黑海沿岸建立军火库；多瑙河航行自由，俄国让出对多瑙河三角洲的保护权；俄国放弃对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以及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承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与会各国不得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为后盾，与法、土、撒丁等国一道战胜了实行封建农奴制的俄国。战后，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影响得到明显加强，为此后进一步染指该地区的事务奠定了基础。同时，俄国从战争中得到教训，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着手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

第四节 19世纪50至70年代的科学与艺术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全面展开，英国的历史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首先，工业革命使社会分工日益细致，使一部分人能够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有余暇从事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等领域的活动；第二，工业革命给人们提出了众多的问题，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回答和解决，使文化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三，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使中世纪被封建等级法权关系和自然经济的割裂状态所掩盖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使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和认识社会问题，从而使文化的层次有了进一步提高；第四，工业革命使文化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文化活动，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以上原因，19世纪30至70年代，英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一时期，英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工业革命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导致人们对隐藏在物质内部的奥秘作深入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最为著名。

进化思想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学者阿那克西曼就提出了有关进化的一些初步思想。以后的许多大思想家也都接受这种理论。但真正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过程，却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在生物学方面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进化学说的是法国博物学家让·拉马克。他认为动物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获得习性，而这种习性接着又在构造的变异上得到反映。他认为这些物体构造上的习性是能够世代遗传的，经过一系列交替发展后，一种新物种的动物最终将会产生出来。以后这一学说统治生物学达50年之久。19世纪中叶，随着地质学、古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的发展，进化思想逐步成熟，为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一个小城镇医生的儿子，从小酷爱植物学，热衷于收集各种标本。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期间，达尔文阅读了许多动物学、地质学和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并初次接触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不久转入剑桥大学攻读神学，但他对博物学仍有浓厚的兴趣，课余阅读了大量的博物学著作，并旁听亨斯罗教授的植物学课程，随他到野外观察和收集动植物标本，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831年，达尔文结束剑桥大学的学习，同年12月，经亨斯罗教授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海军考察船“贝格尔”号进行考察活动，开始了决定他一生科学生涯的环球航行。

“贝格尔”号是一艘专门用作环球科学考察的船只。整个考察活动维持了5年。这次航行给达尔文提供了极好的直接考察动物的机会。在考察途中，达尔文有机会阅读了莱伊尔的著作，并接受了他的均变论，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观察过火山，接触过野蛮的山地人，并经历过地震。在南美洲，他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动物化石，与现代的犰狳十分相似，这说明现代

生物和古生物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是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在进一步南行过程中，他看到密切相近的物种往往分布在相邻的地区，而相距遥远的地区，物种差异就比较大。1835年9月15日，达尔文到达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里采集到许多鸟种，这些鸟种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岛屿上而呈现出差异。按照这些鸟嘴的大小与形状，可以排列出一个渐进的系列，鸟嘴的这些差异与岛上可能找到的食物有密切的关系。

这次考察拓宽了达尔文的视野，促使他对有关问题进行思索。如果物种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如果物种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为什么又如此相似？这促使达尔文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这一切只能用物种逐渐变异这一假设来解释。这次航行使达尔文由一个物种不变论的信徒转变为一个进化论者。

回到英国以后，达尔文即着手进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并进行家鸽交配和园艺实验。在此期间，达尔文阅读了大量的书刊，包括中国古代的《齐民要术》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出生的人要比生存下来的人多得多，因此，在争夺食物的争斗中，弱者肯定要被淘汰”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运用到生物学的研究中。1839年，达尔文将跟随“贝格尔”号航行的考察日记进行整理，写成《1832年至1836年间舰长费茨罗伊率领的英国皇家舰贝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史与自然史的考察日记》。1840年至1843年间主持编写《贝格尔号旅行期间的动物志》。1842年，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摘要。在以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方面用事实来补充完善自己的学说，另一方面不断将摘要送交友人审阅，和他们进行讨论。1854年，他将研究成果送交友人、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胡克博士审阅，其后又转给查理·莱伊尔爵士。1857年10月，达尔文写信给美国波士顿的爱沙·格雷教授，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经过十余年的补充、讨论，达尔文有关进化的理论渐趋完善。

1858年6月18日，正当达尔文潜心写作《物种起源》时，收到了他的通信者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来的论文《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型的倾向》。这是1858年2月华莱士在南洋群岛的丹纳特写的，他寄论文给达尔文的用意是请达尔文审阅，并请达尔文转交给莱伊尔。达尔文读完华莱士的论文后，发现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和他自己的理论十分相似。“为了考虑他们两人之中，究竟谁应该要求创立这个理论的优先权，而且也为了科学的广大利益，”在胡克和莱伊尔的共同坚持下，并经过达尔文同意，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在英国林奈学会上宣读，同年8月20日，在该会的《动物学学报》第3卷中发表。此后，在莱伊尔的催促下，达尔文加快了《物种起源》的写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稿。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正式出版。

《物种起源》一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生物在世代相传中发生变化的进化理论，二是阐述生物进化机制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在野外考察和对家禽的研究中，发现物种母体产生的后代比可能生存下来的要多，生物的后代虽然和亲代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在生物界广泛存在着遗传和变异现象。在生物的后代之间，发生着一场为攫取食物、栖息地和其它生活必需条件的斗争。这种斗争有三个类型。第一，同一物种各个体之间的

斗争，如同种动物争夺食品，同种植物争夺肥料和水分等。第二，物种与物种之间的斗争，他以三叶草、土蜂、田鼠和猫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如三叶草的花粉要依靠土蜂来传播，而土蜂的数目决定于田鼠的多少，因为田鼠经常毁坏蜂房和蜂窝，而田鼠的多少又决定于猫的数目。第三，物种与自然环境的斗争，如寒冷和干旱气候会引起大批生物死亡，生物要活下去必须同自然界斗争。生物的进化就是通过这种斗争，通过对变异的选择完成的。在这场斗争中，某些物种的后代由于变异的因素处于有利的地位，有些生来就强，有些后代比母本长着更长的角和更尖的爪，或它们身上有天然的颜色，使它们能够较好地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能够躲避它们的敌人的袭击而生存下来。这些物体由于在生存斗争中获胜而生存下来，而其它物种在足以繁殖之前就被淘汰了。达尔文将变异和自然选择看作新物种起源的首要因素。他认为，具有适应性的个别物种通过无数次的接宗传代，把它们各自承袭下来的变异特性传给后代，而在生存斗争中不适应的物种经过不断淘汰，最终也将产生出一种新的物种。生物界就是通过这种变异，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此之前，多少年来，神学家们一直用《圣经》来解释世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上帝的杰作，一经创造出来，便永远不变。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向人们说明，上帝造物是一种荒谬的神话。他在《物种起源》的序言中写道，“今日许多生物学界（包括我在内）所认为生物种类均由个别创造而来的观点，毫无疑问是个错误；相反的，同一系统的生物种类有时正是别种（今日大多数已灭绝）的子孙。而且我相信，自然选择势必引起生物物种的改变，虽然不能说这是引起变异的唯一原因，但可以说是主要原因。”——由于达尔文认为只有那些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对有神论显然是一大打击，使宗教的独特观念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人类优越、宇宙永恒不变和上帝完全按照当时所知的模式创造世界的信仰都因此受到怀疑。因此，《物种起源》出版后，许多敌对者、保守派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对达尔文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舍尔称达尔文的理论为“胡闹定律”。达尔文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他读了达尔文的书后感到很痛苦。连一直支持他的莱伊尔也感到“人由猴子进化而来”这句话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而英国教会更是气急败坏，叫嚷要“拯救心灵和打倒进化论”。1860年6月30日，在科学促进会于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妒火中烧的欧文指使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对进化论进行诋毁，结果被赫胥黎驳得体无完肤。

另一方面，《物种起源》在英国出版后，赢得了千万个同情者和支持者，至1872年已再版6次。由于《物种起源》一书构思完整，并以20余年来的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大大地发展了以往的进化假说，使这一理论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也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得到赫胥黎、胡克和莱伊尔等科学家的积极支持。由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认为，生物在外界作用下不断发生微小的变化，通过累代的选择作用，能够适应外界环境的个体可以生存，并且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发展为新种，不适合者则不能生存和传种。进化论所揭示的这种动植物自身发展、变化和联系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完整的科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牢固的自

然科学成就中，因而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仅半个月，恩格斯就从哲学上肯定了它的革命意义，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 19 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克思的功绩相提并论，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李卜克内西甚至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达尔文远离城市的烦嚣，在他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马克思在世界喧嚣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于杠杆应用于另一点而已。”1873 年，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献给达尔文，扉页上写着：“献给查尔斯·达尔文先生，”落款是“你真诚的羡慕者”。足见革命导师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重视和支持。

进化论哲学家：斯宾塞和赫胥黎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成为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如同三个世纪前哥白尼的著作的出版对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对受过教育的人们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所阐述的思想不仅影响自然科学，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斯宾塞和赫胥黎就是这一时期英国进化论哲学的代表人物。

赫尔伯特·斯宾塞生于德比郡一个信循道宗的教徒家庭。青年时代放弃亲戚资助去剑桥大学上学的机会，立志自学成才。1842 年起为《独立教徒》杂志撰稿，1848 年至 1853 年任《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并着手在各种评论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包括《演进假设》（1852 年）、《科学起源》（1854 年）、《论进步：其规律和原因》（1857 年）等，从这些论著的标题即可以看出，他在对达尔文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了解之前，就在致力于建构进化论了。不过，他的这些著作大多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近 40 岁时，斯宾塞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哲学是各专门学科基本原理的综合，是可以替代中世纪神学体系的科学总结。他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试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综合成哲学体系，并一直为此而努力。其主要代表作是《社会静力学》，在该书中，斯宾塞的哲学体系同早期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概念非常合拍。从培根和霍布斯以来，英国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试图建立如此庞大的体系。

斯宾塞的哲学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但他不仅仅将进化论用作解释动物和植物的工具，而且还将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仅物种和个人按照进化的原理在发展，而且行星、太阳系、风俗习惯、机制、宗教信念和道德观念等也都按照进化的原理在发展。天地万物都周而复始地经历产生、发展、衰败和灭亡的周期。当一个周期完结，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循环无穷。但他又认为主宰天地万物进化的是超自然的神，而且这种神是不可认识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三卷，第 574 页。

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46—47 页。

吴德铎著《科技史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第 72 页。

斯宾塞把生物进化的规律过于生硬地搬到人类社会中，将达尔文有关生物进化的某些论点如生存斗争等加以歪曲和夸大，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从进化理论演绎出所谓的“种族优劣论”，并在实践中吹嘘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比任何“劣等民族”都要“优越”的民族，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提供依据。此外，斯宾塞还提出一整套所谓的“社会有机论”。他根据生物学的规律，得出动物有机体的三个系统，即营养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他据此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分为三个阶级：担任“营养功能”的工人阶级，担任“分配和交换功能”的商人阶级，以及“调节生产”的工业资本家阶级。在斯宾塞看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生物学规律的。他还把力学的平衡规律硬套在人类社会的行为上，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否认社会内部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平衡的破坏”。他声称自己是个人主义的主要保卫者、社会主义的敌人。他非难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是原始社会的陈迹，是社会进化最初阶段的一种现象。他对国家机器恨之入骨，以致他宁愿亲自将稿件送到出版社，也不愿把它交给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邮局来邮寄。

如果说斯宾塞作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主要被帝国主义当作弱肉强食、残酷掠夺和杀害落后民族的理论依据，因而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去甚远的话，另一名进化论哲学家赫胥黎则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斗犬”而著名。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教师家庭，早年因家庭贫穷而失学，自学成才。21岁到“响尾蛇”号考察船上任助理军医，并随船到澳大利亚考察。考察途中，他用简陋的仪器研究海洋动物，并将研究成果陆续寄回英国发表。回国后开始研究生物，尤其研究动物的个体性、头足纲动物、古生物的神经的结构和功能、脊椎动物的头骨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他受到很大启发。他自称“进化论的斗犬”，为宣传和保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斗争。当解剖学家奥温发表攻击达尔文的文章，企图证明人猿无共同之处时，赫胥黎连续发表演说，用大量事实证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由此他遭到围攻。在科学促进会于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威尔伯福斯竟挑衅地责问赫胥黎：“如果猴子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请问您：猴子是您祖父的祖先呢？还是您祖母的祖先呢？”赫胥黎回敬说：“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耻辱。我以为应当感到耻辱的是那些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的可疑成功，而要粗暴地干涉他所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的人。”就这样，赫胥黎等人用逻辑论证和一系列科学事实，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主要代表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和《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年）。

《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我国最早被译为《天演论》，近代学者严复最早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该书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的读者在谈到赫胥黎时往往首提《进化论和伦理学》。但该书并不是生物学的重要著作，就是在赫胥黎的撰述中也不是最重要的，充其量不过是正确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说明了蒙昧、无知的古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作为指导现代或将来人类的伦理学说。无论是对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贡献而言，该书都不能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相提并论。

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赫胥黎把人的注意力转向进化论原理。在这方面，它几乎具有与《物种起源》一样大的影响。赫胥黎不只对捍卫进化理论感兴趣，他与斯宾塞一样，把进化论学说扩大到所有与人类有关的重大问题上。他论证说，社会制度和伦理并不是由神明制订的，而是生物遗传的产物。虽然他并不否认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可能性，但他也断言，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像神学家所说的上帝这样的一种神。他把基督教说成是“异教和犹太教中某些精华和某些糟粕的混合体”，而这种精华和糟粕实际上是在西方世界某些人的天赋性格的影响下形成的。

艺术

英国的绘画艺术在 18 世纪才自成流派，但一经崛起，便在欧洲艺坛上占有重要地位。19 世纪，英国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空气有了一定的改善，资产阶级采取了自由主义政策，各种哲学思想极为活跃，造成了英国艺术繁荣发展的形势，艺术也产生了相应的思潮，出现了理想主义的“拉斐尔前派”和“新拉斐尔前派”。

1848 年某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 3 名青年学生威廉·荷尔曼·汉特、加布瑞尔·洛瑟蒂和约翰·埃维尔列提·弥莱斯聚集在弥莱斯家里闲谈。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共同的艺术思想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深觉英国学院艺术陈陈相因，弊病甚多。尤其是自拉斐尔成名以后，人们都以他为榜样，到 19 世纪，艺术更是远离现实。当他们欣赏到一幅意大利比萨大教堂的壁画《死的胜利》时，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这种在拉斐尔以前的作品才是认真而朴实艺术，才是艺术创作的方向。因此，他们认为英国的艺术家应向拉斐尔前的画家学习，从深入自然入手，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选择宗教和道德题材，歌颂过去生活的准则和特质。于是，他们组成“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以示同学院派分庭抗礼。此后，画家柯林森、画家兼评论家斯蒂芬斯、雕刻家伍尔纳等也相继加入，并得到当时著名青年评论家罗斯金的支持，从而形成拉斐尔前派，在英国艺坛上成了一股重要力量。

“拉斐尔前派”的 3 名骨干之一洛瑟蒂（1828—1882）在绘画方面并无太大建树，主要长于写诗，50 年代曾发表长诗《圣女升天》，以唯美的精神赞颂至上的爱情。在绘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升天圣女》，描绘少女在天堂里靠着栏杆俯视下界，等候爱人上来相聚，两个天使在天堂底下现出同情的样子。他的画因公式化而略显空洞。汉特的作品主要有《被雇的牧人》、《巴格达的拉希德的黄金时代》等。

在“拉斐尔前派”3 名组织者中最有成就的是曾被视为“神童”的弥莱斯。他 9 岁即以素描出众获银质奖章，11 岁被美术学院破格录取。1853 年被选为皇家美术学会会员，时年才 24 岁。临终前被任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名作是依据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而画的《奥菲里亚》，描写一位自杀的少女浮在水上的形象。为了逼真，他请洛瑟蒂夫人茜达尔躺在浴盆里做模特儿。画面上，奥菲里亚仰睡在水上，手中握着花枝，半开的双唇似乎在低唱，绿色的纱裙如浮萍一样飘起，岸上坠落的鲜花似乎缓缓向前流动。1858 年，弥莱斯的另一幅画《盲女》在利物浦展出。《盲女》表现以卖唱为生的盲女与一个给她带路的小姑娘坐在田埂上休息。盲女背后碧绿的田野上

跳跃着小鸟，身边野花在摇曳，天上现出彩虹，但这些对贫穷的盲女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属于她的只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弥莱斯通过精美的写实技巧和明亮的外光色彩，表达了对不幸者的同情。

“拉斐尔前派”强调真实地描写自然，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弊病，希望通过艺术和道德教育来达到改造人心，从而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艺术创作的真谛，他们的创作取材于神话、基督教的传说以及某些文学家的作品。他们对现世不满的最终结果是逃避现世，遁入中古社会神秘的幻想中，求得心灵平衡。他们的作品除了用朴实的艺术手法描绘人物的真实感外，并没有什么积极感人的力量。

第十章 19 世纪末的英国

第一节 社会概况

一、人口增长和移民

人口增长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口继续增长。1801 年时，整个英国的人口仅为 1590 万人，1851 年增加到 2740 万人，1901 年又增加到 4150 万人。在一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但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

年代	出生率 (单位：‰)
1861—1870	35.75
1871—1880	35.55
1881—1890	32.45
1891—1895	30.5
1896—1900	29.3

那么，新增加的人口又作何解释呢？原来，同期死亡率的下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年代	死亡率 (单位‰)
1861—1870	22.6
1871—1880	21.4
1881—1890	19.15
1891—1895	18.7
1896—1900	17.7

造成该时期英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来看，英国乡村地区，尤其是爱尔兰乡村地区的大批青壮年移居海外，使人口结构老化。而在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家庭中，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人们的生育观也不同于以往，不再恪守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当朝女王维多利亚共生育了四子四女，她对生孩子感到厌烦。当她的长子爱德华的第四个孩子于 1868 年出世时，她已有 14 个孙子孙女了。维多利亚感叹道：这件事“令人兴味索然。对我来说，这好像与温莎公园中兔子的繁殖没有什么差别！”而在普通工人农民看来，子女是赚钱养家糊口的好帮手。但是由于英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和社会上对使用童工现象的抨击，儿童就业日益困难，所以，他们也被迫少生孩子，以免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此外，女权运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英国女权运动的一位先驱汉纳·米切尔

在看到节制生育的观点在兰开郡地区得到人们接受时这样写道：“将控制人口作为与贫困斗争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新观点。”她本人只有一个孩子。即使在强烈反对任何人为干预生育行为的宗教界，到 90 年代时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1893 年 6 月 15 日发行的由非国教徒主办的《基督教世界》就同意使用“安全期”避孕法。因此，英国家庭平均拥有子女的数目不断减少。19 世纪 60 年代为 6.16 人，70 年代为 5.8 人，80 年代为 5.3 人，90 年代更减为 4.13 人。

而这个时期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与婴儿死亡率的变化并无直接关系。1870 年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婴儿（一周岁以下）死亡率为 16%，80 年代曾降至 13% 左右，但到这个世纪末时，婴儿死亡率又恢复到 30 年前的水平。然而，流行性传染病发病率的大幅度下降使人们的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肺结核、猩红热、腹泻和痢疾均逐步得到控制。据统计，英国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与 50 年代相比，患肺结核死亡的概率下降了近一半，患其他几种传染病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为：斑疹伤寒、伤寒等热病为 22.9%，猩红热为 20.3%，腹泻、痢疾、霍乱为 8.9%，天花为 6.1%。医学的发展尽管有助于控制传染病，但作用并不是主要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也只有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一项，而人们患天花致死的危险性只有很小幅度的下降。客观地说公共卫生监督制度的形成、个人卫生状况的改善、营养条件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大大增强了人们抵御疾病的能力。

移民运动

移民运动是对该时期人口变化造成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素。19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引起向海外移民的浪潮。英国移民大都移居美国和其它英属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据统计，仅在 1871 年—1911 年间，英格兰地区有 135 万余人移居海外，相当于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 10%，每 10 个移民中就有 9 个的年龄在 40 岁以下。

造成移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可归纳为两大因素：英国政府鼓励移居海外的政策、自然灾害、宗教、政治迫害及失业等均为推力因素，海外国家及殖民地的发展机会和物质资源条件以及传播媒介的作用均可视为吸力因素。

此外，英国国内人口迁徙规模也不小，总的趋势是从乡村迁往城镇，从北部城镇迁往南部城镇。而国内迁徙又是与人们从事行业的改变密切联系在一起。农业衰落最明显，农林渔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由 1871 年的 15.1% 降到 1901 年的 8.7%，同时期工矿业占有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则由 43.1% 上升到 46.3%，商业运输业由 19.6% 增加到 21.4%。所以英国人口状况的改变反映了社会的变革。

Hannah Mitchell, *The Hard Way UP*, 1968, pp. 88—89, p. 102.

H.J. Habbakuk,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750*, 1972, p. 54.

Phyllis Deane and W.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1967, p. 142.

二、经济状况

农业

农业在 19 世纪下半叶急剧衰落，其根本原因是受国际农业竞争的影响。英国农场主在这场竞争中败在了美国大农场主之手。1846 年皮尔的保守党政府令人惊愕地废除了《谷物法》之后，保护英国农业的唯一屏障就是与北美及澳洲等地之间的海洋。但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海运价格大幅度下降。1868 年时，从芝加哥到利物浦每 1/4 英担小麦的运价是 11 先令，到 1892 年运价下降到 4 先令 3 便士，而到 1902 年再降为 2 先令 10.5 便士。因而，从美国输入小麦的数量大增，从 60 年代年均 165 万吨增加到 90 年代初的年均 500 万吨。大量外国谷物的涌入使得粮价一降再降，小麦价格从 1875 年的每 1/4 英担 2.5 镑降到 1894 年的 1.14 镑。谷贱伤农，大批农民离开农村移居城镇或海外，大片农田废弃，地租下降。1872 年—1895 年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由 140 万公顷减少到 60 万公顷。但是，牧业及蔬菜种植并未发生同样的大衰落，比如牛的存栏头数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 1911 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人的餐桌上的食品更加丰富了。

工业

危机现象不仅在农业出现，其他行业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1873 年—1896 年，工商业的增长率、利润率和外资额都下降了，因此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大衰退”时期。根据当时对某些行业技术工人失业情况的调查，1872 年的失业率仅为 1%，1879 年和 1886 年分别高达 11.4% 和 10.2%。

棉纺业长期以来执英国出口之牛耳，但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中丧失了活力，出口值下降。不过，最严重的是它不愿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来摆脱困难，仍使用陈旧的骡机来与美国先进的纺纱机抗争。其观念上的保守性比技术上的落后性造成的危害更大。

钢铁业也存在着同样的弊端，英国人发明的新技术往往在本国受到冷遇。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在 70 年代末发明了从廉价的含磷铁矿石中提炼钢的方法。迟至 1900 年，英国生产的钢锭和钢铸件中只有 16% 是托马斯炼钢法的产品，其余的仍沿用旧的炼钢法。因此，英国钢产量在 1886 年和 1893 年分别被美国和德国超过。

19 世纪末工业发展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大规模化工生产。英国化工业也染上了英国工业的通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迟至 20 世纪，英国制碱业还在用陈旧的莱氏法生产，而法德等国早就普遍采用了成本低廉的索氏法。合成染料的国内市场也被德国人占去 80%（1914 年），但像肥皂、颜料及化肥和大量生产的化学药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可与德国相抗衡。

此外，电力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也落到了美德等国之后。

然而，英国毕竟是工业化历史最长的国家，有些工业部门仍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或在世界经济中占重要地位。采煤业生机勃勃，煤产量和出口量均

有显著增加。1874 年英国煤产量是 1.27 亿吨，到 80 年代中期达到 1.6 亿吨左右。原煤出口在 1867 年首次突破 1000 万吨，1883 年增加了一倍，1894 年达到 3000 万吨。

造船业保持了领先地位，所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最大。1892 年—1913 年，英国船舶出口量翻了一番多，从每年不到 50 万吨增加到 100 万吨以上。

从上面叙述可见，英国工业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放慢，19 世纪末的增长速度只及 19 世纪中期的一半。

年代	工业生产增长率（单位：%）
1860—1870	33.2
1870—1880	20.8
1880—1890	17.4

第二个特点是英国丧失工业霸主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赶上。英美德法俄五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品中所占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年代	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俄国
1870	31.8	23.3	13.2	10.3	3.7
1881—1885	26.6	28.6	13.9	8.6	3.4
1896—1900	9.5	30.1	16.6	7.1	5.0

而且，英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的比例也下降了。1880 年的数字是 41.4%，1899 年降为 32.5%。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对外贸易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1873 年时，英国有 2/3 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是用于换取原料及食品，而到 19 世纪结束时的比例下降到 1/3。同期出口制造业产品以换取制造业产品的比例则由 13.2% 上升到 25.3%。这两组数字表明英国对外国制造业产品的依赖增加，英国不再是“世界工场”。

造成英国工业发展速度下降的原因很多，首先，英国不重视现代科技教育，沿用传统的师徒传授法，迟至 1889 年议会才通过《技术教育法》，但其教育规模已落在其他国家之后。如在 1913 年，德国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出 3000 名工科毕业生，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高校只有约 500 人拿到这个学科的学位。其次，英国工业发展较早，更新改造难度也更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需要具有新技术、新知识的生产者和管理人员，这个问题在当时很难解决。再次，工业界领导人物和管理人员观念保守，缺乏创新的精神，不用说外国的先进技术，就是本国发明的先进技术也不愿积极采用。第四，英国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成本低，难以与外国大企业相竞争。最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工农业在与外国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英国在 19 世纪下半期一直对外国产品敞开大门，不收关税，而欧美其他国家均对英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如在 1904 年，欧美各国对英国制成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为：德国 25%、意大利 27%、法国 34%、奥地利 35%、美国 73%、俄国 131%。甚至连大英帝国内的自治领地在这个世纪末也开始实行征收关税政策。

PhyllisDeaneandW.A.Cole,op.cit.P.297.

B.Thomas,MigrationandEconomicGrowth:AStudyofGreatBritainandtheAtlantic Economy,1973 , P.459.

B.Thomas,op.cit.P.122.

贸易

生产速度的放慢必然在进出口贸易上得到反映。若以 50 年代的出口指数为 100, 60 年代为 159.5, 70 年代为 217.9。从 80 年代起增长明显放慢, 80 年代的指数为 230, 90 年代为 236.9。 见下表：

英国出口统计表（单位：百万英镑）

年代	纺织品	棉制品	钢铁	机械	煤	总额
1850—1859	59.9	35.5	17.9	2.4	2.3	100.1
1860—1869	98.5	57.6	24.0	4.6	4.5	159.7
1870—1879	118.6	71.5	34.9	7.7	8.8	218.1
1880—1889	114.1	73.3	35.3	11.8	10.5	230.3
1890—1899	104.3	67.2	32.5	16.1	17.5	237.1

（以上数据为年均额）

与此同时，英国的进口也在增加，若以 19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的指数为 100, 60 年代为 153.9, 70 年代为 212.7, 80 年代为 232.2, 90 年代为 257.1。其增长幅度大于出口增长幅度，而且其数额更是大大超出。见下表：

英国进口统计表（单位：百万英镑）

年代	食品	纺织原料	其他原料	制成品	总额
1855—1859	49.3	50.4	26.3	2.8	169.5
1860—1869	77.8	90.7	32.1	5.0	260.9
1870—1879	124.8	95.8	44.2	9.9	360.6
1880—1889	136.6	94.9	45.2	12.3	393.6
1890—1899	148.9	89.8	52.0	15.7	435.8

（以上数据为年均额）由于英国同期无形贸易的盈余也有较大增长，所以贸易总额仍有较大的顺差。无形贸易的收入主要来自船运收入、利润、利息、红利、保险金、手续费、佣金等。19 世纪 50 年代起贸易总额的平均顺差额如下（单位为百万英镑）：

年代	顺差额	年代	顺差额
1851—1855	8	1876—1880	25
1856—1860	26	1881—1885	61
1861—1865	22	1886—1890	88
1866—1870	41	1891—1895	52
1871—1875	75	1896—1900	40

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使得出口增长减缓，进口增长幅度变大，只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弥补，才使贸易总额出现顺差。

P.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1969, P.468.

Ibid P.468.按通行价格计算。

Deane and Cole, op.cit.P.36.

第二节 国内政治

一、政治制度与政党

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

第二次议会改革的胜利，使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与他们经济实力相称的权力地位，同时也把改造旧的国家机器，彻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议题提上了日程。

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以单一的、世俗化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代替分散的、传统的、宗教的、宗族和种族的政治权力。2.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并发挥其职能，由新的管理集团来执行。新的组织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和选择，必须以他们的才能和社会成就为依据，而不是以家庭、家族的背景或地位来决定。3.整个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通过其政党或利益集团，日益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

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的民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早已取得胜利，但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光荣革命后，王权受到限制，议会成为实际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国王仍保留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他实际上控制着任免政府官吏的实权，即所谓“恩赐官职”权。这不仅使国王能够通过任免官吏来左右议会，而且还使买卖官职成了合法的、公开的现象，结果使得英国政府机构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贪污成风，效能低下，甚至有的官员请人代职，30多年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视事。

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与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政治经济权力极不相称。同样，国家机器的腐败也不利于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国内外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目标。第二次议会改革既然已经使政权和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那么政权本身的结构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强大压力下，英国从1867年起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完成与其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任务。

文官制度的完善

从50年代开始的改革所建立的文官制度尚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令政府最头痛的是公务压力迫使各部不断要求增加日常工作的勤杂人员。从60年代起，各部门就开始在固定的职员之外雇用临时的打字员或抄写员，而他们的工作具有阶段性和季节性，这就很难保证不发生混乱。罗伯特·罗姆图曾试图使这种事务性工作规范化。在他的努力下，1871年8月19日，枢密院公布的条例承认抄写员等非正式雇员享有与正式雇员同等标准薪金的权利，但没有病假工资和退休金。这样的规定当然不能满足非正式雇员的愿望。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87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指出，2/3的非正式雇员已逐渐成为永久性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应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E.W.Cohen,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 1941, PP.24—26.

获得享受年金的权利，但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874年政府再次成立以莱昂·普莱费尔博士为主席的咨询委员会，调查文官的组织机构。该委员会具有空前的权威性：它包括6个部的首脑和2名议员。他们的调查报告在全面评价了1870年以来的文官制度后，肯定了公开竞争原则以及区别对待国家雇员的做法，但建议取消临时雇员与永久雇员的差别，在中央一级设立勤杂人员管理部，雇员可以在各部之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雇员总额的情况下缓和用人部门的矛盾。该报告遭到了财政大臣的反对。尽管如此，枢密院仍然于1876年发布了一道指令，根据普莱费尔委员会的建议，对低级文官与勤杂人员作了如下规定，“在任何政府部门中服务的雇员，都可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并得到同样的任命和待遇。”由于各部的付薪标准不一，因而也就难免再次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1886年，里德利委员会成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公开考试竞争取仕以及按水平对文官进行分类的原则才正式被官方接受。里德利委员会对各级文官与雇员的工资、工作时间、年金、退休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统一规定，但各项规定的细则直到1890年才最后确定。

至此，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文官制度。它不仅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且对欧美等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议会机制的改革

随着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议会机制的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70年代起，内阁地位逐渐增强，权力重心发生位移，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议会至上的原则逐渐被内阁至上的原则所取代。其最重要的标志是1875年狄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事件，内阁越过议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独自行动，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新产生的各个利益集团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把众多的提案转变为法律，极大地增加了议会的工作量，使它处在无法应付日常事务的窘境之中。通常议会每周用两天时间讨论政府事务，在新的形势下这远远不够。

然而，这些麻烦毕竟可以克服。对议会威胁最大，使议会几乎瘫痪的，是从1880年开始的爱尔兰议员的阻挠活动，他们用无休止的发言破坏英国议会的一切正常活动。1881年1月31日，爱尔兰议员在讨论有关《强制法案》的问题时，连续讲了41个半小时。这种状况迫使议长宣布，“在传统的规定与方式下，议会行使立法的能力丧失殆尽。必须强制实行一个新的迫不得已的程序。”于是，议长开始实行1881年格拉斯顿起草的“紧急条例”，即议长有权中止某议员的发言，从而扭转了局面，防止了议会的“崩溃”。1881年秋，布兰德·梅等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工作，企图从根本上结束议会的混乱状态。1882年2月20日，他们提出建议，让“紧急法案”中的基本原则

Valerie Cromwell, *Revolution or Evolution: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7, PP.155—156, PP.156—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 1982, P.302.

Valerie Cromwell, *op.cit.* P.163.

固定下来，这项提案在同年年底被议会通过。爱德华·休斯形容这些新规定是“传统议会与现代议会的真正分水岭。”政府现在可以要求议会一周有4天的“政府之夜”，并且拥有新的结束辩论的权力。

这是一项成功的改革，它完善了议会的机制。但是，也引起了布里等人的忧虑，因为议会中个人的传统权力受到了侵害，多数党的成员完全有可能独霸议会。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议会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己的机能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种担心也就很快被人们抛到脑后了。

议会本身的改革从另一个方面完善了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

地方政府的改革

中央一级的改革必然引起地方一级的政府机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1835年市政法颁布后，各地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城市委员会和市政机构。但是，这些委员会的机构各不相同，它们管辖的地区也互相交错。它们的一部分工作由地方政府管理，一部分工作完全掌握在中央各部，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受本地政府管辖。这种双层体制显然会带来很多麻烦。1867年后，地方行政团体纷纷建立。虽然中央政府很想将许多工作委托给地方团体，但是这些工作大部分都与财政有关，而把财政责任委托给非民选团体又是与传统原则相背的。这样政府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中。更糟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各种局面而抛出的各种零星的立法，使地方政府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混乱状态。1881年，彼此不相隶属的地方当局共计不下27,069个，它们向各地纳税人征税。因此，地方政府亟需进行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权限的集中；第二，区域的重新调整和简化。

1888年的郡议会法基本上满足了这种改革的要求，它简化繁杂的地方政府机构，规定全国设立62个行政郡、60多个“郡级市”；每个郡或郡级市设一个议会，议员任期3年，由当地纳税人选出；各郡议会可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接管原来季审法庭的一些行政职能，统一管理各种地方机构；新的地方政府机构成员应由所在选区选出，或由所在地方政府任命；郡议会的权限：对本地征税，借款，管理地方治安，保护居民财产，修桥铺路，建筑房屋，管理工业学校等。

地方政府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它使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扩展到了地方一级，结束了地方政府的混乱状态，提高了它的行政效率，同时，也结束了治安法官对地方的统治。在此之前，乡村几乎完全控制在治安法官手中，而治安法官又几乎完全受当地的乡绅操纵。现在，乡村拥有住房的居民都有了选举权，这样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几个世纪来土地占有阶级对英国的政治控制，至此才算告终。

自由党

政治现代化不仅要求有现代化的国家机构，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党

Ibid.P.164.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 The Lion at Home,1974 , PP.2407—2423.

组织。第二次议会改革促进了现代政党的发展。

威廉·哈考特爵士曾说，“自由党如同一座有很多公寓的大楼。”的确，1870年以前的自由党几乎没有一个固定形象，政治上与组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裂隙。维多利亚中期的政党是松散的议会政党，但凭着某种内聚力，格拉斯顿仍然领导自由党度过了重重难关。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取得了某种进展，从而最终形成了现代政党。从1850年起，帕麦斯顿领导的议会政党开始出现，60年代，自由主义者开始与地方的激进政治家如布莱特等建立了联系。70年代后，各基层选区大量出现正式的政党组织。80年代，政治激进主义达到高峰，议会内外的政治斗争遥相呼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格拉斯顿的最后一届政府（1892—1894）已经是一个有自己纲领的政党政府，议会统治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

议会党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50年。皮尔死后，他的追随者们试图在议会里寻找一个永久的立足点。阿伯丁1852年—1855年的联合政府为皮尔派进入辉格—自由党政府集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虽然这届政府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遭到惨败，然而它却为帕麦斯顿政府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帕麦斯顿的第一届政府开始被公认为自由党政府，在它的内部，皮尔派、辉格派和自由主义者并不仅仅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联合。各种因素，尤其是它的领导人的魅力使它融合成领导一个时代的政党。

以帕麦斯顿等党魁为首的议会党团可以看作是议会党团的雏形，不过帕麦斯顿的党主要是一个议会党，而不代表那些在全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这些人中有一半地主和有地产收入的绅士。当然，随着中产阶级政治热情的高涨，自由党比它的对手更能吸收这样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也决定了自由党发展的方向。它紧紧地依附于英国的工业与商业集团，并在此基础之上成为全国性的党。同一时期，自由党吸引了大批的政治家加入自己的队伍，并与各种出版宣传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为自由党过渡到现代政党创造了条件。

不过很多政治家还不是职业性的，政治对他们只是一种间歇性的事务。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自由党真正的职业政治家是“前排议员”，这些人常常是辉格党绅士，如克兰威尔、金伯利、斯宾塞和里彭等。他们热心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事务，把他们的精力大部分花在行政事务而不是议会外本党听众方面，他们更像政府的高级文官而不是政党的领导人。

第二次议会改革结束后，这种松散的议会政党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在此以前，尽管英国已存在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制度，但很多选区实际上只是地方大户的囊中物，旁人很难插足，也就很少有议员会在自己的选区对付组织起来的政党。既无这种必要，全国性的政党的地方组织当然也就不会建立。选举权的扩大改变了选民的政治地位，在一个选区里，仅靠几个显要人物的支持是不够的。任何一党，如想赢得一个议席，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民，尽可能将本党追随者的姓名登入选民册内，以便控制。于是，1867年以后，地方登记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政党组织。

起初这样的地方登记团体主要是候选人的某个代理人或他本人亲自主持的一个办事机构，但后来发觉这样的机构不能满足政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于是这些团体开始把自己建立在代表制的基础上，第一个实现这样改组的是伯明翰自由党协会。

协会的新会章规定，凡捐助 1 先令的自由党党员均为协会会员，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推举协会的职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20 人。1873 年，这个协会又进一步更新了自己的组织结构，把分选区作为整个组织的唯一基础。分选区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由所在分选区的自由党人参加。这一改组保证了基层组织能够尽可能充分发动本党群众在选举时投本党候选人的票，提高了选举机器的效率。自此以后，其它各种各样的自由党基层组织也纷纷出现，如联合王国联盟、国民教育联盟等。

基层组织的发展增强了自由党的力量，使政党政治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依靠政党组织进行活动。

政党政治的发展和要求有与之相称的新型领导。格拉斯顿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自由党内部两派力量，即辉格绅士和工业自由主义者的平行力量中发展起来。他是非国教徒，他总是给他的同僚一种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印象，对自由党推行的政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对两派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他把道德与政治结合得天衣无缝，正是这一点使他在 1876 年—1880 年反对“巴尔干暴行”的活动中为自己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使他成为自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

但是，作为一个政党领袖，格拉斯顿也有明显的缺陷。他掌握自由党各派力量的方式主要是靠煽动、鼓舞而不是强有力的管理，在困难面前，他畏缩不前，无法学会难以捉摸的政党管理艺术，只好尽量超过一些，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派别纠纷。他厌恶政治压力集团，担心它们会成为政治上新的腐败根源。他同时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力主进行社会改革，并吸收下层人士中的精华参与政事。格拉斯顿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弱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自由党在此阶段内能成为改革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地方组织的发展促使自由党建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部分由于自由党的特点，部分由于缺少保守党戈斯特那样的干练人物（此人在保守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成果卓著），自由党的日常活动几乎完全由督导员操纵。尽管自由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未能有效地控制地方组织。因为自由党组织的巨大变化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到上的，这就使它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远远不及保守党。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不满足于仅仅在民主基础上设立各地协会，他们想把各地的协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总会。经过一番努力，1877 年 5 月 31 日，他们在伯明翰举行了自由党全国总会的成立大会。张伯伦被选为会长，他在给约翰·莫利的信中说，他希望总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组织。”的确，这个组织很快就显示出其活力，它协调了自由党在议会内外的行动，使党的领袖与追随者更加团结，加强了自由党中央对地方各级组织的控制。在 1880 年大选中，该组织为自由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尤为重要的是，

劳伦斯·罗威尔：《英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36 页。

Richard Shannon, Gladstone and the Riot in Balkan, 1975, P.266.

Paul Adelman, Gladstone, Disraeli and Later Victorian Politics, 1985, P.27.

督导员是各党负责召集政党议员们开会的干部，他们必须保证在议会开会时本党有选定的人数出席。

Paul Adelman, op.cit.P.29.

它保证了 1886 年自由党统一派分裂出去时，整个党的组织仍能保持不垮。

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后，自由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自身的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有较为稳定的领导集团，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有较为严密的组织机构，并能以民主的方式维护某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并由此影响这些社会集团，从而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

保守党

一个政党，如果要想取得选举的胜利，不仅要有富于感召力的政策，而且还要有坚强的组织。保守党的情况和自由党差不多，1867 年以前，由于选民不多，保守党的组织也很原始，党的中央机构基本上掌握在几位权势人士手中。除了参加议会活动外，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征集选举基金、安排候选人。各地党的代理人也都是非职业的，只是在选举时才参加活动。因此，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的联系非常松弛，主要是通过伦敦的卡尔顿政治俱乐部（成立于 1832 年）来进行的。第二次议会改革后，它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和自由党一样开始了自身的改造。1867 年到 1886 年是保守党组织的基本转变时期，新的更有效率的政党机器开始建立。保守党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1. 中央组织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和正规化；2. 地方组织机构得到了迅猛发展，日益要求全国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其结果产生了保守党全国联盟。

由于保守党在 60 年代缺少自由党那样广泛的群众组织，因此，在 1868 年选举中再次失败。这一失败促使保守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是使党更加大众化，还是仍旧像传统做法那样，保持某种贵族式的权威性，由党的领导人、督导员和部分工作助手包办一切？一句话，保守党在新的形势下何去何从？这一争论几乎从 1867 年保守党全国联盟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其结果是迫使狄斯雷利下决心改进党的中央机构。1870 年，成立了保守党总部，并任命戈斯特为党的代理人。

戈斯特是个头脑清醒、精明强干的人。他赞同狄斯雷利的主张，决心尽力争取工人阶级的选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 1873 年，已新建了 69 个保守党协会，全国保守党协会达 400 个。在大的市区，总部基本可以控制局面，在小的区域，保守党的影响则更大。在 1874 年大选中，保守党的候选人似乎都能找到合适的选区的支持，戈斯特的努力保证了保守党大选的胜利。

戈斯特的另一个策略是牢牢地控制保守党全国联盟。这个联盟在戈斯特上任以前就已经成立，与自由党的组织相反，这个机构完全是从上到下成立起来的。1868 年的大选表明该组织缺少有力的领导人的持久奋斗目标，不能完成党所期待于它的任务。因此，1871 年戈斯特成为它的书记后，就干脆把该组织的总部搬到国会街他自己的党的代理人办公室去。

但是，1874 年大选的胜利冲昏了保守党领导人的头脑，他们愚蠢地听任戈斯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党机器松垮下去，重新让督导员们代替戈斯特

的工作，并迫使他在 1877 年辞职。戈斯特当时就对狄斯雷利发出了警告，但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1880 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后，党的领导才发现了自己的失策，重新把戈斯特请回来担任党的代理人。

戈斯特把持的这两个机构成了保守党最重要的遗产，尽管保守党的党魁们对此看法不一，但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来说，这份遗产的重要性显然不可低估。

与自由党不同，保守党的重建不是通过民主而是通过集中进行的。不过，由于保守党的支持者大多非常富有，所以保守党的财源比自由党充裕。不仅如此，就整个政党机器的效率而言，它也比自由党高得多。

通过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变革，英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过，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不是上面的这些变革，而是 1884 年—1885 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法的通过。

二、第三次议会改革

改革的前提

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后，虽然英国在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仍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选民的范围尚不够广泛，工人阶级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选举费用过于高昂，竞选中贿赂现象层出不穷；地主在乡村仍然握有绝对的优势，农业工人仍未获得选举权，等等。因此，进一步清除这些弊端，就成为第三次议会改革的主要任务。

相对而言，第三次议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比较小。两党对此都没有提出多大的反对意见，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反对势力纵想阻挠，也阻挠不住。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会过分损害英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它的通过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并未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掀起多大的波澜。上院曾经提出，在政府提出重新调整选区的方案之前，不同意“民选机构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调停下，风波很快平息。虽然激进主义者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认为这是“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但毫无所得。

第三次议会改革的进行是一个时机问题。80年代初，这一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自由激进主义者要求彻底的民主化，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又助长了这一声势。当时，格拉斯顿内阁被爱尔兰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它也急于实行内政改革，以摆脱不利的处境。并且，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进行一次新的选举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于是，格拉斯顿在他第二届内阁任内着手进行第三次议会改革的工作，并且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成功。

1883 年的《取缔选举舞弊法》

通常所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实际包括3个法案，第一个便是1883年的《取缔选举舞弊法》。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改革虽然为民主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但并未以具体的措施来保证民主的原则得以实行尤其是在当地富豪可以通过金钱的手段来操纵选举、收买选票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能反映民众的意志。因此，格拉斯顿内阁在通过第三次议会改革议案前，首先提出了《取缔选举舞弊法》。该法案于1883年8月23日在议会通过，成为法律。

该法案在某种意义上是1854年同类法令的强化和扩大，它详细列举了各种腐败和非法行为，规定候选人不得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收买选民，如请选民吃喝或给以种种物质上的报酬，也不得以任何压力或暴力强制选民投票，并且严格限制竞选活动经费，甚至对送选民到投票处的机动车辆的数量也作了限制。有报酬的拉票员人数也受到了限制。该法令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选举开支作了规定，从而使任何候选人都能负担。由于对贿赂和舞弊进

Anthony Wood, op.cit.P.320.

J.H.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PP.2353—2360.

行了打击，竞选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前靠收买选民变为通过自己的宣传和纲领来吸引选民加入自己的政党组织，从而投本党候选人的票。选举的大部分事务开始职业化，主要由政党协会的成员来承担。

1884 年的《人民代表法》

《取缔选举舞弊法》通过以后，格拉斯顿内阁提出了《人民代表法》议案，经过议院一番辩论，1884 年 12 月 6 日，该议案获得通过。它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的房主与寄宿人，不论其住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它规定，在 1867 年选举法的基础之上，下面这些人也拥有选举权：在投票登记前一年住进他的房屋并纳税的房主，一年交纳房租 10 镑以上，居住期达一年以上的寄宿人，以及自己拥有的土地或租佃的土地年产值为 10 镑以上者。按此规定，英国选民增加了 200 万，即从原来的 250 万扩大到 450 万。这一法令最重要的结果是使乡村工人和城镇工人一样，拥有了选举权。

1885 年的《议席重新分配法》

1884 年选举法案通过后，理应有一个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法案，以便严格依照各区人口多寡来分配议席。但这一提案却遭到了上院的阻挠，如上所述，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干预，问题才算解决。1885 年，《议席重新分配法》得到两院批准而成为法律。它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新增 13 个双议席选区和 66 个单议席选区，同时将这两处的另外 36 个双议席选区变为单议席选区，取消马科斯菲尔德与桑地维齐两个双议席选区，在苏格兰新增两个单议席选区，在爱尔兰新增 22 个单议席选区，并将爱尔兰 3 个双议席选区变为单议席选区。该法令根据人口多少分配议席，取消了 1.5 万人以下选区的选举权，使其成为所在郡的一部分。1.5 万—5 万人的选区，无论以前是否有代表，都可选送议员一人。5 万—16.5 万人的选区，可选送议员 2 人。16.5 万人以上的选区，可选送议员 3 人。人口每增 5 万，则可增选议员 1 人。这种原则又推行到各郡。除一部分城市和大学外，全国各郡一律划为单议席选区。为了便于这种改革，议会新增了 12 个议席，议员总额由 658 人增为 670 人。其中爱尔兰 103 席、苏格兰 72 席、英格兰与威尔士 495 席。自此，工业中心和人口繁盛的区域在代议制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动之一。改革后的选区虽然在大小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但它完全破坏了古老双议员选邑和双议员郡的选举制度，只有几个旧的双议员选区继续存在到 1948 年，绝大多数选区都被重新划分。它迫使整个选举组织不得不另起炉灶，两党也不得不在新选区中创设新的协会和办事机关，寻找新候选人，协助政府编制新的登记册等等。伦敦发生的变化最大，新选区纷纷建立。保守党对重新开始的这些事情有着巨大的热情，他们在新都市选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议会选区的重新划分为下院的政治家奠定了新的立法基础。

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 *The Longman Handbook of Modern British History 1714—1980*, 1983, P.61.

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 *op.cit.*P.61.

第三次议会改革的意义

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完成了议会改革的任务，虽然它尚有一些缺陷需要弥补，如选举名册编制不完备，登记手续复杂，居住期限的* 限制，赋税限制（需完税以后方有选举权），复数投票制以及妇女尚无选举权等问题，但从当时英国总人口为 3000 多万，而近 500 万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这一事实来看，大部分家庭都分享到了政治民主的权力。政治民主的扩大不仅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意愿，同时也提供了工人参政的可能性，为工人政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这必将在下一个世纪里影响英国政治结构的变化。

三、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国内政策

自由党的政策

19世纪晚期，自由党国内政策的重点主要是颁布各种社会改革的立法与处理爱尔兰问题。本节主要讨论自由党的各种社会改革立法。

任何社会改革都离不开钱，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能否推行某项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是能否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自由党的领袖格拉斯顿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帕麦斯顿内阁时期，格拉斯顿就担任财政大臣。他的财政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财政改革，尽量使制造业和商业摆脱政府征税的束缚，利用政府的力量降低原材料与财务的费用。他认为这将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对于工资问题，他的看法与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完全一样——工资应与它们的自然水平相符，能提供廉价的食物并保证贸易的连续扩张。只要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就能够分享到一般繁荣的好处。因此他认为工会是一种限制工业自由发展的非自然力量。不过，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他开始改变了对工会的看法。

格拉斯顿的自由贸易政策刺激了英国的工业发展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使工人阶级也分享到了很大的好处。由于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物价的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就消费水平在短短的20多年中提高了60—75%。

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格拉斯顿的个人作用。英国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制约，但他执行的自由贸易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满足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证明，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财政大臣之一。英国经济的发展为自由党提供了进行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增强了他们改革的信心。

格拉斯顿的首届政府（1868年—1874年）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的首次大选使自由党获得了多数议席，并由此将格拉斯顿推上了首相的宝座。随后的6年是巨大的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时期。

这次大选的胜利使一些观察家们颇感意外，因为迪斯雷利是1867年改革法的炮制者。但实际上，这时保守党的羽翼尚未丰满，而改革与进步的名声又使自由党占了不少便宜，布赖特与科布登等激进主义者的宣传鼓动也起了很大作用，工人阶级则渴望改革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这种种因素不仅把自由党推上了台，而且迫使自由党的领导人比他们本来打算的走得更远。

自由党政府除了早已进行的文官制度改革外，还进行了教育、军事、工会、投票法等方面的改革。

格拉斯顿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重大的改革总是要触犯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非国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得到任何好处，军队与宫廷忌恨卡德韦尔的改革措施。工会对《罪行补充法》恨之入骨，禁酒自然也引

起不满，人们甚至把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也归罪于英国的中立。种种因素导致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在 1874 年的大选中失败，而工人阶级改投保守党的票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保守党政策概述

狄斯雷利重建保守党的工作在 60 年代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在他的政府通过第二次议会改革法后，却立即在 1868 年的大选中遭到了失败。沉重的打击使狄斯雷利更为清醒地看到了英国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劳动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再仅仅是两党党魁政治交易中的筹码，而是开始为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力而斗争了。他认为，“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变化是不断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阻挠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化，而在于这些变化是依照人民的方式、习惯、法律和传统来进行，还是依照抽象的原则、任意的决定和教条来进行。”在格拉斯顿的首届内阁任期内，狄斯雷利不仅从组织上改进了保守党的竞选机器，而且看到了两种必要性，即在国外，英国必须进行扩张以免落后于沙俄和德国；在国内，必须使工人阶级信服，社会改革不是激进党人的专利，保守党同样可以干出对劳动阶级有利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新托利主义”或“托利民主”。这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直成为保守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狄斯雷利第四届内阁（1874 年—1880 年）

未上台前，狄斯雷利曾对保守党全国联盟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保守党的三大目标：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巩固英帝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于第三点，狄斯雷利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说，“对于那些认为有必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人来说，除非实际上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使他们的工作人道化，否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就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要取得这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违反使国家繁荣的那些经济原则。……这两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即一方面可以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又不致损害国家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党认识这种政策会导致资本减少，工资降低，失业率提高并最终使王国贫困下去。由于这种自由放任哲学的影响，使格拉斯顿政府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缩短工时问题上无所作为。而狄斯雷利则认为，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冲突，并且他把社会改革看得比政治改革更重要。他的名言是，“当茅屋不舒适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因此，狄斯雷利一上台，便立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

负责社会改革的中心人物是 R. 克洛斯，他原是兰开郡的律师。在他的推动下，狄斯雷利内阁通过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令。

1. 1875 年工匠住宅法

W.F.Morypenny and G.E.Bookle ,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 Earlof Beaconsfield , 1929 , P.291.
J.H.Wiener (ed) , op.cit.P.2498.

W.F.Morypenny and G.F.Bookle , op.cit. P.709.

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建筑合乎卫生标准的住房成了一件紧迫的事。《工匠住宅法》规定地方当局有权拆毁不合卫生条件的住房，并建造新房供工人使用。该法令有很多缺陷，主要的一点地方是政府尚未获得强制性购买住房的权力，因而不能清除不卫生住房。不过，这项政策仍然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

2. 1875年公共卫生法

自产业革命以来，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而地方当局对卫生问题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卫生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里的污水无法顺利排出，粪便横溢，到处是垃圾，成群的猪甚至在街上乱窜，整个城市臭气熏天。卫生不良使得瘟疫流行，疾病猖獗。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规定地方当局必须任命一位负责卫生健康的官员，负责修筑管辖区域内的排水沟，检查供水情况，建造合乎标准的厕所，对食物、饮水以及医院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不合标准或违反规定者处以罚款。

3. 1876年的商船法

英国商船的船员为数甚多，但船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却极差，因此商船素有“活动棺材”之称。船员们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进行了抗议活动。德比郡的议员塞缪尔·普利姆索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争取通过改善船员待遇的立法。他的企图遭到了船主们的强烈反对，狄斯雷利开始也持反对的态度。但当越来越多的公众关心此事并声援船员时，他明智地改变了态度，支持并通过了普利姆索尔提出的商船法案。该法令授权贸易委员会监督商船的各种活动，并对船员在船上的生活环境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4. 工会法

狄斯雷利内阁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在于它的立法。1871年以前，工会是非法的组织，格拉斯顿的1871年法令虽然宣布工会为合法，但罪行补充法却使工会实际上比以前更受警方和雇主的威胁。1871年南威尔士有7名女工，仅因为他们对工贼骂了一句“呸”，就被捕入狱。工会为此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但格拉斯顿内阁对此态度冷漠。这样，扭转这种敌视工会状况的希望，就寄托在保守党身上了。

1875年6月10日，内政大臣克洛斯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取消1871年的罪行补充法。他表示要公正地对待工人阶级，并兑现他许下的一切诺言。8月13日，该议案以《阴谋与财产保护法》的形式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它规定，任何两人以上以协定或结社方式造成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纠纷的，不能被指控为阴谋行为。在工业争端中，如果一个工人的行动是合法的，那么整个工会的行动也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人解除与他雇主的契约是合法的，那么所有工人的同类行为均属合法。这样，工会的罢工第一次真正合法化。1876年的补充法，废除了“妨碍贸易”等限制工会的规则，使工会的地位与活动彻底合法化。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工会的立法。1875年的主仆法使雇主与工人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以前的主仆法规定工人在契约期内离职属违法行为，按法律要

J.H.Wiener (ed), op.cit.PP.2287—2307.

J.H.Wiener (ed), op.cit.PP.2287—2300.

George Howell, Labour Legislation, Labour Movements, Labour Leaders, 1902.P.294.

George Howell, op.cit.P.369.

赔偿损失甚至被处监禁，而雇主毁约则是法律允许的，只须付一定数量的赔偿费就行了。而按新法令，双方都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1874年的工会法规定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6个半小时，而以前每周工作时间为60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半计算，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基本上可以不超过10小时。另外，以前由于政府对工厂监督不严，很多法令和制度并未得到执行。克洛斯的1878年《工厂车间法》明确规定工厂视察员不能由厂方派人担任。视察员随时可以到厂视察，违法的厂主将被罚款10镑。如因机器防护措施安装不当而造成工人死伤，厂主将被处以100镑以下的罚款。该法令使所有的工厂都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是国家保护工人的一项重要措施，满足了工会的要求。

除此之外，狄斯雷利政府在1878年还颁布了圈占公地法和教育法。教育法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而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将处以罚金。另外，禁止非法圈占公地，使正在消失的森林得到了保护。

狄斯雷利在任内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立法上，而且还反映在行动上。1875年，在狄斯雷利的动议和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英国政府未经议会通过就先行买下了埃及国王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这在英帝国扩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传统的议会形式已不再完全适应现代政治瞬息万变的需要，权力的重心日益转向人数较少的内阁。

总的来说，狄斯雷利试图使他的党跟上时代步伐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这种社会改革即“托利民主”导致了工人阶级保守分子的产生。1879年，矿工工会的领导人A.麦克唐纳甚至对他的选民宣称，“保守党在5年中对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超过自由党50年来对工人所做的事情。”

但是，狄斯雷利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业。保守党上台时，经济的状况就不好。当时英国已开始从加拿大的“处女带”、美国的中西部和澳大利亚进口大批的谷物，价格之便宜使英国国内的农民几乎无利可图。1875年—1879年间的农业歉收使情况更糟。这对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都是沉重的打击，许多农业工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与南非战争等对外战争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格拉斯顿乘机攻击狄斯雷利的外交政策，保守党政府在各种压力下失去招架之力。在1880年大选中，保守党遭到了预料中的失败，并在乡村失去了很可观的支持。

一年后，狄斯雷利去世。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重建了保守党，使它摆脱了旧的托利传统，找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诚然，他的国内外政策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旧的托利分子强烈反对他扩大政府的权力。他的欧洲政策在以后显示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对外扩张政策部分地造成了南非与阿富汗的不幸事件。但是，作为一个基本顺应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社会改革的政绩应该得到肯定。

George Howell, op.cit.P.369.

J.H.Weiner, op.cit.P.2329.

自由党重新执政：格拉斯顿 第二届内阁（1880年—1885年）

虽然自由党在188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多数，但这一次，自由党的优势已今非昔比。自由党内部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旧的辉格党绅士依然在党内拥有很大势力，在政府中拥有重要的位置。而一批年轻的、在日后发挥着巨大能量的激进分子如约瑟夫·张伯伦等人，却仅仅获得较低的职位。辉格党绅士们在政府中要求执行一种保守退步的政策，而自由党中新获得选举权的人则要求更进一步实行社会改革。事实上，是激进分子把格拉斯顿推上了台，但是他在这届政府中执行的政策却远非激进。除了辉格绅士的阻挠外，议会中新增加的80名爱尔兰议员也是一个令格拉斯顿头痛的因素，他们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在解决爱尔兰问题之前，不可能解决任何其它问题。因此，格拉斯顿政府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在何等程度上解决爱尔兰问题。

格拉斯顿在处理爱尔兰问题上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起初试图通过强制手段压制爱尔兰的骚乱。1881年，他抛出了《强制条例》，规定凡是有援助爱尔兰土地同盟嫌疑的人可以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和拘留。大部分土地同盟的领导人被捕。1881年格拉斯顿又抛出了《土地条例》，规定政府可以仲裁确定15年的地租，补助农民购买一份土地。这样，部分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骚乱逐渐平息。但是，格拉斯顿的安抚政策引起了旧的辉格绅士的不满。在对外政策上，格拉斯顿也遭到帝国扩张主义者的反对。除了通过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案外，格拉斯顿这届内阁几乎没有什么作为。1885年，张伯伦曾提出一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让爱尔兰拥有地方自治政府。但他的意见在党内遭到了强烈反对，张伯伦被迫辞职。而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帕内尔此时已接受了伦道夫·丘吉尔的劝说，决定支持保守党。1885年6月8日，格拉斯顿政府的预算修正案未获通过，格拉斯顿只好辞职，狄斯雷利的继承者索尔兹伯里组成新政府。

索尔兹伯里的看守政府（1885年—1886年）

按照惯例，索尔兹伯里勋爵可以先行就职，然后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但第三次议会选举法规定必须在新选民登记完毕后才能进行大选。因此11月前不可能举行大选。这样，索尔兹伯里除非得到格拉斯顿和爱尔兰议员的共同支持，否则，他是不愿就任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斡旋下，格拉斯顿与索尔兹伯里达成了谅解。于是，索尔兹伯里以少数党领袖身份组成新一届政府，英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复杂微妙的短暂时期。不仅自由党，保守党内部也面临着分歧：伦道夫·丘吉尔带领他的“第四党”，发誓要把保守党维持在狄斯雷利的社会改革和帝国扩张政策的轨道上，这又引起了党内其他人的反感。尽管如此，索尔兹伯里的这届“看守政府”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他满足了帕内尔的许多要求，取消了强制法并通过了一项土地法。该法令允许农民政府申请补助，以购买土地。

到1885年8月，格拉斯顿已意识到给爱尔兰自治的必要性。不过他还不愿公开他的想法，害怕这会引起党的分裂。因为张伯伦提出的纲领不仅要给爱尔兰自治，而且主张给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独立议会。

在 11 月大选前，帕内尔曾试探过格拉斯顿的态度，未获结果，于是下令他的追随者们仍然投保守党的票。尽管保守党在很多自治市里获得了成功，但在各郡都一败涂地，结果自由党以 86 席的多数获胜。帕内尔在保守党那里没有寻到应有的支持，索尔兹伯里和丘吉尔都拒绝同意任何有限制的自治。帕内尔只好转而寻求自由党的支持。当格拉斯顿的儿子赫伯特·格拉斯顿突然宣布格拉斯顿同意爱尔兰自治时，帕内尔支持了自由党。于是，格拉斯顿在 1886 年 1 月底组成了新政府，将由他来提出这个令人头痛的爱尔兰自治议案。

格拉斯顿第三届内阁（1886 年）

格拉斯顿的这届内阁与以往不同，它几乎像签订了卖身契一样，把这届政府的命运完全与爱尔兰自治联系在一起。他发誓要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然而能否成功却要看他在何等程度上控制他自己的党。不幸的是，爱尔兰自治问题立即导致了党内早已存在的矛盾的公开化。以哈廷顿勋爵为首的辉格派一翼拒绝加入政府，而张伯伦则在格拉斯顿宣布了自治法案的细节后退出政府，因为他坚持自治必须是联邦性质而不是分离主义的。1886 年 4 月，格拉斯顿正式向下院提出他的议案，在爱尔兰设立一个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可分两级，在帝国议会的严格管理下处理爱尔兰的大部分内部事务，只把外交、军事和贸易大权留给英国议会，而爱尔兰议员从此不在威斯敏斯特拥有席位。这一议案不仅遭到保守党，而且遭到辉格绅士与张伯伦激进分子的反对。而张伯伦的攻击尤为猛烈，他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派别——“自由党统一派。”

6 月 8 日，议案提交表决，结果以 313 票对 343 票被否决。其中至少有 93 名自由党议员投了格拉斯顿的反对票。格拉斯顿立即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7 月的选举结果表明，保守党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胜利。格拉斯顿立即辞职，由索尔兹伯里组成新政府。

自由党这次失败的影响是深远的。保守党从此开始了它将近 20 年的掌权生涯。从 1830 年开始的自由党统治到此结束。它在社会改革方面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而当英格兰人还没有完全赞成爱尔兰自治时，格拉斯顿贸然提出爱尔兰自治议案，无异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自由党的左右摇摆，不仅使它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左翼，也失去了自己的右翼。从此，自由党开始走下坡路。

索尔兹伯里第二届内阁（1886 年—1892 年）

这届保守党政府的政策缺少特色。部分的原因在于它的支持者们目标不一。张伯伦领导的自由党统一派虽然支持索尔兹伯里，但仍然宣称他们是自由党人，在下院仍与自由党坐在一起。索尔兹伯里一方面得应付爱尔兰议员，另一方面又得对张伯伦做出某些让步，以换取他对保守党的支持。而张伯伦

Anthony Wood, op.cit.P.329.

H.L.Peacock, AHistoryofModernBritain, 1982, PP.150—151.

既已被绑在保守党的战车上，也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许多观点，干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情愿的事。这届保守党政府，就是在这种交织的矛盾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新政府中，除首相外，最重要的人物是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伦道夫·丘吉尔。他时年 37 岁，他的坚强性格和不屈不挠地继续推行“托利民主”的决心使他在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享有高位。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为错误估计形势而葬送了政治前途。他认为减少陆军和海军的预算是必要和可能的，但这不仅遭到了陆军部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主张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议员的反对。丘吉尔想以辞职来迫使首相屈服，然而他的恐吓政策未能奏效。索尔兹伯里改任自由党统一派的爱德华·戈申为财政大臣。

虽然索尔兹伯里渴望得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但他对爱尔兰自治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他拒绝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做出任何让步。新政府对爱尔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对政府认为违反秩序和法律的人可以不经陪审团审判即进行判决。索尔兹伯里任命他的外甥巴尔弗为爱尔兰总督，以执行这种高压政策。爱尔兰农民在威廉·奥布莱恩和约翰·狄龙的领导下，开始执行“运动方案”，即所有的佃户商定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租金，如地主拒绝即行抗租，并采取进一步的反地主和反英国的行动。巴尔弗以严厉的《镇压犯罪活动法》作为对他们的回答，并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地主。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新的土地法，由国家给那些购买土地的爱尔兰农民提供更多的补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压政策所产生的矛盾。

索尔兹伯里内阁的主要兴趣在国外，在他任内，英帝国的殖民地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在国内，索尔兹伯里内阁只进行零星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立法有 1888 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法》，该法案导致了郡议会的产生。另外，伦敦郡议会也于同年建立，但各个机构腐败现象严重，组织不得力。为加强各个机构的管理，1899 年通过了伦敦政府法，此法令一直到 1965 年才废止。该法令规定，凡人口 5 万以上的城镇都可成为自治市，并享有郡议会所享有的自治政府的广泛权力。除此之外，1891 年的工厂法，规定工厂雇用工人的最小年龄不得低于 11 岁。同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小学教育可免交学费。这些改革措施，作为对张伯伦要求的让步而提出的，并无多大实质性的意义。

索尔兹伯里的政策在议会内外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到 1891 年，他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争取选民了。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后，他决定解散议会，1892 年 7 月举行了大选。

格拉斯顿依靠爱尔兰议员的票数获得微弱多数，于是索尔兹伯里辞职，格拉斯顿再次组成新政府。

格拉斯顿第四届内阁（1892 年—1894 年）

格拉斯顿这届政府的基础是虚弱的，保守党与它几乎旗鼓相当，只要爱尔兰议员稍有不满意，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更糟的是，这些年来，自由党全国总会的积极活动，反而给自己的政府出了难题。1891 年，自由党全国总会通过了著名的“纽卡斯尔纲领”，其中包括一连串的社会改革措施，如爱

尔兰自治、“一人一票”等等。自由党在执政时必须执行这些纲领，否则就会危害它的统治地位。带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套纲领执政，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由此带来的麻烦也是可以想象的。一旦它执政后，选民就要求它兑现诺言。如果不兑现，政府的威望也就完结了。对 80 多岁高龄的格拉斯顿来说，这无异是个沉重的负担。

格拉斯顿现在已把自己政治生命的赌注完全押到了爱尔兰自治这张牌上。1893 年 2 月，他提出了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该方案和前一个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爱尔兰议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拥有代表一项，但他们的权限只限于在爱尔兰和帝国事务方面投票。84 岁高龄的格拉斯顿为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奔走呼号，先后在 85 次会议上同张伯伦与巴尔弗那样的辩论家展开交锋，创造了议会史上的奇迹。然而，他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下院以 34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议案时，上院在二读时却以绝对的优势票数否决了它。格拉斯顿遭此打击后，日益失望，同僚们逐渐疏远，终于在 1894 年 3 月 3 日辞职。在女王的坚持下，他违反大多数自由党人的意愿，让罗兹伯利接替首相职位。由于没有得到上院议员的支持，罗兹伯利的一连串社会改革的议案大多胎死腹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于 1895 年 6 月辞职。索尔兹伯里再次组成政府，他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以 152 票的多数获胜，其中包括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由此开始了保守党长达 10 年左右的统治，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

不过，罗兹伯利的自由党政府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1894 年它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地方政府法案，一般称之为教区议会法。它限制了教区议会的权力，从而弥补了郡议会法所产生的不足。在这个法案中，不仅承认某些妇女可以参加地方选举的投票，而且有资格成为市议员。

在英国政坛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的格拉斯顿退出政治舞台，无疑是一件大事。他在下院的告别演讲上，激动地发泄了他对上院的愤慨。长期以来，他同那些在他看来是自由和进步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些激进的自由党人追随他的足迹在 20 世纪初期继续战斗。格拉斯顿为爱尔兰问题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然而也在这方面遭到了他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这并非由于他的无能和他的性格，而是他在解决爱尔兰问题时没有触动根本性的问题，即消灭爱尔兰的地主制度，他希望在政治上给爱尔兰地主以独立的地位。结果这种两头讨好的政策适得其反，遭到了地主与爱尔兰农民的共同反对，并由此促使了他的下台。

尽管如此，格拉斯顿仍然不失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的辞职标志着自由党厄运的开始。在英国历史上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继任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无法扭转自由党衰亡的颓势。

索尔兹伯里第三届内阁（1885 年—1902 年）

1895 年大选的胜利使保守党与自由党统一派建立的联合政府获得了巩

J.H.Wiener (ed), op.cit.P.2502.

H.L.Peacock, op.cit.P.154.

固的基础。但是，这届政府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动荡的局面。在内政方面，激进分子不满足于已有的改革。自由党的官方政策在纽卡斯尔纲领发表后变得越来越激进，而越来越多的辉格绅士转入保守党阵营又加强了自由党内部激进派的势力。自由党内新一代的激进派如劳合一乔治和阿斯奎斯等人开始崭露头角。自由党的政策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劳资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促使了工党的产生。这般时期既是英帝国繁荣的顶峰时期，也是其内部发生新的分化的微妙时期。

由于各帝国主义强国此时竞相争夺殖民地，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因此，索尔兹伯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与殖民扩张上。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

爱尔兰问题依然搅得这届政府心神不定。索尔兹伯里希望通过改善爱尔兰农民地位的方式来削弱爱尔兰的自治要求。他的这项政策获得了部分的成功。1903年通过的由爱尔兰总督乔治·温德姆提出的土地购买法，规定由政府借钱给农民购买地主以公平价格出售的土地。利息为3.25%，分68.5年还完。这一计划受到爱尔兰人欢迎，至1910年为止，有25万佃农购买了土地，政府为此支付了1.5亿英镑。1898年，爱尔兰各郡建立了郡议会，增加了爱尔兰人参加本地政府事务的机会，部分地满足了爱尔兰人的要求，使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18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工人赔偿法。工会一直要求政府改进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该法令规定工人在工作中受伤可以要求赔偿。虽然对具体的赔偿尚有若干限制，但毕竟承认了雇主对雇员负有某种责任这一原则。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法庭不公正判决，该法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届政府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1895年皇家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方面的落后状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899年英国建立了教育委员会，协调各教育机构的关系，保证实行良好的教育制度。不仅实业界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而且首相与张伯伦也为此摇旗呐喊。改革由巴尔弗具体负责，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各种宗教团体在教育界已扎下了根，拒绝让出自己的阵地。巴尔弗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于1902年12月通过了他的教育法。该教育法奠定了20世纪英国教育的基础。它废除了旧的学校委员会，由市和郡的议会任命教育委员会，负责该地的初等、专科和中等教育的管理事宜。除了公立学校，天主教和国教的学校也从议会和地方税中得到某些补贴。该法令还设法改造旧的文法学校，使各类学校都能赶上公认的教育水准。但非国教徒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因健康原因辞职，首相职位落到了他的外甥巴尔弗手中。

1897年，索尔兹伯里政府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举行典礼。这或许是英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典礼。庆典持续了两个星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其说是庆祝女王即位，不如说是庆祝英国的强盛。的确，英帝国已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踌躇满志，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事。虽然经济学家马歇尔教授已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然而他的忧虑完全被一片欢呼的声浪淹没了。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3年后去世。她的儿子爱德华五世继承了

H.L.Peacock, op.cit.P.170.

J.H.Wiener (ed), op.cit.PP.2220—2233.

王位。此时恰好是世纪之交，也恰好处于不列颠帝国荣誉的峰巅。她去世后，这一辉煌的时刻也就随即成为历史，昔日的“光荣”不复再来。

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的先后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三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9世纪晚期，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英国工人阶级政党——英国工党的产生，它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格局，并对20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节对该时期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评述将主要围绕着英国工党的起源而展开。

对工党起源的探讨是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戴维·凯茨认为产生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是由英国工人运动的传统决定的，他们历来反对暴力行动，主张合法斗争。此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为什么劳工在获得选举权后不能通过某一个现有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却没有作进一步分析。工党史学家亨利·佩林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由党各选区的团体过于僵化，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阶级的需要。菲利浦·波伊尼尔指出工党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会对自由党丧失了信心，并意识到单纯的工会斗争不能奏效，因而不得不接受一些社会主义的主张，另外寻找出路。不过，为什么自由党不能调整自己的政策，为什么工会在追随自由党多年之后最终与自由党分道扬镳，亨利·佩林和波伊尼尔均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显然，工党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工会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首先从工会入手分析工党的起源问题。

David Cate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1975.P.5.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Philip Pointer, *The Advent of the Labour Party*, 1958, PP.10—11.

一、工会与工联主义

工会的起源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发的群众组织，其主要宗旨是通过集体谈判与雇主商定本行业的劳动工资，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它同时也是劳动者之间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的一种互助福利组织。英国工会起源的准确时间尚难界定，大致为17世纪末期。随着工业的发展，中世纪的行会开始衰落，作为技术工人的帮工，与雇主之间某种程度的利益一致开始消失，冲突由此产生。于是帮工开始组织起来维护技术工人的特殊地位，商定本行业应该得到的合理工资。这种技术工人的最初组织称为礼拜堂，起初是一种类似俱乐部的社交组织，后来才发展为与雇主对抗的工会组织。第一个有文件记载的半永久性的技术工人组织出现于1696年。虽然这种组织在官方看来具有非法性质，但它们在18世纪仍然得到了很大发展。因为老板为了与技术工人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一般不愿去告发工人组织。在对法战争中，由于工会组织与政治激进主义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而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惊恐，于是，议会在1800年通过了《结社法》，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工人的非法组织”。

《结社法》通过后，虽然工会组织仍在暗中发展，但明显受到遏制。直到1824年《结社法》被取消，结社才成为工人的合法权利，工会才开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并逐渐成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核心。

不难看出，工会在其初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主要由技术工人组成并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成员具有浓厚的行会意识，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同时，工会组织最初并不存在于大工业之中，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并无紧密联系。当工会组织在各种大工业内发展起来时，它最初的那些特点并未消失。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工会运动保守主义的传统。可以说，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英国工会从未要求或是向往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工联主义

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工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轻视理论。然而，轻视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任何一种运动如果没有某种理论的支持都很难持久。实际上，在工会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工联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实用原则，也不仅仅是“工人队伍中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始终在工会运动中起着“支配”或指导作用的理论。第一次系统提出这种理论的是托马斯·哈德盖斯金。182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首次将劳工主义（即以后的工联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把劳工主义变为一种真正的政治理论。虽然他的理论作为一种理想在宪章运动失败后被埋葬掉了，但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却始终支配着工会领导人的思想，并由此左右着工会运动的方向。

Henry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1963, P.11.

B.W.Clapp (ed),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1976, P.349.

Geoffrey Foote, *The Labour Party as Political Thought*, 1985, P.8.

哈德盖斯金鼓吹的劳工主义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直接来源于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他把李嘉图对付地主的武器用来对付资本家，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劳工在生产中未获得自己应有的一份，因为资本家夺走了所有的剩余价值。因此，为获得应得的工资，劳工组成工会是完全必要的。工人没有分得国民财富中应得的一份，因此工人有权夺回自己的果实。据此，哈德盖斯金要求按创造财富的多寡来重新分配国民财富。

他在激烈反对资本家的同时并不反对资本，因为资本能为国民带来财富。这也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作为剥削工人劳动的资本家是可恨的，但作为管理经营者的资本家却有权同工人一样获取劳动的报酬。哈德盖斯金还强调工会斗争应独立于其他阶级并完全依靠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这一点是建筑在对资产阶级及一切有产者的敌意与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它在议会斗争时成为工会的一大特色。哈德盖斯金最后强调财富再分配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由政府执行这一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还应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免遭他国便宜劳动力的冲击。

哈德盖斯金的观点构成了以后工联主义的理论核心，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柱石。

工会一般说来主要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但也并不排除政治斗争或其他斗争形式，只要这些斗争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实际斗争中，工会往往在一种形式不能奏效后就转向另一种形式，就像钟摆一样，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两极之间摆动。

Geoffrey Foote, op.cit.P.8.

Ibid.P.9.

Ibid.PP, 10—11.

二、宪章运动以后英国工运的发展

工人运动的低落

宪章运动是英国工运史上的一个高潮，它采取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宪章运动之后的 30 多年，英国工运的主要特点是由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摆向”经济斗争。这并非表明工人已对政治失去兴趣，他们仍然参加政治集会，甚至参加自由党或保守党。不过，宪章运动中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在工人队伍中已经淡漠，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与传统习惯开始占了上风。正是在这段时间，工会斗争成了工运中的主流，工联主义思想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造成英国工运钟摆向“右摆”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状况。19 世纪中叶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 1850 年到 1875 年的 25 年间，铁路增加了 1 倍半，年钢产量增至 70 万吨，煤炭与生铁的产量也翻了一番。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几乎独执世界市场的牛耳，生产的每种商品超过了自身消费的需要，其他工业国不能望其项背。经济的发展使工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据英国统计学家鲍利统计，兰开郡棉织工每周工资 1850 年为 20 先令 5 便士，到 1874 年，已升至每周 33 先令。其他行业的工人工资也大致如此。不难看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交替与工人的实际收入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经济斗争不能奏效时，工会才会采取更激进的斗争方式。

工会组织的健全

然而，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英国工运已完全停滞不前。在歌舞升平的帷幕之下，社会正以一种不为人们所觉察的方式向前发展。

第一个进展来自工会组织本身。首先是 50 年代初出现的“新模范工会”，它主要由各行业的熟练工人组成。它组织严密，结构稳定，基金充足，有一批专职干部。虽然“新模范工会”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它为持久的工会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8 年，由于乔治·波特的努力，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盟——全国职工大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表明英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内成了一股有组织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有利于工人的政府立法

第二个进展主要来自英国政府在此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措施对工会运动的发展和工党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是 1867 年通过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改革法案。该法案执行后，选民人数由原来的 137 万增为 250 万。当时熟练工人的大部分都获得了选举权。1874 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两个劳工议员进入议会。1884 年至 1885 年，第

T.Rothstein, From Chartism to Labourism, 1929, P.202.

G.D.H.Cole, The Common People, P.328.

A.L.Bowley, Wages in United Kingdom, 1900, P.118.

三次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又使选民从 270 万增为 400 多万，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随着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要求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韦伯曾明确地指出，“获得选举权的工人不会对诸如任命谁担任巴黎大使这种事感兴趣，而会越来越多地寻求把他的政治民主转变为工业民主，以便作为一个投票人对他自己生活的环境有某种形式的控制。”

其次是 1871 年宣布工会为合法，“任何工会的活动只要是在它的职业范围之内，都不应被视为非法而受到阴谋犯罪的起诉或加以诸如此类的罪名。”

1875 年又对工会设置罢工纠察等要求作了让步。工会在法律上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它对工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另外，英国政府关于普及教育的一系列立法对工运也有着重要影响。1876 年，通过了强制 12 岁以下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法令。英国政府普及教育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缩小与美、德等国在教育上的差距，增加技术劳动力，但同时也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了解各种社会思想，增强阶级意识，并使自己的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

T.R.Hay , The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lfareState 1880—1975 , 1978 , P.14.

E.P.Cheyney (ed) , ReadingsinEnglishHistory , 1975 , P.742.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进步与贫困》

英国工运的“右摆”与英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然而，从1873年开始的长达20多年的经济的不景气即“大萧条”，打破了这种相对平稳和谐的局面。对于这段时期英国经济是否真正“萧条”，史学界尚有争论。但这段时期英国经济状况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则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是对社会是否存在贫穷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由于英国经济的顺利发展，自由主义思潮在维多利亚时代占了主导地位。它鼓吹“人人自助”，认为贫穷是由个人懒惰等原因造成的，因此，社会应“教育”穷人积极谋生。

“大萧条”所造成的大批工人失业，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并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命运。于是，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对失业者和穷人的状况进行了调查，他们“对无助穷人悲惨命运的最新介绍极大地地震动了国民。”

1881年，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一书出版，在英国掀起了调查贫困问题的高潮。在随后发表的一大批文章和报告中，以查理·布什对伦敦穷人的调查报告影响最大。他的统计结果表明，在伦敦，有30.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调查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于是，一部分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然不能将贫困的罪责归咎于个人，就只有从社会结构的机制和制度本身去寻找。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最后，矿工领袖凯尔·哈第把这一切汇入工联主义的主流中，形成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联盟

在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海德曼组织了英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海德曼出身于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879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880年，他阅读了法文版的《资本论》，并和马克思讨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第二年，他写出了一本名为《大家的英国》的小册子，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1881年，他在伦敦激进派俱乐部组织人们讨论这些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主联盟”。1884年，联盟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其纲领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内容。

社会民主联盟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吸引了许多年青的工人，他们都试图从中找到他们贫困和失业的原因。汤姆·曼恩、乔治·兰斯伯雷、拉姆赛·麦克唐纳以及赫伯特·莫里森等人都是从社会民主联盟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

但这个组织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理论上，海德曼最大的错误在于认

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1978, P.238.

Ibid.P.115.

E.J.Hobsbawm, *Labour's Turning Point 1880—1900*, 1948, PP.46—47.

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自动地造成资本主义崩溃。他对英国工会运动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罢工斗争，都不过是被激怒的工人对不可忍耐的压迫所采取的无知和绝望的反抗形式而已。这些斗争本身毫无意义，最成功的罢工也仅是加固了经济奴役的锁链，虽则这种锁链是镀金的。因此，他反对罢工，反对工会运动。认为工人阶级“尚未受到足够的教育，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他们及其子孙的极端重要性”。他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将不是由工人阶级，而是由保守党去完成，因为保守党提出的改革计划不会受到自由党的阻挠，容易实现。这样的立场观点，显然不可能使社会民主联盟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此外，海德曼家长式的独裁作风也激起了联盟内许多成员的不满。他们谴责他拒绝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脱离工人组织。1884年12月，联盟总委员会的19位成员中，有10位脱离了联盟，并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

但是，这个组织人数较少，并且继续保留着社会民主联盟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严重缺点，加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逐渐篡夺了它的领导权，它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到1890年自动解散，其中大部分人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联盟，其余部分1895年被克鲁泡特金的“自由协会”合并。

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英国工运中扎下根，这除了社会主义联盟这个组织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外，马克思主义很多基本观点与工联主义互相冲突也有很大关系。

马克思也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应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而不是仅仅要求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环境；工会只是反抗资本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并非最终目的。他同样反对蒲鲁东与哈德盖斯金等人的国民财富再分配理论，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只有摧毁资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穷的根源。除了这些引起工会反感的主张之外，最糟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很多工人看来却无异于暴政，尤其是在他们逐渐获得了选举权之后。由于受英国工运传统的影响，英国工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现存政府掌握在雇主阶级手中，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在选举中将它夺过来，然而却不愿接受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观点。只是在工人阶级应当自己解放自己这一点上，工会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使他们多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自己”的理论。

费边社

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在1884年组成了一个类似学术俱乐部的团体，起名叫费边社，著名的剧作家肖伯纳和韦伯夫妇都是其成员。

费边社主张社会改革，但认为具体改革的任务不应由他们承担，他们不应成为一个政党，而只应成为一个为改革提供理论和纲领的智囊团。他们吸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所有权不能创造占有财富的权利的观点，但否认马克思关于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学说。不久，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张边际效用论，并在认为劳资冲突可以调和的前提下，发展出

了一种激进理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的学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费边派却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发展。韦伯写道：“民主主义理想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本身。”“我们的目的不是用无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也不是把工人从残酷的工资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仅仅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工业。”“我们不希望看到把矿山和矿山的利润让给矿工，而希望看到让给整个社会。”社会主义不是阶级的学说，而是普遍利益的哲学，“社会主义是使所有的人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计划。”在政治学方面，与马克思相反，费边派认为，英国的现存政府形式适合发展社会主义，因而不必打碎或推翻。真正的冲突不是在劳资之间，而是在社会与投机发财者之间。因此，应对财富实行重新分配，使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可能分享到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提议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办法消灭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权，使之归国有和市有，并将工业企业移交社会管理，谋求公众福利。这种财产的所有权每由私有向社会所有转移一点，也就向社会主义靠近了一步。当所有的企事业都由市政当局接管时，社会主义也就实现了。

费边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英国特色，因而较易在英国得到流传。但出于对工人阶级的轻视，早期的费边社并未试图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与工会运动联系起来，相反，他们对把自己的理论“渗透”进自由党或保守党倒是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费边社的渐进变革方式，它的发展集体经济、按照宪法行事的主张以及独特的经济理论，给即将出现的工党提供了一个能够容纳工联主义的理论框架。

但是，费边主义毕竟太抽象太学究气了，对有着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人缺乏足够的感召力。要使它与美国工人运动真正结合起来，还需要一种中介力量。

四、“大萧条”与新工会运动

大萧条

1870 年代英国的“大萧条”使工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1879 年高达 11.4%，1882 年下降至 3%，但 1884 年又上升至 8%，1885 年为 9%，1886 年为 10%。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遭到削减，以铸造工人为例，1885 年周平均工资尚为 1 镑 4 先令，而 1886 年周平均工资比前一年减少了 1 先令 9 便士。削减工资使工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大量的失业与削减工资，使一些工会基金发生困难并由此而垮台，工会大为削弱。1879 年加入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会数目减少到 92 个，是自 1872 年以来最少的一年。工会代表大会的成员也从 1874 年的 100 多万人，减为 1880 年的 50 万人。

但是，这种冲击并未在组织严密的旧工会中立即产生相应的反响。从 1882 年起，工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甚至雇主对工资的削减，也未引起他们相应的反抗。有些工会干部大声疾呼：“我们真诚地告诫每个工会成员尽可能保持冷静，以便使我们目前的基金状况有所缓和。”一位名叫詹姆斯·杰克的工会干部还认为，接受低工资将有助于培养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良好感情”。这样，在 80 年代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兴起于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工人阶级，而是产生于一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对此评论道：“最近在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许多青年人，他们对这些问题比工人更清楚，比工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这是英国工人的耻辱。要知道，甚至在民主联盟里边，工人也多半只是勉强地和表面地承认新的纲领。”

旧工会的这种态度，除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威胁使他们变得畏首畏尾外，物价下降，在业工人与工会成员能够生存下去，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他们一般不愿采取过分危及目前生活水准的行动。

然而，旧工会的这种态度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是个复杂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一的社会阶层，它由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财产不等的人们所组成。旧工会中的熟练工人属于工人阶级上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能挤进中产阶级下层。工人阶级的下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悲惨的一个阶层，他们因社会灾难寻找不到工作而长期失业，只能依靠各种救济为生。他们通常负债累累，总是处于饥寒之中。一旦经济萧条，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失业与压低工资的威胁。以伦敦码头工人为例，即便在货运的高峰时期，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只能满足 40% 的工人。因此，竞争非常激烈，一位码头工人这样描绘道：“人们像野兽一样疯狂，我们常常站在旁人的肩膀上。”

新工会运动

B.C.Roberts,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 1868—1921*, 1958, P.93.

B.C.Roberts, *op.cit.*P.93.

H.J.Fyrth, *The Foundry Workers: A Trade Union History*, 1959, P.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9 页。

E.J.Hobsbawm, *Labour's Turning Point, 1880—1900*, P.82.

普通工人的这种处境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采取了与熟练工人完全不同的态度，那就是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为保障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斗争。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新工会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新工会运动起源于 1888 年伦敦布莱思特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费边社成员安妮·贝桑特夫人对火柴厂女工悲惨状况的报道成为这次罢工的导火线。火柴厂女工每周工作 70 小时，每小时仅得 1 便士，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她们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因此，她们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起初，老板们根本不把这种非熟练工人的罢工放在眼里。在随处都可招募到失业工人的情况下，罢工的失败似乎已在预料之中。但贝桑特夫人与赫伯特·伯罗斯将罢工女工组织起来，并为她们募捐，社会舆论也转向了女工一方，经过几个星期的斗争，女工们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伦敦的其他普通工人注意到了这个胜利的信号，于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呼声立即传遍了全国。1889 年 5 月，汤姆·曼恩、约翰·伯恩斯、威尔·索恩组织了伦敦煤气工人工会，其成员迅速增加。几周之后，他们认为向伦敦煤气公司提出自己要求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及时地采取了行动。在罢工的压力下，公司很快就同意将工作日从 12 小时减至 8 小时。旋风般的胜利刺激了工人运动。8 月 13 日，西南印度码头的几个工人首先发出了罢工的信号。汤姆·曼恩、伯恩斯、蒂尔特等立刻不失时机地将码头工人组织起来。19 日，码头工人工会成立。伯恩斯将罢工推向了高潮，他领导码头工人在全伦敦举行了游行。罢工工人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限额——每小时 16 便士。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第一次插手干预，码头工人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码头工人的胜利证明，非熟练工人只要团结战斗也能取得与熟练工人工会相同的成果。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他行业的非熟练工人，他们纷纷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于是，新工会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在短短的几年内，新工会的成员就达到了 14 万人。由于新工会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低下，他们与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旧工会相比，具有较强的战斗精神。他们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色彩：规定最低工资和 8 小时工作制，必须有立法保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议会中有为自己说话的代表。由此而萌发了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思想。

但是，新工会的生存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它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不巩固。旧工会本能地对新工会持敌视态度，维护技术工人特权地位的心理使他们始终不希望非技术工人挤进自己的队伍。当 1889 年码头工人罢工正处于高潮时，全国职工大会主席乔治·希普顿却认为这次罢工不过是一次“非常可悲的劳工争端”。而当世界各地捐赠了成千上万镑钱来帮助码头工人时，全国职工大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表示就是拿出从代表们中收集到的 10 镑捐款。而当年的职工大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甚至根本未提非技术工人的组织。

除了旧工会的敌视外，雇主的反扑与经济的再度衰退也是新工会运动衰

Derek Fraser, op.cit.P.122.

H.A.Clegg, A.Fox and A.F.Thompson,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VI,1889—1910, 1977, P.183.

B.C.Roberts, op.cit.P.123.

落的致命因素。雇主们甚至在新工会刚刚出现的时候就企图扼杀它。1891年，当经济再度不景气时，雇主们立即抓紧时机进攻并迫使新工会转入了艰难的防御状态。事实证明，发展过速、几乎是一哄而起的新工会，无论在组织、基金和经验方面都显得不足以有效地抵抗这股反扑的逆流。在危机到来，失业率重新上升之时，新工会没有能力给它们的成员支付足够的互助金，以帮助它们度过难关。于是新工会的成员迅速减少，很多新工会因此垮台。到1900年时，剩下来的新工会成员还不到工会成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新工会运动的衰落使它所取得的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然无存，在新工会运动中所带有的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不久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与旧工会一样，它也开始将其目标的实现放在和解而不是仇恨的基础上。因此，1892年以后残存下来的新工会组织，在各方面已与旧工会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它比旧工会要激进一些，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

新工会运动的影响

尽管如此，新工会运动仍然受到了工党史学家和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们的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英国劳工史上仅次于1926年大罢工的重大转折事件。因为，新工会运动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

首先，它极大地震动了旧工会的领导，虽然他们对新工会的衰落幸灾乐祸，但不得不开始考虑新工会寻求政府干预工业纷争的问题。同时，新工会运动迫使原来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旧工会对所有的工人敞开大门。这样，工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成了包容工人阶级各阶层的组织。工会从此具有了真正的群众性质。战斗性较强的普通工人的参加也给旧工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因而对全国职工大会所做出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他们最先响应了哈第等人建立工党的呼吁，并对工会最终支持建立工党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新工会运动使得长期脱离工人运动的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虽然普通工人并不能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但他们却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剥削，资本家之所以富是因为剥削了他们。很多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工人们的承认并享有特殊的威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后来成了各级工会的领导。自此以后，社会主义从少数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走了出来，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巨大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工会运动中要求组成独立劳工政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工会的主要目标是8小时工作日，它需要立法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为此，必须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预示着工会运动的钟摆将再次向左摆动。不难看出，新工会运动在工党的起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普通工人与熟练工人等各种因素与力

H.A.Clegg, A.Fox and A.F.Tompson, op.cit.P.97.

S.and B.Webb, Our Partnership, 1948, P, 1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1页。

量组合起来，为工党的诞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五、哈第与独立工党

劳工领袖哈第

不过，在当时英国政坛上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形势下，获得选举权的工人纵然对两党的政策不满，也只好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两党的候选人之一，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需要。在新工会运动中，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积极分子一直为改变这种局面而努力，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矿工领袖凯尔·哈第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 1893 年完成了这一任务。

哈第于 1856 年生于兰开郡，母亲是农妇。他早年生活极为贫苦，8 岁起就不得不做工糊口。艰难的生活，使他很早就萌发了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他尚未成年就参加了工会活动，不久当选为兰开郡的矿工代表，1886 年担任阿歇尔工会的书记。哈第早期曾对自由党抱有幻想，认为工人可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进入议会，通过政府立法的方式逐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 1887 年的竞选中，自由党的地方竞选机构千方百计限制劳工的政治影响，和保守党一起排挤参加竞选的哈第，使哈第遭到惨败。这次失败彻底破除了哈第对自由党的幻想，他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他认为只有穷人才同情穷人，富人们并不知道穷人谋生的艰难。因此，他号召工人在自己的队伍中挑选候选人，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将他们送进议会，以便在议会里为工人的利益讲话。1887 年 4 月，哈第发表文章指出：“当工人们正在争论究竟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更应统治他们时，这两个强盗却正在分享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党，一个独立的工党，工会有力量创造它。”

1889 年新工会运动的兴起，为建立独立的劳工政党创造了良好的时机。艾威林夫妇曾提出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独立阶级纲领的工党，并希望得到第二国际的支持，可惜这个计划由于社会民主联盟内部的分歧而流产。费边社的许多基层组织也认为在“渗透”或革命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劳工在现有两党之外建立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基层支部也持类似的看法。这为哈第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几年奋斗，他排除了种种干扰，终于在 1893 年建立了独立工党。

独立工党

独立工党由独立的工人组织、费边社的地方支部、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组成。它是工党日后建立的最重要的组织基础，其主要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组织与工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便在议会中组成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它提出了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用征税消灭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等要求。

哈第没有详尽的政治纲领，却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一切政治行动都必须与捍卫劳工利益联系起来。哈第受到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影响，反对自由主

义，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针对一种制度，而不是针对哪一个阶级而言的。

哈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联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与反对工会的社会民主联盟不同，哈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工会身上。工会既有组织，又有基金，并且工会愿意为工人自身的利益奋斗。因此，争取工会支持始终是哈第努力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看，哈第的社会主义信念也特别适合于工联主义。激进的基督教义与平等民主思想使哈第更多地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复活了的基督原始教义，是用来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健康的竞争的。哈第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无新的贡献，甚至还有曲解之处，然而它却具有费边主义等所没有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使哈第能够把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汇集到为工人谋利益的旗帜之下。这是哈第与独立工党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Geoffrey Foote , op , cit.P.43.

Ibid.P.44.

六、雇主的反攻与工党的诞生

雇主的敌视行动

独立工党成立后，除了在个别地区得到工会的支持外，它几乎是孤军作战。费边社当时正在专心地向自由党“渗透”，对独立工党并不十分感兴趣，而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一贯敌视工会运动，自然不会与独立工党紧密配合。更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政党竟然长期得不到大多数工会的支持。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很多工会成员已经加入了自由党或保守党，要转过这样的弯尚须一定时间，而工会干部则担心集体参加一个新党会引起工会内部的分裂。确实，作为一个经济斗争组织，工会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但要把这个组织变为政治组织，则必然会引起内部的分歧。另外，一些强大的工会如矿工工会等，有能力独立选派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对独立工党的行动也持观望态度。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政治斗争中，双方的结盟都是一种利益的结盟，在工会还没有看出这样的结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明显的利益前，它们是不会愿意贸然地把自己有限和宝贵的基金投入这种“冒险”的行动的。

然而，雇主的反扑迫使工会改变了对独立工党的态度。还在新工会运动兴起的初期，雇主们就在集聚力量寻求反击的机会。他们要求工人在自由劳工的名义下进行登记，并要工会承认雇主们组织的反工会团体——自由劳动协会。该组织由工会叛徒柯里森担任头子，专门破坏罢工，使罢工工会在法庭上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同时，资产阶级的各级法庭，毫无例外地偏袒雇主，作出对工会不利的判决。

在对工会的反扑中，除了官方机构公开袒护雇主外，雇主自己也采取了联合行动。1896年，机器工业协会雇主联合会成立，其目的在于“保卫雇主的权益不受工人组织的侵犯。”他们不仅要拒绝八小时工作制，并且要造成一种彻底摧毁工会力量的形势。1897年，该协会与工会谈判破裂，雇主们举行了同盟歇业，结果使得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斗争失败。同年，南威尔士的矿工也不得不按雇主的条件复工。雇主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资产阶级报刊公开宣称，英国工业竞争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只有彻底消灭工会的力量，英国工业才可望恢复其霸主地位。为了“统一行动”，各行业的雇主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集团”或“联合会”。1898年，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雇主联合组织——雇主义理事会成立。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资产阶级已整个地组织起来向工人发动进攻了。

劳工的反应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工会领导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工会的生存已受到了威胁。这意味着工会自宪章运动以来在立法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有丧失殆尽的危险。许多工会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寻求利用

Henry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1976, P.108.

Henry Pelling, *Labour and Politics*, 1958, P.13.

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己的经济权益，他们寻求通过立法手段来保卫自己已经获得的成果。1898年，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宣布：“要提供基金及一切费用，使自己的代表进入下院以及其他官方议会，并要求他们施加压力，使所有对该工会有利的立法提案得以顺利通过。”铁路职工联合会在1899年更明确地提出：“那怕由实力雄厚的工会往议会仅仅直接送一名自己的代表，甚至这个代表在下院中保持缄默，也比送50名最优雅的自由党人或是50名最善良的保守党人进去要好得多，因为他是劳工反抗现状最明显不过的证据和标志。”

这样，劳工独立选派自己的议员的问题就在1899年的全国职工大会上提了出来。侍者工会代表沃格尔与供应工会代表奥格雷迪率先提出通过强制征费的方式建立议会基金，以便为自己选出的议员付薪。混合铁路职工协会代表霍姆斯则提出了更激进的决议：“大会考虑到过去几年来的决议，为了在下院更好地获得维护劳工利益的代表权，特指示议会委员会邀请所有合作社、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召集一个由上述机构中愿意参加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大会，以研究措施，争取在下届议会中增加劳工议员的人数。”

这个决议得到了码头工人、铁路职工以及商店雇员等工会代表的支持，但遭到了矿工与棉纺织工会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决议不切实际。经过一下午的辩论，该决议终于以54.6万对43.4万票得以通过。

这样，工会终于与独立工党在选送劳工代表进入议会，以便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会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原来的态度，但也并不反对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劳工党。

工党的诞生

1900年2月27日，经过几方面紧张的筹备，“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更名为工党）成立大会在伦敦法林顿纪念大厅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41个工会、7个各业理事会以及各社会主义团体，另外还有一些合作组织。通常把1900年作为工党建立的年代。

工党的诞生使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组织上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全国性工人政党，这是英国劳工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英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William D.Muller, *The Kept Men* ? 1977, P.3.

Henry Pelling, *Labour and Politics*, P.23.

B.C.Roberts,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 PP.165—166.

D.C.Douglas (ed), *op.cit.*Vol.7, No.2, PP.673—674.

Henry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 PP.207—208.

第四节 外交和殖民政策

一、海上霸权

海军的重要性

自 1588 年英国在英吉利海峡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来，逐渐巩固和扩大了海上优势，建立了海上霸权，为殖民帝国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证。罗伯特·吉芬爵士在《我国军队的实力标准》一文中写道：“没有制海权的大英帝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英国人还认为对于本土防御来说，强大的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英国没有征兵制，无法迅速征集一支强大的陆军去抵御入侵之敌。同时，英国十分发达的对外贸易也仰仗海军的保护。尤其是到 19 世纪末，英国食品进口数量巨大。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1904 年—1910 年和 1914 年—1915 年任海军首席大臣）宣称：如果海军丧失了霸权，无论多大规模的陆军都将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我们的海军被击败，我们不得不感到害怕的不是入侵，而是饥饿！”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和俄国的海军发展迅速，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约 1860 年，法国首先研制出了装甲舰。当时英国人担心海上优势会被法国取而代之，而且为防备拿破仑三世从海上入侵英国南部，便加快建造军舰的速度，到 60 年代实现了舰只的装甲化。以后 20 年中，英国牢牢地保持着海上霸权。

巩固海上霸权的努力

1885 年，英国又一次与俄国处于交战边缘，但英国海军却还未做好作战准备。军舰型号杂乱，用途各异，在作战时无法相互掩护支援，效率低下，水兵也在和平时代中消磨了斗志。同时，报章披露了法国正在实施一项重大造舰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增加海军预算，1880 年为 1020 万镑，1890 年增为 1380 万镑，1900 年又增为 2920 万镑。

1889 年，索尔兹伯里政府为对付法俄日益接近，英国地中海舰队将可能前后受敌的局面，提出了英国海军的“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数量要与仅次于英国的其他两强（当时指法俄）相当。同年的《海军防御法案》拨款 2150 万镑建造 10 艘战列舰，还实行了各种吨位军舰设计建造的标准化。英国的这项措施反过来促使法俄加速发展其海上力量，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1890 年—1892 年美国海军上将马汉撰写的《海权论》出版。

马汉认为海上权力不仅是一个国家建立霸权的基础，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的著作对英国影响很大。海军同盟于 1895 年创立，其宗旨是宣传英国保持海上霸权的重要性。在 1897 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60 周年的活动中，英国海军的 165 艘军舰（内含 21 艘重战列舰和 54 艘巡洋舰）接受了女王的检阅，各国军政宾客对此印象深刻。《泰晤士报》说，这一前所未有的

马汉的《海权论》包括以下两部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 年出版）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 年出版）。

的壮观场面为“ 世界各强国派来的舰只所目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英国的海上霸权似乎仍然坚不可摧。

二、“光荣孤立”政策

“光荣孤立”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各大国纷纷结盟争霸的时代。德奥于1879年结盟，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形成三国同盟。法俄日渐接近，最终于1894年签定协约。英国此时却独辟蹊径，采取了置身于这场结盟浪潮之外的立场。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于1880年重任首相后，着手实施他一年前提出的“正确政策”的六项原则：1.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政府；2.在国外维护和平；3.“使欧洲各强国保持协调”；4.不与他国结盟；5.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6.“同情自由”。这六项原则的基本点有两个：一是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协调斡旋，以建立所谓的“协调的欧洲”。二是避免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盟，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实现“光荣孤立”。因此，英国的协调与孤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协调政策很不成功，它遭到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的猜疑和反对。唯一可使格拉斯顿感到安慰的是欧洲列强在1880年—1881年对于重新划定门特内哥罗与希腊之间的边界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后，这项政策便在奥斯曼帝国、南非和埃及等地连连碰壁。正因为如此德国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格拉斯顿放在眼里。1884年他对德国驻俄公使说格拉斯顿“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所有素质”，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在1884年至1885年解决埃及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德国联合法国将欧洲各国置于其控制之下，英国备受冷落。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就此挖苦道：自由党人“最终建立起他们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协调的欧洲’，他们成功地使欧洲大陆各国协调一致反对英国。”

政策的演化

1885年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开始逐渐放弃协调政策。在与其他欧洲国家打交道时只就具体问题与其中某个国家合作，同时避免承担长期义务。

从当时欧洲实力对比来看，德奥意三国同盟显然超过法俄两国。在80年代后半期，英国与德奥意较为接近，但又不正式加入该同盟。另一方面，英国与法俄关系却较为冷淡，因为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英国的主要敌手，此时为争夺非洲和其他地区而关系紧张。俄国则在中亚和巴尔干地区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利益。

在德国的推动下，意大利于1887年2月17日与英国以交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一项秘密协定，两国约定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在毗邻地中海地区建立霸权。6个星期后，奥匈帝国加入这项协定。对于这一发展，英德两国都表示满意，英国得以利用意奥及德国的力量牵制法俄，而德国则欢迎英国协助它

See W.E.Gladstone, *Midlothian Speeches*, 1879.

W.E.Medlicott, *Bismarck, Gladstone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1969, Appendix .

Lady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1931, Vol. , P.136.

维持欧洲大陆现状。

但是，英国仍恪守不结盟的孤立政策。1889年1月，索尔兹伯里拒绝了俾斯麦邀请英国加入同盟国的要求。除结盟问题之外，英德关系良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密切。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去世时，英国下院领导人W.H.史密斯将德国称为“我们的盟邦和朋友”。1890年，英德两国顺利地达成了解决东非殖民地问题的《赫里果兰条约》。

进入19世纪90年代，欧洲局势发生变化。法俄两国分别于1891年和1892年缔结咨商协定和军事协定。军事协定于1893年生效，标志着法俄正式结盟。德皇威廉二世登基后，于1890年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变本加厉地扩充军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英国对此感到不安，与德国关系疏远了。到90年代中期，英国又一次处于孤立境地。加拿大的政治家们于1896年初首先使用了“光荣孤立”这个术语来形容英国的这一处境，很快便在英国流行开来。海军大臣戈申宣称这种孤立是有选择的和光荣的，因为它赋予“我们选择行动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相互牵制。同年，索尔兹伯里也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致词时将“光荣孤立”作为外交政策加以阐述。他指出英国应该不参加任何同盟和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光荣孤立”这个词虽然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其实它作为一种外交政策，从19世纪中叶起就为历届英国政府所奉行。

英德关系与外交政策

90年代后期，英德关系进一步紧张，英国对德国的野心也更加担心和警惕。1897年9月，《每日邮报》派该报名记者斯蒂文斯采写了16篇文章描述“铁蹄下”的生活。他写道：“有关殖民和帝国问题上的争夺无疑是引起德国对英国持有敌意的主要原因。……德国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个人都对我们表示厌恶……忽视这一点毫无益处。”而且，英国舆论开始将德国视为敌国。1898年12月的《当代评论》登载了一篇标题为“英国头号敌人”的文章。作者指出：“德国皇帝的计划是复活大陆上针对英国的同盟。”此外，德国在经济上的竞争也被英国视为一种威胁和敌意。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政策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淡薄。注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仅是一种需要而是也是一种传统。英国历史上外交政策的变化往往体现在风格和重点上而不是基本内容上。从80年代起，政治家们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格拉斯顿于1880年重新担任首相时便寻求采取两党均赞同的外交政策立场。而索尔兹伯里在1886年和1892年组阁时都任命自由党人罗斯伯里勋爵为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在1895年说：“我们应当对外保持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外国政治家们就会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某一届政府，“而是一个伟大、强大和团结的民族。”

三、殖民帝国

帝国主义时代

一位名叫 A.V.迪西的历史学家于 20 世纪刚开始时写了一本名为《英国的法律与观点》的书。他在书中对大英帝国称颂备至，并且宣称：“小国时代显然已经过去……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庞大的帝国与巨型商业公司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大国都建立起了自成一统的殖民帝国。法、德、俄、比、意等殖民帝国已遍布于世界各地，但最庞大的殖民帝国仍是大英帝国。到 1901 年，英帝国面积约 1200 万平方英里，超过地球陆地面积的 1/5，其中在美洲有 400 多万平方英里，在大洋洲有 300 万平方英里，在非洲也达 300 万平方英里。英帝国人口为 4 亿左右，其中近 3/4 生活在印度，加拿大为 540 万人，澳洲 380 万人，新西兰 80 万人，而英国本土为 4150 万人，只占整个帝国人口的 1/10 多一些。

因此，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这个词在 19 世纪 60 年代意思指实行独裁统治的恺撒主义。但到 19 世纪末，英国有一些人将帝国主义视为爱国主义的表现和产物，认为其内涵不仅包括引导移民型殖民地建立自治政体，而且还具有将落后的非移民型殖民地带入文明世界的使命。因此，英国此时的殖民扩张也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直到最近，英国的历史学界中仍有人持这种观点。显然，它是为英帝国殖民侵略作辩护的一种荒谬论调。

殖民地类型

从总体上看，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移民型殖民地，它指宗主国进行大规模移民，以致于移民构成当地居民主体的殖民地。移民将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带到殖民地，并按照宗主国的模式来进行开发和建设，因而这类殖民地在各方面都好像是宗主国的摹本。英帝国内这样的殖民地有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独立前的美国也属这一类型。二是非移民型殖民地，它是指宗主国未进行大规模移民，只派遣少量官员和专业人员及军警等充当统治工具，土著居民仍是当地居民主体的殖民地。移民只占这类殖民地人口的很小比例，殖民地仍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宗主国将这类殖民地视为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对象，其根本动机完全不是要将它们带入所谓的文明世界。所以宗主国不像对待移民型殖民地那样，并不将它们视为本身的延伸及其文化的扩散。这类殖民地大多分布在非洲和亚洲。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型殖民地。在这类殖民地中，宗主国的移民具有相当的规模，并按宗主国的模式进行开发建设，但是移民人数远少于当地土著居民的人数，而且土著居民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依然存在，形成移民中的宗主国文化和土著居民中的土著文化并存的局面。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就属这种类型。

英国政府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实行不同的政策，对移民型殖民地，英国

允许它们建立自治统治，默许它们要求独立的倾向。

加拿大

这项政策的起源是 1838 年德拉姆勋爵在前往加拿大巡视和调查之后提出的那份著名的“德拉姆勋爵报告”。报告指出了该殖民地统治上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建立具有自治权的责任制政府的解决方法。1840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由殖民大臣罗素根据德拉姆勋爵报告拟就的《加拿大法案》，批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合建一个政府，沿大西洋的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等地暂不包括在内。上下加拿大各派 42 名议员组成议会，但英国派出的总督决定政府部长人选和是否实行责任制政府。在额尔金勋爵（德拉姆勋爵之婿）任加拿大总督期间（1847—1854）加拿大责任制政府形成。

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要求分设各自的地方政府的呼声又起。同时，大西洋沿海各省与上下加拿大的关系更加密切，希望与上下加拿大形成一个统一体。显然，联邦制政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理想选择。1864 年 10 月，加拿大各殖民地代表在魁北克举行会议，随后拟就了一部联邦宪法。1867 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批准了这部宪法。从此，加拿大成为英帝国中第一个自治领，其正式名称是加拿大自治领。中央政府设在首都渥太华，总督作为英国君主的代表仍是其元首。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由总督指定，任期终身；众议员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出。各省建立拥有较大自治权的政府。

加拿大的联邦制与美国的联邦制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第一，总督有权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为总理，并拥有立法司法方面的权力，不像美国分权制那么权力界线分明，但其实权却又小于美国总统。第二，参议院的组成以各省人口为基础，而美国则不论各州人口多少一律选出两名参议员。第三，加拿大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的权限，因而所有未予明确规定的权限均属联邦政府所有。而美国正相反，美国宪法只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权限，其余权力均属各州及其他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比美国联邦政府更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政府主张在加拿大实行英式政治制度，同时从美国南北战争中看到州和地方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因而对地方权力加以限制。当时的加拿大安大略以西地区实际上还无人居住，属英国哈得孙湾公司所有。1867 年美国以惊人的低价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使加拿大吃惊不小。在经过努力获得英国女王同意后，加拿大于 1869 年以 30 万英镑的代价从哈得孙湾公司手中购得了安大略以西土地所有权。第二年，安大略省西邻地区设立马尼托巴省，并加入加拿大联邦。1871 年，因发现金矿而人口猛增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1885 年，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通车，中西部的萨斯喀切温和阿尔伯达省也并入加拿大。至此，加拿大的版图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澳大利亚

19 世纪中叶的淘金潮也在赤道以南的澳洲殖民地掀起。该地因而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猛增，但澳洲的 6 个殖民地，即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

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并不急于仿照加拿大的模式建立联邦，而是各自为政，建立起各殖民地的责任制政府。究其原因，地理因素十分重要。位于大洋之中的澳洲大陆远离欧美列强，没有加拿大所面临的那种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威胁。而且澳洲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各殖民地之间联系困难，经济上又能自立，所以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状况来看，建立联邦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但到 19 世纪后期，形势的变化使各殖民地将联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 50 年代开始，大批华工进入澳洲淘金，当地不少白人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华工抢了他们的饭碗。因而在 1855 年，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先颁布限制华工入境的歧视性移民法规，开“白澳政策”之先河，此后各殖民地纷纷效尤。但各殖民地移民法不统一，实行过程中多有不便之处。另外，随着各殖民帝国的建立，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澳洲四周地区已失去往日的宁静，尤其是德国于 1884 年兼并了澳洲以北一水之隔的新几内亚部分地区，使澳洲各殖民地感到了现实的外来威胁。

关于将澳洲各殖民合并为澳大利亚联邦的设想早在 1868 年就由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理亨利·帕克斯提出。到 90 年代，各殖民地（西澳大利亚除外）才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共识。根据 1899 年公民投票的结果，立宪工作于次年完成。英国政府对澳洲各殖民地建立澳大利亚联邦的要求采取了开明的立场。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亲自说服西澳大利亚加入澳大利亚联邦，并在英国议会中积极活动。他在议会就《澳大利亚联邦法案》进行辩论时说道：“凡是对澳大利亚有益的，也对整个大英帝国有益。因而，我们大家不论所属党派如何，不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对这个主张感到欢欣鼓舞。”该法案顺利地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1901 年元旦，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其地位与加拿大相同，即英帝国中的自治领。

澳大利亚政治制度比加拿大更近似于美国，这倒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首先，澳大利亚宪法与美国宪法一样，对联邦政府权限作了规定。第二，参议院的构成亦如此，每个州不论人口多寡均选出 6 各参议员。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选出。其他方面均仿效英国模式。作为英国君主代表的总督为联邦元首，总理是由众议院中多数党领袖担任，握有实权。澳大利亚的新都设在当时还是一片荒原的堪培拉，直到 1927 年才建成启用。

新西兰

英国在开发新西兰时，原将它与澳洲其他殖民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但新西兰不愿成为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早在 1853 年，新西兰总督乔治·格雷就在惠灵顿组建了一个两院制的中央政府，属下的 6 个省通过其经选举产生的政务会处理各自的事务。1856 年，英国批准新西兰建立责任制政府。1875 年，新西兰地方政府系统重建，其构成与今日之英国地方政府系统相似。从那时起，新西兰实际上已是一个拥有自治权的统一国家。1907 年，英国正式承认新西兰为帝国内的自治领。

Barry Cohen and David Black, *Australia, a Topical History*, 1973, P.174.

A.B.Keith (ed), *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63—1917*, 1948, P.338.

四、争霸非洲

主张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浪潮在 19 世纪下半叶席卷英国政界。曾于 40—60 年代盛行一时的分离主义已烟消云散，英国不再将殖民地视为负担。从 70 年代起，英国两大政党的领袖，即保守党领袖狄斯雷利和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都是扩张主义者。争霸非洲则是英国殖民扩张政策的重要体现。

瓜分非洲

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对北非以南地区（南非除外）了解甚少。50—60 年代，欧洲人对非洲内地进行了多次探险。70 年代，他们改变以往兵戎相见武力争夺的做法，通过外交途径在谈判桌上对非洲进行瓜分。英国是这场殖民者大瓜分的主角之一。1876 年，比利时国王在布鲁塞尔召开由比、英、法、德、意、俄、葡、奥匈、美等国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参加的会议，为瓜分非洲做准备。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探险和开化非洲协会”，并就如何瓜分非洲进行了讨论。1884 年 11 月 15 日，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开幕。会议决定将刚果河流域划给比利时，德国得到喀麦隆、多哥及以南地区和西南非洲的一部分，法国获得刚果西北部地区，英国则领有尼日尔河下游地区。这是欧洲各国达成的第一个瓜分非洲的协定。

第二个瓜分非洲的协定于 1890 年产生，由英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签署的一系列条约构成。其目的是更详细地划定各列强的势力范围，避免武装冲突，而对英国来说是为了确立其纵贯非洲大陆的势力范围。《英葡条约》同意葡萄牙扩大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势力范围，葡方承认马绍那兰（今津巴布韦中北部一带）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为英国所有。《英德条约》中，德国作了重大让步，承认英国拥有肯尼亚和乌干达，桑给巴尔岛为英国保护地；英国则将北海中的赫尔果兰岛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同时为了打消法国的不信任感，英国更确切地承认了法属西非的边界和对马达加斯加的所有权。

殖民扩张手法

在具体做法上，英国在北非地区采取财政控制、军事占领与镇压并举的策略。1876 年，英国购得苏伊士运河 44% 的股票，又趁埃及财政破产直接控制其财政。1882 年派军镇压了以阿拉比为首的反英斗争，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巴林成了实际统治者，埃及也成了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只在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在苏丹，英国遇到了更激烈的反抗。1872 年起英国设立驻苏丹总督实施直接统治。1881 年，穆罕默德·阿赫美德自称为马赫迪（救世主）率众发动反英武装斗争。直到 1898 年，英国才镇压了这场长达 17 年的反殖民运动，次年以“英埃共管”的名义下变苏丹为其殖民地。

在非洲其他地区，英国沿用传统的殖民扩张手法，向私人公司颁发特许状，由这些公司充当先锋。80 年代先后建立了著名的三大公司：王家尼日尔公司（1886 年）、英国东非公司（1888 年）和英国南非公司（1889 年），分别在西非、东非和南非地区从事殖民侵略。王家尼日尔公司的创立人是乔治·戈尔迪，他最初的意图是与法国人对抗。该公司通过与当地各部落酋长

签订协定的方法逐渐控制了尼日利亚的南部和北部，在统治方法上，英国人保留部落酋长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但所征税的一半需交给英国殖民政府。东非公司的领导者是威廉·麦肯齐，主要在肯尼亚和乌干达活动，所使用的扩张手法与尼日尔公司的相似，但该东司在财政上并不成功。1893年乌干达被英国政府接管。两年之后，公司所辖全部地区均移交给英国政府。

南非

南非的历史进程有别于非洲其他地区。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就移居该地。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开普殖民地，但在1814年，英国取得了该殖民地。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于19世纪30年代北迁，以逃避英国人的统治，又先后建立了纳塔尔共和国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以及奥兰治自由邦。1843年英国兼并纳塔尔共和国，1877年又吞并了德兰士瓦共和国。1879年英国军队向不屈服的祖鲁人开战，历时7个月的战斗击败祖鲁人，将祖鲁人的国家——祖鲁兰分为13国加以治理，后于1887年正式吞并该地。其后，布尔人用武装斗争反抗英国的扩张，1884年迫使英国人恢复了德兰士瓦的独立。在这样的形势下，塞西尔·罗得斯于1889年创立了英国南非公司。

罗得斯是一个极为狂妄的扩张主义者。他于1871年来到南非，不久就在钻石开采方面获得成功，垄断了占世界产量90%的钻石矿业。英国在非洲的“开普—开罗”殖民扩张计划便由此人提出，但这只是其扩张野心的一部分。他的梦想是夺取整个非洲后，进而占据整个南美、中东和太平洋诸岛，最后再收复美国。南非公司在90年代初很快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刚果以南的广阔地区。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最终于1899年爆发了英布战争。英国获胜后吞并了布尔人的共和国。1910年，该地区四个省合并为南非联邦，成为英帝国中又一个自治领。显然，英国在南非采取的是一方面与布尔人相争夺、一方面镇压非洲居民的方针。

在争霸非洲的过程中，英国夺取殖民地的面积仅次于法国，但在经济战略价值上却首屈一指。此外，英国的扩张矛头还指向亚洲的阿富汗、缅甸、俾路支、中国、马来亚及太平洋中的斐济、汤加等地。

五、巩固帝国的努力

殖民部和帝国联盟

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制订和协调有关政策，英国政府早在 1854 年就增设了殖民部。从 70 年代起，政府内外提出了许多加强英国与白人自治殖民地（含自治领）联系和团结的建议。一种建议主张这些殖民地派出议员进入英国下院和上院，另一些联邦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帝国议会，其地位高于英国和各殖民地的议会。英国当时并不愿意殖民地拥有影响其决策的权力，更不愿与殖民地平起平坐，便于 1884 年建立了帝国联盟，由英国政府中主管爱尔兰事务的福斯特担任第一任主席。该同盟唯一值得一书的成就是说服索尔兹伯里政府于 1887 年召开首次殖民地会议。

殖民地会议

殖民地会议由各自治殖民地、自治领的总理和英国重要大臣参加，主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事务，尤其是防卫和贸易问题。在 1887 年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加强澳洲殖民地海上防卫问题，以对付德国在新几内亚的扩张。7 年后在渥太华举行的殖民地会议往往受到英国史学界的忽视，但它通过了第一批加强帝国内部联系的决议：决定铺设加拿大西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底电缆，开通英加澳之间的快邮邮路。会议还涉及贸易问题，决定各殖民地之间减低关税，但没有削减从英国输入货物的关税。

1897 年迎来了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钻石庆典，第三次殖民地会议也同时召开。加拿大同意削减英国货物输入关税，为帝国特惠制作了最初的尝试。在会上，英殖民大臣张伯伦主张设立具有征税等实权的帝国政务会，但遭到殖民地代表的拒绝，他们不愿英国过多地控制其行动自由。英国方面只得放弃这个主张，但对自治领制度作了肯定。索尔兹伯里首相在会上称加拿大自治领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尝试”，“旨在相互友好、相互同情和相互爱慕的基础上维护帝国的完整。”因此，这次会议为日后英联邦的建立定下了基调。

英国大力巩固帝国的首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1884 年，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说，帝国提供了“商业繁荣和工业活动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是我们 4000 万人民的生活来源”。19 世纪 80 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帝国各殖民地（含自治领）的出口一直保持在其出口总额的 35% 左右。帝国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进口额方面，帝国占的份额较低，但到 1910 年时也上升到英国进口总额的 1/4。资本输出的 40% 以帝国各殖民地为目标，其中 2/3 是输往加、澳和南非，另外 1/5 输往印度和锡兰。此外，帝国各殖民地还吸收了大量英国移民，减轻了英国国内的人口负担。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英国每年平均有 5.9 万人移居帝国各殖民地。

G.Bennett (ed), *The Concept of Empire*, 1962, P.283.

A.R.Hal (ed), *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 1870—1914*, 1968; P.L.Cottrell, *British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5.

B.Thomas, op.Cit.Ch.V.

爱尔兰自治运动

19世纪70年代的农业衰落使得爱尔兰再度发生危机。大批付不起地租的佃户被地主逐出家园。于是，这些失去生计的佃农们联合起来对付地主及其代理人，纵火、伤害牲口甚至杀死那些夺佃者。1879年，在迈克尔·达维特的领导下，爱尔兰全国土地同盟成立，确定“爱尔兰土地归爱尔兰人民所有”的原则。但当选该同盟主席的是颇具声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查理·帕内尔。帕内尔是一个具有盎格鲁血统的地主，信奉新教。1875年当选下议员，1878年接替艾萨克·帕特成为爱尔兰自治派议员领袖。他在议会内采用妨碍议事术以引起人们对爱尔兰事务的关注；在议会外，则号召爱尔兰农民进行抵制夺佃地主的运动。1880年夏，上院否决了一项动用爱尔兰教会的盈余对某些被夺佃农民予以补偿的法案，使爱尔兰形势更加紧张。农民们拒绝交租，拒绝为地主做事，恐怖活动趋于活跃。面临这一严峻局面，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首先在下院通过一项在爱尔兰实行强制统治的法案，接着在1881年通过了继1870年土地法之后的第二个《爱尔兰土地法》。该法确保佃户能交纳公平地租（fair rents）、享受期限为15年的固定租期（fixity of tenure）和自由出售承租权（free sale），这就是“三F政策”。但是，该政策的实施细则极为繁琐，而且一半以上租用一英亩以上土地的佃农享受不到这项政策。不过，三F政策是政府对于财产权的一次大胆干预，地主的权利受到削弱。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这一让步并不满足，继续斗争。英国政府转而采取强硬方针，于1881年10月13日逮捕帕内尔，关入都柏林的基尔梅纳监狱。1882年5月，格拉斯顿派贸易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与帕内尔谈判，达成《基尔梅纳条约》。帕内尔承诺支持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并停止暴力行动，英国政府则同意调整1881年《土地法》，资助被夺佃农民取得承租权和取消对爱尔兰的强制统治。

这项妥协条约引起自由党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爱尔兰总督考珀勋爵和爱尔兰事务大臣弗罗斯特均宣布辞职，以示抗议。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中的强硬派也反对这项条约。1882年5月5日帕内尔走出监狱大门。第二天，爱尔兰一个号称“不可战胜者”的组织派遣两名刺客用长柄手术刀刺杀了在都柏林凤凰公园中散步的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常务次官伯克。格拉斯顿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惊，帕内尔也加以谴责，努力劝说他的支持者放弃暴力，并将分崩离析的土地同盟改组为爱尔兰民族同盟，以爱尔兰自治为其首要目标。

此后，帕内尔将议会斗争作为重要的斗争手段，1885年7月与保守党合作将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赶下了台。但是当保守党政府首相索尔兹伯里试图采取强硬的爱尔兰政策时，帕内尔又联合自由党于1886年1月将保守党赶下了台。

格拉斯顿第三次出任首相后，将爱尔兰问题作为最紧要问题来对待。虽然他明知党内张伯伦派等反对爱尔兰自治，但他甘冒本党分裂的风险，甚至认为分裂后的自由党能更有效地推行爱尔兰自治政策。

果然，刚刚入阁的张伯伦在得知政府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政纲时宣布辞

职。4月6日，格拉斯顿向下院提出《自治法案》，并发表了十分出色的演讲。他认为解决爱尔兰问题将使英国议会恢复尊严，而且在“地方自治”上的妥协，不仅不会削弱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团结，而且会加强这种团结。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允许爱尔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英国政府保留有关王权、国防、外交、贸易、关税、航海、邮政和铸币等方面的权力；爱尔兰税收的40%纳入帝国预算收入；爱尔兰在英国议会中的议员只在讨论涉及爱尔兰自治问题时才出席议会。

该项提案遭到保守党、自由党张伯伦派、哈廷顿派的强烈反对。爱尔兰北部的厄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也举行抗议活动。保守党的重要人物伦道夫·丘吉尔的口号“厄尔斯特将战斗，厄尔斯特将拥有正义”引起强烈反响。1886年6月8日，英国下院投票表决《自治法案》，张伯伦、哈廷顿、布莱特等人率93名自由党步入反对厅，结果该法案以341票对311票被否决。格拉斯顿希望以妥协的策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努力受挫。自由党更是元气大伤，第三届格拉斯顿自由党政府执政不到一年又宣告垮台，党内发生大分裂，自由党从此走向衰落。

在1886年大选中，保守党东山再起，赢得317席，自由党统一派77席（其中由哈廷顿为首的辉格派和温和派约占50席，另约20席为张伯伦为首的激进派），自由党仅获191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85席。大选后，保守党与自由党统一派联合执政。1887年，巴尔弗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后立即推行强硬政策，大量动用军警，逮捕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向地主提供财政和道义上的支持。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镇压法》。更为卑鄙的是，保守党政府利用名噪一时的“皮哥特伪造文件”一事陷害帕内尔。理查·皮哥特是都柏林的一名记者，他伪造了一封帕内尔于1882年5月写给凤凰公园刺客的信，信中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宽恕。《泰晤士报》在1887年3—4月内发表一组文章对帕内尔大肆抨击。政府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准备大动干戈。但是，皮哥特于1889年2月承认他伪造了那封信，政府的陷害才未能得手。不幸的是，同年12月，爱尔兰议员奥谢上尉指控帕内尔与其妻长期通奸并生有三个子女。1890年11月，法院受理这项指控。英国舆论对此事十分愤怒，格拉斯顿则宣布若帕内尔不辞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会党团领袖的职务，自由党将终止与该党团的联盟关系。12月6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会党团选举丁·麦卡扬为领袖。次年10月，帕内尔因病去世，年仅45岁。爱尔兰自治运动亦就此告一段落。

应当指出，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改善那里的贫困状况。1888年和1891年的《土地购买法》规定给购买地主土地的农民提供帮助。1898年《地方政府法》给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同等的地方参政权利。1903年《土地购买法》给予20万爱尔兰佃农购买其租佃地的权利。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

第一节 经济概况

进入 20 世纪，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下降，往日“世界工场”的荣耀已成为历史。1901 年底，乔治王子（后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在巡视了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后归来，带给英国人一个不妙的消息：英国在帝国内的传统市场正受到其他国家的侵蚀，进而发出了“古老的英国必须醒来”的呼唤。

但真正意识到英国这一严峻处境的人似乎并不多。19 世纪下半叶尽管农业发生危机，工业发展速度下降，但由于物价明显下降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上升，普通人的生活已得到改善。人口在 20 世纪的头 10 年中继续增长，由 1901 年的 4150 万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4520 万人。同时，一周岁以内婴儿的死亡率由 1891 年—1900 年的 15.33% 降为 1910 年的 10.54%。不过，移居海外的人数达到空前的水平。1901 年—1913 年，平均每年有 5.7 万多人登上前往异国他乡的海船。这表明，海外的迅速发展对英国人的吸引力更加强烈。

H.Nicolson, King George the Fifth, 1952, P.73.

1891 年—1895 年的批发物价指数水平相当于 20 年前的 68.3%，实际工资指数 1850 年—1900 年上升了 80%。

一、工业

现状

根据 1907 年的调查统计，当年英国工业净产值（用销售额减去人力、原料成本）为 7.12 亿镑。排在净产值前三位的工业部门是采矿业（1.15 亿镑）、纺织业（0.95 亿镑）和食品、饮料及卷烟业（0.87 亿镑），都是些传统工业。

同时，英国制成品在世界制成品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也由 1900 年的 19.5% 降到 1913 年的 14%。

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1890 年—1907 年的年增长率为 0.1%，而同期美国的增长率为 2%。在某些传统工业部门，生产率下降。如采矿业，每个矿工在 1881 年平均产煤 403 吨，到 1911 年只产煤 309 吨。而美国采矿业大量使用机械，人均产煤量比英国高近一倍。

另一方面，英国企业大都规模较小，由个人控制。业主观念保守，不愿进入资本市场集资，生怕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在 1914 年，这种由个人所有的企业占近 80%。在这样情况下，英国在与国外垄断企业竞争中就处于很不利地位。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英国企业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联合和合并，向垄断企业过渡。1883 年，英国制碱企业建立了一个联合组织，以限产提价，确保赢利。8 年之后，48 家生产苏打和漂白粉的公司联合建立了联合制碱公司，这是一个具有卡特尔形式的垄断组织。后来，该公司于 1926 年与其他 3 个垄断公司一起建立了帝国化学公司。较早出现的垄断企业还有 1897 年成立的英国缝纫公司、1900 年成立的波特兰水泥制造业者联合有限公司和维克斯—约翰·布朗公司等。规模最大的是 1901 年建立的帝国烟草公司，拥有资本高达 1750 万镑以上。不过，英国垄断企业形成较美德等国晚，发展水平也较低。而且，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英国企业的利润率滑落，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的 47.7% 下降到 20 世纪初的 39%。

为了提高利润率，英国企业界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探讨“科学的管理方法”，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索尔福德轧钢厂电力工程部主任丁·斯莱特·刘易斯于 1896 年完成了《工厂利润第一管理方法》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论述工厂管理的书。但美国的泰勒管理法首先在美国投入实用。英国对泰勒法持冷淡态度，认为该法忽视人的局限性，重效率轻技艺，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乎未被采用。

出口

唯一还能使英国工业界略感安慰的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及各类出口总额仍保持世界第一位：

B.R.Mitchell and Phyllis Deane (eds.), *Abstracts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270.

D.H.Alcroft (e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15—1914*, 1968, P.18.

英美德出口对比表（单位：亿美元）

国别	年代	制成品	出口总额
英国	1899	13.27	19.78
	1913	19.70	25.56
美国	1899	4.23	16.61
	1913	8.46	24.84
德国	1899	7.82	11.21
	1913	17.26	24.05

但是，英国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落在德美之后，而且，美国国内市场庞大，出口量所占比例较小。再者，在争夺工业国家市场的竞争中，英国的记录最令人失望。可看下面的数据：

英美德对工业国家出口对比表（单位：亿美元）

国别	年代	制成品	出口总额
英国	1899	4.79	9.12
	1913	6.24	9.69
美国	1899	2.72	13.66
	1913	5.35	18.50
德国	1899	4.37	6.91
	1913	9.25	12.85

从以上对比表中，我们看到英国在出口方面的领先地位已岌岌可危。而且在出口产品的构成上，英国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也明显落后于德国。比如机械，德国占 17.7%，英国占 10%；化工产品，德国占 14.4%，英国占 5.1%；金属，德国占 28.9%，英国占 16.7%。

二、农业

稳定发展

20 世纪初，英国农业重新显示出稳定发展的势头。虽然小麦的进口量逐年上升，即从 1900 年的 1750 万英担（每英担=112 磅）增加到 1913 年的 2500 万英担，但英国的小麦种植面积却从 1904 年的 137.5 万英亩扩大到 1913 年的 175.6 万英亩，净增 21% 以上。农业在英国国民收入中比例较为稳定，1900 年—1909 年保持在 6.6% 左右。

占农业产值 1/5 的奶制品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1908 年产牛奶 10 亿加仑，其中 85% 以鲜奶的形式售出，其余部分则加工成黄油和奶酪。牛奶的销售方式已相当先进。伦敦每日动用专列向各地发送鲜奶，密封奶瓶已投入使用。

农业的复苏使得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持续减少的局面得到改观，这在一个已相当工业化的国家中实属罕见。190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农村人口为 750 万人，10 年之后增加到 790 万人。据当时一项核算，在 1901 年至 1911 年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年满 20 岁以上的务农男子人数从 97.7 万增加到 105.6 万。农民的收入在大萧条年代中曾下降了一半，到 1906 年时已恢复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的水平。

但是，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1913 年，西博姆·朗特里写了《劳动者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他估算一个由两个成人加上 3 个孩子组成的农业劳动者家庭的每周最低消费为 20 先令 6 便士。这点钱只能维持温饱水平。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只有北部的 5 个郡的农业劳动者工资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

贸易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1900 年—1909 年，英国年均出口额为 3.33 亿镑，年进口额为 5.7 亿镑。由于英国对外投资获得巨额收入，所以无形贸易顺差剧增，1891 年—1900 年年均为 3.85 亿镑，1901 年—1910 年年均为 5.16 亿镑，而 1911 年—1913 年年均则为 3.46 亿英镑。因此，英国贸易的净顺差也在增加，19 世纪最后十年年均净顺差为 0.46 亿镑，20 世纪开头十年增加到 0.975 亿镑，1911 年—1913 年竟猛增到 2.06 亿镑。 —

第二节 20 世纪初英国工党的发展

一、工党初期的斗争

一个独立劳工政党的存在是英国工人能够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先决条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工党的诞生，但并不意味着它立刻成了有影响的¹政治力量。在能发挥作用之前，它必须首先设法在英国的政坛站住脚。

劳工代表委员会内部的分歧

1900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工会领导人与各社会主义团体领导在伦敦市德盖特广场附近的纪念馆举行了联席会议，虽然代表们都赞成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选派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但各派力量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希望和要求并不相同。这一点，在它的成立大会上就已经暴露出来。

英国工会的行业性和地区性，使它们在利益上很难完全一致，因而也就很难接受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矿工联合会、纺织工人协会和混合机械工人协会是英国工会中最强大的三支力量，它们的态度基本上左右着英国工会运动的方向。

矿工工会的力量最强，1895 年曾有 5 个矿工当选为议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与自由党密切合作的结果，因此，他们甚至在筹备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时就持反对态度。

棉纺织工人主要集中在兰开郡，由于英国棉织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外竞争，而保守党又主张保护关税，这使他们的态度反而倾向于保守党。然而，1899 年棉纺织工会成员詹姆斯·曼德斯勒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奥德姆竞选的失败，却表明追随保守党进入议会是困难的。这就使他们对劳工代表委员会采取了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是典型的技工团体。本来较为保守，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新技术发明的不断出现，手工劳动逐渐被机器代替，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的态度比前两个工会激进得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伯恩斯与汤姆·曼恩都是其中的成员。除此之外，混合铁路职工协会也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它是全国第五大工会，却始终未得到本行业雇主的承认。因此，它们迫切希望通过议会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早提出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建议。

在所有工会中，“新工会”显然是劳工代表委员会最积极的鼓吹者，因为对它们来说，只有劳工代表委员会才能保证它们的生存出路。只是失业常常使它们处于经济窘迫的地位，其组织也不够稳定，这就明显地削弱了它们应有的影响。

由于各派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不尽相同，成立大会上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社会民主联盟要求新党“建立在承认阶级斗争，把生产、分配和交换的

B.C.Roberts,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 P.166.

B.W.Clapp (ed).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P.418.

社会化作为最高目标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种主张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从工联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未来的新党。尽管这个提议由于新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反对，未获通过，但关于这个未来政党的原则、目标、纲领等问题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通过了哈第的提议：“建立一个立场分明的劳工代表的议会党团，它应该有自己的领袖与统一的政策，必须准备同任何目前采取直接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措施的党派合作，并且同样准备同任何党派一道反对与之相背的措施。”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建议，它强调了劳工在政治上独立的必要性，但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这使各派仍有可能继续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有关事宜。

接着的任务是选举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大工会的代表们希望新的执行机构仍然受职工大会控制，以便他们实际上操纵这个组织。这理所当然引起了小工会代表和独立工党的强烈反对。职工大会刚成立时，曾设立了“议会委员会”，负责大会休会期间的日常事务。它是一个秘书处性质的机构，而非权力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鼓动议员为劳工利益投票。它比职工大会更保守，由它来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以344票对165票通过成立新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设不付薪的专职书记一名，由独立工党的麦克唐纳担任。麦克唐纳从未在任何工会任职，态度比较温和，这就避免了无谓的派别纠纷。该机构不受职工大会的直接控制，它有权接受全国各业理事会的工会参加，因此可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从总的结果看，独立工党在成立大会上大获全胜。在新执行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社会主义者占了5名，独立工党的成员和同情者占4名。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权实际落入了独立工党手中。

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中，社会民主联盟强烈谴责独立工党的态度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在劳工代表委员会1901年年会上，当社会民主联盟有关社会主义的条文仍未获得通过时，它愤然退出了劳工代表委员会，使这个本来就很松散的联合体前景更为暗淡。

有些工会的态度本来就犹豫不决，现在由于担心这个组织被社会主义者控制，因而更不愿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时，有129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7万名成员，而大会结束时，实际参加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数不到上面这个数字的1/3。两个月后，参加的成员仍未超过18.7万人。经过麦克唐纳一年多的奔波宣传，到1901年来临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仍然只有35.3万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工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存有疑虑外，广大工会成员的漠不关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入会费虽然很低，但议员候选人的费用则基本上全由基层组织承担。这笔费用相当可观，据估计，一名议员每年至少要花费200英镑。这对于一般工会显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不少工会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抱同情态度，却不愿参加。混合木工协会在报告中承认，它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该工会的章程不

G.D.H.Col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1789—1947*, 1952, P.262.

Henry Pelling, *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1976, P.209.

E.P.Roberts, *Left in Centre: The Independent Party 1893—1940*, 1966, P.10.

Royer Mo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24*, 1978, P.201.

允许为了政治目的而动用基金。

工会的不合作态度使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处境极为尴尬。由于加入者不多，它在第一年获得的经费总共只有 243 镑。这使它在 1900 年举行的选举中，除了印发宣言和传单外，几乎无法承担任何候选人的费用。结果，由于力量悬殊，仅有哈第和贝尔侥幸当选。而贝尔又不愿与哈第合作，哈第实际上成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的唯一代表。

这是一个可悲的局面。实际上，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地位是含糊不清的，它既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工会或社会主义团体，同时也不是这些组织的上司，它只是一个由各个团体为着一个总的目标而组成的松散的联盟机构，尚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议会中的力量。而 1900 年选举的结果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显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罗伯茨甚至认为，假如自由党人不是在对南非战争的态度上意见分歧，造成内部分裂而处于瘫痪状态，假如它同意在几年后所试图执行的巨大社会改革纲领的话，那么劳工代表委员会很可能就此销声匿迹。这种看法虽然过于武断，但如果工会仍然对劳工代表委员会采取半心半意的态度，那么，在社会民主联盟退出以后，劳工代表委员会完全可能窒息在襁褓中。

塔夫河谷案及其后果

塔夫河谷案判决打破了这种僵局，它改变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命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塔夫河谷铁路公司处于它的巅峰。它的铁路把威尔士南部塔夫等 70 多个煤矿矿井与出海口连接起来，沟通了出口与消费的渠道，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威尔士南部的经济命脉。它和其它铁路公司一样，拒绝承认当地铁路工会，认为只有个别工人才有资格和他们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当地铁路工会对此极为不满，因而随时准备寻找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

1900 年 8 月，当地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詹姆斯·霍姆斯下令罢工。他一方面要求增加工资，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在承认工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由于工会要求不高，有人估计即使不罢工，公司也会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塔夫河谷铁路公司总经理阿蒙·比斯利在老板们的支持下，拒绝了罢工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使顺利解决纠纷的希望泡汤。8 月 21 日，工会正式罢工。

8 月 29 日，罢工工人与公司终于达成协议。罢工者唯一的“成就”就是公司保证全部重新雇用他们。从罢工者原来的要求看，他们几乎什么也未得到，反而白白损失了一大笔基金。

但事情尚未到此为止。公司认为贝尔和福尔默斯把传单送给外来工人（指工贼组织中的工人）的行动触犯了 1871 年的结党为非与财产保护法。而法官韦尔在接受公司的上诉后，也认为传单已构成了“明显威胁”，要求工会必须对自己干部的违法行为负责，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此案被提交上院裁决。几乎一年后，上院才作出有利于工会的判决。

G.D.H.Cole ,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 P.296.

B.C.Roberts , op.cit.P.173.

J.H.Wiener (ed) , Great Britain : The Lion at Home , PP.2679—2689.

铁路职工联合会在这次事件中损失惨重，赔偿公司的诉讼费和损失费为2.3万镑，加上罢工期间本工会工人的生活费开支，它的总损失约为5万镑。

根据塔夫河谷案判决，任何抵制性活动被宣布为非法，完全剥夺了工会纠察的权力。这样，工会几乎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罢工。而真正的威胁还在于任何罢工都会导致罚款使工会蒙受损失。这次事件是1889年以来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组织的一系列反攻的一个高峰。有产阶级的紧逼使得犹豫不决的工会再也没有退路了。

这种艰难的处境加强了工会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联系。直到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才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

工会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积极态度给劳工代表委员会注入了活力，为它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3年初，纺织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至此，除了矿工联合会外，劳工代表委员会已把大部分工会力量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1903年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

1903年2月，劳工代表委员会年会在纽卡斯尔召开。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著名的纽卡斯尔纲领。该纲领规定每1000名成员的会费由10先令上升到近5镑，从而筹足了一批可观的基金。该纲领还要求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执委和议会中的成员必须同自由党、保守党和其他党派断绝关系，坚决维护劳工利益。由于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从经济上资助自己的议员，因而有效地加强了党内的纪律，使贯彻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决定有了起码的保证。1904年，职工大会主席不按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原则办事，双方发生冲突，于是贝尔裁决劳工代表委员会为会外组织，职工大会无权干涉，双方正式脱离了关系。直到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地位才明确下来，并成为真正的政党。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此劳工代表委员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超过了职工大会。

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决议中一再声称它要在两党之外奉行独立路线，现实斗争的经验却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在竞选中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向自由党和保守党同时开战；要么与其中的一方结成联盟。同时开战显然是自寻绝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劳工代表委员会只能选择与自由党结盟以反对保守党这条路。

而在自由党方面，也急需与工党建立联盟。自1895年大选失败以来，自由党内部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02年的教育法与张伯伦1903年开始的关税改革运动，使自由党内各派力量恢复了生机，再次抬起头来。然而，自由党要想彻底改变局面，重新执政，必须得到劳工的支持。自由党督导员、格拉斯顿的秘书杰西·赫伯特在给格拉斯顿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直接影响上百万选民的投票，如他们不与自由党合作或者反过来对付自由党的话，自由党损失将极为惨重。但如果允许劳工代表委员会在

G.D.H.Cole, op.cit.P.292.

B.C.Roberts, op.cit.P.190.

35 个选区中直接与保守党竞争，不仅将使自由党得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选民在其余选区的支持，同时还可以替自由党节省 1.5 万镑经费，从保守党处赢得 10 个席位。他的观点得到了格拉斯顿和班纳曼的支持。

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集团中，虽然哈第一直坚决反对与自由党同流合污，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他指出，在双议席选区，“假如自由党能满足于 1 名候选人，而让劳工代表委员会拥有另 1 名候选人，这种事实本身就足以产生良好的伙伴关系。”哈第的表态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劳工代表委员会愿意同自由党合作。于是，麦克唐纳在哈第的默许下开始与杰西·赫伯特接触，提出了包括双方合作范围和程度的建议，共分 3 个部分。1. 自由党在 14 个单议席选区不提名，在 11 个双议席选区只提 1 名候选人 2. 劳工代表委员会希望争取到除此之外的 16 个单议席选区和 1 个双议席选区的提名；3. 另外 9 个单议席选区和 1 个双议席选区的名额安排由双方商讨解决。在所有这些选区中，自由党已经提名候选人的只有两名，而在与劳工代表委员会商讨的 52 个选区中，赫伯特难以控制的只有 16 个，因此协议不难达成。麦克唐纳虽然与赫伯特有过好几次接触，但由于担心劳工代表委员会中“不与自由党妥协”的人的反对，迟迟没有拍板。

伍尔威齐事件加快了双方合作的步伐。当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威尔克鲁克在补选中由于得到自由党的支持而战胜了势力强大的保守党。这个事件表明，如果自由党候选人得不到劳工的支持就无法取胜；同样，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如遭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夹击也无法取胜。因此，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随着 1903 年 9 月大选的到来，两党合作的事再也无法拖下去了。1903 年 8 月 7 日，格拉斯顿写信给班纳曼，如与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只会在 6 个选区遇到麻烦，协议不难达成，但该计划应悄悄进行，以免被公众知道引起麻烦。第二天，班纳曼写信表示同意。其结果颇富戏剧性。由于社会上流传着张伯伦即将辞职的流言，自由党似乎比劳工代表委员会更急于达成协议。于是，赫伯特奉命去找麦克唐纳。其时麦克唐纳正因病住院，赫伯特立即赶到病房。9 月 6 日，两位领导人在病床前会面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结成正式的联盟，而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达成一项默契。劳工代表委员会希望能在 30 个选区内自由行动；作为回报，劳工代表委员会在任何自己有影响力的选区显示“对自由党的友谊”，自由党应支持双方内定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协议很快达成，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工党领导人因此常常否认这个协议的存在。

协议固然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当事者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劳工新党取代自由党的开端。对自由党来说，它节省了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在很多选区由于劳工的支持而更有把握获胜。而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来说，该协议则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一旦议会里有了足够的劳工议员，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完全改观。

Chris Cook , A Short History of Liberal Party 1900—1976 , P.36.

Bealey and Pelling , op.cit.P.136.

Ibid.P.144.

Chris Cook , op.cit.P.36.

虽然保守党统一派政府并未在 1903 年垮台,从而避免了在大选中失败的危险,但麦克唐纳—格拉斯顿选举协定仍被确认,并在避免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冲突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在 1906 年大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

1906 年的胜利

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胜利的最终获得还是要靠劳工代表委员会自身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哈第等人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们从未放弃过把所有劳工力量团结在劳工代表委员会周围的努力,而英国国内的形势也有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英布战争结束后,战时的短期繁荣立即消失,萧条再度袭来,失业率重又上升。这使越来越多的工会投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怀抱。1903 年至 1904 年,有 165 个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到 1906 年为止,每年加入的工会均在 158 个以上。各社会主义团体也得到了发展,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支部甚至重新提出了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要求。尽管海德门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但仍一意孤行,结果社会民主联盟未能重新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不过很多联盟中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如兰斯伯雷等人,却因此而脱离了联盟,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阵营。

1905 年 3 月,矿工工会与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成协议,表示愿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互相配合,双方不互相攻击。虽然该工会仍不愿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但这无疑已是麦克唐纳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

会员的增加也使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1905 年—1906 年它的基金已达 1.2 万镑。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英布战争结束后,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反对。1902 年的教育法虽然有利于一般的中等教育,却遭到了非国教徒的反对,1904 年的执照法也同样开罪了他们。自由党虽然也投票支持这些法令,此时却乐得充当好人。而工会又坚决反对任何关税,使得这届政府几乎不能办好任何一件事。1905 年 11 月,巴尔弗辞职,自由党组成新内阁。原议会于 12 月 20 日解散,1906 年 1 月举行大选。

劳工代表委员会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竞选。哈第慷慨激昂地宣称,“工党”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与目前公众注视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无论关税改革还是爱尔兰自治法案,都不会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工党政府的来临则完全不同。因此,“即将开始的大选是一场革命,它将重新改造政党并推翻现有政治信念的基础。”“受苦受难的百万众生与他们主人的决战即将到来,而他们事业进展的速度与工党在下院的奋斗精神密切相关。”麦克唐纳的才能在竞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修改了工党的竞选宣言,使其更为简练,更富煽动性。在竞选中,麦克唐纳四处奔波,传递消息,为劳工

Clegg, Foxand A.F.Thompson, op.cit.Vol.I.1977, P.375.

G.D.H.Cole, op.cit.P.299.

Nineteenth Century, January 1906, P.24.

代表委员会的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英国的劳工选民，而且爱尔兰的选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

大选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参加竞选的劳工候选人为 50 人，而当选者竟达 29 人，其中 32 人直接与保守党对垒。矿工泰勒在当选后，立即宣布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这样，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的成员已达 30 名。

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大选中争取到了 50 个选区内大约 30 万张选票，占这些选区总票数的 37%。这充分显示了它的实力。现在，他们已不是自由党的小伙伴，而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新的议会召开时，他们毫不迟疑地坐到了反对党的位置上，并选举哈第为新成立的议会党团主席，正式把劳工代表委员会更名为“工党”。

至此，工党度过了它最艰难的岁月。议会党团的成立标志着它已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劳工代表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和工党议会党团的成立是工党史上光辉的一页，它表明这个新生的组织终于在英国的政治风浪中站稳了脚跟。经过多年的努力，劳工运动的主流最终转向了联合的、直接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的候选人不得不在选区内寻找自由党甚至保守党支持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二、1906 年以后的工党

毫无疑问，1906 年大选的胜利使工党能更大地影响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它现在可以直接在议会里施加压力，以促使各种福利政策的通过。在议会关于养老金问题的辩论中，斯特德写道：“一个新的革命性的事实牢牢印入我的脑海，那就是劳工议员使下院的各个部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劳工代表，人数虽然极少，但目标都极为明确。在他们后面有一种潜在的不可估量的选举力量。”

胜利之后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工党的胜利都是令人鼓舞的，工会更是把这次胜利看作是推翻塔夫河谷案判决的大好时机。事实上，早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前，保守党政府设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就已发表了报告，宣称它无意从法律上取消工会，愿意承认工会为合法团体，它们有权把自己的基金用于一般目的和罢工而不是任何有害活动中，并建议修改法律以恢复工会和平纠察的权利。不过保守党此种表示为时已迟，它尚未来得及采取行动就被迫下台。新的自由党政府在保守党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议案。但工会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任何妥协性的提案，而是要彻底消除塔夫河谷案判决对工会造成的损害。因此，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通过决议，坚决地否定了自由党的提案，并提出了自己起草的议案。在工会与议会党团的强大压力下，经过激烈的辩论，自由党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同意了工党的提案。上院此时也认为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于是，1906 年 12 月 21 日，旨在彻底推翻塔夫河谷案判决的“劳资争议法”获得通过。该法明确肯定了 1871 年以来所有工会的存在、罢工行动以及罢工期间的和平纠察行为均为合法，规定不得干涉他人用金钱或劳动去策划或赞助罢工的权利，并强调法庭不得干预任何工会与雇主、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纷争。“劳资争议法”不仅在法律上完全确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而且使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是工党议会党团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也是工会的一次重大胜利。作为选票的持有者，他们第一次从投票箱中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尊严，而这种尊严一度是被法庭所藐视的。

直到 1918 年工党的目标都是十分有限的，它从未认真考虑过组成政府的问题，它的工作主要是保卫有组织的劳工已经得到承认的利益。而在工会的眼中，工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推翻塔夫河谷案判决的政治武器。当议会党团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工会与工党在一段时间内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目标。1906 年前，自由党力图拉拢工党，因而给工党以讨价还价的地位。由于内部意见的分歧和目标的不确定性，工党的一些成员逐渐发展成为互相对立的集团。一些社会主义者尽力想要工党采取进攻性的政策，而另一些工联主义者却坚决反对任何过激的行动。这是导致以后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根源。

与此同时，工会在废除塔夫河谷案判决后提出了 3 个方面的要求：赔偿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73, 1967, P.384.

Henry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1963, P.126.

J.H.Wiener (ed), op.cit.PP.2690—2691.

法应扩大到所有工人；雇主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事件支付保险金；“工业疾病”有权要求得到赔偿。除第二点外，工会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赔偿法通过后，获得保险金的工人增加到 600 万，而政府原来只打算增加到 200 万。同时，政府每年加拨 20 万镑失业救济金，作为对 1905 年失业工人法的补偿。

工会与议会工党的矛盾

这一切意外的成果使工会对议会党团和自己的议员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但他们很少想到这已是工党大选胜利后所能取得的最大战果了。首先，议会党团的力量本身就很虚弱；其次，议员毕竟不能完全代表工会讲话，对议会党团过高的期望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失望。工会本来就认为议会党团在取得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成果后停滞不前，议会党团试图摆脱年会的控制更是激起了工会的不满。斯诺顿认为：议会党团的职责就是“按年会的决定办事”。而特提更是攻击议会党团的领导人是“纯粹的伪君子”，“向阿斯奎斯献媚眼”，“在首相面前像一只咪咪呜呜的猫。”

的确，在取得初步的成功后，议会工党在此阶段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07 年议会党团提出了有关“工作权利”的议案，但未能通过二读，争取养老金的提案也未获得成功。唯一的收获或许是矿工的八小时工作制，但该法案实际上也未能确实保障矿工的权利，因为它允许一年有 60 天可以超过 8 小时，并可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中止该法案。

就在议会党团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时，工党在议会外却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最大的收获是矿工联合会加入了工党。在 1908 年前，矿工联合会是全国职工大会成员中唯一没有加入工党的大工会。矿工联合会在与自由党分手后不断壮大，并逐渐向工党靠拢。1905 年，兰开郡、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矿工提出了加入工党的要求，但由于矿工联合会中自由劳工的力量仍很强大，所以它们的要求没有实现。1906 年工党选举的胜利以及在议会中推翻塔夫河谷案判决给矿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矿工内部要求加入工党的呼声越来越高。1908 年 12 月，矿工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兹决定投票解决加入工党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最终否决了自由劳工的意见，作出了加入工党的决定。作为让步，对现有的矿工议员不作任何变动，矿工将支持他们直至他们被认为是工党的候选人时为止。12 月，矿工联合会与麦克唐纳进行谈判，商讨加入工党的有关事宜。1909 年初，矿工联合会正式加入工党。哈第的“劳工联合”的理想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工党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大劳工团体了。

奥斯本案

就总体而言，如果说 1906 年至 1909 年这 3 年工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有

Roger Moore, op.cit.P.106.

Ibid.P.104.

W.Douglas (ed), op.cit.Vol.7, No.2, 1977, PP.678—679.

Roger Moore, op.cit.P.108.

限、然而意义重大的进展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却是工党发展的困难时期。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它在议会和选举活动中的困境而言。在党派斗争中，形势发生了逆转。1906年大选后，工党的壮大导致了自由党的恐惧，双方的蜜月很快结束，这使力量还很虚弱的工党处于不利的地位。从1906年开始，自由党改善了自己的组织，重组了自由党俱乐部，并加强了与工党基层组织的较量。在1906年和1907年的两次补选中，自由党都取得了胜利，大大增强了自由党的自信心。相反，从1906年—1908年举行的10次补选结果看，工党参与了其中的6次，5次均被击败，仅有的一次成功也是因为爱尔兰选民倒向了工党，否则果实也要被自由党夺走。

在1909年后，工党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奥斯本判决对工党的财政造成了损害，从而减少了工党议员的人数。

奥斯本案产生的根源来自工会中对议会党团不满的阶层。工党的联盟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团体的利益和目标不尽相同。在发生冲突时，必须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然而这必然会损伤少数派的自尊心，造成内部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分歧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和自由党。工党要实行独立的劳工政策，要争取多数议席，就必然要与原来的两党发生冲突。而一部分支持自由党政策的工人对此不满，他们不愿将自己的钱拿给工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或反对自由党政策的费用。工党则认为它在政治上的进展是实现工人整体利益的最好途径，因此一切有利于工党政治上取得进展的政策都必须执行，少数派与工党政策不相容的行为不能容忍。

但少数派的不满情绪并未平息。1905年坎宁城的铅管工人工会要求收回为政治目的而交纳的捐款。虽然经工会领袖的调解事情得到了和平解决，但隐患并未消除。1908年，混合铁路职工协会沃尔瑟姆斯托支部的书记奥斯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1876年工会法第16条中工会基金的使用范围一项并未包括选送议会代表的费用，并将该问题诉诸法院。他在诉状中指出，工会为政治目的而强制捐款是越权行为。开始法院不予受理，原告继续上诉，最后审理推事和法官作出判决，认为按1871年和1876年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有权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并没有给工会为政治目的而强制募捐的权力，因此，这种行为是非法的。

不过，奥斯本判决对劳工运动是一大打击。尽管一部分工会成员对不再支持工党感到满意，但大部分工会领导，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坚决反对法庭的判决。在1910年的职工大会上，多数代表坚决要求政府恢复工会按照自己意愿使用基金的权利。他们认为奥斯本判决已远远超出了奥斯本的本意，不仅工党的存在受到威胁，而且工会的任何带政治色彩的行动也受到限制，甚至连工会拨款参加市议会选举，拨款给“职工大会”或代表团分赴政府各部门接洽公事是否合法都成了问题。一直对工党的发展壮大感到不安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马上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向工党发起进攻。他们纷纷要求法院颁布禁止筹集政治募款的规定，这些要求照例都能获准，这就使工党不仅在财政上非常紧张，而且在政治上也处于劣势。

Roger Moore , op.cit.P.110.

Bill Simpson , Labour : The Union and the Party , 1973 , P.61.

自由党社会改革对工党的挑战

工党对早期各种形式的国家福利政策的态度表明，保护劳工利益的斗争与社会政策的改革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早在 1906 年前，劳工代表委员会就开始关注各种涉及劳工福利的政策。在 1906 年大选时，工党比自由党更急于进行社会改革。尽管工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分歧，但也有基本的、与自由党完全不同的利益联系，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有别于激进自由主义的意识。从 1906 年参加大选的候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两党的差别：在劳工候选人中，88%支持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81%支持政府支付养老金，79%支持教育改革，60%支持住房改造，只有 16%赞成“紧缩政策”。而自由党候选人关注的目标依次为：86%支持教育改革，69%支持改革养老金与济贫法，41%支持与住房和失业有关的立法，而有 54%的人赞成“紧缩”。

这种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党政府在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中上台却又迟迟未能作出相应的反应。与自由党政府相反，工党在大选之后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改革的议案。1907 年 2 月，工党在下院未提出养老金问题，引起哈第的不满，伯恩立即提出了一个修正案。1908 年 2 月，工党再次在一个特别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养老金问题。在社会保险方面，工党强烈要求废除济贫法，实行哈第“工作与生活”原则。从 1907 年起，他们连续提出了 3 个“工作权利”的议案，以对付失业问题。

工党的声势引起了自由党的警觉与恐惧。但劳合-乔治却认为，工党要想取代自由党只有在自由党无法帮助“人民对付严酷的社会环境，把民族从不堪忍受的贫民窟和广泛的贫穷之中转移到闪耀着富裕之光的土地上”时才有可能。为了减弱工党的影响，自由党在组阁两年之后，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推动社会改革事业。

1908 年 6 月，自由党政府首先提出了养老金法案。接着工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修正案，并戏剧性地得到了保守党的支持，从而使自由党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尽管如此，自由党政府的养老金法仍然顺利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由议会拨款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享受养老金者不得被剥夺任何原有的权利。虽然颁布养老金法不是出于自由党本意，但它毕竟是政府通过国家财政力量来建立社会福利事业，因而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了一块基石。

但自由党对济贫法的改革却始终没有显露出应有的热情，甚至在 1909 年 2 月调查济贫法执行情况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冗长的报告后，阿斯奎斯等人仍然无动于衷。他们的借口是自由党成员不会赞成报告的结论。结果该委员会又起草了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有 14 名成员签字，包括韦伯夫妇和乔治·兰斯伯雷，被称为少数派报告。另一份则称为多数派报告。多数派仍然坚持所谓“1832 年原则”，只要求对济贫的管理机构进行改革；而少数派的报告则要求彻底废除济贫法，铲除产生贫穷的根源，以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来取代济贫院的工作。不过对于两派的建议，政府都无意考虑，多数派的主

K. D. Brown, *The First Labour Party 1906—1914*, 1985, P.184.

S. and B. Webb, *Our Partnership*, 1948, P.322.

Douglas (ed), *op.cit.* Vol.7, No. 2, PP. 582—585.

张直到 1929 年才得以实现（即由地方政府、郡议会统一管理济贫工作），而少数派报告被否定后则引起了自由劳工的分裂。

但是，仅仅有劳工介绍所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失业保险制度。于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等人提出了“国民保险法”，并于 1911 年获得了通过。这项法令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健康保险，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失业保险。参加国民卫生保险计划的每个男工每星期交纳 4 便士，女工 3 便士，雇主为每个投保职工交纳 3 便士，另由国家出 2 便士，即著名的“9 比 4 原则”。参加保险的工人在患病期间每人可得 10 先令补助（女工 7 先令 6 便士），但医疗服务不包括家属。失业保险暂时只包括 7 个行业，这些都是处于衰退之中或动荡不安的行业，如建筑、土木工程、造船、铸铁、车辆装配等。大约有 500 万工人在这些行业就业。雇主每周为每个投保雇员交纳 2.5 便士，雇员本人交纳 2.5 便士，政府则补贴上

述两项款项总数的 $\frac{1}{3}$ ，大约每周 $1\frac{2}{3}$ 便士。

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是英国走向福利国家之路的一个重大开端，它力图在劳资之间确立一种新的关系，即雇主必须对工人的生活、健康等负责。政府更深地卷入了经济生活，它的作用已不仅仅限于充当“警察”，而是要更多地行使社会调节职能。

同时，自由党的改革也是对工党的挑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夺回了工党原有的阵地。尽管韩德逊等人在表面上仍对自由党的改革法案表示不满，但他们很清楚，这已是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既然工党不得不支持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政策，自由党也就完全拥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工党处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在补选中，尽管双方已在 1903 年达成默契，自由党仍然小心翼翼地不让工党染指它的传统势力范围。1909 年，矿工联合会加入工党后，自由党对工党独立地位的巩固和工党的发展壮大愈发不安，开始争夺以前自由劳工所占据的议席。1910 年的两次大选，使工党的议席减少到 42 个，自由党也丧失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于是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自由党强大时，工党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它的独立与行动自由，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而当自由党人不占优势时，工党反而缩手缩脚。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自由党与保守党的议席相差无几，迫使工党站在自由党一边，因为它已无力承担再次竞选的费用，不敢轻易地冒使政府倒台的危险。而爱尔兰议员对自由党政府的支持是依阿斯奎斯对爱尔兰自治的态度而定的。当工党加入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府时，它发觉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窘境：它既不能支持又不能反对自由党政府，哪怕这个政府对它的呼声充耳不闻。

结果，正当工党发现自由党正在“代替”自己进行社会改革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时，却在无意中成了自由党的囚徒。

三、工团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工团主义的兴起

工党在政府中的困境引起了广大群众对工党领导的不满。工人们认为我们出钱支持你们，你们就得替我们办事。这种不满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向着两个方向发展。首先是工会再次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同雇主展开斗争。在此基础上，工团主义运动重新高涨。工团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由各个工会负责管理自己的企业。

除了群众对工党领导软弱无能的不满外，工团主义的复兴还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自由党政府局部的、不彻底的社会改革并没有满足全体工人阶级的愿望。对大多数工会成员来说，“国民保险法”不仅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而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全部社会改革的钱都应由国库支出，而不应从工人的钱包里掏出。其次，虽然工会一直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斗争，但他们所理解的“福利”与学者们所理解的福利有天壤之别。在他们看来，他们举行罢工的能力以及以此相威胁的力量是比政府的社会政策更重要的“福利”，是维护真正的工人阶级福利的基础，凭借它可以在劳资争端中获得更高的工资，这显然超过了政府赐与的任何“福利”。第三，社会经济环境也有利于工团主义的兴起。本世纪初，英国大量资本输出，而国内工业投资却显得相对不足，由此而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实际工资迅速下降，这又反过来促使工人要求控制生活费的上涨。在此期间，工人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工人中的“工人贵族”依然存在，他们的工资一般是非技术工人的3倍，不过，他们相对于一般工人的特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从20世纪初开始，新机器与新技术的出现使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传统差别逐渐消失。工会内部这种差别的消失有利于工会斗争目标的统一。第四，工会的实力比以往更为雄厚。除了1906年工会法恢复了工会的合法权利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促进了工会的发展。例如自由党现在比以往更积极地拉拢工会。在对待“国民保险法”的态度上，工会与自由党政府是不一致的，因为工会不希望自己的福利被国家的正式制度取代。劳合-乔治意识到这一点后，明智地决定不削弱工会的作用，而将其作为新的社会政策的执行机构。其结果是“核准的团体”——工会的成员迅速增加。1911年职工大会的成员为166.1万人，仅比1901年增加了1/10，但1913年职工大会的人数已增至268.2万人。也就是说，工会在获得“核准的团体”身份后的两年内，其成员就增加了60%，而到1914年，其成员已达到414.5万人。毫无疑问，工会人数在1911年—1914年的激增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会的互助性质的结构被纳入了国家的健康与失业保险计划，加入一个可靠的社会福利组织总比孤立无援好。

工会力量的强大与议会党团力量的虚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然不能指望从议会中获取自己希望的东西，那么，只好靠自己争取了，这就是工会的结论。在这一阶段，工会最直接的目标是控制物价，提高工资。从1902

G.Foote, *The History of Labour Political Thought*, 1985, P.85.

David Kynaston, *King Labour,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850—1914*, 1976, P.163.

年到 1908 年间，生活费用上涨了 4%，而从 1909 年到 1913 年，则上涨了 9%。生活费用的持续上涨迫使工会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占罢工总数的 58.5%。

工会的行动

第一个对雇主提出挑战的是混合铁路职工协会。该协会在塔夫河谷案中受到的打击最大，1906 年后依然受到雇主的蔑视，雇主拒不承认它为铁路职工谈判的代表，于是该协会书记贝尔在 1907 年发起要求全国的铁路公司与铁路工人增加有关工资问题的谈判。除东北铁路公司外，其余的铁路公司都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该协会进行投票，决定举行总罢工。

铁路工会的行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惊慌，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当时担任贸易大臣的劳合-乔治竭力想阻止罢工的发生。在他的调停下，争执双方与政府代表一起正式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每个铁路公司设立调解委员会，其成员由三方代表组成。于是，铁路工会在没有举行总罢工的情况下获得了自己所要求的東西。

然而，矿工的斗争却不容易平息。1909 年颁布的矿工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它并未缩短矿工的的实际工作时间，因为矿主不把矿工上下井的时间包括在 8 小时内。1910 年，德哈姆与诺森伯兰的矿工举行了为期 3 个月的罢工。同年，南威尔士的矿工也举行了罢工。坎布里安企业联盟的矿工由于在矿坑内艰苦地段工作的工人报酬太低而发动罢工。他们拒绝了调解委员会给他们规定的工资，罢工坚持了 10 个月之久。汤姆·曼恩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次罢工标志着工团主义和凯尔特社会主义的兴起。

工团主义在英国发展受到美国与法国的影响，汤姆·曼恩是传播新思想的使者。他到过法国，吸收了那里的经验，回国后立即在很多行业建立“合并委员会”，鼓吹按工业部门建立工会。1910 年 10 月，他的努力得到了部分报偿，一个跨行业的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宣告成立，其中不仅有铁路工人，而且也包括码头工人和海员。然而，曼恩最大的功绩是 1910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工业工团主义者教育团。这个团体在他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其口号是“教育，鼓动，组织，控制”。

从 1911 年开始，群众性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迫使英国政府动用大量军队和警察，结果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并在利物浦等地的罢工中造成了伤亡。罢工者不仅仇视政府和老板，而且痛恨工会领导官员的无能。因此，汤姆·曼恩等人的工团主义主张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从长远来看，工团主义在理论上对工党的挑战所产生的影响比运动本身要深远得多。它认为工会并不仅仅是福利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也应成为集体主义的，无须政府干预的工业社会的核心。汤姆·曼恩认为，除非工人自己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受苦的根源是由于经济的被奴役，否则根本不可能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因此，工人必须在生产上组织起来。在未来的生产中，不需要政府与资本家在中间发挥任何作用，应该由工会管理一切。

Peter N.Stearns , *Lives of Labour* , 1975 , P.373.

David Robinstain , *People for the People* , 1973 , PP.189—190.

这样，工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工党本身的存在也就成了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威胁。

很明显，工团主义与原有的工联主义者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它把工会与罢工的作用推到了一个极端，认为与经济斗争相比一切政治斗争都是第二位的，并且经济斗争为政治家从事他们本来无法从事的事提供了机会。换言之，工党必须服从工会，并完全按工会的意志办事，而不是与之相反。

工党领导人起初并未意识到工团主义的挑战，哈第等人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工会的罢工斗争。当他们意识到工团主义的威胁后，他们便试图把工团主义纳入工党原来的思想轨道，即承认工会应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传统的功能外，工会还应参与生产的管理。这一工作主要是由韦伯夫妇完成的。这是工团主义在工党发展史上留下的思想烙印。

在战前的几年，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团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盛的表象之下，工团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因为它始终未能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 1912 年全国职工大会上，很多工会领导人发言激烈反对工团主义，结果通过了反对工团主义的决议。工团主义的命运就这样被工会本身决定了，在随后的年代里它一直半死不活。工团主义在组织上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铁路、运输和矿工工会组织的“三角同盟”。但这一组织的 3 个总工会仍然各自保持独立，所以“合并”运动仍未取得预想的效果。

尽管如此，三个大工会在战前的行动却表明，它们的行动是有力的，并且能在罢工中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更有利的解决方案。这为以后工会斗争的联合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基尔特社会主义

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起源于彭提的理论。彭提被工业资本主义的丑恶所震惊，认为这种制度破坏了中世纪行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人类陷入了一种道德败坏的危机中。他最初加入费边社，但在 20 世纪初，他却认为费边社与独立工党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工业主义根本罪恶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提出按中世纪行会的模式来解决工业社会的矛盾，即工业不应由金融家而应由技术工人组成的行会来进行控制。

霍布森深受彭提思想的影响，从而成为基尔特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他反对彭提的中世纪主义，认为不是工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才是人类自身完善的敌人。在工资制度下，工人仅仅是商品，完全丧失了人的价值。然而他却认为工党夺取政权的企图是可笑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照样受到政府的剥削。只有废除工资制度，才能使工人得到彻底解放。他提出由工会垄断劳动力市场，迫使资本家按公平价格付钱给工会，然后工会再在自己的成员中进行分配。这样，工会就能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控制工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基尔特。这种基尔特既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又可保证他们不再受他人

B.C.Roberts, op.cit.P.253.

G.Foote, op.cit.P.104.“基尔特”系英文“guild”一词译音，意为“行会”。

的剥削。政府在基尔特社会中只应成为各种纠纷的仲裁者，它应远离经济事务，把自己的职责限制在对外政策、防卫与立法等事务上。

彭提和霍布森都否定国家和政党的作用，这对工党显然不利。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柯尔在吸收霍布森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柯尔同意霍布森现代基尔特主义的观点，但他反对工团主义“消灭雇主”和推翻民主政体的主张。他认为现存民主政体确有毛病，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必须加以改进，以一种“功能民主”取代政治民主。所谓“功能民主”，柯尔的解释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的意愿是不可能为另一个人所代表的，一个人有各方面的要求，应按这些要求的功能投票选举代表，一个人有多少功能就应有多少选票，这样就能充分满足每个人各方面的要求。这就是柯尔的“全面民主”，而“真正的民主代表是功能代表。”

与他的先驱不同，柯尔并不反对工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吸引工人阶级恰好证明了工党存在对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性。假如把工党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去掉，那么作为一个正在争取执政的党，它完全有可能成为改造社会的主力军。与工团主义者相反，柯尔认为国家在帮助工人摆脱资本剥削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工会所在的行业毕竟过于狭窄，只有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才具有结束资本所有制的力量。在转变国家作用的过程中，工党在全民同意的前提下，具有合法地把资本转移给工人的能力。国家社会主义是将所有权转给基尔特控制的必要步骤，所以国家社会主义毕竟胜于国家资本主义。工党领导人及时地抓住柯尔思想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

从整个工党的发展进程看，基尔特社会主义存在时间很短，但它包含的阶级合作思想却在以后的年代里以各种形式出现。

诚然，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对工党领导在议会中无所作为的一种挑战和反映，但它们的传播却极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二连三的罢工，三角同盟的成立，以及各工会的联合行动等，无疑在客观上加强了工党在议会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总的来说，工党领导对它们持欢迎的态度。

S.G.Hobson , op.cit.P.106.

G.Footer , op.cit.P.110.

四、大战前夕的工党

领导核心的形成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突然宣布与自由党彻底分手，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 1918 年大选并取得成功时，英国的政坛人物莫不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只要仔细考察工党的发展史就可知道，战后工党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战前所取得的一些进展：领导层的相对稳定，政策的连续性，组织的严密与牢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最后一条。工党在组织上（必然由此导致思想上）与自由党完全分离，并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可以说，当战前的工党不得不暂时在同一部政治马车上委屈地充当自由党的小伙伴时，它已经逐步地丰满了自己的羽翼，并做好了心理与实力上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把自由党挤下这部马车。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考察战前工党在各种挑战和不利的环境下，怎样巩固自己的阵地，并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在 1922 年以前，工党还是一个议会外的党。1910 年大选后，作为工党主要决策机构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由 16 名成员组成，除 3 名社会主义团体成员外，其余均来自各工会和各业理事会。麦克唐纳主持工党的日常工作，而韩德逊（1911 年后接替麦克唐纳为工党书记）则掌握着工会。

工党组织的发展

从 1906 年到 1914 年，尽管工党遇到很多麻烦，但麦克唐纳等人仍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自己的组织发展政策。从 1906 年开始，工党就着手建设自己的地方组织，因为几乎所有工党的工作都由这些地方组织负担。工党的基层组织是选区工党，选区工党按选区建立，由当地的工会、各社会主义团体按一定比例派出代表组成。其日常工作主要是登记工党候选人名单、起草竞选方案、召集选区工党会议、监督宣传品的分配等。选区工党书记定期向麦克唐纳等人汇报工作，以便与中央的意图保持协调，如果选区工党得到当地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的完全支持，它就可成为“标准党”。“标准党”与其余选区工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每一个成员都缴纳费用。大部分选区工党处于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因此很难有理想的效率。不过，在奥斯本案发生后，这种松散的状态反而有利于工党的生存与发展。

1910 年两次大选的结果令人失望。尽管工党为这两次大选支出的经费超过了 1906 年（两次竞选的费用分别为 68,986 镑和 41,306 镑），但工党议员的总数却减少到 42 名。而且，即使这样，也还是自由党与工党保持 1903 年默契的结果。因此，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后，工党面临着一系列迫切任务：必须使工党的基层组织更加正规和健全；加入工党的组织必须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而不能仅仅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自己的“工业”利益；必须更加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工会来从事工党的工作。能否完成这些任务是工党生存的关键。

工党在 1910 年两次大选的失利与奥斯本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工会不愿把更多的钱无谓地扔进投票箱中。工党由此在财政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10 年—1915 年其直接损失估计至少达 2 万镑。很多工党的地方机构和中央组织一样受到了打击。由于奥斯本案的影响，工党的成员在 1910 年—1913 年几乎没有增加。同时，在 1913 年新的工会法公布之前，工会也把它们提供给工党的经费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准上。

不过，工党经受住了奥斯本案的打击。它缩减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可能地避免自己内部的分歧，并且由自愿人员组成的工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履行着工党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能，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工党度过了难关。

与此同时，总部（即全国执委的秘书班子）积极参与工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力图使工党的地方组织健全起来。

1911 年，韩德逊担任总部书记。他使工党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麦克唐纳担任书记期间，由于工作粗暴而与许多基层组织关系不好。而来自工会的韩德逊则态度和蔼，处事稳重，精力过人，他上任后打破了麦克唐纳所造成的僵局。他是名符其实的“流动书记”，在战前的几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各地奔波，从事基层组织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地方工党的代表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前一些工会，尤其是矿工工会，不愿工党在本地建立机构，唯恐危及自身的利益，但在 1912 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同年 10 月，矿工工会决定支持工党在所有选区的活动，坚冰终于打破了。

为了支持地方工党的发展，韩德逊同意给由选举产生的工党干部以工资总额 25% 左右的补贴，在较大的工党地方机构设置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但麦克唐纳强调专职人员的选择和任命必须由工党总部同意。1912 年工党大会通过了给地方机构提供补助的决定。申请补助的地方机构必须向总部汇报有关它的组织和它的活动的一切细节。由于总部的支持，工党各区的专职人员由 1912 年的 17 名增加到 1918 年的 80 名。专职人员的增加，对工党组织的健全有着积极的意义。

工党内部权力的转移

工党基层组织的发展也牵涉到另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在 1918 年甚至稍后的一段时期，工党的基层组织，不管以什么名称出现，其基础都是各业理事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总部认为有必要使这些组织正式成为工党的基层组织。虽然 1911 年年会多少给了工党总部一些处理地方机构的自主权，但总部一直没有充分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地方各种力量的平衡关系使总部几乎不可能行使权力。在伦敦与纽卡斯尔等地，各业理事会原是那些地区劳工力量的唯一代表，而现在工党要从政治上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它们的反对，任何权力的移交都必然会产生痛苦。伦敦的各业理事会为了它们失去的特权，不仅公开表示它们对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敌意，而且长期拒绝向伦敦工党提供应交纳的经费。纽卡斯尔的各业理事会甚至在 1913 年 11 月

Ibid.P.20.

R.Mckibbin , op.cit.P.27.

决定退出工党。其它地区情况稍好一些，各业理事会决定向总部投降。但各地的权力移交并不顺利，总部虽然发布了许多指示，但这种转移多半落在纸上，而不是行动上。真正的权力移交直到 1918 年后才确定下来。因此，在 1914 年前，工党实行了一种妥协性的政策，让各业理事会分享了很多理应属于各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权力，条件是它们必须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

工党与自由党的关系

工党在发展和巩固自己基层组织的同时，积极扩展自己在各选区的力量，准备选出更多的议员。但是，工党的这种企图必然要与自由党发生冲突，因为两党都在大体相同的区域进行竞选。这就决定了工党除非与自由党和自由主义为敌，并牺牲自由党的利益，否则它根本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发展。

如果说 1906 年前工党采取与自由党合作的策略是必要的话，那么 1906 年后整个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党方面，尽管许多议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当选与和自由党的默契有关，但他们既然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就不能与自由党过于亲密，有些议员甚至完全否认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议。这样，工党议员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与自由党的合作是暂时的，彻底分手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自由党出于本能，决不会让这个劳工党发展壮大以至危及自己的地位，因此总是抓住机会对劳工议员进行限制或打击。这一点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已经十分明显。尽管韩德逊与麦克唐纳一再表示愿与自由党继续保持默契，以避免在大选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自由党的态度却非常明确：“它决不会同意工党的任何扩张行为。”自由党的首脑之一皮斯在给阿兰爵士的信中写道：“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自由党“尊重上次大选中工党代表所取得的席位，而工党组织也应尊重其他候选人或其他劳工代表在 1906 年以自由党身份所取得的议席。”他认为，假如劳工满足于他们目前的议席，“从长远来看他们肯定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如果工党坚持进攻性的态度，它不可能指望自由主义官员会对自己不被提名无动于衷。”

虽然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双方从各自的实际利益出发，都没有立即破坏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但形势表明，在 1910 年后要保持这种联盟关系已越来越困难。

1910 年后，双方在补选中开始了一场时起时伏的争夺战。1912 年 6 月矿工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兹去世后，他所留下的议席空缺本应由工党候选人填补，但自由党却宣布要得到这个席位。尽管自由党总部权衡利弊决定避免矛盾激化，但自由党的基层组织已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马恩怀特。当地的工党组织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芬恩，于是揭开了两党争夺战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总部只好顺水推舟，它号召本党党员忠于自己的组织，宣称，“战斗必须进行。”“战斗”的结果是自由党如愿以偿地从工党手中夺去了

R.Mckibbin, op.cit.P.36.

Chris Cook, op.cit.P.58.

这个议席。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克鲁。就在同一个月，该选区的自由党议员去世，虽然按默契工党不应染指，但工党决定争夺，这一决定明显带着报复的含意，因而使得这次补选充满了火药味。《时代周刊》预言“我们将会看到（自由党—工党）联盟的终结。”

选举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该议席被保守党夺了过去。补选争夺战的失败成为工党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致命地打击了全国性的自由劳工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希望基层组织停止对抗行动，以免保守党从中渔利，但基层与总部在这一点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在 1913 年的两次补选中，工党基层组织都没有盲从总部的意见。这表明，工党与自由党哪怕仅是表面的联盟也很难维持下去了。

从 1910 年到 1914 年，工党在基层组织的压力下参加了 12 次补选。在这些补选中，工党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丧失了自己原有的 4 个议席（2 席为自由党所得，2 席为保守党所得），但工党在战斗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选票。

Chris Cook , op.cit.PP.52—53.

R.Mckibbin , op.cit.P.56.

R.Mckibbin , op.cit.P.58.

第三节 20 世纪初的英国内政

一、保守主义的衰落

巴尔弗内阁（1902 年—1905 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和爱德华时代的开始不是由爱德华二世，而是由保守党首相巴尔弗的上台作为标志的。诚然，这个时代不能与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但它却是英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本来张伯伦在布尔战争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声望日增，由他出任首相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一次乘车时，张伯伦受了重伤。于是，巴尔弗接替了首相职务。

自由党的危机与巴尔弗内阁

巴尔弗一上台就面临着两项困难的任务——颁布新的教育法和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这是上一届政府留下的遗产，正是这两份遗产导致了保守党统一政府的垮台。

与此同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也面临着可怕的危机。要将自由帝国主义者、温和主义者和新布尔派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布尔派以劳合-乔治为首，他们在布尔战争期间非常活跃。当一些布尔囚徒要求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时，支持这派观点的勇敢记者在 1901 年 1 月 26 日报道：“布尔是一个勇敢而有骑士风度的民族，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巨大的不幸。”⁶⁶该报的观点得到很多自由党人的支持，它对自由党，尤其是右翼的复兴起了某种先锋作用。

新布尔派甚至逐渐俘虏了坎贝尔-班纳曼。作为自由党领袖，在战争开始时，他曾坚持保持中立，以维护党内的团结。6 月 14 日，在伦敦的一次政治午宴上，他宣称对布尔人农庄的毁灭和实行集中营制度是“野蛮的方式”。他的表态不仅遭到了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攻击，而且在党内也引起了危机。6 月 17 日，他放弃了以前的中立，公开支持劳合-乔治的动议，即在会上讨论自南非归来的记者霍布豪斯的报告。结果受到自由帝国主义者和保守党的强烈反对，导致了自由党的分裂，有 50 名自由党议员放弃了投票。

于是，自由党各派举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宴会，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求得到党内多数的支持。一向以党的领袖自居的阿斯奎斯也宣称，坎贝尔-班纳曼的话不代表自由帝国主义派的意见。

在党内强大的压力下，坎贝尔-班纳曼只好摊牌。7 月 9 日，他在自由党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大会上提出了他是否合适继任领袖的问题。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获得了全体一致的信任票。阿斯奎斯在随后的政治宴会上，也缓和了口气，认为自由党应把帝国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

Ant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 1982, P.386.

A.F.Havighurst, *Britain in Transition*, 1979, P.57.

Ibid.P.58.

自由帝国主义的代表兰斯伯雷看到自由党内的团结已不可能，遂宣称将退出党的政治活动。作为一名前首相，他具有很大的影响，韦伯夫妇甚至也希望他来领导“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党从格拉斯顿主义下解放出来，提高“国民效率”，并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糅合在一起。但是，这样做势必引起自由党的进一步分裂，兰斯伯雷不愿走到这一步，于是自动退出了这一场纷争。尽管如此，仍未解决自由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直至布尔战争结束，自由党内部的不和谐依然存在。

然而，自由党本身未能完成的任务，却由保守党替它完成了。保守党在1902年—1903年的行动，决定性地改变了自由党未来的命运。可以说，正是保守党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自由党重新联合起来，并为1906年自由党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1902年的教育法与关税改革运动

保守党政策的变化可以追溯到索尔兹伯里内阁。布尔战争尚未结束时这种政策就已初露端倪。首先是教育法遭到了所有在野党的反对。接着，1902年5月，财政大臣提议，为了弥补战争的额外支出，必须对小麦和面粉征收少量的进口税。这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人们对反谷物法的斗争尚未淡忘，这个问题居然又老调重弹。

1902年的教育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然而推行这一教育法的保守党却蒙受了莫名其妙的损失。它在议会中遭非议甚多，结果自由党在反教育法的斗争中团结了起来，并且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1903年，自由党在7次补选中得票率增加了37%。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1870年以来的教育概况作一回顾。在1870年前，传统的公立学校，对学校的捐助主要由国教徒进行。1870年教育法颁布后，非国教徒把持了新成立的教育委员会。而随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学校，则主要由郡议会把持。由于多头控制，各自为政，一方面造成了经费来源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等教育的发展。于是，1902年的教育法取消了2568个学校委员会，由郡议会统一负责中等教育事务，由328个地方教育机构负责14,238个捐助学校的有关事务，这些学校不再直接从白厅得到补助。学校也可以接受宗教组织的资助。然而，在下院辩论时，这一问题遇到了麻烦。国教徒和天主教徒支持议案，因为议案实际上把他们的学校从经济窘迫中解救出来。非国教徒则反对这一议案。他们本来幸灾乐祸地看着教会学校的破产，而现在他们看见的却是这些教会学校由于地方税的支持而得到了拯救。劳合-乔治抓住时机对议案进行攻击。非国教徒对议案的愤慨和反对导致了自由党的重新团结。该教育法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把中等教育由宗教和世俗共管完全转为由国家统一管理。

教育法的通过一方面使自由党在反对教育法的立场上重新统一，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内部造成了分裂。张伯伦拚命从政治和宗教角度反对教育法。在

A.F.Havighurst, op.cit.PP.59—60.

Ibid.P.63.

Antony Wood, op.cit.P.387, P.66.

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又转向了关税改革。他狂热地支持征收谷物税，这与 1903 年 4 月 23 日内阁预算案提出的自由贸易主张发生了矛盾，因此遭到巴尔弗的坚决反对。而张伯伦也不愿妥协，他已 66 岁，实施他政治意愿的机会已不多了。交战的结果原预算案获得通过，但其代价是保守统一党的分裂。

尽管巴尔弗和张伯伦发生了分歧，但两人都不愿最后摊牌，而希望由大选来裁决。8 月 5 日巴尔弗获得了保守党多数对他政策的支持，重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于是一场危机顺利度过。

巴尔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原则上接受了张伯伦的观点，但这引起了里舍与雷沃里舍斯的反对。巴尔弗只得转告张伯伦，目前由政府讨论食品税是不合适的，但张伯伦以辞职作为回答。9 月 17 日，他要求辞职的信公布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惊。

张伯伦认为改变贸易政策将会加强英帝国的地位。他研究了美德两国的贸易，认为这两国在 1870 年后贸易增长一直超过英国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而英国死死抱住自由贸易政策不放，结果吃了大亏。于是，他毅然退出了政府并成立了关税改革同盟。这次关税改革运动提出了以下一些纲领：对外来食品征收低关税，以鼓励从殖民地进口食品；对机械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减少国外产品的竞争力，扩大英国的工业，增加就业；为了防止生活费用上涨，尽量减少对糖茶以及诸如此类的产品的征税。张伯伦认为这些措施将会促使殖民地进口英国的产品，从而增加英国的出口能力，弥补美德两国多年来采取保护政策给英国造成的损失。

张伯伦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保守党人的支持。但是，张伯伦离开政府和组织关税改革同盟，并未能迫使巴尔弗辞职。他极力在两派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样终于把政府维持了下来。

巴尔弗被迫辞职与保守党的失势

但是，这种平衡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南非的中国劳工问题再一次使巴尔弗处于窘境。为了防止给本国失业大军造成压力，英国发布了限制外国劳工入境的法令，但驻南非的英国高级官员却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招募华工开采金矿。这立即使舆论大哗。反对奴役外国劳工成了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有力口号。实际上，当中国劳工进入南非时，巴尔弗政府并不知道这些劳工已签了用工作支付旅费的契约。至 1905 年 10 月，在南非的中国华工已达 4.7 万人。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未尝不是成功的，但在道德上显然不可取，政治上则是一个失策。

尽管巴尔弗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但到 1905 年秋天，他在内政问题上已一筹莫展。教育法、关税改革、中国劳工以及一些议会会议的纠纷，都一齐向他袭来。在内政问题上的束手无策，使选民对他失去了信心。

然而，迫使巴尔弗辞职的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党内。张伯伦的主张得到了保守党许多基层组织的支持，加深了保守党的分裂。1905 年 11 月，在纽卡斯尔召开的保守统一党党员会议上，张伯伦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他

H.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 1982, P.171.

A.F.Havighurst, op.cit.P.67.

的观点的决议。这无异对巴尔弗极为不利，因为他刚发誓要重整党的团结。不久，张伯伦又要求全党接受他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连保守党的杂志也认为这构成了“党的危机”。自由党的报纸《每日新闻》也预言，“如同张伯伦对格拉斯顿先生的背叛行为一样，他现在也会对巴尔弗先生采取同样的行动。”后来证明，张伯伦的确希望政府垮台，使之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以便接受他的政策。在内外压力下，巴尔弗不得不最后摊牌。他不是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解散议会，而是直接向国王提出辞职，这同1873年格拉斯顿反对狄斯雷利时完全一样。而一些自由党人也提醒坎贝尔-班纳曼，像狄斯雷利那样拒绝接受首相职位。但是坎贝尔-班纳曼正确判断了形势，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丧失，于是同意组成政府，并立即在1906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保守党的两次失策，并没有导致自由党彻底解决其内部的分歧，在爱尔兰问题上尤其如此。在临近大选的形势下，自由党必须在爱尔兰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1905年11月23日班纳曼谨慎地宣布对爱尔兰问题表示同情，但认为爱尔兰应先组成自己的政府，然后再谈自治问题。这个原则基本上为党内各阶层所接受。

大选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保守党遭到了惨败，自由贸易者获得了胜利。自由党获399席，爱尔兰统一党获83席，工党获29席，而保守党仅获151席。这样的结果不仅使保守党和自由党感到吃惊，工党也同样感到吃惊。自由党内的格拉斯顿派、自由帝国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汇集在一起，团结一致地投入大选，这是自由党获胜的主要原因。在1895年和1900年两次大选中，很多工人阶级成员将选票投给保守党。多年来，自由党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合作使自由党如愿以偿。这次选举对张伯伦是灾难性的打击。虽然他仍当选为议员，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却到此为止。一方面，他的政治主张受挫，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中风损伤了他的健康。尽管他到1914年才去世，但在1906年他的政治生命确已完结。

1906年大选被史学家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3次选举之一，另外两次为1832年与1945年的选举。选举的结果使工人阶级获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工党和自由党获得了胜利。它是英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下院基本由“土地利益”集团成员控制的局面。新议会召开时，几乎有一半的成员是新当选的。尽管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仍可发现“乡村绅士”的影子，然而，他们已不再是下院中的主导力量。改革后的下院广泛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商业、法律、金融、记者和劳工的利益。下院已不再是“欧洲第一俱乐部”，燕尾服和高礼帽也不再为某些人所垄断。最重要的是内阁中出现了第一位劳工大臣——约翰·伯恩斯，虽然他本人不是真正的劳工。

下院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其原因是选民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1867年和1884年两次改革之后，新选民逐渐成熟起来，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自由党，除了1903年的默契和反对所得税之外，还因为巴尔弗很少过问社会改革问题和拒绝改变塔夫河谷案判决。因此，自由党要长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必须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

A.F.Havighurst, op.cit.P.70.

Ibid.P.76.

Ibid.P.76.

二、自由党与社会改革

新自由主义

自由党的这届政府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英国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有力的政府。该政府组成后不久，立即把新自由主义原则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英国世界工场地位的丧失，旧自由主义已不能适应新的国情，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种新的理论——新自由主义，逐渐在自由党内占了上风。

坎贝尔-班纳曼内阁（1906年—1908年）

尽管自由党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已做好了社会改革的准备，然而事实证明坎贝尔-班纳曼并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他没有固定的政治目标，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家。他几乎不给内阁以任何直接的指示，也很少过问各部的工作。因此，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是很有限制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把各派力量都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内阁中真正重要的人物是阿斯奎斯。作为财政大臣、非国教徒和中产阶级成员，他责无旁贷地充当党内温和派的代表。有关财政改革和预算案的辩论给了他在下院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在那里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劳合-乔治在财政部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声望与日俱增。总的来说，在自由党新政府中，激进分子占了多数，他们对决定英国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中（包括首相）绝大部分与旧贵族无直接联系。

在保守党方面，虽然遭到了沉重打击，然而并未瘫痪，巴尔弗及其主要领导人都在新政府中占了一席之地。至于张伯伦虽然也当选，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就他的实践而言，他几乎是一位好斗的、但又非建设性的政治家，他给保守党和自由党带来了灾难，在两党内部引起了分裂。假如他不反对格拉斯顿，英国有可能早20年实行社会改革，那么工党或许不会产生，而英国的政治格局也将会完全不同。就这点而言，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劳合-乔治。但是，由于保守党在下院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不可能对自由党的政策提出挑战，所以只好利用上院的多数对自由党的社会改革进行阻挠。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策略，它为1909年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并彻底改变了两院关系。

上院反对自由党的许多立法，如1902年的教育法和停止复数投票法，但接受了工会纷争法。工会纷争法是自由党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自由党实际上并不愿意同工人阶级疏远关系。在这一范围之外，两党都避免提出更激进的社会民主要求。但是，上院否决教育法导致自由党内出现要求根本改变两院关系的潮流。在1907年的议会开幕式上，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立法纲领。该纲领认为“两院的不幸区分”损害了议会制度，并暗示英王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坎贝尔-班纳曼希望改变上院成分，3/4的“终身贵族”由政府任命。但自由党在上院的领袖克鲁认为在未明确上院对下院的权

限之前不应随便变动上院的成员，于是球又踢回了下院。

坎贝尔-班纳曼主张下院拥有无限的权威。1907年6月24日，政府提出了一份要求限制上院反对或修改下院议案的权力的议案，结果引起了保守党的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该议案获得通过。

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期间，除了霍尔丹的军队法外，没有通过任何重要的立法。

阿斯奎斯政府与社会改革

1908年4月，坎贝尔-班纳曼因健康原因辞职，数月后去世。阿斯奎斯接替担任首相，自由党的社会改革自此才正式开始。阿斯奎斯担任首相直到1916年。他虽然缺乏创造性，但他就任首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班纳曼内阁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丘吉尔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对社会改革负责。他和劳合-乔治一起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劳合-乔治本人几乎是“新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政府中的人格化代表。正是他与丘吉尔的合作才使得阿斯奎斯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

在劳工的压力下，阿斯奎斯政府在1908年首先通过了矿工八小时工作法。1908年，又提出了养老金法案，规定免费为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养老金，费用由国库支付。享受养老金的老人不得被剥夺任何应享有的权利。政府利用国家财政力量来建立社会福利事业，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下了一块基石。

养老金法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然而毕竟给老年无生活来源的工人一线希望的曙光。因此，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与宪法危机

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上院没有进行任何抵制，但在修改1902年的教育法和酒税牌照法问题上，自由党政府却遭到了失败。这使自由党对上院日益不满，而1909年的财政预算案，终于使自由党有合适的借口向上院发起进攻。

自由党的一系列福利政策是以国库中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切费用为前提的。但政府已有1.46亿英镑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海军和支出养老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大幅度削减开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开辟新税源。劳合-乔治走了后一条路。他提出的方案是：大幅度增加遗产税；对收入较高者课以附加税，对每年300英镑以上的收入提高所得税率，对于每年500英镑以上的收入，其超过300英镑以上的部分则增收超额所得税；对烟草和烈性酒增收重税，加上原来的烟酒执照税，估计该税总额可达600万英镑；对土地

A.F.Havighurst, op.cit.P.91.

Ibid.P.91.

A.F.Havighurst, op.cit.P.91.

转手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增殖部分征收 20%的土地税。

劳合-乔治是第一个出身贫苦的内阁大臣，对贫穷有切肤之痛，他深知满足工党要求的必要性。因此，他毫不隐晦地宣称他的预算案是一项战时预算，是筹款从事反对贫穷的战争。“让富人付钱”成为他的口号。1909 年 4 月 29 日，他正式向下院提出他的财政预算案。

该预算案提出后，经过短暂的沉默，风暴出现了，尤其是征收土地税，引起了传统的上流社会的强烈反对。自由党报纸把这称之为“人民预算案”，而保守党则把他称之为“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预算案”。不过，自由党中许多家境不错的成员尤其是商业阶层也反对预算案，这显然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经过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等人的努力，1909 年 11 月 4 日，“人民预算案”终于在下院以 371 票对 149 票得以通过。

尽管这个预算案暗示它可能成为一件阶级战争的武器，然而它实际上远未达到如此程度。不过，保守党还是决定加以反抗，并且有迹象表明保守党准备利用上院的多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如果上院违反惯例，反对下院通过的财政议案怎么办？自由党领导人，尤其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急于和上院摊牌，巴不得上院反对，以便就此对上院进行反击。他们一再强调下院的权威。丘吉尔认为上院不仅是反对下院的某项立法，而是要控制全国财政。劳合-乔治甚至宣称：如上院拒绝议案，那无异于颁布了一道人民革命的命令。

自由党咄咄逼人的行动迫使保守党作出反应。但如何对待“人民预算案”，保守党内部并不一致。以鲍尔温为首的温和派主张不要反对，以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部分保守党人则坚决主张反对，因为这些措施极大地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兰斯多恩认为此事应由全体国民来仲裁，上院不宜轻易退让。10 月 30 日，上院以 350 票对 75 票否决了“人民预算案”。12 月 2 日，阿斯奎斯设法在下院通过了一个议案，宣称上院的行动是一种“违宪和篡夺下院权利的行为”。于是，议会被解散，1910 年 1 月举行了大选。然而，要一般的百姓来关心上院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未免过于天真。因此，自由党政府在这次行动中的战绩平平，仅以一席之差险胜保守党。自由党获得 274 票，保守党获 273 票，爱尔兰自治党获 82 票，工党获 40 票。这种结局使保守党和自由党非常失望，工党也不例外。唯一高兴的是爱尔兰人，他们现在终于掌握着平衡议会的砝码了。

尽管如此，上院最终还是通过了议案。然而，自由党一发不可收，他们决心对上院穷追猛打。摆在阿斯奎斯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摧毁上院对下院议案的否决权；二是使爱尔兰获得自治权。但是，要遏制上院，必须获得国王的支持，要求国王允诺加封足够的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而爱德华七世并不愿这样干，他希望能有一种较为和谐的解决办法。1910 年 3 月，阿斯奎斯提出了新的议会法，其基本内容为：财政议案在下院送到上院 1 月后即自动成

J.H.Wiener (ed) , op.cit.P.2838.

A.F.Havighurst , op.cit.P.96.

Ibid.P.97.

A.R.Ball ,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 1981 , P.56—57.

A.F.Havighurst , op.cit.P.97.

Ibid.P.98.

为法律；上院对其余议案的否决期限不得超过 2 年，如果某项议案已经下院三次通过，即使上院不同意，自动成为法律；议会的期限由 7 年减为 5 年。4 月，该议案在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在下院获得通过。5 月 6 日，爱德华七世病故，使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英王乔治五世即位，他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绅士，这与爱德华七世刚好相反。

由于这一变故，政党斗争被暂且放在一边。双方决定全力以赴解决上院在宪法中的地位问题。然而，因存有种种分歧，两党议员的私下接触，未能导致联合内阁的产生或与此相一致的行动。

1911 年的议会法

但是，两院的冲突并没有因爱德华七世的去世而有所缓和，1893 年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被否决后，两院冲突的祸根就已种下。当自由党在下院占多数时，上院总是想方设法拖延或阉割下院通过的议案，因此，两院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战幕既已拉开，而且形势对自由党有利，阿斯奎斯等人自然不肯错过机会。

虽然新国王乔治五世讨厌上流社会的人，但他并不愿加封新贵族以压制上院。阿斯奎斯以辞职相要挟。11 月 16 日，国王只好履行加封足够多的自由党新贵族的许诺。由于爱德华七世曾要求在迫使上院就范之前必须先诉诸民意，于是 11 月 28 日议会被解散。

然而，在 12 月举行的该年度第二次选举中，投票者比 1 月份明显下降。选举结果几乎与 1 月份完全一样，自由党获 272 票，保守党获 271 票，爱尔兰人获 84 票，工党获 42 票。自 1832 年以来，自由党首次连续获得三次大选的胜利。因此，在政治上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在公众的压力下，上院问题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1 年 2 月，自由党政府再次在下院提出议会法。新议会法与阿斯奎斯在 1910 年提出的几乎完全一样，5 月下院以 121 票的多数通过了该议案。

与此同时，上院也在下面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是与下院的关系，二是上院成员的构成。上院的保守党议员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 8 月 9—10 日举行最后辩论。议案最终以 131 票对 114 票得以通过，这是因为 15 名大主教中有 13 名支持议案，另外尚有 37 名保守党贵族投了赞成票。

然而新的议会法并未酿成事实上的革命。第一条规定上院对财政案的否决权不得超过一个月，事实上从未发生过。因此，人们一般认为 1909 年上院采取拒绝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上院虽无权否决下院的财政提案，但实际上，1909 年的财政预算案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财政案的范围。因此，上院作出否决的反应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第二条规定上院搁置下院通过的议案不得超过两年，并且下院如果 3 次予以通过，经英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实际上，这一条也很少被侵犯过。上院的结构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如此，1911 年的议会法仍然是自 1832 年来英国宪政史上最重大

A.F.Havighurst, op.cit.P.98.

Antony Wood, op.cit.PP.405—406.

A.F.Havighurst, op.cit.P.101.

的变化。议会两院的关系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作了规定。从此以后，上院再也不能对下院的最高权威进行挑战了。1911年议会法作为选举权扩大后的必然结果，大大加快了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战后，普选权终于得以实现。

不过，上院仍然利用自己的一点残存的权力进行反抗，使政府通过每项立法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工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女权运动的高涨以及1911年议会法所必然带来的爱尔兰自治法，使得英国国内动荡不安。

政党政治

上院与下院的冲突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巴尔弗成为党内攻击的焦点，因为他曾主张上院通过议会法。反对者们发动了“巴尔弗必须走”的运动，迫使巴尔弗在1911年11月8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博纳·劳接替了他的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按照英国政治中个人的作用往往超过党组织的作用的惯例，处于反对党的保守党当然也不会有所作为。

1911年的议会法标志着自由党激进主义的结束，造成1906年选举胜利的自由党—工党联盟开始崩溃。虽然社会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然而这并不能掩饰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英国的工业优势结束，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失业率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劳合-乔治建立的调解委员会并不能根本扭转经济状况。因此，工党和自由党的左翼越来越激进。工团主义也开始复兴。

妇女解放运动也给自由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由来已久。20世纪初，她们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妇女选举权方面，这是妇女要求在立法、工作以及教育方面获得平等权利的一部分。1903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潘克赫斯特夫人成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班纳曼曾在1906年选举中向该联盟许诺，自由党获胜后将考虑妇女选举权问题，以换取他们的支持。然而获胜后的自由党只作了一些象征性的表示。1907年，自由党政府颁布选举权法，该法令规定妇女有权参加郡、市议员选举并有资格担任郡、市会议员等，但妇女选举权的实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然遥遥无期。

1910年后，由于自由党始终未履行修改1902年教育法的许诺，开始失去了中产阶级非国教徒的信任，而爱尔兰自治案的迟迟未决又使它失去了爱尔兰议员的信任和支持。这一切使自由党政府完全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几乎任何一次大选都可能使政府倒台。这种状况之所以未发生，主要在于其余各党在混乱中也未能提出吸引选民的强有力纲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从另一角度看，它们还没有做好接替自由党政府的准备。这样，自由党政府才得以苟延残喘到大战爆发。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英国的对外政策

在 20 世纪到来时，英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逐渐放弃了在 19 世纪恪守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与其他国家结盟。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却是英俄关系的恶化。

一、前途难卜的英帝国

对帝国看法的变化

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逐渐下降和英帝国国内移民型殖民地独立倾向的加强，英国人对帝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英布战争给英国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其自信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英帝国军队竟被布尔人打得昏头转向，损失惨重。近 6000 名官兵战死疆场，另有 1.6 万人死于疾病。这场战争的开支高达 2.2 亿多镑，几乎等于当时英国一年的出口总值。于是，英国人对花费巨大代价来维持帝国的做法提出了疑问。连一向热衷于帝国事业的约瑟夫·张伯伦也开始将帝国看成是英国的一个负担。

自加拿大于 1867 年成为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自治领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移民型殖民地在 20 世纪初也相继获得自治领地位。在海外出生长大的英裔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紧密，他们不再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家”。英国政府对移民型殖民地的自治要求采取了开明的态度，并未加以阻拦，更不用说派兵干预了。这与一个多世纪之前英国处理北美 13 个殖民地问题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两党对帝国的立场

英国两大政党对于英帝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保守党是英帝国的积极维护者，认为仅靠英国的力量已难以承受这个负担，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都应承担责任。在 1902 年殖民会议开幕式上，约瑟夫·张伯伦说：“我们承受这个负担已有多年。我们认为现在是我们的孩子们帮助我们共同承受这个负担的时候了。”但是，出席殖民会议的各自治领、殖民地代表对他提出的加强帝国团结、步调一致的主张不感兴趣，无人表示支持。身为殖民大臣的张伯伦并不气馁，在 1902 年殖民会议后致力于关税改革，企图用特惠制维系帝国的团结，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于 1902 年继任保守党政府首相的阿瑟·巴尔弗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保持英国与各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开始对“英联邦”的概念进行探讨。1904 年，巴尔弗在政府中设立了帝国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英帝国的防卫战略，对各军种的军事开支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直到 1947 年才被内阁国防委员会所取代。

自由党对英帝国的热情要低得多。在 1911 年的帝国会议上，自由党政府首相阿斯奎斯与其他自治领的总理们一起反对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沃德关于将帝国建成联邦国家的主张，声称：“这样的做法将会“对我们目前的责任政府制度产生绝对致命的影响”。当然，自由党也不愿英帝国走向崩溃，因此阿斯奎斯在会上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英国及各自治领在各自为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自治领

各自治领对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帝国防卫计划并不热心。张伯伦要求它们出人出钱支持英国国防建设，只有新西兰答应了这个要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却坚持自起炉灶，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当然，各自治领在英国有困难时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鼎力相助。英布战争打响后，3万各自治领及殖民地军队前往南非与英军并肩作战。在不久之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也派出大批部队参战，为英国最终取胜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各自治领都不愿事先作出保证或承担义务，而且它们对英国所承担的义务更多的是出于对母国的那种特殊的情感。

抨击帝国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英帝国的存在进行抨击，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当时最著名的激进主义批评家是霍布森，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穷人入不敷出，但富人却能积累大笔财富。富人们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帝国存在和扩张的动力。霍布森指出英国的殖民政策就是为这些“经济寄生虫”服务的。

种族问题

英帝国内除了少数几个移民型殖民地之外，大多数殖民地中白人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那么，英国人是怎样处理种族问题，怎样看待非白人的呢？按照当时英国两名派驻殖民地的高级官员——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和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看法，非白人在生理上并不一定是低下的，但他们须经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提高到白种人的文明水平。霍布森一方面抨击英帝国，一方面又承认白人继续统治非白人的必要性，同时他主张这种统治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工党领导人拉姆齐·麦克唐纳也认为白人和其他非白人难以共处。他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政府》一书中这样写道：“当白种人和有色种族共同生活以及社会平等的条件开始产生时，他们中间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所以，他认为不同种族应分开生活，也就是实行种族隔离。但是，他并不赞成将这种隔离永久化，指出当非白人接受教育取得进步之后，应享有选举权，成为平等的公民。

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就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性质。1902年结束英布战争的和约就未能解决土著黑人的选举权问题，只规定“关于授予土著人以选举权问题将留待自治制度实施后再予定夺”。1906年，自由党政府决定批准布尔人实施自治制度时，并未将授予土著黑人以选举权作为前提条件。然而在1907年的选举中，英裔白人在德兰士瓦议会中只获得少数席位，布尔人控制了议会。这时，英国政府感到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对黑人的选举权问题更是抛到脑后去了。于是，阿斯奎斯内阁于1909年接受了关于将英国原

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与原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合并为南非联邦的提议，期望南非联邦成为大英帝国中又一个强大的、忠于英国的自治领。英国议会批准了南非提出的不授予所有非白人选举权的提案。这样，在南非联邦成立时，原开普殖民地中根据财产资格已获选举权的约 2.2 万名黑人和印度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南非成了英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典范。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激进派成员和工党成员持反对态度，但因人少力薄，未能发挥明显的影响。

印度

对于印度殖民地，英国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其种族歧视的实质依然未变。1905 年 10 月，印度总督寇松颁布分治孟加拉的法令，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怒，全印掀起抵制英货的斗争。同年底，新任印度总督明托上任后便在镇压这场民族运动的同时推行改革政策。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利对此表示赞同。明托将全印立法会议中印度议员的人教增加了一倍，扩大其在财政方面的权力。同时，他还在总督行政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印度委员。通过这些措施，明托成功地控制了局势。

应当指出，英国殖民当局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实行民主，而是按照英国政府驻印代表麦考莱 1835 年有关印度教育的备忘录的精神行事。麦考莱主张造就一种协商式的独裁制度，具体做法是允许这样的人参与统治，即“具有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但又具备英国人的志趣、观点、道德观和智能。”莫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目标不是要建立印度自治政府，他“根本没有干任何放松控制的事”。显然，英国殖民者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为维护其统治和剥削培植一批亲英的傀儡。

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英帝国成功地解决了南非和印度问题，比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时显得更稳固了。然而，英国的实力地位已下降，英国人已对大英帝国能否生存下去表示怀疑。1905 年，一位无名氏写了一本名为《大英帝国的衰亡》的小册子，列举了 8 个致使帝国衰亡的原因：都市生活的优势地位；英国对海洋兴趣的下降；奢侈的风行；品味的退化；人们体质的弱化；宗教和精神生活的败坏；过度征税和浪费；以及英国在保卫帝国方面的无能。威尔斯也于 1914 年不无道理地发生这样的疑问：“帝国将生存下去吗？”此后几十年的历史验证了这种悲观看法，大英帝国于 1931 年改组为结构松散的英联邦，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获得独立，昔日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终究未能逃脱古代各大帝国衰亡的命运，英国也沦落到二流强国的境地。

二、英日同盟的建立

背景

当时俄国在中国的东北积极扩张势力范围，租用旅顺港，拟订修筑铁路计划，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成威胁。于是，英国开始寻找盟友，以共同扼制俄国的扩张野心。由于法国还在台湾问题上怨恨英国，所以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成为英国盟邦的可能性最大。不久前英德曾在促使委内瑞拉还债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1901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和殖民大臣张伯伦设法接近德国，希望与之结盟。倘若英德果真结成盟友的话，世界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精明的德国人却打算坐山观虎斗，企图以此从中得利。德国外交部政治司负责人霍尔斯坦写道：“保持行动自由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样一来，皇帝陛下不仅能够靠提供援助，而且甚至靠保持中立来要求得到适当的赔偿。”同时，德国方面又放出口风，若英国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德国可以考虑英国的要求。英国还不打算立即加入欧洲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只好放弃与德结盟的计划。

接着，英俄举行直接谈判，俄国不愿作出任何让步，谈判以失败告终。于是英国转向能在远东地区与俄国相抗衡的日本帝国。1902年1月，英日签署同盟条约，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英国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利，并允诺当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另一国加入俄国一方时，英国将与日本并肩作战。随着这一条约的产生，英国开始放弃“光荣孤立”政策。

英日同盟的建立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法国在震惊之余认为英俄之间存在开战的可能性，而根据1894年的《法俄协约》，法国将站在俄国一方与海峡那边的宿敌再燃战火。尽管当时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并不好，但法国也不愿跟英国打仗。英国亦不愿树敌过多。这样，英法两国反而从1903年起开始接近。德国则愈来愈坚定地认为英俄开战已为时不远。

英德关系及军备竞赛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德关系良好，因而在英俄关系恶化之时，英国便试图与德国结盟。但从19世纪末起英德关系由于德国大力扩充海军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英国海军部于1902年制订了第一个对付德国的计划。该部高级官员在10月份提醒内阁：“新的德国海军是以与我国交战为基点精心建设起来的。”英国海军主力开始部署在北海及附近地区，同时加快造舰速度。1906年，配备大口径火炮的新式“无畏”号战舰编入现役。英国海军还认真地考虑过对德国舰队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方案。但是，德国自1898年和1902年两度颁布《海军法》以后，海军迅速壮大起来。1907年，德国开始建造无畏级军舰。1909年初，德国人又秘密地加快了造舰速度，迫使英国放弃了“两强标准”。

A.J.P.Taylor, *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in Europe*, 1954, P.403.

K.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1830—1902*, 1970, P.478.

英国政府十分清楚德国扩充军备对英国造成的威胁。1905年底起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德国海军，而且也必须考虑到德国陆军。如果德国舰队力量有一天超过我们的话，德国陆军就能够征服我国。而德国人就没有同样的危险，因为无论我们的舰队力量如何占有优势，任何海军获得的胜利都不能使我们接近柏林。”温斯顿·丘吉尔也有同感，他说如果海军对德国是一种“奢侈”的话，那么对英国就是一种必需。因此，虽然英国在1909年放弃了“两强标准”，但仍定出了主力舰超过德国60%的目标。自由党政府增加军费，给海军的拨款从1900年的2920万镑，增加到1910年的4040万镑和1914年的4740万镑。而德国的海军人费在1900年折合740万镑，1910年增至2060万镑，1914年为2240万镑，远不及英国。因此到1914年大战爆发时，英德投入现役的无畏级战列舰的对比是20：13。

英国陆军也进行了改组和加强。以首相为首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于1903年建立，总参谋部于1909年设立，这完善了陆军指挥系统。但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并不具有在战略上协调陆军和海军的职能，只是在备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了全面的准备，诸如食品供应、新闻检查和间谍工作等做得很出色。此外，该委员会编制了一本《战争手册》，规定了战争临近时的行动程序。

陆军大臣理查·霍尔丹及时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一旦法德开战，英国将做好立即派出“远征军”的准备。这支远征军将包括6个装备齐全的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而且，为了保持足够的后备役兵力，霍尔丹着手将英国的民军改组为本土军。本土军拥有自己的武器装备，军人在4年中每年训练一次，30岁之前随时应召服现役。1908年起，霍尔丹在大学和公立学校中组建军官训练团。同年，在英布战争中的英雄巴登·鲍威尔的倡导下，童子军运动蓬勃兴起。1913年时，英国童子军成员有15.2万人之多。总之，英国陆海军和本土军到1914年大战爆发之时已有了很大的加强，并为及时参战做好了准备。

G.P.Gooch and H.Temperley (eds)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 1894—1914 , 1930 , Vol. , P.779.

A.J. P. Taylor , op. cit. P. 27.

三、英法、英俄关系和协约国的形成

英法协约

英法两国在历史上几乎一直是争霸欧洲及世界的对头，两国在 20 世纪开始时的关系也并不好。英日同盟的建立曾使法国紧张了一番，但英法双方此时都不愿采取损害对方的行动，而且都对日益强大的德国感到担心。因而从 1903 年起，英法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其标志就是两国元首的互访。1903 年 5 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出访巴黎。他那和蔼可亲的言谈举止打动了心怀戒意的法国人，获得了很大成功。7 月，法国总统卢贝回访伦敦。其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与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商讨了解决两国之间纠纷的办法，并形成了一致意见。1904 年 4 月 8 日，英法两国签订了一项重要的协约：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支配地位，法国则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法国在西非殖民地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英国则同意法国在纽芬兰周围海域享有捕鱼权；英国放弃对马达加斯加的要求；两国划定了在暹罗的势力范围，并共同统治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样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纠纷均得到化解。英国在与法国订立该协约时的出发点是要排除一个潜在的敌人，并不是想结交一个盟友。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德国方面的威胁和压力却使这项协约成了名副其实的盟约。

德俄接近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德国人更坚定地相信英俄战争不久将开始。于是，德国政府开始与俄国进行关于结盟的谈判，企图一举粉碎俄法之间的同盟。同年 10 月，事态尤为紧张。开赴日本海参战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北海向英国渔船开炮射击。法国急忙出面调停，俄国向英国表示道歉并同意将此事件交由国际仲裁。

次年 5 月，俄国战败。法国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仅靠俄国这个盟国无法保障其安全，因而加强与英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俄国却发现法国在日俄战争中并没有对自己提供很大的帮助，亲德势力乘机活动。7 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芬兰湾的一艘游艇中会晤，并签署了《比约克条约》。但是，尼古拉却无法说服手下亲法的大臣们批准这项条约。此外，当时俄国国内形势紧张，军事方面弱点很多，所以法国的政治和财政援助对于俄国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比约克条约》最终成为一张废纸。

摩洛哥危机

如果说日俄战争后的一系列事件是对俄法关系的考验的话，那么 1905 年的摩洛哥危机是对英法协约的挑战。这年 3 月，德皇威廉二世到达摩洛哥的丹吉尔访问，声称摩洛哥仍是一个独立国家，对法国的影响视而不见。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提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摩洛哥问题，其真实意图一方面是与法国争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要表明法国盟友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德国相信英俄等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法国。5 月，法国

在德国方面的战争威胁下作出让步，接纳皮洛夫的提议。法国外交大臣德尔卡赛以辞职相抗议。1906年1月，欧美各大国出席了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法德两国尖锐对立，法国要求控制摩洛哥的财政和治安，德国则主张维护摩洛哥的“独立”。英俄美意等国支持法国，德国的主张只得到奥匈帝国和摩洛哥的赞同。这次会议显示了三国同盟的分歧和英法俄等国关系的日趋紧密。德国在外交上受挫，但法国也未能立即完全占有摩洛哥。

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对于英国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进一步证实了它对德国所持的疑虑和担心。1907年1月，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艾尔·克罗在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指出德国的“目标是首先在欧洲建立起德国的霸权，并最终在世界建立霸权”，其行为对欧洲和平构成了威胁。因而，他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在过年20年中，德国人总是将让步视为软弱的表现。

英俄协约

爱德华·格雷自1905年接任外交大臣后继续奉行亲法的外交政策，这在整个摩洛哥危机中已有充分的表现。比如他在1906年1月发出指示，继续进行英法军事人员的官方会晤。而且，格雷还对德国大使说：如果法德之间因摩洛哥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摩洛哥危机结束后，格雷又大力发展与俄国的关系，终于在1907年8月31日达成了英俄协约。该协约与英法协约的形成相似，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在这份协约中，英俄两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但英国同意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两国还将伊朗划分为三个区，即东南部的英国区、北部的俄国区和它们之间的中立区。根据另一份照会，俄国还承认英国对波斯湾的支配权，英国则暗示它将不反对俄国对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的控制。

英俄协约的签字标志着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的形成，欧洲两大对立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峙局面也告完成。

不过，就英法、英俄协约内容本身而言，它们并不具有盟约的性质。而且英国政府到此时仍然避免与它国共同承担军事方面的义务。1911年夏摩洛哥危机再次爆发后，英法尽管恢复了参谋人员的会晤，但没有达成过任何军事协定。1914年5月，英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俄国进行了秘密的海军会谈。一个月后，外交大臣格雷在下院回答质询时承认有关英俄海军问题的做法是误入歧途。此外，在英俄协约签定后4年之久的一次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格雷介绍了英国“避免陷入束缚其手脚的纠缠”的方针。这表明，虽然“光荣孤立”政策早已停止施行，但其精神实质仍对英国外交政策有影响力。

与英法协约不同，英俄协约在英国国内一直不受欢迎，英国人讨厌与这个沙皇独裁国家交朋友。事实上，英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甚至比英德之间的经济矛盾更为尖锐。迟至1914年春，英伊石油公司还与德国有关方面达成协议，共同对付俄国和美国的竞争者。但是，格

G.P.Gooch and H.Temperley (eds), op.cit.Vol. , P.266.

G. P. Gooch and H. Temperley (eds), op. cit.Vol. , P. 266.

Anthony Wood, op.cit.P.415.

雷始终坚持调和主义政策，英俄关系才未发生大的波折。

四、大战前夕的英国外交

协约国集团形成之后，英国对欧外交政策仍显示出相当突出的矛盾性。一方面，英国愿意保持和发展与法俄两国的关系，同时又避免与它们正式结盟或承担任何军事方面的义务。另一方面，英国虽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集团的霸权野心保持警惕，但又努力避免双方关系的恶化。

对德政策

1908年，奥匈帝国宣布正式兼并名义上属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俄国支持下，塞尔维亚和门特内哥罗准备与奥匈帝国交战。英国却对此表示沉默，并拒绝了俄国关于黑海海峡问题的要求，使来访的俄国外交大臣伊斯托夫斯基空手而归。英王爱德华七世恰在此时出访奥地利的盟邦德国。结果，俄国在无法得到英法支持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奥匈帝国则在德国的帮助下将这块自1878年以来就处于其军事占领之下的地区正式据为己有。

德国对英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所持立场表示欣赏，便试图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要求英国承诺当德国与欧洲另一个大国交战时保持中立。格雷拒绝了德国的这项要求，认为“对德国协议……将使德国确立在欧洲的霸权。一旦达到这个目的，该协议将不会存在多久。”但是，孤立德国也是存有风险的一种政策。格雷在1909年写道：“真正使德国陷入孤立将意味着战争，而且让德国取得欧洲霸权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而在这两个极端的做法之间，欧洲外交还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显然，英国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卑不亢、有分寸的温和对德政策，颇有些中庸之道的特色。

但是，格雷的对德政策并未得到英国公众的普遍支持，自由党内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为首的激进派也持不同的看法。终于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英国转而采取了强硬的立场。5月，摩洛哥首都非斯发生反对苏丹的暴动，法国军队开进非斯维护秩序。德国担心法国乘机吞并整个摩洛哥，便于7月1日将“豹”号军舰开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德法军事冲突已近在眼前。英国政府及时干预，格雷在7月4日约见德国驻英大使，声称英国政府不会对那个地区的“任何新的安排”无动于衷。但德国方面未对英国的表态作出回应。7月21日，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举行的宴会上强调英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去维护和平和自己的利益。尽管他在演说中并没有点德国的名，但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即德国若对法开战，英国将站在法国一边。德国当时还不愿冒与英法交战的风险，于11月与法国达成妥协：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法国则割让法属刚果的两块领土给德国。

巴尔干危机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解决并未能消除欧洲的紧张局势。早在1911年9月，意大利为夺取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而对土耳其动武。土耳其的实

A.J. P.Taylor, *op. cit.* P.459.

C.J.Lowe and M. L. Dockrill, *The Mirage of Power*, 1972, Vol. I, P.27.

力遭到进一步削弱，引起巴尔干地区的动荡不安。1912年10月，巴尔干地区的门特内哥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为结束土耳其的外族统治，对土宣战。欧洲各大国对这场战争十分关注，协约国支持巴尔干诸国，同盟国则站在土耳其一边。但两大军事集团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所以巴尔干诸国于1912年12月3日与土耳其签署停战协定。接着，两大军事集团成员国和交战国出席了伦敦会议。次年5月达成《伦敦条约》，土耳其将其欧洲部分大部分领土割让给巴尔干诸国，阿尔巴尼亚获得独立。

仅仅一个月之后，巴尔干地区战火又起。这一次是保加利亚向它的邻国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宣战，不久门特内哥罗和土耳其也参加反保战争。结果保加利亚寡不敌众，遭到惨败，被迫签定《布加勒斯特条约》，丧失了大片领土。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该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奥匈帝国对此极为担心，视塞尔维亚为主要威胁，急欲拔掉这颗眼中钉。

于是，奥匈帝国早在1913年8月便秘密地向德意两国发出共同进攻塞尔维亚的提议，但由于意大利的拒绝，该提议未能付诸实施。不过，德国方面的反应却相当积极。同年10月，德皇威廉二世对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伯克托尔德说：“我支持你，我已准备好在你的行动需要时拔刀相助……对我来说，来自维也纳的一切都等于是命令，对此你尽管放心。”而且德奥两国都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迟打不如早打有利。协约国方面做出迅速反应：法国在1913年8月将军服服役期延长为3年，英国在斯卡帕湾等地建立两处新的海军基地，俄国也在大幅度扩充军队。但是，协约国方面的行动是防御性的，其中英俄两国完全不愿与德国开战，它们的目标是维持现状。

1914年6月28日，从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传出一则令世人震惊的消息：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人指使的凶手杀死。英国方面感到战争的危险在增强，但对战争是否会真的爆发仍持怀疑态度。在英国看来，斐迪南本人名声不佳，不少人对他的死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塞尔维亚经济落后，国家形象欠佳，因而单为此事投入战争似乎并不值得。尤其重要的是，英国不想与德国交战，甚至不愿看到两国关系的恶化。迟至7月23日，劳合-乔治还在下院对议员们说：英德关系是多年以来最好的。

英国各界对大战的预测和看法

那么，英国各界对于欧洲大战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就有人预言大规模战争将在欧洲爆发。霍尔在他的1889年版《国际法》前言中认为“下一次战争极有可能是一次大规模战争”。“所有国家将走上战场；世界贸易也许在海上见胜负；民族生存将危若累卵。”此后，英国又有不少人著书、上演戏剧模拟德国入侵英国。1909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记者罗伯特·布拉奇福德为《每日邮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陈述德国对英国的现实威胁，号召英国积极备战。这些文章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A.J.P.Taylor, op.cit.P.550.

I.F.Clarke, Voices Prophesying War, 1763—1984, 1966, Chs.3—4.

布拉奇福德在谈到他写这些文章时说：“我之所以写这些文章是因为我相信德国正处心积虑地要摧毁大英帝国，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做好抵御一场突然的、强大的进攻的准备。”

当时还有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可以设法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诺曼·安杰尔在他的《大幻想》中指出，尽管国际贸易关系还未能根绝战争，但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参战各方来说都意味着经济上的巨大灾难，因此他希望欧洲统治者们在新的现实面前能采取自制的外交行动，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安杰尔的这本书在1910年至1913年间售出200万册，影响极大。另外，许多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欧洲工人阶级有能力通过罢工和拒绝参战的方式来阻止战争的爆发。原独立工党主席、工党议会党团首任领袖凯尔·哈第就持这种看法。

中年知识分子中还有一种末日将临感，他们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对前途充满了悲观的看法。知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保守党人约翰·贝利在1914年4月28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人们曾赖以生存的旧秩序的世界似乎正在消失，像我这样习惯以和平、稳定的方式生活的人对前景感到不安。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对已过世的人感到有些羡慕。不管怎么说，他们不会受到那些沉重地压在我们活着的人身上的难题的困扰。”

然而，大多数英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14年时年仅20岁，他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过得很快乐，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降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工党内阁中任财政大臣的休·多尔顿是这样讲述他在1914年时的心情的：“在思想上意识到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意识到不断加强的高效率德国舰队对英国的威胁。但我在情感上并没有意识到任何近期的灾难性危险。”因此，英国在思想上、物质上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准备是不充分的。但是，欧洲局势的迅速发展，最终使英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参战

就在劳合-乔治在下院称赞英德关系的当天，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4日，格雷在内阁讨论爱尔兰问题的会议快结束时阐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和他本人的担心。英国领导人到此时才发现欧洲已处于大规模战争的前夜，但是，英国还存有幻想，要求德国方面对奥匈的行为加以节制。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国的这一努力不会有任何效果。

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奥匈的盟国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之后又对法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即使到这个时候，英国仍对是否参战犹豫不决，内阁的意见就存有很大分歧。按照英法、英俄协约，英国没有参战的义务。而且，英国与塞尔维亚之间也没有任何承担军事义务的条约。所以迟至8月2日，英国政府作出的

T. Brex, "Scare-Mongerings" from the Daily Mail, 1914, P. 66—69.

H. Weinroth, Norman Angell and the Great Illusion: "An Episode in Pre-1914 Pacifism", Historical Journal, XV, 1974.

H. Dalton, Call Back Yesterday, 1953, P. 80.

正式反应只是拒绝德国方面希望英国保持中立的要求和警告德国海军不得从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言外之意是，英国对德国从陆上进攻法国不会介意。阿斯奎斯首相此时最担心的是内阁会因英国贸然参战而倒台。

8月4日，德军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此举消除了阿斯奎斯的担心。内阁成员中除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辞职之外，都同意英国参战，因为根据1839年条约，英国与法、德、奥、俄四国共同保证比利时的中立。这样一来，英国的参战便师出有名、顺理成章了。同日晚11时，英国对德宣战。《每日邮报》记者克拉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始终对这场大战避而不谈，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才会经历这场大战，但它在此时爆发了，我们将经历它。”但是英国和其他参战国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延续4年之久。

